

文革史话

之

第七部

大幕落下

上卷

刘朝驹 著

中国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文革史话之第七部大幕落下 / 刘朝驹著. -- 香港:中国文化出版社,2021.9

ISBN 978 - 988 - 15988 - 6 - 8

I. ①文… II. ①刘… III. ①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27

书 名	文革史话之第七部大幕落下
作 者	刘朝驹
出 版	中国文化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化出版社 发行部(00852 - 21962638)
总社地址	香港九龙弥敦道 208 - 212 号四海大厦
经 销	香港九龙书店
总 编 审	中国文化出版社国内编审处
出版策划	宋艳丽
印 刷	北京云迪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32
印 张	10
字 数	308 千字
版 次	2021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988 - 15988 - 6 - 8
定 价	60.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zgwh.cn/>

目 录

◇上 卷◇

第 1370 回:国庆节,毛泽东由衷感叹 告迟群,农村过渡争议大	1
第 1371 回:刘冰信,毛泽东颇不满意 未曾说,科技就是生产力	8
第 1372 回:毛远新,开会帮助邓小平 清华园,楼内贴满大字报	17
第 1373 回:八人会,继续批评邓小平 急召回,张爱萍就不认错	24
第 1374 回:王洪文,十五日回到北京 刘冰等,参加政治局会议	31
第 1375 回:清华园,召开万人批判会 “打招呼”,卫星升天再收回	38
第 1376 回:见福特,张爱萍住进医院 康生逝,毛泽东坚持斗争	47
第 1377 回:七五年,国民经济大发展 噩耗至,周恩来总理逝世	56

第 1378 回:举国悲,周恩来遗体告别 北京城,十里长街送总理	65
第 1379 回:追悼会,毛泽东没有出席 选总理,毛泽东反复权衡	74
第 1380 回:二月二,中央下一号文件 召豫、甘,谈两地铁路问题	81
第 1381 回:春节后,“总理遗言”传全国 “转弯子”,北京开五省会议	88
第 1382 回:再召开,十二省“转弯子”会 找秘书,徐景贤上报材料	96
第 1383 回:先念病,李素文主管财经 江青忙,招十二省区领导	102
第 1384 回:看江城,再掀反击翻案风 追万里,《文汇报》“三五事件”	109
第 1385 回:小学生,抬花圈到天安门 三二五,《文汇报》再遭质疑	117
第 1386 回:看河南,大字报直指刘、纪 接建勋,政治局当面批邓	125
第 1387 回:南京市,悼总理群情激奋 大标语,明确打到张春桥	131
第 1388 回:清明节,雨花台数万之众 天安门,广场上花海诗潮	140
第 1389 回:政治局,忙开会紧急研究 做决定,要连夜撤走花圈	151

第 1390 回：冲会堂，广场上人潮汹涌 调民兵，北京市“四五事件”	158
第 1391 回：邓小平，再次被撤销职务 华国锋，党内第一副主席	167
第 1392 回：汪东兴，安排转移邓小平 为花圈，郑州有人被打死	175
第 1393 回：叶帅府，老干部来往频频 保定乱，陨石雨引发感慨	184
第 1394 回：告康生，章含之写揭发信 说江青、张春桥都是叛徒	191
第 1395 回：“怀疑论”，《北京日报》大讨论 要追查，《总理遗言》的作者	200
第 1396 回：华国锋，毛泽东写三句话 “亲启”信，景贤为春桥“找伴”	209
第 1397 回：湖南乱，保定农民开进城 朱德逝，叶剑英看华国锋	216
第 1398 回：七月七，皮定均飞机失事 七二八，中国唐山大地震	225
第 1399 回：急救灾，华国锋赶赴唐山 重庆市，百余干部奔成都	232
第 1400 回：山西省，书记王谦戴高帽 到天津，江青三下小靳庄	239
第 1401 回：见李敏，毛泽东依依不舍 到大寨，江青连夜回北京	247

第 1402 回:九月九,一代巨星陨东方 保遗体,政治局紧急会议	254
第 1403 回:闻噩耗,神州大地同悲哀 唁电多,五大洲为之震动	261
第 1404 回:齐哀悼,一个时代的结束 政治局,研究追悼会事宜	269
第 1405 回:华国锋,看病去见李先念 张平化,质疑米士奇电话	277
第 1406 回:上西山,李先念见叶剑英 争文稿,说“按既定方针办”	285
第 1407 回:九一八,毛泽东追悼大会 打内战,许世友儿子的信	292
第 1408 回:华国锋,定决心抓“四人帮” 下西山,叶剑英“狡兔三窟”	299
第七部上卷各地文革章回索引	308

第1370回：国庆节，毛泽东由衷感叹 告迟群，农村过渡争议大

1975年10月1日，国庆26周年。上午，毛泽东没有看书，也没有睡觉，独自靠在床头上，静静地想着。突然，他自言自语道：“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一个国庆节了，最后一个‘十一’了。”他随即转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平静地问：“这可能是我的最后一个‘十一’了吧？”

工作人员说：“怎么会呢？主席，您可别这么想。”

毛泽东认真地说：“怎么不会呢？哪有不死的人呢？死神面前，一律平等，毛泽东岂能例外？‘万寿无疆’，天大的唯心主义。”

这段时间，毛泽东喜欢怀念往事，常谈起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的事情，愿意看这方面内容的电影。一次，中南海游泳池放映《难忘的战斗》。影片中，人民群众扭着秧歌、打着腰鼓，夹道欢迎解放军进城时，毛泽东渐渐地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先是阵阵抽泣，流着眼泪问护士长吴旭君：“当年欢迎的人群里面有你吗？”

吴旭君流泪点头，毛泽东随即失声痛哭，哽咽不能语，大家哭成一片，电影也放映不下去了，工作人员只得将他搀扶退场。

这是毛泽东在看电影《雷锋》后的又一次流泪，当然，这次不只是流泪，而是失声痛哭。这也是老人家最后的一次看电影，亦是逝世前的最后一次无限悲壮的感情流露。有时，毛泽东还要来一些旧照片反复地看。据工作人员回忆，对两张旧照片，毛泽东看得津津有味：一张是他1942年穿着打补丁的裤子在延安给120师干部作报告，另一张是他1947年骑马行军于转战陕北的途中。

国庆节这天，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任命张廷发为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一书记。任命之初，邓小平找张廷发谈话，问他：“你现在是空军主要负责人，你对当前空军的工作有什么打算？”

张廷发简要汇报了空军存在的问题及准备用整顿的办法来解决的想法。

邓小平听后说：“好，就照这么干。部队要整顿，还是全面整顿好。”

不久，张廷发又见到叶剑英，他对张廷发讲的第一句话是：“廷发同志，空军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这年10月，也是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即林立衡一生中的又一次转折。这一转折，使她被迫脱下她从小就看惯穿惯的军装，换上了便服，从此脱离了生她、养她、使她一直感到比家庭还温暖还亲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1974年3月“批林批孔”开始后，林立衡和帮助小组部分人员又从空军招待所搬回警卫一师招待所的二层小楼上，以保证她的安全为主。当时，谢静宜也住在空军招待所。林立衡给江青写信，称“江妈妈”，将信交给谢静宜。谢静宜将信交给了周恩来。

4月11日和19日，林立衡两次写信给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高厚良，提出“组织上现在还没有把我定为林彪死党”，对派人看护她表示不满。

对林立衡的工作，空军一直是在总政主任李德生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李德生调沈阳后，汪东兴向空军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政治局要再议一下，对林立衡要解除监护，她和死党有区别，准许她同张清林来往。让她到农场劳动锻炼，更多地接触群众。

于是，空军党委研究决定，将林立衡和张清林安置在条件较好的河南开封某空降兵师农场。1974年7月29日，高厚良向林立衡、张清林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林立衡表态说：“坚决拥护中央的指示，毛主席在百忙中还关怀我，确实感到我们党的英明伟大。自己各方面的错误很严重，今后一定要努力锻炼自己。”

当晚，张清林从总后搬回到警卫一师。二人打报告提出结婚，空军政治部批准他们结婚。

8月2日，空政干部部派人陪同林立衡夫妇到河南开封。

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后，1975年10月，决定让林立衡夫妇作转业处理。

当空军领导机关向她传达这一决定时，林立衡认为难以接受，要求留在部队，得到的答复是：如不服从，“从10月30日停发工资，粮

票”。

林立衡大哭一场。其实她还不知道,当时,原在部队工作的所有受林彪牵连的人,已经统统都转业到地方了。

部队为林立衡转业选了三个地方:郑州、开封和孝感。邓小平圈了郑州。

林立衡到了郑州,在一个汽车厂分厂任革委会副主任。因为她没有子女,而且表示不愿再生子女,所以分工她管计划生育工作。

10月2日,正在清华大学“支左”的北京卫戍区警卫师干部惠宪钧和牛怀林,到钓鱼台担任警卫工作的中央警卫局干部孙凤山家串门。孙凤山不在家,他们就转到了邬吉成家。因为惠宪钧和牛怀林都是邬吉成在警卫师时的老同事。他们见邬吉成家里已有几个客人,就匆忙告辞。

邬吉成送他们下楼,惠宪钧家距此不远,就邀邬吉成到他家坐坐。因为好多年没见面了,又不过几步之遥,邬吉成就随他而去。

在惠宪钧家叙了一会儿旧,惠宪钧突然有几分犹豫地对邬吉成说:“我有件事想跟你谈谈。”

邬吉成问:“什么事?”

惠宪钧说:“我们还是到隔壁谈吧。”

他们来到了隔壁房间,惠宪钧跟邬吉成谈的是清华大学的事情,他说大学里几位老干部对迟群和谢静宜有意见,一是说迟群不民主,在大学里一个人说了算,校党委其他书记不敢说话;二是作风飞扬跋扈,经常大发脾气,有时还打碎东西,烧掉窗帘被服等公物,还得学校给换新的;三是迟群经常不上班,也不知在干什么事情;四是迟群对没有当上中央委员很不满,常说“吴德算个什么,为什么你们对他那么重视?”还说“主席身边的人都有职位了,为什么不给我安排?”等等。

惠宪钧还说:“这些问题我们曾通过有关渠道做过反映,但一直没有回音。我们想给张耀祠副主任写信,今天见到你顺便跟你谈谈。”说完,取出厚厚一叠材料交给邬吉成说:“我们已写了一份材料,反映了迟群违背党的原则的活动,希望能让毛主席看到,请你代我们把这份材料转给主席。”

邬吉成没接那叠材料,而是说:“材料我就不看了,而且也不能转,

干咱们这工作有纪律规定,不可以给首长转东西,这你们也清楚。我觉得你们还是按系统呈递的好。”

说到迟群,邬吉成说:“对他我不了解情况,你们对他有意见,应该在党委会议上,按毛主席的思想路线,从安定团结出发,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通过这种方式,走小道是不对的。”

邬吉成还说:“迟群、谢静宜的组织关系,现在北京市,在清华大学,已不在我们部队过组织生活,我们党委也根本管不了他们。你们说要给张耀祠写信事,一则他没有时间过问,二则他也不了解你们那里的情况。我的意见还是不写为好。只要按组织原则办,问题应该是可以解决的。”

不久,清华大学的一份简报上发表了刘冰、惠宪钧等人的意见书,并且附有按语说8341部队的两个副团长,一个是张耀祠,一个就是邬吉成,支持他们的观点。

又过了几天,汪东兴突然把电话打到邬吉成的家里:“邬吉成,惠宪钧是不是到过你那里?”

“有这事呵。”

“你都跟他谈了些什么?”汪东兴问。

“谈什么?没谈什么,他想让我帮他转交一份材料,我没有同意给他转,而是让他按组织系统递交。另外,就只能讲应该按毛泽东思想办事这些大道理呗。因为材料我也没看过,也不知道具体的情况,还能讲什么嘛。”

“你现在就回办公室,写份检讨把事情经过讲清楚,然后马上交给我。”

重新把和惠宪钧见面交谈的场面细细回想了一遍,邬吉成觉得自己实在没什么可检讨的,就把见面的全过程,自己讲了什么话,都写了出来。当天下午就送给了汪东兴。汪东兴收起这份“检讨”,便再没了下文。

1975年国庆节后,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外宾,李先念陪同。会见结束,外宾离开后,李先念单独与毛泽东谈话,他说:“最近,有一些讲话,我觉得有问题,味道不对,似乎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1975年10月,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和铁瑛与纪登奎研究了原浙

江省造反派头头、现任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张永生的问题后，以浙江省委的名义给中央打报告，说张永生“在任浙江美术学院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期间，利用职权盗窃国画库 400 幅国画”，以此要求将张永生调离浙江。

这个报告台头只写了“党中央”，没有写“毛主席”。所以，纪登奎接到报告后，便以中央组织部党的核心小组名义，将张永生送到河北省遵化县建明公社西铺（穷棒子）大队劳动锻炼。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许多歌曲因为词曲作者的原因都基本上不能唱了。比如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虽然是聂耳作曲，但是因为词作者是“四条汉子”之一的田汉，所以只能奏曲，不能唱词了。而冼星海的歌只有《救国军歌》和《到敌人后方去》允许唱，但也都被改了歌词。毛泽东做出调整文艺政策的指示后，音乐界就有人想改变这种现象。正好，1975 年 9 月中旬，冼星海夫人钱韵玲因公自杭州来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陈莲受《创业》批示启发，建议钱韵玲给毛主席写信，反映一下这个问题，钱韵玲同意，音乐界的李焕之、李德伦也十分赞成。他们议论到，7 月 17 日，聂耳逝世 40 周年，国内没有表示，日本却开了纪念会；10 月 30 日，是冼星海逝世 30 周年，如国内再无表示，苏联借此做文章，对我们国家不利。他们认为，从这点着笔，上书毛泽东，提出希望在 10 月 30 日冼星海逝世 30 周年开展纪念活动。他们又同政研室负责人于光远商量，得到于光远的支持。于是，由陈莲代为拟稿，以钱韵玲的名义给毛泽东写信，于 9 月 27 日写成，很快由胡乔木、于光远转邓小平送毛泽东。毛泽东赞成演出，并于 10 月 3 日批示将钱韵玲的信“印发在京中央各同志”。

毛泽东批示下达后，李德伦等积极组织纪念音乐会的排练。首都音乐界人士兴高采烈，中央各音乐团体争相参加，北京市专业音乐工作者和业余音乐爱好者也表现了极大的热情，民族乐队的人数达到 100 多人。国务院政研室的负责人邓力群参与了整个音乐会和纪念活动的准备工作。

纪念聂耳、冼星海音乐会确定在 10 月 25 日举行，李德伦写信邀请邓颖超出席。邓颖超回电话，说因“总理身体不好，音乐会不能到场”，但她同总理要一起通过电视看演出实况。

1975年10月4日,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讲话说:“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

10月7日,邓力群主持写出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的初稿。这篇文稿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出发点和归宿,全面论述了毛泽东要学理论、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项指示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宣传了1975年中央关于解决铁路问题、钢铁问题、国防工业问题、农业问题以及一些地区和单位问题所发出的一系列重要文件的精神,概括了邓小平全面整顿的思想,提出了“以三项指示为纲”,称得上是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的政治纲领。另外两篇已经基本形成的文件“工业二十条”和《汇报提纲》,则分别是经济工作的纲领和科技文教工作的纲领。

10月9日下午,胡乔木到国务院参加华国锋召集的会议,讨论华国锋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的修改问题。

10月10日,毛远新从新疆返回辽宁时路过北京,毛泽东决定把他留下,作为病势越来越重的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泽东向政治局做了通报。于是毛远新就留在了中南海,住在怡年堂后边的一个小院里。

1975年国庆节前夕,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3700多位代表从山西大寨移师北京继续开会。9月23日至10月21日,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讨论陈永贵提出的迅速过渡的建议。这次座谈会除了政治局委员外,还特地请了12个省的省委书记参加。既然不是所有的省委书记都来,请谁不请谁便大有名堂。陈永贵知道山西省省委书记王谦倾向于搞大队核算,就建议说:“让王谦来一下更好,说一下大队核算的好处。”结果,偏偏王谦没有来成,陈永贵老大不高兴。

座谈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赵紫阳和谭启龙这两位大省的省委书记坚决反对大队核算过渡,连张春桥也表示不同意。陈永贵则力主过渡,一再强调大队核算的好处。争到上火处还忍不住高腔大嗓地嚷起来,以至后来有“陈永贵大闹12省书记会”之说。10月19日,第

一次全农会宣告闭幕，而这个平行进行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仍然没有争出一个结果。两天后，由于分歧太大，意见无法统一，座谈会无结果而散，陈永贵的提议被暂时搁置。

散会后，张春桥让上海派人去昔阳学习大队核算的经验，昔阳县委立即向陈永贵报告。陈永贵怒道：“不要给他介绍经验！到底搞什么鬼哩，政治局讨论时，他坚决不同意，为什么又偷偷摸摸到这里学大队核算的经验来了？”陈永贵既生气，又感到莫名其妙。发了一通火之后，还是以事业为重，改口说：“如果他是真的学，你给他弄点材料送去也可以。”

10月15日，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做了题为《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总结报告。

做完总结报告，华国锋从会议大厅走出来，在江苏厅前碰见了陈永贵。两位山西老乡很亲切地走到一块聊了起来。华国锋说：“哎呀，我今天的报告不知怎么样？”话音刚落，谭震林出来了，只见他举着手笑道：

“今天的报告可好呀！”

没想到江青也在后边跟着，她走到华国锋和陈永贵面前，清清楚楚地说：

“这个报告说轻一点是修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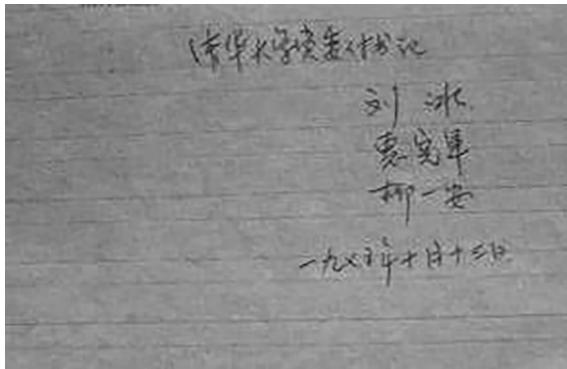
华国锋和陈永贵闻言不禁一愣。

第 1371 回：刘冰信，毛泽东颇不满意 未曾说，科技就是生产力

10月的一天，清华大学的迟群亲自召开全校工宣队队员会议，但是没有通知其他书记和宣传队负责人参加。迟群在会上说：“现在有人要同我们保持距离。我们要准备迎接一场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我们有办法、有能力解决。我迟群还要做党委书记，有人盼着我走，办不到。”

刘冰预感到迟群已经知道了他们给毛泽东写信的事。此时，吕方正已调回部队，刘冰、柳一安、惠宪钧心急如焚，反复商量后，决定第二次上书毛泽东。

这封信由刘冰起草，于 10 月 13 日完稿。信的抬头是“邓副主席转呈毛主席”。随信附有《关于迟群同志的错误补充情况》。



与前一封信相比，这封信写得更加尖锐，而且把谢静宜也摆了进去。信中说：“联想起‘十大’以后迟群发泄不满情绪时，她跪在迟群面前，握着迟群的手讲些不合原则的话，当时我们就实在看不下去。”这番情景是在开党委书记办公会议时发生的，谢静宜居然在迟群面前单

腿跪下，央求他不要再发牢骚了。此举将站在一旁的刘冰和惠宪钧、柳一安惊得目瞪口呆。

这封信写成后还像上次那样，送到邓小平住处，请警卫人员将信送王秘书。但王瑞林这回没有接收这封信，回答说：“这里不收信了，信可送国务院。”

刘冰他们的心情很沉重，王秘书不收信可能是头一封信出了问题。

事已至此，刘冰索性破釜沉舟，找到了抗日战争中太行山的老战友、原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时任教育部副部长李琦，请他帮助。

见面后，刘冰依然是开门见山说明来意，向李琦介绍了迟群、谢静宜在清华的所作所为，并告诉他这是第二封信，请他设法送到邓小平家里。

李琦听完后，非常高兴，说：“这件事太好了，你们做了件好事啊！我完全支持你们。小平同志的秘书王瑞林我很熟悉，我到国务院见到他时，交给他也行。你放心，信一定能送到。”

10月13日当天，李琦就把信交给了胡乔木。

在向毛泽东写信的同时，刘冰等人还将同样内容的信送给当时北京市委的主要领导人，并向北京市委科教组负责人作了同样内容的口头汇报，要求北京市委调查处理迟群、谢静宜的问题。

从市委返回学校时，刘冰又想到了万里。于是，又找到他，向他详细地讲了迟群、谢静宜的问题，以及他们两次给毛泽东写信的情况，问他是否听说了，知道不知道主席有什么指示。

万里说：“你们给主席的信，我听说了，主席有什么指示，不知道。迟群、谢静宜的问题我知道一点。你可要提高警惕，要按毛主席的‘三要三不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让人家抓住你的把柄。”

刘冰说：“这些年来，我被整怕了，真想调离清华，你见到纪登奎同志跟他说说，把我调出这个是非之地吧。”

万里说：“刘冰！你现在可不能走！……尤其现在不能走，要从整个清华考虑……你要安心，只是工作难做就是了。这是斗争，很复杂。你只要坚持‘三要三不要’，他们对你就没办法。你给主席的信会有答复的。”

1975年9月，国务院政研室向党中央、国务院开列了邀请出席1975年国庆招待会的科技教育界、文化艺术界、新闻出版界人士的名单。这个名单相当广泛，在文艺界的名单中就有周扬。可是，临近国庆，周扬却一直没有收到企盼中的那张请柬。周扬未能在国庆招待会上露面。

国庆招待会后，哲学社会科学部政工组将学部出席招待会的吕叔湘、任继愈、俞平伯、顾颉刚、冯至、何其芳、丁声树、吴世昌、贺麟、韩幽桐、严中平等对出席这次招待会的反映，整理成材料编印在《政工简报》第31期上。材料说：

学部有21人出席了邓副总理主持的以周总理名义举行的盛大招待会，庆祝国庆26周年。他们在招待会上听了邓副总理的祝酒词，看到一片朝气蓬勃、团结胜利的景象，非常兴奋。外国文学所原所长冯至说：“宴会充分体现了我国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宗教所原副所长任继愈说：“宴会是一个团结的大会，出席的有老年的、中年的，也有青少年，是我们党和国家兴旺发达的表现。”大家谈到，宴会充分体现了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精神。经济所原副所长严中平说：“参加这次招待会，说明党认真贯彻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文学所原所长何其芳说：“出席这次盛会，深切感到党对于犯过错误，承认有错误并有所改正的党员干部的关怀和鼓励。”大家听邓副总理讲要实现“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这一宏伟目标，极为振奋，都表示要为完成这一历史任务贡献自己的力量。有的同志还认为，一些与国民党上层有过联系的人物出席这次招待会，对于党的统战工作有积极的影响。

胡乔木看到这份《政工简报》后，于10月13日呈送给邓小平，请他考虑“要不要转送主席”。并于当晚，将李琦当天转交刘冰等人反映迟群在清华问题的第二封信亲自送到邓小平家里。在此之前，康生秘书李鑫曾跟胡乔木说过：“清华、北大的事都是毛主席直接管的，你千万不要插手。”

邓小平于10月15日将31期《政工简报》批“送主席看看”。

第二天，10月16日，毛泽东在31期《政工简报》第一页的空白处批到：

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

并嘱：送政治局各同志。

10月19日，中共中央转发华国锋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10月19日这天，毛泽东在会见外宾后同李先念、汪东兴等谈话：

“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迟群是反革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一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小谢是带3万工人进清华大学的。迟群我还不认识哩。”

他又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你们6人先开会研究处理。此两封信印发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

毛泽东说的“你们6人”是指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吴德、谢静宜、迟群。“此两封信”是指刘冰等人8月和10月的两次来信。

毛泽东早就收到了邓小平转来的刘冰等人8月份写来的第一封信。他看后，没有说什么，指着放文件的柜子对秘书说：“先放着。”

收到刘冰的第二封信后，毛泽东又把刘冰的第一封信找出来重新看了一遍，很不高兴。于是有了10月19日对李先念、汪东兴等人的谈话。

随后，李先念、汪东兴把毛泽东19日谈话的内容向邓小平作了传达。邓小平决定，把毛泽东19日的谈话，向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传达。

10月21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邓小平、乔冠华、黄镇在座。

基辛格说：“我们同人民共和国的关系赋予极大的重要意义。”

毛泽东说：“意义有一点，不大。”

基辛格说：“我们有一些共同的对手。”

毛泽东说：“对，你们（指基辛格和邓小平）吵了一架。”

基辛格说：“只是在为了达到共同的目标应采取什么手段上吵了一点。”

毛泽东说：“你昨天说美国无求于中国，中国也无求于美国。我看部分是对的，部分是不对的，小的是台湾，大的是世界，如果双方都无所求，你们为什么要来北京，我们为什么接待你们和总统？”

基辛格说：“你们对世界问题的概念是我们打交道的国家中最清楚的，而且大部分意见是我们都同意。苏联对我们是极大地危险，但并不在我们优先考虑的问题中占第一位。”

毛泽东说：“不对，超级大国只有两个，我们是最后，美国、苏联、欧洲、日本，我们是第五。你们就是踏着我们的肩膀跑莫斯科，现在这个肩膀没有用了。”

基辛格说：“我们不是想利用中国跑莫斯科，因为这种做法会是自杀性的。”

毛泽东说：“已经跑过了！”

当基辛格说美国准备曾试图表示在军事问题上提供帮助时，毛泽东说：“军事方面，我们现在不谈，等打起来再说。”

关于世界形势，基辛格说：“我重读了两年前主席与我的谈话，从中我读到了主席对世界形势极深刻的分析，我们十分重视。”

毛泽东说：“有些估计还要看。现在欧洲太软，太散，害怕苏联。西德和东德统一起来，就像（举拳头）这样，我们赞成统一。现在德国统一没有危险，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致。日本自己要搞霸权主义。”

基辛格说：“日本称霸的潜力是存在的。”

毛泽东说：“你太忙，不忙看来也不行啊。风雨欲来燕子忙，现在世界不太平，风雨要来，所以燕子就忙了。推迟可以，但要阻止风雨难。”

谈话中，毛泽东还说：“第一，问候福特总统先生。第二，问候尼克松先生。”

基辛格说：“这两件事我都将十分愉快地去做。”

1975年，已经75岁的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李大章向中央提交了辞职报告，说自己年龄大了，在一线工作有点力不从心，希望辞去四川

的职务,退下来。

李大章退下来,怎么安排?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任人大副委员长。那么,谁去接替李大章的工作呢?中央主管组织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在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说:

“如果大章同志退下来,可以先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人大开会后再任命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对于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革委会主任的刘兴元,纪登奎说:“全国像他这样到地方主政的军队干部,早在前一年就陆续回归部队了,就让他回部队吧。建议赵紫阳到四川,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四川省革委会主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三副担子一肩挑,一步到位。”

纪登奎的建议获得大家的同意。

10月21日,邓小平报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事宜的报告。报告说:

政治局近日会议,讨论到主席在高级知识分子参加国庆宴会的反映简报上所作重要批示的时候,谈到党外党内有一批人,需要在政治上早点安排,都同意积极准备,早点召开全国政协会议。另外,政治局一致意见,拟于近日召开一次人大常委会议,补选两位人大常委副委员长,一为主席和中央已经决定的李大章同志,一为邓颖超同志。

10月22日,毛泽东对邓小平报送的报告批示:“同意。”

赵紫阳参加了9月23日至10月21日举行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会议即将结束时,邓小平约赵紫阳单独谈话,恰巧那天邓小平有事,改在了第二天,他和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廖志高等一起去见了邓小平。

见面后,邓小平告诉赵紫阳中央决定让他去四川,问他有什么考虑?据说当时赵紫阳唯一的顾虑,就是与四川的一把手刘兴元如何共事?

邓小平鼓励赵紫阳大胆工作,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他说:“你去了以后,要准备艰苦奋斗,就是搞得好,也要三年才能见效果。”

很快,赵紫阳在北京民族饭店的一个会议室与参加农村工作座谈

会的四川代表团部分代表见面。

10月23日，赵紫阳乘四川代表团的包机入川，在家的四川省委领导和省委秘书长兼省革委办事组组长杜心源等人在机场迎接。

10月23日，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19日与李先念、汪东兴等人关于刘冰信的谈话，并决定，按毛泽东的意见，召开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传达讨论。

10月25日，清华大学人事处负责人林钧万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周荣鑫“组织上任人唯亲，搞宗派”，想把迟群“从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搞倒，把他从教育部门领导班子中赶出去”，“千方百计地要否定科教组几年来的工作”，“已在全国特别是教育战线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同时，说迟群“在文化大革命中，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教育革命做出了他应有的贡献”，“在教育战线上是有影响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等等。

对这封信，毛泽东批示：“先作调查，然后讨论一次。”

10月25日晚上，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的音乐会如期举行。民族文化宫一派节日景象，大家喜气洋洋，气氛特别热烈。宋任穷、王震、陈丕显、周建人等出席，政研室胡乔木等7位负责人也都出席。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音乐界人士几乎都来了。演出大受欢迎，形成《创业》批示后文艺调整中的又一个高潮。民族文化宫剧场实在容纳不下各界观众。所以，演出两天后，又移到首都体育馆演了3天。从10月30日起，上海也参照北京的样子开音乐会，在人民广场演出了几场，广州、沈阳、大连也都开了音乐会。

10月27日，邓小平、李先念、吴德、汪东兴联名向毛泽东写报告，准备向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传达毛泽东19日的谈话。报告里提到：“其中主席对小平、江青同志批评的内容，建议不传达。”毛泽东在这句话下面画了一条线，写了一个“对”字。

10月27日这天，毛泽东对江青下去“蹲点”等问题批示到：“改一改，不要蹲点。军队、地方都不要蹲点，特别在北京，我在北京没有去个（过）任何一个地方，说话不要冲口而出。不要管，要顾大局，不要打电话，不要来看我，有事写信。”

10月31日，邓小平将胡乔木转来的鲁迅之子周海婴关于鲁迅著

作的研究和出版问题的来信报送毛泽东。信中提出：

一、将戚本禹过去从文化部保险柜弄走的全部鲁迅书信手稿一千多封交给国家文物局负责保护收藏，由文物局负责全部影印出版，同时由出版局负责编印一部比较完备和准确的鲁迅书信集。

二、现在继续编辑出版一部比较完善的新的注释本《鲁迅全集》（包括书信和日记），需要动员一些认识和熟悉鲁迅的老同志来参加工作。

三、将 1958 年下放北京市文化局的鲁迅博物馆重新划归国家文物局领导，在该馆增设鲁迅研究室，调集对鲁迅研究有相当基础的人员，请一些对鲁迅生平熟悉了解的老同志做顾问，除和出版局共同负责鲁迅全集的注释外，专门负责鲁迅传记和年谱的编写工作。

周海婴的这封信写于 1975 年 10 月 28 日，是受 1975 年 7 月以来，文艺界发生的一些事情的影响，周海婴和鲁迅的弟弟周建人感到，应该乘这个时机，给毛泽东写信，反映鲁迅著作和书信的出版问题。10 月下旬，周海婴到胡乔木家里，把有关情况和向毛主席写信的想法对胡乔木讲了一遍，请胡乔木予以指点。胡乔木支持周海婴给毛泽东写信，并对信的写法，详细地谈了意见。10 月 28 日，周海婴的信写好后，又交给胡乔木转呈。

31 日当晚，邓小平又致信毛泽东：“我有些事须向主席当面谈谈，并取得主席的指示和教诲。明（一日）下午或晚上都可以。如蒙许可，请随时通知。”

11 月 1 日，毛泽东对周海婴的信批示：

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

毛泽东
十一月一日

当天，邓小平指示汪东兴：“即照主席批示印发。”

11 月 1 日晚，毛泽东召见邓小平。见面时，毛泽东批评邓小平为刘冰转信一事。邓小平向毛泽东问及《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语言困难的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汇报中说我曾说过‘科学是生产力’，我说过这样的话吗？”

邓小平问这一时期以来，中央工作的方针、政策是否正确？

毛泽东说了一个字：“对。”

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不容多谈，邓小平很快就告辞了。

在胡耀邦主持起草的《汇报提纲》前三稿中，从1969年编印的《毛主席论科学技术革命》的小红本引用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科学院为起草《汇报提纲》而编辑的《十六条语录》中，对这一条注的出处是：“毛泽东：《在听取科学技术规划汇报时的谈话》，1963年12月。”邓小平赞成这个论点。

胡乔木接手修改《汇报提纲》后，曾经查对过这句话的出处，一时没有查对得很清楚。他决定暂时保留，送请毛泽东审定。于是，胡乔木把包括这一条语录出处在内的《汇报提纲》第二部分中所引用的毛主席关于科技工作指示的出处（共二十六处）印出，作为9月26日国务院讨论稿的附件之一，其中引了两句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并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三分册第369页的论述，作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的注释。注文为：“关于这一论点，马克思在讲到近代社会的劳动生产力时，有过这样的论述：‘所谓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其次是在生产过程内部联合起来的社会力量，最后是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转移到死的生产力上面去的技巧’。”同时要求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同志进一步搜集和整理马、恩、列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材料。

毛泽东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提出了疑问，于是胡乔木进一步作查对工作。他查到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听取聂荣臻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时，列席的韩光、范长江、于光远在笔记上都记有：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等话。但是并没有“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鉴于《毛主席论科学技术革命》中所引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一时查不清出处，于是，在《汇报提纲》退回后的改稿中删去了这句话，同时，在所附《出处》中也相应删去它的出处和引马克思的话所作的注释。

第1372回：毛远新，开会帮助邓小平 清华园，楼内贴满大字报

1975年11月2日，毛泽东看了胡乔木10月23日报送的作家姚雪垠的来信。姚雪垠信中说：

《李自成》第一卷于一九六三年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我曾给主席寄上一部。一九六六年夏，得知主席看过了这部书，曾指示说：这部书虽然有些问题，但应该让作者继续写下去，将全书写完。这部小说共五卷，写成后估计有二百五十万至三百万字，第二卷已写成近两年，但还没有地方出版，请求主席帮助解决。

姚雪垠是小说《李自成》的作者，在武汉。因为毛泽东一向重视明末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这段历史，因此，1963年，《李自成》第一卷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作者姚雪垠即给毛泽东寄赠一部。1966年8月中旬，毛泽东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对列席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说：“你告诉武汉市委，对姚雪垠要予以保护。他写的《李自成》第一卷，分上下两册，上册已看完，写得不错，让他继续写下去。”第二天一早，王任重就给武汉市委书记宋侃夫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做出了不批斗，不游街，不抄家等“予以保护”的规定。这样，姚雪垠得以在文革中继续写作，并于1973年完成了《李自成》第二卷的书稿，于1974年抄出一份清稿征求意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书写成后无法出版，于是他按照《李自成》一书责任编辑江晓天的建议：上书毛泽东。

1975年10月8日，姚雪垠给曾长期担任武汉市委书记、当时调任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临时领导小组成员的宋一平写去一封长信，“汇报稿子的进行情况以及出版问题。”说明“我想给主席写一封简短而诚恳的信。”并详细叙述了内容要点，希望宋一平设法“通过什么渠道，将我的信转到主席手中。”宋一平接读姚雪垠信后，即向胡乔木作了汇报，很快复信表示支持，并嘱咐“给毛主席的信要用毛笔书写，并

且字要写大些。”

10月23日，宋一平收到姚雪垠写给毛泽东的信后，即转交给胡乔木。这时，毛泽东对邓小平转交的刘冰等人的信已有批评。胡乔木与吴冷西等商量后，没有将姚雪垠的信通过邓小平转送，而是由胡乔木直接转呈毛泽东。为此，胡乔木于23日当天写了一份报告给毛泽东：

送上长篇小说《李自成》作者姚雪垠由武汉写给您的一封信。姚在信里说，这部小说他拟写五卷约三百万字，第一卷已改写，第二卷已写成近两年，但还没有地方出版，请求您能给予帮助。姚的信是宋一平同志托我转送的。宋现在哲学社会科学部工作，以前长期在武汉，所以姚把信寄给他。宋还把姚给他的两封信也给我看了。因为这两信可以帮助了解姚目前的具体困难，所以现在也一起附上，供您在需要时参阅。

11月2日，毛泽东在胡乔木的报告上批示：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

毛泽东

十一月二日

印成以后多向
我写信寄来为好
主席看这些
已将送上长篇小说《李自成》作者
姚雪垠由武汉写给您的一封
信。他在信里说，这部小说，仙机

尽管此时毛泽东已成功进行了眼科手术，但是这个批示的手迹仍是非常潦草，甚至无法完整地完成签名。

1975年冬，姚雪垠调进北京，《李自成》第二卷也得以发排。

11月2日上午，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时谈到对形势的看法。他说：

“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

毛远新列举了几个方面的表现：

1、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

2、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支流，似乎迟群、小谢讲了走后门的错话，干扰，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得一大堆。

3、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

毛远新说：“‘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了。”

“一些同志到一起总是议论文化大革命的阴暗面，发牢骚，有人把文化大革命看成一场灾难似的。”

毛远新说：“当前一方面要进一步落实主席的干部政策，另一方面也应该对干部教育，有正确的态度，应该感谢革命群众对自己的帮助教育。”

讲到这里，毛泽东说：“对。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你找小平、东兴、锡联谈一下，说是我让你找他们，还有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到我这里来，当面你讲，不要吞吞吐吐，开门见山，把意见全讲。我已找小平谈了两次，昨天晚上又讲了。你要帮助他提高。”

毛泽东考虑了一下又说：“先找小平、锡联、东兴同志开个会，你把这些意见全讲，谈完了再来。”

当晚，毛远新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把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召集到一起开会。他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开门见山的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这段时间的路线不正确，在各方面都有复辟现象，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坐在那里抽着烟，默默地听着，没有讲话。当毛远新再一次重复地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3个多月的路线不对时，邓小平把烟在烟缸中熄掉，说：

“这个问题还可以再想一下。你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是从今年3月‘九号文件’开始抓工作，主持中央工作是7月，‘九号文件’以后是什么路线，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可以考虑嘛，上我的账要从‘九号文件’开始算起。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九号文件以后的评价，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

邓小平列举了3月以来做了哪些工作和讲了哪些话。并说：“昨天（即11月1日）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主席说对。”

邓小平还说：“把生产搞上去，安定团结，是主席的指示，执行这个指示是对的。”

后来，邓小平表示愿作自我批评。

第二天，11月3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他与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开会的情况，毛泽东对毛远新说：“你没有精神准备，他也没有料到，顶了起来。你有理，顺着不好，顶了他，这就叫帮助。”

毛远新说：“小平同志后来收回了原来的话。”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说：“他要有个转弯，他开始转弯了，小平同志态度很好。”

当毛远新问下一步怎么办时，毛泽东说：“再开会，帮助邓小平，扩大一点人，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也参加，你们8个人先讨论，不怕吵，吵也不要紧，然后政治局再讨论。”

毛泽东说：“讨论限于文化大革命问题，做个决议。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是阶级斗争嘛。”“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

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你们8个人先讨论。一次开不好，两次，三次，不要着急。”

11月3日下午，清华大学的刘冰原定下午14时30分和惠宪钧、吕方正一起进城参观展览会。下午14时25分，他正准备出门时，有人敲门。

刘冰打开门，见是迟群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通知他说：“迟群让我通知您，下午3点在第二教室楼召开党委扩大会议。请您务必参加。进城的车子我已通知车队不用来了。”年轻人说。

“好，我知道了。”刘冰说。

送走年轻人，刘冰立即打电话给惠宪钧：“迟群办公室来人通知3点钟开常委会，我判断是有关我们信的问题，请通知老柳迅速到我办公室商量对策。”

当刘冰骑自行车赶到办公室时，已是14时40分。此时惠宪钧、柳一安都在他的办公室。3人简单交换了一下意见，感觉几乎是一样的：“既然常委会的召开是关于我们信的事，开会前又不和我们商量，搞突然袭击，证明毛主席支持迟群，而不支持我们。怎么办？”他们紧张地商量着，认为还是要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一切按党的原则行事。既然是关于信的问题，很可能要他们在会上宣读，于是惠宪钧跑步到他办公室取来信的底稿，然后3人快步走向第二教室楼。

15时整。会议室满屋子的人，黑压压一片。除了常委、各系党委书记、校级各部处负责人外，还有很多北大党委的生面孔。

15时15分，吴德在迟群、谢静宜的陪伴下进入会场。他是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安排，前来参加清华大学校党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有关指示精神。

刘冰站起来吴德他握手，吴德只是冷冷地点点头，刘冰已伸出的手只好收回来了。

大家坐定后，吴德从座位上站起来，清了清嗓子说：“这一个时期，清华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刘冰、惠宪钧、柳一安3位副书记和常委吕方

正4人给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写信，告了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同志和我们的市委书记谢静宜同志。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于他们的信作了批示，现在我把批示的主要精神给大家传达一下。”然后，他将毛泽东对刘冰等人上书的批评意见，用自己的话做了传达，可以清楚地听出来，毛泽东不支持刘冰等人的上书。

会场安静极了，几乎相邻的人都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

此时刘冰怎么也想不通：“本是一腔热血，出于对党和毛主席的忠诚才给主席写信的呀。怎么变成了反对毛主席呢？”

吴德说：“这个问题是什么性质？这个是非要弄清楚。要按毛主席的指示进行讨论，辩论认清问题的性质。”然后，他宣布：“这个会请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同志主持。”

迟群站起来，清了清嗓子说：“我们请刘冰把他们给毛主席写的信在这里念一念。”

刘冰定了定神，强迫自己镇静下来，然后站起来，拉过话筒，一字一句地读着那封曾寄予他们无限希望的信。他语速很慢，想让会场里所有的人能听清楚迟群、谢静宜存在的问题。

在念信的过程中，刘冰不断被来自各个方向的驳斥、批判、声讨、反对的声音所打断，几乎无法念下去。他几次提出不念了，迟群不得不劝阻大家暂停声讨，让刘冰把信念完。

刚念完信，刘冰还没坐稳，人们就纷纷站起来，争先恐后的批判刘冰他们，个个义愤填膺，人人慷慨激昂，都说刘冰他们是“诬告”，“恶人先告状”，“欺骗毛主席”，“用写信的办法反对毛主席”等等。

原来有些人对迟群和谢静宜是有看法的，但是一看这阵势，也都说自己是“上当了”，并且“走资派”、“投降派”全来了。他们说，“刘冰是走资派，你们三个是投降派。”

刘冰申辩说：“我们给毛主席写信反映问题，正是对毛主席、对党中央的忠诚。信里反映的问题都是事实。”

这时，吴德插话说：“刘冰！你应该老老实实，把你们的活动拿到桌面上，不要在桌子底下活动。”

刘冰说：“我们没有搞桌子底下活动，我们完全是按照组织原则办的，给市委科教组汇报过，给吴德同志报告过。”

吴德说：“你没有给我报告，你那是信。”

刘冰说：“信也算数吧！我们还两次请求你接见，要向你汇报，这是在桌子底下活动吗？”

吴德不说话了。

散会后，迟群要刘冰和惠宪钧、柳一安留下，给他们宣布纪律：“不准相互串联，不准到校外，不准请假，要按时上下班，不准迟到早退。”

第二天，二教楼会议室就贴满了大字报。其中最为显眼的是清华大学政治部副主任吴伟煜写的《走资派还在走》和《投降派确实有》这两张大字报。

8点整，迟群、谢静宜来了。迟群宣布开会，他说：“昨天吴德同志传达了我们主席的批示精神，刘冰宣读了他们的信，大家应根据吴德同志讲的精神展开辩论，对他们的信可以提问，可以批判，刘冰他们也可以申辩。”

但是，整个会议过程都是一面倒，对迟群、谢静宜全是赞扬，对刘冰等人都是批判。不管刘冰，还是惠宪钧、柳一安，只要一说话就遭到围攻。

从那以后，清华大学几乎天天开会斗争刘冰等人，每天就像学生上课、工人做工那样，8小时开会批判……规模逐渐扩大，到11月12日，批判会已经扩大到全校支部书记以上党内外干部1300余人参加。在这次会上，只有批斗者的发言，刘冰等3人已没有一言辩护的机会了。不是不让他们辩护，而是没人听他们的辩护，与会者也不给他们辩护的时间了。

第1373回：八人会，继续批评邓小平 急召回，张爱萍就不认错

11月4日，毛远新按照毛泽东说的，召集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8人开会。他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然后首先发言，从对毛泽东谈话的理解，说到邓小平的问题，批评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

当晚，毛远新在中南海游泳池向毛泽东汇报了8人会议情况。他说：“他们对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以来意见也很大。”

当毛远新汇报到汪东兴讲，“主席一个时期批评这些人，一个时期批评那些人，为的是在路线上一致起来，不要一批评就要打倒似的”，毛泽东点头说：“对，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

当他汇报到邓小平坚持说“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现安定团结”时，毛泽东说：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当毛远新请示下一步怎么办时，毛泽东说：“会议还要开，还要逐步扩大几个人，开会就是帮助他及大家，互相帮助，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毛泽东说：“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看法不见得一致。”

毛远新问：“这次会议，争取在对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能初步统一认识，对团结有利。目的是通过讨论，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是这

样吧?”

毛泽东说:“对。”他又嘱咐毛远新:“这个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

11月5日,邓小平给毛泽东报送外交部关于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吴奈温访华接待计划的请示报告中说:“奈温已表示希望会见春桥、江青、文元同志,故我请外交部提出由我和春桥两人之一出面接待的方案。”“我觉得以后见主要国宾,由我一人出面,过于繁重,故拟请春桥出面如何?请主席考虑指示后,再送政治局各同志审核。”

毛泽东阅信后批示:“由小平主持会谈,春桥可参加迎送及宴会。”并删去请示中提出“江青同志会见已有安排”一句,还把“由邓小平或张春桥副总理代表周总理主持”、“请邓小平或张春桥副总理讲话”、“请邓小平或张春桥副总理祝酒”中的三处“或张春桥”四个字圈掉。

11月5日深夜23时许,正在大西北凤州视察工作的张爱萍接到陈锡联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小平同志让我转告你,在外面不要乱讲话,要少说话。”

张爱萍感到愕然和纳闷,遂问陈锡联:“北京有什么新情况?”

陈锡联说:“说不清楚。”就把电话挂断了。

第二天,张爱萍向基地排以上干部讲话。他说:

“在七机部,我问他们,都是革命同志,为什么不能坐在条板凳上?即使坐在一条板凳上也不是面对面,而是屁股对屁股。我说,你们这里看不见友谊,都像仇敌一样,生活一天,会少活一年!……

现在好了,改变了。有一位老工人说,像现在这个样子,我要争取多活三年!”

就在张爱萍说这话时,北京又给他来了电话,是催促他回京的。电话是副总参谋长胡炜打来的,这真是历史的巧合,1974年国庆节叫张爱萍回北京参加国庆招待会的电话也是胡炜给他打的。

“中央请你尽快回来。”胡炜在电话里说。

“有什么急事吗?我这里工作还没有完。”张爱萍说。

“有重要事情。”胡炜道,“电话里不好说。你回来就知道了。”

张爱萍还是推迟了一天。11月8日,他准备飞绵阳,到九院去。

电话铃又响了,这次是中央办公厅电话:“爱萍同志,去接你的飞机,已经到了宝鸡附近的军用机场。中央领导同志有重要事情,你马上返回”

赶到宝鸡要坐4个小时的汽车,此时的张爱萍正发着高烧。

“真遗憾,我答应第九研究院的同志多少次,一定去他们那里看看。这次又去不成了!”坐在吉普车上,张爱萍不无遗憾地说。

军用吉普车在初冬陇西的寒风中疾驶。当日黄昏时分,在前往机场的途中,路过21军驻地。这个军有一个师,是张爱萍在抗日战争初期在淮北亲手创建起来的。已经多年没有来看望这支老部队了。但是,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北京要他当晚便赶回去。他只好“过家门而不入”。

在21军军部,张爱萍匆匆地吃了一顿晚饭,夜色迷蒙中,军用吉普恍穿过浓重的夜色,直奔军用机场。

回京的当天晚上,张爱萍的爱人李又兰给他服了药,看他极度疲劳的样子,原本不想再说什么了,只要他早点休息。但又担心第二天中央的紧急召见,没有一点准备也不好。于是,犹豫再三,还是告诉了最近清华大学刘冰的事情。张爱萍靠卧在沙发上静静地听着。通常他都是腰板挺得直直的,即使是坐在沙发上,腰从来都不靠椅背。下面垫两个沙发垫子,双手搭在拐杖上,一副军人姿态。今天他是真不行了,高烧且有些胸闷,吸了会儿氧气,他什么也没有说,静静地、默默地听着。

很晚了,他睡下又爬起来要长途电话,是关于卫星发射的事情。

第二天,通知张爱萍去中南海开会。

参加会议的6个人,除张爱萍外,其余5人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李先念、纪登奎、陈锡联,以及国防科委政委陶鲁笳。

会议是华国锋主持,李先念首先拿出一份文件,递给张爱萍说你:“先看看吧。”

张爱萍接过文件,只见文件标题是:《关于对我调离处理的申诉报告》,副标题是:《揭发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推行“今不如昔”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署名是230厂“916”组织负责人舒龙山。文件的上

方印有一行大字：

毛泽东11月2日批示：“印发政治局各位同志，请总政酌处。此人是‘916’左派。”

舒龙山的信是10月1日写的，内容基本上还是大字报上写的，叙述自己如何受刘少奇、王秉璋、张爱萍的迫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如何一次又一次救了他。

李先念问：“看完了？怎么样？”

“不怎么样！”张爱萍的回答让在座的人都吃了一惊。

李先念本能的说道：“什么？连毛主席的指示也不怎么样吗？”

“不怎么样，就是不怎么样！”张爱萍如同一头倔驴。此话一出，还说什么呢？大家一时不知如何以对，会场上沉默……

纪登奎率先打破了沉寂：“我问你，‘今不如昔’这句话是什么人说的？”

“是右派说的。”张爱萍再一次语出惊人，这不等于说自己是右派吗？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纪登奎没有马上回过味儿来，严肃地问道。

张爱萍：“还用解释吗？告状的人不是左派吗？”

纪登奎：“那你到底说了没有？”

张爱萍：“还用我说吗？七机部的问题你不清楚？”

纪登奎：“你看看你，讲的话就有这么厚厚一大摞！”

张爱萍：“你都看过了？没有看到你自己讲过的话吗？”

纪登奎：“你什么意思？”

张爱萍：“‘九年无宁日’，就是你说的。忘记了？”

纪登奎：“你血口喷人！态度很不老实！”

又是沉默。

陶鲁笳站出来揭发：张爱萍任职后根本没来机关，一下子就跑到七机部去了，其目的是整那里的革命左派，污蔑七机部的大好形势，并动用部队的人力、物力到工厂笼络人心，以批判派性为名搞反攻倒算，在国防科委压制民主，个人说了算……

揭发批判后，又是难捱的沉默……

李先念：“你说拿出能打到莫斯科的武器，什么意思嘛！”

张爱萍：“什么意思？阶级斗争为纲的具体化嘛！你们不是老喊高举阶级斗争的旗帜吗？”

会场再次出现沉默……

又是纪登奎发言，批判张爱萍的路线错误。

又是毫无顾忌地回击。张爱萍把自己在关押期间的所思所得完全发泄在这一场针锋相对的辩论之中。几位副总理一时间竟被张爱萍一个人顶得手足无措。

陈锡联用腿碰碰张爱萍，悄声说：“你承认了算了”。

说实话，这是百分之九十九的老干部在那种情况下会选择的态度，但张爱萍没有卖陈锡联的账，而是大声问：“你们要我承认什么？”

陈锡联：“承认犯了路线错误啊。我不也承认过嘛，也没有把我怎么样嘛！”

张爱萍大吼：“那是你！”

.....

主持会议的华国锋一直没开口。冷场很久后，华国锋才说：“这件事很突然，对毛主席的指示需要一个理解和认识的过程。是不是请爱萍同志回去再想一想。就散了吧！”

鉴于张爱萍顽固的态度，4个副总理谈话后的当天，政治局全体成员深夜驱车来到人大会堂，接见在那里等候多时的七机部和国防工业各部的党组成员们，向他们宣布了刚刚做出的决定：

张爱萍同志在七机部和国防工业各部门的工作中，犯有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右倾翻案的错误，经政治局讨论通过，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决定，张爱萍要接受群众批判。

随后，一行人又驱车来到三座门军委办公地点，向早已等候的三总部和国防科委的党组成员宣布了同样的内容。

在上述两个地方宣布决定时，邓小平都说了一句相同的话：“七机部和国防科委出的问题，责任在我。”

在此之前，11月6日，毛远新报送毛泽东11月2日、3日、4日毛泽东与毛远新的谈话整理稿。毛远新在送审报告中说：

“为了集中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为了贯彻互相帮助，统一认识，团结起来，搞好工作的原则，也考虑到下一步逐步扩大，便于传达

讨论，我把前几次谈话中主席有关的指示整理一个材料，请主席审阅指正。小平同志确定明天晚上八个人继续开会，会后再向主席报告。”

11月9日，毛泽东圈阅了毛远新11月6日报送的整理稿，并让工作人员告毛远新：“同意将这个整理材料印发到会同志。”

11月10日上午，邓小平约胡乔木过去，对他说：“我现受批判，起因是转刘冰的信。”

并说：“主席作了很严厉的批评，我作了自我批评。”

胡乔木告诉邓小平：“信是由李琦交我，我交给你的秘书的。”

邓小平并不知道信是怎么来的，说：“信既要我转，总是说明写信的人认为我是同情他们的。”并要胡乔木不必提转信的事，以免事情复杂化。

邓小平说：“中央讲了，‘三项指示为纲’这个提法不对，只有阶级斗争才是纲。”

胡乔木说：“转信的事恐怕不是主席批评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一定是主席对你早就有了不满。”

邓小平说：“过去把形势看得太简单了。”

胡乔木提到：“政研室今后要吸收革命造反派参加领导。”

邓小平听了马上摇头，说：“不要！只要吸收年青一点的就行了。”

胡乔木报告了政研室正在写的关于《水浒》的文章的题目和构思，邓小平说：“写起来你直接送主席，不要经我转。”

11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会见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吴奈温。会见后，毛泽东与参加会见的邓小平、张春桥谈话，建议让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刘冰等人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他说：“他们参加会议也是对他们的一种帮助。”

毛泽东吸取了文化大革命发动前没有向广大干部“打招呼”以至许多领导干部被打倒的教训，于11月13日亲笔写了一个“关于打招呼问题”的批语：

“过去只有河南同百分之八十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在多数人身上复杂一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一些老同志打个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

(指胡乔木)、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人也要打招呼。”

毛泽东在 1975 年 10 月以后指出：

“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大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很多书我也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也不是课堂上学的，如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

“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做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英国工党就是反动的，美国产联、劳联也是反动的。”

“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

11 月 14 日下午，国务院会议厅，邓小平和华国锋、李先念、纪登奎四位国务院副总理一起召集胡乔木、周荣鑫、胡耀邦、李昌开会，谈了周荣鑫、胡耀邦、李昌三人的错误，通知他们：政治局日内将开会谈他们几个人的问题。邓小平说：“你们跟我一样，文化大革命以来没有工作，不了解情况。”

又对周荣鑫说：“你是教育问题。”

虽然在 14 日的会议上没有谈胡乔木的问题，但他心中不免敲鼓，觉得“为刘冰等人转信，当是自己的问题之一。”会后，他一直为此事不安，于是在 11 月 15 日找到邓小平，说自己要对党、对中央讲清楚为刘冰转信的经过。

第1374回：王洪文，十五日回到北京 刘冰等，参加政治局会议

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看到清华大学给中央政治局的《简报》后，非常兴奋，把马天水他们找到东湖路七号招待所的会客厅，拿出清华大学的《简报》给他们看，说“毛主席已有批示了”，徐景贤他们鼓励王洪文回去参加战斗，王洪文说：“再等几天，现在是清华大学在开常委扩大会议，但是政治局是否开会，我还要看一看。”

11月14日，王洪文给毛泽东报送《关于上海召开大型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情况简报》。他在《简报》中说：“最近听到下面有些人在传抄主席与江青同志七月十四日的谈话内容。因此我建议是否可以将主席这次谈话精神传达给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及有关文化单位。”

第二天，11月15日，毛泽东对王洪文14日报送的《简报》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请讨论一次。我讲的不完全，至少应该提到鲁迅提倡削烂苹果一篇，请文元同志找出此文印发，以供讨论之用。”

毛泽东批示中提到“鲁迅提倡削烂苹果一篇”，是11月14日，《解放军报》在《长征》文化副刊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刻烂苹果”及其他》的文艺短评。这是一位署名金辉的战士自发来稿。

“刻烂苹果”出自鲁迅的一篇题为《关于翻译》（下）的杂文。鲁迅在这篇杂文中说：“我们先前的批评法，是说，这苹果有烂疤了，要不得，一下子抛掉。”他主张，倘不是“穿心烂”，就把烂疤刻掉“还可以吃得”。所以，鲁迅“希望刻苦的批评家来做刻烂苹果的工作”。

这篇短评说：“对待有缺点的作品，历来有两种方法，就是鲁迅说的‘抛’和‘刻’。前一种，将有‘烂疤’的苹果，不问青红皂白，统统付之一‘抛’，判处‘死刑’；而后一种，对并非‘穿心烂’的苹果，既刻掉了烂疤，又保全了好的部分，乃是‘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毫无疑问，这后一种方法，才能更好地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

短评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纯的东西，也没有尽善尽美的事物。金

要足赤，人要完人，那是形而上学思想。作品也不可能没有缺点，像是一个苹果，即使没有烂疤，也不会没有疵点。文艺作品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由于客观事物的复杂性和人们认识能力的局限性，要求十全十美是不可想象的。马克思主义从来也没有苛求过某种东西一经产生便完美无缺。”

11月15日，王洪文飞回北京。

当天，邓小平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洪文同志已经回到北京。7月份洪文同志到外地时，经主席批准，由我暂时代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现洪文同志已回，按例，从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请洪文同志主持。近日召开的17人会议，亦应请洪文同志主持。请主席批示（由东兴同志通知）。”

毛泽东当天批示：“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会再说。”

11月16日下午18时，刘冰参加完清华大学的辩论会，身心疲惫地回到家，于18时30分接到谢静宜的电话，让他19时在清华大学西南门上车，去人民大会堂。

刘冰问：“干什么？”

谢静宜说：“你到大会堂北门下车后，告诉哨兵，你是清华大学的刘冰，他会领你进去。”

经过和妻子商量，刘冰决定去，但做好了被捕的准备。

刘冰较早来到人民大会堂，战士将他领到东大厅，只见屋里的座椅围成圆圈，前后两排，厅内有几个女服务员正在摆放沙发和茶几。后来汪东兴进来了，看见刘冰问道：“你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

刘冰答：“我是清华大学的，叫刘冰。”

汪东兴说：“啊！你就是刘冰！过去没见过面。”

这时谢静宜来了，她看见刘冰说：“你来了。”

然后她和汪东兴一边说话，一边走开了。

刘冰怕影响别人，赶快走到一个较远的沙发前坐下，等待着。19时55分，陆续进来了一些人，先是政治局委员们，接着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也都来了。大家在摆成圆圈形的两排沙发入座，政治局委员在前排，其他人都坐第二排。

刘冰看到胡耀邦也来了，过去挨着他坐下。胡耀邦和他握了手。

纪登奎正好坐在他们前排，扭过头来也和刘冰握了手。刘冰小声致谢。

20时整，邓小平宣布开会。他说：“昨天主席接见外宾完了之后，把我留下，在场的还有张春桥，主席要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刘冰同志参加政治局会议。主席说参加会议也是一种帮助。”

简短的开场白以后，邓小平走到张春桥面前说：“我耳朵背，记不详细，请你把主席讲的整理一下。”

张春桥说：“我不整理，我没有记。”

邓小平似乎没有听见，只是把两张记录纸放到张春桥面前的茶几上，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这时姚文元说话了：“今天列席会议的他们几位，恐怕还不知道主席对清华的批示吧？是否给他们传达一下？”

邓小平没有说话。姚文元重复着自己的话：“今天列席会议的他们几位，恐怕还不知道主席对清华的批示吧？是否给他们传达一下？”然后指着刘冰等人问：“你们听过没有？”

刘冰回答：“我听了，吴德同志传达过。”

吴德马上说：“我没有传达，我只是说了主席批示的精神。”

邓小平说：“那好吧，请毛远新传达一下。”

于是毛远新翻开笔记本，念了毛泽东的批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刘冰是第一次听到毛泽东批示的真实内容，此时的他如同晴天霹雳，脑子里一片茫然。后来他回忆说，“当时自己心跳加快，连呼吸都感到困难，感到这真是天大的冤枉。”他脑袋昏昏的，耳朵嗡嗡的，会场上什么人再说什么，他全听不到了，满脑子都是毛泽东的批示。

毛远新传达完后，邓小平说：“讨论吧！”

当天刚刚坐飞机回到北京的王洪文首先发言，他说：“我最近到上海去了一趟，听到许多反映，下面对周荣鑫意见很大。教育部搞教育革命，专讲一些旧观点、旧思想，搞旧的一套。这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

续革命的理论背道而驰。”“周荣鑫 1975 年 1 月出任教育部部长，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在教育界也进行了整顿。”

张春桥附和着说：“都是一些旧的东西，周荣鑫不听我们的。”

姚文元也说：“报纸的记者也有反映，群众有意见。”

王洪文还指责胡耀邦在科学院进行整顿时的一些言论。

江青时而坐在沙发里，时而站起来走动，一边走一边说些什么，与会者也未必听得清楚，但明白她是支持张春桥、姚文元的。

邓小平一言不发地听着。叶剑英除了偶尔喝点水或偶尔用毛巾擦擦脸，一直在默默地记笔记，什么话都没说。

晚上 23 时许，邓小平宣布：“今天的会到此为止，明晚 8 点钟继续开会。”

做好被逮捕准备的刘冰，没想到居然走出了大会堂。他表面上若无其事，心里早已乱成一团。有人跟他打招呼，他只是下意识地做出反应，点点头，竟连什么人都没看清楚。等人们都上了车，刘冰才从台阶上下来，找到清华的车子。

回家的路上，刘冰一直在想：“主席说的‘参加会议也是一种帮助’含义是什么？应该要我们在会议上作检查，在会议上接受批判。那在明晚的会议上，我就该检查了。主席批示中说信的矛头是对着他的，又点名要我参加政治局会议，毫无疑问，我对主席批示持何种态度，主席定会注意的。但如何检查呢？”

深夜 12 点，刘冰回到了家里。妻子苗既英看到他能回来，非常惊喜，连声问道：“是怎么一回事？”

刘冰把参加政治局会议的详细情况，特别是毛泽东的批示告诉了妻子。

苗既英听完这番叙述久久说不出话来，一直用手绢擦眼泪，最后说：“这真是冤枉了！”想了一会儿又对刘冰说：“给他老人家写信反映情况是矛头对着他的，中央副主席给转个信也成了偏袒，怎么能得出这个结论呢？”

苗既英用怀疑的口气说道：“老人家是不是真的糊涂了？他 80 多岁了，人老了容易糊涂，这批示不是颠三倒四吗？”

刘冰说：“不全是糊涂，而是听了毛远新、谢静宜的一面之词。”

苗既英说：“按这个批示，就会给你定成反对毛主席的罪名。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这批示如果编在《毛选》里，那我们不就永世冤枉吗？”

刘冰说：“是呀，现在已经到头了，没有地方说理。邓小平转个信是偏袒我，这不正常。现在只有检讨，争取留在党内。只要活着，过几年再说。反对毛主席的帽子现在已经被戴上了，我怕开除党籍，一旦开除党籍就不好办了。明天晚上政治局会议上，恐怕我们5个人要检查。现在要想想如何检查。”

苗既英说：“一个是检查，一个是不检查。我们没有错检查什么？”

刘冰说：“主席说矛头是对着他的，不检查行吗？不行！因为那样会再戴上一顶对抗主席的帽子，岂不更冤枉？几十年来，我们在亲身实践中看着主席领导我们取得了胜利，我们自己的成长也是他的思想哺育的。在这一件事上，即使是主席错了，从良心上讲，也不能对抗，让主席为难。”

苗既英说：“你不能过细检讨，原则上表个态就行了，不能给自己戴帽子。”

刘冰说：“毛远新是要给主席汇报的，不戴帽子，主席通不过。”

苗既英坚决地说：“要给自己留个余地，将来好翻案。你再仔细想想怎么办好。明天你好好准备一下，现在该休息了，已是3点钟了。”

他们都吃了安眠药，也睡不着，仍然商量着在政治局会议上如何检查的问题，直到东方发亮。

政治局扩大会后，王洪文给上海打电话，叫他们赶紧给他整理邓小平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材料。上海市委很快就把邓小平的言论整理出来，交给上海市委印刷厂印成大字本，直接送给王洪文。马天水也急忙写了《邓小平策反我的过程》交给了王洪文，由王洪文批转印发给政治局参加会议的人。

11月17日晚20时，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还是由邓小平主持。他首先让毛远新传达毛泽东听了16日会议情况汇报后的指示，接着转向胡耀邦等人说：“你们5位同志，主席要你们参加，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吗？”

胡耀邦闻言站了起来，大声说：“我讲些意见。主席要我们5位同

志来参加会议,是对我们的关怀。我在这里对主席表示衷心的感谢。昨天晚上,王洪文副主席对我讲了许多话,我在这里郑重声明,他说的那些问题我没有。说我说了什么话,我没有说过,请求中央查证。我与刘冰在团中央一起共过事,他找到我要我给他转信。我对他说过我支持你,但是信要你自己送,因为我们不是一个组织系统的。我是科学院,你是清华大学。所以我不能帮你转信。完了!”

说罢,胡耀邦坐下。会场上一时间鸦雀无声,连受到反驳的王洪文也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邓小平说:“你们谁还说话呀?”

刘冰看看周围没人回应,待不住了,就说:“我发言。”

他刚要说话,邓小平说:“刘冰同志,我耳朵背,你坐在我旁边讲,好不好?”刘冰赶快走过去,坐在邓小平左边的座位上,然后说:“主席对我作了严厉的批评,我在这里向主席、向中央作检查。”

刘冰说:“主席严厉地批评了我,又要我列席政治局会议来帮助我,这是对我的关怀,我在这里对主席表示深深的感谢;我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抓了一些鸡毛蒜皮,罗织罪状,错告了主席派往清华的干部,我犯了诬告的错误,我在送信过程中,涉及到一些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我对党、对主席应忠诚老实,不能隐瞒;我请求党中央和主席给我处分;我向主席和党中央保证在我的后半生,我将以最大的努力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接着发言的是胡乔木,他讲到刘冰的问题时说:“刘冰同志的第二封信是我送给小平同志的。”

这时猛然从背后响起江青尖厉而有点沙哑的声音:“乔木! 你反对毛主席呀! 我现在才知道。”

只见她坐在一张铺着白布的桌子前,上面还摆着饭菜。她没有来得及吃晚饭,只能到大会堂边开会边吃。这时江青猛地站起来追问胡乔木:“你为什么给刘冰送信?”

胡乔木说:“我不认识刘冰,也不认识迟群,只是听说过他们,我对刘冰印象好一些。”

江青用她那颤抖的声音生气的说:“你是主席的秘书,你反对主席我没料到。”

胡乔木结结巴巴继续检讨。

随后李昌要求发言。他检讨说：“科学院在转整顿过程中，没有很好地理解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工作没有做好，我和耀邦同志都是有责任的。关于我提出从应届高中毕业生招考大专生的问题，主要是由于科学院缺少合格的实验员，于是我们就提出要办高等技术专科学校，直接从高中毕业生中招生，这违反了大学招生‘群众推荐，组织考察’的报送制度，错误是严重的，教训是深刻的。”等等

周荣鑫同志因为有外事活动来晚了，他最后发言。在他发言过程中，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江青4人不断插话，批评他“否定教育革命”、“搞资产阶级教育”、“搞修正主义”、“复辟、倒退”等等。

时间已经23时多了，因为毛远新宣读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批评，说他“从来不抓阶级斗争”，所以在这天会议结束的时候，邓小平也做了检查，说：“我的根本问题就是不抓阶级斗争。”接着宣布：“今天的会就到这里，下次会议时间另行通知。现在散会。”

第 1375 回：清华园，召开万人批判会 “打招呼”，卫星升天再收回

1975 年 11 月 18 日，清华大学在大礼堂召开全校师生员工万人大会，北京大学 1600 多人也参加了这次大会。

会上吴德传达了毛泽东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批示全文。紧接着是开展大辩论。但是辩论的另一方此时却没有在会场。此时，刘冰被安排在校政治部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面对着墙壁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大标语一坐就是一天，看管的人连坐向都不让改变。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则被安排在会场之外。

大会开了整整一天。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四人在会上被称之为“正在走的走资派”、“投降派”、“右倾翻案风的急先锋”，说他们“否定教育革命，翻教育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反党、反毛主席”。

清华大学贴满了大字报。大字报在批判刘冰等人的同时，也公开点名批判教育部长周荣鑫，说他否定教育革命，坚持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和毛主席的教育路线相对抗，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大学来清华大学看大字报，参观学习，人达数十万人之多。他们的大字报被大量翻印，四处散发，内容迅速在各地传布，各地一些学校也相继开展了“教育革命大辩论”，大有 1966 年 6 月份的阵势。但是，1966 年 6 月全国的大字报几乎是群众自发的起来的，领导想禁止都禁不住。而这次各学校学生和群众都不积极，看上去热热闹闹贴大字报，都是上级组织的，内容都是抄报纸，与 1966 年有着天壤之别。

11 月底的一天下午，刘冰在家里听到一阵轻轻的叩门声后。开门一看，是一机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副部长项南的女儿小米。

刘冰和项南建国之初都在团中央工作，彼此熟悉，但他对小米此时前来仍感意外，忙问：“你是怎么来的？”

项小米回答：“坐我爸爸的车来的，门外没有看到人。”

刘冰对她说：“我怕有人看到你来这里。”

小米说：“我不怕，他们敢怎么样？”

原来，她是和父亲项南一起到北大来看大字报，项南留在北大，让女儿进清华园看望刘冰，带话问候，要刘冰注意身体。

小米告诉刘冰：“现在就是清华和北大在批判你，其他单位和地方还没有动作。但是情况很紧张，很多人都知道了你给毛主席写信和主席的批示，一些老同志都不敢相互往来了。”她对刘冰说：“刘叔叔，要特别提高警惕，他们会用各种办法整你，也会搞人监听你的电话，你要再打电话了。”

项小米的来访使刘冰感到一丝温暖。

一天深夜 23 时左右，刘冰突然听到轻轻的叩门声，声音断断续续。根据以往被批斗的经验，刘冰迅速穿好衣服，还拿上了大衣下楼开门。

门打开一看，来人是工程物理系学生宋章元。

年轻人进屋后匆匆问候了刘冰的身体情况，然后说：“我今天夜里是专门来看看你。你们 4 个人的信，几乎所有的同学都抄下来了，很多人用复写纸复写了许多份邮寄到外地。大会上批判者说信的内容都是假的，同学们根本不信。迟群说开会是大辩论，要通过辩论搞清问题的性质。同学们在宿舍里说，既然是大辩论，怎么看不到刘冰他们出来辩论呢？有的同学说，大概是不敢让他们出来吧。这些话都表达了对迟群的不满。迟群、谢静宜在学校里不得人心，同学们表面上不敢说，实际上都同情你。你们并不孤立，你要保重身体，想开一些。”说完他就走了。

11 月 20 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邓小平作了批评。根据毛泽东意见，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邓小平用毛泽东的话婉言拒绝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11 月 21 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报告，由毛远新转交给毛泽东。报告说：“遵照主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免犯错误。现拟了一个 136 人的名单，并拟了一个打招呼的谈话要点，都是由政治局会议

讨论修改了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打招呼的方法是，把大家召集到一块谈，政治局同志都出席。政治局商量，准备把谈话要点发给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以及省、市委第一书记，也给他们打个招呼。此点也请主席批准。”

邓小平还在这个报告的后面附上了“打招呼”谈话要点。这个要点中，毛泽东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指示只有“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没有后边“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些内容。

第二天，毛泽东听工作人员读了邓小平的报告和谈话要点，在邓小平的报告上批道：“很好。但不仅只是老同志，要有中年、青年各一人同听同议，如同此次 17 人会议那样。即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请政治局再议一次，或者分两次开，或者先分后合。”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由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做了传达。

但毛泽东很快又想到：本来是给老干部“打招呼”的会，如果有青年人参加，又会增加许多复杂因素。第三天，11月 23 日，他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说：“还是你们议的好，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因有的还未结合，有的在打派仗（如七机部），有的貌合神离（如清华），召集不起来。”

11月 24 日，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邓小平主持，并在会上宣读了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

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十月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他们用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一九六八年七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根据毛主席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十一月三日起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会议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在全校师生中进行辩论。

二、毛主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

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指毛主席）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三、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随后，邓小平没有再说其他的话。

会后分组进行座谈讨论。

时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的张震在会上见到邓小平，问候道：“身体好吗？”

邓小平说：“还好。”

张震：“你多保重。”

邓小平没有吭声。

11月26日，中共中央下发[1975]23号文件，转发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同时，印了一份《通知》：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打招呼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是一些负责的老同志，也有几位青年负责同志，共130余人。会上宣读了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会后分组进行座谈讨论。

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在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大军区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党委常委或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进行传达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报告中央。

1975年8月，返回式遥感卫星第二颗发射星完成了总装测试任务。



卫星组装。

10月16日,产品专列到达东风场区。11月15日,在技术阵地完成了总装测试后的卫星和火箭转到发射阵地。发射部队经过10昼夜的连续工作,完成了星箭对接和发射前的各项检查测试工作。11月24日,试验领导小组负责人徐明、任新民、石荣屹、吴鹏联合签署了发射任务书,经批准,开始加注推进剂。

1975年11月26日16时29分23秒,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由“长征二号”运载火箭在甘肃酒泉基地发射升空。



1975年11月26日,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

但是，卫星在第一天仅运行数圈后就出现了气压波动。得知这一消息之后，钱学森和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兼科技部部长的马捷乘专机从北京飞赴西安。据亲历者回忆，钱学森竟然在隆冬的西安急的满头是汗，他必须向坐镇北京的张爱萍总指挥报告真实情况。好在祁思禹胸有成竹，判断卫星在姿态调整中启动制动火箭造成气压下降，卫星一定可以完成近 50 圈的预定在轨飞行任务。

不过，当卫星轨道上按计划运行了 3 天，完成了对预定地区的遥感任务，将要启动返回阶段时，还是出现了真正的险情：1975 年 11 月 29 日，当地面测控中心将要发出控制卫星开伞的指令时，两台控制计算机竟然开始“打架”，一个要发出指令，一个判断必须切断指令。此时卫星的速度接近每秒 7 千米，如果控制指令失效，卫星返回舱可能落入其他国家造成外交灾难。1959 年 4 月 13 日，美国回收返回式卫星时由于弹射指令过早下达，机密胶卷落入挪威境内北部离苏联边境不远的地方，在国际上掀起轩然大波。

关键时刻，只见祁思禹一拳砸破机房和指挥室之间的玻璃，猛地撞进指挥大厅，三步并作两步冲到主控台前，嘴里不住大喊：“发指令！”原来是见情况紧急，当机立断，来不及绕门冲进指挥大厅，干脆破窗而入。

主控台前的调度参谋立即对着麦克风喊出“指令发出”口令，顿时，整个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指挥大厅里鸦雀无声，大家都屏息凝神，盯住中心轨道显示屏上每秒更新一次的记录……

突然，一个光点出现在显示屏中国地图的西南部。整个大厅的人员不约而同起立鼓掌，欢呼声如山呼海啸般响起！

卫星回收工作相当复杂，美国一般都在海上回收，中国当时还没有这个条件。经多方反复比较，决定在中国腹地四川省南部作为回收区。卫星从北往南飞，落在四川。但是如果卫星没有落下来，继续往南，很快就会飞出国外，很可能落到其他国家。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卫星里装了炸药包，一旦发现轨道不正常，往南跑得太多，就把它炸掉。

11 时许，返回舱以 20 – 30 倍的音速，排山倒海般地呼啸着从宇宙

归来。渭南测控中心报告：“尖兵返回大气层，进入角……高度……速度……”它以每秒 8 公里的速度降落，巨大的摩擦力将周围的空气点燃，遍体通亮，经内蒙古、宁夏、陕西、甘肃，来到了四川。

由于返回式卫星裙部被高温损坏，再入段没有打开减速伞，650 千克的返回舱没有落在四川预定区域。下一个后备的着陆点是在贵州。从这里飞过国境，也就几分钟的路程。

最紧张的时刻到来了。指挥室里，操作人员的手就按在炸药起爆按钮上。卫星飞过了预定地点，前面就是国境线！再等一等……

卫星着陆了，落在贵州西南部北盘江关岭铁索桥旁。经计算，轨道预报落点估计偏远了 400 余公里。

此时已是中午时分，贵州六枝盘公社一家煤矿上的 4 名矿工正坐在井口闲聊，突然看到一个圆乎乎的大家伙从天空飞落下来，“刷啦啦”一声，它将一棵大松树巨大的树冠一扫而光，接着蹦落在了地上。

发现天外来客的消息很快一级一级报了上去。下午 18 时，国防科委指挥所通告，贵州军区在六枝盘公社坡了大队发现一空降物，已派民兵保护现场。

这个消息令在北京国防科委坐镇指挥的张爱萍暗自惊诧：北盘江关岭铁索桥！40 年前，他正是在这里率领红 3 军团先遣团抢渡白层渡口、阻击援敌并大获全胜的地方。几年前，他在关押中还在念叨，倘若有朝一日大难不死，重获自由，就到北盘江关岭边安个家吧……

当卫星回收测量部队赶到现场时，惊喜地发现返回舱没有摔坏，基本完好，裙部再入大气层时有烧损痕迹。“尖兵”取得了预定的遥测试验资料，返回舱携带着照相胶片等试验资料，所有胶片完好无损！只是返回舱的落点偏大了一点。

张爱萍当即挥毫写词一首：

“长征”万里遣“尖兵”，
巡行太空战鬼神。
力争朝夕越艰险，
获锦归来举世惊。



回收返回舱。

北京,叶剑英高兴地边看着返回式卫星拍摄的照片,边对大家说:“偏远了400多公里,没什么要紧嘛。我们第一次回收卫星,能落在中国大地上就是胜利!”

返回式卫星发射成功的新闻公报送到毛泽东那里时,他由于眼疾已经看不太清字了,就让秘书人员一字一句念,对一些字句作了修改,随即签发了公报。对卫星拍摄的照片他也吃力的、兴致勃勃地看了。

返回式遥感卫星发射、回收成功,是中国航天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突破。标志着中国航天技术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和航天遥感技术的国家。

就在卫星返回后的第二天,11月30日,军委要求张爱萍写检查。

卫星的成功返回,让许多人为张爱萍感到高兴。粟裕当时正在住院,他对前来看望的张爱萍妻子李又兰说:“卫星回来了,爱萍的压力会轻一些了。”遂在纸上写了几个字:“虎落平阳被犬欺!”

对张爱萍的检查,粟裕建议说:“可以听听宋时轮的意见,他点子多。”

宋时轮说:“你们就别操心了,就让我的秘书帮助写一个,文革的事经历多了,他已经练出来了。”

这份检查,陈锡联看了后特别高兴,说:“爱萍同志的检讨很深刻嘛,我看可以过关了。”

因为没有签字，又给退回来了，但就是这个名字，张爱萍死活不肯签。陈锡联很无奈，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犟呢？检讨一下过了关就算了嘛。”

12月1日，《红旗》杂志刊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提出：

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就必须“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

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就必须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就必须正确看待教育质量，批判“智育第一”。

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

第1376回：见福特，张爱萍住进医院 康生逝，毛泽东坚持斗争

1975年12月1日，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刚刚步出机舱的福特的脸色是阴沉的。眼尖的基辛格已在总统夫妇身后兴奋地报告：“好哇，邓小平已在舷梯前迎候总统了。”福特的脸上这才露出了笑容，他知道，中方还是很重视他的来访。

邓小平在当晚以周恩来总理名义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说：“三年多以前，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双方发表了著名的上海公报。这是一个独特的国际文件，它明确阐述了中美两国不同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政策上的根本分歧，同时也指出了两国在当今世界上具有许多共同点，其中突出的一点是两国都不应谋求霸权，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霸权的努力。公报为发展中美关系提供了基础，也指出了方向和目标。这一公报的发表，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而且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些话是针对美方一系列违反《中美上海公报》的做法。福特这次来华，尽管不会给中美关系带来实质性的进展，却也不准备在会谈中提出原来准备的在北京设大使馆，在台湾设联络处的方案了。

在与邓小平的会谈时，福特告诉邓小平说：由于美国国内形势的需要，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须推迟至1976年大选后再照日本方式采取行动。在此之前，准备把驻台美军削减一半，即从2800人减少至1400人。他还一再强调说，美国不能在预期和平解决问题以外前途的情况下抛弃“老朋友”，“期待中国政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邓小平也明确地指出：所谓“日本方式”，也就是要接受（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三个原则，美台间的民间贸易方式可继续保持；至于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属中国内政，应由中国自己来决定。邓小平还表示，在美国接受三原则之前，中国并不急于解决正常化问题。

福特总统一行抵达北京的次日，12月2日下午15时30分，中方

通知美方，毛泽东主席想见福特。于是，福特携妻子、女儿和其他随员，在下午16时离开宾馆，前往毛泽东的住处。

16时15分，邓小平副总理和其他中方官员在中南海游泳池的门口欢迎福特等人的到来，然后陪同他们进入室内。

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书房里接见了福特总统与基辛格国务卿，邓小平、黄镇与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布什也参加了会见。

毛泽东和客人一一握手后，请大家入座。

毛泽东先问福特：“你好吗？”

福特点头并致意：“我很好，希望你也很好。”

毛泽东指指胸口又拍拍双腿：“我不好，我有病。博士好吗？”

基辛格笑着说：“很好。我很高兴来到您这里。”

毛泽东环视了一下在座的各位，问：“所有其他的美国朋友好吗？”

福特：“他们都很健康。”

福特：“主席先生，我们今天早上有一次很不错的讨论。”

像过去毛泽东亲自掌握着周恩来与尼克松、基辛格的会谈详情一样，毛泽东虽然已经疾病缠身，仍然很详尽地了解邓小平与福特会谈的具体内容。他好像是明知故问：“你们谈了些什么？”

没待邓小平开口，福特抢先说：“我们上午谈了国际形势。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有必要进行平行的努力，来取得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的结果。”

毛泽东眯缝着眼睛望着福特，以其特有的幽默略带讽刺地说：“我们没有这种本事，我们只能放放空炮。”

福特没有领悟出毛泽东是在含蓄地批评他放空炮，就说：“我不相信，主席先生。”

毛泽东继续用幽默表达自己的不满：“就是骂娘，这种本事我们倒是有。”

在座的中国人都忍不住笑起来。翻译成英语后，美国人才笑了。福特笑过后，领悟了其含意，这才露出了尴尬，说：“（骂娘）我们也会。”

毛泽东机敏地说：“你们也会？那就达成协议。”

福特说：“我们可以以很有力量的语言来反对某一个捣乱的

国家。”

毛泽东笑了：“不错，又达成协议。”

屋里的气氛很轻松了。毛泽东举起手来指着基辛格说：“总统阁下，你们国务卿干涉我的内政。”

福特与基辛格都紧张起来，望着毛泽东。

毛泽东却不紧不慢地说：“他不准我去见上帝。”

福特一时语塞，基辛格则不无得意地说：“我们坚持这一点。”

毛泽东又指着基辛格说：“上帝的命令他敢违抗啊！上帝请我，他不让去。”

基辛格佯作惊讶说：“要是你同上帝在一起，你们结合的力量就太大了！”

毛泽东已经十分习惯与基辛格进行幽默的对话，就很高兴地说：“博士阁下是无神论者，反对上帝，破坏我和上帝的关系，真是厉害啊！我拿他也没办法，只好听从他的命令。命令就是 ORDER。”

福特有点疑惑地问：“他是给上帝下命令吗？”

毛泽东反应敏锐地回答：“博士是向我下命令。”

毛泽东对中国驻美大使黄镇说：“黄镇同志，事情怎么样了？你还回美国吗？”

黄镇：“我听从主席的指示。”

毛泽东问福特：“总统先生，你们要他吗？”

福特：“我们当然要他回去。我们的关系好极了。大使先生回美国是很重要的，就像布什先生要是留在北京一样。”

毛泽东问布什：“你留在北京吗？”

布什说：“只有几天了。”

毛泽东：“你升职了。”

福特：“对，他升职了。我们将在一个月里，提名继任者。”

此时福特准备提名布什任美国中情局局长。

毛泽东：“我们不想让他走。”

福特：“他是一个出色的人，所以我要他回美国。但我们会找一个同样好的人来接替他。”

毛泽东：“那样挺好。我觉得，黄镇同志返回美国更有利。”

黄镇：“我将坚决执行主席的指示。我确实想回国，因为我驻外太久了。但是我将按照主席说的做。”

毛泽东：“你应该再在那里待一到二年。”

黄镇：“好的，我肯定会回去，坚决执行主席的指示。”

毛泽东对福特说：“有一些年轻人批评他。”

他说的是黄镇，接着他又指着在场的两个翻译对福特说：“这两个人对乔老爷（乔冠华）也有一些批评。不能忽视这些人啊，否则你会在他们身上吃苦头的。这是一场内战。现在外面有很多大字报出来。你不妨去清华和北大看看。”

此后两位领导人的谈话围绕反对苏联霸权展开，涉及了日本、当时发生政变的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希腊、土耳其、南斯拉夫、孟加拉、印度、罗马尼亚、安哥拉、扎伊尔、莫桑比克、南非。

在“就广泛的问题谈话”之后，毛泽东说了句：“那就这样吧。”

这时中方的摄影师进来拍照，福特知道会见该结束了。

美方人员站起来，同毛泽东握手道别。摄影师在一旁拍照。

毛泽东表示，他将“护送总统到外屋。”

在护士的搀扶下，毛泽东和福特一起走到外屋。在那里，美方人员又一次同他道别。

福特说：“感谢主席先生。”并且说他认为这样的谈话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基辛格旧话重提，对毛泽东说他很高兴毛泽东听从了他的命令，“不去升天”。

这时福特鬼使神差再出昏话，说他“希望修正一下国务卿的说法，主席先生一定能够去天堂。”话一出口才觉得失言，连忙与基辛格一起忙不迭补充说：“希望这一天不会来得很快。”

还是毛泽东为客人解了围，坚称“自己上不了路，因为基辛格已经下了命令。”

基辛格则再次重申他的命令不变。

毛泽东主席与福特总统的会见就是在这样的幽默的气氛中结束了。

会见结束后，参加这次会见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李一氓

没有回家，而是匆匆赶倒张爱萍家，对张爱萍的妻子李又兰说：“会见结束告辞时，小平同志专门提到了爱萍，他对主席说：‘张爱萍去七机部搞整顿，是我派去的。’主席接着就说：‘是你派去的，也是我派去的嘛！……对爱萍还是要帮嘛。’从主席的态度看，估计问题不致太严重。你赶快和爱萍说说，让他宽宽心。”

此时张爱萍正在301医院住院。他在一次参加批判会回来后，突患心肌梗塞，幸得301医院抢救及时，才得以脱离危险。

301医院的303(办)立即上报军委。叶剑英下达三条指示：1、对张爱萍的病要积极治疗、精心护理；2、不允许任何人干扰治疗，医院要负起责任来；3、没有我的批准，不能让张爱萍离开医院。他给张爱萍打电话说：“你的那些讲话，我都看了，没有什么错误。你沉住气，他们不敢怎么样。”

聂荣臻来看张爱萍，送来几只老母鸡，说是给张爱萍炖汤喝。他对张爱萍说：“不是要揪后台吗？让他们来找我好了，我就是你的后台！”

张爱萍住院期间，“帮促会”依然进行。但每次刚开始，医护人员就以输氧、输液、化验、检查或以“特殊治疗”为由，进行捣乱。弄得“帮促人员”情绪全无。他的病室门上，也总是挂着“不是探视时间不得入内”的牌子。

张爱萍住院期间，230厂、211厂的许多工人都来到301医院的大厅打听：“张老身体怎么样了？能不能去看他？”

凤州的工人对前来了解张爱萍问题的调查组说：“是张爱萍好还是你们好？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他来了，我们还能分半斤猪肉，你们来了，我们连这点肉也没了。”

一天，陈锡联和李先念前去医院探望周恩来，周恩来握着陈锡联的手，很是酸楚地说：“温玉成同志不是我要关他的，……”周恩来指示，找一找温玉成在哪里，情况怎么样。

1975年12月，成都军区根据周总理办公室通知，将关押了6年的温玉成释放出来。

12月9日，《人民日报》刊登梁效的文章《反修防修的伟大革命》，提出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12月10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扩大中发[1975]23号文件传达范围的通知》,邓小平的问题扩大到地、县级。其实,经过了9年的文化大革命的中国老百姓,早已感到邓小平又出事了。

12月10日这天,毛泽东对毛远新说:“江青当了政治局委员,什么也不懂,还板着面孔训人,架子那么大,要人家当奴隶。”

12月12日,文化部创作办公室向出版机关发出了一个《样板戏剧组文章若干提法修改方案》。其中第一段“关于文艺方针的提法”说:“69年以来,所有样板戏剧组文章,大都是提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改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的完整提法。”

12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中共中央关于陆定一问题的决议》的通知:

1975.12.13; 中发[1975]25号

毛主席已圈阅。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现将《中共中央关于陆定一问题的决议》和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关于陆定一问题的审查报告》发给你们,可口头传达到党员和群众。

中共中央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1975年12月11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陆定一问题的决议》是: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并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关于陆定一问题的审查报告》。鉴于陆定一是一个长期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且有重大内奸嫌疑,按照党章的规定,将其永远清除出党。

中央专案组《关于陆定一问题的审查报告》建议:陆定一在审查期间态度恶劣,拒不认罪。遵照毛主席“给出路”的政策,建议释放,清除

出党,保留公民权,安置到外地,养起来,每月发给二百元生活费。陆定一的严重历史问题及政治问题对其子女不应牵涉。

12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的通知:

1975.12.14;中发[1975]26号

毛主席已圈阅。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现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个报告很好,提供了在党委领导下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的经验,可供你们参考。这个报告可以发到县、团级,大、中、小学可以发到党支部。

12月16日,康生逝世。

12月18日,毛远新给毛泽东的信:

主席:

上次请示是否可以把主席近一时期有关指示整理一下,开会时印发大家学习,主席同意可以试试。

我试着综合了一下。为便于大家学习理解,没有按时间顺序,而是根据内容整理的。

主要三个方面:

1、阶级斗争为纲

2、文化大革命(包括教育革命)

3、当前运动的方针、政策

这样编排是否妥当,送上草稿,请主席批评指示。

毛泽东当天批示:“可以。”

12月20日晨5时,重病中的周恩来不停地重复着罗青长的名字,声音很低。高振普核准后,出去要通了罗青长的专线电话。

通知完罗青长,高振普回到病房,准备向周恩来报告。但是当他走近周恩来病床时,看见他已经睡着了。高振普站在床边,一直等到

周恩来醒来。

周恩来睁开眼看见高振普，便问他：“通知到罗青长了吗？”这次吐字特别清楚。

高振普汇报说：“已告诉他本人。”

周恩来说：“他一到就让他马上进来。”

罗青长这边接到高振普的电话后，到西花厅换乘了周恩来司机老杨开的吉斯车来到305医院。可是，当他赶到医院时，周恩来又陷于昏迷状态。他在外面等着，一直等到中午，周恩来才醒来。

高振普陪罗青长走进周恩来病房。罗青长疾步走近周恩来病床，看到正在输液的周恩来面色很憔悴。他握着周恩来的手，叫了声“总理”，就哽咽了。

周恩来说：“青长，我平时不病，没想到这时病成这个样子，我还能看到你。”

罗青长说：“我知道，老干部都很关心总理的健康，希望总理早日康复。”

周恩来示意罗青长坐在床边的一把椅子上，对他说：“我找你来谈台湾问题。”

罗青长汇报了台湾的有关情况，周恩来询问了台湾的近况和在台湾的老朋友。他说话声音很弱，罗青长由于难过和激动，又有些紧张，说：“听不清总理讲什么。”于是高振普把耳朵贴近周恩来嘴边听清后，再将周恩来的原话转述给罗青长。但有的事高振普听不懂，便问罗青长：

“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罗青长说：“懂，你就照传吧。”

谈话进行近20分钟，周恩来说：“我平常给你们讲的台湾那些老朋友，他们这些人，过去对人民做了有益的事情，你们将来千万不要忘记他们，一切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你们都要不要忘记他们。”

讲到这里，周恩来实在疼痛难忍，只好说：“青长，休息10分钟吧，休息10分钟后，我们再谈。”

说着，周恩来用颤抖的手吃力地从病床旁拿起一本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罗青长接过来一看，只见上边转载的香港《七十年代》

月刊9月号刊载的《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一文旁边，有一段歪歪斜斜的批语，是周恩来的笔迹：

请罗青长、家栋对蔡省三的4篇评论的真实情况进行分析，最好找王昆仑、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人，弄清真相，以便**（两字模糊）。

周恩来 九月四日

托，托，托，托。

香港《七十年代》月刊的这篇文章，是介绍蔡省三对蒋介石去世后台湾局势的分析，其中介绍了将成为蒋介石接班人的蒋经国的经历等其他情况。周恩来批示中提到的“家栋”是指钱嘉栋，时任周恩来的秘书。

罗青长说：“请总理放心，台湾方面的工作会继续做，按照总理的交待多做工作，简报的事会更加细心，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周恩来点点头说：“我要休息一会儿了。”

罗青长恋恋不舍地走出病房。

当晚，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在会上做检讨，表示“感谢毛主席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并介绍自己几个月来的思想情况。会后，他致信毛泽东，将检讨发言稿送毛泽东审阅。

第 1377 回：七五年，国民经济大发展 噩耗至，周恩来总理逝世

12月27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说：“盼望在主席认为方便的时候，让我去看看你。”

毛泽东当天批示：“我近日有些不适，以不见为好。大局是好的。”

与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相隔不到一个月，1975年12月31日晚23时50分，毛泽东在书房里又会见了两位美国客人——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

朱莉说：“我带来了我父亲对你的问候，还带来了他特意写的一封信。”

在翻译读完尼克松的信后，毛泽东接过信，用英语念了信末的日期和签名，说：“很好，谢谢他。我还要见他，President Nixon（尼克松总统），欢迎他。”

谈到中国的情况时，毛泽东说：“中国有些成绩，总的来说是落后的。过了10年，你们再来看。”

当戴维说，感到最新的是中国的精神发展时，毛泽东说：“Struggle（斗争）！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ClassStruggle（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也有斗争。共产党内部也有斗争。不斗争就不能进步，不和平。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不可怕，我们不杀人。国民党过去的党、政、军、特人员，战争中俘虏的，现在都把他们赦免了，给他们公民权。”

戴维说：“从你们的革命的角度来看，没有一个灵魂是不能拯救的。”

毛泽东说：“帮助人家改正错误。比如批评10个人的错误，8个人批对了，有两个人没有错误，搞错了，批评他们了，以后取消，说他们没有错误，恢复名誉。”

朱莉指着王海容说：“她告诉我说你有两首新词元旦将要发

表了。”

毛泽东说：“老的，有一首是批评赫鲁晓夫的。”

谈话至1976年元旦0时45分结束。朱莉、戴维注意到，他们面前的毛泽东尽管已被疾病折磨得筋疲力尽，“斗争”的话题却使他又“像青年人那样兴奋起来”，“他的头脑甚至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眼前的事实使这对年轻的夫妇不由得感叹：“不论历史如何下结论，毛的一生肯定将成为人类意志力量的突出证明。”

1975年是第四个五年计划结束的一年。由于各方面进行了整顿，1975年经济工作一个月比一个月好。虽然8月河南、安徽等省部分地区遭遇特大洪水，但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较好。对照调整后的“四五”计划纲要（修正草案）检查，工农业总产值达到4467亿元，完成计划的101.7%，超过了年度计划高限，比上年增长11.9%。农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和大多数产品产量指标已经完成。农业战胜了严重自然灾害，取得丰收。农业总产值完成104.5%，比上年增长4.6%，比1970年增长19.1%，平均每年增长3.6%。粮食产量达到5690亿斤，比上年增长3.3%，创历史最高水平。工业总产值完成100.6%，比1974年增长15.1%，同1970年比较，五年增长53.9%，平均每年增长9%。社会商品零售额1271亿元，增长92%。进出口贸易额147.5亿美元，超过以往任何一年。财政收入815.6亿元，完成98%。这一年尽管存在着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积累率过高，财政收支出现赤字（5.3亿元），职工人数增加过快等问题，但总的看来，1975年是这几年经济发展最好的一年。邓小平因为主持1975年整顿，赢得了大家的信赖。

12月底，周恩来进入了断断续续的昏迷状态，大家都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进入病危后，有一次他的呼吸突然停止，连心跳也骤然停止搏动。医务人员以为周恩来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们一边奋力抢救，一边通知中央领导人来医院准备作最后告别。

没想到周恩来是被一口痰堵住了，把痰吸出后，他又恢复了知觉，慢慢睁开了眼睛。一见身边围着的中央领导，周恩来脸上露出了笑意。他颤抖着伸出手，和大家一一握手。

张春桥是最后一个和周恩来握手的，他刚转身，周恩来就叫着他名字。因为身体太虚弱，说话的声音太小，张春桥没有听见，站在那里没有反应。周恩来有点着急，又连叫了两声，这次身边的人听见了，告诉张春桥：“总理叫你。”

张春桥疾步来到周恩来跟前，俯身听他说道：“你和文元同志要好好的帮助王洪文同志，他还年轻。”

张春桥一边重复着周恩来的话，一边表态：“总理，你放心！”

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情。

1976年元旦，毛泽东的《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两首词发表：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

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念奴娇·鸟儿问答》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

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

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

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

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

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已处于病危之中的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恰好从广播里听到，便让秘书去买来报纸，并让他们读。当读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周恩来的嘴角绽出几丝笑纹，甚至可以听到隐隐的笑声。可是，剧痛很快又使他双唇紧抿。秘书收起诗词，他虽然疼得额上沁满汗珠，仍然坚持示意让秘书把诗词放在他的枕边。

有一天，他醒过来，用微弱的勉强能听到的声音讷讷地问医生：

“主席，主席身体怎么样？”

“没有大的变化。”医生小声报告。

“只要主席健在，我就放心了。”周恩来说完后，又昏迷过去了。

元旦这天，全国各大报刊都在头版刊载了毛泽东 10 年前写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标题下方，印着笔迹颤抖的“毛泽东”签名。

同时发表的经过毛泽东圈阅的“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写道：发表这两首词“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怎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反映”。社论还公布了毛泽东不久前批评“三项指示为纲”时所讲的一段话：“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1月5日凌晨，周恩来又作了第13次手术，也是他最后一次手术，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前来看望、守候。

下午至夜间，在京大部分政治局委员接到周恩来病危通知，分批前来探望。

考虑到周恩来当时的病情，康生逝世的消息没有告诉他。周恩来在病危时跟医生吴阶平说：“我这里不用了，你到康老那儿去吧！”

叶剑英白天黑夜地与吴医生保持联系，一再指示：“要想办法，能延长一天就延长一天，哪怕是多延长一小时一分钟，只要可能，就要尽到医疗方面的一切努力和责任！”

自周恩来病重后，特别是 1975 年下半年卧床后，叶剑英基本上是天天来。特别是在处理重大问题的前后，必来。开始，他常常与周恩来一谈就是 3 个小时。后来，减到了两小时。一月又一月，一天又一

天,周恩来声音越来越微弱,叶剑英越坐越贴近周恩来,谈话的时间也越来越短,连一个小时也无法坚持了。

终于,周恩来难以再说出声了。这时,叶剑英仍然坚持天天来,来了就紧贴周恩来坐下,轻轻握住周恩来的手,他们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嘴唇一样地颤抖,一样地说不出话,就那么望啊望,望啊望……那种情景,那份情谊,任你是铁打的心肠见了也忍受不住,不能不躲出门外失声痛哭!

他们最后一次谈话时,叶剑英叫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都退出,无论是送水送药,不按铃不许进。叶剑英从病房出来后,把工作人员召唤到身边,声音很轻,严肃地吩咐说:“你们俩都准备好纸和笔,24小时在总理身边,一刻也不能没有人。总理原则性很强,很多事,很多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特别是对于中央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内容要发泄,你们一定要记下来……”

然而周恩来始终没有说什么,直到停止呼吸。

在他逝世后,工作人员将雪白的纸交给叶剑英。叶剑英望着那洁净的白纸,眼里陡地涌起泪花,讷讷一声:“他一生顾全大局……”

1月8日凌晨,弥留之际的周恩来要求见最后一个人,那就是调查部长罗青长,要了解对台工作。对罗部长,周恩来还没把心中的话说完,便再度陷入深度昏迷。

周恩来的卫士高振普守在周恩来的病床前,抚摸着他干瘦的左臂。这是周恩来住院后期,高振普养成的习惯。他的手臂发热,高振普就比较放心。此时周恩来转过脸来,看看高振普,高振普习惯地对周恩来点点头。周恩来没说话,他这几天说话已经很困难。卫士乔金旺走进病房,示意高振普休息一会儿。高振普轻步往外走。忽然电铃响了,这不是平时的电铃,而是为遇紧急情况专设的电铃。不好!大家快步跑向病房,几乎同时看到监护器上的心跳显示:心跳70多次。陈在嘉大夫说,一直是100多次,忽然掉到70多次,她急得说不出话来,周恩来心跳在继续下跌,60次、50次、30次……

医生们按照原定的抢救方案,采用了所有措施,呼唤、人工呼吸……都不起作用。荧光屏上,时而显示一次心跳,渐渐地看不到心跳

了,只见一条直线。但是,抢救工作仍在继续进行,即使在心电图上已呈现出一条直线以后,又持续抢救了十多分钟。

吴阶平看了一下手表,他同旁边几位专家交换了意见之后,向大家宣告:“抢救工作可以停止了,把那些东西:全身上下氧气管、输液管、引流管和心电图监护仪的电极板等都撤掉,用新床单将总理全身都覆盖起来。”

这就是1976年1月8日上午,时针指在9时57分!一代伟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周恩来告别了人间。

还没有等吴阶平说完话,大家长久地压抑在心头的悲痛一下子爆发了出来,整个病房哭喊声一片……总理,人民的好总理,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60多个春秋的伟人,带着全国人民的敬仰,离去了。

专家、医生、护士与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抽泣着,依依不舍地离开病床,大家都站到房间边上去,为党中央领导人到医院来向周恩来遗体告别腾出空间。

第一个来到病房的是邓颖超。她还在走廊里,大家就已听到了她的悲泣声,有人嚷道:“邓大姐来了。”

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房门口,只见邓颖超由工作人员搀扶着颤颤巍巍地走进病室来。她身上穿着大衣,帽子拿在手里,她顾不及梳理散挂在眼睛边那灰白色的头发,唏嘘不停,满面泪痕,边走边用手绢擦眼泪。

邓颖超走进病房看到眼前的一切全都变了样:这一年零七个月来她所熟悉的挡在周恩来床头的屏风、病床两侧的床头柜等物都被撤走了;心电图监测仪、输液架与输液瓶不见了,其他抢救用的医疗仪器都被放到了墙角边;她的亲人恩来无声无息地躺在床上,他,被白床单覆盖了全身;原先都围在恩来病床旁的专家、医护人员,此时,都站在离开病床的地方,房间里一片抽泣声,大家用尊敬、关心和同情的目光看着邓颖超。一位护士走过去揭开白床单,周恩来穿着蓝白相间病号衣服的上半身露了出来,稀疏的头发整齐地向后梳理着,脸上擦得干干净净,神态安详地闭着眼睛“睡着”了。邓颖超意识到,从此再也见不到同她生死与共的恩来了,他们就这样永别了。

这时,邓颖超再也无法克制自己长久以来压抑在心底的悲痛与无奈,她蹒跚地扑向周恩来床头,用哆嗦着的双手抚摸周恩来已经冰凉的面颊,顿时号啕起来,泪水簌簌地滚落下来,她嘶哑着嗓子哭喊着:“恩来呀!恩来呀!你走了,我来晚了啊……”

屋子里的人们悲声大恸,再次达到高潮。邓大姐弯下身子,低头吻着周恩来的额头,不停地抽泣着。几位护士主动搀扶并劝老大姐离开病室到隔壁房间休息。

中央领导人接到周恩来去世的消息后都急匆匆地赶来了。第一个走进病房的是江青,她走到离周恩来床头大约一米远处,就站住了,大声喊着:“小超,小超……”

邓颖超被人搀扶着走了出来,江青拥抱着她,向她表示安慰。

李先念走进病房,他弯下身子,双手紧握着周恩来的手,只叫了一声“总理……”便再也说不出话了,泪水一下涌了出来。他悲痛得双手发抖,站都站不稳了,工作人员赶快把他扶到沙发上。他坐在那里,双眼睛盯着周恩来的遗容,无言地抽泣着。

11时05分,由邓小平带领,叶剑英、李先念、华国锋、陈锡联、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走进周恩来病房,围在他的遗体前肃立。小平同志说:“恩来同志,安息吧!”然后向周恩来三鞠躬,目视着他的遗体,缓缓地退出了病房。

周恩来的遗体,经过精心整理,于当日12时许转送到北京医院。

当天,邓颖超向党中央提出了周恩来生前的请求:“骨灰不要保留,要撒掉。”

张耀祠赶到毛泽东卧室外的大厅,把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告诉值班护士小于。小于哭着在通报纸条上记下这件大事。她把这张纸放在了毛泽东大厅里的条桌上。

护士孟锦云此时正在毛泽东卧室里值班。毛泽东躺在床上看一本《鲁迅选集》。小孟听到外面大厅里有人走动的声音,知道这是有人送东西来。她悄悄地走出去,看到纸条,泪水不由自主地滚到了脸颊。她把纸叠起来,放进了自己的口袋,擦了擦泪水,回到了毛泽东的卧室。毛泽东依旧在那里看书。他根本没有留意到小孟去大厅里的事,

小孟也便装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只是又坐在了主席床边的沙发椅上，也顺手拿起了一本书，心不在焉地翻看着。她担心，周恩来去世的消息会给毛泽东沉重的打击。

中午吃过饭后，主席休息了两个小时，下午3点多钟，政治局派人送来了周恩来逝世的讣告清样。小孟收下来，看毛泽东睡醒觉，精神还算可以，她决定找机会把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告诉毛泽东。

按照惯例，这时小孟要给毛泽东读报，读文件。她先读了些别的内容，而后稍稍停顿了一会儿，拿起那张讣告清样，她一向很高的嗓门，很快的速度，变得低沉、缓慢：“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于1976年……”

没等小孟念完，毛泽东已紧锁眉头，闭上眼睛，泪水流到嘴角，又流进脖颈……小孟自己已经哭出声来，泣不成句地坚持读完了讣告。

毛泽东始终没说一句话，只是任泪水下流……

此时的小孟，不知该说什么，也不知该做什么。无声的悲哀弥漫在毛泽东的卧室里，卧室里此时显得格外沉寂，仿佛这里的空气都凝固了。

早在1975年11月中旬，汪东兴和纪登奎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曾召开小范围会议指示：

“最近一段时间，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听取了总理医疗组的汇报。经过几次大的手术，目前总理的身体非常虚弱，已不能下床，生命处于垂危之中。根据总理目前病情的发展趋势，中央领导同志商定，先在很小的知密范围内，指定少数同志对总理的后事预做准备。要准备的有：

(1)起草讣告和悼词，这是必须提前准备好的，一旦出现不幸事件，现写就要误事。

(2)拟定治丧委员会名单和遗体告别、吊唁活动、追悼大会等初步方案。讣告和悼词由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周启才执笔拟出初稿，治丧委员会名单和遗体告别等事项，由中组部部长郭玉峰和副部长郑屏年拟出初步方案。完成时间暂定十天。”

这次会议十分保密。根据会议决定,周启才完成了讣告和悼词起草工作后,报告了汪东兴。汪东兴指示:“两件文稿由你亲自封存和保管,什么时候用,等通知。”周启才把两件文稿密封在一个文件袋里,锁在了他专用的保险柜中。

1976年1月8日上午10时许,汪东兴电话通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周启才,要他携带周恩来的讣告和悼词初稿,到中南海西楼大厅同李鑫一起进行修改,并说此事他已告诉了李鑫。

李鑫是康生生前的秘书。不到10分钟,周启才和李鑫相继来到西楼大厅。周启才把讣告和悼词的起草情况向李鑫简要说了一下,并将两件文稿交给他看,告诉他,悼词中周恩来的革命简历可能写得不够全,已和中组部领导商量好,他们负责提供这方面完整、系统、全面的材料,今天派专人送来。

第1378回：举国悲，周恩来遗体告别 北京城，十里长街送总理

1976年1月8日下午15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会议由邓小平主持。治丧办公室有关成员和李鑫、周启才列席了会议。周启才将讣告印件分发给到会成员。邓小平让周启才在会上读一下。周启才用较慢的速度，较高的声调，不到一刻钟读完了全文。经过讨论，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了这个文件。这时邓小平问汪东兴：

“悼词准备好了吗？”

汪东兴说：“在总理生前准备了一个初稿，正在修改，还没改好，今天会议讨论不成了。”

邓小平说：“那就等修改好了另找时间开会讨论。”

在讨论周恩来丧事过程中，治丧办公室提出请外地的李德生、许世友、韦国清和赛福鼎4位政治局委员来京参加周恩来的遗体告别和追悼大会的建议时，江青、张春桥反对。

当晚，谢静宜打电话给共青团北京市委，询问原定次日召开的北京应届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誓师大会的准备情况，她原准备大会照常召开，但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下，同意改期。

这一天，康克清把周恩来去世的消息向朱德隐瞒了一整天。1月8日下午，朱德还去接见外宾，接受国书。回来后，康克清先慢慢地对他说：

“总理病情最近恶化了。”

朱德听了后，沉默了一会儿，竟不肯相信。他认为有那么多的好大夫给周恩来治病，病情不会发展得那么快，但他的心情还是显得十分沉重。

到了晚上20时，朱德才得知周恩来已经逝世的消息。他先是一怔，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看到家人个个泪流满面的样子，他才肯定这是真的了。他坐在那里沉默不语，眼泪从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流了

下来，滴落在衣襟上。在那么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女儿朱敏还是第一次看见她的父亲流泪。

当朱德听到周恩来在临终遗言中说要把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地和江河里时，他喃喃说道：“过去人们死后要用棺木埋在地里，后来进步了，死后火化，这是一次革命。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恩格斯去世后，骨灰是撒在大海里的，而总理要把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地上和江河里，这也是一次革命。总理为党、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一个真正彻底的革命家。”他一边说，一边流泪，还问家人：“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吗？”

当天，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报告说：“中央政治局专门讨论了周恩来同志的丧事问题，议定了三个内容，一是向毛主席的请示报告；二是关于周恩来逝世的讣告；三是周恩来治丧委员会名单。”邓小平请示：第二、三项“均须于今晚广播，现送请审批，退汪东兴办理”。

毛泽东在9日批示：“同意。”

9日，邓小平再次因周恩来丧事写信请示毛泽东：“总理逝世消息发表后，不少国家要求派代表团或代表来参加葬礼。”其中有阿尔巴尼亚的阿利雅，明晨动身；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三木武夫，明晨动身；斯里兰卡共和国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今晚动身。邓小平写道：“政治局对此作了专门讨论，决定仍按主席的批准方案（一律不请）执行。由政治局发一个正式公告，现送上请批示，以便发表。退汪东兴办。”

邓小平提出，由他自己约见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乔冠华约见日本驻中国大使，韩念龙约见斯里兰卡驻中国大使，予以说明。毛泽东批准了这一方案。

周恩来讣告和治丧委员会名单，报经毛泽东批准后，1月9日在各大报纸头版整版登出，当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反复向国内外进行广播，沉痛宣告了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

1月9日，中央电视台第一次通过国际通讯卫星，向世界传送自己的节目——《向周总理遗体告别》。这一天，中国人开始争购周恩来遗像，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灯火通明，门前的长队一直排到了东单。但北京的周恩来标准像只有200张库存。

“是不是打长途，在上海印刷 59 万张像？”王府井书店党委书记兼经理姚明，与调研科长孙忠铨悄悄商议说。于是，上海印刷二厂接到电话，立即加班印制周恩来像。

周恩来治丧委员会的人特地来看望朱德。考虑他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劝他不要外出活动，注意节哀，并建议他只参加一次周恩来的吊唁仪式。可他说什么也要参加全部吊唁活动。1月10日，朱德在女儿的陪同下，来到北京医院吊唁厅，向周恩来诀别。在车上他就要脱帽。天气太冷，大家劝阻了。当他吃力地走进灵堂时，就开始流泪，他缓缓地走近周恩来的遗体，专注地望着共事 50 多年的老战友，似乎有话要对他说，可这已经是不可能。他努力站得笔直，异常庄重地，颤巍巍举起右手，敬了最后一个军礼。千言万语都化在这崇高的敬礼之中。





1976年1月9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委员向周恩来总理遗体告别

1月10日，聂荣臻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遗体告别后，又到邓小平的住处探望。

1月10日、11日两天，党和国家领导人，党、政、军各有关部门负责人，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以及首都群众代表一万多人，怀着敬爱和极其沉痛的心情，前往北京医院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



1976年1月11日下午，根据周恩来生前的遗愿，他的遗体将送八

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火化。这对全国人民来说，不曾又是一声晴天霹雳。连日来，电报像雪片一样飞往治丧办公室，人民群众强烈要求保住周恩来遗体，以便今后瞻仰。治丧办公室里将他们的请求转告了邓颖超，邓颖超说，“感谢大家的好意，但烧骨灰、撒骨灰是恩来生前和我约定的，这也是一场革命，希望你们理解、支持。”她嘱咐罗青长和统战部副部长李金德主管好火化事宜。

下午15时许，周恩来的灵车缓缓地离开北京医院，驶向长安街。北京市万人空巷，十里长安街早已是人山人海，人们扶老携幼，冒着凛冽的寒风，自发地伫立在道路的两旁，秩序井然，像往日迎候着总理的来，今日又迎送着总理的去。灵车所过，哭声四起，撕心裂肺，人们翘首仰望，希望再看一眼自己的好总理，希望自己的好总理再看一眼他心悬不下的人民。



下午16时45分，周恩来的遗体由王洪文、汪东兴、邓颖超，以及治丧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周恩来生前友好，隆重地护送到八宝山火化。周恩来的遗体静卧在鲜红的党旗下，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他致以最后的敬意，邓大姐向她的亲人、战友作最后的告别，人们再也控制不住感情的闸门，任其宣泄，一下子扑向周恩来的棺椁，嚎啕大哭，希望唤醒总理，希望留住总理。最后的告别终于不可避免了，在人们的哭喊声中，身穿崭新制服的殡仪工人恋恋不舍地将周恩来的遗体送入粉刷一新的火葬炉，熊熊的烈火燃起，周恩来在烈火中得到了永生。

1976年1月12日至14日，周恩来的骨灰安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供各界人士吊唁。

1月12日下午15时，由邓小平主持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继续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周恩来的悼词和追悼大会的有关事项。会议一开始，邓小平就说：

“总理悼词文稿，会前已经发给大家，为节省时间会上就不读了，请大家发表意见。”接着又说：“这篇悼词我仔细看过多遍，我认为写得是不错的。对总理一生的评价，对总理的革命简历，对以总理为榜样，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向总理学习的几段话，都符合总理的实际。我同意这篇悼词，认为可以用。大家有什么修改、补充意见，请讲。”

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等都相继发言，表示同意悼词文稿。

当讨论悼词即将结束时，邓小平再次发言。他说：“大家讲得差不多了，对悼词文稿大多数同志表示赞成，会上没人提出具体修改或补充意见。我提一点具体补充意见，加一个字，印件中1922年总理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应是总支部书记，加上个‘总’字，符合实际。大家没有新的意见，悼词文稿就讨论到这里，政治局通过。个别文字修改后，报请毛主席审批。”并指示治丧办公室改后先送邓颖超过目，看邓颖超还有什么意见。

散会后，周启才和李鑫走到大会堂北门口，张春桥从后面赶上来对他们说：“悼词号召向总理学习的那部分，不必那样展开写，不必写得那样实，你们改一改，压缩一下，笼统地写几句虚的话就行了。”

周启才和李鑫听后一愣，没有马上回答。

张春桥又说：“你们听清我的话了吗？”

周启才和李鑫说：“听清了。”

事后，他们把此事报告给汪东兴。

会后，周启才和李鑫遵照会议指示，对悼词的个别文字进行了修改，并请邓颖超过目。这时，他们考虑应该在悼词中加上一句“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考虑再三，他们把这个想法报告了汪东兴，得到了他的支持。他们驱车赶到邓小平家中，汇报了这一建议。邓小平看了一遍改好的悼词印件，提笔在“他衷心爱戴和崇敬伟大领袖毛主席”

这句话的后面,加上了“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句话。并在悼词首页写上“请主席审批”。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时间。

1月12日,邓颖超对周恩来生前的两位警卫高振普和张树迎说:“恩来同志不留骨灰的请求,毛主席、党中央已批准。你们俩跟随恩来同志工作多年,已向中央请示并得到批准,由你们2人执行撒骨灰的任务,这是你们俩为恩来同志办的最后一件事……”

邓大姐说到这里嗓子哽咽了,她强忍眼泪,克制住自己的感情,继续对他们说:“接到中央批准的消息,我高兴。高兴的是,恩来说过,他担心我替他办不成这件事,今天可以办成,就要成为现实了。咱们要共同为实现他这一愿望而继续工作。我很想亲自去撒,但是,目前条件还不允许我去做。再说,天气太冷,我岁数也大了,出动目标大。恩来同志是党的人,我委托你们二人去办,你们二人是党支部成员,我们靠基层支部。我相信,你们俩会很好地做好这一工作的。”

高振普向邓颖超提出,是否可以把周恩来的骨灰多保留几天,然后再撒。邓颖超摆了摆手说:

“我的请求,中央已批准,已有了安排,就不要再提了。我再向你们俩说一遍,你们要认清,撒骨灰也是一场革命。由土葬到火化是一场革命,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又是一场革命。我死后骨灰也不保留,也请党支部负责。这是我和恩来同志的一次革命啊!我们一定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邓颖超让她的秘书赵炜和高振普、张树迎去看一看,哪个地方可以撒,最好撒在有水的地方。但当时天气寒冷,很多地方都结了冰,没有选中一个合适的地方。最后中央决定派飞机去撒,并规定了投撒的时间、地点。中央决定由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和台湾办公室主任罗青长代表中央治丧办公室,由张树迎、高振普代表周恩来生前党支部去执行这次特殊的使命。

晚19时30分左右,邓颖超带着周恩来生前的工作人员缓步走入大会堂西大厅,大家随邓颖超向周恩来的遗像默哀,然后由周恩来生前的卫士张树迎、高振普打开骨灰盒,邓颖超双手抚摸着骨灰,双眼含满了泪水,她喃喃自语,像是在向总理倾吐着心曲:

“恩来同志,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安息吧!我们要永远跟随毛

主席战斗！”

在场的人无不动容，恸哭失声。

党中央决定由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和台湾办公室主任罗青长及张树迎、高振普等一行人穿过大会堂地下室，护送着总理的骨灰，离开了他生前熬过无数不眠之夜的地方，邓颖超的车紧随其后。大约晚20时许，他们到达坐落在北京东郊的通县机场，登上飞机。这是一架平时撒农药用的安—2型农用飞机。巨大的马达轰鸣声掩盖不住送行人的哭泣声，飞机缓缓升起，在深沉的夜幕下，透过朦胧的泪眼，仍然能看见邓颖超久久地、久久地挥动着双手，向他的亲人、战友做最后的告别……

周恩来骨灰撒放的地点，是邓颖超根据周恩来生前的遗愿，与中央有关领导反复商量后确定的，极具象征意义。第一个地点是长城，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我们民族的灵魂，周恩来曾提议将长城作为我国的国徽和国歌歌词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激励民心、凝聚民心；第二个地点是北京密云水库，这是周恩来多次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与劳动人民一起劳动的地方，在这里他与人民群众结下了深情厚谊，这里也倾注着他建设首都的心血和对首都人民的关爱；第三个地点是天津海河，这是周恩来参加革命的发祥地，他在这里认定了自己终生不渝的奋斗目标，他也是在这里播下了爱的种子；第四个地点是黄河入海口，当时的垦利县，现在的滨州。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为中华民族哺育了无数的仁人志士，最后又无私地融入浩瀚的大海。周恩来正是从这里走向世界，走向全人类。周恩来也要从这里走向他魂牵梦萦的台湾岛，去看看那里的台湾朋友……

整个过程经历了近4个半小时的飞行，中间没有停留，没有惊动任何人，更没有搞什么仪式。

郭沫若听到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后木然呆坐，病情突然加重，以至无法行走、无法站立。1月13日，他写了《怀念周总理》：

革命前驱辅弼才，

巨星隐翳五洲哀。

奔腾泪浪滔滔涌，

吊唁人涛滚滚来。

盛德在民长不没，

丰功垂世久弥恢。

忠诚与日同辉耀，

天不能死地难埋。

1月1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出记者报道:《大辩论带来大变化》,开篇写到:“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再次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愤慨。有人在街头撕毁当天的《人民日报》,不少人打电话责问报社:“你们是什么感情?”

1月14日的下午,又是孟锦云给毛泽东读报的时间,小孟读了准备在周恩来追悼会上由邓小平致的悼词清样。小孟读着,毛泽东不再是默默地听着,他泪如泉涌,失声痛哭,这在毛泽东是极少见的。他依旧没说一句话。他的痛哭,已诉说了他深厚的情感,这里有对患难与共的战友的哀伤,有对几十年来交往的回顾,有对自己暮年多病的悲凉,有对自己已无力回天的沮丧。周恩来的谢世,也许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代人的退出。毛泽东大概也感到了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悲伤。14日晚上,早已病重的毛泽东,身体又多次出现反复,他根本坐不起来,更不用说是站立了。小孟打电话请示汪东兴:

“总理追悼会的事,要不要告诉主席参加?”

汪东兴回答说:“政治局未发出通知请主席参加追悼会,你们就不要问主席参加不参加了。”

那天晚上,在毛泽东看电视的时候,护士和陪伴他的人看到眼泪再一次从他衰老的脸上流了下来。

14日晚,在蒙蒙的夜色中,邓颖超在周恩来生前党支部成员的陪伴下,将周恩来的骨灰盒移往人民大会堂台湾厅,暂时存放。作为周恩来相濡以沫的知己,她知道周恩来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台湾问题,她想让周恩来再在这里歇歇脚。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就是在周恩来的亲自提议下设置的,厅内的一切摆设都是按照他的安排摆放的。他为设立台湾厅曾倾注了大量心血。台湾厅的好多石头、砖块都是从台湾运过来的。厅中悬挂的一幅郑成功画像,是周恩来吩咐罗青长到故宫博物院,向国家文物管理局局长王治秋调来的,周恩来同时嘱咐罗青长复制一幅,通过关系赠送给蒋介石父子。台湾厅的说明词也是周恩来亲自拟妥改定的。

第1379回：追悼会，毛泽东没有出席 选总理，毛泽东反复权衡

1975年1月15日，全国下半旗向周恩来总理志哀。下午，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5000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

追悼会就要举行了。朱德的秘书见他悲伤过度，连续几天彻夜不眠，身体特别虚弱，怕他撑不住，就征求他的意见：“去不去？”

“去，当然去！”沉浸在极大悲痛之中的朱德，根本没有考虑自己的身体状况，马上作了肯定回答。

可是，就要上车出发的时候，朱德却因两腿软得厉害，怎么也站不起来了。这使朱德非常不安，坐在沙发上，难过地叹气：“唉，去不成了！这怎么对得起恩来？”

猛然，朱德想起什么，忙吩咐说：“快把电视机打开！就是坐在家里，我也要参加这个追悼会。”

关于周恩来追悼会问题，毛泽东批示，由政治局拟一个意见。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朱德等表态，请主席出席追悼会；华国锋、陈锡联、吴德、纪登奎、王洪文、姚文元表态：请主席酌情（处理）；江青、张春桥、汪东兴反对主席出席。毛泽东在政治局的报告上，圈了华国锋、陈锡联等人的意见，批上一个“好”字。

周恩来逝世几天后，中央拟好了有关追悼会的规格，参加追悼会的政治局及党、政、军负责人的人数和悼词一并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审阅时，张玉凤一直守候在侧。她和许多群众一样，心里存有一线希望，毛泽东或许也能像4年前参加陈毅追悼会那样，去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在这之前，轮椅，氧气袋，一切抢救的措施都准备好了，准备毛泽东去参加追悼会。一句憋在张玉凤心里许久的话，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她像孩子般地问毛泽东：

“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

一直处于悲伤中的毛泽东，这时，一只手举着还没来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只手拍拍略微翘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对张玉凤说：“我也走不动了。”

听到这里，再看看眼前病榻上痛苦万状的毛泽东，张玉凤无法抑制自己的泪水……她后悔真不该这样问已经无力行动的毛泽东。

毛泽东不无歉意地说：“那几个人的追悼会，我也没能去。”那几个人，可能是指1975年4月去世的和他一起参加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董必武等人，以及其他几个老干部的追悼会。毛泽东让张玉凤递给他用惯了的那支红铅笔，在送审报告上写有‘主席’二字的地方端端正正地画了一个圆圈。悼词千言，这个圆圈寄托了他对周恩来深切的哀思，表达了他对周恩来的深厚情谊。

张玉凤后来在她的回忆文章中这样描述毛泽东当时的身体状况：

“他讲话困难，仅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字句。由于长时间在他身边工作，我还能听懂主席的话。每当主席同其他领导同志谈话时，我就得在场，学说一遍。但到了他讲话、发音极不清楚时，我只能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摸，获得他点头认可。当主席的语言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他老人家只好用笔写出他的所思所想了。后来，主席的行动已经很困难，两条腿不能走路。如果没有搀扶，连一步都走不动了。”

1976年1月15日下午15时，周恩来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送的花圈放在周恩来遗像两侧。

会场里还放着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送的花圈。

大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邓小平致悼词。

这天上午9时15分，上海黄浦江上一艘或几艘船只拉响了汽笛，接着上百艘船跟着拉响汽笛。整个外滩被汽笛声笼罩，整整37分钟，既无事先布置也无串联。当天下午15时，上海黄浦江上再次响起汽笛声。人群从外滩沿江各个大楼涌出，汇集成浩荡的哀悼队伍，十几个人一列纵队，抬着花圈和周恩来遗像，从海关大楼直排到南京东路，转弯到江西中路，新的队伍不断加入，串流不息，直到深夜，所有的队伍都沉默而肃静无声。面对人山人海的悼念队伍，上海市委允许将花

圈送进外滩的市革会办公大楼大厅。

毛泽东没有去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在后来几天每次给他读有关悼念活动的文章、各国的唁电，他都会默默地流泪。每当给他读文件的护士孟锦云发现时，自己也不忍再读下去了。她想起汪东兴的叮嘱：“主席岁数大了，身体又不好，就不要多读这样的文章了。”

此后，毛泽东的情绪一直很低沉，不愿讲话。他不顾医生的劝阻，借助刚治好的一只眼睛，不停地、无休止地阅读书籍和文件。张玉凤回忆：“由于他的身体过于虚弱，两只手颤抖，已经没有举起文件的力量了。为了满足老人家那艰难的阅读需要，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要帮他举着书或文件。”看得出来，他是在用这个办法来摆脱内心的痛楚。

周恩来去世，谁来当总理？每当毛泽东醒来，他总是在扳手指头，还问张玉凤，政治局成员的名字，张玉凤就一个一个地报出当时政治局委员的名字。

有一天，毛远新告诉毛泽东，上海一些人贴出大字报，说邓小平在悼词中把周恩来赞颂得过分了，“结论应该推翻”。

毛泽东明确的答复：“攻击周总理，人民一定不会答应。在总理追悼会上所作的悼词，其结论是不能改变的。要推翻这个结论，人民是不会赞成的。”

这可能就是后来的传言：“反周必反，反周国必乱。”

1月20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邓小平作了检讨发言。针对有人提出“为什么提出要见主席”的责问，他回答道：“我的意思是，想当面向主席讲自己错误的严重，特别想当面听取主席的批评和指示，我还想当面提出自己的工作问题。我觉得这种要求是正常的，我仍然抱有这样的希望。”

会后，回到家里，邓小平当夜致信毛泽东：

“在上次会上同志们要求我在讨论之先，由我讲讲要对主席当面说些什么，所以我在今晚的会议上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现送上，供审阅。”

“我两次要求面见主席，除了讲自己错误和面聆主席的教导外，确实想谈谈我的工作问题。还在批判我的错误的时候，提出我的工作问

题是否妥当,我自己确很踌躇。提,怕觉得我受不得批评。不提,也有什么恋栈之嫌。再三考虑,还是想当主席面谈这个问题为好。”

“现在,已过去两个多月,批判还将继续下去,再不提出会妨碍中央的工作,增加自己的过失。因此,我首先向主席提出: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恳请予以批准。”

“我自己再不提出,实在于心有愧。”

“至于我自己,一切听从主席和中央的决定。”

1月21日上午,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1月20日会上邓小平的检讨发言情况后,毛泽东说:对邓小平批还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意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

毛远新:“还要创造条件,看实践怎样做到自己的申明,小平同志讲向主席陈述自己错误,听取教海外,还想讲自己的工作问题。”

毛泽东:“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

毛远新:“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毛泽东:“对。”

毛远新:“上次主席讲征求几个人的意见,华、纪、陈提出国务院请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他们三人做具体工作。”

毛泽东考虑了一下说:“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让一下。”然后他又扳着手指数政治局成员的名字,最后说:“还是华国锋比较好些。”

毛远新点头说:“是。”

毛泽东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

此后,邓小平不再主持中央的工作。

华国锋这时55岁,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时随军南下,到湖南工作,历任县委、地委和省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担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以及湖南省军区和广州军区的负责人,一九七一年调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后任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由于经常到湖南视

察,对华国锋是熟悉的。“文化大革命”期间,随着见面机会的增多,对华的了解也增加了。他认为:华国锋既有基层工作的经验,又有在省里和中央工作的经验;为人老实忠厚、办事“公道不蠹”。他甚至表示:“人家说他水平低,我就选这个水平低的。”

1月21日下午,叶剑英打电话约熊向晖去他那里。谈话中,叶剑英提到,周恩来的追悼会,是他提出让邓小平致悼词,以此再给他一个在全国人民面前亮相的机会,想再扶他一把。现在看来还是不行。政治局批邓,越批越凶。叶剑英感到很为难:参加吧,没话好说,不说话呢,又不好办。家人建议他到广东去休息。叶剑英自己想去广西。他征求熊向晖的意见。

熊向晖说:“他们要整你,你到广西也逃不掉。他们要的不是你这个人,而是你的位置。我建议,你就学三国时刘备的韬晦之计,请病假,但是不要离开北京。这样,可进可退。”

叶剑英深以为然,说:“这个意见好。”

1月18日,经中央批准,由国防科委和七机部联合召开批判张爱萍的大会。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系统,包括230厂职工及社会各界共7000人参加。地址选在先农坛体育场,中央、国务院机关和解放军驻京大单位及新闻媒体都被邀请参加。

张爱萍一早就起床了,他刮了胡子,对镜着装。在医院里住久了,会显得衰老疲惫。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影响到他形象的事,在今天是决不允许的。

他一上台,还是那个习惯,对着麦克风,把他那根手杖在地上使劲地顿了一下,全场一下子鸦雀无声。7000大众都想听听他的“检讨”。

张爱萍慢慢从军装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全场一下子哄然大笑:是发言稿!张爱萍讲话居然也念稿子了!

主持人大声喊道:“严肃点!这是一场阶级斗争!”

张爱萍再次被冲击后,他拒绝做任何检讨,这次,他终于同意做检讨了,大家都想听他究竟能讲些什么?

只见张爱萍对着稿子念道:

“去年三月我重新工作以来,到了一些单位,接触了一部分干部群众,讲了一些话,也做了一些决定。假如我犯了路上的错误,将由我

个人承担全部责任。与其他同志没有任何关系。”

读罢，张爱萍又把手杖狠狠地在麦克风前顿了一下，扭头就走了。他上车后说：“走，回医院。”

等在场的人回过味来时，张爱萍的车已经开走了。

张爱萍在 7000 人大会上就念了 72 个字，合到在场的听众每 100 个人才摊上一个字。此时，已经没人敢把他重新送进监狱，张爱萍还怕什么？早就看透了，顶多去山里开照相馆！

批判仍在持续不断。规模在六、七千人左右的批判大会，继 1 月 18 日后又开了多次，但是，张爱萍从此一律拒绝参加。他说：“你有本事就来绑架我吧！”

他还劝国防科委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肖向荣不要去参加批斗会。1975 年张爱萍复出，就约了肖向荣和他一起干。肖向荣在被批斗后，也是心脏病发作，住进了 301 医院。国防科要求他参加群众批判大会，说“这是对待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问题，也是对待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态度问题，你好好想想吧！”

这番话对一个老革命来说，有着当今这代人难以想象的分量，肖向荣犹豫了。张爱萍对他说：“胡说八道的话，哪里能听他的。不能出去，要斗就叫他到医院来斗，骂就由他骂去，不过个把钟头。”

肖向荣说：“不去，政治上被动，毕竟是毛主席领导的群众运动啊。”

张爱萍说：“都到现在了，怎么还这样蠢！什么毛主席领导的？完全是派性斗争！他们算什么组织？宦官朋党，胡作非为！不要去！”

但肖向荣还是说：“毛主席有指示，中央也发了文件，作为一个党员，总要见见群众，去说一说真实情况也好。”

肖向荣，走了。

他真的是做到了据理力争。面对批判，他坚持自己和张爱萍到七机部整顿是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的，是正确的，成效也是有目共睹的。但越是这样，对他的批斗就越是没完没了……

一天晚上，他伏案写交代检查，想到自己革命一辈子，竟然落得如此下场，悲从中来，不禁泪如雨下。爱人劝他早点休息吧，他说，待会吧，还差些没写完呢。一觉醒来，再看他还伏在案上，已经昏迷，身子

下还是那张没有写完的检查交代。送到医院抢救，终未能挽救回来。

闻此噩耗，张爱萍亲泪如泉涌，他激愤地敲着桌子：“为什么要出去！为什么不听话！……”泪如泉涌。

多少年过去了，每次提到这事，张爱萍都是那句话：

“是我找他出来工作的，他是代我受过而死。他比我更忠于这个党，他对党是真忠，真忠……”

第 1380 回：二月二，中央下一号文件 召豫、甘，谈两地铁路问题

由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大量日常工作亟需有人主持，1976 年 1 月 28 日，毛泽东正式提议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1 月 31 日，毛远新给毛泽东的请示报告中说：“我已和王洪文、张春桥谈过，传达了主席对华国锋、陈锡联工作安排的指示，他们表示完全拥护，保证支持。此事可由政治局指定专人分别向中央党、政、军部门进行传达。”

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还应同小平同志谈一下。”

2 月 1 日，姚文元的日记中写到：

天安门有反革命传单曰：“打倒张、姚”，还有什么“打倒少壮派”。“少壮派”一类是国民党、苏修的惯用语。为人民的敌人所仇恨，“打倒”，不胜光荣之至。这本日记没有多少可看的东西，无非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相互“打倒”而已。但革命讲政策。说厉害，是远远不及反革命派的辣手的。我手无寸铁，就一支笔，且是铅笔，“打倒”除杀头坐牢之外，就是把我这支笔剥夺掉。

2 月 2 日，中央下达了 1976 年的一号文件《中共中央通知》：

1976.02.02；中发〔1976〕1 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当晚，张春桥给叶剑英的秘书来电话，说要看看叶剑英。叶剑英马上打电话告张春桥，没有让张春桥过来看他。

真是历史的巧合，1975 年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是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而 1976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是任命华国锋代总理。

2月3日，张春桥给王洪文的秘书肖木写了一篇读中央一号文件感想的文稿：

又是一个一号文件。

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

真是得志更猖狂。

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人民是决定的因素。

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正是：

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1976年2月3日有感

张春桥用中央前后两个一号文件时间仅隔一年形势已发生了“新桃换旧符”的大转变，教育、鼓励肖木要乐观。因为肖木当时对形势看法较为悲观。这个《有感》，张春桥给肖木看过后，随即锁进了保险柜。

周恩来逝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都未能摆脱悲伤的情绪。本来还可以说说笑笑的毛泽东，因为周恩来的去世，仿佛一下子带走了他本已不多的欢乐。那段日子里，他脸上几乎已无笑容，常常沉默着。

就是在这种气氛中，1976年2月4日，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到了。但是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住处外面一片昏暗，只有一排整齐的路灯闪着微弱的亮光。家家团圆之夜，毛泽东身边没有客人，更没有亲人，他的住所，依旧显得冷清而寂寞，只有身边几个工作人员陪伴着他。

年夜饭是张玉凤一勺一勺喂的。此时的毛泽东不仅失去了“饭来伸手”之力，就是“饭来张口”也十分困难了。他在这天依然像往常一样在病榻上侧卧着吃了几口他历来喜欢吃的武昌鱼和一点米饭。

饭后，张玉凤和孟锦云把他搀扶下床，送到客厅。他坐下后，头靠在沙发上休息，静静地坐在那里。

入夜时，中南海外边传来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毛泽东听得那么真切，他意识到了这是除夕。他看看张玉凤，又看看孟锦云，用低哑的声音说：“放点爆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

于是，张玉凤通知了正在值班室的其他几名工作人员，让他们在房外燃放了几挂鞭炮，毛泽东听到噼噼啪啪的爆竹声，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按照规定，在中南海是绝对不准燃放鞭炮的，毛泽东的住地更是戒备森严。游泳池传来的爆竹声着实让中南海警卫人员吓了一跳。等人们弄清这一动静竟是来自毛泽东的住地后，一个传闻便在京城的政治圈中不胫而走：“毛主席在周总理死后放鞭炮！”还有人证明第二天亲眼看见从游泳池拉走了整整一卡车的鞭炮屑。非常夸张了。

一些人本来就对毛泽东没有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有看法，因为在周恩来逝世的一星期前，毛泽东还接见在“水门事件”中下台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和女婿，而且在周恩来逝世后，很多单位还发出“不要用死人压活人”的“最高指示”，压制老百姓自发悼念周恩来的活动。

一些老干部私下里纷纷为周恩来抱不平，认为周恩来一生对毛泽东忠心耿耿，而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死却无动于衷，也实在太令人寒心了！这种情绪迅速扩展到整个社会。这次“鞭炮事件”更是火上加油，弄得整个京城沸沸扬扬。

2月4日，大年初一，聂荣臻要女儿聂力打电话给邓小平的女儿邓榕，代表全家向邓小平全家祝贺春节，并要邓小平保重身体。

2月6日，陈锡联第一次主持中央军委常委开会，参加会议的有王洪文、张春桥、苏振华、粟裕、汪东兴、徐向前、聂荣臻。邓小平、叶剑英、刘伯承没有到会。会议对去年7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文件作了检查。会后，中央军委向毛泽东、党中央写出报告，称1975年7月邓小平、叶剑英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有错误”，建议“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并要求全军积极参加“回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这一报告经毛泽东批示同意后，中共中央于2月16日发出“三号文件”予以批转。

2月6日这天，张春桥召见文化部部长于会泳，对他说，江青身体不好，以后文化部所有的事由张春桥管。凡请示件不要往她那里送了，样板戏剧团不需要报批的件，可以送。

张春桥向于会泳交待了几件他和江青商量过的事情，最后在谈到关于辽宁省要求提倡每个大队都办放映队时，张春桥说：“都这样搞不行，总要先解决吃饭穿衣问题，后解决看电影问题。文艺的发展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不能阻碍它的发展。我们现在的粮食只能说刚刚够吃。可能有的省发展快些，这是允许的。但都发展，就成问题了。”

2月7日，华国锋首次以国务院代总理的身份出面接见外国驻华使节。

2月8日晚，叶剑英再次找熊向晖去他那里。见面后，叶剑英说，他接受了熊向晖的建议，“跟聂帅商量以后，就打了报告给毛主席，请病假，已经得到了政治局的批准。”

关于华国锋为代总理的任命，叶剑英说，这个措施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虽然王洪文告诉他，毛远新传达毛主席关于人事安排的指示时，说这是暂时的，但是叶剑英认为，“可以肯定的是，毛主席不想让江青、张春桥和王洪文接班。”他表示：自己虽然不了解华国锋，但是“已经给主席写信，拥护对华的任命。”

听说叶剑英生病了，空军副司令员吴富善特地去看望，一见面就问：“首长，为什么不干了？”

叶剑英回答：“谁说不干了？他们不叫我干，只好不干！”

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从广州回来后去看望叶剑英，劝他到南方去休养一段，叶剑英回答说：“不，这个时候，我哪也不能去。”

还有许多人打电话、写信给叶剑英办公室，问候病情。“叶办”的人只好悄悄地如实以告：首长身体和往常一样。

陈锡联历史上和叶剑英实际上交往并不多。听说叶剑英想到广州居住，特地打电话劝说：“叶帅，你不能去广州。”

谁知叶剑英生气地说：“你怕我捣鬼吗？我如果想捣鬼的话在哪里不能捣？”

觉得自己被误解的陈锡联对妻子王璇梅说：“我留叶帅在北京，是想在政治局里能多留一票啊。”

王璇梅事后回忆这段历史感慨的说：“那时在中央工作的环境实在太复杂了。”

此时，兰州铁路局和郑州铁路局已经乱了起来。而且郑州铁路枢纽堵塞，危及全路，形势严峻！为此，中央不得不紧急召见河南、甘肃两省和郑州、兰州两局的主要领导干部来京解决问题。1月下旬，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冼恒汉带领兰州局的赵滔、张恒云、陈平、蔺子安、章云等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和省委书记唐岐山，带领郑州铁路局的苏华、王志庭、张建业、胡逸平、李克基等人于1月21日分别来到北京。

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指示：“铁道部临时领导小组，要与河南、甘肃省委领导统一思想，统一意见，分别写出《关于解决郑州铁路局问题的报告》、《关于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报告》，征得两省省委领导同意后，再上报中央批下去。”

铁道部临时领导小组根据华国锋等领导的指示，从1月21日起分别听取河南、甘肃两省和郑州、兰州两局领导的意见和批评，并据此写出检查报告和解决问题的意见。

但是铁道部与河南、甘肃两省的意见分歧依然很大。铁道部和部分铁路局的领导认为，去年解决铁路局的问题，是按照中央9号文件要求进行的，河南、甘肃省委领导也基本上是同意的。河南、甘肃现在的做法就是刘建勋、唐岐山和冼恒汉等人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铁道部，要铁道部领导在向中央提出解决郑州和兰州两局问题的《报告》中承认错误，否定铁道部对郑州和兰州两局问题的处理，从而否定中央9号文件。对此，万里不同意。但是有《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和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他也不能说什么。最后，万里以文件上点了郑州局党委代理第一书记苏华和铁道部政治部主任黎光的名字，说：

“他们都是我们派去的，执行的是我们的决定，错误由我来承担，要点就点我的名，我就这一条意见了，如果你们不同意，我就不签字……”

为此，僵持了一个星期。

2月8日，河南刘建勋、唐岐山给中央写了《关于解决郑州局问题的意见》。其中写道：“郑州铁路局的问题，主要是局党委代理第一书

记苏华同志刮右倾翻案风，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这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绝不是孤立的。这是同铁道部主要负责同志的错误指导思想分不开的。”

他们认为，铁道部前一阶段在解决郑州铁路局问题上的主要错误：一是，把郑州铁路局的形势看反了，否定主流是好的。二是，把郑州局的主要矛盾搞错了，背离了党的基本路线。三是，没有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四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的革命新生事物和新生力量。他们在意见书中写道：“铁道部和苏华搞的这一套，省委是完全反对的，并且一再指出过。”

与此同时，冼恒汉也写了一份与《关于解决郑州铁路局问题的意见》内容类似的《关于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意见》。其主要内容：一是，错误的性质是“右倾翻案风”；二是，错误的事实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三是，责任全在铁道部，省委是反对的；四是，解决的办法，在省委统一领导下，回击“右倾翻案风”。

2月9日晚，华国锋、纪登奎等国务院领导，把铁道部部长万里和副部长李新找去。华国锋批评他们在解决兰州和郑州问题上拖延时间。在谈到文件中点名问题时，纪登奎说：

“你的意见和要求可以理解，但，点谁的名，这是中央的意见，你们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

就这样，万里终于在文件上签了字。

2月14日晚，华国锋、王洪文、纪登奎、吴德等，召见了河南、甘肃省委领导和铁道部党的临时领导小组成员，以及郑州、兰州铁路局领导。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讲了话。接见之后，把出席会议的铁道部临时领导小组成员全部留下，又对他们单独做了指示和批评，主要有：

一、你（指万里）的错误不少，你讲过“四个乱了——思想乱了、组织乱了、队伍乱了、制度乱了”；你把派性说成是主要矛盾，对形势看法有错误，把支流说成主流；主要责任不在你，而在邓小平；你过去敢，现在还要敢，要敢于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敢于承担责任，要批“右倾翻案风”。部领导小组一方面要检查自己的错误，另一方面要批邓，检查哪些方面你们执行了邓小平的路线，要划清界限。万里同志要转好

弯子。

二、你们对在文件中点黎光、苏华的名想不通。部里和省里的看法不同，甘肃要黎光回去是为了好做工作。黎光和苏华可以先不回去。到一定时间再说，现在有病治病。

河南刘建勋在北京开会期间，了解到中央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内幕，感到河南在1975年执行了邓小平的指示搞整顿，特别是整了造反派，不是小事情。他和纪登奎就如何稳定河南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决定把整顿期间从省直机关下放到基层的几个有影响的造反派头头马上调回省直工作，恢复职务。刘建勋把省委办公厅副秘书长赵俊峰叫北京，要他马上向省委常委汇报解决。

赵俊峰回到郑州，立即向省委常委作了汇报，省委当天发文件把几个影响大的造反派头头调回省直官复原职，还提拔重用了两个头头，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因搞整顿使刘、纪和造反派之间造成的紧张关系。

第1381回：春节后，“总理遗言”传全国 “转弯子”，北京开五省会议

春节后，社会上突然出现“总理遗言”。

“遗言”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给邓颖超的，很短，全文如下：

小超同志：

你我都是共产党员，一起革命五十多年，我相信你一定经受得起。

要向蔡大姐学习，要教育孩子当好普通一兵。

战友周恩来

1975.12.28

另一部分较长，也就是当时轰动全国、震惊世界的“总理遗言”，全文如下：

主席、中央：

我自第二次手术以来，病情曾有短期稳定。从下半年开始，癌症已经广泛扩散，虽然自觉尚好，但离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及中央汇报一下近来的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感动，主席年纪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党和国家掌舵，是全国人民莫大的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主席在遵义会议时和我的谈话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为主席分担一些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保重。

洪文同志几年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解决问题上，提高都很快，对此我极为高兴，我们党后继有人，洪文同志今后要多抓全面性的问题，处理还要果断，为党多做工作。

朱德和叶剑英同志年事已高，要锻炼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可以摆脱些，但你们所处的地位仍然是举足轻重的。我们老一辈人，跟主席那么多年了，要以高昂的战斗精神，保持革命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

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

春桥同志能力强，国务院的工作，小平、春桥要多商量。

同志们，长期以来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程。在这曲折的道路上，我永远不能忘怀那些在我们前面倒下的先烈，我们是幸存者。1926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们，死者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的。”多少年来，我总想着，用什么来向他们汇报呢？……在此弥留之际，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些工作而感到内疚……展望本世纪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死对于共产党员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把生命交给了人民的事业，而人民的事业是永存的。唯一遗憾的是我再也不能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加倍工作，为人民服务了。同志们一定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关于我的后事，我向中央请求：

将我的病情发展告诉全国人民，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

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会应力求简单，请洪文同志主持，小平同志致悼词。

骨灰不要保存，撒掉。

永别了，同志们！

周恩来

1975.12.29

全国各地很快发现了数以万计的“总理遗言”抄本。而且，“遗言”还被世界各国130多个电台、通讯社反复播发。当时，几乎没有一个人怀疑这份遗言的真实性。说话的口吻，对中央高级领导人的评价，对中国革命历史的了解，文字的干净简洁……一切都像周恩来的风格。

但是，谁能相信，这份“总理遗言”的作者竟是杭州汽轮机厂的一

名年仅 23 岁普通工人——李君旭。

1976 年 2 月上旬的一天晚上，阴冷的天空中翻飞着雪花，李君旭的同学“大耳朵”吕建树从他插队的农村回到杭州。“大耳朵”从乡下带回来一大块新鲜狗肉，那是他插队的房东知道他要回城后，将自己家里养的狗宰了送给他的。

“大耳朵”吕建树在杭州的几个同学袁中伟、刘建新、李晨光、李君旭都集聚到“大耳朵”家里。大家围着火炉烹狗肉议时政。“大耳朵”说，他插队的那个农村，农民都吃不饱饭，许多村民开始离开村子出去谋生了。大家又一起议论到刚刚下发的中央文件，议论到文件宣布的中央高层人事变动中没有邓小平的名字。对时局的忧虑，对祖国前途命运的担心，让这帮热血青年更有了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

在他们中间，李君旭并不属于核心人物，此时却慷慨激昂地说：“我要当一颗铺路的石子，用我的热血去唤起民众！”

袁中伟同学说：“民众现在已经是一点即燃的干柴，缺的是点燃干柴的火星，我们是可以做火星的。”

那一天，大家聊得很晚，大家聊到了“总理逝世后会不会留下遗言？”这是当时大家都很关心的话题。随后又猜测“如果有遗言总理一定会说到哪些内容？”

李君旭没有说话，但脑子里一刻也没有停止转动，他将这帮热血青年你一句我一句的言论、观点、设想、猜测、希望……一丝一缕地融进自己的大脑。

“总理的遗嘱，就是骨灰撒掉这一句话吗？”

“肯定还有什么话被人封锁了！”

“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得行动起来，继承总理未竟事业！”李君旭觉得自己应该写一篇文章。

回到家里，李君旭展开稿纸，准备抒发心中的感想。但是提笔写了几个开头，都不满意。突然，他脑海中迅速闪过一个念头：“遗言！就以周总理的口气，写一封诀别书。”

1976 年春节过后不久一个寒冷的晚上，当大家又集中到李君旭家时，他在昏黄的灯光下，拿出了两张薄薄的纸。那就是他精心炮制的

“总理遗言”。但他没有将真相告诉他的这些伙伴们，只说他是抄来的。

这似乎是不可思议。一位堂堂的国务院总理的“遗言”怎么会出现在一个小小的工人手里？可当时在场的几个热血青年看了以后，竟没有一个人问类似的问题，在议论了一番“和我们猜测的挺像”之后，全都埋头抄写起来。李君旭此时知道：他——成功了！

在场抄录这份“总理遗言”的人，无一例外地都将抄录的这份“总理遗言”拿给周围的亲人、朋友、同学看了。而每一个看过这份“总理遗言”的人，也都无一例外地埋头就抄……依旧没有一个人问及这份“总理遗言”的来源，也没有一个人对这份“总理遗言”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而每一个抄录的人又都以最快的速度再传给他们周围的人，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就这样，这份仅仅是出自杭州汽轮机厂一位23岁小工人之手的所谓“总理遗言”，却冠以周恩来名字在短短的时间内像滚雪球一样迅速地传遍了几乎整个中国。

这是因为，“遗言”中的许多内容迎合了人们当时的心中渴望。许多人都是含着热泪反复诵读。特别是那句“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些工作而感到内疚”，让无数人唏嘘。还有关于后事的三点请求，其中“骨灰不要保存，撒掉”，寥寥8字，更让多少人潸然泪下。人们的情绪在这样一份从天而降的“总理遗言”中找到了寄托。

这时，还有一首据说是毛泽东写给周恩来的《诉衷情》的诗也在广为流传：

一生忠贞为国酬，
何曾怕断头？
如今神州红遍，
江山靠谁守？
业未竟，
身躯倦，
虽未终，
鬓已秋。
自古忠臣多逆子，

宝黛真情两分离。

你我之辈，
忍将夙愿付东流？

2月初，中央召集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还有当时问题较多的云南、四川、浙江、江西、福建五个省的领导，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召开了“转弯子”会议，云南、四川、浙江、江西、福建五个省前来参加会议的有29位省级领导。

主持会议的华国锋说：“这次找你们来，主要是来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打招呼，思想早转弯，放下包袱。因为你们有些省市过去传达过邓小平的一些东西，责任不在你们，在邓小平身上，你们可以揭、可以批，这样就放下包袱，思想上就好统一了。”

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和华国锋原来都在中南局工作，赵紫阳是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是湖南省委副书记，互相比较熟悉。会下，赵紫阳对华国锋说：“国锋同志，整顿工作中的很多事都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决定的，有些界限一定要掌握好，不要把打击面搞大了。”

2月16号下午，四川组的代表讨论时，正在发言的四川省委书记段君毅突然就停下来不说话了，坐在他对面的省委书记，原四川省石油管理局某女子钻井队指导员唐克碧觉得奇怪，再看看段君毅旁边的赵紫阳，怎么也不说话了？她顺着两人的目光侧过头，才发现穿着军装的江青正从她背后走了进来。

江青坐在赵紫阳的旁边，没有说话。可能是事发突然，会场上也没有人说话。过了一会儿，只听江青说道：“这几天，我等了三天三夜没睡觉，就等着一个人发言。”

她声音非常小，仔细听才听得到。唐克碧不知江青是在等谁发言，这时她看见赵紫阳的脸红了，红到脖子根儿，知道江青肯定说的是赵紫阳。

果然，江青提高了嗓门喊：“赵紫阳，就说的你呀！现在有些人对中央的会议不理解，有意见、有情绪，赵紫阳你是怎么想的？”

之后江青又说到关于她的谣言四起，特别是在广州！赵紫阳是1975年从广州调到四川来的。江青还说：

“赵紫阳你是毛主席重点培养的人，毛主席对你很信任，你不跟毛主席走，跟着邓小平跑，你怎么能这么对毛主席啊？还有你赵紫阳到四川，为什么一去就批造反派？”

江青提到时任重庆市革委会副主任的黄廉给她写的一封信。她说信写得很好，然后就开始念黄廉在信里写的诗，还说主席也看了。她说：

“赵紫阳，你要是不转弯子，我就把这封信谱成歌，搞成样板戏那样唱，到全国去唱。”然后问赵紫阳：“黄廉是个好同志，他入党了没有？”

赵紫阳回答说：“没有。”

江青：“那他有没有申请？”

重庆市委书记、重庆市革委会主任鲁大东说：“有。”

江青问：“申请了为什么没批准？”

鲁大东说：“当时没有介绍人。”

江青说：“没有介绍人？我来当他的介绍人！”

接着她对着坐在对面的唐克碧说：“克碧同志，我们两个当他的介绍人！”

唐克碧没有说话，大家都沒有说话。唐克碧以为大家是在等着她回答，硬着头皮正要说，赵紫阳说话了：

“不是不介绍他，不让他入党，是他历史有点问题。”原来黄廉档案里有一些部队不好的评语，如“反右”时内定“右倾”等等。

江青大声问：“什么问题？哪个没问题？我们在座的哪个没问题？只有他有问题？我们这些老家伙个个有问题！”

接着，赵紫阳对他到四川任职及与邓小平的关系作了说明。他说：

“第一，我到四川来是中央决定的（不单单是邓小平）；第二，当时我本来想到小平同志那去问一问还有什么说法，邓小平同志忙，就没去。第二天就不是我自己去的了，还有廖志高和其他人。我问了小平同志，我到四川去还有没有其他指示，小平同志说你去好好干就是了，把四川稳定下来，经济发展上去。从此之后，我没和小平同志有任何接触了。”

关于广州“谣言四起”的事情，赵紫阳说：“我确实听到过关于毛主席批评（江青）的话，是听韦国清同志说的，他说了以后我对任何人都没提过，包括我的老婆我都没说。我可以保证，我家里人都不知道。”

江青说：“哎哎哎，大家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好好谈。”她说要送给赵紫阳两本书：“这两本书，我是用我的生活费买的，没拿公家一分钱，我省吃俭用，在生活费里节约出来给你买的。我是关心你们，爱护你们，因为你和廖志高都是毛主席亲自培养的，我也相信你们，所以买书送给你们。”

这两本书，后来是唐克碧去领回来的。

接下来，赵紫阳继续发言，他说要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这几年老同志总犯错误？”

这时，江青起身离开了会场。

说到黄廉给江青写信，是因为赵紫阳到四川后点了黄廉的名。

赵紫阳到四川后，主要精力放在农业上，对当时中央强调的清除派性的工作，他是和大搞农业结合起来搞的。在一次省委工作会议上，四川的干部们听到新来的省委一把手一个很令人吃惊观点：

“我们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要涌现一批积极分子，我们对待‘造反派’，就要像对待政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一样，即使有错误，这样的错误也应该由我们来承担。”

在这样的方针指导下，尽管“批派性”的会开了很多，声势也很大，可是强调自我教育，不登报，也没有公开点名。赵紫阳指示：“对于搞派性干扰了‘学大寨’的干部，要进行批判，但不能单独作为派性来批，而是要他们在‘农业学大寨’中去立新功，改正错误。只要把‘农业学大寨’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派性、矛盾之类的事就会减少。”“重在搞清思想，处理上要慎重。对头头不是以他们的言论治罪，而是根据他们打砸抢烧、贪污盗窃等罪行。”

在重庆，赵紫阳曾用“四大名旦”来形容四川搞派性的情况，当时没有点名。到了1975年11月中旬，按照中央的决定，赵紫阳在一次会议上点了四川省革委副主任邓兴国、杨忠诚、四川省革委常委周家瑜、重庆市革委副主任黄廉四个人的名，说：“这次我们‘批派’的方针仍然是自我教育，不点名。但是这四个人在运动中做了不少坏事，从未作

过检查，省委发了通知给他们，要他们在一一个礼拜之内拿出检讨来。”

后来邓兴国、杨志诚、周家瑜三个人按省委要求，拿出了检讨，还分别找省委、重庆市委领导谈话。只有黄廉拒不检查。后来给江青写了信。

中央召集的这次“转弯子会议”于2月21日下午3时25分结束。中央首长退席时，江青走到大厅门口，看见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原重庆供电公司工人、重庆“反到底工总司”勤务组副组长汪友根，轻声对他讲：

“要给黄廉做工作，不晓得他能不能顾大局。”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保定地区武斗、混乱再起。至1976年，河北省委、省军区难以遏制，中央不得不再次动用早已脱离地方“三支两军”的38军。

1976年2月7日，河北省保定地区党委副书记杨连甲、杨志昌和常委吕毅要求召开常委会，持枪警戒，内外威逼，卡断联系。2月11日，他们控制的战斗队抢占地委大院，致使地委领导陈哲、杜森尧被迫离开机关。

1976年2月20至24日，保定市委召开各大口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共中央4号文件，布置“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23日，部分市委委员将市委主要负责人劫持到五一饭店，要强行解决市委的“翻案风问题”，压市委转弯子，没有结果。

第1382回：再召开，十二省“转弯子”会 找秘书，徐景贤上报材料

1976年2月12日，毛泽东阅吴桂贤2月1日关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问题的来信，信中说：“收到陕西咸阳市北杜公社两位知识青年给主席和党中央的信，他们反映了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安置、培养工作和招工中存在的问题。”

毛泽东批示：“印发政治局。知识青年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以解决。”

2月13日，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中山路仓库的汽车司机何庆华，在冰城哈尔滨发表了一篇《致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一封公开信》。信中说：“一小撮假马克思主义分子，利用窃取的重要岗位，把自己伪装成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打着红旗反红旗”，“名义上搞大辩论，实质上是大镇压，谁要有半点不同意见就被打成反革命”。

2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在批判旧世界中建设新世界》，狠批教育界的“右倾翻案风”。

2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军委关于检查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文件的报告。报告指出：

军委常委于2月6日开会，对去年7月军委扩大的会议文件作了检查。

一、一致认为，这次军委扩大会议，遵照毛主席，党中央批准的议程，讨论通过的《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是正确的，应当继续贯彻执行。

二、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两个讲话是有错误的。建议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

三、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深入发展，全军要积极参加这场伟大的斗争。为了保持部队的稳定，随时准备打仗，军队的运动要

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采取正面教育的方式进行。有的需要展开大辩论的单位,如国防科委,要经军委批准。

2月16日,姚文元在日记中写道:

“外国人都说:宣传工具在左派手中,是‘宣传毛的主张’‘继续革命’的,但搞‘经济工作的是求实派’,经济工作什么时候能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领导呢?”

1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批判“三项指示为纲”》,对邓小平进行不点名批判,说他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2月18日上午,重庆市解放碑的交电大楼墙上贴出了题为《我爱我的祖国》的大字报,署名是“祖国忠诚的儿子、重钢职工白智清”。大字报在重庆引发强烈反响,白天下雨,人们撑着雨伞看,夜里人们打着电筒传抄。有人在大字报上批道:“写得好,有胆量,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

白智清是重庆钢铁公司机修厂技术员。从1974年起,他就以“心赤客”的笔名,给李德生、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和江青写信,历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批判江青,被公安部列为“心赤客反革命案件”进行追查。

2月23日,福建省机械局干部刘宗利和他的妻子张梅英、父亲刘学旗在福州东街口邮电大楼门口的大理石廊柱前贴出一张署名“三名共产党员”的大字报:《“阿斗”的呼声》,写下了6点意见:

一、万分沉痛地哀悼周总理逝世,学习周总理高尚的革命品质,继承总理遗志,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

二、林贼虽死,阴魂不散,他们千方百计为林贼修正主义路线翻案,妄图推行没有林彪的林彪修正主义路线;

三、坚决粉碎当前社会上出现的一股分裂党中央,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反革命妖风;

四、邓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他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正确执行者,历史和人民会给他作出公正的结论;

五、廖志高同志主持省委工作以来,福建很有起色,大有希望,福建人民会给他做出正确的评价;

六、一小撮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派性的人,错

估形势，疯狂刮起右倾翻案妖风，必将受到人民的加倍惩罚。

许多工人、学生、战士在大字报上留言，表示赞同和支持。3月8日，王洪文下令追查。

2月中旬，北京市出现一份传单，说：“张、江、姚是林彪式的小舰队，是陈伯达式的政治骗子，他们欲把大批老同志置于死地而篡党夺权”。传单号召：“全国人民紧急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向叛徒、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之流进行坚决斗争”。这份传单的作者是中央广播事业局的一位共产党员，名叫窦守芳。2月24日，他被逮捕。

2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阶级斗争，促春耕生产》，将毛泽东批评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讲话公诸于世。

2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召开了12个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与2月初的5省会议一样，也称“转弯子”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传达了由毛远新整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这些指示，是毛泽东在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的多次谈话内容：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的法权。我们自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多人少。”

“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

“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毛泽东认为，“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

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毛泽东认为,“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

“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

关于对待老同志和造反派。毛泽东说,“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

关于当前运动的发展。毛泽东主张,“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在《指示》当中，毛泽东点名批评邓小平，认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代表资产阶级”。

但即便事情已发展到如此地步，毛泽东对邓小平仍留有余地，表示：对邓小平“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

“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在 12 省“转弯子”会上说：“毛主席说，错了的，中央负责。政治局认为，主要是邓小平同志负责。”“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

在“转弯子”会议之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旗帜亮了出来。华国锋取代了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会后，张春桥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叫到钓鱼台九号楼长谈。钓鱼台九号楼是张春桥的住所，朴素简单。他们谈了三个问题：一是痛骂邓小平，二是议论上海的人事安排，三是张春桥叮嘱上海方面今后要注意的几种倾向。谈话快结束的时候，张春桥似乎很不经意地对他们说：“我这里需要一个秘书，你们看看上海有没有合适的人……”

马天水哼哼了两声，朝徐景贤看看，轻声说：“老徐看，有什么合适的人吗？”

王秀珍是分管组织工作的书记，可是，给张春桥派秘书，要求高，条件严格，而且必须能写。王秀珍没有吭气。

徐景贤沉思了一下，一时也想不起比较合适的人。王洪文任党中央副主席后，曾向他要一名秘书，替他起草文件，撰写讲稿，翻阅资料等。王洪文指名要调市委写作组的肖木，他是铁路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曾经担任过《上海铁道报》的编辑、《支部生活》的编委，他不但会写理论文章，而且会写杂文、散文，报告文学和小说……有较深厚的理

论修养，为人比较谨慎，随和。像这样的人到张春桥身边工作倒是非常合适的，可是王洪文已经把他挖走了。此刻，再要找一个像肖木这样的人给张春桥当秘书，难了……

张春桥看他们几个都没有接口，便不再往下说了。这时，徐景贤说：“这件事让我回去和写作组朱永嘉他们商量下，提出几个名单来，整理成书面材料，送给您看看再定吧！”

张春桥表示同意。

回到上海，徐景贤和朱永嘉从市委写作组下属的文学组、哲学组、经济组、自然辩证法组……中间，物色了条件比较相当的人选，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理论修养和活动能力，能拿得起“笔杆子”，而且都比较年轻，没有家庭牵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他们从中定下3个人，朱永嘉特别向徐景贤推荐一名青年骨干，既会写文章，又会开汽车。他说：“当了秘书跟着春桥同志出去，万一有什么事，马上可以顶上去当汽车驾驶员！”

徐景贤要市委写作组把那3个人的档案材料做了简要的摘录，打印出来，然后徐景贤写了一封短信，附上摘录材料，通过市委机要交通员直送北京，请张春桥圈定选用其中何人，或者他认为全然不合适，就把材料退回以便再选。

信和摘录材料送去以后，许久没有回音。

第1383回：先念病，李素文主管财经 江青忙，招十二省区领导

1976年3月1日，在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召集财政、商业、外经等各部部长会议上，宣布：“经毛泽东批准的中央决定：在李先念副总理养病期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素文负责主管财贸各部委和外贸部的工作。”

3月2日，武汉市贴出“继承总理志，实现四个现代化”等大标语；即后又出现了《绝不对资产阶级野心家卑躬屈膝》的油印传单；同时，武汉锅炉厂召开有200多人参加的大会，公开点名批判江青、张春桥。

3月2日，江青在京西宾馆第9会议室，自己召集12省、区负责人开会，发表长篇讲话，说“邓小平是个谣言公司的总经理”，是“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和“大汉奸”。

她从1974年“风庆轮”问题讲起，说：“邓小平在外事问题上走得相当远了，但是由于主席对外事抓得很紧，所以有一些抓回来了。比方，他投投降三木，妥协，这个主席抓了，霸权问题不能妥协。这是个原则问题，妥协了苏修会高兴。关于台湾问题，邓小平拍布什的马屁，我就光看了外交部整的那个东西，其他的还不知道。我为什么敢在同志们面前讲他是个汉奸，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呢，有物为证。我全部带来了。”“我给同志们念一下，不印，我是请主席参阅。邓小平完全是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出口原料和外国资本家订长期合同，等等。他还说过，要把杭州、苏州、还有广州，还有许多地方开放给外国人游览，吃喝玩乐，抓外汇。”

“邓小平把咱们的原油，咱们的石油，连煤炭，棉布统统压价出售。这些都是去年冬天干的。如果给了第三世界缺油的国家，那还情有可原，他是卖给那些大资本主义国家呀。燃料我们自己缺呀。所以我说他是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中国有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就是邓小平。叫他汉奸，正确不正确？我们的主席还在保着他

啊,我说话是我个人的意见。”

“邓小平这种买办资产阶级破坏生产是历来的。他进口了好多外国设备,不晓得为什么都挤到今年上马。有的设备根本没有处理三废,现在毒害人啊。上海紧急呼吁。现在是救命呐。”“就是这个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邓小平,他对第三世界是一点兴趣也没有,就是对美国,西德,第二世界有兴趣。那简直是一副奴才相,在我们面前可凶了。我曾认为他是一个团结的因素。”

“我根本不知道有邓小平什么事,特别是我还挺迷信他,74年啊,可不知道噢,他一直对我都比较讲理的,通情达理的,我说他能团结人,他是骗了我,那时,他急了,暴跳起来了,骂,脸上的肉都直哆嗦。喊,我要调查。”

“自从邓小平到了政治局,政治局就成了一个摆设,懂吗?像个花瓶。他不给思考时间,文件事前不发,发了也来不及看,到会上去一大堆,根本来不及看,他就说,政治局通过了,就送主席,强加给主席,然后就利用他陪外宾能见主席,又说,这是主席的,来镇压政治局。发展到去年斗我,我讲话,他说我不听你的。我不听你的。”

她说:“邓小平这种事,恐怕很多同志不知道内幕。当然我知道的也不太多。不过,我是一个首当其冲的人物。他在去年4月底,不请示主席,擅自斗争一个政治局委员,4月底一直斗我到6月。

邓小平是个谣言公司的总经理,他的谣言散布得很多,据说去年查谣言,有的省查,有的省根本不查,还扩散,一查就查到北京,就查不下去。

最近,我们才开了窍门,人家揭发了,一个就是他那个政治研究室。胡乔木,这是一个坏人。这个政治研究室不仅凌驾在国务院之上,而且邓小平他们还要了一个花招,把原来的‘毛选委员会’干掉了。他把胡乔木这样的人也凌驾在政治局之上了。主席不同意的,不赞成的。这可是一个相当大的谣言店。”

“现在看来,全国的谣言都是邓小平弄的。说我一切职务撤销,下放劳动啊,说我已经自杀了。”

江青接着谈到了文艺问题,她说:“连《创业》也是他授意的,作者那封信确确实实是邓小平转的,主席的批示无比的英明伟大,主席并

没有看这个电影。《创业》这个题材是我推荐的，拍得粗糙一点，当然也有一些问题。主席的指示无比的英明就在于保护了我们一系列的电影、戏剧，很多东西，不然都是毒草。

人家揭发邓小平看电影《春苗》，看了几本，就说，大毒草。他们就是重视那个《海霞》，而且下命令让中南海的放映员去抄文化部主要负责同志的家，而且下命令让所有政治局委员都要去看《海霞》。”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没有这样的情形，命令整个政治局看《海霞》，不只是《海霞》。”

“还有体委，整庄则栋整得厉害，这都是在后头的，整我在前头。”

江青问：“湖南的那个张平化来了没有？”

张平化起身说：“来了。”

江青：“你对《园丁之歌》那样积极，造了许多谣，那个信说是你支持写的，搞的？”

张平化答：“是。”

江青：“你能够造主席那么多谣，而且你安排了给主席看，是不妥当的。你还说初澜就让他烂了吧。你让一个服务员造那样多的谣。我已经核实了，我对这个戏两点意见，有意见我没说，就是对内容有意见。那个戏是我和春桥、会泳三个人审查的。它叫《园丁之歌》。我觉得园丁首先应该是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工人、贫下中农，怎么会成了知识分子呢？

意见最多、最深刻的是春桥同志。

你是搞反攻倒算，但是我们当时说也不要批什么，就压起来了。后来是你们湖南自己批的。那只好上演，批嘛。

初澜的文章我没有看。初澜是什么人，我也不知道。文章没看，是因为那个字太小，不看。……毒草锄掉还可以作肥料。《园丁之歌》可以上映，不是不可以，但要允许马克思主义的评论，来评它。”

张平化：“现在没有见谁有这个想法。”

江青：“你是完全搞翻案！”

张平化：“不是。”

江青：“你是好得不得了啊！我看你那封信了。那只是有缺点吗？那应当说是有错误。你就是独独没有登评《海瑞罢官》文章的。

我今天提出来，就是你太积极了。告状告到主席那里。叫主席看，主席从来在这一类事上是超脱的。你叫服务员来探听，找了那么一大堆，然后说，这个戏好得不得了。你在那里搞翻案，你没有执行邓小平那一套？现在我都有份。”

“你那个湖南就不受影响？你看你气鼓鼓的，我平心地讲，你有问题，我在这儿跟你讲理哩。我就不信，你那个文件上没有啊？你说过没有？军委扩大会不传达怎么行呢？中央的文件不传达怎么行呢？一个错误路线来了，坑了多少同志啊，坑人呐，害人呐。你不值得委屈，不要气鼓鼓的。这属于执行问题。有的执行得坚决，有的执行得不那么坚决。”“所以这个事情啊，认识有差别。我和同志们有差别，我认识可能早一点，抵制他也早一点斗争早一些。希望犯错误的同志尽快回到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能讲话的要讲话。我就不相信有人就死心塌地地跟邓小平走。林彪都没有带走一兵一将嘛，是不是？我不相信，所以要帮助。我今天看了，不能镇压群众。有些省有些问题。”

她对张平化说：“你自己要作深刻检查，你如果镇压了，你要作自我批评。来的同志，能说话的就要说话。我很不希望像廖志高那样，一下飞机就给抓起来。在座的同志，我不知道是不是每省都有，这是个大局，要回去先给造反派学习主席的重要指示。你们现在自己在这儿学习了，回去找造反派先学。我忧虑这个。当然大多数省是可以学下去的，个别同志要有精神准备，回去就让人家给捉起来。廖志高就被捉起来，我做了工作，陈佳忠做工作，群众听他的呀。中央候补委员陈佳忠同志做了工作，群众说三条，你廖志高都没答复，人已经放了。能说话的同志的是不是还有。你看人家清华。现在据说整个北京市都点名了，不上街，很听话的。去了很受教育。”

江青接着讲到了她和邓小平在政治局内的斗争，说自己是“过了河的卒子”，要吃掉邓小平这个“反革命老帅”：

“4月开始到主席那里告状，所谓请教，那个办法是告状。主席就批了一个文件出来。他就利用这个文件，说是学习主席的指示，不报告主席，就斗了我。

5月3日，主席召集政治局会议，会上对双方都批了，内容暂时在这儿不说。但是他又是根本不讲主席批他们的，把对我们的夸大了，

特别是对我。”

江青说：“主席在5月3日批他们，建议要看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说列宁说，那是一群人啊！都是大知识分子，大反革命，要坑人。这个邓小平绝口不提。说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要谨慎，这个他也不提。主席说不要搞广东帮、四川帮、上海帮，结果他只提上海帮。说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好。还有很多了。这些都是批他们的。

我们的主席对文化大革命都说了三七开嘛，我上一次讲了，就不重复了。我多想三，受过冲击的同志，你们多想那个七。

三也要一分为二，主席说了。至于那个三，我以前想，那根本不是我的错误。打倒一切，怀疑一切，那是陶铸的，还有国务院也有一个文件，说要层层烧透。当时王、关、戚他们想拿出去，我写了一个报告给主席。主席说这个不能拿出去，要保护总理、副总理。全面内战我根本没份。……虽然这两个错误不是我的，但是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间发生的，我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呵！这就要总结经验教训。

邓小平不仅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他是所有的案都要翻。完全是个反革命两面派，他暴露得比林彪还快。”

“同志们，包括一些跟他多年的老同志，我就不相信同志们会跟他走，除了个别的坚决要跟他的。如果我说了这些，广大的干部、党员、广大的指战员、广大的人民群众，能答应邓小平吗？在座的同志能够答应邓小平这样欺负咱们的主席吗？我请问，在座的同志，包括我在内，都受主席的保护呵！”

邓小平这样欺负主席，这样残忍，我不能不说。”这时，江青抽泣、哽咽地说：“同志们哪，我们都没有责任保护主席吗？我是觉得应该想一想呵！”

我今天说的不仅是这个，他是个大汉奸，现在已经走得远了。他要是上台，像我这样的人，那是千百万人头落地。

我公开在政治局讲，我已经有了精神准备，杀头、坐牢，我不过只有一个头吧，从入党的时候，就作了精神准备。不过我这头也要保护自己一点，不能随便叫他们杀头、搞死。向来我身上没有一点儿钱，现在带那么几十块。”说着，江青就在她的包里找钱，没有找到，说：“噢，这

次又没带。弄不好，我就走。”

“据我知道的，在很早主席就跟我讲过，不要喊打倒刘邓路线了，要有区别，要把邓小平跟刘少奇区别开。我听招呼了，就不跟着喊了，因为大家都喊刘邓路线嘛。我们都一直是在顶着干呐，受伤都不下火线，他保护得好好的，养的那么健健康康的。我是确实对他满腔希望，因为我看到主席一番苦心，怎么样保护他，然后怎么调他回来，用什么方法来恢复他的名誉，来提高他的威信，这我都知道，都看在眼里。他回来，开始对我很好，两面派啊，我倒觉得邓小平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呐，能够谈心的人，我可找到了这么一个人，觉得他可以。那时总理病重，我原来比较忧虑总理这个位置，后来就不太忧虑了，我甚至觉得他可是一个团结安定的因素，这个话对在座的那个同志讲过。他才不是安定团结的因素呢，才是一个破坏、分裂的大阴谋家呢。”

“我对邓小平有个认识过程。我想在座的同志可能比我熟悉他。我实在是不熟悉他。在座的有没有他的部下，或者是老的，大概也不熟悉，因为他这个人啊，可是不接触人，不接触群众。他到大寨去，连一个中午都不住，到老百姓家里都不去。

据这次揭发，他家里的常客是什么人呢？李井泉、胡乔木、胡耀邦，还有王海容、唐闻生。还有什么人，我搞不清了。那都是无话不说，交待任务的，别人不能去。”

“现在的资产阶级不在于荣毅仁，那个谁都知道，而在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官，在于咱们。

我资产阶级法权挺多的，我虽然老是自己限制，还有一些，有一些还必要，不然我就不能工作了。资产阶级糖衣炮弹那可厉害了，我曾经形象地说过，我是且战且走，打中了自己，擦干了血迹，包起来再上战场。要提高警惕，你看我们都住着楼房，我住宾馆，我没有住那个最好的，是因为怕爬楼梯，我住底下工作人员的房屋，我有汽车、警卫员、秘书、护士。我必须要有护士，因为我每天吃毒药——安眠药。我吃的量特别大，自己不能掌握。我没有服务员，我是女同志，不需要服务员。护士、战士、还有司机，在座的恐怕不少吧。所以咱们属于大官。

我有这么两句话：‘巡抚出朝，地动山摇。’确实要小心呵！确实有这个问题。像我这样的人，不要去要，人家就送上门来了。这里有不

少同志有我这种情况。我不需要走后门，别人就替我安排了。礼物给我送上门来，拒绝了。我到哪儿去，吃饭都是别人陪着吃，我后来想了个办法，每人出一份，会餐。革命化。”

“别人造谣我是武则天。我说，在阶级问题上，我比她先进，但在才干上，我不及她。有人又说我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她是执行法家路线的。”

“他们就是用下流的东西诽谤武则天，诽谤吕后，诽谤我。目的是诽谤主席嘛。还有比这个还厉害的，我就不能说了。这个事情涉及到主席，你们也不要去做扩散。我建议你们也看看这段历史。……像我这样的人，因为文化水平是不高的，我用工具书就可以看懂。在座的大学生也有了，有没有？我反正只是个高小学生。蹲图书馆的时间多，大概有的同志比我们还低一点儿。就这样吧，我占用同志们时间很多，我要讲错了，同志们批评我。”

3月3日，中共中央连续发出4号、5号、6号文件，下发毛远新整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和华国锋在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领导会议上讲话。当天，《人民日报》发表《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进一步不点名的批判邓小平。文件中毛泽东的指示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以他亲手写的文字为根据，毛远新只是加了一些“因此”、“所以”之类的连接词而已，并在整理好后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只改了一个字，即把邓小平说的“黄猫黑猫”中的“黄猫”改成“白猫”。

毛运新为什么写成“黄猫”呢？因为他查了邓小平的原话，说的是“黄猫”。

第 1384 回：看江城，再掀反击翻案风 追万里，《文汇报》“三五事件”

1976 年春节，武汉的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李想玉、潘宏斌、田学群、曹承义、彭勋、吴炎金和市档案处干部、市机关“红司”二号勤务员郑峰等人在“交通联司”一号勤务员傅廉家聚会，傅廉夫妇用很丰盛的酒席招待大家。胡厚民、曹承义、潘宏斌、郑峰和吴炎金比较能喝，大家又很久难得聚在一起，所以非常高兴，结果郑峰当场喝得大醉，吐了一地，连胆汁都吐出来了。

大家乘着酒兴，边吃边谈，说得最多的是胡厚民和彭勋，他们都表示，决心紧跟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坚决反击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胡厚民提出要请“工总”核心组成员、时任武汉锅炉厂革委会副主任、武汉市革委会常委沈复礼出山，曹承义自告奋勇前去联系。另外还有“联司”的一号头头顾建棠，也要前去联系一下。

胡厚民提出：“这次批邓，要请两位造反派中央委员举旗子。”

这两位，一位是“工总”常委、省革委会常委、汉阳轧钢厂工人夏邦银，另一个是“工造总司”成员、武汉国棉三厂劳动模范谢望春。夏邦银是中共中央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谢望春是中共中央第九届、第十届候补中央委员。

以后，他们又在“工造总司”头头、省革委会常委潘宏斌家多次开会，决定由夏邦银、谢望春、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胡厚民、顾建棠 7 人组成领导班子。

除了领导小组，他们还搞了一个参谋班子，参谋长是胡厚民，成员有顾建棠、沈复礼、聂年生、彭勋、曹承义。聂年生参加一两次会后自动退出了。这个参谋班子又戏称为摇鹅毛扇的鹅头鹅毛班，胡厚民被称为鹅头，其余都是鹅毛，大家常以此互相取笑。

就在 2 月，以中央委员夏邦银、候补中央委员谢望春领头，省市革委会中的造反派头头共 22 人署名的《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致敬信》在

汉口水塔公开张贴出来了。由在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带头写大字报上街，在武汉文革史上还是第一次，在武汉三镇引起轰动，大字报很快被转抄、翻印。这份大字报是由参谋班子执笔写成的。

第一封公开信发表后，又张贴了第二封公开信。

中央4号文件传达后，里面有毛泽东的这样一句话：“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胡厚民等人经过研究，提出：为接受反复旧运动的教训，这次不组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是充分运用宪法保障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武器，以省委第一书记赵辛初1975年6月4日在省委扩大会上的讲话为突破口，在“滚”字上做文章，要把通过“两清一批”从各级革委会“滚”出去的造反派代表再“请”回来。办法是：“上促下攻，内紧外松，立足基层，统一行动。”这个口号是顾建棠提出来的，原来是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夏邦银到中央开会听到的北京和上海经验，然后他打电话告诉朱鸿霞和胡厚民的。

彭勋拟定十几条顺口溜作为大标语，由曹承义派人刷遍武汉三镇。大标语有：“湖北有个赵辛初，扩大会上讲话，手舞邓记尚方剑，六月四日大砍杀”，“六四讲话大毒草，滚出去要请回来”，“两清一批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等。

随后，彭勋第一个在武汉市建工局礼堂作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报告。

彭勋，共产党员、湖北大学青年教师、“新湖大”头头，有很好的口才。一次在同原湖北省省长张体学谈了五个小时的话以后，张体学很欣赏他的口才，说：“你真是个油嘴啊！搞得前途无量，搞不好会成第二个梅白。”谈话时有其他武汉“新”派头头在座，“彭油嘴”的绰号很快传开了。文革中，江城父老不一定知道彭勋的大名，但一定晓得“彭油嘴”。

两封公开信和彭勋的打油诗标语以及随后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彭勋、曹承义等人在各系统和单位的演讲，把武汉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火点起来了，基层的造反派群众也迅速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热潮。

3月5日是周恩来的诞辰，也是中国的学雷锋纪念日。新华社在

这天凌晨播发了沈阳部队指战员学习雷锋的电讯，内中提到了周恩来对雷锋的题词：“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党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全国各报差不多都在3月5日全文转载了这一电讯。然而，3月5日的《文汇报》与众不同：第一版醒目地刊登文化部写作组以“初澜”笔名所写的文章。新华社那条电讯，《文汇报》安排到第四版，而且，删去了电讯中周恩来的那四句题词。

《文汇报》要闻部夜班编辑组是在3月4日晚上24时许收到新华社电讯稿《沈阳部队指战员坚持向雷锋同志学习》和通讯《雷锋精神永活在我们中间》。据说当时四个版面稿件已安排就绪，有的已出大样。要闻部夜班值班负责人经请示领导同意：将上述两份电讯稿交给国际版（第四版）编辑刊登，如果稿件太长，可以删掉一些。

编辑随即把《沈阳部队指战员坚持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消息作了删节，并把经删节的小样和第四版版样一并送交值班负责人审定，值班负责人说不看了，时间很晚了，赶快去拼版。

《沈阳部队指战员坚持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消息共删去四处，其中一处为“不少部队还培训了雷锋故事讲解员，结合各项政治和部队工作，向干部和战士介绍雷锋同志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引导大家走雷锋成长的道路，作雷锋式的共产主义新人”。这段文字中的“雷锋同志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是周恩来给雷锋的题词，据后来审查此事时编辑交待说，他在匆忙中未及检核，原文未标明出处，又未加引号，他“不知是周总理的题词”。

《文汇报》这样做，在当时的形势下，其影响可想而知。一时间，《文汇报》社的电话铃声响个不停，读者纷纷质询他们：“为什么删去周总理的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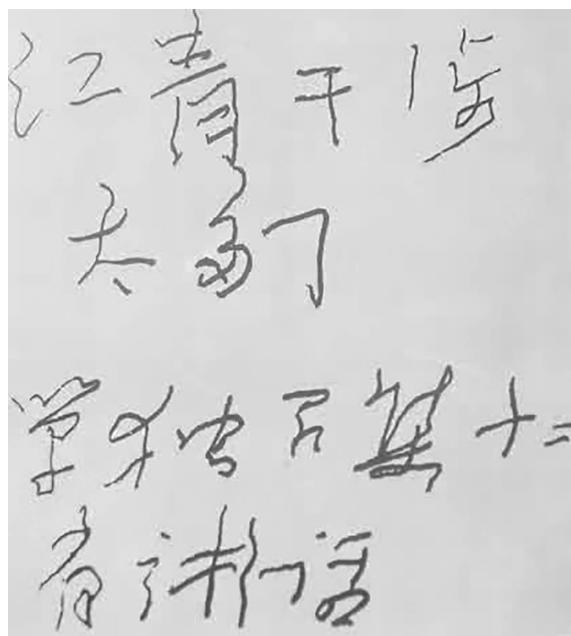
3月6日，南京市新街口，有人将《文汇报》第四版那篇删去周恩来题词的新华社电讯，用红笔圈出来，贴在墙上。南京新街口是南京最繁华的中心路段，上下班高峰人流很多。这张报纸引起了瞩目。消息很快就在南京人中间口口相传。周恩来虽然从小就去了天津，但是

他的老家淮安仍然把他当成自己的人，一个值得骄傲的老乡。从周恩来逝世到追悼会召开的7天内，南京共有2500多个单位的32万多群众前往周恩来在南京的故居——梅园新村凭吊。正值严冬，寒风呼啸，天暗云低，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在梅园新村纪念馆墙外排起了长队，追悼队伍从梅园新村街道向长江路、太平北路、北京东路、鼓楼广场延伸，长达二、三公里。此后，梅园新村纪念馆接到闭馆通知，被迫停止开放，许多群众公开责问：“为什么不让我们悼念总理？”

而这次，南京人愤怒了。

3月7日，杭州市贴出《马天水想干什么？》的大字报，署名“冯火”。作者是《浙江日报》的记者：李力和潘旭。

3月10日，毛泽东得知江青3月2日的讲话后批示：“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十二省讲话。”



他让转告华国锋：江青的这个讲话是不对的。对江青要求印发

“风庆轮”问题材料一事，毛泽东批示：“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

后来，张春桥问姚文元：“知道不知道江青、王洪文到省委书记会上去了？”

姚文元说：“不知道。”

张春桥说：“他们还会讲出什么好话，无非惹些麻烦，让我们也跟着受牵连。”

3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姚文元审改的社论《翻案不得人心》，不点名的指责邓小平就是“煽起右倾翻案风的那个人”。文章还直接引用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批判：“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这天，《诗刊》1976年二、三月号刊登了朱德委员长的两首词：

喜读主席词二首

毛主席76年词二首发表，聆，读再三，欣然不寐。吟咏有感，草成二首。诗刊索句，因以付之。

一

昔日上井岗，革命得摇篮。
千流归大海，奔腾涌巨澜。
罗霄大旗举，红透半边天。
路线成众志，工农有政权。
无产者必胜，领袖砥柱坚。
几度危难急，赖之转为安。
布下星星火，南北东西燃。
而今势更望，能不忆当年。
风雷兴未艾，快马再加鞭。
全党团结紧，险峰敢登攀。

二

鲲鹏九万里，直上云海颠。
伟哉大宇宙，壮志充其间。

可笑蓬间雀，称霸欲吞天。
倏尔控于地，仙阁化为烟。
文革号炮响，帝修心胆寒。
春风化红雨，新枝壮且繁。
老中青一体，路线共瞻前。
阶级斗争纲，纲举目豁然。
掌握辩证法，统一宇宙观。
真心搞马列，地覆又翻天。

3月10日，贵州市中心紫林庵贴出一份3万多字、长达80多张纸的大字报，题为《关于目前形势和新的历史任务的几点看法》。文中提出：“把主要精力放到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方面来，使我国经济提高到世界先进水平，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乃是我在目前时期的首要问题和中心任务。”这篇大字报反映强烈，很多人表示“支持这张革命大字报”。

大字报的作者是几家工厂的普通工人：李洪刚、郭成望、王大卫、陈明云、叶忠源、黄维鸣、卢炎。这7名青工，还将大字报油印80余份，自费前往长沙、郑州等地散发。

张春桥接到上海《学习与批判》送给他的这份大字报摘要后，立即批示：“看来修正主义已后继有人”。

公安部下令，要贵州公安部门对这份大字报立案追查。

3月11日，福建三明市农机公司赵大中在三明市贴出了《论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张春桥》的大字报，文中说：“我把他的罪行公诸于众，可以唤起人们的注意，张春桥是个坏人！万一他的阴谋得逞，也要叫他的日子不好过。这样，我杀头也甘愿。”

几天后，赵大中再次写出了更为激烈的续篇……

2月下旬，中央关于解决郑州和兰州铁路局问题文件下达后，点燃了铁路部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之火。铁路下属单位一些人纷纷从外地来京上访，冲击铁道部机关，在铁道部院内墙壁上刷着“打倒万里”，“揪出走资派、黑干将万里”，“揪出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万里”，“万里镇压造反派，罪该万死”，“万里不倒，火车不跑”

等大标语。同时，铁道部大院内也贴满了揭批万里和工作组的大字报。

这些上访人员，大部分是1975年铁路整顿期间，受过处分或批判的干部、工人。有男有女，有的还带着孩子。他们点名要找万里，找铁道部副部长、机关党委书记刘建章和有关工作组的领导。万里和刘建章分别用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接见了太原、临汾分局和兰州第一设计院、郑州局和洛阳机车厂、昆明铁路局等单位的上访人员，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和批评，动员他们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但收效不大，有的刚回去又来了。

上访人员越来越多，越闹越凶。他们别的领导不找，专找万里、刘建章，抓住了就不放，以致部领导小组会议无法在部里进行，不得不到二七剧场去开。为了应付这种局面，刘建章副部长不能参加部领导小组会议，专门接待上访人员。

由于一些地方领导的支持，来京上访人员越来越多。高峰日达400多人，铁道部招待所住不下，有些人就住在外边。兰州铁路局所属一些单位的上访人员闹得最凶，他们几十人强占了万里的办公室，在那里搞“进驻”，吃住在那里。办公室内有直通全路各地的长途电话，于是万里、刘建章的办公室，就成为他们的“联络站”了。3月6日中午，万里部长办公室一屋子男男女女上访人员，还有孩子。地上、沙发上、床上、办公桌上、椅子上，以及窗台上，到处躺满了人，到处都刻着“打倒万里”……

3月11日，昆明铁路局40多名上访人员，要求万里到铁道部招待所会议楼回答问题。万里的秘书于廉和徐守和一看势头不妙，对新华社记者张广友说：“昆明局这些人今天找万里同志可能要闹事，你们去看看吧。你们一去即使不说话，对他们来说也是个威慑和制约，必要时你以记者身份说几句话，解解围，可能会起点儿作用。”于是，张广友和新华社另一位记者黄奉初随同万里到了铁道部会议楼的一间简易平房里，屋内大约四、五十人，一个个满脸怒气。

上访人员中一个人开始提问题：

“去年你去昆明局是否刮了‘右倾翻案风’？”

“是根据谁的指示干的”

.....

你几句，他几句，情绪越来越激烈，气势越来越凶，张广友一看不妙，赶紧站起来说：“有话慢慢说，一个一个地说，你们这么乱，我们连记都记不下来了……”这几句话还真灵，大家都回到了原座位，一个接着一个说。

已经是下午 13 时 30 分了，张广友站起来说：“现在已经是一点多了，该吃饭了。”

大家不干，说：“我们还没讲完呢。”

张广友说：“你总得让人家吃饭呀，而且你们也得吃饭呀，”他指着手表说：“你们看看都啥时候了？有什么意见以后再讲嘛！”他边拉着万里边往外走，边回答说：“找不到他，你们找我！”

两位记者在万里家里吃了午饭。饭后，他们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边喝茶，万里边向他们介绍了铁道部的一些情况和他的一些看法。

万里说：“去年铁路整顿，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成效是大家都看得见的，上上下下一致叫好。至于是否有缺点、错误呢？局部地方是不可避免的，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我担心的不是我个人如何，我担心的是运输生产要受影响。现在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邓小平的。邓小平不倒则罢，邓小平倒了，你们保我也没用。我对这些是很不理解的，但客观事实的确如此。前些天中央在解决郑州和兰州铁路局的文件中，为什么非要点黎光和苏华的名字，而不让点我的名字。我顶了一个多星期，最终还是中央决定了，我只好服从。”

在谈到大批上访人员问题时，万里认为：这个问题不是一般复杂，而是很复杂。去年我们铁路在全面整顿中带了头，批了派性，调整了一些单位的领导班子。这些人来闹，主要是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之机为自己翻案。

第 1385 回：小学生，抬花圈到天安门 三二五，《文汇报》再遭质疑

再说重庆的白智清在 1976 年 2 月 18 日的大字报上直书自己的名字后，没有受到来自任何方面的威胁。于是他又把第二张大字报写好，于 3 月 3 日深夜登上开往成都的列车，于 3 月 4 日早上 8 时许，在成都最繁华的市中心盐市口，把那份长达 6 千多字的大字报一张接着一张的贴出来。大字报的标题是：《试问，到底是哪家主义？——评张春桥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认为张春桥不是马列主义者，而是“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给国家、给革命、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修正主义”。他批判张春桥在《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中所提到的“共产主义供给制”，认为 1958 年爆发的大饥荒，正是因为农村实行了“包吃、包穿、包住、包教、包治病”等等这样的“供给制”造成的。

这张大字报轰动蓉城，聚集起来的几万群众堵塞了交通要道盐市口。人太多了，后面的看不见，有人爬上道旁的法国梧桐，骑在树丫上高声朗读。闻讯赶来看大字报的人越来越多，晚上人们打开了手电筒，一直看到 3 月 5 日凌晨。大字报的空白处，写满了批语。

3 月 5 日上午，成都硅酸盐厂的工人赶到盐市口，挤进人群去撕毁大字报，与围观的群众发生争斗，愤怒的群众把他们打得头破血流，然后一哄而散。这就是轰动成都“三五事件”。但是赵紫阳没有任何的表示。

3 月 10 日，几百人冲击省委和成都市委机关，进驻省委大院三天两夜，提出“打倒二赵（赵紫阳、赵苍璧）一许（许梦侠）”的口号，要求揪出四川的“还乡团团长”。

3 月 13 日，四川省公安厅下达了一份“由公安机关内部掌握，请勿张贴”的通缉令，称白智清张贴大字报“是一个重大的反革命事件”。

3 月 13 日，四川部分群众挟持省委书记段君毅和许梦侠到北京告状，准备向中央递交揭露四川省委“抵制批邓”和“包庇反革命分子白

智清”的材料,要求改组四川省委的领导班子。国务院办公厅秘书长罗青长出来接待,批评他们挟持省委书记上访的行为是错误的,要他们放人。

3月19日,北京朝阳区牛坊小学的师生来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为周恩来敬献了悼念周恩来的第一个花圈。从这天起,北京人自发汇集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献上花圈和花篮,把一朵朵白纸花扎在广场四周的松枝上。接着,无数的花圈、挽联相继出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天安门广场逐渐成为花圈的海洋。花圈在无言地倾诉,花圈上的挽联也在默默地交流着某种信息。走进这肃穆的海洋,你随时都可以读到感人至深的诗句:

“敬爱的总理,您回来吧,我们日夜想念您!”

“四个现代化刚刚着手,您怎么能离开人间?回来吧,回来吧!回来还去国务院。在那里把好人扶起,把坏人撤换!”

“一生奋斗,为中华新颜;灰撒江河,换大地常春。”

“九州埋忠骨,大地生辉,总理精神永驻;八亿仰英灵,民心承露,斯人浩气长存。”

“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日夜思念您。”

“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总理和人民同甘苦,人民和总理心连心。”

“天地一声雷,地倾绝其维。顿时九州寂,无语皆泪水。相告不成声,欲言泪复垂。听时不敢信,信时心已碎!”



3月20日,广东顺德大良轧钢厂工人杨振汉写信给毛泽东,批判张春桥。

杭州市“冯火”继3月7日贴出《马天水想干什么?》的大字报后,3月21日又贴出《马天水在干什么?》的大字报。

3月24日,北京市公安局指令天安门派出所“把送花圈的单位、人数、送了多少花圈等汇总上报”。

当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各地禁止来京上访的通知》。《通知》指出:“最近,浙江有几批学生,强行登上火车,要求来京上访和到清华、北大看大字报。经过阻劝,大部已经回去了。中央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不符合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影响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中央要求各地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的规定,对强行登车要求来京的人员,应做好思想工作,坚决劝阻。告诉他们,整个运动要根据毛主席指示,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在本地区、本单位搞好教育革命大辩论,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3月24日,南京江苏新医学院73级中医系的100多名师生要到雨花台去祭奠,江苏淮阴学生潘朝曦在祭奠条幅上写了:“革命先烈、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落款为:江苏新医学院中医系七三年级全体同学。

这个花圈在被江苏新医学院中医系七三、七四级200多名工农兵学员和部分教职工抬着前往雨花台的路上,引起了人们的围观和议论,很多人大声叫好,并且尾随花圈,形成人流。

不料,到了雨花台,他们的花圈摆放好后,有一个挎着照相机,身穿工作服的30岁左右的男子过来,把写有“革命先烈、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的缎带扯掉了。这一下子,惹恼了中医系的同学,他们把这个人围住,问他为什么要扯下他们的缎带。该男子说,他刚从上海回来,听说上级有指示,不准悼念周总理。听他这么一说,学生们一下子就火了,把他揪起来就打。后来,班干部黄成惠、何文彬等人怕打出人

命,就让大家先把他抓到一个房间里审问。这件事在雨花台闹得沸沸扬扬,双方争执不下。

下午 17 时多,有同学跑回学校,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先返回学校的潘朝曦。他一听就火了:“你不让我们悼念,我们非要悼念!”他对沈桂武等几个同学说:“走,我们上街刷标语去!”说完,自己就提着墨水桶,夹着白纸,带上大排笔,其他同学拎着几桶糨糊,一起来到南京市最繁华的新街口。他们在人民银行的围墙下,用两张白纸拼贴到一起,形成一个巨大的白色方块,然后,潘朝曦用大排笔写下:

“誓死捍卫周总理!强烈要求省市委严肃处理雨花台三二四政治事件!”

这 28 个大字,每个都有一人多高,非常醒目。落款是:“江苏新医学院”。

当时正值下班高峰,新街口人如潮涌。见到了这条标语,大家都围观上来,议论纷纷。很多人问发生了什么事情?雨花台政治事件是什么意思?潘朝曦和他的同学们一遍又一遍地大声解释,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引起了严重的交通堵塞。

晚上 19 时多,当潘朝曦他们筋疲力尽地回到学校,发现整座南京城就像一堆干柴一样被点燃了。学校值班室的电话一夜到天亮响个不停,南京各个大学和事业单位纷纷打电话来江苏新医学院询问,并表示坚决支持……

江苏省委书记彭冲于第二天,3 月 25 日凌晨 5 时多,驱车赶赴江苏新医学院,让校领导立即召集中医系七三年级学生和干部开会。忙了一天正在酣睡的潘朝曦等同学,被系党支部书记朱林森和年级辅导员杨慧玉等紧急叫醒。他们对彭冲的到来即兴奋又紧张,立即商量对策,决定让一部分同学去开会,拖延彭冲;然后,让班级的“秀才”杜文东把事情经过写成文章,潘朝曦和沈桂武分头抄写成两份大字报,派同学火速张贴到南京新街口中央商场对面和鼓楼广场主席台附近。

当彭冲在江苏新医学院侃侃而谈,试图稳住学生时,这两份题为“三二四雨花台政治事件真相”的大字报已经贴出去了。

而这一天,3 月 25 日,上海再次发生轰动全国的《文汇报》“三二五事件”。起因是这天《文汇报》头版刊登的一篇标题是《走资派还在

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报道中，有这样一句话：

“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
这句话再次引起了读者的震怒。

“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当时对邓小平的“专用代词”，大家一看就明白。但是，那个把邓小平“扶上台”的“走资派”又是谁呢？能让邓小平上台的只有毛泽东，毛泽东肯定不是“走资派”。毛泽东之下就是周恩来了，这不是在说周恩来是“党内那个走资派”吗！

“《文汇报》骂周总理是‘党内走资派’！”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短短几天内，《文汇报》就接到抗议信件 420 多封，抗议电话 1000 多次。

“《文汇报》如此狗胆包天，后台是张春桥！”本来，愤怒的汽油早已撒遍中国大地，《文汇报》“三·五”、“三·二五”事件的火花，再次点燃反张春桥的熊熊烈火。

《人民日报》3月10日社论《翻案不得人心》发表后，上海市仪表局党委中心学习组组织学习，《文汇报》记者就请仪表局办公室通讯员写了关于这次学习的报道，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局党委副书记戴梦鳌说：“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他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迫不及待地刮起右倾翻案风……”

本来，在上海市仪表局党委中心小组发言时，戴梦鳌是指名道姓说“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是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的，但是因为当时中央还不允许公开点邓小平的名，所以见报时，删去了“邓小平”三字。

报道接着在批“举逸民”时又说：“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据后来相关人员说：前者“党内那个走资派”是指邓小平，是前文戴梦鳌那句话的省略用句，后边那个“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指当时教育部长周荣鑫等老干部。

但是，很多群众对于周恩来逝世后的一些举措已经非常不满。而《文汇报》3月5日在报道中删去周恩来题词事件发生不久，3月25日又出现“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的词句时，大家当然认为这是再次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上海《文汇报》“325事件”不啻于对南京“324事件”火上浇油。3月25日下午，南京大学50多名工农兵学员抬着花圈来到梅园新村纪念馆，要求进馆内悼念周恩来。纪念馆未接到开放通知，没有开门，他们就翻墙入内开了大门，在馆内举行了悼念仪式。

此时，南京群众的情绪已经不可遏制了，几乎每个人都准备在清明节把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再推进一步。南京大学数学系团总支书记李西宁准备在4月5日清明节那天，以数学系团总支的名义搞一个大动作。但是3月26日晚上，他们系里一个叫陈海潮的学生跑来告诉他：“中央已经有文件下来了，说反对封建迷信，不准大家在清明节前后搞悼念周总理的活动。”

李西宁听到这个消息后，当即决定抢在中央文件公开传达之前采取行动。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跑到学校办公室去借周恩来的遗像。学校办公室出来接待他的是当年南京大学“八大左派”之一的吴老师，一听是数学系团总支要搞活动悼念周恩来，就把周恩来的遗像借给他们。

随后，李西宁又去向校党委汇报，校党委模棱两可，并没有阻止他们。于是，李西宁又找到数学系的党总支副书记刘老师，他也很支持，并说：“你们布置好了以后通知我们一下，我们让系里面的老师们一起参加。”

3月27日晚上，李西宁召集系团总支扩大会议，准备第二天举行悼念周恩来的活动。

3月26日，湖北武汉锅炉厂200人集会，指名批判江青和张春桥。

也是在3月26日这天，北京政治局开会，听取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两个学校汇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情况，面对面批判邓小平。会议由华国锋主持。

这次会议的起因是3月中旬，江青对毛远新说：“两校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政治局的会却开得冷冷清清。应该请他们到政治局会上来介绍一下运动情况，可以面对面地批判邓小平。”

过了几天，在一次政治局会上，江青又提出：“清华、北大是主席亲自抓的点，主席要中央机关、各省来参加打招呼会的人都去两校参观

学习,他们反映效果比较好。政治局的同志都没去过,建议请两校的同志到政治局来。”

会后,毛远新把江青的意见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同意。

3月24日深夜,迟群和谢静宜在清华大学校部大楼党委会议室召集部分党委成员和“梁效”写作组的骨干分子张凤瑞、胡健、荣泳霖、夏镇英和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吴敏生开会。在会上,谢静宜首先传达了毛远新的指示,大意是:中央要听我们汇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情况,要选几个人到政治局去面对面批判邓小平,要给政治局透点新鲜空气。

3月25日上午,迟群、谢静宜又召集他们几个人继续商量,最后确定由清华党委副书记周家憲在政治局会上主讲,其他人插话,并规定了每人插话的内容。迟群说:“中央要我们去汇报,就是要同邓小平一类修正主义大官们作斗争。”“谁也不要怯阵,发言既要有分量,又要有关质量,要讲出水平来。”迟群还授意“汇报的内容要以对外接待提纲为基础,把接待介绍的第三人称‘他’,一律改为‘你’,‘你是一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让你们一伙人死了心吧!’……”他还讲:“汇报时要考虑到还有一层人,要突出揭发、批判、剥皮,重点是经济问题和经验问题。”“主要由你们讲,我们俩见机插话。……”

3月26日,政治局开会,清华大学周家憲当着邓小平的面说他是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一贯倒骑毛驴向后看,一贯搞复辟倒退。

“梁效”写作组的胡健在发言中提到邓小平1957年1月在清华大学的讲话,说是“一个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黑报告”,“大长了右派的威风,把右派全放出来向党疯狂进攻,使得清华大学57年就冒出了560个右派分子”。

“梁效”写作组的张凤瑞在发言中指责邓小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打击新生力量,称邓小平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只有搞修正主义的经验,只有走资派还在走的经验”。

谢静宜在插话时说:“75年第三季度,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这个时期在八宝山给32名在文革中自杀的老干部开了追悼会,去参加追悼会的人很多,还有不少是坐着大红旗轿车去的。”

王洪文说:“贺龙的追悼会,周总理也去参加了……”

会上,张春桥说邓小平“是老牌机会主义者,连托洛茨基都不如!”

王洪文说:“邓小平去年6月到上海,私自找马天水谈话,让他有事不要找市委,要直接请示他,搞得我们几个市委书记都不管用了。”

姚文元说:“去年主席批给政治局的几条指示,怎么那么快就传出去了?还有那些小道消息,搅得人心惶惶,要查一下,根子到底在哪里?”

江青气冲冲地说:“根子就在政治局!国务院政治研究所就是造谣总公司,邓小平你就是总经理!下面还有分公司,分经理。”

会上,邓小平一言不发。

迟群质问他:“邓小平,你不吭声就是顽固对抗!”

江青无可奈何地说:“你们是少见多怪呀!政治局每次开批邓会他都是这个样子,死猪不怕滚水烫嘛!”

事后,毛远新把这次会议情况报告了毛泽东,说邓小平的态度不好,会上一句话不说,最后连个态度也不表。

第1386回：看河南，大字报直指刘、纪 接建勋，政局当面批邓

我们再看河南。中央2月25日召开的12省打招呼会议后，河南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已由教育界的大辩论扩展到全社会，在1975年整顿中受压的那些造反派纷纷组织集会、串联、游行、贴大字报，把矛头指向了各级党委，也指向了纪登奎和刘建勋。河南省委常委连续开会，研究如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如何转弯子，如何检讨等问题。3月17日，刘建勋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说，要一方面批邓，一方面检讨，向造反派认错。

纪登奎自“批邓”以来日子也不好过，尽管他作了检讨，纠正了一些“错误”，表示要“批邓”，为解决郑州铁路局的问题，纪登奎派人到河南“纠正错误”。他说：“去年处理邢介江的问题，你们去看看，全错全平，错多少平反多少”，“刮右倾翻案风，我到河南也讲了错话，群众批也是应该的”。

但是，河南依然毫不客气地贴出“走资派还在走，投降派确实有，革命派要战斗”的大字报，说“去年夏季前后，纪登奎追随邓小平在河南大刮右倾翻案风，错误极为严重。”

大字报还说：“在河南，刘建勋就是刮右倾翻案风的风口，纪登奎是河南右倾翻案风的积极策划者，是主谋。”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投降有罪，招安可耻。”

这时，郑州大学7名造反派领袖党言川、任延庆、张书震、李长杰、唐一兵、程天富、方复山写出了题为“郑州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不容颠倒——略谈纪登奎同志关于郑州大学文化大革命的几次讲话”的大字报，要求省委呈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文中说：

“纪登奎、刘建勋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支持过郑大师生造反。但事过九年，在去年夏季前后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中，他们不是站出来反击，而是站出来帮腔。在许多重大历史问题上颠倒历史，混淆黑白，

竭力否定郑大文化大革命,为右倾翻案、复辟倒退的反革命逆流推波助澜。”

他们在大字报中向纪登奎提出了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文革”初期,当权派把革命造反派打成反革命,究竟是像纪登奎去年讲的那样,因为我们这些人不太好,有些言论是右的,是群众自发起来抓我们的反革命,还是因为我们起来造了反,走资派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把我们打成反革命?对此,纪登奎应当清楚,郑大的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党中央当时是表了态的。请问,你这样讲,把毛主席的指示,党中央的决定置于何地?

第二,关于刘建勋同志的一张大字报。纪说刘建勋的一张大字报“意思是不要打他反革命,这样一来,他的资本就高了。”文革初期刘建勋的这张大字报,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表扬,是支持革命群众起来造反的。这绝不是只关乎党言川同志一个人的问题,而纪登奎现在这样讲,从根本上否定了这张大字报的政治意义,无非是说,刘支持我们的这张大字报是假的。我们没有忘记,纪还是这张大字报支持者和起草人之一。现在否定这张大字报,就是否定了郑大和河南的文化大革命,也等于否定了纪登奎本人。

第三,关于党言川同志反党中央反周总理的问题,纪登奎这样说是毫无根据的。……

第四,纪去年到河南,风尘仆仆跑到郑、洛、许、信等地,学着邓小平的腔调,大讲反派性,大骂造反派。什么“四大害”、“五大怪”、“八大金刚”、“四大赖”,总之使人们又感到还是“二七公社大杂烩,牛鬼蛇神排成队”。我们不禁要问纪登奎同志:“你这是不是要向邓小平表白自己,要和河南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划清界限?表明自己要追随邓小平的那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大字报说:“纪、刘在文化大革命中支持过我们造反,我们和河南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也支持了纪、刘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但在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中,你们不看方向看风向,跟着邓小平大骂文化大革命和造反派,不是对造反派高抬贵手,而是动不动就叫‘滚’。有些人官做大了,薪水高了,高高在上,听不进不同意见,忘乎所以,不讲道理,到处骂人,以官大压人。纪登奎同志就是如此。”

大字报最后说：“现在社会上有人利用纪、刘的错误，要打倒他们，我们是坚决反对的。但我们决不保他们的错误。纪在右倾翻案风中受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影响，说了错话，办了错事，使许多领导干部也跟着犯了错误。纪登奎同志必须向毛主席、党中央做出检讨，向全省人民做出检讨，主动承担责任，肃清影响，改正恶果。”

3月25日，河南省清丰县交通局贴出大字报，题目是：“刘建勋为何觉悟得慢？——兼评纪登奎的投降路线”。大字报一开始就说：

“那个曾经挂着‘支持革命造反派’随后披上‘革命领导干部’外衣的纪登奎正是一个靠河南革命造反派鲜血染红了外衣，随后被邓小平招安的投降派的典型代表，是混入‘梁山’的投机商，是当代的宋江。”

大字报认为刘建勋“觉悟不高”，河南各级领导转弯子慢，与纪登奎去年8月“从浙江窜到河南作的一番丑恶表演很有关系”。

大字报说：“从前，宋江投降后就去打王庆，王庆是宋朝河南的起义军首领，他打过王庆之后，就去打方腊，方腊是宋朝浙江一带农民起义军的首领。今天，纪登奎被邓小平招安以后，先去浙江镇压革命造反派，回头跑到河南大刮右倾翻案风，这种惊人的相似之处，简直是对古往今来投降派的极大嘲弄。”

大字报还写道：“我们说纪登奎是混入梁山的投机商，有文化大革命十年来铁的事实做见证。他靠河南革命造反派的鲜血染红了外衣，但是从来没有坚定地、真心诚意地支持过革命造反派。1966年8月，就在郑大革命造反派刚刚宣布成立‘郑大联委’的时候，他一面假惺惺地表示支持，一面又为保守派的头目们出谋划策：‘他们成立联委，你们就不会成立战斗师呀？’于是乎，郑大原文革改头换面而成了战斗师。去年8月，他来河南煽动右倾翻案风，又一次美化那个保守派头目，赞不绝口地夸他‘品质好’，借此给邓小平送一个献媚的秋波。”

3月下旬，郑州“二七公社”派在市公安局门前静坐、绝食，要求释放在1975年整顿期间被公安机关抓起来的造反派头头。同时，还组织数百辆汽车、拖拉机搞10余万人的大游行。刘建勋见形势紧张，赶快给中央发电报，请求中央给个解决办法。

华国锋接到刘建勋的电报后，找纪登奎商量解决办法，二人决定

派公安部负责人杨贵回河南帮助刘建勋工作,让刘建勋来北京向政治局汇报一下情况,政治局就河南问题提出个意见,再报毛泽东那里批示一下,这样刘建勋回河南就好办了。

3月27日上午,以为河南局势已经失控的华国锋,指示河南省军区司令员张树芝负责将刘建勋等人护送至郑州军用机场。当天下午,华国锋派来飞机将刘建勋、省委副书记王维群等人接往北京,汇报河南的工作。

3月27日下午16时许,刘建勋一行抵达北京,被安排在京西宾馆。不一会儿,纪登奎即来宾馆看望,问了问河南的局势,说华国锋马上要来,“咱们去迎接他吧。”他们刚走出大楼,华国锋就到了,陪同前来的还有主持公安部工作的副部长杨贵。

一行人等来到一间会议室坐下,刘建勋即向华国锋检讨,说“我们工作没有做好,河南又乱起来了,给中央增加了这么多麻烦”等等,表示惭愧。

华国锋开导说:“建勋同志,你不要老作检讨,这个责任你也负不起来,河南乱的原因是有总根子的。总根子是邓小平。今天晚上政治局开会,听你们汇报,要批邓。”

华国锋还说中央准备派杨贵到河南帮助解决问题。

刘建勋向中央报告河南的情况,原本是请求中央给个指示、办法,或者派人来河南帮助工作,没想到被接到北京,而且还得在政治局会议上面对面地批判邓小平。这使他陷于两难境地,不批邓过不了关。批邓,意味着什么,他是非常清楚的。抗日战争时期,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他就是邓小平的老部下,他对邓小平太了解了。而今老部下要批老上级,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回批邓,可是作了难啊!”

当晚22时多,刘建勋一行被接到人民大会堂,由工作人员领进一个不大的会议室,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们都已神情严肃地在里面就座。杨贵列席会议。刘建勋等人一入座,华国锋就宣布开会:

“今天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一下河南问题。今天把刘建勋、王维群叫来汇报一下河南的情况。”

接着,刘建勋开始汇报。他先汇报了河南各地的混乱情况,检讨自己工作没有做好,边哭边说,很动感情。他检讨了1975年批判、下

放几十个造反派，把造反派得罪了，所以现在乱起来了。江青说：“你们不是整了几十个造反派，而是整了三千个造反派。”

接着，刘建勋开始当面批判邓小平。他说：“河南现在这么乱，原因是什么呢？今天你邓小平也在这里，我当面向你说清楚，就是由于执行了你的反动路线，河南才搞成这样乱的局面。我的身体不好，还没有照你说的要有十分干劲去干，就搞成这个样子了。如果按照你说的要有十分干劲去干，就要造成更大的恶果。如果再按你的办法，抓几个，调一些，那就得罪更多，乱得更厉害。你过去的反动立场没有变，检讨是假的，如果按照你的反动指示去办，就要亡党、亡国、亡头，你就是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是复辟势力的总根子，是‘还乡团’的总头子。”

刘建勋说到这里，一些政治局委员忍不住笑了起来，又七嘴八舌问了一些具体问题。刘建勋擦了擦脸上的冷汗，一一做了回答。

邓小平一言未发，两眼盯着刘建勋，一根烟接着一根烟地抽。

华国锋问河南省委副书记王维群还有什么补充？王维群说：“情况建勋同志都说了。我说一点意见，河南不是整了3000造反派，是批了20多人，其他调下去的干部大部分是机关抽下去锻炼、培养的干部。”

江青打断王维群的话：“你扯谎！你们整了3000多造反派，按照邓小平的指示，你们整新干部，打击造反派，凶得狠！”

接着，江青开始批判刘建勋“执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还批判纪登奎说：“毛主席那么关心你，培养你，而你却违背毛主席的指示，上了邓小平的贼船，执行邓小平的一套，到浙江、河南镇压革命造反派。你在浙江讲了什么？在河南讲了什么？我手头都有材料！你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革命造反派，对不起全国人民。”

于是，纪登奎也检讨了一番。

会议开到夜里0时休会，大家都去吃夜宵了。邓小平没有去吃饭，坐在那里抽烟。刘建勋、杨贵、王维群等人也没去吃饭，干坐在会议室里，谁也不开口说话，气氛十分尴尬。

夜班饭后，继续开会批邓。大约到了夜里一点多钟，华国锋说：“建勋啊，你再准备一下，另行汇报吧！”

这时邓小平问华国锋：“会议散了吧？”

华国锋说：“散会”。

邓小平立刻站起身，第一个走出会议室。

王洪文望着邓小平离去的背影说：“都说他聋，其实不聋嘛。一说散会，他拔腿就走，走得比谁都快。”

此时刘建勋已瘫坐在沙发上站不起来了，只能被人搀扶到手推车上，推出了会议室。这次“面对面批邓”如同他1966年8月写大字报支持学生造反一样，在全国的省委书记中都是独一无二的。

第一次汇报后，根据华国锋关于政治局再听一次河南问题的汇报的指示，刘建勋、王维群、杨贵等人在下榻的京西宾馆准备汇报材料，并向纪登奎要了几份清华、北大的“批邓”材料，作为参考。

一次，纪登奎与刘建勋谈话时间刘建勋在郑州水上餐厅和李井泉谈话的问题。刘建勋说：那天多吃了几杯酒，说的什么都不记得了。“不见邓副主席死不瞑目”不记得了。纪登奎说：“李井泉回北京后，都向中央汇报了。你这样的态度不对。”刘建勋听了这话很着急，回到京西宾馆后，就往郑州打电话，询问有关人员他当时和李井泉都说了些什么？别人都敷衍说不记得了。

第 1387 回：南京市，悼总理群情激奋 大标语，明确打到张春桥

1976 年 3 月 27 日，北京市民兵指挥部奉命派员赶赴天安门广场“观察动向”。

3 月 27 日，姚文元在的日记中写道：

南京冒出一批针对上海的大字报，还有“揪出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反对抢班夺权”一类标语，据说弄了一批学生（大多是高干子弟）上街。

这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

每次运动发展到一定时候，反动势力都要跳出来“示威”一番。也好，让革命群众多看看。只是中央政治局太迟钝了。

又快到“四·一二”了，又要“炮打”了。

主流是好的，革命群众精神振奋地在批邓中前进。“同右倾翻案风对着干，敢挑千斤重担夺高产。”这是工人阶级的声音。朝农批资产阶级法权达到相当深度。

清明节将要到，发现南京、北京、太原都有借此搞“悼念”总理的活动而闹事的苗头。

也就是在姚文元写下这篇日记的 3 月 27 日晚上，南京大学数学系团总支书记李西宁召集系团总支扩大会议，把几个班的学生党支部书记也都扩大进来了。他对大家说：“我们团总支准备在明天举行一个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大家听了都一致表示赞成。开完会大家扎花圈，写横幅，贴通知，忙乎了一夜。

3 月 28 日上午 8 时，李西宁和计算机专业一年级党支部书记秦峰及其他几位学生干部带领全系 400 余名师生，高举周恩来的巨幅遗像，抬着写有“光辉永照后来人”的花圈，排成数列纵队，绕道闹市区新街口、大行宫，向梅园进发。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冲突，李西宁把学生当中几个比较机灵的人派

出去当侦察兵，在大队人马前面打前站，一旦发现有什么异常就赶紧回来报告；另外又挑选了几个身强力壮的解放军学员组成一个方阵，保护在周恩来遗像周围。他们还带上老虎钳和小铁锤，准备到了梅园新村后，如果工作人员不给他们开门，他们就准备砸开锁强行进入。结果省里提前通知梅园新村开门接待他们。

这次游行示威在南京城里引起了轰动。第二天，3月29日上午，南京大学数学系学生宋志杰等人，将3月25日的《文汇报》贴在校园里。他们用墨笔把“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这句话勾了出来，上面写着：“看一看，想一想”6个大字。接着，数学系的师生又在南京大学南园宣传栏下面和对面，贴出两条大标语：“警惕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无数革命先烈和革命老前辈用鲜血打下来的红色江山我们也要用鲜血来捍卫！”

标语刷出后不久，就有人将“各级领导权”改为“最高领导权”。

紧接着，中文系抄贴出了1957年毛泽东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政治系在“是粗枝大叶，还是别有用心”的标题下公布了《文汇报》就3月5日事件给他们的复信。

这个消息不胫而走，人们纷纷涌向南京大学校园看大字报、大标语。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这天中午，南京大学有11个系的800多名工农兵学员，分成20个小组，在闹市街头进行演讲，在大街、车站和公共汽车车身上刷大标语，还在开往苏北、安徽、浙江等地的长途汽车上贴上了“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文汇报3.25文章胆敢反对周总理罪该万死！”“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等大标语。

3月29日下午16时30分左右，南京大学数学系计算数学一年级学员胡同森与地理系74届学员白锦铭在新街口邮电局旁的宣传画栏，看本校地质系找矿专业的几个同学在刷标语，其中有围观的人说：“你们在这刷标语影响不大。为什么不到火车站去刷！”

胡同森闻言立即回校，提出要去火车站刷标语，并在晚饭前后串联到数学一年级的三个班的10个寝室的同学。他的提议得到他们的党支部书记秦峰等人的同意。18时30分左右，秦峰亲自集合本年级70人，另加三年级3人乘公共汽车前往南京车站。

在车站工人的协助下,秦峰等人先后在通往成都、兰州、三棵树、上海、济南等5次列车的车厢上张贴或书刷标语,首先将从上海开往成都的22次列车的车厢两侧刷上了“文汇报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罪该万死!”“文汇报向何处去?”“警惕野心家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等大标语。这些标语在热情的旅客护卫下,一直保留并带进了成都。

当天晚饭后,化学系无机二班李家胜也在宿舍里提议说:“我们也去刷几条标语吧!”得到同学们的响应。有人提出要把标语带到上海去。于是他们前往南京西站。李家胜等7人到了西站,在211次和405次列车车身上刷了6条标语。然后乘22时50分的405次列车来到新火车站,在这里遇到数学系的学员已在那刷标语。这时数学系的墨汁已刷完,他们先行返校。李家胜等人又在刷完74、95次列车上刷上大标语,于凌晨1时30分左右回校。

3月29日夜至30日,南京江苏新医学院、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学院等更多学校的工农兵学员来到火车站刷标语。铁路工人对他们说:“刷的这些标语没有用,往北开的还行;往南开的,到昆山,就被人用水冲掉了,根本进不了上海。”

学生们闻言,在车站工人的帮助下,用不易被冲洗掉的水氯松、油漆、柏油,将标语刷在火车上。30日上午10时许,13次特快列车带着用冲洗不掉的沥青写的大标语开进了上海。南京邮电学院广播专业三年级学生,共产党员张夏阳还带头在车站和列车上高呼“谁反对周总理就砸烂谁的驴头!”等口号,并向旅客宣讲《文汇报》反对周恩来总理的问题。学生们用了10多个小时,在南来北往的火车上刷了近200条大标语。南京的消息,就这样被传播到了四面八方……

这几天,南京城沸腾了。遍地都是标语口号,到处有人发表演讲,南京几乎是全城出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络绎不绝。每当游行队伍出现时,交通警察为他们开绿灯,车辆为他们让路,路边的群众驻足观看,鼓掌欢迎。

南京建筑五分公司人事科长龙连山喊出了“打倒江青!”的口号。

3月30日,南京工学院建筑系的工农兵学员贴出题为“十个为什么?”的大字报,提出“为什么悼念总理的影片至今不和广大革命群众

见面？”“为什么总理逝世后连一个回忆录、一篇纪念性文章也没有？”……

3月30日下午17时30分开始，南京最热闹的新街口、鼓楼、山西路西口，出现了南京警备区战士徐同新写的传单，上面写道：“他们正干着林彪没有干完的勾当，……把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张春桥揪出来示众！”

传单刚一贴出，便吸引了一大批围观的群众，人们念着、听着、抄着，高呼“把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揪出来示众！”当有人问道：“张春桥要不要打倒”时，现场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要！”同时，传单还被复制成大字报在南京市内张贴。

3月30日，王洪文给《人民日报》打电话，要他们在南京的记者注意反映情况，并明确表态说：“南京事件是因为省委有走资派。”“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是转移批邓大方向，他们借着《文汇报》删稿大做文章。”“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制造舆论。”“南京大街贴出‘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报，省委说没有办法。不是没有办法，是他们不管。”“南京事件是因为省委有走资派，省委的彭冲、许家屯，南京市的储江、贾世珍。”

王洪文说的这四个人是当时江苏省、南京市的主要负责人。彭冲是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许家屯是江苏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储江为南京市委书记、市革委会主任，贾世珍为南京市委副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

3月30日，中共中央在江苏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上批示：“采取有效措施，做好群众工作，防止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进行捣乱破坏。”

30日的晚上，姚文元在日记中写道：

南京冒出一批针对上海的大字报，还有“揪出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反对抢班夺权”一类标语……这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每次运动发展到一定时候，反动势力都要跳出来“示威”一番。

此时，不仅是南京，天津、武汉、西安、太原、青岛、杭州、郑州、福州、重庆、昆明、贵阳和长沙等地都发生类似情形。而且，天子脚下，首都北京也不平静。

3月30日凌晨，第二炮兵的24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了第一个来自军队的花圈：“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

30日，北京总工会工人理论组29位员工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贴出第一张悼念周恩来和声讨江青等人的悼词。

接下来，数不清的悼词、标语、诗词、大小字报一张接一张地张贴在天安门广场。此时的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的人群一日多于一日，送花圈的队伍长长排列在东西长安街上和前门两边。扎在松枝上的白花层层叠叠，好似早春里的雪。一首题为《满江红——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词作令许多人交口诵吟，人们噙着泪水读着：

星陨东方，
天地咽，
山河减色。
忍为民，
赴汤蹈火，
心血沥绝。
开天辟地奠国基，
踪迹环球创伟业。
问六十春秋昼与夜，
可曾歇？
瞻遗容，
泪不绝；
哭总理，
肝肠裂。
化举国之哀，
坚持马列。
岂忍江山付东流，
那堪神州再溶血。
将遗愿早日化宏图，
此心切。

3月31日，北京市公安局遣派便衣工作人员“以群众面目出现，把小字报、诗词记录下来，全部报告”。

3月31日下午,南京汽车制造厂女医生王运德及其丈夫张精美,电工殷辉起草,贴出这样的大标语:

“深切怀念杨开慧烈士!”

“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

“党和国家的报纸、电台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批周必乱,反周亡国!”

“党内这个走资派在上海大搞独立王国不得人心!”

“舍都一身剐,敢把党内这个走资派拉下马!”

“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打倒文汇报的黑后台张春桥!”

标语张贴在厂大门、中山门、七一四厂、新街口、大庆路、新火车站的沿线上。

这天下午,南京市电信局三分局工会主席,测量班长秦世祚和他的同事,将一个直径两米的大花圈安放在南京鼓楼食品商店大楼二楼的阳台上。阳光照射下,两幅黑绸上书写的挽联夺人心魄:

心血操尽革命伟业如巍巍泰山立寰宇

骨灰撒遍祖国山河似点点春雨润人间

下午14时30分,南京汽车制造总厂制泵分厂的10多名职工在殷辉、王运德的带领下,在南京市中山东路的一个部队机关院墙上,刷贴一条巨幅标语:“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引起轰动。许多围观的群众齐声高喊:“把张春桥的名字倒过来!”“打×,打×……”

3月31日,《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鲁瑛将在南京的一个记者反映的情况送给王洪文阅,王洪文立即转给江青。

晚19时,王洪文打电话给《人民日报》社,询问南京情况。

晚20时,张春桥给《人民日报》社打电话询问南京情况。

晚21时,姚文元给《人民日报》社打电话,并要求一有情况就向张春桥汇报。

姚文元将从《人民日报》那里得到的关于南京的消息告诉张春桥。张春桥忽然在电话中问姚文元:

“你读《红楼梦》,最欣赏的是哪一句话?”

姚文元茫然,不知张春桥为什么突然提及了《红楼梦》?

张春桥自己回答说：“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说罢，一声长叹！

4月1日凌晨两点多钟，姚文元给新华社负责人打电话，批评南京分社把“南京事件”的原因说成是“南京人民对总理有深厚感情”，“长期以来江苏对上海的做法有意见”，说：“你们记者要有鲜明的立场。这明明是别有用心的人在捣乱破坏，煽动群众，反对中央，怎么能把这些说成是江苏对上海有意见呢？你们要对事物进行阶级分析，告诉你们记者，要提高警惕。”并要求记者：“要注意反映省委对电话指示的执行情况。”

4月1日，南京铁路中学教师厉传彬，学生王喜民在校园里和食堂门口刷出了每个字有一平方米大的悼念周恩来的标语，并在水泥地上写了“打倒张春桥，清除隐患，挖出定时炸弹！”一行大字。

4月1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南京出现的周恩来悼念活动。叶剑英和邓小平未参加会议。会议认为当前全国各地流传所谓“总理遗嘱”、“总理给主席的诗词”欺骗了一些不明真象的人，干扰破坏当前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南京已有人借机闹事，还要利用4月4日清明节搞什么扫墓活动，并要以纪念杨开慧烈士名义送花圈。北京等地也有很多类似的东西。这个动向值得注意。除电话答复江苏等地外，中央可以正式发一文件，说明所谓遗嘱之类，是敌人造的谣言，干扰破坏当前的斗争大方向，要追查，不要上当。会议中有人提出要改革今年“五一”节的庆祝方式，不搞游园活动。讨论结果，会议认为，“五一”节活动可以改革，但今年改变不利，不搞影响太大。要利用这个机会体现安定团结，庆祝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初步胜利，鼓舞全国人民。并建议邓小平不出席。

随后，中央政治局会议于当晚23时45分向江苏省委发出了电话通知。这一电话通知，是姚文元起草的：

毛主席已圈阅。

(一) 据了解，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你们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全部覆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对有关群众要做好思想工作，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进行捣乱，破坏。

(二)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

(三)所谓总理遗言,完全是反革命谣言,必须辟谣,并追查谣言制造者。

(四)任何人不准冲击铁路。

姚文元在会后的日记中写道:

南京“大字报”已点了张春桥的名,是“打倒”、“揪出”、“野心家”、“阴谋家”,……还是林彪在庐山会议上那一套。

昨晚政治局开六人“紧急会议”,我坚持起草一严肃的通知。今日主席即批准此通知,发江苏并发全国。估计这几条下去,会对这股猖狂反扑的妖风起当头一棒的作用,而使人民更加认识邓小平的反动性。但斗争不会就此止歇。

有一个地下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活动,这一点更清楚了。

4月2日凌晨,毛远新给毛泽东写了报告,报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

主席:

4月1日晚,政治局讨论了几件事:

一、当前全国各地流传所谓“总理遗嘱”“总理给主席的诗词”欺骗了一些不明真象(相)的人,干扰破坏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南京已有人借故闹事,还要利用清明节(4月4日)搞什么扫墓活动,并要以纪念杨开慧烈士名义送花圈。北京等地也有很多类似的东西,这个动向值得注意。

除电话答复江苏等地外,中央可以正式发一文件,说明所谓遗嘱之类,是敌人造的谣言,干扰破坏当前的斗争大方向,要追查,不要上当。

二、今年五一节活动。

有的同志提出不搞游园活动了,应改革一下,还有见报也不好安排等。

讨论结果,五一节的活动今后可以改革,一年搞一次(国庆节)即可。但今年改变不利,当前国内外敌人都说我们乱了套,要钻空子,历年有活动,今年不搞影响太大。要利用这个机会体现安定、团结,庆祝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初步胜利,鼓舞全国人民,今年五一节活动还是按

去年的办法不变。

至于中央同志登报排列，可分三个公园分别报导（道），不搞通栏，只登政治局同志、副委员长、副总理，不搞过去上千人的大名单。

建议邓小平同志不出席，其它（他）政治局同志尽量都出席。

三、3月初主席指示，《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暂时就传达到县团级，暂不扩大传达。目前干部已学习了近一个月，党员、基层干部普遍要求传达，是否可以考虑下一步再扩大传达到支部书记和各级机关的党员干部。

上述意见当否，请主席指示。

如同意，国锋同志准备正式向主席写报告。

毛远新

4月2日

当天，毛泽东批“退毛远新四月二日”

4月3日，毛泽东阅批：“同意”。

第 1388 回：清明节，雨花台数万之众 天安门，广场上花海诗潮

就在政治局讨论“南京事件”的同时，北京的局势也在发展。几天来，天安门广场上的英雄纪念碑周围已经摆满了花圈，北京市又打开了广场灰观礼台让群众摆放花圈。

1976 年 4 月 1 日，北京市公安局负责人在公安会议上提出：“现在反革命破坏活动相当嚣张”，“凡是纪念碑前反动的东西，要坚决搞掉。”

4 月 2 日，北京出现了第一支游行队伍。清晨，中国科学院 109 厂的职工，用 4 辆大卡车开道，抬着 4 个大花圈和 4 块巨型诗牌，牌上写着：

红心已结胜利果，
碧血再开革命花。
倘若魔怪喷毒火，
自有擒妖打鬼人。

游行队伍，高擎诗牌，穿过王府井大街走进天安门广场，把它放在纪念碑的最高处。几乎同一时间，北京重型电机厂工人制作的第一个铁花圈送到天安门广场。

巨大的诗牌、钢铁花圈，十分引人注目，这一消息在北京迅速传播。

4 月 2 日，天安门广场灰观礼台上的花圈很快就摆满了，北京市委立即指示开放红观礼台，让群众上去摆放花圈。这几天，广场上的群众少时数万，多时十几万人。

4 月 2 日，中央要求北京立即传达 4 月 1 日晚中央给江苏省委的电话通知，并派出警察和工人民兵干预制止北京的悼念活动，同时派出便衣警察逮捕或跟踪悼念者。中央还要求北京传达姚文元指示，说“清明节是鬼节”和“送花圈是四旧”，不要群众去天安门广场举行悼

念活动。

4月2日下午,江苏省委将中央的“四·一通知”传达到南京市和江苏省,各级组织开始出动大批人员,冲刷南京市面的大字报,大标语,并贴出大字报,说前几天的事件是“为反革命复辟、政变制造舆论”。

当天,南京大学一个教室的课桌上又出现一首署名“万万千作词,千千万抄写”的《捉妖战歌》:

妖风起处,定有妖精,
妖为鬼域,必显灾情。
乱党乱军,祸国殃民,
尾巴高跷,始露原形。

原名狸精(李进),化名蒋亲(江青),
妖态百出,不得人心。
攻击总理,手段卑鄙,
蒋帮敌特,配合密切。
欺骗主席,罪大恶极,
狐假虎威,借助钟馗。
鬼喊打鬼,贼喊捉贼,
当年武斗,它是罪魁。
有个同伙,妖法更多,
名叫蠹翘(春桥),最会奸笑。
两妖合作,收集喽罗,
篡权计划,有纲有目。
先夺舆论,伪装老左,
谈古论今,蛊惑人心。
侈谈什么,儒法斗争,
儒家法家,根本一家。
代表利益,剥削阶级,
事过千年,远离现实。
为其翻案,是何用意?
无非想当,封建皇帝。

自己复辟，不须放屁，
打击正直，排除异己。
滥用法权，施出诡计。
既想遮天，又想盖地。
激怒群众，四方奋起，
千军万马，口诛笔伐。
妖怪惊慌，却能变色，
七变八变，本质不变。
觉悟群众，岂能愚弄？
抓住尾巴，决不放松。
众志成城，妖有何能？
即取其道，还治其身。
学习总理，革命到底！
奋不顾身，捍卫总理。
总理遗志，定能实现，
人心所向，共产主义。

南京军区宣传站、虹桥、兰桥等地也出现了“野心家张春桥翻案不得人心！”“向张春桥的修正主义文化部，宣传部开炮！”“捣毁文汇报土围子！”这类传单。

4月2日晚，叶剑英将熊向晖叫去，对他说，他请病假以后，杨成武、王尚荣还经常向他汇报工作，叶剑英告诉他们不要来了，恐怕他们不方便。近来，已经很少有人看他了。他对熊向晖说：“你现在还信任我，我很感激。”说着流出了眼泪。

熊向晖说：“叶帅，你不能这样讲，首先是你信任我啊！”

熊向晖对叶剑英说：“王震发牢骚，说关键时刻，元老、重臣都不讲话了。”

“虽然他讲得有些片面，但是这说明老同志对叶帅是非常尊重的。”“我和王震一起去看聂帅时，聂帅说：决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场决战在什么时候发生，以什么形式发生，现在还不知道。不过聂帅也希望叶帅给毛主席写信。”

叶剑英说：“这些意见都对，但是我担当不了啊！”

熊向晖说：“现在就要用到毛主席当年给隐蔽战线制定的方针：精于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叶剑英认为在这个非常时期，熊向晖到他那里会引人注目，多有不便，以后还是让他的侄子叶选基到熊向晖这里来，沟通消息。

4月3日，南京邮电学院工农兵学员以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的名义，在南京从山西路至三牌楼一线，刷出“反对周总理的一系列政治事件要彻底查清，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等15条标语，南京工学院的2000多名师生沿鼓楼、新街口、中山东路、梅园新村，举行悼念周恩来的游行。这一天，仅去雨花台烈士陵园送花圈的就有289个单位14万多人，比前几天增加了一倍。而全市在中央电话通知下达后的三天内，又有60万人参加了悼念和游行的活动。

4月3日，北京市委邀请各界群众代表座谈，征求对花圈的处理意见。到会的群众代表要求将花圈摆放到6日，这期间由他们出面做工作，花圈由群众自己收回，群众不取走的花圈，可以移送八宝山。

4月3日，姚文元在日记中写道：

继江苏、浙江等地后，反动标语开始在北京出现。昨天天安门人群激增，用所谓“悼念”总理发泄对运动的不满，发表反革命演说和反革命口号，有的还公开反共，这是没落垂死势力的挣扎和疯狂反扑的一种表现。他们是否已用完了它的后备力量，我看还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科学院、七机部）是它的基础。……而这一切说明：如果党内走资派得逞（势），不仅是丧失社会主义革命成果，民主革命成果也会丧失。反共的“还乡团”会一起扑上来残杀、镇压劳动人民。还有一个搞匈牙利、林彪式政变的反革命口号是：“我们要民主！不要法西斯！我们要周总理，不要佛朗哥，更不要那拉氏。”还有的人煽动成立群众组织，“要坚强，要防止一个个被击破”。这也是林彪一伙的反革命口号……

中国这个国家，激烈的斗争不断，但解决矛盾（某一个方面、部分）却总是不彻底。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毕竟不是绣花。

王洪文坐着轿车在天安门广场转了一圈。回到大会堂后，他给从上海选拔到公安部中共核心小组的祝家耀打电话说：

“你还在睡觉啊！我刚到天安门去看了一下，那些反动诗词你们拍下来没有？不拍下来怎么行呢，将来都要破案的呀！要不，到哪里去找这些人呢？你们应该组织人去把它拍下来，要考虑到将来的破案！”

这时，张春桥也说：“要派便衣去！便衣很起作用，只有便衣才能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最重要的情况。”

叶剑英也极为关注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每天派人去那里了解情况，抄录诗词，边读边赞：“好诗，好诗，难得的好诗！”

4月4日，农历三月初五，中国的清明节。这天，涌向天安门广场的人们达200万人次！天安门的悼念活动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有诗写道：

清明的花圈如皎月，
嫦娥感慨同悲切。
清明的挽联像尖刀，
忠魂挥舞断贼腰。
清明的檄文放光彩，
进击大旗长空摆。
清明的诗歌披彩霞，
革命事业露新芽。
清明的歌声连广宇，
国际战歌不断曲。
清明的口号震乾坤，
人民永将正义伸。

上午7时，北京青云仪器厂职工，排成四列纵队，共275排，抬着34个花圈来到天安门广场，绕场一周后，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

同时，曙光电机厂3000多名职工从东单出发，走进广场。

北京重型电机厂工人也把他们制作的第二个铁花圈抬进了广场。

.....



是日上午，北京铁路分局青年工人王海力在天安门广场披展血书，上书：

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将用鲜血和生命誓死捍卫您!!! ——中国无产阶级的红后代。

场面感人。

上午11时，首都钢铁公司工人李铁华在天安门广场发表讲演，声泪俱下，感人至深：

“阳春3月的连绵雨水，那是我们8亿人民流不干的眼泪。”

“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慈祥的父亲！”

“您忠诚的儿女看望您老人家来了！”

“我们的好总理呀！您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人大义凛然、横眉冷对；对人民父亲般地关怀，母亲一样的热爱。”

“您老人家光明磊落、胸怀宽阔、任劳任怨、从无倦态。您一辈子工作、战斗；战斗、工作，不辞辛劳，不分昼夜。您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英勇斗争，鞠躬尽瘁。您老人家是活活累死的呀！”

“您老人家的丰功伟绩，永远铭刻在我们8亿人民心中！您老人家高大的形象，永远树立在人民心中！人民心中的纪念碑，永远砸不碎！人民心中的形象，万代放光辉！”

“同志们，我们发现有那么一小撮人，把矛头对准周总理，这是我们绝不允许的！”

“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

“总理得人心，人民热爱总理。这就是历史最好的见证！”

“同志们，斗争是尖锐复杂的，但是，我们要坚定信心，把那些野心家、阴谋家统统揪出来，彻底打垮！”



罗小韵 摄

同日，纪念碑东侧贴出《叫人怎么办？》的诗词，公开为邓小平鸣不平。诗中写道：

8点钟上班，点上一支烟，倒上一杯水，翻开一本大参考，一看就一天。生产上不去，这是自然而然。自从去年‘七一’后，面貌大改变，领导下基层，抓纲又抓线。任务明确方向对，群众心里好喜欢。加班又加点，卫星上了天。结果好话没听见，坏话一大篇。什么“人头要落地”，却成了大灾难。这叫人怎么干？！是不是不干才喜欢？不，他们想一手来遮天。三人十只眼，阴谋篡大权，唯恐天下还不乱。同志们，怎么办？我们就要和他们顶着干，把他们的阴谋来揭穿！

下午15点多钟的时候，叶剑英悄悄地拉着解放军总医院护士周美华和绰号“马头”的警卫参谋马西金，开车到了天安门广场。他们车开得很慢，从纪念碑的右侧，绕到左侧，转了一个大圈。叶剑英几次要下车去看一看，都被随行人员劝止了。

同日晚21时，纪念碑东南角出现了《第11次路线斗争大事记》，引来众人的围观。有人在高声诵吟：“江青（在1974—75年间）扭转批林批孔运动大方向，企图把斗争矛头对准敬爱的周总理”；“江青背着中央接见外国传记记者”；“江青污蔑中央领导同志，并企图在四届人大争当总理”；“邓小平同志重新回到了中央工作（1975），取得了斗争的初步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文中直接点出江青的名字，引起了强烈反响！……

山西坞城路三局机电队共青团员王立山在这里写下了《扬眉剑出鞘》的名作：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北京市外贸局青年干部李舟生写下了《今日在何方》：

请你们不要问我今日在何方；难道你们能不来到这天安门广场？
请你们不要再费心到这儿来找我，这里早已经是人的海洋。像四海惊涛齐奔向英雄碑下，像五洲风云齐飞向总理身旁。像无数白帆满载着

圣洁的情感，我也扬帆催发呵，航行在这无边的海洋。……

当时，有一首诗，题目是《人民的总理人民爱》：

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

总理和人民同甘苦，人民和总理心连心。



不知是谁，写了一首儿歌《几个小丑嗷嗷叫》，一时被四下传抄：

蚍蜉撼大树，摇又摇：“我的力量大，知道不知道？”

大树说：“我知道，一张报，两个校，几个小丑嗷嗷叫。”

另一首诗是《向总理请示》，明骂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

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

当有人念完这首诗时，周围的人就高喊：“烧！”“烧！”

一张题为《给〈文汇报〉开的诊断书》的大字报，署名“赤脚医生”。

一个小伙子在高声朗读。一边读，人群中一边发出哄笑声：

给《文汇报》开的诊断书

《文汇报》负责人：

读贵报3月25日奇闻，真为你的身体担心，让我给你检查一下吧：哦，原来发了高烧，发烧引起神经错乱。建议赶紧治疗，否则亿万人民不饶。治疗方法：

一、把你们的意图写到题目里去，大张旗鼓地讲嘛！古云：人逢喜事精神爽，死到临头便发狂。可以再发表令人一目了然的文章。那时

人们的眼睛就会闪光——红光。同时你们的眼睛也会闪光——绿光。
这样会收效如神。除不如仙人之外，自然病除。以为上策。

二、停刊万年吧。大为遗憾，不能除根，引为下策也。

说得对，吃我的药；说得不对，分文不取。见笑，见笑。

赤脚医生

丙辰清明

针对中央取消清明扫墓的通知，有人用诗痛斥姚文元：

谁说清明是四旧？

谁说清明习惯臭？

年年奠祭我先烈，

今发禁令何理由？

广州半导体材料厂青年电工庄辛辛从羊城写信给《人民日报》编辑部：

我们的呼声

支持邓小平！打倒张春桥！

支持邓小平！打倒姚文元！

支持邓小平！打倒江青！

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革命人民心中！

据统计，从3月19日北京朝阳区牛坊小学的红小兵在纪念碑前献上第一个花圈，至4月4日深夜，共有1400多个单位献上了2073个花圈！

银花簇拥在纪念碑四周，诗如潮，歌似海。



4月4日,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中发生争执殴斗,公安局也有很多人受伤,事态严重起来。

4月4日的南京,虽然是星期天,但怕出事,南京市各单位都不放假。即使如此,去雨花台的人数仍然有7、8万之多。

第1389回：政治局，忙开会紧急研究 做决定，要连夜撤走花圈

1976年4月4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在紧张的气氛中召开会议，华国锋主持。往日，他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不大开腔。眼下，他不能不明确表态。

以下是4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抄自毛远新的记录本，文中的错别字是毛远新记录中原有的：

华：（国锋）今天研究一下天安门的情况。

很严重，很恶毒的，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煽动群众，打架。

吴德：在纪念碑前送花圈的2073个，单位1400多个单位次，有的不写单位，有的冒充某单位，3号507个单位送800多个，4号420个单位送450个，大的有6米直径，一部分写人民烈士的，一部分写总理。

3号有20万人，4号有7、8万人，最多的是七机部、科学院，其次是四机部、铁道部、外贸部。

北京市：广播器材厂（761），曙光电机厂、青云仪器厂。

重型电机厂，送了个钢焊的花圈。送的比较多的单位，都是问题比较多的单位。

多数人是出于怀念总理，有的是学校到那里去宣誓，批邓、教育干部。

4月2日就开始有恶毒的，有的煽动、讲演，反动的实质很清楚。

诗词、悼词、小字报，有48起是恶毒攻击主席、中央的。

敌人利用这件事，性质和南京是一样的。

采取的措施：

1. 当场取证、拍照。向群众说这是反动的。结果有的公安人员被打。

2. 看准了是反动的，有人盯着，离开人群以后再抓，拘留了10

个人。

拂晓前清理一次，把花圈取走。

看热闹的人很多，也还有坏人带着一帮打架的人也来送花圈。

基层工作。主要是把中央的电话通知发了下去，今天明显减少了，向群众说明是坏人利用群众的心情，攻击主席、中央、破坏批邓大方向，群众还是听的，很多人明白以后说不能去上阶级敌人的当，很多单位把花圈折了，大多数群众是拥护中央通知的，知道所谓“总理遗嘱”是敌人造的谣，广大工人说不能上敌人的当。

投入了5000民兵，3000公安人员，都着便衣，以民兵的身份出现，做了大量保卫、劝说工作。

对外部（地）进入北京的火车车辆，有各种大标语的都在丰台刷掉。

看来这次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

邓小平从（19）74年——（19）75年他作了大量的与论准备，什么批林批孔是批周公，什么反经验主义是揪总理，并造了大量舆论说某某人要夺总理的权，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准备形成的。

明显地是拿死人压活人，是党内有走资派把矛头直接指向主席的。

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

文化大革命以来没有这次这样的逆流。过去是都是说想念毛主席，这次根本不提主席，敌人比过去更猖狂。

华国峰：这次有个迷惑人的借口是《文汇报》的3月6日、24日来骗人，说是《文汇报》实际上是攻击中央的。

这次利用清明节跳出来搞的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要追查谣言，深入进行批判。

.....

吴德汇报完情况，王洪文问他：“你认为是什么性质的活动？”

吴德说：“肯定有一小撮在背后挑动，但是目前我们还缺乏证据。”

华国锋连声说：“是反革命在捣乱，是邓小平在背后操纵。”

这时，姚文元的秘书匆匆进来，递给姚文元一张纸条，这是《人民

日报》的负责人鲁瑛给姚文元送来的。姚文元看了一下，马上就说话了：

“天安门事件，究竟是什么性质？我来念一份大字报。这是刚刚在纪念碑前贴出来的，许多人围在那里看。《人民日报》记者也在现场，抄了下来，打电话传录，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情况。标题叫《大事记》……”

姚文元念起了《大事记》，正是当晚 21 时在广场纪念碑东南角被朗诵的那份《大事记》：

一、74 年 1 月，江青扭转批林批孔运动的大方向，企图把斗争矛头对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二、74 年 2 月，江青背着中央接见外国传记记者，污蔑中央领导同志，污蔑文化大革命，并企图在四届人大争当总理。

三、75 年 1 月，主席识破了江青的野心，召开了四届人大，邓小平同志重新回到了中央工作，取得了斗争的初步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

四、75 年 7 月，主席严厉地批评了江青，停止其在中央的工作，周总理养病期间，中央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持，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国民心大快。

1976 年 4 月 4 日

江青听罢，拍案而起，像扫机关枪似的，冲着华国锋说道：

“这种大字报，贴在天安门，恶毒攻击中央首长，你管不管？中央的人身安全还有没有保证？是谁把党内的机密泄露出去，要不要查？写大字报的人，要不要抓？天安门广场闹得这个样子，你这个代总理、公安部部长，还管不管？如果你不管，我去找主席去！”

她从姚文元手里抢过那张《大事记》，站起来要走。

华国锋连忙请她坐下来。

江青气鼓鼓地坐下，朝毛远新说道：“远新，你好好记一记，回去向主席汇报。尤其是华代总理的话，你一句一句都要记清楚！”

华国锋一脸尴尬地坐着。

这时，张春桥不紧不慢地说道：“天安门闹事，使我想起了 20 年前的匈牙利，想起了那个纳吉。纳吉原先是匈牙利的部长会议主席，给

赶下了台。他在 1956 年就煽动闹事，发动叛乱，当上总理。我看，邓小平就是今天的纳吉，中国的纳吉！”

王洪文马上附和道：“春桥同志说得对。天安门闹事的总后台，就是邓小平！刚才文元同志念的大字报上，那些家伙不是说，‘中央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持，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国锋同志，政治局该对天安门闹事采取强硬措施了……”

江青质问吴德：“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为什么允许反革命讲演？”

吴德说：“我在这里开会，怎么会知道。”

江青说：“这个反革命分子要马上抓起来，这样的人不抓有右倾。”她指着吴德说：“你中邓小平的毒太深了。”

吴德站起来检讨了几句，说思想上没有重视，有些麻痹。然后，就出去给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打电话，问他是怎么回事？吴忠在电话中说的确有人演讲骂江青。吴德问这个人在哪里演讲？吴忠说就在纪念碑前，现在围听的群众很多，不好处理，待群众散开后能抓人时再抓。

吴德回来向政治局汇报了吴忠的意见，但没有获得同意，而是要求立即抓人。

吴德和倪志福赶紧出去传达布置。不久，吴忠打来电话说，那个演讲的人已经抓起来了。

此时已过午夜零时，江青说：“现在已经过了 12 点了，现在已是 4 月 5 日了。清明节已经过去，清明节的悼念活动应该结束了，你们完全有理由向群众解释清楚。现在就动手，天亮前必须把花圈全部送八宝山。”

吴德小心翼翼的说：“按天安门广场花圈的数量，需要调 200 辆大卡车，现在工人下班了，我们找不到足够的运输工具。”

江青说：“我不管，你们想办法。”

会议沉默了一段时间。

华国锋说：“老吴，你考虑考虑，动员力量，今天晚上解决了吧！”

没有人表示反对。

姚文元在 4 月 4 日——清明节那天的日记中写道：

今日高潮仍是国家机关、七机部、科学院等居多。有的花圈奇形

怪状，挂在吊灯上。

海燕在汹涌的波涛上迎风飞翔，共产主义战士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反革命活动会锻炼出一批革命派，这也是历史的辩证法——太顺利了不好。

晚政治局开会，我接到人民日报记者电话，告广场上有人进行反革命演说，直接点了江青的名，内容极坏，无人制止。我立即向政治局报告，激起了多数同志的愤慨和警觉，决定立即逮捕这两个反革命，清除花圈，派民兵、部队戒严、封锁道路，明天一律不准再送花圈。吴德和倪志福同志紧张地走了。不久，即听到这个坏蛋被捉住的消息。无产阶级专政总得有一点“专”的样子呵！太软了！

北京市还是努力做工作的。只是谣言一时难以全部肃清。问题还在部队中。

前两个月批邓中我曾说：如果下次再来比这次更厉害时，人们都当作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但果然如此！从全国看，太原、西安、沈阳均有发现。凡不批邓的都在保周的口号下集合起来了。这是一次阶级阵线的鲜明划分。

4月5日凌晨，北京卫戍区和汽车运输公司出动200辆汽车将广场的花圈运往八宝山，小部分放在中山公园。在清理广场时，有57名在场群众遭审查，其中7人因抄诗或“可疑”而被捕。这天夜晚，在广场上抓了388人。

4月5日一早，天安门广场，昨天花圈的海洋没有了，广场上一片狼籍。

4月5日，毛远新就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4日讨论天安门事件的情况，给毛泽东写了报告。这一报告经毛泽东圈阅。文中错别字是原件中原有的：

主席：

4月4日晚，政治局分析了当前北京的情况：

几天来，向天安门前烈士纪念碑送了两千多个花圈，大的有六米。去的人每天有几万人，3日达二十万人次。最多的单位是七机部、科学院，其次是四机部、铁道部、外贸部，北京有的工厂在动员后仍送去钢铁焊成的花圈。多数是悼念总理，少部分有隐射攻击中央的，个别的

非常恶毒的。4月2日起，有不少人当场致悼词，读诗词，有的贴小字报、标语、传单。其中不少内容是以悼念总理为名，分裂、攻击中央，有的直接攻击毛主席，还有人上去发表煽动性演说，宣读十分反动的传单，语言极为恶毒，下面有人组织鼓掌，要求再读一遍。有的人上去读反动材料，周围有一帮打手，谁去干涉就挨打。4月4日晚有人公开读一个传单，说邓小平上台是决定性胜利，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人搞的，某某人反总理，某某人想夺权等等，大群人围着听，（还有外国人）有人帮助照明，他连续五遍，完全是攻击中央，攻击主席的。

北京市委组织民兵、公安人员在现场，这几天已发生五十来起反动的案件，民兵一起去干涉，结果被挨打，已打伤很多人，公安派出所也要冲击，天安门的卫兵干涉一个人爬上旗杆发表演说，被打伤。这样大量的在天安门前集中那么多群众场合下，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

很显然，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不仅北京，全国不少地方都有。这是去年以来大量散布反革命谣言，造反革命与论准备的继续和发展，去年邓小平说批林批孔就是批总理，批经验主义就是揪总理（上海马老的揭发）。他带头散布了大量谣言，社会上吹得更凶，去年一直未认真追查和辟谣。今年邓小平的名声不好，就抬出总理在群众中作文章，攻击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反总理，利用死人压话人，利用总理在群众中的威望来为邓小平效劳，编造大量所谓“遗嘱”、“诗词”、“谈话”等等东西美化邓小平，于是谁要批邓，谁就是反总理了。这种看法颇有些煽动性。

这次敌人活动如此猖狂，不足为怪，主席的重要指示，打中了资产阶级（主要是党内资产阶级）的要害，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当然送花圈的人多数是受人挑拨煽动，出于对总理的怀念，有的工厂（石景山）工人可以把“遗嘱”全文背下来，还边读边流眼泪，是上当受骗的。但是在清明节（这也是孔老二的一套）这样大规模的集中搞，显然有人在策划。

政治局的同志分析，阶级敌人猖狂跳出来是件好事，他们只能靠谣言、靠死人来煽动不明真相的人，说明他们日子实在不好过，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也要提高警惕，防止挑起更大的事端，这次看出存

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因此也要防止万一，采取一些必要措施。

在北京，第一，继续发动各级党组织作好群众的工作，揭穿谣言，教育群众不要上当。中央准备转发公安部一个报告，在全国揭露敌人的阴谋，并发动群众追查政治谣言，在“五一”前搞一次大的反击。（正起草）

第二，首都工人民兵组织好，（目前已准备了五万人）向广大群众作宣传、教育，打击暴露的反革命活动。公安机关密切配合破案。（目前已抓了十几个在天安门搞反革命宣传的人）

第三，卫戍部队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向干部战士讲清当前斗争的实质，防止敌人挑起更大事端。特别是八三四一部队，应向全体战士传达主席的重要指示，讲清当前天安门前是什么事，不能只看成是群众悼念总理的活动，而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否则一旦有事，战士可能同情闹事的人，甚至出现匈牙利事件那样，部队不愿意向反革命进攻。

第四，北京军区要稳定，指定一定的机动部队，以防万一。

政治局决定，鉴于纪念碑前反革命活动越来越猖狂，从今晚（4号）开始，清理花圈和标语，估计会有人捣乱，已调了三千民兵在广场周围，卫戍区三个营（尽量不用部队出面），明天开始，布置民兵围绕纪念碑，劝说阻止群众去送花圈和集会，不再允许进入这个范围。

截止目前（5日晨五时）在五万民兵和三千公安人员的包围下，抓住了当众宣传反革命传单的人及其保镖。把周围保护那个反革命分子一百多人集中起来，进行教育，肃清流毒，其中二十多人身上都有反革命的传单、材料。群众基本走散，现场正在清理，花圈都送到八宝山。进行得还顺利。

估计下一步会出现两个可能：一是暂时地平息下去；一是挑起新的事端，敌人会利用“中央有人反总理，连送花圈悼念活动都不许”的借口去煽动，以致导至战斗。

这样安排如有不当，请主席指示。

4月5日晨

毛泽东在报告的日期上边让张玉凤批了：“退毛远新”

第1390回：冲会堂，广场上人潮汹涌 调民兵，北京市“四五事件”

1976年4月5日凌晨5时10分，王洪文来到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旁的一个院子里的小楼，这里是广场联合指挥部所在地。北京市公安局的负责人和“首都民兵指挥部”副总指挥张世忠、马小六都在这里。

5时15分，通往广场的路口已有人把守，不准送花圈的群众进入，还设了劝阻站。人民英雄纪念碑由军队、警察、民兵组成的封锁线层层围住。但是，人们继续从四面八方向广场拥来。

6时许，北京市172中30名学生，在群众的支持下，冲破了封锁线，把花圈送到了纪念碑上。

7时30分左右，一名军人发表反对群众送花圈的讲话，受到群众斥责。过了一会儿，一个身穿蓝制服的人攻击周恩来，引发众怒。两个“便衣”上前解围被群众认出市公安局的便衣，其中一人向人民大会堂方向逃去，群众跟着涌向大会堂东门外，一时间集聚了10万之众！东西长安街上还有许多群众向广场进发。

联合指挥部开始往大会堂东门增调民兵、警察和部队。8时，一辆广播车在向广场群众作宣传：

“清明节已过，悼念活动已结束，请革命同志离开天安门广场，要警惕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手拿广播喇叭的是个警察。有的群众骂他，他以牙还牙。这时一些群众忽地围了上去，夺过他的喇叭，并把广播车掀翻了。

9时，一个持有清华大学机械系听课证的人说：“你们这不是胡闹吗？人民万岁的口号不对，人民也分阶级。”“这样悼念不好。人一死，送花圈有什么用？周总理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

此言一出，群情忿怒，几名群众一拥而上，将其扭送至中山公园派出所。同时，几十万人在大会堂门口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

号，山呼海啸。大会堂东门外人山人海，水泄不通。警卫大会堂的战士同欲冲进大会堂的人们发生了冲突。有人指着解放军战士质问：

“你热爱不热爱周总理？不热爱回家种地去！”

战士眼里含着泪，有口难辩，有苦难言。



吴鹏 摄

中午，人群包围了广场的联合指挥部所在的小灰楼，群众派出4名代表向指挥部交涉，提出归还花圈、释放被捕群众、保障群众有悼念总理的权利三项要求，谈判无结果。

人群冲进了小灰楼。联合指挥部冒起了浓烟。当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委员匆匆爬上人民大会堂楼顶，俯瞰事态，警民之间已互伤一片。

当天，召开政治局会议。叫邓小平也来出席。张春桥指着天安门广场对邓小平说：“你看看天安门前的情况，人家要推你出来当纳吉。”

邓小平一言不发，也没有与其他人交谈。

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列席政治局会议，他汇报说：

“这次看：有组织的两百来人，有四、五千人是凑在一起的。今天提出一要花圈二要战友。说卫戍区抓了人，只要碰见战士民兵、公安人员就打。打伤168，重伤15人（4个战士、11个公安人员）。

砸了两辆，烧了四辆汽车。

‘新造反委员会’放火烧房子，把自行车砸了浇上汽油烧。

利用战士打不还手，伤了些人，下午决定只要歹徒动手打人，民兵可以还手，并配备了短木棍，敌人的气焰马上就下来了。在市委广播用天安门广场的喇叭以后，多数看热闹的群众就散开了，一万民兵带着短木棍包围上去，分批清理后，今天抓了38个人。以前三天捉了39个，大部分都有证据。贴写反革命小字报演说。”

他还说：“今天这个疯狂性看得更清了，杀人、放火，无所不为，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

“整个活动来看，早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

“只要允许挨打还手，民兵公安完全可以对付。”

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汇报说：“准备三万民兵在两个公园。”

“市区集结的9个营。”

“我估计不足，准备也仓促了，上午搞得不好，以为他想喘息一下。历史博物馆的楼、指挥部、营部，没想到他们真敢烧，从一楼点火要把人烧死。”

开会中，毛远新拿着毛泽东的几个批示的条子传达：“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变了。”

王洪文听了毛泽东的指示后提出，要调10万民兵。

此时已近傍晚，吴德说：“北京的民兵没有上海训练得好。现在工人已经下班回家了，调不来这么多。”

王洪文问：“能调多少？”

北京市负责民兵工作的书记倪志福说：“最多也就是两三万人吧！”

吴德说：“广场上这么多人，调两三万民兵进去解决不了问题。广场上的人比能调动的民兵多得多，搞不好广场情况会更加混乱。”

张春桥说：“用广播的办法动员群众离开现场，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

江青用手指着吴德说：“你是北京市革命会主任，你怕什么群众？应由你出面讲话，动员群众离开，把你的讲话录音，放录音带。”

华国锋、陈锡联、汪东兴等也同意让吴德出面发表广播讲话。

会议通过了吴德的广播讲话稿，并决定：5日下午18时广播，20时出动民兵。

华国锋说：“今天这件事开始估计不足，暴露了很多漏洞，总结经验教训。

敌人今天充分进行了暴露，烧了汽车、房子，打了人，进行反革命的宣传。

这是蓄谋已久的，全国搞的。

这几天是在大造舆论，煽动，下一步真正搞什么，是不是在广场不一定，明天指挥要沉着要看准，轻易不动，一出就要取胜。

测重分工，民兵和公安分工。

注意摸索线索，找司令部。

今天的事情是否要向全国发个通报。”

会议决定：

1、调动民兵解决问题，民兵可拿起木棍，由倪志福同志指挥。
(原定要调十万，实际调了三万多)并指定晚八时动手。

2、先用广播的办法，动员群众离开广场，开始拟以广播电台的名义广播。后来政治局决定，由吴德直接发表广播讲话。

会未散，吴德和倪志福就赶到卫戍区同吴忠商量出动民兵的事。

吴忠听了传达后说：“天安门广场上群众那么多，民兵去一定会出问题，可能会发生流血事件，将来谁负这个责任？”

吴德说：“政治局已决定晚8时出动民兵，怎么办？”

吴忠说：“绝对不能8点出动，只有等群众走得差不多了，再出动民兵清场，否则肯定会出现问题。”

3人商定：“吴德和倪志福在卫戍区，吴忠去历史博物馆现场指挥，由他把握出动民兵的时机。”

4月5日，中共中央通知：

1976.04.05；中发[1976]8号

毛主席已圈阅。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中央决定，将中发[1976]4、5号文件扩大传达范围，基层单位传达到党支部书记，党、政、军机关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传达学习情

况,请你们综合报告中央。

傍晚18时30分,天安门广场上的华灯未像往日那样开启。吴德的广播讲话开始在广场上空响起:

同志们!

近几年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

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大好形势。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争取更大的胜利!

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广场上的群众陆续散去。

讲话稿是当天政治局会议决定,不是吴德的手笔。

晚上20时,华国锋、陈锡联不停地打电话找吴德,多次催问:“为什么还不出动民兵?”此时,他们都在人民大会堂里观察着天安门广场的局势。

吴德与吴忠在电话中商量怎么办,吴忠还是坚持说:“广场上有几万人,现在不能出动。”

这时,政治局找吴德,继而又找吴忠,要求汇报情况。吴德等商量好几条不能马上出动民兵的理由:

第一,工人刚刚下班,都是从家里找出来的,集合迟了。

第二,事先未通知交通警(东西长安街规定不许通过大卡车),民兵沿途受到阻拦,影响了集合时间。

第三,先到的都是商业系统的民兵,女民兵多,她们执行这种任务有困难。

华国锋等人听了汇报后，很不满意，说：“怎么搞的？”

其实，那些理由都是为了找借口、拖时间而编出来的。当时，民兵早已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集合好了。毕竟面对的是如此众多手无寸铁的群众，此事肯定是要载入史册的。作为当事人，还要面对自己良心的拷问，一旦做错，在历史上是永远也抹不掉的。

晚上 22 时 30 分，华国锋、陈锡联又打电话催问，陈锡联更为关心，他是北京军区的司令员，首都的安全问题最为重要。吴德再打电话问吴忠：“民兵可否出动了？”

晚 23 时，广场上的群众大都散去，剩下的人大概只有 1000 人左右了。吴忠打电话给吴德说：“现在集中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不肯离开的只有 200 多人了，可以出动清场了。”

广场上突然华灯齐放，大逮捕开始了。先由卫戍区的徒步部队把广场包围起来，万名工人民兵，手持木棍开始清场。来不及跑的人不时被打倒在地。叫骂声、喊叫声此起彼伏。很多人从广场上像拖死狗一样被抬到了路边的松树墙后面。有的人晕过去了，有的人头破了，有的人腿瘸了，不一会儿，他们被扔上汽车拉走了。天安门广场的水泥方砖上，可以看见留下的血迹……

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的孟连后来回忆说：

我正在纪念碑南侧抄诗，看见有人追打四散的群众，赶紧收起笔记本，绕到纪念碑北侧。只见北面也涌来好多人，我急忙跑下台阶，想冲出包围，但已来不及了，他们一边狂喊“回去！回去！”一边舞着棍棒，劈头盖脑打来。猛然一脚，我被踢倒在地，十多人围着我，连打带踢，直打得我头晕目眩，不能动弹。等到我慢慢清醒了一些，才感觉还有一个人压着我的腿，胳膊旁边躺着另一个人，不远处传来人们挨打的惨叫声。他们发现我有抄诗的本子，便把我连夜押到了监狱。

姚文元在 4 月 5 日的日记中写道：

今天经历了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我目睹了反革命暴徒在天安门广场的表演，并自始至终参加了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斗争。

下午二时，政治局紧急开会，人民（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赤裸裸的反革命煽动，反革命暴动事件，打了解放军，烧了汽车，打了民警，打了革命群众，并且冲到人民大会堂东门。一批人在记（纪）念碑进行反

革命煽动，号召成立反革命组织，以“悼念”总理为名猖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中央，提出要邓小平上台，喊“总理万岁！万万岁！”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阴谋越来越露骨。

今晨，我已把人民日报一份记者手写的情况在政治局会上报告并请远新同志报主席。其中提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野心家”搞的，邓小平主持工作是他们“决定性胜利”。听了这个情况，我提出此事已带有反革命政变性质，要立即采取措施，开短会，不要多议。当即决定：由吴德发表讲话，指出这是反革命性质事件，号召群众离开广场，然后立即组织民兵进行包围、分割后均（拘）留其骨干分子，予以有力打击。

三时散会，我先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外，看见了广场全景，四大批人拥来拥去，两堆火还在历史博物馆外燃烧。我即请政治局同志都上来看一看，在江西厅，大家都来了。这是触目惊心的反革命事件，一场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前奏。碑前核心部分有一批坏蛋始终不动，谁去反对就打谁，另有一伙人进行反革命演说，送花圈、贴传单。外面有好几万人，流来流去。再外面有一批骑脚踏车的人飞快地来回巡逻，看来是通风报信的。还有不少小汽车，有不少是部队的。不一会，解放军营房的小楼着火了，又一辆车着火了，火光熊熊，黑烟冲天。于是，看见楼上把被子、床单、衣服、书籍、纸张一批一批地从窗口掷了出来，掷到火中去烧。救火车无法接近。望远镜中，看见有一个家伙爬上纪念碑放了一个大花圈，用绳子把它围起来。政治局同志看到这一切，无不仇恨满腔，阶级斗争是这样尖锐，这已经是武装暴乱性质了！

大喇叭还不响，我们很急，一再查问。华国锋要求王洪文、张春桥、我留下来处理。我同意。终于，在六时二十五分，人民广场的大喇叭响了，吴德同志录音讲话反复讲反复播放。大喇叭一响，立即看见广场上的人大多数像潮水一样一批又一批向北退去，不到一小时，广场上人已大为减少，看热闹的走了，核心部分就越来越暴露在面前。

九点二十五分，民兵开始行动。

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无产阶级专政威力下迅速被击溃。带着棍子的民兵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广场，从南北两方面加以包围，敌人彻底瓦解了。

晚，政治局开会听汇报。战果辉煌。

抓住了二百多人，放了一些之外，还留下一百多人，突击审查。

强大的“革命暴力”“摧毁”了弱小的“反革命暴力”。

《人民日报》的内部刊物《情况汇编》在4月5日前后不到一星期的时间里，一连出了十几期。

《情况汇编》的印数很有限，可是，作用很大。姚文元曾说过：“这个小报，比几百万张报纸的作用还要大。”

为什么呢？因为《情况汇编》直送毛泽东。卧病之中的毛泽东，主要依靠《情况汇编》了解外面的情况。另外，《情况汇编》也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各委员。

4月4日，《情况汇编》上原本编入了一首来自天安门广场的《满江红·敬周试作》：

千古华土，脱蛹几只新苍蝇，嗡嗡叫。得宝成精，自鸣得意。伟人光辉形象在，岂容小虫来下蛆。激起我满腔怒火烧，拍案起。

志同者，团结紧，捍卫咱，周总理。拿起火与铁，准备决战。任凭熊黑掀恶浪，摆开架势对着干，揪出藏尾巴的恶狼，斗到底！

姚文元大笔一挥，斧去上半阙。再删去“捍卫咱，周总理”以及结尾句，只留下“志同者，团结紧，拿起火与铁，准备决战”。然后，姚文元加上批语：“这类反革命言论表明，幕后策划者是在言论之外，还想搞行动。”

4月5日，姚文元看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南面贴出的那首《扬眉剑出鞘》五言诗抄件后，把其中的“泪”字改成“血”字，变成了“洒血祭雄杰”。然后，又从抄来的许多诗里挑选了一首，加以删节，与那首五言诗连成：

欲悲闹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血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

我们信仰马列主义，
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
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
我们不怕抛头洒血，
四个现代化日，
我们一定设酒重祭。

姚文元把这首诗编入《情况汇编》，并亲笔加了这样的按语：

“所谓反对‘秦皇’，要真正的马列主义，完全同林彪反革命政变计划中的语言一样，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煽动。这伙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更加暴露了他们要在中国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4月4日《清样》刊载的一首题为《清明节呐喊》的诗写道：“……‘遥瞧’无罪？总理有瑕？桩桩件件，有目共察。追根寻源，海辽两家。名利熏心，欲立自家。……”姚文元在这首诗的后面加了一段话：“这除了上海之外，还把矛头指向辽宁，暴露了策划者的一部分意图。”

4月5日的《清样》写道：“有十来个小伙子，分别被闹事的人围打。据闹事的人说，其中两个是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一个是解放军。他们公开说了‘周总理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因此，他们头上都被打起了几个大血包，脸浮肿，流着血。许多人叫着：‘打死他！打死他！’”姚文元删去了“他们公开说了‘周总理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一句。

第1391回：邓小平，再次被撤销职务 华国锋，党内第一副主席

1976年4月6日，天安门广场戒严。

4月6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在京委员继续开会，确认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件是“反革命暴乱性质”，决定继续组织3万名工人民兵，在天安门广场附近集中待命，并派9个营的军队在京城随时机动。

凌晨3时，会议结束后，毛远新立即以书面报告形式，向毛泽东汇报：

主席：

5日夜到6日凌晨，政治局部分同志听取了北京市汇报，并研究下一步怎么办。

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同志首先介绍情况，要点如下：

今天(5日)敌人闹得这么凶，我们估计不足，上午很被动，下午才扭转过来。

从现场来看，有组织地活动的约有二百来人；跟着起哄或表示同情支持的有四千多人，其中有十几岁的学生、社会流氓；其他是看热闹和过路的人。

昨天晚上的行动，捉了十几个，清理了花圈，今天他们早上六点就来了，提出1.要花圈；2.要战友。碰见民兵、战士、公安人员就打，他们利用战士民兵打不还手的纪律，硬往死打。总计：

伤：一百六十八人，其中：民兵六十一人。

战士：五十二人，公安人员五十五人。

重伤：十五人，已送医院抢救。

烧毁汽车四台，砸毁汽车两台，并放火烧了历史博物馆南侧的小红楼(现场市委指挥部)。烧自行车一大堆。

查出一个地下“新造反委员会”。

下午决定只要歹徒动手打人，民兵、战士、公安人员可以还手，并

配备了短木棍，敌人的气焰马上就下来了。我们的士气大振。

市委通过天安门广场的大喇叭广播以后，多数看热闹的群众都很快走散，一万民兵和五个营的战士及三千公安人员带着木棍把闹事的人全部包围，分批清理，多数教育释放，捉了最坏的三十八个人，前天捉了三十九个，大部分有证据。目前天安门前恢复正常。

刘传新同志说：这次事件有个特别明显的特点，即他们的矛头非常集中，各类演说、诗词、悼词、小字报、传单、字条、口号都集中攻击毛主席、攻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么多讲话、文章，就是不批邓，（有的公开拥护邓小平）不提走资派，不正面提毛主席（攻击的提），手法多样，朗诵诗词的，发表演说的，教唱歌的什么都有，很多不是这些年青人写得出来的，内容既恶毒又隐晦，是白头发的人编写的。

再一个特点是法西斯，不顾后果，疯狂已极，杀人、放火无所不为，（不是抢救得快，很多人会被打死）连提出不同意见的看热闹的群众都往死里打，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在天安门广场光天化日下群魔乱舞，这是历史上没有的。

够立案侦察的有三百多起，反动的东西共三百四十多件。

此外，从整个行动来看，完全是早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今天这么凶猛的反扑，出我们的意外，原以为昨夜打击了他们，得喘息一下吧，谁知趁我们拂晓调整兵力部署的时机，突然组织反扑，我们过于天真了，看简单了。

今天得了教训，准备明后天新的反扑，已组织了三万民兵，九个营的战士，只要允许民兵挨打还手，不用战士也可以对付。

估计敌人会准备明暗两手，要防止他搞暗杀、破坏活动，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

卫戍区司令吴忠同志说：

现在已准备了三万多民兵，集中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待命，市区内集结九个营的部队随时机动：

历史博物馆两个营，

小红楼一个营，

中山公园一个营，

劳动人民文化宫一个营，

市委机关一个营，
人大会堂一个营，
西单招待所一个营，
市公安局一个营。

另外，还有三、四个师驻扎近郊待命。

今天我们估计不足，准备也差，上午没搞好，没有集中力量，在今天上午烧汽车时就应出动，但调动不灵了，指挥部没（被）包围，冲进去放了火，在一楼浇上汽油、点火。要把楼上的全烧死。楼上有民兵指挥部的马小六、张世忠同志（中央委员），有卫戍区两个副司令，市公安局两个副局长，他们从后门跳窗才跑出来，教训太大了。

另外，打不还手是指人民内部，那样的反革命，烧汽车、打人还不还手，吃亏了，他们连外国人也打，想制造事端，我们估计不足；暴露了我们工作中很多弱点。

今天最后取得了胜利，但教训太深了。

政治局的同志一起研究分析了一下：

不要以为事情完了，天安门前大表演是在造舆论，下一步是不是在广场不一定，防止他们声东击西，准备更大的事件的发生。因此民兵明天不要轻易出动，指挥要从全市着眼，不要只注意广场，遇事要沉着，看准了，不动则已，一动就要胜利。

民兵要进行思想教育，讲清这根本不是什么悼念总理，是反革命暴乱性质。不要把民兵手脚捆得太死，“小人却动手，老子也动手”。请吴德同志代表中央去慰问受伤的同志。

公安局要侧重侦察线索，找到地下司令部，只打击了表面这些年青人不行，要揪出司令部。

部队也要加强教育。防止敌人也拿起武器，包括枪枝。要准备几个方案，徒手、木棍、不行就动枪。

市委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工作，使全市人民知道天安门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明天人民日报要发社论，组织全市人民学习，批邓提高警惕，准备应付更大的斗争。

国锋同志最后归纳了大家的意见，并建议由北京市立即把这两天的情况、性质、主要罪行，采取措施写个材料，中央尽快通报全国，今天

的事必然会传到全国，敌人会进一步造谣，制造混乱，挑起更大的事端，各省市不了解情况有所准备是不行的。

大家认为尽快向全国通报很有必要，起草后送主席。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望告。

4月6日三时

毛泽东于11时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

下午，江青也来到毛泽东住地，当面向他报告处理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经过。张玉凤回忆：“她走到主席床前，对主席说：‘我来这以前，特意到天安门广场绕了一圈，一路上硝烟弥漫，一伙人烧房子，烧汽车。这是以死人压活人，邓小平是他们的总后台，我要控诉。我建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主席看了看她，没有说话。”

4月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的社论，坚持“批邓”，并再一次将毛泽东不久前说的话“翻案不得人心”，以黑体字标出。

4月6日，姚文元在日记中写道：

晚，政治局开会，毛主席听了民兵拿起武器非常高兴，说：“士气大振，好！好！好！”决定搞一文件，北京市委起草，通报全国。昨日紧急起草的一篇社论，今日已见报，毛主席批了，指出了对反革命政治谣言要严加追查，对反革命分子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4月7日上午8时5分至9时15分，毛泽东听了毛远新汇报，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以下是毛远新整理的谈话记录，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

（我汇报了4月5日、6日北京市的情况，谈到原来是打不还手，吃了亏，性质变了，应还手，并配备了木棍）

主席：谁人建议的？陈锡联？

（我：好像不是他，他是赞成的，他说战士只能挨打不行。政治局好几个同志一直在大会堂注视广场事态变化，和北京市委一起研究解决的办法，吴德去发表演说是大家的主意，动员一般群众离开，人少了才好动手。）

主席：好。

（我：目的是区分两类矛盾，一讲事件的性质，好人都离开了，当然

也有坏人聪明点的跑了，剩下人少了，我们的力量占优势再下手。)

主席：(点头)嗯。

(当我谈到政治局6日晚上研究的几件事，提到华国锋同志建议将北京发生的事通报全国，起草了北京市委的报告，中央发个文件——)

主席：公开发表。

(我：登报？)

主席：是。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现场报道(指了指桌上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三份)，吴德讲演等。

(我：市委报告不发了？)

主席：不发。并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上待三中全会审议批准。

(我：太好了！将来召开三中全会时补手续。)

主席：(点头)嗯！

(我：由中央作决议，也公开发表？)

主席：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

(我：好。上次会议，春桥同志当邓小平面说：你看看天安门前的情况，人家要推你出来当纳吉。)

主席：(点头)是的。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砸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用力挥手)

(我：应该赶出去了！我马上找国锋同志去。)

主席：小平不参加，你先约几个人谈一下，不要约苏振华。

(我把除邓、苏以外的政治局同志的名单列出，送主席看。)

主席：叶不找。

(我把叶剑英划掉。问：除这三人外，其他同志都参加？)

主席：好。华国锋任总理。

(我：和上面决议也一起登报。)

主席：对。

(我：我马上去通知国锋同志开会传达。)

主席：(挥手)快，谈完就来。

据毛远新2010年12月22日与阎长贵通电话时回忆说：“主席选

定华国锋做接班人,他还是希望张春桥做‘军师’,安心做副手,他让我向张春桥传一句话:‘遵义会议后我不就是做了十年的副手吗?’”其中“遵义会议”四个字毛远新怎么也听不清,毛泽东就用笔写了出来。另外,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和对邓小平的处理意见也都是毛泽东亲手写的。

关于4月7日参加政治局会议的人员,毛远新先是传达毛泽东的意见,说朱德、叶剑英、李先念、苏振华不必参加会议了;但其间毛远新出去了一趟,回来后又通知除苏振华外,其他人都到会。苏振华前几次的会议都参加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让他出席7日的政治局会议。于是,政治局会议直等到朱德、叶剑英、李先念都到达后才开始。

对于毛泽东“撤销邓小平一切职务”和“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的两项提议,与会人员都不说话。政治局当即拟定了文字稿。朱德戴上老花镜拿起文字稿看了一遍,一言未发。

在讨论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时,叶剑英不表态,朱德离开了会场。

在讨论开除邓小平党籍时,叶剑英起身说:“开除? 把我也一起开除吧!”说罢也离开了会场。李先念不表态。华国锋、陈锡联、吴德、纪登奎提出:“要请示毛主席。”

接着,汪东兴提出增补江青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张春桥、姚文元和吴桂贤表示赞同。江青表示:“坚决拥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我不当什么副主席,继续当批判邓小平的‘过河卒子’。”

此时,叶剑英、朱德已离开了会场,李先念不表态,华国锋、王洪文、陈锡联、吴德、纪登奎还是表示“要请示毛主席”。

毛远新立即将政治局决议的文稿拿去请毛泽东批示。毛泽东看了政治局的议案后,圈了华国锋为总理,并加上“第一副主席”,在江青名字上用方框圈了起来。他在政治局讨论纪要上,圈了叶剑英,批上:“是在指责我。”圈了李先念,批上:“还是给我面子。”圈了华、陈、吴、纪,批上:“意见相同,我还活着,留在党内。”

很快,毛远新回到大会堂,对政治局说:“毛主席已经批准了。”

4月7日上午,姚文元火急火燎地打电话给鲁瑛,说:“你和写天安门广场情况的记者,马上到人大会堂来,带着那几期刊登广场事件的

《情况汇编》来！”众人到齐后，姚文元立即布置新任务，说话中带着胜利的喜悦：“大好事！大好事！你们把反映天安门事件的几期情况，编成一篇公开报道。”

中午，姚文元把那些记者，领进了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见面。

姚文元介绍说：“他们就是搞天安门情况的。”

王洪文马上以副主席的身份，表彰道：“你们有功劳呀！小小的《情况汇编》，比几百万张的作用大！”

江青的话最多，不断地说：“我们胜利了，祝贺你们！”

江青还“亲切慰问”他们：“你们挨打了没有？”

王洪文高高地举起酒杯，对记者们高喊：“都干一杯！我们为胜利干杯！”

江青也一一敬酒，表示祝贺。

干毕，张春桥说：“那帮家伙写反动诗，就是要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他们的后台，就是邓纳吉。我们的报道，一定要注意把天安门事件与邓小平挂起钩来！”

一番喜气洋洋的祝贺完毕，记者们便紧锣密鼓地开始把近几期的《情况汇编》，改写成《现场报道》。

“要快！写好1页送1页回去排印。”姚文元说：“用我的警卫车去送稿！”

下午，毛远新去见毛泽东，请示当晚就要广播的两个决议的问题。毛泽东没有什么新的原则性的补充，只是对任命华国锋为总理的第一个决议作了重大补充。他说：“还要任党的一个副主席，并写在决议上。”

晚上，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宣读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即《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具体内容如下：

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

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中共中央

1976年4月7日

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中共中央

1976年4月7日

1小时后，4月7日晚8时，中央电台向全国广播了这两个决议。

第1392回：汪东兴，安排转移邓小平 为花圈，郑州有人被打死

在4月7日上午讨论毛泽东指示的政治局会上，江青等人谈到邓小平就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时，说邓小平曾坐着汽车到天安门广场亲自进行指挥。

江青和张春桥说：“要做好思想准备，可能有群众要去冲击邓小平，把邓小平抓起来。”

华国锋说：“应该去向邓小平本人问一下，以便核实。”

于是江青说：“让汪东兴去吧。”

汪东兴认为此事事关重大，需请示主席。他从人民大会堂出来，并没有去找邓小平谈话，而是车子一拐，进了近在咫尺的中南海。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可能有人会去冲击邓小平。毛泽东说：“不能再冲击，不能抓走。”并问汪东兴有没有办法？汪东兴建议，把邓小平转移到其他地方，可以转移到东交民巷那个房子去。毛泽东说：“可以。”

汪东兴立即布置，让中办警卫局马上准备东交民巷的房子。并交代滕和松立即做出一个警卫方案。交代完后，汪东兴让人通知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找邓小平谈话。同时，汪东兴通知警卫局的处长东方，让东方找个不显眼的车子，去把邓小平接到东交民巷。一切布置好后，汪东兴赶往东交民巷。在东交民巷，汪东兴将有关情况告诉了邓小平，问了他是否曾坐车到天安门进行指挥。邓小平说，他只有一次坐车去北京饭店理发，根本不是什么“指挥”。汪东兴对邓小平说：“可能有人要冲击你，不要出去，散步就在院子里。”之后，汪东兴又回到中南海，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当汪东兴赶回到人民大会堂时，已经是晚上了。这期间，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两个决议”，向毛泽东报告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江青等人文问汪东兴：和邓小平谈得如何，邓小平是不是坐车到天安门直接进行了指挥？汪东兴照实回答，邓小平只是去北京饭店理发。张春桥

让汪东兴写个谈话记录。汪东兴火了，说：“让你们去，下次你们自己去问吧。”汪东兴没有把将邓小平转移到东交民巷的事情告诉任何人。

姚文元在4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

清晨刚吃安眠药不久，又来电话把我叫去开会（引者注：指上面所引毛远新传达毛泽东在当天上午的谈话记录）。主席有重要指示。主席问了天安门的情况，当毛远新汇报到政治局准备发一内部通报时，毛主席说：“要公开发表，在报纸上发表。不是发北京市革委会的报道，而是发人民日报记者现场报道一、二、三和吴德同志讲话。并据此开除邓小平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上待三中全会批准。1. 首都；2. 天安门；3. 烧、打、砸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同时决定，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以上四件均登报。

这是在关键时刻，以果断行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举粉碎了反革命事件的首脑，将动员起千百万人民起来进行斗争，表现了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和决心。决不犯巴黎公社放松镇压反革命的错误。我热烈拥护主席的决定。会上决定，今晚八时广播。

我提出还有份刚发出的情况，是反革命分子在民兵强大威力下被缴械的报道，应补入。

由于人民日报是内部报道，把几份合成一份，时间极紧急，我立即把人民日报的鲁瑛、新华社的解力夫、广播局的邓岗、萧木四人找来，并组织了汽车，规定这些人一律不回去，成立指挥小组，每个单位准备了通讯联络工具，有事商量应由各单位负责人立即通过汽车送回。人民日报几个记者也来了。非常高兴，几夜没有睡了，眼睛都充满了血丝，但立即投入了写稿的战斗。

不久，毛远新向毛主席汇报回来了。主席还说：决定中要加上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当晚八时广播，还要译成外文。当讲到人民日报还有一篇时，主席说：对呵！正在看。同意要跟省、市、大军区同志打招呼。

稿子改、排、送，花了不少时间。终于在政治局修改通过了。报主席。在两个决议、一个讲话批回来以后，此件也批回来了。当时是六时四十分，离广播只有一个小时多了，还要先期录音，由于预先已准备好车子，广播局同志立即带了稿子离开，我说要坚决保证及时、准确地

完成任务。

七时开了一个北京各负责人会，只有十分钟，读了两个决议，要大家听广播。开完会，其他同志都走了，我决定留下来，听了广播再走。因为历次经验告诉我：这样匆忙地赶出来的东西必然在文字上会有误的，需及时校正。因而宣传单位的几个人也留了下来。一天身体已很疲乏了，但精神是十分振奋的。

一分钟、一分钟地等待着，八时来临。收音机响了！播音员宏亮的声音，十分有力地播出了四个文件，声音在大厅中如洪钟般震荡着。果然发现有个别错误，如“天安门”误写成“人民广场”等，立即进行校正。请同志们吃了饭，在这个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我们这个宣传的前线指挥部解散了。各自回本单位，艰巨的、新的战斗任务在等着大家。

我怀着一种战斗的喜悦回到家时，英、三三、莉莉一起极为高兴地拥上来，都说：“好得很！”“大快人心！”我很想多说几句，但这时又感到一种特别的疲劳，坐在沙发上不想多说了，一天吃了一餐，走了许多路，精神上的紧张……这时随着一个大战役的结束而迸发出来了。英劝我躺一会，我躺了一下吃了安眠药，但始终睡不着，又爬了起来。是的，不能骄傲，不能麻痹。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路还很长，还有许多政治、组织问题要处理。但是今天这一切，都以鲜明的阶级斗争的事实告诉我们：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一是有力的面向国内的亿万劳动人民和全世界的宣传，把反革命的阴谋煽动彻底揭穿；二是武装起群众，坚决拿起棍子（必要时机）；三是果断的组织措施。千百万人民懂得了阶级斗争的真象（相）和自己的任务，敢于善于拿起武器同反革命分子战斗，用铁拳狠狠打击反革命分子，同时中央机构及时地处理内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叛徒，从无产阶级利益出发，打破一切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框束缚（如要开会“选举”啊，要开“人大”通过啊……）

采取果断的清除坏人的组织措施，这是粉碎反革命政变的三项基本经验。

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胜利前进！毛主席万岁！

四期简报，均是我修改后发的，留此以作纪念。

姚文元把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265期等4期简报订在日记中，留作纪念。

4月8日，《人民日报》登载了两个决议。



1980年10月，张玉凤在呈报中央的一份材料中，记述了毛泽东当时的情况：

“四·五”前后，主席对外面的情况一点都不知道。他病重动不了，由我们工作人员搀扶着才能走几步，就得赶快坐下来或躺下，呼吸困难，连讲话的气力也没有。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连我们也不知道。

江青、毛远新为了控制当时的真实情况，曾给我们在主席身边工作的同志下了条规定：没事不要到外边去。毛远新还让汪东兴通知我们：现在外边很乱，最好不要到外边去，也不回家。让汪东兴在中南海找个房子，让我爱人和孩子临时到里边来见见就行了。这个安排我没

同意。这期间，我也没到外面去，对外面的事也是一无所知。

这些天，毛远新随时都来，他说：政治局的同志连夜开会，认为天安门发生的事件不是孤立的，是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的重演。还说邓纳吉这类词。政治局还决定将天安门前所有的花圈烧掉；还通过了吴德同志的那篇讲话稿。这一时期的决定都是政治局议定后，报告主席。主席也无力细问，只能点头，表示知道了。这段时期，中央作出的一系列错误决定，让一个已经长时间不能说话、不能吃饭、连呼吸都很困难，卧床不起、只有一息尚存的病人负责显然是不合适的。

1976年4月5日上午，八点左右，毛主席正重病卧床，值班医生和护士看护。这时，江青手拿一根木棍来到主席住处，问我：“主席醒了没有？我有事要同主席谈。”她走到主席床前，对主席说：“我来这以前，特意到天安门广场绕了一圈，一路上硝烟弥漫，一伙人烧房子，烧汽车，这是抬了死人压活人，邓小平是他们的总后台。我要控诉！我建议中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

主席睁开眼看了看她，没有说话。

江青又说：“政治局已经开了会，作了安排，你放心，过一会毛远新还要来向你报告政治局开会的详细情况。”

不多时，毛远新带着华国锋主持的政治局关于“四·五”的决议，让主席表态。主席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后，用红铅笔在另一张纸上写了：“同意，要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后来，人民日报发的《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真相》和社论，主席没有看过。据说，江青、张春桥在天安门“四·五”运动平息后，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庆祝酒会，华国锋同志亲自参加了。

1976年清明节前，郑州市中心二七纪念塔下也摆放了一些花圈。和北京天安门广场一样，表面上看是纪念周恩来总理的，但仔细看其中的一些挽词和贴在旁边的大字报，就知道是针对当时正在开展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矛头直指张春桥、江青。

4月4日清明节这天，郑州市肉类联合加工厂的一些人，到二七塔周围看了看，回厂就展开了讨论，他们听说北京、南京等地也有类似的情况，认为这是一股反革命逆流，决定要公开表达他们对这一事件的立场。

4月5日清晨，签着肉联厂几十人真实姓名的大字报《严正声明》，贴在二七纪念塔北边约200米的郑州市电信局营业大厅门前。

当天傍晚，新华社河南分社给肉联厂来电话，让签名写大字报的人派代表到分社去。代表们来到河南分社，一位记者接待了他们。他表情十分严肃，详细听取代表们的看法。最后，他告诉他们，他已将他们的大字报连同所有签名一字不漏地报告中央政治局。他还说，据他了解，这是全国第一张这样内容的政治声明。

谈话结束后，肉联厂的这些代表就在新华分社门口议论开了，大家说从这位记者的态度来看，他们没有作错。这时，有人建议：“去把那些有反动内容的花圈收了。”

说干就干，他们回到厂里，将一辆卡车开到二七广场，把一些他们认为有反动内容的花圈收到车上。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群众在围观，也有人问咋回事，肉联厂的人向群众宣传他们的看法。没有人阻拦。

花圈装上车，有人说“送到省委去，让省委表态”。他们就直接将花圈拉到了省委南院。值班员把办公室张副主任找来接待他们，张副主任不同意接受这些花圈。肉联厂的工人也不和他废话，就把车上的花圈卸下，一一摆放在省委南院正对大门的办公楼前，目的是让省委负责人都能看见。然后，他们又回到二七广场继续搬。这时候，突然开来几辆卡车，上面全是穿军装的军人，肉联厂的人下意识地背靠背聚在了一起，心中十分紧张。没想到这些当兵的，下车就热情的和他们打招呼，然后就和他们一起收花圈，打扫现场。原来，省委书记耿其昌打电话到北京，向纪登奎报告此事，纪登奎在电话里要耿其昌派部队协助肉联厂的人处理此事。

肉联厂的人回到工厂后，立即用电话或直接派人与和他们共同观点的单位联系，向他们通报了当晚的整个情况。最后签署了郑州肉联、郑州纺织机械厂、郑州交通运输公司、503厂等72个单位群众的《联合声明》，表达他们收花圈和对这一政治事件的立场，随即贴出。此时已是后半夜，他们几个单位的群众又走上街头，刷写表达这一立场的大标语和大字报，直到4月6日晨，才陆续回去休息。但还有少数人在继续刷写大标语。

但是，最后走的郑州市电信局职工焦春亮后来被十几个人围攻追

打，直至被活活打死在二七广场。听到这一消息后，各单位的群众又重新走上街头，声讨这一血腥暴行。这应该是“清明节事件”后唯一被打死的人。

郑州市革委会决定将焦春亮追认为烈士。这一年的夏天，郑州市公安机关按当时一贯的做法，将一批需要逮捕或交付审判的人员材料印成小本，发给群众讨论，征求意见。这本小册子中有郑州清明节事件中写匿名大字报的人员，同时，将当局侦讯后认定打死焦春亮的凶手刘敬列在这本小册子的第一位，加上“民愤极大”的语气，按当时的惯例，是要判死刑的。肉联厂的一些人已知道写匿名大字报的那些人和北京“清明节事件”的主要组织者、参与者一样，大多数是高干子女，也一样有很深厚的政治背景。他们觉得，在没有查清之前，就一判了之，这其中肯定有走资派的阴谋。于是，大家又署名写了一张大字报，呼吁“刀下留人”，并揭露省走资派企图“杀人灭口”的阴谋，大字报贴在市百货大楼门口。贴出去的第二天，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到肉联厂和写大字报的人员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此后，刘敬等人的判决就被搁置下来。直至后来中央为“清明节事件”平反，他们出狱，打死人的刘敬等人又成了“四·五”英雄。也是在“清明节事件”平反后，郑州市委取消了焦春亮的烈士称号。当时参与反击这一事件的一些人在以后的“揭批查”运动中，也因此而获“反周”的罪状，在监狱和学习班里遭到了清算。

1976年4月7日，湖北、武汉的省、市革委会群众代表正在一治开会，当他们从广播中听到“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撤销邓小平内外一切职务”的两个决议后，一片欢呼，紧急开会研究如何乘此东风促省委转弯子。曹承义则开了多辆广播车连夜到武汉三镇广播这激动人心的消息。广播车高音喇叭高呼：

“坚决拥护中央两个决议，拥护中央正确处理天安门反革命事件！”

“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紧跟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打倒邓小平，消灭还乡团！”

“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转好弯，快转弯，诚诚恳恳作检讨！”

随后，曹承义又带人把大标语刷遍武汉三镇。

4月8日，听说湖北省委上午要召开电话会议的消息，胡厚民说要到省委，大家都跟着去了。到了省委门口，大门洞开，哨兵也不拦阻，因为一辆满载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的卡车正冲了进去，全部是武重“工总”的队员。胡厚民他们紧随其后进入省委二楼会议室。赵辛初、赵修、韩宁夫等书记们正在开会，工人们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去就拉赵辛初等人，待到要拉宋侃夫时，吴炎金挡在前面说：“不关他的事。”将他留了下来。

吴炎金为什么要保宋侃夫呢？原来批林批孔运动时，胡厚民和吴炎金曾去过宋侃夫家，他们谈得非常好，宋侃夫对造反派并无怨言，长期靠边站的他 also 不存在任何整造反派的问题。他虽参加省委开会，可他无职无权，把他抓去于事无补。

工人们带走省委第一书记赵辛初和赵修、韩宁夫，并临时决定在汉口闹市区武胜路新华书店门前开群众大会，请他们3人分别在会上表态。

从武昌水果湖到汉口武胜路的途中，赵辛初等人内急，一时无法找到厕所，胡厚民他们就让工人看着赵辛初他们在僻静处小便。当他们一行人到了武胜路新华书店后，工人们扶着赵辛初等省委领导，从软软的竹梯爬上大会主席台。大会由吴炎金主持，赵辛初、赵修、韩宁夫分别在大会上讲了话，都表态拥护党中央两个决议，表示坚决打倒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转好弯子，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朱鸿霞、胡厚民也在大会上讲了话。参加大会的群众非常多。这一次活动又通了天，

中央很快打来电话：“抓走赵辛初等领导同志是错误的，应赶紧送回去。”此时，工人们已将赵辛初、赵修、韩宁夫等省委领导安全地护送回去了。

省委领导人很快与胡厚民他们达成了一些共识：一、省委是积极转弯子的，坚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二、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造反派，“滚”下去的全部请回来。三、“两清一批”犯了扩大化错误。胡厚民他们最初认为是方向、路线错误，是右倾翻案、

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他们在涉及造反派头头入党、提干、补台的问题上意见未能统一，在湖北省委是否紧跟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问题上各执己见，其中省委书记韩宁夫对立情绪比较严重。

街上的大标语依然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的，省革委会副主任朱鸿霞就在通往长江大桥的龟山山坡上用红油漆写了“打倒邓小平”五个大字，署名朱鸿霞。

第1393回：叶帅府，老干部来往频频 保定乱，陨石雨引发感慨

4月8日清晨，上海市中心人民广场的上空升起了一面白色的旗帜，上面写着“沉痛悼念恩来总理”八个大字，还缝着周恩来遗像。升旗者是徐汇区服务公司建新机修厂工人黄水生。黄水生将旗子在广场中心的一个旗杆升上去后没有离去，就站在原地等着人来抓他。闻讯赶去的民兵将他拷上手铐。以后他被投入监狱，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2月16日，方被释放。

4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现场报道《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四月五日，这种反革命活动达到了高潮。八点左右，一辆市公安局的广播宣传车被砸，车子被推翻在地，车身和喇叭都被砸扁了……

十一时五分，许多人又涌向天安门广场东边的历史博物馆。博物馆前一个女同志出来劝阻，马上被拉去打了一顿。这时，有一帮坏人围着广场东南角，钟楼旁边的一座解放军营房，砸了门，占了房子。几个理着平头的家伙，拿着半导体话筒，轮着用嘶哑了的声音煽动。将近十二点，有的闹事的人还宣布成立什么“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一个戴眼镜的坏人扬言限公安局十分钟答复，不答应条件就砸烂公安部门。

.....

请看，这伙反革命分子是怎样以极其腐朽没落的反动语言，含沙射影地、恶毒地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同志的：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泪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九时半，数万首都工人民兵接到了北京市委员会的命令后，在人民警察和警卫战士的配合下，采取了果断措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英雄的首都民兵士气大振，雄赳赳、气昂昂地排着队伍，开进天安门广场，进行有力的反击。他们把仍在纪念碑一带作案、闹事的坏蛋，

团团围住，将其中现行犯和重大嫌疑分子，拘留进行审查。这一小撮张牙舞爪的坏人，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不堪一击，一个个如丧家之犬，蹲在地上直打哆嗦；有的慌忙把身上的匕首、三角刀和抄有反动诗词的本本交出来；几个拔出匕首妄图行凶顽抗的罪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姚文元显得异常兴奋，他在4月8日的日记中写到：

各地形势多数均好。反革命仍有破坏，这也在预料之中。邓小平一动，地、富、反、坏、右即发出嚎叫，绝望者狂跳，没有什么奇怪，镇压就是了。问题还在党内。这次事件，我看有三种因素作用：（1）党内走资派（包括要保卫资产阶级法权的高干子弟）；（2）社会渣滓，从刑事犯，到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到反动文人；（3）还有特务（国民党，苏修）。其中党内走资派是台柱，主心骨，凝结点。故征途尚长。

此次天下已定，作词一首，总括以记之，以待下次斗争参考对比。

水调歌头·天安门广场

巍巍雄碑立，堂堂大道通。

万千烈士鲜血，化作广场宏。

忽见群魔乱舞，阴火嚎风四起，恶鬼逞狂凶。

工农兵齐奋起，铁拳镇爬虫。

霹雳震，怒涛涌，扫黑风。

誓除阴暗丑类，旌旗耀碧空。

万里征程尚远，白发红颜携手，文武追敌踪。

回首火烧处，红楼倍鲜红。

4月8日，北京举行超过百万人的“庆祝粉碎四五反革命”游行。同日，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在信中，他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表示：第一，拥护华国锋担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第二，对继续保留他的党籍表示感谢。

4月12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收到署名为“一名现场的工人民兵”的来信，信封正面写着“人民日报总编辑收”，背面写的是“戈培尔编辑收”，信封里装的是4月8日《人民日报》第1版和第2版刊登的《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这份《人民日报》刊头，“人民”两字被打上了黑叉，加上“造谣”两字，成了《造谣日报》。接着，在报

纸的空白处,这位工人民兵写了很长的批语,其中几句如下:

“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成为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

“明明是十来个青年进行挑衅攻击周总理,并得到大会堂里的人保护,你们说是冲大会堂打人了,谁人不知是江家小朝廷的?”

“你们演的这场‘国会纵火案’实在不高明,一篇混淆视听的假报导就能骗得了人民群众吗?从今日改为:法西斯党机关报。”

“打倒野心阴谋家江、张、姚!!!”

4月13日,毛泽东对选印的天安门事件中诗文原件批示:“天下已定。此件杂乱无章,近于画蛇添足,不宜发表。”

4月13日,毛远新给毛泽东的报告上说“十二晚政治局会议研究了八件事,其中第三件事是北京市委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报告准备转发全国,”“报告要进一步修改充实,除介绍北京的经验外,要把这次事件的罪证选择一些影印附上,使全国干部更清楚天安门事件的性质。”

毛泽东划了横线并批语:“第三条不好。此计不妥。”

4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说邓小平是“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社论说:

第一,它进一步说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

第二,它充分说明反革命分子确实有,而且他们的反革命活动是同党内走资派搞复辟倒退的阴谋紧密相联的。

第三,它又一次说明一切反革命都是短命的,没有什么了不起;广大人民群众是要革命的,绝不会容忍他们的反革命活动。

不过,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老百姓已不像以前那样好管了。有人特地在大楼的墙角转弯处贴大标语,比如在墙尾写上“邓小平打不倒”,于是,有人叫好,也有去报告公安局,但警察来了转90度到墙那面,发现标语还有后半句:“造反战士非好汉”。这种合法的恶作剧简直是防不胜防,而且无可奈何。

4月18日,张春桥在写信给儿子张旗(小名毛弟)的信中写道:

亲爱的毛弟:

这个月,我过得相当紧张。从南京到天安门广场,到处闹。四月

五日，我到大会堂，如同亲眼看到匈牙利事件一样。从望远镜里，看得很清楚。当着邓小平的面，我骂了他是纳吉，他态度恶劣，但没有话讲，只能点头。我有幸看到这个纳吉的丑恶末日，出了一点气。（这一段，别人不知道，你也不要吹出去）现在天下已定，正在扩大胜利。我感到上海现在镇压反革命劲头不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你到农场，要提高警惕。阶级斗争还是很复杂的，敌人不会认输。寄来的信，都看了。退给你。二炮一封，我留下了。内容我大体知道，近来接到不少类似的信。祝你好。我身体尚好，勿念。

爸爸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八日

在发生“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同时，4月3日，聂荣臻写信给当时主持军委常务工作的陈锡联，告病假两个月，不参加军委会议。

事情的起因是1976年3月中旬，中央军委在听取国防科委、七机部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情况汇报时，听到国防科委某负责人反映说，聂荣臻仍在插手国防科委的工作，“让他的秘书参加科委会议做记录，起草科委体制文件。”

原来，1975年3月16日，张爱萍刚任国防科委主任，第一次召集国防科委负责人陶鲁笳、肖向荣、陈彬、马捷开会，没有秘书，便提出请聂办秘书帮个忙，到会做记录。

王洪文等听了汇报后说：“中央、军委没有分工叫他管国防科委、七机部的事情，他自己擅自插手管国防科委、七机部的事情，是完全错误的。现在怎么办？是把他同邓小平一起批，还是先集中批邓？”

这时有人插话说：“关于点聂荣臻名的问题……现在运动开展起来了，势必联系到国防科委、七机部，就是要对聂本人触他一下，从刘少奇、林彪到邓小平到聂荣臻，凡是修正主义的东西都要批。”

于是，在国防科委系统，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同时，又掀起了批判聂荣臻的高潮。

聂荣臻非常生气，他说：“从1975年2月重新参加军委工作以后，我除了在军委会议上对国防科委和七机部的工作发表过意见而外，没有单独找这两个单位的负责人谈过话，怎么又批起我来了？”于是在4月3日写信请病假。

4月5日，陈锡联在聂荣臻的信上批了：“聂帅，您的病情已向中央同志报告过，同意您较长时期休息，注意治疗。”

4月的一天，叶剑英办公室突然接到李先念的警卫打来的电话，告知李先念就在西山附近，想顺路过来看看叶帅。

叶剑英开始有些犹豫：“见还是不见？”

后来还是答应了。他让下面的人抬了两把椅子到院子里，

10分钟左右，穿着风衣的李先念如约而来。叶剑英起身相迎，风趣的问道：“什么风把你吹过来了？”

李先念答：“无事不登三宝殿。”

叶剑英本来只想在院子里接待李先念，但后来还是把李先念从院子请到屋里的小会客厅。10分钟后李先念便告辞而去。

4月中旬，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建议叶剑英参加一些中央的工作。于是，叶剑英又开始在公众面前露面。4月27日，他出席了庆祝民主柬埔寨国家独立一周年的招待会。5月1日白天和晚上，分别参加了首都群众庆祝劳动节的游园活动和焰火晚会。5、6月间，叶剑英先后会见了巴基斯坦、法国、朝鲜等国家军方来访的领导人和其他贵宾。

此后，聂荣臻从城里来到西山，与叶剑英相邻而住，两人频繁交谈。而肖劲光、粟裕、宋时轮、杨成武、苏振华等军队的高级将领们，也经常来到叶剑英住处，在叶剑英面前表达他们对这“上海帮”的不满。大多数时间，叶剑英是只听不说。只是偶尔，他才会流露一点点内心的想法。

有一次，以脾气火暴、性情直爽著称的王震来到西山，在谈到江青、张春桥时，他说：“我看，干脆把他们几个抓起来，问题不就解决了！”

叶剑英没有说话，只是向王震伸出一只手握成拳头，然后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了两晃，接着把大拇指向下按了按。

叶剑英问及汪东兴的情况。曾经作为汪东兴上级的王震，七十年代中期又被毛泽东点名去协助汪东兴管理中央警卫工作。他很有把握的说：“汪这个人我是了解的，他以前做过我的下级，我在延安做卫戍司令时，他是我的部下，很熟悉，现在我和他一起工作，我了解他，他

是忠于毛主席路线的人。”

一天,李先念到北海散步,碰到正在钓鱼的陈锡联,两人是四方面军的老战友,陈锡联任师长,李先念任军政委。陈锡联主动对已请病假、基本不参加政治局会议的李先念说:“那几个人怎么办?要想个办法才行。毛主席不让他们搞‘四人帮’,他们照样搞,政治局一开会就吵架,江青打头阵,搅得政治局无法正常工作。”

李先念说:“办法总会有,你还是钓你的鱼吧。”

“四五事件”后,河北保定的杨连甲、杨志昌、吕毅等人,将保定地委第二书记杜森尧挟持到涿县关押起来。又把邹士杰、李升从保定押到涿县,强行召开保定地委第七次常委会,在会上免去3位地委书记职务,同时任命3名地委书记、副书记和95名县委常委、地直局级干部。从此,保定地区各级领导公开分裂。

1976年4月10日,保定7万军民集会、游行,表态拥护中央“四七决议”,保定市及周围各县又动荡起来。

4月13日,经毛泽东亲自圈阅,中央就清苑等县发生抢劫枪支、弹药、粮食事件电话通知,责成河北省委、河北省军区必须限期解决。

4月24日,中共河北省委鉴于保定地委不能正常工作的情况,发出17号文件,决定调保定地委常委到省委参加学习班,并派出吕玉兰、樊德玲、李铁、刘俊孝、王珏等11人组成临时领导小组代行保定地委常委职务,组织收枪工作队到保定进行收缴武器工作,但却遭到地委极少数人的阻挠和破坏。由于杨连甲等人不去省委,学习班没有办成。还有一些县的农民轮番进城,轰赶临时领导小组,小组被迫于5月12日撤离保定。而后,河北省委决定由原雄县书记杨凤鸣代理保定地委第一书记,保定继续大乱。

3月8日下午15时1分59秒,宇宙中一颗巨大的陨星,顺着地球绕太阳公转的方向,以每秒钟10多公里的速度,坠入大气层,在吉林郊区金珠乡上空爆炸。

陨星爆炸后,向四面散落,形成了世界史上一次极为罕见的陨石雨,其散落范围达到480平方公里,但更多的陨石却是散落在吉林大屯乡李家村和永吉县江密峰乡一带。

15时2分36秒,最后一块陨石坠地,穿破了1.7米厚的冻土层,

陷在地下 6.5 米的深处，并在地面上造成了一个深 3 米、直径超过 2 米的大坑，而它震起的土浪竟高达好几十米，土块飞溅到 100 米以外。

在这次陨石雨中，有 3 块陨石最大，都超过了 100 公斤。它们沿着原来的坠落方向，一直朝偏南方向飞去，分别坠落在吉林九站乡三台子村、孤店子乡大荒地村、永吉县桦皮厂乡靠山村。而最大的那块陨石重达 1770 公斤，大大超过了美国收藏的世界最大陨石：诺顿陨石的重量，1078 公斤。因此它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陨石。

这块世界上最大的陨石，很快被吉林市博物馆收藏，命名为“吉林陨石”。

4 月 22 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的电讯，题名为《吉林地区降落一次世界罕见的陨石雨——当地群众对陨石进行了观查、搜集和保存工作；科学工作者作了考察》。

这天，护士孟锦云给毛泽东念了这段陨石雨的消息，老人家听得非常认真。听完后，他让小孟停下来，扶他到窗口。他望着夕阳渐落的天际很久，望得出了神。

“主席，天上怎么会落下那么多石头呢？也怪了，还没伤人。”

“这种事情历史上可屡见不鲜啊。史有明载的就不少。野史上就更多了。”

毛泽东又讲：“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天人感应’，吉有吉兆，凶有凶兆。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是要死人呢。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赵云死时，都掉过石头折过旗杆。大人物真是与众不同，死都要死得有声有色。”

小孟说：“那全是迷信，是古人瞎编的。您真信吗？”

毛泽东没有马上回答，沉思了一会儿，才说：“古人为什么要编造这些呢？”

是回答，还是提问？……

第1394回：告康生，章含之写揭发信 说江青、张春桥都是叛徒

4月25日，章含之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

去年夏季我们曾听到一件诬告江青、春桥同志的事件。现在想来，这是邓小平在幕后策划的。现将事件经过向主席报告：

去年夏天，大约八月，一天晚上，海容、小唐两位同志来找我说有件事要了解。她们说她们去看了康生同志。是邓小平带话给她们说康老想见她们，后来康老的秘书直接打电话与她们联系约时间。小唐说她们请示了主席，主席同意后她们才去的。

接着，她们说康老病很重，恐不久于世了，因此有件心事要托她们转报主席。康老说，江青、春桥两同志历史上都是叛徒，他曾看过春桥同志的档案，是江青同志给他看的。康老要海容、小唐找两个人去了解情况，一个叫王观澜、一个叫吴仲超。康老说这两个人可以证实江青、春桥同志是叛徒。海容、小唐说她们想问问乔冠华同志是否认识王、吴二人。乔说他只知有此二人，并不认识。她们又说，听说江青同志的历史叛徒材料在三十年代香港、华南的报纸上有登载，问乔当年在华南工作是否见到过这类消息和文章。乔说他只见过生活上对江青同志的攻击，从未见过涉及政治叛变这一类的东西。关于春桥同志的情况乔说他完全不知道。当时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听说上海有一派贴过大字报说春桥同志是叛徒，后来被压下去了。

当时我们都劝王、唐两位不要替康老传这些活。我们说如果康老有事向主席报告，他可以口授他的秘书写下来，而不应该叫两个不了解情况的年轻同志传这种活。我当时说尤其关于江青同志这些话更不应该传，这样做客观上矛头是对着主席的。小唐说他们这些老同志不会把江青同志的事扩大的，不过她应当退出政治活动，将来叫她养老，去看看她还是可以的。

以后我们再也没有问起此事。但是在她们谈此事后不久,有一次在人大会堂宴会散会时,我见到一个行动有点困难的老年人。正巧海容走过,我问她此人是谁。她说“这个人就是吴仲超。”不知这是否是她有意安排吴出席宴会的。

以上情况特报主席参阅。

含之

一九七六年四月廿五日

江青看了章含之的这封信后批道:“此类事逐渐会揭发出来,我看他们是否高超过林彪?据说,他们的大、小舰队活动有些雷同,有些不同。小舰队有过之而无不及。”

吃的饱饱的、睡的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后来在1976年12月2日的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曾说过毛泽东当时对此信的批语:“毛主席批语乔‘借刀杀人’,‘借中央之刀杀王、唐’。”

章含之信中提到的王观澜,在《毛泽东书信选集》一书中《致王观澜》,曾有如下注释:

王观澜(1906—1982),浙江临海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色中华》总编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土地部副部长。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历任中央农民委员会主任、陕甘宁边区统战委员会主任等职。1948年曾到苏联治病。

王观澜在病中,毛泽东曾为之写信安慰:“既来之,则安之……”这封信在文革期间广为流传,成为慢性病者常常背诵的“最高指示”。

王观澜其实与江青的接触不多,但是他的妻子徐明清却和江青在上海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共处。

1937年底,王观澜在延安与来自上海的徐明清结婚。这个徐明清,原名徐明。因为当时延安中央党校也有一个人叫徐明,王观澜为了使妻子的名字区别于那个人,加了一个“清”字。此后,她便一直叫徐明清。

徐明清文革前任国务院农林办公室教育处副处长,浙江临海人。她小学毕业后,考入当地最好的台州女子师范学校。1926年,随着北伐革命军节节胜利,豆蔻年华的少女徐明清,在学校积极参加了

共产党领导的进步青年活动，并加入了共青团，后转为共产党员。

1928年，徐明清考入了陶行知在南京创办的晓庄师范学校。1932年10月，受陶行知委派，参加了“晨更工学团”的创办，并成为负责人。当时“晨更工学团”是个公开、合法的教育团体，设有幼儿园、小学、特别班，以及农民、工人、店员识字班。上海的左翼“教联”、“社联”、“剧联”以及“左联”等组织，都纷纷派人参加“晨更工学团”的工作。其中“剧联”派出的是田汉的弟弟田沅。

一天，田沅带着一位山东姑娘来到“晨更工学团”。她细高个子，穿一件蓝布旗袍，长得俊俏而性情活泼。这姑娘就是李云鹤，即后来的江青，当时的名字叫李鹤。田沅希望她能暂时住在“晨更工学团”。

徐明清看江青不仅识字，还会唱歌演戏，团里当时正好缺教员，就把她留了下来，安排在店员识字班当教员。

当时团里的女教员只有徐明清、李云鹤和一个叫李素贞的宁波姑娘。3人同住在小楼顶上的阁楼里，每天爬着竹扶梯上下，没有床，一起睡地铺，关系很融洽。彼此称呼都很亲切。江青叫徐明清“一冰”，徐唤江青“小李”，而对李素贞，她俩都称呼“宁波李”，“宁波李”是共青团员，受徐明清领导，江青因为没有组织关系，只是作为徐明清手下的一名普通教员、进步青年，没有参加党组织的活动。

1933年冬天，从监狱被保释出来的李云鹤同居男友，国立青岛大学学生俞启威，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天津市的第一任市长黄敬，到上海找李云鹤。徐明清见他俩相亲相爱，就想方设法给他们腾出一个房间暂住。后来，俞启威找姐姐帮忙，在静安寺附近租了一间小屋，就和李云鹤一道搬过去住了。不过，李云鹤工作仍是在“晨更工学团”教课。

1934年1月28日，上海各界举行了纪念“一二八”抗战两周年的示威游行，暴露了“晨更工学团”的进步面目，引起警方注意。俞启威为了避免再次被捕，决定和李云鹤一道离开上海去北平暂避。徐明清由于身份暴露，也很快离开了“晨更工学团”，去上海浦东办女工夜校。

没过多久，因生活难以维持，李云鹤独自从北平再去上海。经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的介绍，江青被安排在该会在小沙渡路办的一个女工夜校里当教员。小沙渡路，即今日的西康路。江青在那里教女工

们唱歌、演戏、识字，同时还去徐明清那里的浦东女工夜校和其他几所夜校教女工们唱歌和排演话剧。这时，她用的化名是李云吉。

有一天，江青走在大上海的马路上，忽然看见一张熟悉的面孔，她惊呆了！那人也认出她来，喜出望外。在这偌大的上海，这小伙子和江青能在当街相遇，真是个巧合。

此人名叫乐于泓，平常大家都叫他“阿乐”，他是中共地下党员，当年在青岛和俞启威、李云鹤一起参加革命活动。在俞启威突然被敌人逮捕时，是阿乐帮助李云鹤逃出青岛，送她上船的。

他乡遇故知，形单影孤的江青非常兴奋。此时阿乐担任共青团中央的交通员，公开身份是一家邮局的出纳员。此后，他们有了比较多的往来。

1934年9月的一天，江青请阿乐为女工夜校的演出拉琴，两人约好在兆丰公园见面。这时，连阿乐自己也不知道，他已被国民党特工总部特务跟踪。兆丰公园即今日上海的中山公园，离北新泾不太远。那时，公园有两个门，其中一个门一出去，便通往英租界。阿乐在兆丰公园跟江青见面时，发觉有人跟踪，知道事情不妙，当即与江青分头而走。阿乐熟悉那里的环境，飞快地从那个通往英租界的大门出去，逃入租界，甩掉了特务，没有被捕。江青见阿乐朝那个大门走，她便向另一个大门逃，结果被特务截住，就这样被捕了，关押在国民党的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特务们原本要抓的是阿乐，却把江青逮住。当时，特务们并不知道江青的政治情况。

在看守所里，江青遇到了一名她教过的小沙度路女工夜校的学生，此人在江青被捕后十多天即获释。江青便托她带口信给基督教上海女青年劳工部总干事钟绍琴，钟绍琴很快把消息传给了徐明清。

因为李云鹤是“晨更工学团”的教员和左翼“教联”的成员。徐明清获悉李云鹤入狱的消息后，立即向上级汇报，组织对她营救。

江青被捕后，既无叛徒指证，也没有任何证据，被关押了两个月，警察局经数次审讯后，认为从她身上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口供，遂允许保释。1934年冬，江青得以释放。

出面保释李云鹤的是上海公共租界华人教育处处长陈鹤琴和法租界公董局何德奎。

出狱后的李云鹤在徐明清的家乡住了一段时间，并经徐明清的父亲，一位当地的老中医，治好了了肺结核，后去北平找俞启威。

1935年春节后，徐明清从家乡回到上海，继续主持浦东女工夜校的工作。由于叛徒的告密，徐明清在1935年4月被捕。

徐明清被关进了拘留所，一关就是3个月，但敌人始终没有查出徐明清与上海中共党组织有什么关系。在此之后，徐明清又被转押到了杭州。

这期间，敌人对她严刑逼供，使用了各种刑具，使她的脑神经受伤，全身浮肿，头发脱落。但徐明清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没有给敌人任何口实。

从上海拘留所，到杭州反省院期间，陶行知先生和“教联”的同志一直在积极营救徐明清。陶行知先生亲自派人到拘留所探望徐明清，并通过上层关系找到当时的上海社会局局长潘公展，请他出面设法保释。但由于国民党内部相互倾轧，关系错综复杂，营救一时难有结果。

徐明清被转押到杭州后，陶先生又派女工朱冰如化装成上海市民政科科长李人超的亲戚，找国民党的浙江省要员批了条子，三次到杭州探监。她给徐明清送去了食品、衣物，还传递了外面的消息。

在陶行知先生及党组织的大力营救下，1936年6月，徐明清才被释放出狱。但由于在关押期间她受到严重摧残，身体极度虚弱、全身出现浮肿，组织上允许她回家乡治病休养。两个多月后，徐明清病愈后再回上海。

上海工委考虑徐明清在上海被捕过，继续留下来工作会有更多的危险，因此提议她也去西安工作。

徐明清接受了组织的安排。临离开上海前夕，徐明清决定去看看江青。因为她听说，自1935年春天，江青三度来上海后，化名蓝萍，饰演娜拉一炮走红，后跟电影名编剧、剧评家唐纳恋爱、同居，成了上海演艺圈的明星，名气陡增。而过了一段时间，俞启威到上海，她与俞启威相见后又旧情萌发，感觉十分内疚和苦闷，遂与唐纳闹起了离婚。她离沪北上追随俞启威，唐纳追到济南，自杀殉情被救。于是蓝萍与他又携手返沪。这些文人明星的种种逸闻，一度被报界炒得沸沸扬扬。

那天，徐明清来到了蓝苹的家，那是一座花园式小楼的一层。她来时碰巧江青不在，是唐纳接待了她。

徐明清告诉唐纳，她是蓝苹的朋友，叫徐一冰，明天就要离开上海了，如果蓝苹有空，约她明天到火车站见一面。说完，她给江青留下了一张字条。

第二天，在上海火车站月台上，徐明清正在和前来送行的浦东女工夜校的学生们话别。直到火车快开时，才见急匆匆跑过来一个女人，是江青。江青此刻的样子和她想象中的相去甚远，她非常瘦，而且脸色蜡黄，根本不像一个正走红的明星。

“一冰，你上哪？”江青问道。

“我去西北。这一去，不知何时再见面了？”徐明清回答。看着江青那副黄瘦的模样，徐明清随后特意叮嘱她要多注意身体。

谁知江青听了她的话后，长叹了一口气，只说了一句：“真是一言难尽啊！”

火车开动了。她们来不及多说话，便匆匆分手了。当徐明清从车窗回眸望去，江青仍站在月台上向她挥动手臂。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不久，徐明清被调任新成立的中共西安市委，任市委委员，兼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并负责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与当时在办事处工作的邓颖超、叶剑英、危拱之、蔡树藩等人成为很熟悉的同事。

1937年7月下旬的一天，一辆黄包车忽然停在西安北大街幼稚园的门前，从车上下来一位穿着旗袍、打扮入时的小姐。她拎着一只小皮箱，说是要找徐老师。

徐明清闻声从房间走出来，见来人吃了一惊，喊道“李鹤，你怎么来了！”原来这位来者正是江青。

上海一别转眼就一年了，徐明清发现江青的气色好了一些。江青说她此次北上就是专为找她而来的。徐明清遂让她先在幼稚园住下。

安顿好了行李，徐明清和江青细谈起来。没聊几句，徐明清问起了唐纳的情况，“一言难尽呀！”江青叹了一口气，接着说：“情况糟得很。我与唐纳闹翻了，他市侩气十足，简直令我无法忍受。”

见江青不愿意多说，徐明清也就不便再问，她又换了一个话题：

“你现在还经常演电影吗？”

“唉……”江青又叹了一口气。“七七事变爆发后，上海局势动荡不安，大家哪还有心思看电影啊！现在，电影市场一直很萧条，我呆在上海也没有什么事可做啦！”

“那你现在怎么打算？”徐明清又问。

江青这才道出了自己的真正来意：“一冰，说真的，我来西安是想请你帮个忙。”尽管那时徐明清的名字已由一冰改为徐明，但江青还是习惯地叫她的老名字“一冰”。

“帮什么忙呢？”徐明清问。

“我想到延安学习，想请你帮我找个关系进去。”江青说道。

徐明清知道，当时有很多左翼文化工作人员和一批进步青年，纷纷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千里迢迢，来到延安，寻找光明。

“你从上海带介绍信来了吗？”徐明清问道。她所问的介绍信，是指中共上海党组织的介绍信。

江青摇摇头，说：“有你在，会有办法的。”

在徐明清的帮助下，江青通过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去了延安。之后，组织审查江青历史，徐明清为她写了一份证明材料。一年之后，江青与毛泽东结为夫妻。

1938年11月20日，徐明清和丈夫王观澜被邀参加了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宴。

文革开始后，徐明清和丈夫王观澜夫妇双双被挂牌游街批斗。在全国掀起抓“叛徒”的风潮中，她因在1935年4月曾被国民党特务抓捕，成了“审查对象”。1969年初，徐明清被下放到湖北沙洋的国务院农口干校监督劳动，接受审查。她忍辱负重度过了4个春秋。始终坚信专案组最终会辨明是非，做出正确的结论。然而，她万万没有想到，1972年，自己会被定为叛徒、开除党籍！她多次向上级反映实情，都被指示为态度不老实。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有人建议她给毛泽东、江青写信。徐明清想：江青此时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有很大的影响力，她对自己被捕的情况是有所了解的。于是，她在1973年6月2日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写道：“30年代我在上海参加革命活动的总的情况，想您是

有印象的。我的一生所作所为,想您大体是了解的。”

第一封信没有回音,徐明清想是江青没收到,又于6月19日再写一封,但依然石沉大海。但这发出的两封信都如石沉大海。一直挨到了11月份,心存一线希望的徐明清,再次提起了笔,给江青写了第三封信,恳请她能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为自己的历史清白作证。

三封信全都渺无音讯,徐明清这顶“叛徒”帽子便一直戴了下去。

江青在上海被捕时,关押在当时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由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审讯组赵耀珊,绰号“黑大汉”,在公安局特务股楼上审问。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编审组长朱大启也参加了审讯。朱大启在解放后被捕。1958年5月19日,朱大启在狱中写下的供词中,有这么几句:“还有个女的李云古,左翼文化方面的,被捕后我同他(她)谈过话。”朱大启写这一供词时,并不知道“李云古”是江青。1968年2月20日,朱大启在供词中又一次涉及“李云古”:“李云古被捕案件:李云古,山东人,女性,1935年初(注:应为1934年10月)被捕,经过不详,当时经上海区训练审讯组长赵耀珊谈话,据赵谈李参加左翼文化组织。”此时的朱大启依然不知道“李云古”是江青。

1974年,康生陆续收到几封揭发江青和张春桥的信,说江青曾经被捕过。与江青一起被捕的徐明清被定为叛徒,她曾经给江青写信求救,说江青是了解她的。于是,人们纷纷传言:江青也是叛徒。

至于章含之信中提到康生说的那个吴仲超,时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1936年4月,张春桥曾参加吴成志(即宋振鼎)组织的“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在张春桥1950年填写的《简历表》上,“何时何地何人介绍入党、候补及转党年月”一栏中是这样写的:

1936年4月在上海经吴成志、林福生介绍入党。

1938年8月在延安经顾光斗、雄飞介绍重新入党。1939年2月转正。

张春桥既然在1936年4月入党,怎么到了1938年8月又要“重新入党”呢?

吴成志,真名宋振鼎,他对张春桥1936年4月在上海的入党经过是这样说的:

“我1932年9月被捕，1935年7月从苏州反省院自首出来后去上海。1936年4、5月间，我（化名吴成志）与原社联林福生（从苏州反省院出来的）、王德明等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曾经我介绍张春桥参加预备党员。这个组织没有党的组织领导，是我们自己成立的。成立不久，上海党组织派吴仲超找我谈话，指出这个组织是非法的，叫立即解散。我们当即解散，并通知到所有参加的人，也通知了张春桥。此后，我再未介绍过张春桥入党。”

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在1976年10月18日所写的证明也清楚表明：

1936年在上海，宋振鼎同一些叛变自首、住过反省院和不三不四的人成立了一个预备党员委员会，这是个非法组织。由我通知宋振鼎，宣布取消了这个组织。

解放前我不认识张春桥，文化大革命中，从外调的小将们口中才知道那个委员会内有张春桥。

吴仲超

1976年10月18日

第 1395 回：“怀疑论”，《北京日报》大讨论 要追查，《总理遗言》的作者

1976 年 4 月 26 日，《北京日报》以《两封针锋相对的通信》为题，连续两次刊登下乡知识青年黄一丁与刘宁的通信。在通信中，这对昔日的好友就“扎根”、“农业学大寨”、政治理论与实际生活的关系等等问题展开了辩论。在报纸上，代表正统观点的刘宁的两封长信均被全文刊载，持“怀疑论”观点的黄一丁的两封信却被大加删削。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黄一丁与刘宁自幼相熟，从托儿所到小学，又到中学，一直是形影不离的好友。1969 年，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洪流，他们一同从北京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以后，刘宁上调团政治部宣传队，黄一丁始终留在基层连队。1975 年黄一丁病退回京后，承刘宁母亲之托，给刘宁写了一封信，劝他尽快想办法回城。作为老朋友，黄一丁在信中无所顾忌，对一些社会现象表示了怀疑和困惑：

关于“农业学大寨”，黄一丁表示支持和理解，但对这场旷日持久的运动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实现预期的目标他表示怀疑：

“我觉得，如果乐观一点看，它也许能够决定今后农村的命运，也决定我们兵团的命运，也许我们农工们会不再像今天这样受人愚弄，被人瞧不起，被人随意摆布了。因此，也决定我本人的命运。我常想，有许多的不能令人满意的事情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可农业学大寨运动有没有足够的力量呢？”

对当时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树立的“扎根”典型高崇辉的事迹，他认为有些地方很敬佩，可有些地方并不想仿效。

他还用一种含蓄的口吻质疑到：

“有些政治教条，我们总是凭着激情一厢情愿地相信它，实际上并不明白，任何一种政治原则，拿到社会上去总是打折扣的。我们接受它的方法却常是错的。我们手中的信条未必能替我们解决实际生活中哪怕很小的一个问题。”

黄一丁曾经虔诚地参加过“农业学大寨”运动，宣传过“扎根”农村的大道理，也深切地体验到文化大革命后，社会上的许多不令人满意的现状。他自幼接受的是工农当家作主的教育，到建设兵团后，面对的却是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现实。曾经的政治信条在社会现实的撞击下，他产生了疑问。

黄一丁的信是1975年11月29日寄出的，大约半个月后，刘宁给他回了一封数千言的长信。信中他批评黄一丁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今天的又一悲剧”。并警告说：“同志，好好想一想吧，在今后的道路上，我们究竟是同志还是敌人！！！”

接着，刘宁将双方通信的复本作为入党思想汇报的资料上交单位领导。他所在的团党委立即将这件事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上报师政治部，师政治部又上报黑龙江建设兵团政治部。

此时的黄一丁尚不知尽管事态正在扩大，当接到刘宁回信后，他意犹未尽，又给刘宁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说：

“人思维的本性就是怀疑的……而且我请教一声，难道现实中的许许多多的不能令人满意的事情和一些让人百思不解的问题的存在都不值得怀疑吗？仅仅轻描淡写地用‘这是前进中的问题’不能说服。”

“我们以前被社会左右得这样厉害，难道不正是因为太少怀疑的缘故吗？社会本身是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样教导我们的！）而人的怀疑只不过也是尽可能地辩证一些的自然要求罢了。总而言之，怀疑怀疑，天塌不下来，没有怀疑，马克思主义是不能前进的。”

1976年初，谢静宜从《北京日报》的内参上了解到他们二人的通信，认为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和“返城风”的好材料，主张公开见报。于是4月26日《北京日报》以《两封针锋相对的通信》为通栏标题，将黄一丁、刘宁二人的第一次通信刊出。同时发表的《编者按》将两人的观点分歧说成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的反映，并称赞刘宁的复信“生动地表现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青年一代的战斗风貌”。

这时的刘宁，已被团党委授予“先进青年”的称号，并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学大寨会议，实现了入党的夙愿。

不久,他又作为先进典型回到北京,对黄一丁展开工作。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和组织部也派人找到黄一丁,意在要他返回兵团。。

8月26日,《北京日报》又刊出经过删节的黄一丁给刘宁的第二封信和刘宁的复信。

黄一丁的基本观点被归结为三大错误:反对学大寨;反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散布反动的“怀疑论”。

这场讨论的结局以黄一丁在《北京日报》上发表《我对“怀疑论”的认识和批判》而落下帷幕。文中,黄一丁自称在接受“深刻教育”后开始“猛省”,“看到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青年激烈斗争的刀光剑影”,进而批评了“怀疑论”的五种“骗人手法”。但正是通过这场轰动一时的讨论,人们对知识青年中广有市场的“怀疑论”的基本观点,有了较多的了解,“怀疑论”的一些基本观点,也借这次“讨论”得以阐扬。

其实,一些知识青年到农村以后,才发现了一个与他们一直生活的城市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很多农村中司空见惯的贫困、落后、愚昧、封闭令他们感到震惊,城乡的巨大反差令他们惊愕,也极不适应。当然这些知识青年,应该对1949年以前中国农村的贫困、落后、愚昧、封闭的程度更不清楚和了解,对1949年以后中国农村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没有切身地体会。林彪“913事件”后,一些人感到自己上了当,受了骗。一些人因理想支柱的塌陷而四顾彷徨。

此时,“怀疑论”在知青中流行。为了寻绎扑朔迷离的政治风云的真正底蕴,也为了避免重蹈受骗上当的覆辙,许多知青开始求助书本。无论是在农村社队,还是在兵团、农场,知识青年中读书风气明显上升。他们涉猎的读物不再囿于早已熟读成诵的“红宝书”,而是闯过各种人为的“禁区”,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其他可以搜罗到的书籍。在一些文化素质较高的知青中,研读马列主义原著也蔚成风气。列宁的《哲学笔记》、恩格斯的《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等哲学著作,成为特定环境下知识青年寻找批判武器的重要方式。

云南西双版纳某农场机关在组织各队知青讨论刘宁和黄一丁的通信内容时,很多知青公开认为“黄一丁的信有水平”,符合现实;而刘

宁“太激进了”，“唱高调”，“动机不纯”。当时，黄一丁收到了数以千计的来信，许多人向他致意或表示支持。

1976年5月5日，一辆绿色的吉普车开进了杭州汽轮机厂。4个公安人员带走了正在工作的“总理遗嘱”的作者李君旭。中共中央在一周前发出了紧急电话通知：“总理遗言”是伪造的，是一份蓄谋的“反革命谣言”，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彻底的追查。国家公安部为此专门发了文件。

“遗言”制造者李君旭很快就被公安局网入囊中。事情至此本来可以迅速结案，人证、物证、本人供词一应俱全。然而，案子上报后，有关方面没有一个人相信这样一份轰动全国乃至世界的“总理遗言”居然会出自一个年仅23岁的青年工人之手，下令继续深入追查，一定要把隐藏在幕后的策划者揪出来。

对李君旭的轮番疲劳审讯开始了，他们不让他睡觉，整天用一百瓦的电灯泡照着他的脑袋，好几拨人轮换着反复问他同一个问题：“遗言”的真正制造者是谁？

李君旭从小就是软弱胆小的，上小学时，就常被同座的女生欺负而不敢吭声。当那些穿着制服的公安人员在他眼前晃来晃去，要他交代谁是真正的“遗言制造者”的时候，他害怕了，终于说出同学袁中伟的名字。整个案子似乎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因为当时北京认为：“总理遗言”这样大的政治案件显然隐藏着巨大的政治背景，而李君旭的知识分子家庭背景显然不可能。而袁中伟的父亲却是当年大名鼎鼎的浙东新四军游击队的老干部袁霄吟，其母亲也是当年绍兴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老干部。

5月10日下午，在文革初期就被打倒，“913事件”后被解放，此时又刚刚靠边站的袁中伟的父亲，正在“菩提寺路蕙宜村1号”小楼，自己的家中，躺在一张老旧的藤躺椅上翻看书报，突然进来几个人对他 说：“组织部的人要找你谈话，请你跟我们去一趟。”袁霄吟没有任何怀疑，只穿了一件老头汗衫，起身就要跟他们走。来人似乎不经意地看了他亲一眼，说：“再带一件外套吧。”就是这句话让站在一旁的妻子感到不安。这位当年曾是绍兴城里与日寇和汪伪特务机关斗智斗勇的地下党员，她的警觉和敏感超乎常人。

就在袁霄吟刚走出门，几个身穿警服的人突然从他们家的房后蹿了下来。他们出示介绍信，态度温文尔雅，叫袁霄吟家里人不要紧张。接着开始抄家。一些人爬上了黑咕隆咚的天花板，在蜘蛛网密布的阁楼上打着手电乱照；一些人将晒台上的每一只花盆连花带土倒在地上，用手慢慢地把土坷垃捻碎；更多的人则是拉开每一个抽屉打开每一口书橱翻查，只要看到带字的纸片、本子、信笺，无一遗漏，统统拿下。搜查的细致、深入、滴水不漏绝非文革初期造反派的抄家可比，让在场的人不寒而栗。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没有人向他们解释缘由。

袁霄吟的妻子拉着女儿袁敏的手走到晒台上，从那里，他们清楚地看到楼下路口的拐弯处停着一辆军绿色的吉普车，袁霄吟上车时回头看了一下，他应该是要和家人告别一下。

搜查一直从下午延续到晚上，他们将每一个房间的电灯都打亮了，整幢小楼灯火通明。

袁霄吟的妻子这时候显现出一种临危不惧的沉着和镇定，她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不断地问他们要不要喝水，提醒他们这儿还没搜那儿还没查，最后甚至还把抄家者带到楼下厨房里，指着一大堆煤球说：你们把这儿也好好搜搜，从前我当地下党时最喜欢将秘密文件放在这种脏乎乎的地方，敌人往往想不到的。

来人哭笑不得地看着母亲一本正经的模样，尴尬地搓着双手，显然他们不太愿意扒拉这堆黑乎乎的煤球。

袁中伟的姐姐下班刚回家，也被便衣警察用“谈谈”的名义要从家中带走。她誓死不从，对警察说：“我妈妈有心脏病，要是你们不把我妹妹接回来照顾我妈妈，我就是一头撞死在这儿，也绝对不会跟我们走。”警察答应了她的要求，这才将她带走。

晚上，袁中伟在工厂上班的妹妹袁敏也被警察带走了，是被带回了家里。

他们向袁敏和她母亲宣读了一份文件，自此，她们才大体弄明白：袁中伟已于5月9日在上海被抓；他父亲和姐姐被带走，都是因为同一个案件：“总理遗言”案。此案件已先后被抓的有：李君旭、刘建新、李晨光、吕建树；以及李君旭的父亲，杭州第一医院的院长；刘建新的

父亲,浙江省某厅局的一位领导;刘建新的母亲,浙江大学的一位处长;李君旭前女友的父亲,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处长。

他们还要袁敏天天在家陪着母亲,说这是他们对她姐姐的承诺。

年长的公安人员对袁敏说:“从今天开始你不用到工厂上班了,就在家里照顾你妈妈。工资照发。”

年轻的公安人员对袁敏说:“假如不是你姐姐对我们说,你妈妈有心脏病,要是我们不把你接回来照顾你妈妈,她就是一头撞死在这儿,也绝对不会跟我们走,那么我们就不会连夜到厂里把你接回来。现在你可以天天在家陪你母亲,我们对你姐姐是有承诺的。”他说:“你姐姐是我见过的最坚硬最厉害的姑娘。”

袁中伟是在上海被抓的,比他父亲早一天,5月9日。袁中伟从小学就开始磕磕绊绊读《资本论》,对政治有一种天然的兴趣,从父母这一辈老共产党人身上传承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和抱负,更让他像“五四”运动中的热血青年。春节后,他去了很多地方:青岛、沈阳、大连、长春、锦州、哈尔滨,最后到了北京,参加了天安门事件的全过程。

他是在做社会调查的。他希望了解,在即将展开的路线斗争中,工农兵会站在哪一边?有人说,干部阶层是文化大革命中既得利益受损者,作为干部子弟反“四人帮”能否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此,他重点跑了上海和东北,深入到工厂车间和产业工人促膝对话,甚至还到了长春的解放军红九连,和当时全军模范红九连副指导员于小平捧着高粱米饭彻夜长谈。最后,他得出结论:即使在“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和东北,群众也是反对他们的。他把调查结论都详细地记在自己的日记本上。

袁中伟身上还带着一份父亲在京老战友的名单,他按着父亲提供的联络图上的名单和地址,一家一家登门拜访。这些老干部普遍对“四人帮”恨之入骨,几乎不约而同地对国家当时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忡忡。他们大多因为种种原因赋闲在家,但他们聊起国家大事还是滔滔不绝。袁中伟把这些老干部对“四人帮”的不满和对时局的看法都详细地记在日记本上。

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所做的这些社会调查后来会牵连一大批老

干部和他走访过的人，他为此痛悔不已，并且自此以后再也不记日记。

离开北京后，袁中伟5月7日到上海，住在姨妈家。姨父姨妈也都是很早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5月9日那天，袁中伟的姨父突然提前下班回家，说：“今天公安局的人找到我下放劳动的工厂里去了，问是不是有个外甥住在家里，并说，这个外甥出事了，今晚要到咱家里进行抓捕行动。还很严肃地对我说：此事已经向马天水同志汇报了。天水同志说，你是老同志了，向你提三点要求：1、要积极配合组织行动，并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担保不透露半点风声；2、你外甥到上海的每一个细节都要写成材料，上报组织；3、不能让上海的其他老同志知道你外甥被捕的情况。”

袁中伟的姨妈听完这些话脸色刷地白了。袁中伟一早就去探望他父亲的老战友了，她姨妈和姨父商量，是否等袁中伟回来后给他点暗示？正在这时，他们的儿子回来了。袁中伟的姨父让他立即到南京西路上的一家无线电器材商店的柜台上，找营业员米秋报信，要他告诉所有老同志，袁中伟出事了。米秋就是袁中伟那天去拜访的他父亲老战友的儿子。

那天晚上，袁中伟被反铐着押上了车，连夜送回杭州。在杭州市市公安局的贵宾接待室连续对他进行了40多个小时的审讯，主题就是一个：你是怎么伪造“总理遗言”的？

首先问：“你知道‘总理遗言’吗？”

随后是：“你是怎么伪造‘总理遗言’的？”

可那时，袁中伟并不知道“总理遗言”是伪造的。

审讯者说：“我们知道，你对反击右倾翻案风不满。”

袁中伟反驳说：“邓小平上台后，铁路通了，钢产量上去了，有错吗？”

袁中伟被他们审问得筋疲力尽，精神几近麻木，但他仍坚定不移地回答：“我没有伪造‘总理遗言’。”

审讯持续到第三天，袁中伟被押送到杭州市著名的监狱，小车桥。每天的提审依然集中在“总理遗言”上，即便审问者有时云山雾罩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但最后肯定万变不离其宗，归于“总理遗言”。最后，袁中伟终于明白了，流传甚广的“总理遗言”并不是周恩来总理所写，

而是有人伪造的。但他当时确实还不知道“总理遗言”是谁写的，他坦然地认为，既然自己只是抄录了“总理遗言”，那么审查清楚后应该就可以被放出去了。

袁中伟在上海被抓后，公安局在杭州他家大有收获。他们在袁中伟姐姐房间的一张写字台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叠信，每封信的落款都是同一个名字：阿胖。经调查，这个阿胖正和袁中伟姐姐谈恋爱，而阿胖的父亲时任浙江省委领导，更重要的是，他是浙江省去北京参加周恩来追悼会并面见邓颖超同志的三位省委领导之一。从这条线顺藤摸瓜，案子就渐渐纳入了上面希望的轨道。接下来被拖进这桩案子的人都是符合上面暗示的干部阶层要求的：阿斗和阿斗身为省厅局领导的父亲，其在浙江大学当处长的母亲，李君旭前女友那位时任省委组织部处长的父亲。

5月下旬，一节从杭州到北京的软席包厢，将袁啸吟和袁中伟姐弟，蛐蛐儿李君旭和他的父亲，阿斗和他的父亲总共7个人，在互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押送进京。在北京“保护性审查”18个月。

直至1977年11月，提审人员向袁中伟宣布了审查结论：“经查，袁中伟同志和制造‘总理遗言’无关，但是在‘四人帮’搞乱浙江的很复杂的情况下，也说了一些损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属于严重的政治错误。现解除审查，回原单位工作，工资照发。”

对这样的政治结论，袁中伟拒绝在上面签字。他后来回忆说：

“他们反反复复劝我签字，甚至明确告诉我，这个结论中央最高领导都已圈阅，等等。我想了足足15分钟以上。最后我在自己的结论上写下了一句话：‘这个结论我本人不同意，我保留向华主席党中央直接反映情况的权利。’公安部的同志看了这句话都十分震惊，面面相觑了好半天，研究了好久，也劝了我好久，最后还是决定先放我出去。”

在北京出狱后的第一个晚上，袁中伟在公安部招待所遇见了李君旭。他当时希望李君旭能告诉他事情的真相，但李君旭只是一个劲向他道歉……

其实，在关押期间放风时，袁中伟曾见过刻在砖墙角落上的一句话：“小弟（袁中伟），对不起。”他知道这是蛐蛐儿李君旭为他刻的。以蛐蛐儿内心的敏感和自尊，可想而知他当时承受的压力有多大！



“总理遗言”案主要当事人中学毕业后的第一次合影(左一,李晨光;左二,阿斗刘建新;左四,蛐蛐儿李君旭;左六,瓜子袁中伟;左七,大耳朵吕建树)。

第1396回：华国锋，毛泽东写三句话 “亲启”信，景贤为春桥“找伴”

1976年4月30日午后，毛泽东接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华国锋陪同。

接见后，华国锋对毛泽东说：“我把外宾送上车，还来向主席谈几件事。”

毛泽东说：“好。”

不多会，华国锋返回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他说：

“最近我处理了几件事，现在有几个省发生一些问题，我已同政治局的同志研究，作了处理，签发了中央文件，形势正在好转。国际上也有些事。我经验不多，有事多同政治局的同志商量，看主席有什么意见。”

毛泽东说：“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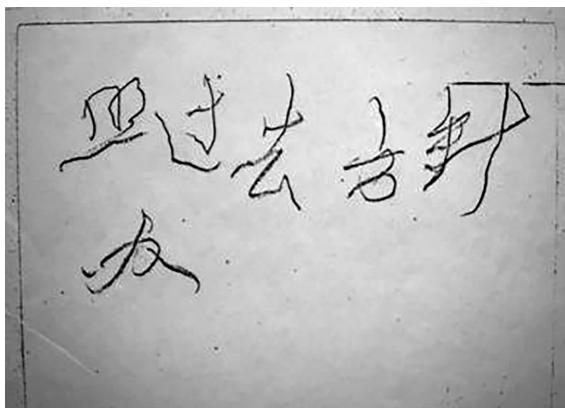
当时，毛泽东说话已经讲不清楚了，华国锋听不明白，在旁边的张玉凤就把毛泽东的话重复了一遍。

随后，毛泽东又讲了一句，张玉凤也听不清楚。毛泽东就要纸和笔，张玉凤扶着他在纸上写道：

“慢慢来，不要招（着）急。”

“照过去方针办！”

“你办事，我放心！”



5月11日，毛泽东突然发病，脸色苍白，呼吸急促并伴有全身大汗。经过检查，专家们确认毛泽东为心内膜下心肌梗塞，同时又伴有心律不齐，病情十分严重。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出现了心肌梗塞迹象。中央决定由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和汪东兴4人直接负责对毛泽东的医疗工作。医疗小组有关毛泽东的病情报告必须逐日向上述4人汇报、请示。同时决定：一般性中央文件不再送毛泽东批阅。重要文件经过四人批准方可送交毛泽东批阅，以减少毛泽东的工作量。

第二天，5月12日，毛泽东会见了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会见时，毛泽东由张玉凤和孟锦云搀扶着，走到接见大厅坐在沙发上。

当李光耀来到大厅，张玉凤和孟锦云把毛泽东扶起来，她俩便退到屏风后面，毛泽东刚站起来与李光耀握完手，就“扑通”一声坐下了，小张和小孟在屏风后看得清清楚楚，她们惊讶得差点喊出声来，她俩最清楚毛泽东的病情，这次突然坐下，是他实在无法支撑，不由自主坐下的。

毛泽东接见李光耀，仅寒暄几句，前后只有几分钟就迅速结束了。

当人们看到这次毛泽东接见李光耀的新闻照片时，无不感到震撼，与前几次的照片相比，毛泽东目光无神，已经不能正常地抬头，只能把头仰靠在沙发上。

1976年4月23日至5月10日，国家出版局在济南召开“鲁迅著作注释工作座谈会”，有13个省、市、自治区有关方面的代表79人参

加。会议传达了毛泽东1975年11月1日的批示，制定了《鲁迅著作注释出版规划（草案）》，明确了各地分工承担的任务。会后国家出版局写了报告，国务院于7月1日批转各地执行。

这次会议分为两段。第一阶段，在山东的济南南郊宾馆开；第二阶段，在北京国务院二招召开。

上海写作组陈冀德参加了济南鲁迅著作注释座谈会后北上北京，并去钓鱼台看了张春桥。

一天晚上，王洪文的秘书肖木把陈冀德从《红旗》杂志社的招待所接到姚文元的住处。陈冀德一直以为姚文元和张春桥是在一起办公的。肖木告诉她：“姚文元已经搬出钓鱼台了。”

姚文元的家属从上海迁到北京后，姚文元就搬出了钓鱼台，全家住到西单附近过去薄一波住的四合院去了。

来到姚文元的住处，陈冀德觉得这里像是一所过去京官的住所，有好几进深的老房子。姚文元的秘书接他们进去以后，在黑咕隆冬的走道里，弯弯绕绕走了好些时候，才来到一间感觉大而无当的会议室。

会议室只在进门的一头亮着灯。整个房间昏昏暗暗的。桌椅、墙壁看上去都非常陈旧。他们还没坐定，姚文元就进来了。

话题从济南召开的鲁迅著作注释座谈会说起。姚文元说：“周海婴给有关方面写了一封信，提出，当前在鲁迅的研究上，存在着否定一切的倾向。这就是召开这次座谈会的起因之一吧。”

还对陈冀德说：“《光明日报》的内参上，有你在这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我们都看到了。你的观点是对的。否定也是继承的一种方式。否定一切就不对了。鲁迅说的‘拿来主义’，倒洗澡水不要把澡盆里的孩子都倒掉了。都是这个意思。”

接着，他们说到发生在一个月前的天安门广场事件。姚文元说：当时，政治局的人都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站在会议室的窗前，可以看到广场上的景象。人头攒动，一点不亚于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那样的场面。现在看来，文化大革命是暴力，天安门广场事件，实际上也是暴力。还是恩格斯说得对，阶级斗争，最终还是暴力解决问题。

从姚文元处出来，陈冀德问肖木：“房子这么大，又这么破旧。办公厅的人怎么也不帮忙收拾收拾？”

肖木说：“他们哪里会把姚文元放在眼里。姚文元身上穿的军大衣，好几年了，都磨破了。没人管。还是张春桥说了话，他们才给换了一件。”

陈冀德也见了王洪文，但没有谈什么，只是请她看电影参考片，和几个陈冀德也不认识的人一起喝了喝茅台。

陈冀德觉得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3人的生活追求差别很大。王洪文生活奢侈，及时行乐，但张春桥、姚文元朴素，姚文元甚至有些寒酸。

5月16日，上海庆祝“文化大革命”发动十周年之际，徐景贤收到张春桥寄来的一封密信，是张春桥亲自写的信封，正中写一着：“徐景贤同志亲启”，在“亲启”下面特意打上两个圈圈。信封下方的署名直接写着“张春桥”，接着是发信日期。这封信背后贴着“密封”的签条。

徐景贤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愣了一下。因为他和张春桥接触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收到过他自己写的“亲启”信封。过去张春桥给他写信，往往只写在信纸上或写在文件的天地部分，信封是由秘书代写的，然后再由秘书密封，贴上签条，盖上机密图章，进行编号登记，再转送出去。即使是内容绝密的信件，他对自己的机要秘书，也是从来不回避的。在徐景贤的印象里，张春桥自己亲笔书写“亲启”件给他，这是头一遭。可见，这肯定不是一封普通的信件。

不但徐景贤意识到了这封信的重要性，而且连机要秘书们也都清楚这一点，这封信经过3个机要秘书之手，由张春桥在北京的严秘书登记后，送给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小何，再由小何转送给徐景贤的秘书小张签收。当这封信出现在徐景贤办公桌上的活页夹里的时候，和它一起收到的其它信件和文件，都由秘书拆封、登记编号，独独只有这一封信，仍然密封着，上面张春桥写的加圈的“亲启”两字，十分引人注目，谁也不敢动它一下。

徐景贤看到信，取出剪刀，急速地剪开封口，展开一页白色的薄道林信纸，纸上赫然跳出张春桥那熟悉而又漂亮的铅笔字行书：

景贤同志：

送来的材料收到了。老实说，我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想找个伴，关于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

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何必去想这些事情呢？但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又想起了这件事。

你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呢？

祝好！

春桥

信纸下方还有一行小字：请阅后烧掉，免得引起不愉快的事。

徐景贤看了这封信，恍然大悟：原来张春桥根本不是要找什么“秘书”，而是要为自己找个伴侣。徐景贤为自己能得到张春桥的高度信赖而深感庆幸。

然而，要为张春桥“找个伴”，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在信里对于找什么样的“伴”没有提出任何条件，只是提到希望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光凭这一条，就难。

张春桥本来就是一名“大杂家”，谈起话来，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坛逸事、人事变迁……可以说，古往今来，天上地下，无所不谈。这和他过去长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后来又进入中央领导层有关。现在，要找个能够经常和他“谈话”的“伴”，势必要求她有较高的思想政治水平，有较丰富的知识积累，能够做出机敏的反应，还要有驾驭文字的能力。

徐景贤开始小心翼翼的寻觅，不敢让其他人经手，经过几个星期的时间，结果却总是让他失望：凡是符合条件的那些“对象”，都是早已有了家庭的人；而有些独身女性，则是思想政治水平和文化素养等不够条件。他选来选去，觉得要从四十岁左右层次较高的女性中，找到至今独身并适宜成为张春桥的妻子的人，实在是难上加难。

正当徐景贤伤透脑筋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机会让他“捕捉”到了一个理想的对象。这天，他到上海文教系统某机关去参加一个会议，听取向基层单位派出的专题调研组的工作汇报。当时一位40来岁的女性的发言，引起了他的注意：她讲话时口齿清晰，条理分明，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言辞敏捷但又不像某些女性那样咋咋呼呼。徐景贤插话问了她几个问题，她都能对答如流，还能列举出一些人员的具体情况作为左证，这说明她在调查研究时，对基层单位的情况摸得很透，工作作风很深入、很细致。徐景贤特别欣赏的是，她在发言中敢于对他的某

些看法表示异议，而且能够委婉而明白无误地说出她为什么不同意的理由，徐景贤认为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因为社会上阿谀奉承的人不少，在日常生活或工作中，顺从或是附和领导的意见，往往是一种比较普遍的风气，用沉默来表示异议已经算不错了，至于能当面说出不同意见来的，简直是凤毛麟角。

散会以后，徐景贤用随意交谈的方式，向会议的主持人同时又是这个机关的领导了解她的情况，会议主持人说，这位女性是共产党员，曾经做过多年的机关工作，又在一个重要刊物的编辑部当过编辑，有相当好的文字表达能力，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了一个倾向性的问题，向领导写了书面汇报，受到领导上的重视，转给报纸公开发表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徐景贤听了更为高兴，因为他看到了这份书面汇报，认为写得不错，提出的问题也有深度，所以特地上送给北京的张春桥过目，由张春桥批示同意后公开发表的。

那个会议的主持人看出徐景贤颇为赏识这位女士的才干，就进一步补充说：她的工作态度十分认真负责，下去调查研究的时候，往往全心全意，没日没夜地干，因为她现在是独身一人，别无牵累；她曾经有过一个不幸的婚姻，因为她不育，对方就和她分手离婚了。这样，她反倒把全副精力都扑在了工作上。

徐景贤听了心里更是美不可言，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这和给张春桥找对象的要求倒是非常吻合的，美中不足的是该女士的相貌平平，但是最重要的是她具有较高的内在素质，也就足以弥补外貌上的不是了。

拿定主意以后，徐景贤不露声色，请会议主持人把这位女士找来，由他单独和她谈话，讨论如何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的问题。通过交谈，徐景贤对该女士的思想水平，性格特征，工作作风，兴趣爱好乃至生活经历，家庭情况等，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谈话结束，他和她握手道别。

5月下旬，巴基斯坦总理布托来访中国，提出要会见毛泽东，当时布托已经来中国好几天了，一直等待毛泽东的会见，但由于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不允许，所以一直没有安排。

5月27日，布托马上要离开中国，又一次提出见毛泽东时，毛泽东的秘书不得不把这种要求向毛泽东报告。此时，毛泽东刚吃了安眠药，但他依旧毫不犹豫地点头同意安排接见。这次会见，毛泽东已明显地面容憔悴，表情麻木，行动不便，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坐着与布托会面、握手。

毛泽东问布托：“你好吗？”

布托回答说：“我很好，谢谢你。”

毛泽东说：“我不大好，腿不大好，讲话也不好。”

布托说：“主席创造了伟大的历史，你高举着人民革命的斗争旗帜。”

毛泽东说：“没有做出多少成绩。”

毛泽东会见布托，前后不过几分钟，然而，这是他的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1976年5月27日毛泽东最后一次在书房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

5月29日晚上8点23分，云南龙陵至潞西一带，发生7.5级地震，10点又发生了一次7.6级地震。由于地震预报部门对这次地震有预报，因此在中共云南省委的统一指挥下，伤亡和损失被大大减轻。

5月30日深夜，毛泽东的心脏病再次复发。他呼吸急促，大汗淋漓，并出现了短时间的昏迷，所幸发现及时，很快抢救过来。这次发病之后，毛泽东同意医生在他的耳垂上抽取血液进行化验，同时又配合医生使用当时属新式医疗器械的无线电遥测心电仪。这样，医生就可以在外室通过遥测心电仪随时监控毛泽东心脏的变化，以便及早采取治疗措施。在以后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毛泽东的病情较为稳定。

第 1397 回：豫湘动，保定农民开进城 朱德逝，叶剑英看华国锋

1976 年 5 月 23 日至 6 月 10 日，河南省委在省委三所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批判邓小平“罪行”，反击右倾翻案风。6 月 1 日，刘建勋在会上发言，他说：“文化大革命以来，经过九、十次路线斗争，本来我们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是好的，我们同新干部是有感情的，新老干部团结战斗，十年的老战友了。由于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我们跟着犯了错误，不仅伤害了一部分新干部，压了一部分群众，而且使党委的一些领导同志处于被动局面。根子在邓小平，责任主要在我。”

“同志们批评我怕邓小平，该顶的没有顶住，屈服了邓小平的压力。这个批评好。我思想上确有怕邓小平的一面。邓小平上台以后，我跟一些同志讲过，这个人很厉害，在他领导下工作要小心点。我对邓小平的这种印象，有历史的原因。文化大革命以前，我长期在他领导下工作。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是大官，我还是小官。在太行时，我听到看到的有关他的事，就觉得此人厉害。去年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对我们河南的舆论也不少，什么‘地方主义’，‘一派掌权’，等等。对我们是有压力的。邓小平点了郑州铁路局的名以后，万里同志气势汹汹几次来整郑州铁路局。5 月份那次来，他说：‘一进安阳就有人反对’。到了新乡，既不通知省委，也不同铁路局党委商量，就召开几千人的大会，点名批判，指桑骂槐，来了个杀鸡给猴看。到了郑州，说‘来到河南不受欢迎’，大骂郑州铁路局‘结党营私’，是‘修正主义’，要撤徐达本同志的职。我知道他有来头，不敢硬顶，急忙躲避，他到郑州，我就下乡。我跟几个地委书记谈过，万里那样凶，是有邓小平当后台，这不仅是整铁路局，而是要整我们省委。当时，铁路局党委的同志是同万里对着干的。8 月份那次来，他进一步推行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一次，我为了照顾关系，在铁路局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说了几句客套话，我说省委和部里是一致的。他回去的时候，说这次来

‘没有摸到老虎屁股，摸了鸡屁股。’可见，是要整我们的。”

“去年5月上旬，李井泉同志来河南，我陪他参观、吃饭，他散布：‘邓小平讲，干工作不要怕犯错误’，‘邓小平抓得很紧，先抓铁路，再抓工业，还要抓军队。’邓小平的所谓抓这抓那，就是要‘全面整顿’，要翻案复辟。当时我没有识别，也说了一些吹捧邓小平的话，说：‘他是我的老上级，我对他的印象是处事果断，言必行，行必果。’我还说有机会要见见他，把河南的问题说清楚。”

“邓小平把派性当成主要矛盾，借口反派性，整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在不同的地点和场合点名批判了一些人，而且多数是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新干部。我向批判错了的同志道歉。”

“去年我们受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所犯的严重错误还集中表现在省委17号文件上。这个文件是对着新干部的，贩卖了邓小平的不少修正主义货色，是一个错误的文件。我们联系实际批邓，要批17号文件。”

6月4日，湖南继续在省委机关大院内召开“促转弯子”万人大会，唐忠富对前来参加大会的一些地、市总工会的负责人说：“你们要根据本地区情况大胆斗”，“把顽固分子的威风打下去”。“搞得张平化休想在湖南找到任何安定的绿洲”。会后，组织了230辆汽车上街，进行宣传。接着，邵阳、衡阳、黔阳等一些地区的运动陆续开展起来。

6月12日，新华社长沙讯（内参）：

最近记者去湘潭江南机器厂采访，这个厂的工人欧阳凯主动向记者谈对运动的看法。他说了以下几点（主要的）：

（一）我不怕坐牢，我声明，我是个反周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在外单位搞调查时，看到反革命分子的反中央领导同志的传单，上面就是没有提周恩来，这不是说明他有问题吗。毛主席发动批林批孔运动，就是反的他。这次反击右倾翻案风，也是反的他。邓小平上台只有几个月嘛。

（二）湖南的问题，光揪张平化有什么意思，张是个第二书记，湖南还有第一书记。可以断定，华国锋是周恩来的人。

（三）反击右倾翻案风这场运动，还只是才开始，以后的事情多得很，早着哩。现在中央的领导权算解决了，中央各部门的问题，文化

部、卫生部解决了，你们新华社解决了，人民日报只解决了一半，其他还没有解决，还有各省的问题。

欧阳凯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厂里的“湘江风雷”派头头。他在同记者谈话前两天，（约在五月十六日前后）曾到长沙，会见了省里一些原湘派的头头，如叶卫东、李敬林等人，他说，李敬林曾向他谈了对运动的看法。（完）

7月19日，湖南邵阳一些人在长沙街头写了“打倒工团主义”，“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等标语，把矛头指向反击右倾翻案风。

唐忠富指出：这是“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并与张厚、雷志忠调民兵把邵阳来的这些人包围在省委大院。

20日清晨，唐忠富、张厚等又增调了民兵达1000多人。双方发生武斗，打伤21人，其中重伤3人。

7月24日，唐忠富到长沙市委、市革委扩大会议上表态说：“张平化在各个关键时刻，都与毛主席的路线唱对台戏，我们要下决心同他斗争到底。”“不打倒张平化我不姓唐”。

7月26日，唐忠富与雷志忠、胡求生等7人来到北京。他在准备的“汇报提纲”中说省委及其负责人“顽固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修正主义组织路线”，“支持纵容打砸抢”，“大造反革命舆论”。

同时，唐忠富还要求胡勇、张厚等人在湖南加紧工作：“你们在家闹得越大，我就在这里越坐得住。”

1976年6月14日，保定市部分市委委员发表《关于保定当前形势的声明》，认为市委主要负责人不反击右倾翻案风，有投降倒逆行。为此，他们声明脱离市委，成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办公室”。15至18日，完县、博野、涞水、徐水等县的农民宣传车进城，支持保定市“部分市委委员”的声明。

6月27日，保定地委代理书记杨凤鸣从北京打来电话，根据中央指示，地市县“反击右倾翻案办公室”一律撤销，武斗人员回原单位，抓的人立即放出。市委向中央调查组的报告中称：今年3至6月，保定市有十余个单位发生围攻、揪斗领导干部事件。有9个单位发生抢公章、夺权事件。

1976年5月底，叶剑英的侄子叶选基来找熊向晖，熊向晖谈到自

己对华国锋的印象,认为华国锋不是极左派一伙的!因为他陪同华国锋接见杨振宁时,没有听到他提批邓,也没有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6月4日晚,叶选基和刘诗昆一起再次来找熊向晖。叶选基说,华国锋现在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叶帅长期在家里休息也不好。希望熊向晖动员叶剑英见见华国锋。

熊向晖表示:“这个意见很好,你们是不是向叶帅提过?”

叶选基说:“如果熊叔叔认为可以,请你向我伯伯提。”

熊向晖答应约个时间去谈。

于是,6月7日晚,叶选基来接熊向晖一起去叶剑英在西山的住地。在谈了其他问题之后,熊向晖把话题扯到华国锋身上。他对叶剑英说:“选基和诗昆的意见很好啊!”

叶剑英说:“我和华不过是在开会时点个头,对他不摸底啊!”

熊向晖拿出他特地带来得两份材料给叶剑英看。

第一份材料是1975年9月26日,邓小平等听取胡耀邦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的说明时的汇报记录稿。当时有很多人的插话,其中就有当时作为主管科学院工作的副总理华国锋的一段插话。起初熊向晖并没有在意,华国锋担任总理后,熊向晖想起这件事,才把这个记录稿又找出来看。

插话中,华国锋讲了三大革命、四个现代化都要靠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院整顿很有必要,讲到依靠工农是对的,可是不能把专业队伍搞得一塌糊涂。他特别对批判基础理论研究的事表示不满,说,毛主席对李政道、周培源讲了,周培源写了文章(关于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人民日报》不发表,《光明日报》发表,跟着就批。这种批判基础理论研究的风搞得科学家都不敢搞基础研究了。科技人员不敢看外國书,思想有顾虑。他还对当时极左派鼓吹的上海经验提出质疑:他们搞“三突”,学上海的经验,学那个?!

熊向晖把记录稿交给叶剑英,特别请他注意华国锋的插话。并说:“你看,这些话很尖锐啊!”

第二个材料,就是他4月17日陪同华国锋和杨振宁的谈话记录稿。熊向晖说:“华国锋刚当总理不久,和杨振宁谈了近两个钟头,没有一句批邓,也没有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只批了外交部那

个造反派的儿子。这就不简单了。”

然后熊向晖又给叶剑英说了两件事。一件是公安部副部长李震死亡的定案问题。当时对李震的死因，有两种意见。公安部门勘察认定是自杀，王洪文以及公安部另一负责人却认为是谋杀。华国锋主持国务院工作后，这个事情还没有结论。熊向晖参加了华国锋主持讨论这个问题的会议。他发现，华国锋不是坐在那里听，而是谁发言，他就站在发言人的后边听，既不插话，也不问话。有人说自杀，有人说他杀，就这么说了一夜。之后，他问：“还有人要说吗？没有，散会。”

第二次再开会时，他把两边的意见归纳几点，说他杀的有几点什么理由，说自杀的有几点什么理由。然后，他让主张是他杀的人再讲讲他们的理由，接着让主张是自杀的人反驳这些理由。结果，他杀的理由都被驳倒。最后，华国锋说：“这样看来，是自杀吧。还有什么意见？”谁也说不出什么意见来了。

另一件事，是在关于李震死因问题的第二次会议散会之后，大家在往人大会堂外面走时，华国锋叫住熊向晖，问：“怎么好久不见老罗了？”

老罗是指罗青长，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

熊向晖说：“他病了。”

华国锋问：“住在哪里？”

熊向晖答：“在阜外医院。”

华国锋不解：“怎么不住北京医院？”

熊向晖说：“文革调整了他们的医疗关系到阜外医院，想住北京医院，可住不进去。”

华国锋站住了，说：“要住北京医院。”说着，就在人大会堂外的台阶上坐下来，从公文包中拿出一张纸，写了个条子：“北京医院并报刘湘屏部长，安排罗青长同志住院。”

就这样，罗青长住进了北京医院。

熊向晖对叶剑英说：“他这个作风也很好啊！”

叶剑英听了后，颌首说：“这个人是含而不露。”

熊向晖说：“我觉得华不错，不过他立足未稳，所以叶帅是否帮他一下。”

叶剑英表示，他会去见见华国锋。

6月10日，邓小平通过汪东兴致信毛泽东，希望与家人团聚：“我到这里来住，两个月零几天了，近一个月，卓琳眼病严重，住了医院。她在医院终日住在一个小房间，除医护人员外，不敢同任何人接触，也没有亲人去看她。这种状况如能改变，对疗效极有好处。所以，我们急切地提出同孩子们同住，或者首先允许她们来看望我们的要求。”

汪东兴将此信报知毛泽东。次日，毛泽东即指示，“可以同意邓小平来信请求。”

6月30日，邓小平接到可搬回宽街住宅的通知。7月19日，他们夫妇从东交民巷搬回宽街住宅。

6月26日，毛泽东的病情又发生了变化。心电图上显示毛泽东出现心律加快和间或发生早搏的迹象。尽管行动不便，但毛泽东仍然不时要求从床铺移至沙发上休息，后来又再次要求移回床榻之上。晚19时左右，遥测心电仪再次显示毛泽东出现心肌梗塞的迹象，而且这次心肌梗塞的面积较之5月11日那次面积略显扩大。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和汪东兴等火速赶到游泳池毛泽东住地。经过医疗小组的全力抢救，到凌晨时分，毛泽东的血压又恢复正常。

当天深夜，在毛泽东病情较重之时，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都纷纷赶到游泳池毛泽东住地。他们依次走进毛泽东的临时病房。当叶剑英来到毛泽东身边时，毛泽东眼里露出光亮，他的手动了一下，这动作显然是有话要对叶剑英说。可是当叶剑英来到毛泽东身边的时候，毛泽东几次张嘴却又讲不出话来，他只能与叶剑英紧紧相握。那握手时的动作和眼神，似乎流露出一种依依惜别之情。

华国锋对毛泽东的这次发病极为重视，他当即决定由自己和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4人分为两班，日夜轮流住在游泳池毛泽东住地坚持值班。为了解决医护力量不足，又从北京几家医院调来数十名医护人员，做到医护人员24小时在毛泽东身边值班，每天三班倒，使毛泽东的病房昼夜不离人。这时，江青也从钓鱼台搬进了中南海。

在对毛泽东进行抢救的过程中，医生又一次向他提出使用胃管输入营养的建议，这次毛泽东没有反对。胃管插上以后，由于能进食，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开始有了一定好转。他浑身也渐渐感到有了气力。

几天后,他又可以在护士的搀扶下下床走动了,尽管不能到室外散步。毛泽东的病情又一次出现了短期的稳定。

7月1日,政治局开会研究毛泽东的病况。江青等人起草了一个下发各省部委关于毛泽东病情的通知,其中说到:“毛主席病情比较稳定,不久就可以康复,主持工作。”

汪东兴反对写这句话,叶剑英也认为不能用这句话,会上和江青他们发生了争论。争到次日凌晨1时,一直没吭声的华国锋说话了:“争得差不多了吧?散会。”

叶剑英有些纳闷。可等他凌晨2时在家看到那天发出的电文,笑了。那句话,电文里没有。

7月1日,张闻天心脏病猝发,病逝于江苏无锡,享年76岁。

这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题目是:“在斗争中建设党”。

社论中转载了毛泽东1964年在八机部部长陈正人信上的批语:

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在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个批示中,曾经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毛主席又指出:“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毛主席还指出:“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毛主席的这一批示以及文化大革命过程中特别是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刻揭露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党内走资派的阶级本质,分析了党内资产阶级的特点、根源和战胜他们的方法,对于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7月6日下午3时01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在北京逝

世，终年90岁。临终前，朱德仍在断断续续地对周围说：“革命到底。”

闻听朱德去世。毛泽东叹道：“‘朱毛’‘朱毛’，不能分离。现在朱去见马克思了，我也差不多了！”

毛泽东一腔深情，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吟诵起南北朝文学家庾信的《枯树赋》：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

今看摇落，凄怆江潭。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一天，叶剑英主动给华国锋打电话，说：“我想看看华总理。”

华国锋在电话中一听，赶忙说：“我应该去看叶帅。听说叶帅患病，我也不好打搅。”

叶剑英说：“你忙，还是我来看你。”

俩人争了半天，最后还是叶剑英说服了华国锋，由他去看他。因为叶剑英觉得，华国锋出行的目标比他更大，还是他去华国锋那里更为妥当。

叶剑英先到中南海看望了病重的毛泽东。回家途中，他让司机绕到北京东四史家胡同华国锋住处，第一次登门拜访华国锋。

华国锋住的地方，车不能开进院里。叶剑英汽车到时，华国锋已经等在门口。这个举动，令叶剑英很欣慰。华国锋亲自为叶剑英打开车门，然后扶着他走进院子，到客厅就座。

叶剑英对华国锋说：“你现在担子重啊！我年老有病，帮不上你什么忙，很惭愧。”

华国锋说：“您是九亿人民的元帅，怎么能这样讲啊。主席让我挑这个担子，我负担很重，推辞不了，只有兢兢业业。因为怕影响叶帅养病，所以没有打搅。今后还望叶帅指点。”

一句“九亿人民的元帅”，颇让叶剑英动容。

寒暄之后，叶剑英问了华国锋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现在治国的方针是什么？”

华国锋说：“举一纲抓两目。举一纲，是阶级斗争为纲，抓两目，就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安定团结。”

叶剑英说：“好。第二个问题是：周总理逝世了，董老、朱老总也都

逝世了，中央人事安排你怎么考虑？”

华国锋说：“除非主席有指示，人事问题一概不动。”

叶剑英说：“好。”

华国锋向叶剑英请教应该注意的问题，叶剑英告诉他：要注意民兵。解放军的传统是，指挥只能是一个，不能多中心。

华国锋表示同意。

第1398回：七月七，皮定均飞机失事 七二八，中国唐山大地震

1976年7月7日，福州军区司令皮定钧，乘直升机视察福建沿海前线，飞机失事，以身殉职。随机高级军官和皮定钧的儿子，全部罹难。

事后调查情况大体如下：

7月7日11时整，皮定均等人乘坐的米—8直升机逆风起飞，开始往北，然后转向东。规定的航线是：向东600、1200、1800，向西300、900、1500米。每600米一个高层。11点10分，米—8直升机与地面指挥中断联系。下午1时左右，漳浦县东坪村的一位民兵亲眼目睹一架飞机向灶山上的一块巨岩撞去，翻滚后解体，爆炸，起火……

大概在7月下旬，新华社负责人解力夫转给姚文元一封信，信封上写着：“姚文元同志亲启”。

姚文元拆开信一看，是反映河南省委常委、组织部副部长李祥林在北京住院时，纪登奎的小儿子纪虎民去看望他时说的一番话。纪虎民说：

“北京一些人说，毛主席病重，恐怕不久于人世。毛主席一去世，把江青等人一逮捕，宣告江青是叛徒，张春桥是特务，他们就完蛋了。这事给你打个招呼，你可给河南的某些同志说一下，作个思想准备。”

随后，李祥林给驻马店地委常委、确山县委书记弓永章打电话，让他去北京一趟，说有事找他。

弓永章原来在省委组织部工作，与李祥林关系很好。弓永章到北京后，李祥林将纪虎民对他说的内容告诉了弓永章。

从北京回到郑州，弓永章将省委组织部部长董万里、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止仁、开封市委秘书长殷国华叫到省委统战部部长李剑波家里，将纪虎民的话向他们做了转达。杨止仁当即表示不相信江青是叛

徒,张春桥是特务的说法,同时认为纪登奎的儿子给李祥林传这番话,可能有来由。他说:“我们既不要相信,也不要再传播,连自己的老婆也不要说。”

事后,杨止仁向河南新华分社社长周民英说了这件事,并建议给毛主席发一个手抄件内参,说:“我们只相信毛主席。”

内参写好后,周民英派记者刘金同到杨止仁家,让他过目。内参是以组织部部长董万里和宣传部副部长杨止仁二人的名义写的。董万里知道写内参一事,杨止仁估计可能是弓永章对他说的。

随后,周民英派刘金同亲自将信送往北京新华社,时间应该是在1976年5月。

姚文元在1980年7月17日的《审讯笔录》中谈到这封信,他说:

我的思想状况。先从1976年7月下旬说起,新华社的解力夫转给我一封河南分社记者写给我的亲启信,并要求我把此信转给毛主席。这封信对我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

问:信里写的是什么内容?

姚:这位记者写信反映河南省委组织部一位负责人,1976年初在北京养病期间,纪登奎的儿子去看他时讲的一番话。这封信写得很露骨,给我印象比较强烈的有:一,用很坏的语言攻击毛主席的病,意思是说毛主席活不了几天了;二,攻击华国锋总理没有能力,说他现在虽然担任了总理,但在工作上一边向李先念问问,一边向张春桥问问,这样把两边的意见凑起来做工作,还特别攻击他在外事工作上没有经验;另外,还有许多吹捧纪登奎的话,说他父亲如何有能力,现在不高兴多管事,不高兴出主意了;三,他还说现在政治局是新派、老派之争,说那些老派现在不开口,因毛主席还活着,只要毛主席一死,他们是要大干的,他们已经秘密串联,做了准备,到时候立即宣布张春桥为叛徒,实行全国军管,接下去就是血雨腥风之类的话;他还说老派、新派无论谁上台都要流血;上海是新派的地方,死了多少人呀!老派上台也要流血,但比较起来还是老派上台好一些。纪登奎的儿子还对这个组织部长说:要他回去给省委打个招呼,对将来的事情要做好准备。这位记者还反映河南省委在听到这个组织部长传达后的情况,如刘建

勋(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等人的态度。总之,给我的印象是写信人了解很多的秘密。当时毛主席已经病重,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华国锋主席已搬进中南海。我看了这封信百感交集,一方面我不大相信,因为信中有些情况不确实,比如信中说毛主席患了喉头痛,就不对。另方面,又觉得是不是有某种根据。这里根据“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就是有些小道消息常常加进些内部情况。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毛主席逝世后,我的确有垮台的可能。这封信收到后,我思忖再三觉得不能转给毛主席,因毛主席已经病重了。我又不愿转给毛远新。也没有送给华国锋主席,因为信里有些话是说他的。我更没有想到送给江、张、王。这封信就一直压下来了,像一块大石头一样压在我的心里。

姚:当时,正是毛主席病危的时候,华主席、张春桥找我谈话,要我和纪登奎负责准备文件,以我为主。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和纪登奎一起找了办公厅的周启才、李鑫等几个人。在中南海准备文件,包括《告人民书》等一整套计划,搞好后封存在那里。

7月,毛泽东的进食已经很困难了。

毛泽东的心脏病暂时得到控制以后,医疗小组又发现毛泽东的其他病情仍在发展。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毛泽东无法进食。当时的毛泽东,双手颤抖很厉害,无奈之下,他只能接受工作人员喂饭的现实。

不久,喂饭也成了难题,于是,医护人员为他配了鼻饲食谱。食物由医务专家和厨师根据人体所需的营养成分精心配制而成,每隔一段时间通过鼻孔下插着的管子注入一次。

没过多久,肺心病又开始折磨他,使他常常处于严重缺氧状态,嘴唇都憋得发紫。他的鼻孔下于是又插入了氧气管。后来即便是流质食物毛泽东也无法下咽,一到嗓子便呛住,引起心脏不适,只能通过胃管进食。

从保存下来的毛泽东的食谱来看,1976年7月11日前为鼻饲,7月12日至9月8日为胃管进食。其中除了8月1日到13日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进食情况较好、9月3日进食一般外,其余时间都较困难。

7月17日,河北唐山召开关于地震的“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

7月21日,唐山白雾弥漫,欲下无雨,唐山人平生第一次因为气候

特异，在心情上蒙下一层疑忌的阴郁。

22日下午16时，唐山的天空骤晴，寒气逼人，怕冷的人竟然穿上了春秋装。黄昏时分，西边天空的火烧云让唐山人感到万分奇妙。

7月23日，有人提出包括北京、保定、张家口在内的京津唐会发生6级以上地震，时间在29日之前。但是人们没有接到这方面的通知。

7月25日，唐山的鸡就像发疯了一样的，无缘无故地相互追逐，发出惊恐的怪叫。人们发现，猪不进圈了，而且活跃异常，陡水河水库的鱼大量翻白，飘在水面。由于上市的鱼量猛增，以至于唐山的鱼价大跌。

这一天，中国地质专家们用古地磁方法，第一次测出了1965年在云南元谋发现的元谋猿人年龄是170万岁，证明其为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古人类。于是，中国发现最早猿人的年代，推前了100多万年。

7月26日清晨，唐山怪异的凉气袭人，一些大猪卧立不安，乱拱乱跑，忽而嚎叫，全是一副病态。而成百上千的青蛙爬出水面，伏在地上，显得有气无力，失去了往日的敏捷。这一天，整个唐山的自来水，突然变得混浊。

7月27日下午5点，唐山的天变得湛蓝，西边的天空光彩四溢。夜色浓重后，空气又闷得人难以忍受，入睡困难。这天，许多公鸡没有打鸣，不愿进食；一些母鸡四处乱奔，有的竟像公鸡一样刺耳地叫起来，奇怪的是一些母鸡连续下2个蛋，入夜不愿归宿。不少的鸽子惊飞不安，猪不吃不喝；猫对老鼠视有若无；成群罕见的黄鼠狼迁徙。井水陡落陡涨……

7月28日0时。前一天晚上的燥热，还在河北唐山至丰南一带延续着，人们闷得发慌。

2时，天空不断闪电，刺目的白光连绵不绝，有大雨降临之势。野外不断有巨大的火球从低凹处喷射出来，急冲上天空后，缓缓落下，在地面上滚动着，耀眼的光照亮了田野。

3时左右，“风声”大作，伴有“哗哗”的响动，一些没有睡实的人惊醒了。令他们感到惊恐的是，仅闻“风声”，却无吹拂的感受。在夜空中出现的许多亮光里，人们好象是在做梦。3时20分，条带状的一束

束红光蓝光从地面掠过，远处天空眩目的闪电使大地景物清晰可辨，忽而又陷入一片黑暗。3时30分，突然一道极亮的光从远处升腾，同时传来沉闷的鸣声。刹时，一切又都沉寂下来，如往昔的黑暗一般，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3时42分56秒，死神终于从地层12公里深处迸发出来。黑暗中突然闪出刺眼的光亮，地下沉闷的怪声由弱而强，由远及近，7.8级的强烈地震在唐山爆发了，其威力相当于400个美国投在日本广岛的原子弹，地震有感陆地范围达到217万平方公里，北到满洲里，西至宁夏吴忠，南到河南正阳，东破渤海水疆。

唐山大地陡然倾斜了，几乎要陷落下去，骤而转入强烈的左右摇晃。

整个唐山土崩瓦解，71座大中型桥梁和160座小桥、1000余道涵洞、280多公里的柏油路面遭到严重破坏，铁路轨道变形扭在一起，百年矿山成了一片废墟，驰名全国的唐山陶瓷工业彻底被破坏，能生产各种高中档瓷器近4千种的北方瓷都陷于灾难的深渊……

更让人震惊的是，唐山106万人口中有63万被压在废墟之中，在一瞬间，24万人死去，另有16万4千人受到了重伤。

中共唐山市委第一书记许家信被抢救出来后，立即在市中心的马路上，建立起“抗震救灾指挥部”。4时，一辆大轿车风驰电掣般驰过烟尘弥漫、余震频繁的大地，直奔市委而来，这是第一个向市委报到的人民汽车公司党总支副书记李玉珍和她的同事，她急切地抓着市委第一书记的手：“我们有140辆车完好无损，整装待发。现在，救护阶级兄弟需要我们，运输物资需要我们，宣传动员需要我们，下命令吧！”

据8月25日《人民日报》在《伟大的核心力量》中记载，“许家信望着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这个二十五岁的新干部，心情十分激动。”

尽管国家地震局办公楼里的测震仪记录被震动出了格，但直到4时30分，全国各处的地震台才陆续汇报测到的数据，而且在7级以下的或8级以上，相差极为悬殊，国家地震局一时难以作出定论。至于震中在哪里，大多数人说是在“北京附近。”为了尽地震工作者的职责，他们不得不分兵四路，在以北京为中心的200公里范围内，寻找震中。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最早确定出震中的竟是邮电部,因为他们与各地的联络中,唯独挂不通唐山的电话。

清晨6时10分,震中唐山终于确定出来。

此时唐山的黎明,一个失去了往日喧闹、失去了生气活力、失去了生命的清晨来到了。曾忙碌的身影已无处追寻,天真的笑语成为绝音。但中共唐山市委的常委们却丢下个人的一切,纷纷赶到书记身边,在李玉珍的公共汽车里,举行了震后第一次常委会。许家信含着热泪,对大家说:“在严重的灾害面前,我们坚信毛主席、党中央一定会迅速援救唐山人民!”

许家信没有估计错,8时06分,国务院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了紧急会议,紧急部署救灾。

当天,党中央和国务院紧急调集解放军部队、医疗队和工程技术人员,日夜兼程,赶赴唐山灾区,抢险救灾。

上午10时,北京军区先头部队乘飞机着陆唐山。但,他们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整个唐山一片废墟,桥梁折断,烟囱倒塌,列车出轨,七零八落的混凝土梁柱东倒西歪,落而未落的楼板悬挂在空中,到处是断墙残壁……

唐山火车站,东部铁轨成蛇形弯曲,其轮廓像一只扁平的铁葫芦。水泥马路,被拦腰震断,一截向左,一截向右,错位达一米之多。

路边越堆越高的尸体山!头颅被挤碎的,双脚被砸烂的,身体被压扁的,胸腔被戳穿的……最令人心颤的,是那一具具挂在危楼上的尸体。有的仅仅一只手被楼板压住,砸裂的头耷拉着;有的跳楼时被砸住双脚,整个人倒悬在空中。这是遇难者中最敏感的一群,已经从酣梦中惊醒逃生,然而他们的逃路却被死神截断。有一位年轻的母亲,在三层楼的窗口已经探出半个身子,沉重的楼板便落下来把她压在窗台上。她死在半空,怀里抱着孩子,在死的一瞬间,还本能地保护着小生命。随着危楼在余震中颤抖,母亲垂落的头发在雾气中拂动。

当时除了双手几乎再没有其他可以用来营救的工具。人们似乎感觉不到指甲剥落、血肉模糊的手的巨疼,而往往是闻声便拼命扒,等扒出时却没了任何气息。

7月30日清晨6时，沈阳军区以最快速度，奔赴唐山，开始大规模营救。但是，当唐山需要医疗物质时，中国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外国的援助，认为那是“不怀好意的所谓人道主义。”

大量尸体在高温多雨环境下迅速腐烂，密麻麻的苍蝇在空中飞舞，腐烂味四处弥漫。传染病的发病率日趋上升，几乎接近暴发的程度。中央紧急命令快速集结防疫人员，调运杀虫、消毒药品400多吨，不分昼夜从空中、地面立体喷洒，向瘟疫作战。市区的蚊子几乎被消灭殆尽，但苍蝇仍大量孳生。在短时间内转移、深埋所有腐烂的尸体，难以尽数的尸体用棉被捆包后立即运走。

第1399回：急救灾，华国锋赶赴唐山 重庆市，百余干部奔成都

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安安静静地躺在他那张宽大的木制床上。他那均匀的呼吸，那安详的脸庞，那微微张启的双唇，使护士孟锦云感到毛泽东今天睡很舒坦，她放心了。

毛泽东的睡眠一直就是老大难。进入80高龄的毛泽东，入睡，更成了难以解决的大问题。小孟来到毛泽东身边防工作之后，也常常为他的睡眠而发愁，使他能睡好觉，这成了小孟的一个很重要的护理任务。今天，看到毛泽东睡得好，小孟心里简直是一块石头落了地。不然，她又要在本上写下“7月28日1点——4点，睡眠不好”的记录了。小孟想着想着，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忽然，小孟觉得有人在用力摇她的椅子，她被惊醒了，马上站起来，发生了什么事？耳边传来了玻璃震动的哗哗的响声。她发现卧室里的窗帘正在抖动。她往毛泽东的床上一望，看见他依旧躺在那里，很踏实，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只不过，已经睁开了眼睛，神态像是在想什么。

这时，护士小李、小俞已经急急忙忙跑进来了，只听小俞慌里慌张地说：

“小孟，地震了，大厅里的窗户震得好响。主席怎么样？没事吧？”

按平时的规定，她们不得允许是不能随便进入毛泽东卧室的，但今天是特殊情况。也就顾不得这些了。

也不知是谁的主意，小孟她们几个人，从毛泽东床边的小柜子里拿出一条床单，几个人一人抻一个角，撑在毛泽东床面上，为的是怕天花板上掉下什么东西砸着他。她们一声不响地抻着，几分钟过去了，毛泽东又睁开了眼睛，翻了翻身，他好像忽然发现了自己头上面的那条床单，那条白色的细棉布床单在他头顶上面抻着。他略微转动头，向上面，向左右看看，他有些奇怪了，微微一笑，然后说：

“怎么？抻床单做什么？”

小孟听见毛泽东笑着发问，便马上回答：“主席，刚才发生地震了，小李他们吓得不得了，赶快跑来，保护您呢。”

毛泽东听了，似乎觉得十分好笑，又很好玩。他不慌不忙地说：“地震了，越震我倒睡得越香噢，这叫地震不醒安如山嘛。”

小孟说：“我们都紧张坏了，您还有心思开玩笑。”

小俞说：“主席，这次地震可厉害了得很，比邢台那次感觉明显多了。”

“总有一天，会天塌地陷，自然规律么，不用怕。”

“您什么都不怕，我们可害怕死呢，可能还要有余震呢。”小李也补充了这么一句。

“怕也好，不怕也好，我看你们抻着单子倒没必要。房子塌下来，一条单子能顶住？”毛泽东做了个落下来的手势，他用手向下挥了两下，几个工作人员才把单子放下来，叠好放在一边。她们也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些莫名其妙。

大约4时59分，张耀祠来到了毛泽东的会客厅。他通知张玉凤和孟锦云：“河北省冀东地区的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根据预测，近期很可能还会有余震。主席目前住的房子不太牢固，需要让他马上搬家，搬到新建的202房间去。那所房子安全些。”

所谓202号就是一座占地面积很大的平房区，它位于游泳池住地南侧，1969年为战备的需要动工修建，1974年建成。202平房区有一条回廊可与游泳池住地相连。这所新宅的特点是防震抗震和适于当时的战备需要。

清晨，汪东兴向毛泽东报告唐山地震情况，建议他尽快离开目前的住处“游泳池”，搬到较为安全的地方。

毛泽东住的游泳池是60年代在中南海游泳池的基础上扩建的，不甚牢固，所以在地震之前就几次劝他搬家，但他始终不肯。这时，小孟根据张耀祠的意见，对毛泽东说：“主席，汪东兴、张耀祠都来过了，他们讲了这次大地震的情况。还讲您现在住的这所房子不太结实，可能还要有余震，希望您赶快搬家。”

毛泽东对搬家的事没有表态，只是紧接着问：“这次地震的情况怎

么样？有没有简报？”

小孟赶紧把刚刚送来没多久的一份简报清样拿来给他读了一遍：

“……我国河北省冀东地区的唐山、丰南一带，7月28日3时42分发生强烈地震，天津、北京市也有较强震感，据我国地震台网测定，这次地震为7.5级，震中在北纬39.4度，东经118.1度，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毛泽东听了之后，显出一种少有的焦虑，小孟还在催促毛泽东搬家，她赶紧说：“您不怕，我们还害怕呢，您也不替我们想想？”

小孟故意用这样的话去激毛泽东，没想到还真灵验了。毛泽东听了她的话，没有摇头，也没有摆手，而是闭上眼睛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说：“你们怕，那就搬吧。”

毛泽东终于被说服了。他同意搬家的消息，几分钟后就传到了汪东兴、张耀祠那里。20多分钟之后，搬家就开始了。所谓搬家，其实，比一般人搬家简单多了。202那所房子，虽然毛泽东一直未搬进去住，但一切都是按随时吃住在管理着，每天打扫卫生，开窗换空气，调节温度，里面的一切设施齐备，只要进来就能住。7月31日，重病在身的毛泽东由警卫战士和医护人员抬上自动移动病床，沿着那条走廊向202平房区转移。

这时的毛泽东，许多时间是处在昏迷半昏迷状态。但在他清醒时，仍十分关心唐山震情。他身边的医疗组成员、神经病学和老年医学专家王新德回忆道：“送来的地震情况汇报，主席不顾个人病重，都要亲自过目。这场地震伤亡达24万多人，其他的损失难以估量。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主席哭了。我第一次亲见主席嚎啕大哭。”

8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递到了毛泽东床头。这是他生前圈阅的最后一份文件。看完报告后，毛泽东立即将主持政府工作的华国锋叫到床前，叮嘱他：“要全力救灾，这是最要紧的。”

8月4日，华国锋受毛泽东的重托，率领中央慰问团赶赴唐山，传递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受灾群众的关怀之情。



1976年8月4日，华国锋、陈永贵受毛泽东委托，视察唐山抗震救灾。（钱嗣杰摄）

唐山地震的第二天，7月29日，杨成武住进西山5号楼，与住在15号楼的叶剑英、住在1号楼的聂荣臻相隔不远。后来，王尚荣也住进西山7号楼。

说说这时候的重庆。6月下旬，重庆市委召开部、委以上党员负责干部会议，市委书记鲁大东在会上作检查。黄廉、周家瑜等人对鲁大东的检查很不满意，就是通不过，不得不休会一周。到了7月中旬，部长会扩大成了局长会。局长会开了没两天，鲁大东被赵紫阳叫到成都汇报工作，局长们吵吵闹闹乱成一团，会也开不下去了。7月22日，黄廉、周家瑜提出要赵紫阳来重庆参加会议解决问题。他们把赵紫阳电话的声音在会议上“现场直播”，让全体与会人员都听到。

赵紫阳在电话中说目前来不了重庆，希望大家把会开好。黄廉马上接过话头在电话中说：“你来不了重庆，我们就到成都来开！”

当天傍晚，黄廉、周家瑜调来几部大客车，拉上参加会议的三位市委书记和部、局长等大约150人，连夜去了成都。

从重庆公交公司调集来的车队浩浩荡荡，把150位重庆的干部拉到了成都市中心的锦江大礼堂，可是没有在大礼堂继续开会。根据省委的招呼，省里的各个部门对口接待了重庆的部局级干部，黄廉、周家瑜、李木森、陈万明、袁金梁五位文革中的造反派被安排在锦江宾馆住

下来。

对黄廉和周家瑜等人的做法,重庆一些老造反派,比如军工“反到底”的李木森、“815”的陈万明、熊代富等人有看法,认为这样搞不符合中央“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搞运动”的精神。现在黄廉、周家瑜要闹到成都,很可能造成赵紫阳对于重庆造反派的错误印象,于是李木森和陈万明决定要向赵紫阳当面汇报自己的想法,就一起跟着来了。而时任重庆革委会副主任,原“815”的老工人袁金梁,两头都想讨好,但是两头都避他。他也跟着来了。

7月26日,赵紫阳、段君毅在省委三号楼接见重庆的黄廉、周家瑜、李木森、陈万明、袁金梁,再次明确表示不同意局长会在成都开,认为那必然会影响各个专县都把会拉到成都来开,哪能行呢?回重庆去开最好,可以叫成都军区值班飞机送大家回去。实在不行,在成都附近专县开也可以考虑。但黄廉、周家瑜二人仍然坚持要在成都开,并提出如果回重庆开,赵紫阳就必须立即去重庆。

第二天上午,赵紫阳和段君毅在省委三号楼再次接见五位群众代表。赵紫阳说,他昨晚没有睡着觉,想了一个晚上,想出一个新方案:在成都开部委会,局长们在省委接见后回重庆去开会。但黄廉、周家瑜仍然不同意。赵紫阳不高兴了,干脆摊牌说:“如果硬要逼我对大家来成都一事表态,我只能说是错误的。但最好还是回避这个问题吧。”

7月28日发生唐山大地震。在接下来的28日、29日和30日上午,赵紫阳分期分批接见了重庆各部、委、局这次到成都的干部。

30日下午,赵紫阳准备分别接见重庆的五位群众代表,他大概从前两次接见中已经看出五人之间有不同意见,就让他的秘书安排分成两批,先通知黄廉、周家瑜和袁金梁去。但黄廉、周家瑜不愿意与袁金梁一起,大概是怕他回来后会把有些话讲给李木森他们听。于是赵紫阳只好先接见黄廉、周家瑜二人,然后第二天上午再接见李木森和陈万明、袁金梁三人。但是李木森和陈万明也不愿意让袁金梁一起参加接见,也怕他把有些话传到黄廉、周家瑜的耳朵里去。赵紫阳又不得不只接见李木森和陈万明两人。这样,最后老工人袁金梁面子最大,赵紫阳在31日下午单独接见他了。

赵紫阳在7月31号上午接见李木森和陈万明,秘书也没有在场。

他俩向赵紫阳汇报的主要是关于鲁大东的评价问题。他俩明确表示：鲁大东绝不是什么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按照中央的标准，他最多只是个“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可是黄廉、周家瑜从“批邓、反右”一开始，就咬定鲁大东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在中央“打招呼会议”后，他们硬说鲁大东没有全面传达中央首长指示，批鲁打鲁达到高潮。李木森和陈万明二人还明确表示了对赵紫阳的不满：“黄廉、周家瑜还不是党员，你赵书记就指示重庆要让他们列席市委常委会，还要他们协助市委工作，他们当然更认为自己有了后台，打鲁大东打得更起劲了。他们用你赵书记来压鲁大东，这都是在你支持下形成的恶果！”

赵紫阳听着，也不生气，说：“你们看到最近《四川日报》登的黄廉、周家瑜的文章没有？他们两人资产阶级派性克服得很好，亲自带头大讲团结，这就很好嘛……”

没等赵紫阳说完，李木森和陈万明就叫起来：“这哪是讲什么团结嘛，这完全是个幌子，这是在为黄廉入党大造舆论，这篇文章在重庆登不出来，他们只好拿到成都，通过你赵书记批示，才在《四川日报》登出来了，写得好像黄廉已经是个共产党员了。难道这一点你赵书记还看不出来吗？要说这就是讲团结，他们怎么不和我们这些群众代表讲团结？就他们两个人团结？”

李木森和陈万明二人不说则已，说起来就一泻千里，从他们与黄廉、周家瑜的矛盾，说到文革中重庆两派的矛盾，与军队的矛盾，各派内部的矛盾……赵紫阳听着，也不反驳，这么复杂的关系，或许他已经被搞糊涂了，只是说：“我刚刚到四川来，对情况不了解……”

此时的成都被唐山大地震闹得人心惶惶，常常半夜里有人叫一声“地震了！”立即全城惊慌，听说 132 厂就有人听到风就是雨，跳楼摔断了腿……重庆来的 100 多人也无心久留，赶快回去了，可会还没有开完啊，得继续。这次重庆历史上史无前例的“马拉松”部、局干部大会，从 6 月开始，从重庆开到成都又开回重庆，到 8 月 13 日才算正式结束。最后黄廉、周家瑜作了个联合发言，号召干部们起来“反潮流”。

8 月 15 日下午，熊向晖得到叶剑英通知，到西山他那里见面。

地震之后，北京家家户户都搭起防震棚。叶剑英那里也没有例外，院子里一东一西搭了两个帐篷，叶剑英在东边那个帐篷里办公会

客。他对熊向晖说：“你对华国锋看得对。”他举了7月1日中央关于毛泽东病情通知的例子后说：“我经过观察了解，这个同志确实好，应该支持。我已经告诉王震了。”

叶剑英跟熊向晖详细讲了他和华国锋见面经过和他们谈话的内容，觉得华国锋说话做事很得体。他对熊向晖说：毛主席一下子把华国锋提为中央第一副主席，这是“非常之时，非常之人”，“还是毛主席巨眼识英雄啊”！

当天晚上，叶剑英留熊向晖在他家院中西边那顶帐篷里共进晚餐，还喝了茅台。

8月16日晚上22时06分，四川松潘至平武一带发生7.2级地震，成都和甘肃武都均有强烈震感。由于地震部门吸取了唐山地震的教训，对此次地震做出了提前预报，中共四川省委又在事前采取了防震措施，因而损失很小。

第 1400 回：山西省，书记王谦戴高帽 到天津，江青三下小靳庄

8月23日下午，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在太原被戴高帽游街批斗。

此事还要从1976年年初说起，当时北京、上海、天津煤炭告急。4月24日，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直接给大同市委书记赵力之打电话，要求大同保证煤炭运输，特别是京、津、沪的用煤。他说：

“老赵你要千方百计地想尽一切办法，把大同的煤炭运出来，无论如何要保证京、津、沪的用煤，假如国庆节总理举行招待会，电灯突然灭了，怎么办？这是关系到国际影响的大事啊！”

当晚，大同市委在大同铁路分局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吸收分局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参加，传达纪登奎电话指示精神，研究贯彻执行措施。会后，分局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除留一人在局机关主持日常工作外，其余分三个组带领机关工作人员下到口泉站、大同站、机务段蹲点，认真耐心地做两派的政治思想工作，说服他们顾全大局，团结合作搞好煤炭外运，保证京、津、沪的需要。同时特别注重了恢复铁路运输的正常管理秩序和规章制度的执行。

经过整顿，大同铁路分局运输秩序有了明显好转，运量有了显著提高。担负外运主要任务的口泉站，平均日装车由4月份的759车，提高到6月份886车。为此，铁道部向大同市授旗予以表彰，铁道部长万里向大同市委表示感谢，省委要市委汇报，大同市委作了总结。之后，省委把大同市委的做法报告了中央。中央肯定了大同解决问题的做法，并于6月26日下发中央(1976)12号文件，转发了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大同铁路分局的情况报告》。

1976年7月中旬，王谦来到大同，主持召开学习贯彻中央12号文件精神的大会。大会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精神为指导，经过49天的学习讨论，于8月21日结束，形成了会议纪要。

8月23日,太原铁路局革委会在太原铁路局俱乐部召开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贯彻大同会议精神,并邀请省委第一书记王谦和市委第一书记黄志刚、副书记马杰等领导参会。

大会尚未开始,一群工人却将准备前去开会的太原铁路局党委书记谢治国等领导在机关拦截住,并拉上早已准备好的大卡车,戴上高帽子,挂上铁牌子,开始游街批斗。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情形呢?原来文革开始后,太原铁路分局也出现了两派群众组织。一派是“太铁红旗造反兵团”,简称“太铁红旗”;一派为“红色铁路造反总指挥部”,简称“红铁总”。“太铁红旗”最早是参加“红联站”,1967年“七月会议”后加入了“山西革命造反兵团”,而“红铁总”则加入了“红总站”。

1968年9月,太原铁路分局在69军派驻军管会首长的带领下,实现了两派大联合,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军管会的部队首长任革委会主任,“太铁红旗”的政委、原太铁分局南机务段工会副主席张安邦和“红铁总”的头头、原太铁分局的一位列车长周万喜,他们二人作为两派的代表人物,都是副主任。

1973年3月,“太铁红旗”的副政委、原太铁分局工会的宣传指导员王弼现,因为说说写写都行,在调入太原铁路局工作后,又被省委任命为太原铁路局革委会副主任,而原太原铁路分局革委会副主任、“太铁红旗”的政委张安邦则被任命为太原铁路分局党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另一位太原铁路分局革委会副主任、“红铁总”的周万喜呢,此时却在监狱里蹲着。原因是武斗期间,“红铁总”打死了“太铁红旗”一名通讯工段的工人宋锦。直接凶手被判死刑,周万喜作为“红铁总”的领导,负有领导责任,被判处5年徒刑,直到1974年,谢振华被批判,此案才被作为谢振华制造的冤假错案,于1974年的8月平反,周万喜提前出狱。但被分配做工人工作。

1975年3月5日,中共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其中第四条规定:“对于少数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干部和头头,应及时调离,不应久拖不决,妨碍大局。”在太原铁路局的整顿中,王弼现和张安邦被作为谢振华安排的干部被调离。而平反出狱的周万喜呢,则要求重新分配工作,认为被安排工人是错误的,

是谢振华路线对他的迫害。

1976年春，王弼现与张安邦等几位被调离的太原铁路路局和分局的干部去北京上访，经铁道部万里部长过问，又经铁道部和山西省委沟通，两家达成共识，让他们回来继续担任原职务。于是，王弼现和张安邦分别以太原铁路局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和太原铁路分局的党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的身份参加了大同会议。而在大同会议快结束时，山西省委和太原市委、太原铁跌局党委又达成共识，让周万喜官复原职，重新担任太原铁路分局的革委会副主任。

太原铁路局政治部干事张金高、太原铁路局保卫科代理副科长种志远、太原铁路局公安处办公室副主任程子和、太原铁路局工程处技术员陈岳秋等人闻讯后，立即组织人马，决定阻止对周万喜的任命。当他们得知8月23日，太原铁路局党委准备在太铁俱乐部召开大会的消息后，张金高等人也决定，在大会开始前，揪斗局党委书记谢治国等局级领导，以阻止对周万喜的任命。

于是就有了大会前，太原铁路分局党委书记谢治国等人在机关被强行堵住，并被拉上卡车游斗一幕。

当王弼现和张安邦等其他领导来到俱乐部大会现场时，见坐在俱乐部贵宾室的只有省委书记王谦一位领导。原来，市委第一书记黄志刚在路上听到会场有变，小车掉头而去。副书记马杰的车被拦下，人被截走。王弼现和张安邦等太原铁路局、分局领导纷纷请王谦赶紧离开，以免意外。王谦却安坐不动，并指示王弼现等人坐上他的小车，阻止游斗谢治国等领导的行为。王弼现等人便钻进王谦的专车，去追赶游斗谢治国等领导干部的队伍。虽然他们追上了游斗谢治国的队伍。但不仅没有拦住队伍，下车劝说的王弼现反而被现场的工人骂为叛徒并遭到了殴打。当这些工人得知王谦在会场贵宾室的消息后，张金高、种志远、程子和、陈岳秋一干主要组织者紧急商议，陈岳秋提出要揪斗王谦。虽有不同意见，但陈岳秋却坚持干下去。他带人返回太铁俱乐部，将王谦绑架到一辆早已备好的邮政闷子车内，等车开出了太铁俱乐部，又将王谦架到了一辆大卡车上，开始沿街游斗。

在游斗省委、市委和太原铁路局、太原铁路分局主要领导人的过程中，一些工人还对王谦、谢治国等领导进行殴打，致使他们多处

受伤。

游斗结束后，省委办公厅立即将王谦送到晋祠 264 医院检查休养。

山西太原“823”揪斗省委书记事件震动中央，华国锋和陈永贵等人商量，准备抓几个人。华国锋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这个想法，姚文元不以为然地说：“这是群众运动嘛！”陈永贵大怒道：“群众运动？人都要打死了，什么群众运动？你去试试看，南京不过就贴了你们几张大字报，你们就受不了啦！”

华国锋见陈永贵火气太大，赶紧叫纪登奎把他拉了出去，随后宣布散会。

8月26日，中共中央给山西省委电话通知，称之为中共中央的“八·二六”指示紧急下达：

山西省委：

据了解，8月23日下午，太原铁路局召开贯彻中央(1976)12、13号文件，学习大同经验汇报会议的时候，陈岳秋等个别坏人蒙蔽和煽动少数人，挑起了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打、砸、抢事件，绑架、打伤省委第一书记王谦和太原铁路局党委书记谢治国，常委、革委会副主任王弼现等同志，破坏中央(1976)12、13号文件的贯彻执行。中央要求你们立即严肃处理这一事件。

一、省委贯彻(1976)12号文件，解决太原铁路局的问题是正确的，必须继续认真把这项工作做好。

二、任何人不准冲击铁路，对反革命、对打砸抢者必须实行镇压。对陈岳秋、梁永智等几个打人凶手，要立即逮捕法办。被揪走的太原市副书记马杰同志，要责令他们立即送回。任何人不准以任何借口非法抓人、扣人。

三、省委要继续领导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集中火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这个总目标下，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团结起来，抓革命，促生产，发展大好形势。

四、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守工作岗位，站在运动的前列，带头学习，带头揭发，带头批判。有错误的同志，要同广大干部和群众一起学习，

一起批邓，转好弯子。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有错误就改，改了就好，不能揪住不放。

五、任何人不准串连，不准拉山头，不准搞战斗队，不准冲击、占据党政领导机关。现在占据省委机关的人，要立即退出，回到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

中共中央
1976年8月26日

（根据录音整理）

山西省委遂于8月27日上午，举行广播大会，贯彻中央指示，并责成公安机关，逮捕了这一事件的一批策划者、指挥者和打人凶手。而王弼现、张安邦又被作为8月23日事件的幕后策划者逮捕，并于1978年12月27日，王弼现被判无期徒刑，张安邦被判有期徒刑20年。其余张金高、种志远、程子和、陈岳秋等22人，分别给予了判刑和免于刑事处分。其中，张金高、种志远二人被判无期徒刑，程子和与陈岳秋二人被判有期徒刑20年。

王谦认定这一次揪斗他的恶性事件，必然是原“红联站”头头段立生、原“兵团”司令刘灏、副司令宋杰等人一手操纵和一手指挥的，于是以肃清“谢振华流毒”为名，给“段、刘、宋”设立专案组隔离审查。

许多慰问电飞向王谦。

“戴钢盔高帽重不重？”陈永贵笑着问王谦。

王谦笑道：“重倒是重，可重还问题不大，主要是扣得不行。”

“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搜集上来，摆了展览？”陈永贵说，“这些家伙给我们革命干部准备的刑法就是这些嘛。这可以教育我们的后代，是一件好的教育，反面教育吧。”

8月28日凌晨2时37分，江青乘专列来到天津。因为是在发生地震之后，天津市区内有许多房屋倒塌，江青没有下车，就住在专列上。早饭后，她乘车去看看市内几条街道的震后情况。

路上，她将解学恭叫到她的车上，对解学恭说，要见见天津驻军，说她1974年6月第一次来津时，看望天津驻军指战员，天津驻军曾因此受到邓小平的批评，现在要为他们恢复名誉。她让解学恭转告 66

军军长刘政，把她1974年6月写给他的那个“66军战斗队”的顺口溜给抄来，并要给她拿套军装，说来时急，忘记带了。她还说警备区的部队也要去看看。

解学恭说，还有来津支援抗震救灾的67军，建议也去看看。

江青同意。

汽车行至津塘公路和京山铁路交叉口附近停车，解学恭下了江青坐的车。

随后，江青的专列又开往宝坻，她要去小靳庄看看。下午14时，专列抵达宝坻。这里受地震破坏也相当严重，断垣残壁随处可见，有的路段因房屋倒塌行走都受到影响。

下午16时许，江青来到小靳庄。她先到各处看了看，接着走进受灾群众住的地震棚里坐下，了解了一些情况。她看见一个青年女社员在临建棚里流眼泪，一问才知是激动的泪水。

社员们走上前来，纷纷表达对首长的思念之情，并且盼望首长能多来小靳庄。江青说：“我也想你们。我来一次不容易，主席不批准，我是来不了的，我有我的难处。”

她对社员们说：“可到家啦！”“整天看文件，把我憋坏了”，“到你们这里才幸福”。

江青照例要干些农活，她和社员及到此抗震救灾的人员一起，参加了搬砖瓦等拆除危险房屋的劳动。因为那次去小靳庄没有带摄影记者，随行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就用自己随身带着的照相机，拍了一些当时江青活动的情景。

随后，江青来到小靳庄附近一支抗震救灾部队的驻地，高声说：“我还没有吃饭呐，我饿了，我还要吃药。”

她走进战士住的帐篷，让解学恭解散了围观的社员，然后吃了社员送来的玉米面饼和稀饭，在帐篷里睡了一个小时的觉。

江青睡好了，就在小靳庄召开座谈会。

小靳庄政治夜校前的场院里灯火通明，人们早已汇集在这里，除了小靳庄的代表，还有司家庄和窦家桥两个生产大队的代表，他们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并且翘首以待。

首先发言的是小靳庄的党支部副书记兼民兵连连长王杜。王杜

他们去年年底就曾派人到北大、清华，从迟群、谢静宜那里了解批邓的精神，小靳庄的大批判也就由批孔转入批邓。就在昨天，迟群和谢静宜还来过小靳庄，送来了邓小平的“三株大毒草”。

小靳庄汇报完了，窦家桥的党支部副书记司福玉接着汇报。江青听说司福玉是知识青年侯隽的丈夫，就要他上前边来，让她看看。司福玉以饱满的革命激情汇报说：“窦家桥以小靳庄为榜样，坚决同邓小平对着干。”

江青评点说：“小靳庄受气了，名声太大，树大招风。”

司福玉继续汇报批邓，但没说几句，又被江青打断了。她说：“主席很宽大，邓小平犯了那么大的罪，主席却对他宽大得不得了。”她说邓小平还一直拿着国家最高的薪水，“享受超出资产阶级法权”，“他是个大家庭，有二十几口人，住最好的房子。他和孩子在一起，天天见面”。最后，她反问道：“你说主席宽大不宽大？”

解学恭在一旁应和：“留个反面教员嘛。”

窦家桥汇报完了，与知青邢燕子同村的司家庄党支部副书记焦清芝接着汇报。邢燕子介绍说：“焦清芝 22 岁，属马。”

江青很高兴地说：“我属虎，能吃你们。”

江青除了批邓，还讲女权。小靳庄的一位下乡女知青被选来专讲男女同工同酬的问题。

一直到晚上 22 时，江青他们才从小靳庄返回天津。

29 日，江青到天津手表厂、第一炼钢厂参观，并在火车上接见了几位在津唐一带抗震救灾的部队领导。

当晚 23 时许，解学恭刚服安眠药睡下，突然来电话，江青让他马上到专列去。江青一见到解学恭，就十分严厉地说：“你见到了这个方案吗？”说着，她把一份天津驻军打印的“接见单位名单”甩给解学恭。原来江青安排次日要到部队去，驻军印了一份“接见单位名单”，直接送给了江青。江青板着脸说：“为什么称‘接见’？这是谁的主意？我是探望部队，不是接见，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为什么混淆起来！”

她还说：“只有中央政治局在北京才是接见，我个人怎么叫接见呢！”

她越说越气愤，解学恭不知所措。江青最后说：“明天我不去部

队了。”

这时解学恭有点着急，部队已准备了两天，现在改变计划对部队怎么解释呢？解学恭想，或许自己承担了责任，事情还有挽回的可能，于是说“接见”这个词是他建议的，部队没有责任，部队准备了两天，不去恐怕不好，还是去探望一下。江青听到解学恭承担了责任，才说：“可以去。”江青讲话时解学恭简要记了一下，江青把解学恭的记录稿拿过去看后说：“大体还可以，有两个地方需要加一下。”

解学恭以为她要亲自改，但是江青是让解学恭自己用笔在上面加上她的话。最后对解学恭说：“请你把今晚的谈话给我整理成一个记录，并起草一个电话稿，报告华国锋同志。”

回来后，解学恭按江青的意见办了，把整理和起草好的记录稿、电话稿送给她看，她批了“同意”，并让解学恭抄清一份给她。

第 1401 回：见李敏，毛泽东依依不舍 到大寨，江青连夜回北京

1976 年 8 月 30 日下午，江青去天津毛条厂看望那里的支援天津抗震救灾的某军和警备区连队，当晚返京。

30 日下午，解学恭起草的电话稿报到了华国锋处。

解学恭记的“江青同志谈关于探望参加天津抗震救灾人民解放军连队”的记录稿是：

(一) 探望和接见是两个不同性质的原则问题，决不能混为一谈。军里的报告提出了接见方案，提醒了我。(注：‘接见’——这一建议是我向江青同志提出的，军里没有责任，责任在我——解注)探望也要按下列要求办：第一，首先是探望参加抗震救灾的基层单位——连队；第二，陪同探望的领导干部，也是参加抗震救灾的，军级干部不能多了，有一、二位就可以了，也是参加或指挥抗震救灾的；第三，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的唐山、丰南、天津市、北京市抗震救灾先进集体和模范个人代表会，届时中央要接见代表。这是接见。我到小靳庄探望贫下中农，同时也看望了在小靳庄参加抗震救灾的师指战员同志，在那里吃了社员王锡恩同志家的饭，其中也有九连战士的饭菜。这是探望，也不是接见。

(二) 请转告在天津参加活动的新华社记者、光明日报记者、天津日报记者，请他们不要帮倒忙。一般不要用《内参清样》报道我的活动情况；如果要搞点内参报道，也要恰如其分，不要胡乱吹捧，言过其实。最好不搞。

解学恭整理于 8 月 29 日晚 12 时许。

解学恭起草的给华国锋的电话稿：

江青同志于 8 月 28 日到了天津市宝坻县小靳庄大队，看望了小靳庄的贫下中农同志，邢燕子同志所在的大队和侯隽同志所在的大队也派来了贫下中农代表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同时也探望了在

小靳庄参加抗震救灾的九连的指战员；在小靳庄吃了社员王锡恩同志家的饭，其中也有九连战士吃的饭菜。江青同志在9月29日又看望了在批林批孔推动下已经全面恢复了生产的天津手表厂、第一炼钢厂的工人同志。我建议江青同志接见一下在天津参加抗震救灾的66军、67军、天津警备区各一个连队和部分先进代表。江青同志告诉我，不是接见，是探望，不要把两个问题混淆了。中央决定接见抗震先进集体和模范个人代表，这是接见。根据江青同志的意见，在29日晚纠正了我的建议和安排，决定只探望三个军的三个连队，都是参加抗震救灾的。我认为江青同志这个意见是正确的，我的安排已经纠正了，特向你报告。

解学恭 8月30日上午。

在毛泽东病情稍稍稳定的日子里，他又恢复了从前惯有的读书习惯，不满足工作人员为他读报，而是坚持用已经恢复视力的左眼，阅读那些线装书和大字《参考消息》。在唐山大地震发生后，毛泽东除不断关心灾区人民抗震自救的信息外，有时也在护士搀扶下，来到病房门外散步，只是他双腿仍然软弱无力。不过因有胃管不断输入营养，毛泽东的精神尚好。8月中旬，遥测心电仪又一次显现出心脏跳动不规律的迹象。而且在这期间，毛泽东的情绪变得烦躁起来，右侧肢体的偏瘫症状也变得明显加重，毛泽东只有在左侧偏卧才能保证呼吸畅通。这时，医疗小组重新调整了医疗方案，相机投入一些控制心脏早搏的药物。

鉴于毛泽东的病情，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8月28日上午，中央警卫局派车把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李敏接过来看望父亲。8341部队中队长陈长江在门口迎接她。李敏下车，见着陈长江便说：“陈叔叔，你好。”

其实，陈长江只比她大几岁，且她已做了妈妈，但她还是像年轻时一样称他叔叔。

“你胖了。”陈长江也打着招呼说，“身体好吗？”

“还好。”她笑着说，“好久没见了，你还是这样。”

“我也老了。”说到“老”字，陈长江又想起毛泽东的“老”，难过得再也说不下去。

当他把李敏送进毛泽东的卧室时，毛泽东正处在半昏迷状态。当张玉凤告诉他李敏来看他时，毛泽东居然醒了，使劲地微微睁开了眼，想看清站在床前的女儿，嘴巴张了几张。在场的陈长江等人听不清他说什么。张玉凤推断说：“主席在问，李敏：今年多大岁数了？”随后，毛泽东握住李敏的手，闭目不语。

过了许久。李敏以为父亲睡着了，将手慢慢抽出，谁知她的手被父亲紧紧地攥住，不肯放开。他再次睁开了双眼，但已饱含了泪水，望着女儿，用含混不清的发音慢慢地与李敏说话。陈长江明白自己应离开，便退了出来。

“姣姣（李敏的小名），你怎么不来看我？”毛泽东问。

李敏说不出话来，因为自她搬出中南海后，再要进到中南海，要经过层层批准，毛泽东哪知道这些呢？他顿了顿，休息了片刻，又深情地说：“姣姣，你要常来看我，我想你啊！”

“嗯。”李敏流着眼泪点点头。

“你今年多大了？”毛泽东问。

“39 了。”

“不，你 38。”这句话，表明毛泽东的记忆是很清楚的。

不过，这一句话，似乎勾起了毛泽东对贺子珍的思念。他叹了一口气，想说什么，喉咙里发出混浊的声音。李敏听不清，只看见父亲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连成一个圆圈。

生怕会加重毛泽东的病情，李敏不敢久留，含泪走出毛泽东的卧室。她在父亲的身边呆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满含泪水地上车走了。她一直不明白毛泽东那手势是什么意思：会不会是要她向贺子珍问好？因为贺子珍的原名叫“桂圆”。

8月30日，江青头扎白毛巾，像陕北农民一样，出现在济南部队某团“登城首功第一连”。

9月2日，江青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是要去大寨。起初，毛泽东没有同意。江青第二次报告，毛泽东同意。

9月3日，江青到了山西昔阳县大寨，她兴致勃勃地提出，要看她上次带来让大寨人种的油莎豆长得怎样了。一听她这个要求，陪同她的大寨人顿生忐忑。因为油莎豆生长的合适地温在 30 摄氏度以上，

而大寨的地温天气热的时候也就 20 多摄氏度,大寨人为此耗了不少心力,但自然规律不可违,油莎豆长得高一丛矮一丛的。

果然,见油莎豆如此长势,江青的脸一下子就拉长了:“你们怎么搞的?啊!我的希望变成泡影啦!我送给你们这么好的种子,你们却种成了这个样子……”

幸亏负责种植油莎豆的大寨大队科研组长高玉良确实对油莎豆的种植狠费了一番心思,把这种子不适合大寨生长,大寨人为此进行了怎样的实验和努力条分缕析得头头是道,江青也就不说什么了。

继而,江青又提出要去看她上次来时带人挖的防空壕。但是这条防空壕已经填了。郭凤莲只好对江青实话实说。这下子江青气又上来了,说:“你们知道我是干什么来了吗?我是同修正主义斗争来了!你们毁我的战壕,也不向我打一个招呼……”

江青召集陈永贵、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队的干部,以及随同她的工作人员,一起学习中央 1976 年 4 号文件,即《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她在讲话时说:“你知道我这次来是干什么来了,我是和邓小平斗来了!……有人要想打倒我江青,要把材料送给毛主席。结果材料落到我们手里,他们的目的没有得逞。所以,我江青还活着!”

她在讲话时,将邓小平出国时带子女到机场给自己送行作为一条罪状提出,并让随行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作证。邬吉成如实说:“我没看见邓小平带子女到飞机场送行,但看到有资料说,邓小平出访法国归来时,他的子女曾到机场迎接。”

江青又说起了“母系社会”:“母系社会就是女人掌权。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还有女皇,也要女人掌权!”

她还几次向大寨的社员、干部发问:“是随父姓还是随母姓?”

当她得到的回答都是随父姓时,很不以为然地说:“你们为什么姓了父亲的姓而不姓母亲的姓呢?以后一定要改过来。”

就在江青离开北京的当天,9 月 2 日傍晚,毛泽东出现第三次心肌梗塞!这次要比前两次严重,面积也有所扩大。与此同时,毛泽东一度好转的全身性症状也在不同程度加重,例如呼吸急促、咳嗽多痰,尿

液也再次从正常水平降至每 24 小时不足 300 毫升。X 光片显示,毛泽东的两肺再次发生感染。中央负责人闻讯后,纷纷赶到中南海 202 住地。中央政治局设立值班制度,常委两人一班,毛泽东身边昼夜保持都有人,其中,王洪文、汪东兴一班,张春桥和华国锋一班。众人轮流在毛泽东住地值班。

此时,毛泽东的身体已近衰竭状态。尽管如此,他的神智还是清醒的。这次心肌梗塞发生之后,他要求在 9 月中旬离开北京,希望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韶山滴水洞。但是,病情的发展已不允许他再次远行了。9 月 5 日晚上 21 时 30 分,毛泽东突然丧失神志。值班的常委经过研究后,决定打电话给江青,告诉她毛泽东病危,请她火速返回北京。

汪东兴在电话中告诉负责江青大寨之行的邬吉成:“主席的病情很不好。”要江青马上返回北京。

关于回京的路线,汪东兴说:“你们返回北京有两个方案可供选择,一是你们乘火车到太原,我派飞机到太原接你们;一是你们乘火车到石家庄,我派飞机到石家庄等你们,你看哪个合适?”

邬吉成短暂地思考了一下说:“我看还是按后一个方案比较好。去太原的时间太长,路也不顺。到石家庄换飞机对安全有利,又节约时间。”

汪东兴同意邬吉成的意见。

放下电话,邬吉成立即将汪东兴来电话的事报告了江青。没过多久,江青的秘书刘玉庭,也接到了通知江青尽快返京的电话。

江青在听了电话传来的消息后,显得异常镇定,没有流露一丝不安的神情。随行而来的许多人员,包括陪同江青到大寨的陈永贵,在得知北京来电话催促江青马上返京后,都猜想这一定与毛主席的病情恶化有关,心情顿时紧张和沉痛起来,做好了立即动身的准备。

当晚 23 时,江青从山西阳泉上火车,于次日凌晨 1 时左右抵达石家庄。

在石家庄火车站,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刘子厚、吕玉兰等,已经在那里迎接。他们陪江青坐上轿车,直奔飞机场,一架专机已在那等候。

上了专机，飞行 20 多分钟，赶到北京。江青直奔中南海，赶到 202 住地时，毛泽东正在睡觉。江青要给毛泽东擦拭后背，涂爽身粉，并给毛泽东活动四肢。医护人员说不用，她不听。亲自为毛泽东做完这些，她才回到临时住处休息。

江青这次回来就住在了中南海内的代号 201 的家中，没有再回钓鱼台 10 号楼。

9月7日，毛泽东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下午，除常来的几位常委外，叶剑英、李先念、陈锡联、吴德、吴桂贤等人也赶来了。没过多久，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也风尘仆仆地赶来。他布衣布裤，光着头，肩上搭着一块毛巾。陈长江迎接他进屋后，他只是简单地洗了把脸。陈长江问他道：“要不要吃点东西，点心什么的？”

他摇了摇头，痛苦地说：“我什么也不要，给我弄两包烟就行了。”

接着，他低头不语，边听汪东兴等人介绍毛泽东的病情，边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烟瘾比往常出奇地大，抽得眼前满是烟雾。

随后，中央领导齐集在 202 南大厅开会，中心议题是准备安排毛泽东的后事。

9月8日1时10分，毛泽东看文件 15 分 30 秒……

凌晨，江青来到 202 住地。她要给毛泽东翻一下身。这时，医护人员提醒她说：“主席不宜右侧翻身。”可是江青不听，医护人员只好把毛泽东翻到右侧。果然，翻身后的毛泽东脸色变发青，呼吸也一度停止。守候在旁的医护人员立即进行抢救，毛泽东的呼吸才又告正常。

这天上午，毛泽东从休克中醒来，嘴里忽然发出微弱的声音。工作人员按照以往的习惯，连忙抓起笔和纸放到他的手中。只见毛泽东艰难地移动着铅笔，费了很大的劲，慢慢地划出了 3 道似乎在颤抖的线，就再也没有力气了。

看到工作人员并没有理解其中的含义，毛泽东非常焦急。过了好一会儿，他的手又可以慢慢抬起了，缓缓地，在木床上敲了 3 下。工作人员这才反应过来，试探地问到：“主席，您是不是要看有关三木的消息？”

毛泽东当即点了点头。

三木时任日本自由党总裁、内阁总理大臣，正在参加日本国内的

大选。

当工作人员给他读了大内参上有关三木和日本大选的消息，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这才平静地闭目休息一会儿。

下午13时18分，毛泽东再次看文件12分钟。

16时37分，又看文件30分……

紧张的生命抢救与宁静的工作、读书展现出一幅伟人弥留前的感人画面。毛泽东的上下肢插着静脉输液导管，胸部安着心电监护导线，鼻子里插着鼻饲管，文件和书由别人用手托着。就在这种状况下，他在8日这天，坚持看书、看文件11次，时间共达2小时50分钟。每一次都是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看了不长的时间，就又昏迷了。

9月8日下午16时37分，毛泽东在心律失常的情况下，仍然坚持看文件长达30分钟。

9月8日下午18时多，江青来到北京新华印刷厂，请工人们吃文冠果。这种壁厚的果子并不可口，江青说：“你们知道吗？文冠果的另一个名字叫文官果，象征着‘文官夺权’！”

当天下午18时至19时，毛泽东的血压开始下降，医生采取各种措施进行抢救。

第 1402 回：九月九，一代巨星陨东方 保遗体，政治局紧急会议

9月8日傍晚，202住地一片沉寂，毛泽东的病情在入夜之后忽然变得沉重起来。正在人民大会堂为西萨摩亚国家元首马列托亚·塔努马菲利第二殿下举行答谢宴会的华国锋得到消息后，立即让中央办公厅通知所有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马上到202住地，同时通知在外地的政治局委员到京。华国锋在宴会上匆匆讲完话，没等宴会结束，便向外宾告别，迅速赶回中南海“202”。

在202住地那宽敞的临时病房内外，随着夜色的渐深，气氛也变得紧张起来。在毛泽东的病房内外齐聚着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尽管202住地内外人员众多，但却是静悄悄的，医护人员也一直在紧张忙碌着。毛泽东病房外的遥测心电仪上，仍然显现出毛泽东心脏跳动的曲线。所有的眼睛都紧紧盯着那条时起时伏的曲线。

晚19时，护士孟锦云来接班。这时江青也来了。

毛泽东要来日本三木武夫的电报，其中涉及中国内地与日本进行通联的商议。19时10分，他拿着这份电报，忽然感到心脏不适，呼吸急促起来，小孟过来，低头给他按摩胸部，毛泽东用很低的声音说：“我很难受，叫医生来。”

医生赶紧把氧气的管子放在他的鼻子处。他用手去拽，肯定是不舒服，过了几分钟呼吸开始平静起来，这时，医生看见主席的鼻孔里有一点嘎巴儿，就把输氧管先拿下来，用棉花签给他弄出来之后，又给他戴上输氧器时，他就一点反应也没有了，从此便陷入了昏迷之中。从傍晚19时起，一直到午夜零点，医护人员始终在紧张地对毛泽东进行抢救。用药、注射、导尿、量血压和输氧，一切都在紧张有序中进行。毛泽东已经陷入深度昏迷，他再也没有睁开眼睛。守在病房外的政治局委员和工作人员，都在静静观察着遥测心电仪上那条不停波动的曲线。忽然，曲线终于变成了一条骇人的直线，这时，时钟指向了9月9

日零时10分！

张玉凤奔出毛泽东卧室，疾步走向毛泽东书房，向守候在那里的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报告噩耗。

住处不过一箭之遥的江青，迅速得到报告，马上奔了过来。她头发散乱，神色慌张，进门便扑在毛泽东遗体上一面痛哭，一面呼喊：“医生呵！你们快救救主席呵！你们为什么不救救他呀！”

她嗓子都哭哑了，仍不肯离去。其悲痛之状，催人泪下。

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们再次走进毛泽东的卧室，围站在毛泽东的遗体前，低头、默哀。

毛远新站在毛泽东遗体前

他们决定立刻召开政治局会议，商讨毛主席后事及相关事务。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很快赶到。但是外地的政治局委员如许世友身在广东，坐飞机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赶到北京，因此政治局会议一拖再拖，等到凌晨2时许，只好由在京的委员先行召开了。

华国锋主持会议，紧急磋商3个问题：(1)毛泽东的后事；(2)毛泽东遗体如何处理；(3)是否邀请外国代表团来京吊唁。

这时，江青在会上又大哭起来，她说：“毛主席是被邓小平气死的”，她又说：“今天的会议忽略一件头等大事，就是要继续批邓！这是主席临终前一再叮嘱的大事！”

姚文元表示赞同。

华国锋显然感到为难，只得说：“对邓小平，当然还要继续批判，但目前需要马上研究的是主席的治丧问题……”

江青一听，极为不满：“对邓小平不能手软！我建议，政治局应该立即通过一个决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以绝后患！”

这下子使华国锋更加为难，因为毛泽东生前说过，“对邓小平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怎么可以违反毛泽东的指示呢？可是，此时他又不便拿毛泽东的指示与江青顶撞……

毕竟叶剑英年长，富有经验，说道：“江青同志，请你放冷静一些，好不好？毛主席走了，我们都很悲痛。毛主席的丧事是国丧，一定要安排好。现在我们要办的事情很多，但是第一位是治丧。毛主席不在

了，我们处在最困难最严峻的时刻，在这种时候，最要紧的是要加强团结，要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江青说：“国锋同志是主席选定的第一副主席，我们当然要以他为中心，我可以号召政治局的每一个同志，要紧紧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这时，汪东兴已打电话给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周启才：“毛主席今天凌晨逝世，现在政治局正等着讨论讣告和悼词文稿，你赶快去。”

周启才急步走向“202”的会议厅，进门前，擦去眼角的泪水，定了定神，轻轻迈进会议厅大门，厅内灯光暗淡，一片沉寂。他走到华国锋面前，把密封的文稿放在他座位的茶几上。

华国锋拿起茶几上的两份文稿说：“现在继续开会，讨论中央预先准备的讣告和悼词文稿，今天主要讨论讣告文稿，会上要定下来，下午要对国内外广播，时间很紧。悼词文稿也过一遍，不讨论，会后印发给大家，另择时间开会商定。”

会议一致通过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决定9月9日下午16时对国内外广播。

如何处置遗体？毛泽东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在人民群众心目中享有如此崇高威望，有人提出，应学习苏联的做法，像保存列宁遗体一样，永久地保留遗体，让子孙后代都能瞻仰，以学习他的精神。但是，根据毛泽东的倡导，中央也早有决定，遗体实行火化为好，这又是毛泽东本人的亲笔指示。一时间，华国锋很难决断。好几个小时过去，还是没有结果。

这时，医疗小组的专家着急了，进来请示说说：“天气这么热，再等下去不得了……”最后，华国锋和叶剑英商议后，提出分两步走：先对遗体实施防腐处理，进行发丧、吊唁；然后再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决定是火化还是遗体保存。

这个决定定下来时，天都快亮了。汪东兴从会议室出来后，匆匆地来到警卫值班室，打电话给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找专家研究遗体防腐处理工作。

因为时间紧迫，汪东兴说话很急，而毛泽东病危是高度机密，刘湘屏对毛泽东逝世毫无思想准备，对汪东兴讲的话，怎么也没听明白，不

得不反反复复地问了好几次。当她得知是毛泽东的逝世的消息，整个脑子都木了……放下电话后，她立刻赶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落实中央交给的任务。

刘湘屏来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同院党委书记杨纯商量后，决定派医科学院基础医学组的党支部书记、形态学教研室第一副主任徐静，去执行这项特殊的任务。

徐静，1931年出生于吉林省人。大学所学专业为组织胚胎学，1956年赴苏留学。在苏学习期间，26岁的徐静以科学上的惊人发现，推翻了“成年高等脊椎动物脑神经细胞不能分裂和再生”这一世界医学界公认了100多年的结论，从而轰动了苏联学术界，并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后一直从事组织胚胎学教学与科研工作，可以说，她的大半生时光都是在显微镜下度过的。

9月9日凌晨2时，卫生部值班室秘书江焕波火速驱车赶往西城的百万庄去找徐静。

唐山大地震后，为了安全，北京市的不少人家还都住在楼间空地上搭起的抗震棚里。江焕波和司机在百万庄一带，心急火燎地在黑夜中摸索了两个多小时，直至凌晨4时才找到徐静的住处。由于他们彼此都不认识，江焕波只好小心地问道：

“是徐静同志吗？我是卫生部的江秘书。”

徐静点点头。

“请跟找走，部里叫你去一趟，有紧急任务。”江焕波急促地说道。

徐静没敢多问，只说了声“你稍等一会儿”，随后迅速回到房里通知了丈夫一声，便登上江焕波的车，消失在夜幕中。

车速很快，在无人的马路上飞奔，向东单方向驶去。在车上，徐静努力猜想着可能接受的种种任务，但尚未来得及得出答案，车已经驶进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大门。

这时，天刚蒙蒙亮，只见刘湘屏正在院子里急得打转。当见到姗姗来迟的徐静后，她劈头就对杨纯说：“你们医科学院真成问题，一个基层教研室的主任、党支部书记，家中竟然不给安个电话？”

徐静听后，只感到好笑。

时间急迫，刘湘屏拉起徐静，换上自己的车，立即向西驶去。车子

缓缓驶入中南海的北门，在一排灰房子前停下。徐静后来才知道，这就是“202”室。

徐静紧随大步疾行的刘湘屏，走进了里面一个不算大的房间。

他们刚进屋，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就进来了，语调低沉地问道：“你是徐静同志吧？”

徐静答道：“我是。”

汪东兴坐下后招呼大家坐下，沉默了1分钟没有说话。此时，徐静感到屋里的空气几乎凝固了。她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但又不敢往那想。

终于，汪东兴说话了：“我告诉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伟大领袖毛主席已于今天凌晨逝世了，现在消息还没有公布。”

徐静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召集你们来这里来，主要是想商量一下毛主席遗体的保护问题。”汪东兴说，“这是一个事关重大的头等大事。当年，印度总理尼赫鲁死后就想保存遗体，可因没及时采取防腐措施，遗体腐变，最后只好烧了。”

汪东兴站起来，走到徐静面前，目光里充满信任与期望：“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万一主席的遗体出点差错，我们就无法向党和人民交代，无法向子孙后代交代。你们要以最快的时间拿出方案，报中央政治局。”

说完，汪东兴望着徐静，又问道：“你有什么要求吗？”

徐静理了理自己的短发，努力使心情平静下来。她思索一会儿，提出3个要求：“第一，需要回院和同行专家们共同研究方案；第二，要先看看毛主席遗体情况；第三，需要一点时间准备必要的器械、药品。”

汪东兴说：“完全可以，有什么问题及时向我汇报。”随即带领刘湘屏和徐静走进毛泽东卧室。

室内光线很暗，厚厚的紫色落地窗帘遮住了外面的阳光，室温已经被降得很低。毛泽东躺卧在大床的中央，身上从头到脚蒙着一条白色的毛巾被。徐静缓缓地走近床边，从侧面轻轻掀开毛巾被，仔细察看遗体的情况。

这是徐静一生中如此近距离地见到日夜想念的毛泽东，心情之激

动可想而知。但 20 多年的工作经验告诉她：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理智必须战胜情感。现在自己面对的是领袖的遗体，稍有疏忽，就会给日后工作带来不可弥补和逆转的损失。此刻，最需要的是镇静、细心和大胆。她粗略计算了一下毛泽东的身高，仔细观察着皮肤有无损伤、褥疮等，轻轻地触摸了皮肤的弹性，轻轻活动一下关节，并一一牢记在心中。

202 室的政治局会议一直开到凌晨 5 点多钟才结束，开的很沉闷。由于毛泽东在中国各族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政治局决定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一个星期的遗体告别活动，以便让尽可能多的人民群众以及各界代表，向自己景仰的伟大领袖作最后的告别。

散会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进行了交流。随后，江青打电话找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想要毛泽东到南方的几次谈话记录稿，还有几件其它手稿。因中央办公厅对毛泽东文件的保管使用有明文规定，张玉凤不敢轻易把文件给江青。

9 月 9 日凌晨。姚文元在怀仁堂召集新华社的朱穆之，《人民日报》的鲁瑛，《光明日报》的莫艾，《红旗》杂志的许健生，中央广播电台的邓岗，布置毛泽东逝世后的宣传工作。会后，他单独把鲁瑛留下。

姚文元说：“这几天如果发生什么事，我同你电话联系不上怎么办？你要有所准备，如果电话联系不上，你得独立处理问题。”

鲁瑛马上明白了姚文元的意思，他说：“毛主席逝世后，首先要注意军队，军队要掌握好。你也要特别注意安全，出入行动要小心些。”

姚文元说：“是要注意军队，还有个大民兵哩！”

又说：“主席逝世了，国内外阶级敌人会乘机捣乱和破坏，你们要密切注意情况，及时反映。对内部也要布置一下，做些准备，包括你们几个负责人的安全。”

根据姚文元的指令，鲁瑛当即返回报社找萧泽曜、刘治平（党组成员）进行布置、传达，派出民兵昼夜加强巡逻、值班，防止发生意外情况……

凌晨 5 时，中央电台新闻部主任被急促的电话铃惊醒，话筒那边传来中央广播局总编室值班员的声音：“有紧急事，请你马上到局长办公室！”

又发生了什么大事，竟然等不到天亮？

这种想法并非偶然，因为 1976 年发生的大事实在是太多了。主任匆匆赶到局长办公室，但邓岗局长不在，只有几位副局长坐在那里。他们低着头，一言不发。一位副局长抬起头，用低沉而沙哑地说：“告诉你一个极其不幸的消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了。”

“啊？”主任惊讶地大叫一声，随即，血凝固了，木然地站在那里，只觉得泪水顺着面颊流了下来。

十几分钟后，电台的一切，紧急运行了起来……

当年，中央电台共有 4 套节目，而且自成系统，各自按照自己的时间运行。不过，此时必须实行并机，把其中两套或 3 套节目联通，用同一时间播同样的讣告。这样，不管听众正在收听哪套节目，但却都能同时收听到讣告。此外，由于治丧规格不同，电台和电视台使用哀乐的时间长短也不相同，有的只用 30 多秒钟，有的要超过 1 分钟，而毛泽东逝世的哀乐，初步商定为 6 分钟。至于什么时间播讣告，由中央决定，但电台必须作好准备，作到随时能播，而且讣告之前的节目不能太欢快高亢，不能是打斗或轻松的节目。讣告播出之后，则要完全取消文艺节目，其他节目的播音基调也必须与整个气氛相适应，那些用了许多年的常用语必须立即取消，比如“毛主席万岁”和“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早晨 8 时，邓岗局长从治丧委员会回来，说中央已决定在黄昏 18 时播放《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

中午 11 时，邓岗按规定向中央电台直接参与播出的部门和人员，传达了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大家震惊不已，有的泣不成声。正在此时，中央突然通知，把《告各族人民书》的播出时间提前到下午 16 时。让人感到十分紧张的是，直到中午 11 时 30 分，中央电台才拿到《告各族人民书》的最后定稿。

正午 12 时，播音员夏青开始录音，他的声音哀痛而庄重。但录音结束后，局长们却一致认为不满意，要求重录。此时，夏青已因紧张而悲痛，近乎精疲力竭。于是，新闻部主任多了个心眼，决定保留第 1 次录音，并在夏青进行第 2 次录音的同时，开始复制第 1 次录音，以作到有备无患。

第1403回：闻噩耗，神州大地同悲哀 言电多，五大洲为之震动

再说卫生部部长刘湘屏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杨纯返回医科院院部后，研究确定，毛主席的遗体保护第一步处理就由徐静负责，张炳常和陈克铨参加，组成3人小组。此时，张炳常教授还在平谷县参加巡回医疗和教学改革。

趁张炳常还未赶回的空隙，徐静去拜访了她的老主任，全国著名解剖学家张鉴教授，想从他那里了解一些孙中山遗体的处理情况。之后，她又拜访了另一位病理科的教授。由于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尚处于保密阶段，所以徐静只能拐弯抹角地向他们讨教，搞得这两位专家也十分不解：这个徐静，怎么一大早会问起这些问题？

小组成员之一的陈克铨年仅38岁，也是形态教研室的副主任，是新成立的3人小组中最年轻的一个。得到通知后，他用了1个半小时的时间，备齐了必要的药品、器械，其中有些物品还是临时借来的。他仔细筛选，核对标签，清点数量，谨防出现差错。

9时左右，张炳常也从平谷风尘仆仆地赶了回来。离家数月的他顾不上回家，便直奔医科院院部而来。张炳常是1948年辅仁大学生物系毕业的才子。他一到，即根据多年的专业经验，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经过商议，被确定为实施方案。

还不到10时，徐静、张炳常、陈克铨携带药品、器械等已提前赶到中南海。

此时，政治局会议正在这里召开，3位医学专家来到会场，因为从未有见过这种场面，略感有些紧张。

汪东兴让徐静谈一谈遗体保护的方案。徐静向在座的中央领导做了详细的汇报，讲述了方案的依据、效果和实施的方法。

政治局委员们听后，又就遗体保存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询问：列宁遗体是怎么保存的？孙中山的遗体为什么没有保存下来？

1972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女尸为什么能保存2000多年？世界上除了列宁、胡志明，还有哪一位领袖的遗体保存下来了？

徐静等人根据平时对于这些问题的了解，分别做了扼要的回答。她说：

列宁逝世于20世纪20年代，是哈尔科夫一位教授将任务承担下来。据说，对列宁遗体进行防腐处理，不是一次完成的。

孙中山的遗体，听老协和医院的专家们说过，是由于脸上长霉菌而无法保存下去了。

张炳常参加过马王堆尸体的考查，马王堆女尸2000多年保存完好，主要是在地下深埋，多层厚厚的棺和椁密封，形成了避光、避氧、低温的自然条件，这些条件对尸体长期保存很有利。

世界上除了列宁和胡志明外，还有曾长期担任共产国际执行主席的保加利亚人季米特洛夫，他的遗体也被长期保存下来了。他们的保存方法如何？都是各自国家的机密，我们知之甚少。

最后，张春桥站起身来，背着手，在两个沙发之间走来走去，他指着徐静的问：“你究竟有多大的把握？”

徐静实事求是的回答：“我们3人都是医学院的解剖学和组织学的教师，为了研究和教学的目的保存尸体和标本，少则几十年，多则上百年的尸体标本都有，只求不腐烂，而皮肤颜色、面容、体态都不重视，这种保存我们是有把握的，经验也是丰富的。但主席遗体的保存大不相同了，不但不能腐烂，还要栩栩如生，要让人民群众瞻仰，这我们没有做过，也未敢想过。我们只能努力去探索。”

华国锋说：“政治局刚刚开过会，为了缅怀毛主席的丰功伟绩，要长期保护好毛主席的遗体，世世代代让人民群众瞻仰。这是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政治任务，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这是党和人民对你们的重托。你们完成好这项任务，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汪东兴也说：“这是一件庄严的政治任务，你们一定要完成好，政治局和全国人民感谢你们。你们要考虑长期保存。现在是20世纪70年代，你们一定要有志气、有雄心，把毛主席的遗体保护得比列宁的还要好。”

最后，华国锋拍板说道：“就按你们的方案办。”

遗体处理工作的时效性很强,时间的稍许延误,都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因此方案一经中央批准,徐静等人便争分夺秒地投入到实施方案之中。上午10时左右,徐静和两位助手一起,果断地往毛泽东遗体血管里注射了福尔马林、醋酸钾、甘油和酒精等药物,作了基础性的防腐处理,为今后的永久性保存作了准备。

他们又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紧张工作,终于顺利完成了对毛泽东遗体实施防腐处理的全部操作。这时时钟已指向了下午14时30分。

许世友在9月9日凌晨在广州接到毛泽东逝世的绝密电报后,把军区事务安排完后,便坐飞机与韦国清一同赶往北京。

他到北京后,先去西山见了叶剑英等人,然后于当天下午15时,赶到毛泽东在中南海的最后住所。一进屋,他先向毛泽东遗体深深3鞠躬。当时,医护人员正在给刚把做过防腐处理的毛泽东遗体穿衣服。许世友俯身看了看胸腹皮肤后,绕遗体走了两圈,自言自语的说:“碰鬼,身上怎么有蓝斑?”又深深3鞠躬,敬了一个军礼,便走了出去。

下午15时,中央电台开始用悲惋的语气,向全体中国人发出预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下午4点有重要广播,请注意收听。”

15时30分,第2次录音结束了。审听后,局长们再次一致认为,这次录音远远不如第1次的好,最终决定播出第1次录音。此时,新闻部主任已经作好了第1次录音的合成带,先是长达23分钟的《告各族人民书》,然后是6分钟哀乐,5分52秒的《国际歌》,再加上报时,台号,总共36分钟。

下午16时,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极其悲痛地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等375人组成毛泽东治丧委员会。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有关毛泽东治丧活动安排的公告。

中共中央9月9日发布“毛泽东治丧委员会”名单上:

华国锋 王洪文 叶剑英 张春桥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韦国清 刘伯承 江青(女) 许世友 纪登奎 吴德

汪东兴 陈永贵 陈锡联 李先念 李德生 姚文元

吴桂贤(女) 苏振华 倪志福 赛福鼎……

一切都按着预先的安排有序地进行着。只是万万没想到,节目在第3遍播出时,发生了严重的错误,哀乐之后,播音员宣布:“现在广播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于是,中央电台被各地打来的电话包围了,质问、抗议、谴责、强烈要求追查事故责任者的声音,让电台万分紧张,酿成了“九·九播音事故”。

毛泽东走了,终年83岁。自1935年遵义会议至1976年,长达41年。

这“83”、“41”,恰巧构成“8341”——他的警卫部队的番号。尽管这是偶然的巧合,可是却也是太巧的巧合。

毛泽东之逝,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次最强烈的大地震。

在中国大陆,除了极少数的人之外,大多数的人始终认为:毛泽东每天日理万机,夜以继日地工作着。毛泽东永远是神采奕奕,精神矍铄。毛泽东总是如人们在书报上看到的照片那样,经常伏案执笔,批阅文件,在会议室里开会,在工厂家田头视察……

直到1976年9月9日,人们才在不知所措的茫然中结束了这种想法。

在中国这样一块特定的土地上,在20世纪70年代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毛泽东在中国具有特别的威望。他在占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们的心中,是生命、是希望、是光明、是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人们没有完全猜错,毛泽东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依旧在工作着,只不过他的工作方式、工作环境已截然不同了。在他的最后日子里,他总是去做他觉得应该是他做的工作,包括不断地会见外宾,只要秘书工作人员转告他,外宾请求接见,毛泽东从不拒绝,既使身体状况很坏。在他的头脑里似乎总是盛情难却,而没有量力而行。

最后一次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就是一例。布托已经来几天了,一直等待毛泽东会见,但由于主席身体状况不允许,所以一直没有安排。当布托马上要离开中国,又一次提出见毛泽东时,他的秘书便不得不把这种要求向毛泽东报告,果然,他毫不犹豫地点头同意。其实,

当时毛泽东刚吃了安眠药，正犯心脏病，但他依旧同意安排。因此，才出现了接见时面部表情麻木，直流口水的样子，也因此泄漏了毛泽东身体有病的绝密，这已是无法隐瞒的事实。

病魔缠身的毛泽东感情依旧细腻丰富，他依旧惦念着亲人，怀念着故交，关心着。女儿来看他，他会久久地深情地拉着她的手，用他不清晰的语音叙别话旧。来看望他，也会引起他的欣喜，引出不少话题。他在最后的日子里，也曾关心过金日成。

也许，毛泽东与金日成有着特殊和友情，有着特殊的情感。毛泽东生日时，曾对金日成送来的大苹果久久凝视，寄托一种异样的情思。当毛泽东听说金日成眼睛患病时，特意派曾给他治过眼睛的唐由之大夫去给他治病，那几天晚上，每次关于金日成治病的电报发来，主席总是认真地看。在朝鲜，在这片并不十分遥远的国土上，牵动着毛泽东的情感。

就在9月9日下午16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宣布毛泽东逝世消息后的15分钟内，包括路透社、美联社和法新社在内的世界主要通讯社便报道了毛泽东逝世的新闻。紧接着，世界各大媒体发表和转载了大量赞扬毛泽东和介绍毛泽东革命事迹的评论和文章，对他的赞扬和哀悼如潮水般涌来，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报纸甚至用十多个版面刊登介绍毛泽东的文章和照片。世界各国政府、各国际组织也纷纷对此做出反应，各国的领袖们，纷纷发来唁电，高度评价毛泽东。

美国总统福特发来唁电说：“在任何时代成为历史伟人的人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毛主席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巨人，他对历史的影响将远远超出中国的国界。”

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以他特有的风格说：“我的孩子们谈到流行音乐歌手身上有一种‘颤流’，我承认我自己对此浑然不觉。但是毛泽东却发出了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颤流’。”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发表声明说：“毛泽东是一代伟大的革命领导人中的一位出类拔萃的人。他不仅是一个完全献身的和重实际的共产党人，而且他也是一位对中国人民的历史造诣很深的富有想象的诗人。”“历史学家将会对毛泽东的事业和他对中国人民和世界的影响做出估价。”

日本首相三木武夫说：“毛主席作为世界的大政治家在历史上留下了巨大的业绩。”

日本外相福田赳氏则用带有崇拜的口吻评价说：“无论对他做多么高的评价，都是不过分的。”

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对毛泽东赞赏有加，他称“毛泽东主席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创造者之一，是给中国人民指出走向新的未来的道路的人。”

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在唁电中说：“新兴的中国就是他永久的纪念碑”。

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发表声明道：“毛泽东主席是一位人类的领袖、历史的推动者。他是名垂史册的人物。”

法国总理雷蒙·巴尔说：“毛泽东主席将作为本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而载入史册。”

英国首相卡拉汉这样评价毛泽东：“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中国的疆界，无疑他将作为世界闻名的伟大政治家而被人们所缅怀。”

巴基斯坦总理阿里·布托发表声明称：“毫无疑问，毛泽东主席是巨人中的巨人。”

巴基斯坦总统乔德里称毛泽东是“中国革命之父”。

联合国总部在毛泽东逝世的当天降半旗致哀。联合国安理会10日开会时，安理会主席致悼词，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和与会各国代表都发表讲话表示哀悼。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联合国全体大会上发言时盛赞毛泽东的丰功伟绩：

“毛主席是一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哲学家和诗人”，“他实现自己理想的勇气和决心将继续鼓励今后的世世代代。”联合国大会主席高度评价毛泽东是“我们时代最英雄的人物”，“他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

曾有记者这样写道：“9月9日下午4时这一悲痛时刻，似乎地球也停止了转动。”

虽然中共中央对外宣布：“不准备邀请外国政府、兄弟党和友好人士派代表团或代表来华吊唁。”但是仍有不少国家的领导人提出要来

参加毛泽东主席的追悼会。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副国务卿哈比卜，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前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什，参议院民主共和两党领袖等都一拨一拨地前往位于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哀悼。

其他国家的中国驻外使领馆，吊唁的人也络绎不绝。在日本，毛泽东逝世后两天内就有 1700 多位各界人士到中国大使馆吊唁。日本还有一位从 1967 年开始就收听北京电台广播的朋友，他每年都把自己在 5 月里亲自采制的茶叶寄给毛泽东。在得知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后，他又带来茶叶委托大使馆转交给毛泽东的家人，以寄托哀思。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许多友好人士是带着全家老少来中国大使馆吊唁的，其中不少父母在毛泽东遗像面前给孩子们讲述毛主席的生平和中国历史，许多刚学会写字的儿童在吊唁簿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在毛泽东逝世后的 10 天里，共有 123 个国家的政府和首脑向中国政府发来了唁电或唁函，105 个国家的领导人或他们的代表到中国使馆吊唁，53 个国家降半旗致哀，许多国际机构和国际会议上也开展了悼念活动。

许多发展中国家对毛泽东的逝世表现出了更大的悲痛。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传到朝鲜后，朝鲜党政领导机关决定 9 月 10 日到 18 日为全国哀悼期，并规定 18 日全国停止一切娱乐体育活动。18 日下午，当中国隆重举行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时，朝鲜举国上下也就地肃立三分钟致哀。哀悼期间，朝鲜各党政机关的干部、群众团体的代表、工人、农民、人民军官兵、青年学生共一万多人到中国大使馆吊唁，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共收到朝鲜各界发来的唁电、唁函 5200 余封。

在中美洲的牙买加，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黑人农民从百里以外的农村赶到中国驻牙买加大使馆，他送上了一束新鲜野花默默悼念毛泽东主席。还有很多前往吊唁的人一边痛哭一边唱着国际歌，悲痛欲绝。

在法国、联邦德国、埃塞俄比亚、巴基斯坦、斯里兰卡以及刚果等国，各界人士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游行。在毛泽东逝世的当晚，联邦德国的一些马列主义组织就分别在几个城市举行了火炬游行。游行人群打着写有“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光荣永远属于毛泽东同志！”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等大标语，高举火把，抬着用黑纱和鲜花簇围着的毛泽东遗像在大街上缓步前行。埃塞俄比亚借着纪念“革命日”两周年的机会，发动了有10万人参加的纪念毛泽东大游行，是所有国家中游行规模最大的。

9月11日，法国各界人士1万多人开始游行，游行队伍在巴黎公社社员墙前举行了追悼毛泽东的仪式。

刚果政府不但组织了游行，而且还决定今后每年将在毛泽东逝世周年纪念日举行正式纪念活动。

在巴基斯坦历史文化名城拉合尔，800名工人组织了哀悼游行。由于找不到巨幅的毛泽东画像，巴基斯坦著名画家马哈茂德·巴特便连续工作六个小时绘制了一幅，放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

世界上唯一对毛泽东逝世“不闻不问”的大国是苏联。就在联合国降半旗、各国政要发唁电、多国群众游行悼念毛泽东时，苏联却显得异常地平静。莫斯科的众多报纸甚至都没有报道毛泽东逝世的消息。苏联的《消息报》也只在倒数第二版的一个角落里发了一则寥寥数行的报道。而在苏联的另一份重要报纸《真理报》上却出现了针对中国的威胁性文章，文章称在毛泽东逝世后，如果中国不在一个月内采取与苏联和解的政策，那么苏联有可能采取某些“不可逆转的决定”。

第1404回：齐哀悼，一个时代的结束 政治局，研究追悼会事宜

毛泽东走了，最悲痛的还是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农民、工人。在河南农村的路上，一位农民正走着，听到了广播里传出的毛泽东逝世的噩耗，他突然就蹲在路边抱头痛哭，过路的人把他搀起来，他指着哀乐传来的方向说：“不说别的，毛主席这些年把国家治理得多平稳！”任何一个普通群众可以写大字报，或者公开批评他的上级，没有哪一个农民或者工人有了重病，因为没钱得不到医治。这是中国有史以来都没有过的翻天覆地的新鲜事，但毛泽东领导下做到了，人民怎能不热爱他！

毛泽东逝世当天，武汉几个“反潮流派”来到唐恒山家，唐家小屋里坐满人。个个悲戚无言，两眼红肿。唐太婆边用胳膊抹眼睛，边在灶前忙活着。老人虽然做了满桌菜肴，谁也不愿走近桌前，一个个拉去坐了，谁也提不起筷子。唐恒山强打精神，清清嗓子：“同志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将革命进行到底，完成主席的遗志！”

小奚忽然叹口气说：“要是死能代替，我真愿拿自己的命换来主席心脏重新跳动！”

她这一说，人们纷纷响应：“拿我们所有人的命都成！”

唐太婆哭了：“拿我一家四口性命我都愿干啊！”

结果，满满一桌饭菜，直到大伙散去，动也未动。

9月9日这天，黑龙江的范正美正在北方大厦主持全省招生工作会议。当他在省委机关听到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后，一路眼泪长流回北方大厦，直奔他住的房间，伏在床上的被上嚎啕大哭。良久，才极力收住眼泪，啜泣地对等在旁边的工作人员说：“毛主席去世了，我们要遭罪了，中国人民要遭罪了。怎么办啊……”

他哀痛不已，极力控制自己的情感，但哀思奔流，万念俱生，无限忧伤，剪不断，理还乱，道不清，诉不完。到了招生会场，范正美向大家

报告了这一不幸消息，情难禁，看着与会者一个个震惊、悲痛的神情，他再次失声恸哭，台下也是一片哭泣唏嘘声。

人们无法控制自己的哀恸，因为在他们心中，毛泽东就是他们的大救星，是他领导中国人民奋斗，使一个曾经百孔千疮、到处是分裂、不义和蒙受奇耻大辱，被外国瓜分、蹂躏的国家，赢得了高度尊严和统一，让一个被外国人讥笑为“东亚病夫”的民族，顶天立地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令世人刮目相看。他是新中国的旗帜，新中国的擎天柱，新中国的象征；他是我们年轻人前进的指路明灯，人生远航的舵手。他的思想和哲学是那样富于思辨、流畅和明白，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他教导人们无私地献身于人民，永远站在人民一边；他是一个难得的全才，不但是中国人民的领袖和导师，也是世界人民的领袖和导师。因为他，中国人民感到无比的自豪，充满自信而奋斗不息。如今他走了，人们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再也看不到他向人民挥手了。

范正美想：“我是唱着《东方红》长大的，照着他的指示学习、做人、战斗而成长的；他教导我爱人民之所爱、恨人民之所恨，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改正错的。我的血液里流淌着他给的营养，脑海里充满着他灌输的思想。是他领导和指挥我们造走资派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斗争正未有穷期，谁胜谁负难分，他就离开了我们，叫我们今后如何生活和斗争啊？！”

这种永诀的感觉，让他的心在颤抖，五脏俱焚。这种难以排遣的巨大哀伤，联想今后国家前途、人民和自己的命运，使他的心情突然变成了一种不能名状的恐怖；他感到自己努力追求、向往的东西，共产党、毛主席带给我们的希望、动力和欢欣，似乎忽然都匆匆随着毛主席的逝世，一齐也离他而远去了，无可挽回了。这是他对国家未来可能发生的事变及其自我命运的预测、忧虑生来的恐怖，是一种神经恐怖、思维恐怖。难言述哀痛，只有泪如雨。“男儿有泪不轻弹”，此时哀思难禁，当着大家的面，他终于伏案放声大恸。

毛泽东的逝世，结束了一个时代，毛泽东时代。

9月10日下午，工作人员重新量了毛泽东遗体的尺寸，由红都服装厂的师傅们很快赶制出两套中山装，一套厚一点的深灰色，一套薄一点的浅灰色。经中央领导审定，给毛泽东穿了浅灰色的那一套。理

发师小周则为毛泽东重新梳理好头发,北京医院病理科马燕龙技师为毛泽东做了细致的化妆整容。



1976年9月,上海蔬果市场,市民戴着黑纱
悼念毛泽东

9月10日晚19时多,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带着在王洪文处协助工作的中办工作人员米士奇,来到中南海紫光阁值班。

廖祖康对米士奇说:“王洪文说,中办秘书处就不来人了,就你一个人值班。王洪文说了,有两件事,一是在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二是在此期间有些解决不了,需要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就说是中央领导同志说的,让你给各省、市、自治区打个电话。另外,各省、市有事打电话就找你。”

米士奇问:“电话以咱们办公室的名义打吗?”

廖祖康说:“不、不、不,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打。”

廖祖康还说:“上海不用打,北京也不要打。”

晚上23时,杜修贤在人民大会堂布置悼念毛泽东的吊唁活动的拍摄工作,杜修贤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合眼,困了乏了,就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几个小时后,毛泽东的遗体就要运至这里,明天还要拍摄瞻仰毛泽东遗容的场景,想到这里,他准备坐在大厅的沙发里休息一会。朦胧间,耳边有一个声音对他说“老杜,你带上相机跟我走。”

杜修贤睁眼一看,是汪东兴。当时,杜修贤身边没有带照相机,但

他想一定是什么重要任务，他向其他同志借了一个照相机和三个胶卷，匆匆赶往汪东兴处。

汪东兴问他，“你带了几个卷？”

杜修贤说：“3个卷。”

汪东兴又说：“不够，多带一些胶卷。”

杜修贤又去找别人借了几卷。

随后，汪东兴对他说“你和我一起走，坐我的车。”

他们一起走出人民大会堂，杜修贤坐上了汪东兴的随车，跟在汪东兴的车后面，驶进了中南海，但汽车没有驶进游泳池，而是停在另外一处院子里。下车后，杜修贤才知道，这里是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另一处住宅，202，与游泳池相邻。

杜修贤被安排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里面只有沙发和茶几，不一会，一位年轻的服务员给杜修贤端来一杯热茶。

大约过去了40分钟，杜修贤突然听见一声门响，随后几个人悄声走来，他看见是华国锋、陈锡联、汪东兴、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等人从里面的一个房间里走出来，华国锋一边走一边剔牙，看样子他们刚刚吃完饭。这时他才意识到，已是9月11日的凌晨了。

姚文元看到杜修贤，对他说：“老杜，我们到处打电话找你，还以为找不着你呢。你来了太好了，今天要你完成一个重要任务。”然后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你先带老杜去，我们一会儿就来。”

杜修贤跟着这个工作人员，穿过走廊向北走，在一间北面房的门口，工作人员停了下来，对杜修贤说，“就里面，你自己进去吧，我就不陪你过去了。”

杜修贤应了一声，就一个人往房间里面走，一进门，杜修贤被眼前的情景震惊了，他怔住了，毛泽东躺在一张宽大的床上睡着，周围一片宁静。杜修贤想，是要他来拍摄毛泽东的最后遗容？因为他知道，一旦毛泽东的遗体运到人民大会堂的灵堂里，毛泽东的遗体就要放进无氧罩里。杜修贤轻轻地调好焦距，小心翼翼把镜头对着毛泽东的遗体拍了一张半身的，又拍了一张全身的，他正拍着，身后传来门的响声，他听见姚文元在门口关照警卫员，要他们把门关好，不准其他人进来。

杜修贤放下相机，等待指示，这时，房间里已陆续进来了几个人，

还是华国锋、江青、张春桥他们8个人，他们围在一起，好像在商议什么，随后，他们几个人排成一排，脸上带着悲伤的神情，一个接着一个围绕毛泽东的床缓缓行走了一圈后，排成一行，低头站立在毛泽东的遗体前，直到这时，杜修贤才明白，他的重要任务就是给他们拍照……出人意料的是，江青、张春桥等人又手挽着手站立在毛泽东遗体前，他又按动了几次快门。

杜修贤想，叶剑英为什么没有来呢？虽然政治局委员不全，但副主席常委都在，就少叶剑英副主席，如果说只是负责毛泽东医疗组的中央领导人向毛泽东遗体告别，姚文元、陈锡联又不是医疗组成员。回到摄影部后，值班记者告诉杜修贤，说姚文元来过几次电话找他，杜修贤联想起汪东兴为此事亲自找到他，又想起江青的“你怎么就带来了一个闪光灯？还是平版光”的话，可见这次合影是计划好了的。

当晚，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警卫战士在中南海向毛泽东遗体举行了告别仪式。

9月11日凌晨3时20分，毛泽东的灵车来了。华国锋、汪东兴等护送毛泽东遗体出中南海西门，来到人民大会堂。毛泽东遗体被放在宽大的平担架上，由警卫战士抬着，缓缓走进人民大会堂北大厅。遗体在北大厅放定，专家们细心测定周围的温度、光照等。

9月11日上午10时许，吊唁活动正式开始。毛泽东的遗体被安置在人民大会堂的鲜花翠柏之中，身上覆盖着一面巨大的党旗，8名礼兵守护在遗体周围。

吊唁活动开始后，中央政治局委员们每4人一组，轮流为毛泽东守灵，其余的都在附近的房间里开会。

11日这天的会议临结束时，张春桥忽然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主席的追悼大会由谁主持？由谁致悼词？”

几分钟过去了，没有一个人发言。最后还是叶剑英打破了这令人困窘的沉默：“我的意见，追悼会由洪文同志主持，国锋同志代表中央致悼词。”

众人把目光投向了另外两位副主席。

王洪文皱眉没有吭声。

“叶帅德高望重，还是请你给主席致悼词吧！”华国锋推辞着说。

叶剑英说：“你是第一副主席，你应该牵头这个头。这也是主席生前的愿望。”

张春桥含笑补上一句：“打今年4月以来，主席就明确指示由你主持中央工作嘛。”

华国锋说：“我能力差，经验少，还是靠大家同心协力，靠集体领导。”

李先念说：“集体领导也要有分工负责嘛，你总不能让大家都站在台上集体念悼词吧。”

华国锋不好再说什么，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主持会议的王洪文环顾四周问：“谁还有说的？没有了就散会！”

这时，张春桥说：“国锋同志，有件事我要向你汇报一下。”

“什么事？”华国锋问。

“关于主席的遗体安置问题。”

“这件事不是中央有了决定，主席的遗体作永久性保存，以供后人瞻仰。”

张春桥点点头，郑重地说：“是呵，是呵，但我听医生同志讲，由于没有及时采取防腐措施，遗体已经变质，不能再作永久性保存了。”

张春桥说得很轻，可立即在会场激起一阵响动。

“什么？”华国锋更是着急，一下瞪大了眼睛。工农出身、感情朴实的陈永贵、吴桂贤顿时痛哭起来。

张春桥还是不紧不慢：“我听医疗小组的同志讲，凡未采取防腐措施而超过3天的遗体，便不能再作永久性保存。”

一听这话，江青抢先跳了起来，嚷道：“华国锋，这事你要说清楚，你为什么要毁掉主席的遗体！你安的什么心？你这样作对得起主席吗？”

吴德含着泪哽咽道：“要是主席的遗体真出点差错，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啊！”

“既然中央已经作了保留遗体的决定，为什么不及时采取防腐措施呢？是不懂，是忽略，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陈锡联的语气十分严厉，带着责问的意味。

华国锋的额头一下渗出密密麻麻的汗珠。他神情慌乱，紧张地解释道：“这个，我实在是不懂，也实在是没有想到。”

“唉，你是第一副主席，这样大的事情怎么能没想到呢？吴德同志说得对，如果主席的遗体因为我们的失职而被毁掉。那中央是无法向全党和全国人民交代的。”张春桥痛心疾首。

江青对着华国锋大喊：“现在，我可把主席的遗体交给你了，要有三长两短，你要负责！”

华国锋急了：“为什么让我一个人负责？大家都是中央委员嘛！”

江青不依不饶：“你是第一副主席呀！你现在主持中央工作呀！”

华国锋额角青筋暴起，极力控制住冲动的情绪，从内心一字一字地吐出：“如果你们有意见，我可以辞去职务；但我决不能承担这个责任！”

叶剑英一拍扶手，大声道：“不，你不能辞职，江青同志说得很好嘛，你是第一副主席，你现在主持中央工作，主席的遗体你能不管吗？你能不负责任吗？”

华国锋更着急了：“叶帅，主席的遗体已经放了3天，我就是舍出性命也保不住了！”

“还不足3天，我们还可以想想办法嘛。”叶剑英安慰他。

秘书在叶剑英耳边说了几句话，叶剑英点了点头，轮到他守灵了。叶帅蹒跚地走出会议室，华国锋紧追几步，问道：

“叶帅，你说遗体还有办法保存吗？”

“当年胡志明同志逝世时，他的遗体就是停放了3天后才决定作永久性保存的，直到今天仍保存得很好。你可以给孙德胜同志发个电报，请他速派遗体保护小组的专家来。”

“好，我马上以中央的名义给孙德胜同志打电报。”

孙德胜，时任越南民主共和国国家主席。

由于临时使用的棺罩还未做好，毛泽东的遗体是敞开的。按照专家的要求，启动了大厅内全部的风冷设备。尽管室温已降到了15℃以下，厅内的人穿着大衣还觉得冷，但对保护遗体来说，这个温度却远不够低。更要命的是，瞻仰人群每人都是一個散热体，军乐队又在现场演奏，铜管乐器中喷出的也是热气，再加上厅内的灯光热量，到最后恐

怕连15℃也保持不住。

“不行，这样下去不行！”防腐小组的人急了。列席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徐静提出，大厅内温度降不下来，不利于遗体保护，必须采取坚决措施……话还未说完，有人提出，要停止瞻仰、吊唁活动，改用照片代替遗体告别，等等。但是，如果这样做，其影响之大，可想而知。由此而产生的政治后果，也是很难预料的。会场上气氛十分紧张。这时，具体负责遗体保存工作的谷牧、顾明等人建议：立即撤去乐队，改为播放哀乐录音；控制厅内灯光总量，除了保留遗体顶上的那盏大灯外，其他的灯尽量少开，这样，吊唁厅的温度应该可以降下来。

他们的建议提出后，会议气氛才缓和一些。

下午，吊唁大厅的温度基本控制住了，华国锋赶回中南海值班。他处理完一些事情后，说身体不适，要去北京医院检查一下。然后悄悄给李先念打电话说：“我到你那里，只谈5分钟。”

李先念说：“你来吧，谈多长时间都可以。”

第 1405 回：华国锋，看病去见李先念 张平化，质疑米士奇电话

9月11日下午，华国锋带了警卫员小叶和秘书小于到北京医院看病。看完病后，华国锋对司机老孙说：“咱们去看看先念同志。”

李先念是华国锋的老领导，1970年，华国锋到国务院业务组任副组长，李先念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他们经常一起参加政治局会议，在国务院研究工作，议论国事。李先念身体不好，经常犯心脏病。周恩来让华国锋负责李先念的医疗小组工作。华国锋常常到李先念家里去看望他。有时李先念躺在床上，华国锋搬个椅子坐在床边，两人谈得十分融洽。此时李先念住西黄城根9号院，离中南海不远。

9号院大门口值班人员一看是华国锋的车，急忙通知里面的人。李先念得到消息，从办公室出来，刚走到大厅，华国锋已快步进来。李先念将华国锋迎到办公室。秘书小于由李先念的秘书徐贵宝陪着坐在外面大厅等候。

华国锋坐下来，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以到北京医院看病为名来的，只能呆几分钟。我实在太忙，离不开，请你去找趟叶帅。‘四人帮’的矛盾必须解决，请叶帅考虑，用什么方式、在什么时机解决为好。”

李先念连说：“好，好，我一定去看叶帅。”

华国锋说完后即匆匆离去。两人谈话不到10分钟。

李先念将华国锋送上市，转身回到大厅。他微笑着轻声问秘书：“你觉得国锋同志怎么样？”

徐秘书不知华国锋为何而来，也不知李先念问题的用意，停顿片刻，拘谨地回答：“他给我的感觉……有些优柔寡断。”

李先念摇摇头，十分肯定地说：“不！国锋同志非常有原则。”

当天，华国锋又找到汪东兴征询解决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问题的意见。汪东兴态度明确，表示坚决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

虽然人民大会堂吊唁大厅的温度基本控制住了,但是,遗体可能保存的最好办法还是要使用能够降温、隔氧的玻璃棺罩。早在9月9日下午,谷牧就紧急召见了北京市计委副主任韩伯平、石油化工部副部长陶涛等人,让他们研究、制造能够降温、隔氧的玻璃棺罩。时间急,只有1天时间。无准备,他们只好找现成的,首先想到的是苏联1925年送给孙中山先生的水晶棺。当他们立即赶到碧云寺,打开一看,由于种种原因已不能使用。

制造玻璃棺,时间来不及,又不安全。于是,确定做一个有机玻璃棺,但北京只有一个厂生产有机玻璃板,最长的板只有1.6米,而这次需要2.2米长。北京有机玻璃厂的全体职工,眼含热泪,日以继夜,边试验、边粘接,把短板粘接成2.2米的长板。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只用十几个小时就将有机玻璃棺粘合成功。11日,工厂职工把玻璃棺送到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把毛泽东的遗体安放在棺内,使棺内成为一个“小环境”。

北京氧气厂和化工系统对棺内进行了充惰性气体的工作,使棺内的含氧量降到遗体保护要求以下。

谷牧请来了各方面的制冷降温专家和北京市冷冻机厂、医疗器械厂等各厂的领导、技术人员和老工人,采用了液体介质、气体介质降温,有明显的效果,但不稳定;北京市计委的谢飘和半导体专家们,又做出了半导体制冷降温的设备,综合降温,使棺内的温度稳定在7℃到8℃,夜里可以降到6℃。

当时,这些制作冷棺的工作人员,他们心脏的跳动都是随着棺内温度计的升降而变化的。这绝不是夸大其词,谷牧曾说过:“如果遗体保护不好,我们就会成为千古罪人。”

9月11日午夜,毛泽东的遗体被放入有机玻璃棺中,专家们所担心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当晚,越南专家组也到了北京。

12日一早,华国锋去吊唁大厅守灵。还不知道这些最新情况的江青,一见到华国锋就着急地大声问道:“华国锋,主席的遗体怎么办?我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

华国锋连声说:“好,好,等一会儿就开。”此时他已胸有成竹。

江青边擦眼泪边说：“主席去了几天了，主席的遗体怎么办？”

……

开会了，姚文元摊开一大堆群众来信，对大家说：“这是从《人民日报》整理的群众来信汇编，群众要求保存主席遗体。”

江青再次说到：“可是，我刚才得到报告，主席遗体已经毁坏了，腐烂了。谁干的？政治局一定要追查！”

华国锋说：“我现在向大家宣布，经过越南专家组和中国专家的共同努力，主席的遗体已得到了妥善的保护，可以永久保存了。”

大家都鼓起掌来。华国锋接着说：“我提议，在天安门广场立即修建纪念堂，安放主席遗体，供全世界人民和我国人民瞻仰。”

他的话再次被掌声淹没。



江青与毛泽东遗体告别，左一为张玉凤

设立在人民大会堂的毛泽东悼念灵堂。

11日晚和12日上午，米士奇按照王洪文秘书廖祖康的要求，用紫光阁休息室的一部红机，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打了27个电话。

西安，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长途电话，亲自作了记录：

1976年9月12日上午十点多。

中办：米思（士）奇电话：

中央领导同志指示：

主席丧期发生重大问题及时报告。有重要问题不好解决及时请示。

找米士奇同志联系。

“米士奇是谁？”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电话后，颇觉蹊跷，他当即给华国锋挂了电话，问道：“这是不是中央的决定？”

“什么？重大问题要找米士奇联系？我不知道呀！”华国锋感到吃惊。他告诉张平化，“米士奇是王洪文那里的工作人员！”

米士奇，在中南海，人们喊他“小米”，中南海里的小字辈，1961年北京二中毕业，正准备报考北京大学历史系，恰好中南海那年从北京应届高中毕业生中选8名“根正苗红”的学生当速记员。米士奇爷爷是工人，父亲是中农，本人是学生，出身河北保定徐水农村，没有很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学六年，他六年当选三好学生，五年当选优秀团员，两度当选北京市优秀学生，自然被选中了。最初选了8人，后来筛去一半，剩4人，米士奇仍在其中。这4人被送去学速记，不久调往中南海，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工作，为中央的会议当速记。

1974年，他担任中办秘书处文件组副组长时，于2月1日被调往王洪文办公室临时协助工作。这样，他成了“王办”的工作人员。

身为中共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不知“重大问题要找米士奇联系”的事情。他问另一位副主席叶剑英，叶剑英也不知此事。于是，华国锋马上要秘书以中央名义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打电话，发出通知，发生重大的问题，应向华国锋和党中央请示报告。

这天，汪东兴在人民大会堂接到张玉凤打来的电话，请示说：“江青几次提出，要看毛主席这里保存的文件，我不知怎么办好，是否可以给她看？”

汪东兴对张玉凤说：“主席那里的文件、材料、书籍、遗物等，未经党中央批准，任何人都不得翻阅、索取和搬动。”

这天，叶剑英在为毛泽东吊唁和守灵中间休息时，来到福建厅，主动和汪东兴打招呼。

汪东兴看到叶剑英，忙问到：“叶帅，你怎么来了？”

叶剑英说：“一方面我来看看你，一方面来听听你对形势的看法。”

“自9月9日以来，你是日夜操劳，没有很好地休息过，可不能把身体搞垮哟！很多事情还等着我们去做呢！”

汪东兴说：“事情的确多得很，瞻仰毛主席遗容还在进行。全国要求来京参加吊唁治丧的人民的来信来电像雪片一样。追悼大会正在抓紧准备。遗体保护问题专家们正在研究。去越南取经的专家尚未回来，预计遗体保存的问题可以解决，请叶帅放心。”

叶剑英叹了口气：“毛主席逝世是一件很不幸的大事，我们都很悲痛！可是还有人不顾大局多方干扰。江青在讨论毛主席丧事的会议上，闹着要开除邓小平同志的党籍。姚文元跟着起哄，不必去说它了。而政治局竟有人毫无根据地说主席脸色发紫，怀疑是医生害死的，弄得医生们很紧张。好在王洪文、张春桥都参加了主席治疗的值班，不然又要颠倒是非了。”

汪东兴深有感触……

叶剑英说：“你在主席身边工作多年，经历了不少难办的事情，这也是不可多得的一种锻炼。我虽然老了，但锐气还是有的……”

见周围无人，他低声问到：“现在江青他们还在中南海活动吗？”

汪东兴说：“江青这两天在中南海跑到毛主席住地，要看主席那里的文件，没有答应她，很不满意，又要闹事了。”

两人又谈了北京、上海、辽宁、天津、广东等省市的情况，感到形势不是很好。

9月12日，迟群、谢静宜以清华、北大两校师生家属的名义给江青写信，保证说：“一定为主席争光、争气，请江青同志放心。”两校还有人给江青写信，提出要江青当中共中央主席。

从9月12日起，一封封“效忠信”、“劝进书”寄往中共中央，也寄到江青手中。一封落款为“毛主席的共产党员”的信寄给“毛主席的中共中央”。信中写道：

“我以极其悲痛的心情向党中央写这封信。我们这些小人物最担心的是毛主席逝世以后，党中央的领导权落到什么人手里？我恳切的向党中央建议：江青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增加张春桥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增加王洪文同志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

还有一封寄给江青的信写道：

“江青同志：请您接受我以我个人和家属、亲友以及我单位全体工作人员的名义，深切悲痛地哀悼。您立即出来挑起这副重担！迅即宣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时乎不待！……”

李先念和陈锡联一起为毛泽东守灵，李先念去洗手间时，陈锡联随后也跟着去了，他悄悄对李先念说：“那几个人可能要动手，要当心。”

李先念急忙摆手，不让他说下去。

9月13日，党中央成立了以华国锋为组长的“毛主席遗体保护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是领导小组的执行机构，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担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的办公地点设在北京市西城区西黄城根南街9号。办公室对外名称叫“国务院第九办公室”，简称“九办”。实际上国务院并没有第七、第八办公室。

9月13日，姚文元在日记中写道：

上午同国锋、洪文守灵；接待朝（鲜）、阿（阿尔巴尼亚）、罗（罗马尼亚）等国使节，许多外宾在主席遗体前失声痛哭，表现了各国人民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

不知为什么，江青没有参加会见。后来她提出政治局开会，在会上，因为遗体问题和华吵起来。她的言词很激烈，大家都不满意，这样下去会很危险。主席不在了，有些人已开始疏远她。我不能这样做，要努力帮助她，支持她，要对得起主席。

下午审新华社稿和电视台的录像，没有江青的镜头，已让邓岗补上。《人民日报》社论又改了一稿，已送春桥同志。他，似乎有什么话要对我讲，过几日应找他谈一谈。

晚上，同英（注：指姚文元之妻金英）长谈，重点国内形势和党内斗争。她的政治嗅觉很敏锐，和我有同样的预感。主席逝世，一些人可能会趁机闹事，要提高警惕，要有所准备。我和英最担心的是孩子，他们尚小，不谙世事，能经受得住残酷斗争的考验吗？

孩子，又是孩子，我近来为什么老想到孩子，为什么变得这样多愁善感，这是意志消沉和怯弱的表现。我要振作起来，要充满信心，为了孩子，也要勇敢地投入战斗。

记住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我喜欢的生活——战斗！”

9月14日凌晨，江青给华国锋打电话说：“我建议立即召开紧急政治局常委会议。”

华国锋问：“会议讨论什么问题？”

江青说：“主席那里的文件由谁清理？由谁保管？这些都要常委会定下来。”

华国锋说：“我同常委们商量一下。”

江青不耐烦地说：“有什么可商量的，都是急需要办的事。”

华国锋说：“我们商量以后再说吧！”

江青又说：“开常委会，我、文元、远新，还有汪东兴都要参加。”

华国锋没有表态，把电话挂断了。

华国锋随即将江青打电话的事告诉汪东兴，汪东兴说：“这个常委会不能开。管理主席的文件问题，听汇报就行了。如果常委会一开，他们一参加，身份就合法化了。他们是要夺权。”

华国锋又给叶剑英打电话，叶剑英也是同样地态度。

华国锋从中南海来到人民大会堂，准备同汪东兴、王洪文、张春桥一起讨论毛泽东遗体保存问题。当日下午，江青又打电话给华国锋，要求开会。华国锋问在座的两个常委王洪文、张春桥：“怎么办？”

王洪文、张春桥说：“就按江青同志交代的办吧。”

江青来到人民大会堂，一坐下就讲个不停，最后提出由她和毛远新清理毛泽东的文件书籍。理由很简单：她是毛泽东的妻子和秘书，列宁的文稿就是克鲁普斯卡娅整理的！

华国锋说：“毛主席是党中央的主席，汪东兴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毛主席的文件应该由中央办公厅处理，由汪东兴负责。”

汪东兴也说：“主席文件，不是讲好要封存的吗？现在保存遗体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呢。”

江青说：“这样吧，文件还是小张保管，她为人可靠，让她给我当秘书吧！”

王洪文、张春桥觉得这样也可以，华国锋、汪东兴没有同意。

江青说：“啊呀！你们不同意呀！是不是怀疑她有问题，可能是个特务吧！”

华国锋一看她又要折腾，赶紧说：“汪东兴同志跟主席几十年了，对主席的东西非常熟悉。按党中央过去的决定，主席的文件属于国家机密，应由办公厅负责清理，并向中央写出报告。现在大家忙于治丧，来不及清理，暂时还是由东兴同志封存起来。”

江青继续坚持，就这样一直吵了5个多小时，华国锋就在那里听着。最后他说：“今天的会议，连剑英同志也没有参加，不算常委会。下次他来了，人到齐了，再讨论。”

江青吵累了，回去了。

第 1406 回：上西山，李先念见叶剑英 争文稿，说“按既定方针办”

李先念 9 月 11 日下午接受华国锋委托后，于 9 月 14 日亲自给叶剑英打电话说要去看他。

叶剑英在电话中问：“公事、私事？”

李先念说：“公私都有。”

叶剑英说：“那你就来吧。”

李先念对工作人员说，心情不好，要去香山植物园散心。汽车快到植物园时，他突然对司机和警卫说：“去西山叶帅处。”

叶剑英在院子里迎接李先念，说：“久违，久违。是哪股风把你吹来的？”

李先念说：“东风。”

俩人先是寒暄问好，又在院子里走了一会儿，随后，叶剑英将李先念请到屋里，打开了收音机。

李先念向叶剑英转达了华国锋 11 日的意见，说：“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叶剑英也重复了一遍：“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是没有与李先念深谈，也没有提出解决“四人帮”的具体办法，只是向李先念打听了陈锡联的情况。

李先念走后，叶剑英把军事科学院第一政委粟裕大将、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上将找来，将李先念所说之事告诉他们。叶剑英住地离军科院很近，军事科学院悄悄地加强了对叶剑英的外围警戒。

李先念从叶剑英处回来，当天就把同叶剑英谈话的情况和叶剑英的态度报告了华国锋。李先念还告诉华国锋，为了保密和联络方便，他要搬回中南海，以后便在国务院会议厅随时见面。

9 月 15 日的吊唁活动结束后，叶剑英约汪东兴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南侧的一间办公室，又谈起江青的事情。

这天,《光明日报》社临时领导小组负责人莫艾作为毛主席治丧委员会成员,在人民大会堂守灵。在休息厅里,《人民日报》社鲁瑛对莫艾说,“明天有重要社论发表,是传达毛主席的临终嘱咐,解释‘按既定方针办’的。已通知你们《光明日报》到《人民日报》去取清样。”

过了半小时,有人给鲁瑛送来一大卷清样,鲁瑛便给在场的人分发。这就是9月16日要发表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的清样,题目是《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莫艾当晚回到报社,立即召开报社领导小组会议,传达鲁瑛同他的谈话,并组织大家学习这篇社论。莫艾根据社论内容,结合宣传报道,又谈了一些报道选题设想。他指示到有关单位组稿。

第二天下午,领导小组分管业务的几个成员和总编室同志一起研究选题问题。领导小组成员孙关龙提出到“梁效”约写一篇“按既定方针办”的文章。大家同意。

9月16日,华国锋召集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等人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其间,华国锋问到:“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

话音刚落,纪登奎就说:“对这些人恐怕还是要区别对待。”

其他人没再说话。

本来华国锋是想了解这些政治局委员们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态度,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此范围谈论如此敏感的问题,显然是不行的。华国锋决定改变工作方法,搞“个别串连”,先找信得过的人密商。

9月16日下午15时,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开会,讨论毛泽东追悼会的悼词稿。开会前,下午14时多,汪东兴将周启才叫到他在人民大会堂的临时办公室,说:

“有两件事你代我报告国锋同志:一是,今天下午的政治局会议,我不能去参加,我要在这里保护主席的遗体,你替我向国锋同志请假。二是,悼词文稿我看遍三遍,认为基本可用。有一条补充意见,就是在悼词文稿的适当地方加上主席讲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条重要指示。我认为加上主席这条指示,很有必要。”

周启才说：“好。我马上就去怀仁堂，国锋同志一到我就向他报告。”

下午 14 点 50 分左右，华国锋到达会场。周启才向他报告了汪东兴请假和对悼词文稿的意见。

下午 15 时整，华国锋宣布开会后，让周启才把汪东兴对悼词文稿的意见讲一下。

所有到会的其他政治局成员都没有反对。华国锋对姚文元说：“没人提出不同意见，那就把主席这条重要指示加到悼词的适当地方。”

9月1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社论中这样写道：

毛主席与世长辞了。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在沉痛哀悼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永远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把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表明：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党就发展，革命事业就胜利；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党就遭挫折，革命事业就失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牢牢记住这个最重要的历史经验，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勇敢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要坚持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坚持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当前，要把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只要我们按毛主席路线办，我们就无往而不胜。

在这篇社论中，以黑体字印着“按既定方针办”6个字。按照当时已经形成的惯例：在报纸上，凡毛泽东的话，均用黑体字排印。这“按

既定方针办”既然是用黑体字排印，就表明是毛泽东的话。

这句话，这篇社论的原稿上本来是这样写的：“毛主席在病中嘱咐我们”，姚文元审阅时删去了“在病中”3字。

当天，叶剑英把《人民日报》送给华国锋。他用红铅笔在“按既定方针办”下面画了一根红杠，然后在旁边打了个大问号“？”。

华国锋看了，并没有在意。

社论发表以后，江青给张春桥打电话：“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发表出去以后，有什么反应没有？我已对文元同志强调，宣传工作要以宣传毛主席的‘按既定方针办’为中心，要反复宣传。”

姚文元于9月17日、19日、20日、23日连续给新华社打电话，要他们宣传好“按既定方针办”。

这天，张玉凤又给汪东兴打电话报告说：“汪主任，江青急于要看主席这里的文件，我不好办啊！你如果有时间最好来一趟，我有事向你当面报告。”

汪东兴放下电话，就驱车从人民大会堂赶到中南海“202”。张玉凤向汪东兴汇报说：“主席逝世后，江青每天都要来毛主席住处找我，多次要看毛主席的九篇文章原稿及修改稿，还要看毛主席的手迹。我觉得不妥，不符合组织手续，我不好随便给，没给她。这两天，江青又来非看文件不可，我只好给她看了。结果江青把毛主席和杨得志、王六生同志的两次谈话记录稿给拿走了。”

汪东兴立即去向华国锋汇报，华国锋问他文件是否重要？

“非常重要。里面涉及到主席关于总参谋长和一批军队高级干部的人选问题，如果扩散出去，会给中央今后的工作造成很大的被动。”

“啊！那你说怎么办？”华国锋问道。

“马上找江青同志要回文件，同时，政治局应指派专人负责保管主席的文字材料，以免流失和损坏。”汪东兴说。

华国锋立即表示同意，并指示汪东兴负责这件事。

汪东兴告诉张玉凤：“立即将这两份材料追回来。中央准备把主席这里保存的文件、材料、手稿等封存起来。”

张玉凤到江青那里要文件，江青写了一个条子给华国锋说，这两份文件很重要，要华国锋批给王洪文、张春桥看。然后将文件转给华

国锋。

华国锋拿到文件一看，上面到处是江青批改的文字。这两份文件本来是毛泽东1974年谈话的原始记录，但正文中却有江青1976年的多处批注，甚至还有这样的话：“对黄、吴、叶、李、邱要进行帮助。”叶群早在1971年9月13日就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了，毛泽东1974年谈话怎么还会这样讲呢！

华国锋于是扣下了这两份被江青改动过的文件。

9月17日上午，《光明日报》孙关龙等两位领导小组成员去“梁效”组稿，二人在汽车里讨论，文章应该用一个什么题目？商议结果，题目就定为“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到“梁效”处谈了组稿意图后，“梁效”核心组随即按《光明日报》的意图将这一任务交给“梁效”写作组组长范达人。

当天下午，“梁效”给《光明日报》来电话，约定9月20日由范达人来报社谈写作提纲。

9月17日，新华社在发给各省市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党委的《内部参考》（第125期）上，报道清华、北京大学两报一刊社论时的讨论情况。

报道引述清华大学政治理论组中年教师黄安森的发言：“敬爱的毛主席，您临终教导我们‘按既定方针办’……”

报道又引述清华大学工宣队员王玄元的话：“毛主席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为我们党不变修、国不变色考虑方针大计。毛主席的嘱咐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

也就在9月17日，上海的《解放日报》第五版，在“遵循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的通栏标题下，用了四个醒目的标题：

“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与走资派作斗争”。

“按既定方针办，就要认真学习，深入批邓”。

“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于是，叶剑英又一次提醒华国锋。

他向华国锋指出：

第一，华国锋过去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经传达过，在1976年4月30日毛泽东在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华国锋向毛泽东请示工作，说及有几个省形势不太好，毛泽东亲笔给华国锋写了“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如今被改成“按既定方针办”，6个字中错了3个字；

第二，有人已经在说，“按既定方针办”是毛泽东的“临终嘱咐”。其实，这不是毛泽东的“临终嘱咐”。因为4月30日距毛泽东去世还有四个多月，那时毛泽东还在会见外宾，怎么能说是“临终嘱咐”？

经叶剑英这么一提醒，华国锋开始注意这件事。

9月1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开。会议一开始，江青就抢先说：“主席处的文件清理保管工作，因汪主任忙于主席的丧事，无暇顾及，我提议把所有的文件、手迹、文稿及各种材料的清理保管工作统统交远新负责，远新有时间，又熟悉那里的情况。”

她滔滔不绝地讲了很多，还说：“张玉凤过去就不可靠，要偷主席的文件。现在要赶快采取措施，让毛远新来整理毛主席的文件。”

张春桥开始也表示同意，提出让毛远新登记毛泽东的文件、材料。

江青补充说：“毛远新是主席的联络员，懂得主席的思想，我也懂一些。应该让远新整理主席的文件，我也参加。”

王洪文和姚文元也表示同意，说毛远新是最合适的人选。

这时，汪东兴发言：“毛主席处的文件、手迹、文稿、材料以及各种信件，历来都是由中央办公厅负责收、发、保管、存档。从中央苏区长征出来一路上，直到延安，从西柏坡进城到如今都是这样做的。因为主席这里的文件、文稿、手迹、信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只能由党的有关组织来保管，不应交任何人来负责，毛主席生前确定的这些正确原则，现在仍应继续坚持。因此，毛主席处的文件、档案以及所有的材料，我认为仍应由中央办公厅负责处理。鉴于目前大家都在忙于主席的丧事，我建议现在暂不处理，先把它们封存起来，任何人不经中央批准，不得翻阅和取用。”

华国锋说：“同意将毛主席处的文件、手迹、文稿以及各种材料，按惯例仍由中央办公厅负责清理和保管。目前汪东兴同志的确很忙，同

意先把它们封存起来。”

江青还要反对，张春桥阻止了她。张春桥建议先让毛远新帮张玉凤清理，华国锋和汪东兴都没有同意。张春桥没有再坚持。

没有人再发表不同意见。

华国锋说：“没有什么意见，就这样决定了。”

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的决定，当晚20时，汪东兴和秘书高成堂一起，来到毛泽东生前的住处，把毛泽东卧室和书房的进出大门，贴上了加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公章的封条。

加封的时候，汪东兴向张玉凤交代：“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已经做出决定，把毛主席这里的文件全部封存，未经中央批准，任何人都不得违反规定。”

张玉凤说：“这样我就好办了。”

22时左右，江青由钓鱼台来到中南海“202”，看到毛泽东的卧室和书房的大门已被封条封住，气得火冒三丈，大发雷霆，质问张玉凤：“这是谁干的？”

张玉凤回答说：“是汪主任带人来封的。”

江青咬牙切齿地说：“好呀！汪东兴，你搞突然袭击！”

她回去后，马上给华国锋打电话，气急败坏地说：“汪东兴搞突然袭击，把主席的卧室和书房都加封了。这种行动是对我们的不信任。”

华国锋说：“今天下午常委会不是已经做出决定，可以先封存起来。”

江青说：“为什么连个招呼也不打就加封？”

华国锋说：“汪主任执行常委会决定，不需要再打招呼了吧。”

江青又质问“为什么要封主席的房子？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赶我走啊！”

华国锋耐着性子解释说：“办公厅封的是主席放文件的地方，没有赶你走。你有你的房子嘛。”

江青仍不肯罢休，又说：“我建议，明天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

华国锋说：“我同意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两个问题：一个是毛主席处的文件处理问题，一个是毛远新回辽宁工作的问题。”

第 1407 回：九一八，毛泽东追悼大会 打内战，许世友儿子的信

9月18日下午14时50分，北京百万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以最隆重的仪式举行“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

同样的天安门广场，同样的百万人海，10年前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神采奕奕，广场上的民众更是沸腾不息。

然而10年之后，天安门城楼上已看不到毛泽东的身影，就连他彩色的巨幅画像也变成了黑白两色。广场上的百万民众不再沸腾，整个天安门广场鸦雀无声，静静地等候追悼大会的开始。而这种沉静不仅只在天安门广场，整个中国都沉静了……

这个追悼大会真是史无前例，全世界也没有这样规模空前的追悼大会，这天的追悼大会全世界都在关注。

9月18日，毛泽东追悼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北京百万群众参加

15时整，追悼会开始。沉痛悲伤的哀乐从天安门广场漫涌，滚滚飘向广袤的天际，阴沉的天空下面是臂戴黑纱胸佩白花、悲痛不止的百万群众。他们默默地抽泣，为毛泽东主席的离去而沉痛哀悼。

悲壮的礼炮鸣响了3声，将新中国27年里最高规格的葬礼推向空前的高潮。

在天安门城楼下面正中央架设的追悼会主席台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站立成一排，王洪文年轻的脸上挂着和年龄不相称的沉重，今天这位最年轻的副主席要主持建国以来最高规格的追悼会。

华国锋站在王洪文的右侧，他要在百万首都人民面前用他浓重的山西口音宣读悼词。

叶剑英立在华国锋的右侧。短短大半年里，出生入死共同打江山的“老伙计”们一连走了3个，连领导人民打江山的毛泽东主席也走

了。这让他充实了半个世纪的精神世界一下变得空荡荡的……他扯着衣角，凄凉的情绪从他脸上每个纹路里自然地流泻出来。

张春桥站在王洪文的左侧。他的左侧就是裹了一身黑衫，头披长长的黑纱的江青。据说这是“庇隆夫人”式的丧服，黑纱把她的脸遮小了一圈，在这排人里显得极不协调。阿根廷总统庇隆 1974 年死于任内，他的夫人后来成为阿根廷的总统。



此时，整个中国大陆停摆，一切机关、厂矿企业、商店、公社、学校、军队里工作的中国人，一切正在街道上行走的中国人，均就地肃立，静默致哀，厂矿、火车、轮船、军舰均鸣笛 3 分钟。

接着，王洪文说：“现在请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致悼词。”

华国锋用尽可能标准的山西普通话，一字一句地念起悼词。

华国锋的悼词没有毛泽东“按既定方针办”的遗训。

不久，追悼大会在《东方红》和《国际歌》中宣布结束，前后不到 1 个小时。

9月18日，在追悼大会上。王震对聂荣臻说：“你听到了吧，批邓的调子还蛮高哩，这样下去可不得了，得赶快催促叶帅决断。”

聂荣臻说：“会后我们再去叶公那儿一趟，给他再烧把火。”

9月18日下午16时，毛泽东的追悼大会刚刚结束，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召开。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同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意见：毛泽东处的文件、档案，由中央办公厅负责清理和保管。目前因工作繁忙无暇整理，可先封存起来。至于毛

远新，应同意他回辽宁工作。

当天，聂荣臻来到小凤翔叶剑英家中。他对叶剑英说：“我们这些老家伙流血牺牲，跟着毛主席、周总理这些老革命家打出来的天下，决不能被那帮野心家、阴谋家篡夺。”

这天，王洪文的秘书肖木是从钓鱼台步行去天安门广场参加毛泽东逝世追悼大会的，足足走了三、四个小时。他是想收集民众对毛泽东逝世的反应，为自己写小说积累资料。追悼大会结束后，他回到住处，接到张春桥的电话，要他过去。张春桥平时与别人很少私人交往，能说话的人不多。肖木讲起自己步行一路的见闻，说毛主席逝世，大家都很哀痛并担忧中国的未来。肖木讲述时，张春桥不时地插些话。

9月19日，姚文元给新华社的电话说：“你们处理各省市在追悼会上的重要讲话、表态，不要怕重复。重要的都要写进去。比如‘按既定方针办’，凡有这句话的都要摘入新闻，没有的要有类似的话……关于‘三要三不要’，消息中提到的要保留，没有的也就算了。”

于是，9月19日，新华社关于28个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举行的追悼毛泽东大会的报道中，全部都写及了“按既定方针办！”中国大大小小的报纸上，印满黑体字“按既定方针办！”《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甚至多次用“按既定方针办”作头版通栏标题。

“按既定方针办”是“上海一千万人民的战斗誓言”之类话，也不断见报。

华国锋看到报纸上天天在登“毛主席指示”“按既定方针办”，又风闻张春桥说是毛泽东临终“拉着”他的手说的，开始意识到这句话背后的严重事态。

9月20日，上海徐景贤接到卫生部部长刘湘屏的电话，要他带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几位专家、教授，搭乘专机赶往北京，参加卫生部召开的毛泽东遗体保存研讨会。

徐景贤打电话请示张春桥同意后，连夜带上海的专家乘飞机来到北京。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厅举行，由刘湘屏主持，开了一个通宵，结束时天已大亮。

徐景贤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给张春桥通了电话，张春桥约他下午到钓鱼台去。9月21日下午14时，张春桥的驾驶员开了一辆大红

旗轿车到人民大会堂，把徐景贤接到了钓鱼台九号楼。

九号楼楼下是大客厅和工作人员用房，二楼外间是张春桥的办公室兼小会客室，里间就是他的卧室。住所布置得简单、朴素，外间的办公室兼会客室里，中央放一张小圆桌，四周是四张软椅；临窗的一边安着一张办公桌，桌面上有一些活页夹。卧室里几乎没有家具，一张普通的双人床，两只小沙发，看得出主人的生活是简朴的。

张春桥让徐景贤在小会客室背窗的一只软椅上坐下。徐景贤向张春桥汇报了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提供的有关 60 军对上海构成威胁的情况。

丁盛 8 月去舟山群岛及长江口外，属上海警备区管辖的大、小洋山岛视察。视察后，他从吴淞口登岸，下榻在上海警备区所属的延安饭店。8 月 8 日晚上 20 时左右，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知道丁盛在上海，相约去看他。

9 月 3 日，丁盛再次来到上海，在延安饭店碰巧又遇到马天水等人。马天水问起，上海市委曾给南京军区转去一封信，是 60 军驻无锡部队一个什么人写的。信中说，在部队招待所查出了 4 个箱子，不知放了什么东西。马天水问丁盛收到转去的这封信没有？

丁盛回答说：“收到了。”同时说起军区也收到一封信，是许世友的儿子写给某医院一位护士的，信上说到毛主席百年后要打内战，丁盛说：“打内战可不得了，军区已将这封信送中央，送给陈锡联了。”

这封信，也报到了王洪文那里。信中说：

“前几天我见到爸爸，他对我说，主席逝世后，中国可能要发生内乱，主要是争夺最高领导权。如果北京有人闹事，他就率部队北上，占领北京城，控制中南海和钓鱼台，把那几个人全抓起来，统统杀掉。爸爸说，这些‘上海帮’坏透了，靠着有主席撑腰，恃权仗势，横行霸道，干尽了坏事，现在主席没了，他们也快完蛋了。爸爸还说，别看王洪文是军委副主席，张春桥是总政治部主任，军队没人听他们的，枪杆子全抓在我们手里，他们只能调动几个民兵师，成不了大气候。爸爸说，他只用一个军，就能把上海民兵吃掉。他把六十军摆在无锡，就是盯着上海的。”

据 1980 年 7 月 12 日王洪文在审讯时说：他看到这封信后，首先找

到毛远新，把这封信给他看了，毛远新建议以拉练的名义从沈阳军区调两个师到北京附近。

王洪文点头表示同意，又担忧地说：“远水解不了近渴，关键时刻还得靠民兵。”

于是，他又找到北京民兵指挥部的马小六和张世忠，让他们连夜调集3000名武装民兵，秘密住进中南海东侧的中山公园里，待命行动。同时，向北京公安局长刘传新和公安部副局长祝家耀通报了这个情况，指令他们派出大量便衣警察和巡逻车，对钓鱼台、中南海、人大常委会等几个重要场所进行重点守卫……

随后，王洪文又把信拿给张春桥看。

此时，徐景贤又对张春桥说：“丁盛还讲，驻在南京到苏州一线的60军他指挥不动，对上海有威胁，让我们要有所准备。”

徐景贤还向张春桥汇报了马天水已经向上海民兵增发枪支的情况。

张春桥听得很仔细，还问了60军领导人的情况。

在谈到上海的工作时，张春桥说：“要谨慎小心，特别是你们几个人讲话要注意。”

他特别关照说：“你回去再跟老马说一说，南京路上出现过的大字报（指要张当总理的大字报）再也不能贴了，这是毛主席单独向我作过指示的。今年年初我已经给老马打过电话了，你再说一下”。

张春桥对徐景贤说：“毛主席去世了，要有像毛主席那样有威望的领袖是不可能了。上海还没有经历过如林彪上台那样的考验，如果我有什么事情总是要连累你们的。”

徐景贤问张春桥：“最近身体怎么样？我们在电视里看到你为毛主席守灵的时候，几次用手抚摸心脏部位，是不是胸口发闷，有没有去检查过心脏？”

“当时我自己没有意识到。”张春桥笑笑说，“后来电视放出来我也看到了，可能那几天实在太累了。”

“还是要注意身体，现在有没有机会出去活动活动？”

“整天除了看文件，批文件之外，就是开政治局会议的时候出去一下。”

张春桥吸了一口烟，继续说，“不过最近我每天早上，在钓鱼台院子里走上一个小时，绕几个大圈子，坚持散步。”

“文元同志搬走以后，可以谈话的人就少了……”徐景贤说到。

“是呀，有时候我坐在这里看文件，一整天只说6个字：早晨服务员送早餐来，我说‘谢谢’，中午又是‘谢谢’，晚上还是‘谢谢’，这样，一整天3句话，6个字就过去了。没有什么人来，真的是‘门可罗雀’。”张春桥说到这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又像叹息，又像自嘲。

听到这里，徐景贤深深地感到张春桥的寂寞和孤独：妻子离了婚，孩子不在身边，自己又没有什么特殊的嗜好，既不爱打牌，又不打网球，当了中央首长更不能随意外出，他是个爱聊天的人，目前的这样一人独处的日子实在难挨，不禁对他的处境寄予莫大的同情，他确实尽快需要“找个伴”，他已经59岁了。

谈话谈到这里，火候也到了，徐景贤当即把话转入了正题：“春桥同志，上次你写信要我办的事，我做了努力，但觉得很没有把握，今天想当面把情况向你介绍一下……”

张春桥轻轻地“嗯”了一声，便不再说话，一双眼睛在镜片后面微微地垂下眼帘，仿佛在凝视着远处的什么地方。但是，看得出他是全神贯注很仔细地在谛听。

徐景贤把找“对象”的过程作了概要的介绍，然后着重谈了他相中的那位女士的基本情况，叙述了和她直接接触的印象。当谈到该女士写的那份调查研究的专题汇报，就是经张春桥作了批示后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时候，张春桥颇感兴趣地抬起头来问了一声：“是吗？”

徐景贤如实地介绍了该女士的政治水平和文化素养，也不加隐瞒地谈了她的相貌很普通以及她过去离异的原因……最后，徐景贤说他并没有把任何底细透露给该女士本人，而是想先听听张春桥的意见，如果可以考虑的话，他再和她接触，当然还要看她自己是否愿意。

张春桥从头至尾听完了徐景贤的介绍，沉默了片刻，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缓缓地说：“这件事今天先不定，我再考虑一下，以后再告诉你。”

徐景贤说：“那好，如果需要的话，我把她的档案材料调出来，那上面还有照片，一起送你看一看。”

张春桥微微颌首。这次当面介绍的谈话就算结束。
徐景贤也将毛泽东遗体保存研讨会的情况向王洪文作了汇报。



1976年9月21日联合国第31届会议开幕，全体代表起立哀悼毛泽东逝世

第 1408 回：华国锋，定决心抓“四人帮” 下西山，叶剑英“狡兔三窟”

1976 年 9 月 21 日，杨成武去看望已从西山返回城内的聂荣臻，报告了叶剑英的情况。聂荣臻对他说：“他们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邓小平暗害了，把叶剑英软禁了，那就麻烦了。他们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经常在会议上耍赖，蛮横不讲理，我们只有采取断然措施，才能防止发生意外。”

聂荣臻让杨成武赶紧返回西山，把这个意思转达给叶剑英，并说：“这个意见，我们上次在西山议论过了，事不宜迟！”

杨成武连夜上山去见叶剑英。叶剑英怕隔墙有耳，把杨成武领到房前的小花园里，杨成武报告了聂荣臻的原话。

叶剑英听后，高兴地说：“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并说：“告诉聂总，请他放心。他跟我想到一起来了，有事随时通报商量。”

他还对杨成武说：“华国锋现在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所以要注意争取得到华国锋的支持。”

他还诙谐地说：“狡兔三窟哟，我要立即搬家。你告诉聂总，也要注意安全。”

9 月 21 日晚，江青、张春桥以推荐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副团长李鑫出任中央警卫团长为名，让李鑫详细汇报警卫团的人员编制，武器配备、警卫布置情况。张春桥对政治局委员居住地点和警卫情况询问得尤为仔细，并一一记录，还要求李鑫把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警卫部队的动向每天向江青报告。李鑫满口答应后，即把江青和张春桥找他谈话的内容全部向汪东兴和华国锋作了汇报。华国锋当即提出以召开中央全会的方式解决“四人帮”问题，汪东兴以赫鲁晓夫利用召开全会把马林科夫搞下台的教训告诫华国锋：“中央委员里支持他们的力量要比你的多。”

李鑫则明确建议华国锋：“采取特殊手段、学苏共中央抓贝利亚的办法，把‘四人帮’秘密逮捕。”

为保密，华国锋当夜亲自前往李先念家中，请李先念向叶剑英转达：“我决心已下，请叶帅尽快下山来商定对策。”

当晚，叶剑英来到华国锋家。

这天，叶剑英与华国锋进行了历史性的晤谈。他首先解释了未与李先念深谈的原因，然后俩人进行两个小时的长谈。

华国锋谈了自己工作的困难，谈了最近发生的几件麻烦事：一件是王洪文在紫光阁安了新的电话，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要求全国有问题时和他联系，这等于另搞了一个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件是江青拿走毛泽东文件的事。最后他感叹地说：“他们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和他们共事实在是难。真要对付江青和那几个人，又怕影响了团结，影响了毛主席的形象，所以左右为难。”

叶剑英建议华国锋参照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处置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先动手、后开口”模式解决“四人帮”。周恩来当时的做法是：把“四大金刚”调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在会议上突然宣布他们的罪行，把他们当场逮捕，关押起来，然后再召开政治局会议做出决定。

华国锋对叶剑英说：“叶帅，你讲的那些我都赞成。不过，党内还有那么多老同志，不知道他们的意见怎么样？”

叶剑英说：“你应该多到老同志那里去走走，多找他们谈一谈，沟通思想，统一认识。”

华国锋有点为难地说：“叶帅，我这个人在老同志面前，论党龄，我是晚辈。论年龄，我也是晚辈。我去找他们，他们不理怎么办？”

叶剑英明确地说：“我支持你。你去找他们，我先帮你打招呼。只要你能站出来斗争，老同志们不会不支持。”

听到这话，华国锋“噌”地一下从沙发里站了起来，说：“只要你支持我，老同志支持我，我就干！”

当晚，叶剑英回到西山，立即打电话把粟裕、宋时轮两位将军叫到住处，高兴地对他们说：“今天我说服了华国锋。先给你们吹吹风，打

个招呼。”他用手指着粟裕说：“华可能找你，你做好准备，好好同他谈谈。”

粟裕说：“我们担架、草鞋都准备好了。”

原总政副主任刘志坚此时已解放，还没有分配具体的工作。他多次去见叶剑英，建议“先下手为强”。

总政副主任梁必业也是建议党中央采取“紧急情况”的支持者。

同时，叶剑英还与空、海军领导人张廷发、吴富善、肖劲光、苏振华以及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的傅崇碧、吴忠、吴烈等领导人保持密切联系，要部队加强战备。

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给叶剑英办公室打电话，只有一个要求：“速见叶帅！”叶剑英称肖劲光为“急先锋”，在小翔凤驻地与他见面。肖劲光一进门便说：“叶副主席，事不宜迟，再不动手，他们就要动手了！”

身为军委办公会议成员的张春桥分管海军，但海军司令员肖劲光根本不卖张春桥的账，两三个月也不向他汇报。有一次张春桥开会批评海军，批了一上午，肖劲光一声不吭，叶剑英也不发表意见。到了中午散会，肖劲光径直走到叶剑英面前，只跟他告别，好像其他人根本不存在，这让一旁的张春桥很是尴尬。

9月底的一天，叶剑英办公室主任王守江来医院看望张廷发，传达叶剑英的话：“病要治，部队也要管。”张廷发当天就出院，到作战值班室坐镇，加强对飞行训练的具体领导。

9月22日上午10时，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政治局会议，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参加，由时任北京305医院的院长李志绥代表毛泽东的医疗组，向政治局汇报毛泽东的治疗过程和死亡原因。由于报告中涉及很多的医学名词，很多的政治局委员不明白，便不断打断报告进行仔细询问。

当汇报到6月下旬毛泽东病危时，许世友突然站起来问：“主席身体上为什么有青黑斑？这是什么原因？”

医疗组人员解释说：“主席病危末期，呼吸困难，全身严重缺氧，所以才有这些现象。”

许世友听完后，满脸不相信的问道：“我打了几十年的仗了，见的

死人比活人还多，没有见过这个样子的。9月9日下午我去见主席遗体，看到这些青黑斑，我就问过主席生前有多少伽玛，现在又有多少。人都有24个伽玛，主席有多少，你们完全回答不出。”许世友接着又讲：“主席是被毒药毒死的，毒死的才有青黑斑，要审医生护士，是谁下的毒。”

在场的人全都一愣，你看我，我看你，没想到许世友竟说出这样一句话，这分明是怀疑毛泽东是被人害死的，医疗组的人都吓了一跳，这样的罪名是任何一个人都承担不起的。汇报的人员又结结巴巴的解释了一通。

许世友又说道：“肯定是上下勾结，串通一气，用毒药暗害？这非彻底查清楚不可。”

一下子全场都静下来。许世友在屋子中间双手插腰，边说话边转过头看着江青等人。

江青仍然穿着一套黑色套服，坐在沙发上两眼直看着许世友，一脸迷惑的样子。

华国锋向周围看了看，紧张地挺起了身子。叶剑英和旁边的李德生回过头来低声问医疗组的成员：“毛主席遗体上的青黑斑是怎么回事？”医疗组的成员小声的解释了几句。

这时，只见江青站起来说：“许世友同志，主席的医疗组辛苦了几个月了，你让他们把报告说完。”

王洪文也站起来说：“主席病危起，国锋、春桥、东兴和我就一直轮流值班……”

许世友将上衣的两个袖子捋到肘上，走到桌前，右掌猛地一拍茶桌，将茶杯都震翻到地毯上，大声吼道：“政治局会议不许政治局委员发言提问题，你们捣的什么鬼？”

华国锋立即说：“世友同志不要发急，有话慢慢讲。”

他让医疗组的人先回去。

江青气的满脸通红，说不出话来。汪东兴起身把许世友拉了回去，劝了几句。许世友仍然怒气冲冲。局面僵持着，华国锋见没人说话，便同旁边的叶剑英商量了两句，然后宣布会议结束。许世友同华

国锋和叶剑英打了声招呼便径自离开了。

9月23日,王洪文也住进西山紧挨着叶剑英那座宽大的15号庭院旁边的一座25号高楼里。从这里,可以清清楚楚看见叶剑英15号院子里的一举一动,就连进进出出的轿车号牌都可以准确无误地记录下来。

叶剑英知道王洪文的到来后,就搬到玉泉山9号楼去了。

过了一天,王洪文发现叶剑英不见了,一打听,才知道叶剑英又搬到玉泉山了,他跑去问汪东兴:“叶剑英怎么搬到玉泉山了?”

汪东兴告诉他:“9号楼是周总理住过的。他生前交待让剑英同志住那栋房子。”

在玉泉山期间,叶剑英行踪不定,独自往来于西山、玉泉山、军事科学院2号楼、城内后海小翔风之间,行踪莫测,有时候一晚上可以搬三次家,刚安顿好,躺下半小时,突然间一个电话:走,又搬家。又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搬习惯了,身边的东西,都是随手一提就可以走的那种。他利用各种条件和时机继续约一些老干部个别商谈。有时一天之内要交谈多次。与倪志福的交流就是借垂钓之机进行的。

9月23日,王洪文的秘书肖木派机要员给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之一的王知常送去一封信,信中写的主要内容是张春桥9月18日晚同肖木谈话的内容。根据当时的笔记和回忆,大意如下:

朱、王、王、陈、顾、章:

九月十八日晚,春桥同志找我谈了一次话,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我对春桥同志说:毛主席逝世后,处处都感到毛主席不在了,有一种失落感。春桥同志说:毛主席处处不在又处处在,毛主席虽然逝世了,但是他老人家的路线、制度、政策都留下来了。春桥同志又说:毛主席的身体是被邓小平搞坏的。邓小平欺骗主席,大搞翻案,被主席察觉,只好带病领导和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硬是把身体累垮了。光凭这一点,邓小平的罪也就够重的了。

二,我劝春桥同志要为人民多保重自己的身体。春桥同志说:毛主席逝世,我心中难受得受不了,胸中时常感到气闷,守灵时用手摸了

一下胸口，啊呀！谁知被电视台的记者拍摄进镜头里了，引起好多人的不安。第二天，我看春桥同志在院子里散步了。

三，我对春桥同志表示担心目前的形势，特别是军队不在这边。春桥同志说：现在的形势不能同马克思逝世时比，也比列宁逝世时的形势好得多，当年托洛茨基是红军总司令，威信比斯大林高得多。邓小平虽被打倒了，但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在于谁挂帅。目前资产阶级的力量还没有集结起来，缺少挂帅的人物。

四，我问春桥同志：中央今后会出现怎样的局面？春桥说：主席不在了，看来今后中央只可能是靠集体领导了。如果今后要出修正主义，还是在上层，在中央，在党内的资产阶级。要吸取苏联的教训，警惕修正主义上台。苏联现在变修了，将来还是会出列宁的。中国即使修正主义上台，将来也还会出列宁。

五，我讲到主席逝世后，外地有些坏人关门饮酒，引起群众气愤，上门惩罚。春桥同志说：我倒担心这方面搞得太过分了，当然群众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人民是好的。有这样好的八亿人民，一定会涌现出自己的领袖。目前最困难的就是现在这一段时期，只要把这一段时期度过去就好了。现在要出邓小平这样一个人是不可能的，人民一定会起来反对的。

六，我对春桥同志说：广大群众普遍希望能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五、六卷。春桥同志说：毛选五卷的书稿已被胡乔木搞得面目全非，目前要出有困难。还是考虑出单篇，一篇一篇出的好。国庆前争取选出毛主席论接班人五条标准的。

七，春桥同志对我说：主席逝世时，苏修也发来唁电。这样大的事外交部也不请示报告，竟然收下了，最后是我从外电消息中发现了这一情况，才让他们把苏修的唁电退了回去。

八，我谈到现在人们普遍对形势感到担心。春桥同志说：要树立信心，今后还是要强调批邓，要讲团结，这是大方向。你转告上海的同志们，要振奋精神，努力工作，准备斗争。

此信阅后即毁，不然，小人苦哉，大人苦哉！

萧木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夜

信中提到的朱、王、王、陈、顾、章即：朱永嘉、王知常、王绍玺、陈冀德、顾澄海、章树焜。这 6 个人都看了此信。徐景贤也看了，是朱永嘉给他送去的。章树焜是最后一个看的，他看后王知常就将此信烧毁了。

章树焜在看信时将原文抄录在笔记本上。上边的文字就是根据章树焜笔记本上的抄页恢复的。

肖木后来解释他最后的那两句话“小人苦哉”，是因为张春桥并没有让他转达这些话，他怕张春桥知道后责怪，所以他要朱永嘉看后即销毁；“大人苦哉”，是担心如果自己对张春桥的这些话回忆或理解有误，会给张春桥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9月23日下午15时30分，江青通过刘秘书的联系，把张玉凤接到钓鱼台11号楼的会客室。等了30分钟，江青把张玉凤引到办公室坐下。

张玉凤问江青：“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后，我们党的主席怎么办？”

江青说：“党的主席未定。中央在开会，许多事情要讨论，斗争很激烈。你要清醒些，知道吗？”

张玉凤说：“知道。”

江青说：“党的主席中央要讨论，要党的全会决定。”

张玉凤说：“我想是你的。”

江青说：“阶级斗争很复杂啊！”

“怎么个复杂法？”张玉凤问。

江青说：“同修正主义斗，同走资派斗，要注意斗争策略。”

在这之后，江青又把毛泽东长征时的警卫员、江西省军区司令员陈昌奉接到钓鱼台11号楼，嘱咐他说：

“你是老红军，主席的警卫员，跟毛主席，拥护主席的。主席逝世后，你跟谁？拥护谁？”

不等陈昌奉回答，江青接着就说：“要跟我，拥护我！”

陈昌奉说：“拥护你！”

江青很高兴：“是嘛！我在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是正确的，你是知道的。”

陈昌奉又问江青：“我该怎么拥护你呀？”

江青说：“你要做工作，做宣传。你有部队干部，有老战友，都可以向他们做工作，但不要在大会上讲拥护我。”

9月24日，原康生办公室秘书、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拿着姚文元写给他的一封信，找到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

原来，9月15日，在中央一次会议上，姚文元问负责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李鑫：“毛选五卷中多少篇是毛主席的手稿，有多少是整理稿？”

过了一个星期，姚文元又写信给李鑫，要李鑫将毛选五卷的文稿送给他。于是，9月24日，李鑫带着姚文元的信找到汪东兴。经过商量，9月25日，李鑫又把姚文元写给他的信，送给华国锋，建议党中央直接抓《毛泽东选集》五卷的出版工作，并要求面见华国锋。

9月26日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和吴德谈话，说了他打算解决“四人帮”的决心。李先念马上表示支持，吴德也表示同意。

吴德说：“解决的办法，无非是两种，一是抓起来再说，二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投票的办法解除他们担任的职务。”

吴德开始偏重主张用开会的办法来解决，说：“我们会有多数同志的支持，反正他们最多只有四张半的票。在政治局投票，我们是绝对多数，过去他们假借毛主席的名义压我们，现在他们没有这个条件了。”

他说的那个“半票”是指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她当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没有表决权。

开会又分两种方式：一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投票决定；二是召开中央全会投票决定。

李先念问吴德：“你知道赫鲁晓夫是怎么上台的吗？”

吴德说：“当然知道。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是少数，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是多数。赫鲁晓夫借助朱可夫的支持，用军用飞机把中央委员从各地接来开中央全会，在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的人占了多数，莫洛托夫、马林科夫遭到失败，被打成反党集团。”

吴德和华国锋明白了李先念的意思，他们分析了当时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都认为：在政治局开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员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没有把握，风险太大。因此，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

他们还分析了全国形势，认为“四人帮”在群众中是孤立的，在军队里是没有力量的。

那么，什么时候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呢？李先念和吴德都同意华国锋提出的“早比晚好，愈早愈好”的提议。考虑到毛泽东主席的治丧活动刚刚结束，全国人民的悲痛情绪还未调整过来，3人初步议定：国庆节后，准备10天，然后再动手。他们的讨论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5时才结束。华国锋再次委托李先念将他们3人的密商结果通报叶剑英，叶剑英获悉后，表示完全同意。

第七部上卷 各地文革章回索引

北京：

第 1378 回；第 1379 回；第 1382 回；第 1385 回；第 1387 回；
第 1388 回；第 1389 回；第 1390 回；第 1392 回；第 1393 回；
第 1395 回；第 1402 回；第 1405 回；第 1407 回；

反击右倾翻案风：

第 1370 回；第 1371 回；第 1372 回；第 1373 回；第 1374 回；
第 1375 回；第 1376 回；第 1378 回；第 1379 回；第 1380 回；
第 1381 回；第 1382 回；第 1383 回；第 1384 回；第 1385 回；
第 1391 回；第 1392 回；

清华大学：

第 1370 回；第 1371 回；第 1372 回；第 1375 回；第 1385 回；

空军：

第 1370 回；第 1407 回；

邓小平：

第 1370 回；第 1371 回；第 1372 回；第 1373 回；第 1374 回；
第 1375 回；第 1376 回；第 1379 回；第 1391 回；第 1392 回；
第 1397 回；

文艺：

第 1370 回；第 1371 回；第 1372 回；第 1376 回；

中美关系：

第 1371 回；第 1376 回；第 1377 回；

四人帮：

第 1371 回；第 1374 回；第 1376 回；第 1377 回；第 1384 回；

第 1387 回;第 1394 回;第 1396 回;第 1400 回;第 1401 回;
第 1402 回;第 1404 回;第 1405 回;第 1406 回;第 1407 回;
第 1408 回;

农口:

第 1370 回;

教育革命:

第 1371 回;第 1373 回;第 1378 回;

国防科委:

第 1373 回;第 1375 回;第 1379 回;第 1393 回;

中央军委:

第 1382 回;第 1393 回;第 1407 回;第 1408 回;

外事口:

第 1376 回;第 1396 回;第 1403 回;

老干部:

第 1376 回;

上山下乡:

第 1382 回;第 1395 回;

工交、铁路:

第 1384 回;

北京大学:

第 1385 回;

海军:

第 1407 回;

上海:

第 1374 回;第 1382 回;第 1384 回;第 1385 回;第 1393 回;
第 1396 回;第 1407 回;第 1408 回;

天津:

第 1400 回;第 1401 回;

华北地区：

河北：

第 1381 回(保定);第 1393 回(保定);第 1397 回(保定);
第 1398 回(唐山);第 1399 回(唐山);

山西：

第 1400 回;第 1401 回;

东北地区：

吉林：

第 1393 回;

黑龙江：

第 1404 回;

西北地区：

甘肃：

第 1380 回;

西南地区：

四川：

第 1371 回;第 1376 回;第 1381 回;第 1382 回(重庆);第 1385 回;
第 1399 回(重庆);

贵州：

第 1384 回;

云南：

第 1381 回;第 1395 回;第 1396 回;

中南地区：

河南：

第 1380 回；第 1386 回；第 1392 回；第 1397 回；第 1398 回；

湖北：

第 1383 回；第 1384 回；第 1385 回；第 1392 回；第 1404 回；

湖南：

第 1397 回；

广东：

第 1385 回；

华东地区：

江苏：

第 1384 回；第 1385 回；第 1387 回；第 1388 回；第 1407 回；

浙江：

第 1370 回；第 1381 回；第 1384 回；第 1385 回；第 1395 回；

江西：

第 1381 回；

福建：

第 1381 回；第 1384 回；第 1398 回；

文革史话

之

第七部

大幕落下

下卷

刘朝驹 著

中国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文革史话之第七部大幕落下 / 刘朝驹著. -- 香港:中国文化出版社,2021.9

ISBN 978 - 988 - 15988 - 6 - 8

I. ①文… II. ①刘… III. ①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27

书 名	文革史话之第七部大幕落下
作 者	刘朝驹
出 版	中国文化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化出版社 发行部(00852 - 21962638)
总社地址	香港九龙弥敦道 208 - 212 号四海大厦
经 销	香港九龙书店
总 编 审	中国文化出版社国内编审处
出版策划	宋艳丽
印 刷	北京云迪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32
印 张	10
字 数	308 千字
版 次	2021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988 - 15988 - 6 - 8
定 价	60.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zgwh.cn/>

目 录

◇上 卷◇

第 1370 回:国庆节,毛泽东由衷感叹 告迟群,农村过渡争议大	313
第 1371 回:刘冰信,毛泽东颇不满意 未曾说,科技就是生产力	322
第 1372 回:毛远新,开会帮助邓小平 清华园,楼内贴满大字报	329
第 1373 回:八人会,继续批评邓小平 急召回,张爱萍就不认错	335
第 1374 回:王洪文,十五日回到北京 刘冰等,参加政治局会议	343
第 1375 回:清华园,召开万人批判会 “打招呼”,卫星升天再收回	349
第 1376 回:见福特,张爱萍住进医院 康生逝,毛泽东坚持斗争	359
第 1377 回:七五年,国民经济大发展 噩耗至,周恩来总理逝世	367

第 1378 回:举国悲,周恩来遗体告别 北京城,十里长街送总理	374
第 1379 回:追悼会,毛泽东没有出席 选总理,毛泽东反复权衡	383
第 1380 回:二月二,中央下一号文件 召豫、甘,谈两地铁路问题	390
第 1381 回:春节后,“总理遗言”传全国 “转弯子”,北京开五省会议	398
第 1382 回:再召开,十二省“转弯子”会 找秘书,徐景贤上报材料	407
第 1383 回:先念病,李素文主管财经 江青忙,招十二省区领导	414
第 1384 回:看江城,再掀反击翻案风 追万里,《文汇报》“三五事件”	422
第 1385 回:小学生,抬花圈到天安门 三二五,《文汇报》再遭质疑	429
第 1386 回:看河南,大字报直指刘、纪 接建勋,政治局当面批邓	439
第 1387 回:南京市,悼总理群情激奋 大标语,明确打到张春桥	446
第 1388 回:清明节,雨花台数万之众 天安门,广场上花海诗潮	453
第 1389 回:政治局,忙开会紧急研究 做决定,要连夜撤走花圈	460

第 1390 回：冲会堂，广场上人潮汹涌 调民兵，北京市“四五事件”	466
第 1391 回：邓小平，再次被撤销职务 华国锋，党内第一副主席	475
第 1392 回：汪东兴，安排转移邓小平 为花圈，郑州有人被打死	481
第 1393 回：叶帅府，老干部来往频频 保定乱，陨石雨引发感慨	488
第 1394 回：告康生，章含之写揭发信 说江青、张春桥都是叛徒	496
第 1395 回：“怀疑论”，《北京日报》大讨论 要追查，《总理遗言》的作者	503
第 1396 回：华国锋，毛泽东写三句话 “亲启”信，景贤为春桥“找伴”	511
第 1397 回：湖南乱，保定农民开进城 朱德逝，叶剑英看华国锋	519
第 1398 回：七月七，皮定均飞机失事 七二八，中国唐山大地震	529
第 1399 回：急救灾，华国锋赶赴唐山 重庆市，百余干部奔成都	536
第 1400 回：山西省，书记王谦戴高帽 到天津，江青三下小靳庄	545
第 1401 回：见李敏，毛泽东依依不舍 到大寨，江青连夜回北京	552

第 1402 回:九月九,一代巨星陨东方 保遗体,政治局紧急会议	559
第 1403 回:闻噩耗,神州大地同悲哀 唁电多,五大洲为之震动	566
第 1404 回:齐哀悼,一个时代的结束 政治局,研究追悼会事宜	572
第 1405 回:华国锋,看病去见李先念 张平化,质疑米士奇电话	580
第 1406 回:上西山,李先念见叶剑英 争文稿,说“按既定方针办”	588
第 1407 回:九一八,毛泽东追悼大会 打内战,许世友儿子的信	594
第 1408 回:华国锋,定决心抓“四人帮” 下西山,叶剑英“狡兔三窟”	601
第七部上卷各地文革章回索引	612

第 1409 回：天安门，召开国庆座谈会 通情况，华国锋紧锣密鼓

1976 年 9 月 27 日，江青带着 1 个警卫排，卡车上还装着几匹马，在谢静宜、迟群陪同下，来到清华大学团河农场。江青说，此行是看望教工，参加劳动。

9 月 27 日晚饭后，肖木打电话给张春桥的机要秘书严忠实，说他要回上海，问张春桥有什么要交待的？严忠实当即报告张春桥。张春桥说：“叫肖木来吧。”

大约是晚上 8 点多钟，肖木到钓鱼台 9 号楼张春桥住处的办公室，那天晚上张春桥与肖木谈了许多，谈到毛泽东对他的培养，谈了如何保护毛泽东的遗体，如何修建毛泽东的纪念堂，如何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事情。但谈得最多的还是当时的形势。张春桥认为“资产阶级还有力量”，他们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中国当前很大的一股“危险”力量，必须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对资产阶级使用铁的手腕”。张春桥说：

“多难兴邦。”

“要提高警惕，要提高信心。”

“要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

张春桥还高度赞扬了上海的民兵武装，说这是一支有高度觉悟的工人组织，并要肖木转告上海的骨干分子，要作好准备，要经受考验。他说：

“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对于批判邓小平，张春桥更是念念不忘，语气中表现出对邓小平的仇恨和担心，并一再地强调，现在关键是由谁来担任接班人，如果这个班接不好，中国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邓小平就会重新上台……

一向言语不多的张春桥这天晚上显得很健谈，情绪显得很不稳定。他们一直谈到23时多。

肖木临走时，张春桥对肖木说：“还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再次去找一下马老和景贤同志，请他们再抽空出面找文静谈一谈，尽快地将我们离婚的事情办了。”

张春桥强调：“你告诉马老他们，我没有别的什么要求，财产、孩子全归她，只要能离婚就行。必须要离，而且越快越好。”

9月28日，肖木从北京到上海，一下飞机就直接从机场赶到康平路市委常委学习室。将当时在上海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6名市委常委全都找来，详细传达了张春桥9月27日晚同他的谈话内容。当时，徐景贤在笔记本上作了记录：

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研究，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马克思主义刚出来时，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还没有人知道。后来到了列宁，中国懂得马列的也很少。现在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在世界传播了，比起那时候来懂得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所以要建立信心。当然要看到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

上海的工作，转告上海不要急，不要多出头，许多事让外地去搞，我们要把工作做得扎实一些。上海不搞，别人还会拿出几条来讲你。老实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现在批文件与过去不同了，没有人把关了。现在比列宁去世时好，那时斯大林威信不高，托洛茨基作过红军总司令，威望比斯大林高。

9月28日，江青来到北京昌平县南口镇附近的清华大学试验化工厂，当时称清华大学大兴分校。全厂教职工夹道欢迎江青。

在清华大学大兴分校，江青来到苹果园。在秋天的阳光下，苹果正熟。有人要给江青摘苹果，她说：

“苹果留着吧，留在最盛大的节日时吃吧！”

当人们给她拍照时，江青又说：

“胶卷留着吧，留着照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吧！”

然后，江青又到办公楼听取汇报。她信口而说：

“什么叫生产力呢？我在政治局一次会议讲，生产力中最主要的是劳动力，劳动力都是我们妇女生的，你们在座诸位都是我们女人生的！”

她又说：“西太后你们知道吗？名为太后，实际上是女皇帝。”

她谈起了康熙皇帝：

“康熙皇帝这个人很厉害，六岁登基，身边有个大臣叫鳌拜，不让他掌权。他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就要求选一些少年进宫一起踢球、裁跟斗，这些人都会武术。有一天，鳌拜一人进宫，康熙就指使这些青年把鳌拜抓起来杀了。”

这天，江青在迟群等人陪同下又去了昌平驻军某部。而王洪文在这天到河北保定38军某部，张春桥在这天去了通县驻军某部。

9月28日，张春桥向李鑫要《毛选》五卷材料。

9月28日，毛远新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提出他是留下还是回辽宁的问题。

江青的昌平之行，没有通知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而是由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安排的路线和现场的步哨和警卫，这是不符合正常程序的。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结果没有找到江青。汪东兴给邬吉成打电话，问：

“江青到昌平去你知道不知道？谁布置的警戒线？”

邬吉辰说：“她去昌平我是事后知道的，谁布置的路线警戒我不知道。听说是通过北京市公安局刘传新布置的。”

“你马上派人去昌平，把她找回来，中央要开会。”汪东兴命令道。

9月29日下午，华国锋约李鑫到国务院会议厅个别谈话。在3个多小时的谈话中，华国锋主要是听李鑫讲。

李鑫说建议中央要“采取果断措施。”

华国锋说：“你的意见很好，我要再同几个同志商量一下。”

华国锋接着又说：“我很忙。我没有时间看很多材料。你注意一下报纸舆论动向，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9月29日，江青到清华大学原子能研究所。她说：“我在主席逝世

后的第一次中央会议上，就控诉邓小平，要开出他的党籍。”“我也要向你们年轻人宣誓，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和他们斗，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还长着呢。形势是好的，你们看形势好不好？但是要警惕。”

江青还带了1000元人民币和一把剪刀。她说：“他们要害我，我随时准备着，剪刀是自卫的，钱在必要时可作路费。”

原打算晚上还安排活动，后因中央通知晚上开会江青才提前返城。临走时，她神秘地说：“你们等着特大喜讯，准备学习公报！”

9月29日夜，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会，继续由毛泽东医疗小组的医生报告毛泽东的治疗过程和死亡原因，研究国庆活动安排。除刘伯承久病请假外，15名政治局委员，4名候补委员全部到会，华国锋主持会议。

江青首先发言。她说：“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

江青刚说完，王洪文、张春桥接了上来，要求政治局加强集体领导，要求给江青“安排工作”。

华国锋十分为难，不知该说什么好。

叶剑英为他解了围，他说：“江青同志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本身就是很重要的工作。我不知道洪文同志、春桥同志提议给她安排工作，要安排什么样的工作？江青同志身体不好，坚持做好政治局委员的工作，已是很不容易的了。”

没有人再说什么。接着，毛泽东医疗小组的医生报告了毛泽东的治疗过程。

医生汇报完之后，又讨论了乔冠华在联合国的一个发言。其中有“按既定方针办”的话。

汪东兴说：“现在宣传上要注意，不要多去讲‘按既定方针办’，还是宣传中央两个文件。”

吴桂贤在发言中说，“按既定方针办”是华主席在计划会议上讲的。自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要用生命保卫文化大革命等。

关于国庆活动，由于毛泽东刚逝世等原因，政治局决定：不举行游行、联欢等庆祝活动，只是召集一些工农兵的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开

会；政治局的同志可分头到工厂、农村去看望工人、农民。

接着华国峰宣读了毛远新的来信，大意是：我是作为毛主席的联络员来工作的。毛主席逝世后，我要求回辽宁。当然中央如果有新的指示要我留下来，我服从决定。

李先念说：“还是让他回去吧，有事还可以再来嘛。”

江青马上表示不同意，她说：“毛远新应该留下，必须留下！只有他熟悉毛主席临终前说的话。”

张春桥、姚文元纷纷响应说：“毛远新应该留下。”

江青又说：“毛远新留下，是要处理毛主席后事的。”

华国锋问：“你不是说过，毛主席的后事，你不参加，毛远新也不参加吗？”

江青火了，一口咬定：“我没讲过！”

江青说话，常常出尔反尔。她似乎忘了，她对华国锋说她和毛远新不参加毛泽东后事处理时，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都在场。这时，汪东兴开口说道：“江青同志，你跟国锋同志说那句话时，我也在场，我也听见了！”

汪东兴的话，简直使江青下不了台。于是她歇斯底里的嚷道：“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这样对付我！你们想把我赶走，赶出政治局，我偏不走！我要留下！”

张春桥说：“毛远新同志可以暂时留在北京。他在主席身边工作过。主席晚年的字迹，他熟悉，能够辨认。”

江青接着张春桥的话说道：“让他留下来整理主席的晚年文稿。”

叶剑英说：“我同意国锋同志意见，毛远新同志是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理应回辽宁工作。”

华国锋考虑叶剑英、李先念年岁大了，会议已经开了好几个小时了，就劝他们先回去休息。叶剑英、李先念二人先走了。

会议继续开，江青坚持让华国锋表态把毛远新留在中央工作。华国锋、汪东兴等干脆不讲话了，任由她说。等到江青吵累了，说话声音小了一些时，华国锋问她接着做什么？

张春桥提出政治局委员有的戴黑纱，有的不戴，这样不统一，群众

看了会有意见。

江青说：“黑纱统统拿掉，毛主席逝世不再戴黑纱了，我带头，我第一个把它拿下来。”她说完就把自己臂上的黑纱拿掉了。并让其他人也拿下来，还站起身一个一个把别人的黑纱给摘下来。

后来，张春桥提议国庆节天安门开座谈会，由吴德准备发言。江青还提议要参加象征性劳动，大家没有同意。这时已经很晚了，江青又讲了很长一篇话，大意是：大家要团结，要同心协力，如果谁破坏团结，就让他从这里站出去。

她还没有讲完，许世友就站起来责问她：“你为什么要我们从这里站出去？”

江青解释说：“我并没有说你嘛。”

俩人又因此吵了起来。大家劝说住后，江青继续说：“‘十一’后召开十届三中全会，会上要做中央政治局报告，报告起草由张春桥负责，毛远新留下来帮助起草。会议要通过决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中央人事要有所变动，我提议由华国锋负责这项工作。”

此言一出，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们都很吃惊，要召开十届三中全会如此重大的事，作为政治局委员的他们竟从未听说！

江青还在没完没了的说。她又提出，她要和华国锋谈些“家务事”，别人不愿意听的可以不听，“没有事的都走”。

时间已经很晚了，姚文元看到大部分人都很疲劳了，就说：“你们先走吧，让她一个人去讲吧。”

于是，人们站起来都走了，只剩下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和华国锋、汪东兴。汪东兴坚持留了下来，始终坐在华国锋旁边。江青一直喋喋不休说到第二天早晨5时。

会后，江青又向汪东兴索要毛泽东的文件。汪东兴下来后问叶剑英怎么办？叶剑英回答说：“毛主席在世，你保卫他的安全，现在老人家逝世了，他的文件档案你也要保管好，像保卫毛主席安全那样，有什么问题华总理和我给你撑腰。”

此时，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3人的沟通更加频繁。为了避免引起注意，他们从不开会，总是个别交谈，叶剑英对这一条把得很紧，他

对汪东兴说：“我们不能开会。”

汪东兴曾向叶剑英提出：“你年纪大了，还是由我来跑吧。”

叶剑英说：“你也不能到我那里去，因为目标太大。还是我到你这里来，你这个地方好，房子不显眼。”

叶剑英说的汪东兴的“那个地方”就是中南海南船坞汪东兴住的地方。

这天，叶剑英又赶到汪东兴那里谈了一个多小时。谈话期间，突然传来消息，说江青要过来找汪东兴，叶剑英赶紧起身离开。叶剑英后来嘱咐马锡金：“以后到汪东兴那里，进、出不能走同一个门。”从这一次起，叶剑英再去汪东兴家，如果是从西门进的，出去时就走东门。

有一次从汪东兴那里出来后，叶剑英问马锡金：“汪东兴的警卫怎么样？你打电话告诉汪，说，我对他的安全不放心！”马锡金将原话转告给汪东兴。汪东兴说：“是啊，有人要暗害我。”

叶剑英去史家胡同的华国锋家，也都是从运煤的后门进去的。有时在中南海或人民大会堂开完会，叶剑英让司机拉着他在附近转了几圈，再拐到华国锋家。

9月30日，暮霭浓重，天安门华灯初放。19时整，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核心人物，依照极为严格的顺序，鱼贯步入天安门城楼上的大厅，“工农兵学商”各界代表纷纷起立致意。领头的是当时中国的一号人物华国锋，留着平头，壮实的身躯，一身中山装。紧跟在华国锋之后，便是当时中国的二号人物，41岁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留着小分头，在这支高层领导人的队伍里显得格外年轻。在人们的心目中，他的接班人的地位，也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1976年那三次举世瞩目的追悼大会，充分显示了他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1月15日，首都举行追悼周恩来大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致悼词。

7月11日，首都举行追悼朱德大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由中共中央第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致悼词。

9月18日，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群众追悼毛泽东大会，站在天安门城楼中央主持大会的依然是王洪文，致悼词的还是华国锋。

此刻,当他步入天安门城楼大厅时,不知因踌躇满志,还是年轻心急,竟快步疾行,走到步履稳缓的华国锋旁边,并排而行,眼看着要超前一步。突然,王洪文意识到在这种气氛严肃、讲究顺序的场合超前一步会招惹一场风波,他赶紧减缓步频,缩短步幅,跟华国锋拉开了一段距离,保持着“第二号”的位置。

在王洪文之后,是一位身穿军装、戴一副眼镜的长者——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叶剑英。

叶剑英对参加这次会议的安全问题十分担心。他几次向汪东兴了解当晚会议警卫工作情况,当明确城楼上的警卫是由汪东兴亲自掌握的中央警卫团的部队担任时,才最后决定参加会议。

在叶剑英之后,那长长的队伍依次为: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吴德、陈永贵、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

在毛泽东的巨幅画像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宣布开会。

按照事先审定的稿子、事先排好的发言顺序,“工农兵学商”代表一个个念着稿子。没有掌声,没有笑声,没有口号声,每一个与会者都端端正正地坐着,脸上毫无表情。

黄帅作为学生代表念完发言稿之后,吴德站了起来,对着话筒说道:“请中央领导同志发言。”

没容中央的其他人表示,华国锋就急着站起来走到麦克风前,说道:

“同志们,今天,在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七周年的前夕,我们参加首都工农兵学商代表举行的座谈会。我们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七周年的时候,我们更加怀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在历年来中国首脑发表的国庆讲话中，华国锋这次的讲话可以说是最简短，几乎磨平了所有的棱角。

吴德意识到华国锋这样做是要快点结束会议。所以当华国锋一讲完，吴德就起来宣布散会，避免在这样的会议上发生什么问题。

王洪文坐上红旗牌轿车，突然，他对身边的秘书说：“明天，把摄影师喊来，给我拍几张标准照！”

秘书茫然，但又不好问“为什么”，只得点头道：“好。”

会后，华国锋、李先念、吴德等人到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电影放映时，华国锋上厕所，李先念也跟出来，问华国锋有什么事情吗？

华国锋说：“看完电影，你和吴德留下，有事商量。”

电影放映结束后，他们3人就到小礼堂旁边的武成殿小会议室再次商谈。华国锋通报了与叶剑英、汪东兴商定的解决办法，3人讨论了解决“四人帮”的时间和可能发生的问题。

第1410回：约吴忠，叶剑英“以快打慢” 订计划，王、江继续下基层

10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新华社关于这次座谈会的报道，突出宣传要遵照“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0月1日，江青又到清华大学发表讲话。她说：

“我们主席非常英明，说文化大革命七分成绩，三分缺点。三七开你们是不是都同意？文化大革命揪出了刘少奇、林彪，其实是他们自己跳出来的。邓小平也是自己跳出来的，4月4号他还参加了政治局会议。今年2月，他说洪文同志回来了，我就不干了，主席还是让他工作。天安门事件给他做了总结。主席是宽大为怀的。主席让我们选王明当中央委员，我们都愿选他，主席做了很多工作，说当反面教员也要选。主席体格是非常好的，但刘少奇、林彪，特别是邓小平迫害主席。我在主席逝世后的第一次中央会上，就控诉了邓小平，要开除他的党籍，没有开除，要以观后效，还会有人为他翻案。”

江青还说：“主席非常英明，说文化大革命三七开，我是不属于有怨气的，是属于执行主席路线的，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嘛。”

我对三分不足，要有所认识，我这里只讲缺点，成绩让人家去讲，我这种态度，是否较好一点。

三分缺点你们也不清楚，不是毛主席的，也不是中央文革的。中央文革有坏人，自己端出来了。‘怀疑一切’是陶铸的。他的一篇文章和一个文件，送给主席，我们签了名，不同意，签名的也有坏人。他说要层层烧透，高举红旗的人也要烧透，说是主席以下都可以怀疑，实质上是可以怀疑主席。

作为我是亲自参加领导文化革命的，更要注意总结经验，尽管不是我们干的，也要作为经验，你们也要好好总结。”

10月2日，外交部部长乔冠华将《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送审稿报到华国锋那里审批。华国锋看到其中有：“中国人民将坚决遵循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把支援世界各国人民反对两霸的斗争作为光荣的国际主义义务”这一句时，在“按既定方针办”的黑体字下面画了一个大问号。遂后他又发觉，这一发言稿中多处写着“按既定方针办”，就把这些话统统删去。然后在送审稿的天头上，写了这么一段批示：

剑英、洪文、春桥同志：

此件我已阅过，主要观点是准确的，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建议将此事在政治局作一说明。

叶剑英和王洪文看了之后，都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一个圈，写上“同意”两字。

张春桥也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写上“同意”两字，却加了这么一段话：“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这天，王洪文忙于拍摄标准像，总共拍了114张照片，其中穿便服、中山装的53张，穿军装的16张，办公照片21张，室外单人像24张。

拍完后，王洪文叮嘱摄影师：“今天就给我把照片送来！”

“这么急？”摄影师满脸惊讶。

“只争朝夕！”王洪文用毛泽东的诗句答复摄影师。说毕，狡诈地笑了一下，补充说道：“先是各印一张八寸的送来，我挑选一下。选中的，要仔细修版，要大量地冲印！”

“大量冲印？”摄影师又感到困惑。

“你去冲洗吧！”王洪文挥挥手，不作任何解释，把摄影师打发走了。

这位摄影师，还是杜修贤。

当摄影师杜修贤忙于冲印照片的时候，王洪文给上海廖祖康挂长

途电话,用上海话说道:“小廖吗?侬勿要‘热昏’!”

前些天,廖祖康请假回上海结婚,婚礼定在10月7日。

9月底,叶剑英听说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到昌平坦克6师蹲点,还把那里的一个团参谋长给换了,立刻引起警觉,特地交代苏振华,利用国庆节的假日,约卫戍区司令吴忠到密云水库去“玩玩”。

苏振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任兵团政委时,吴忠任旅长,他们是老上下级关系。吴忠到北京任卫戍区副司令时,苏振华正靠边站。吴忠到不避讳,依然登门看望老领导。

10月2日,苏振华看望了华国锋,又找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谈话。他对吴忠说:“目前情况复杂,请务必掌握好部队,保持部队稳定,不受干扰,除了叶帅的命令,任何人都不能调动部队,特别是不准任何人调部队进京,保证部队绝对听从党中央的号令,千万不能出任何问题!而且要求绝对保密。”

苏振华特别对吴忠说:“叶帅对在坦克6师驻昌平的那个坦克团不放心。张春桥有个在军报工作的弟弟在这个团蹲点,把团的领导干部都换了。万一有人被煽动、蛊惑,把坦克开进北京城怎么办?”

苏振华所说的“把团的领导干部都换了”,其实就是这个团的参谋长人事调整,与张春桥等人无关。

吴忠回答说:“这个部队大门口就是警卫师的坦克团。卫戍区的坦克比他们只多不少,加上反坦克火炮,足以保证首都的绝对安全。”

下午15时许,叶剑英到中南海南楼汪东兴的办公室,再次与他商谈。两人分析了这几天的情况,一致感到形势逼人。原来设想的国庆节后10天动手,看来太晚了。叶剑英说:“该摊牌了,我们要立即找华国锋同志谈,要加速采取果断措施。兵贵神速,不能失掉时机,必须以快打慢,乘人之不及。”

在商量如何具体解决“四人帮”问题时,汪东兴提出,动用8341部队解决问题。叶剑英向汪东兴详细询问了8341部队的情况,完全赞同。他要汪东兴先拟订一个具体行动方案,再同华国锋一起商定。

两人一直谈到吃晚饭的时间。汪东兴留叶剑英共进晚餐,叶剑英欣然答应。由于谈得高兴,吃饭时两人一边吃狗肉,还一边喝了几杯

茅台酒。

晚饭后，叶剑英驱车到了东交民巷华国锋的住所，向华国锋谈了他同汪东兴商定的意见，华国锋表示完全赞同。两人决定等汪东兴提出具体行动方案后，再一起议定。

汪东兴送走叶剑英后，通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和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武健华来开会。汪东兴直接对他俩说：“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对‘四人帮’要采取行动。”汪东兴要张耀祠和武健华两人先琢磨出一个行动方案。然后他于21时，来到华国锋在东交民巷的住地，相互沟通了与叶剑英的谈话内容。华国锋对他说：“我和叶帅商议，由你先拿出一个执行办法来，我们再议定。”

汪东兴答应第二天即可拿出方案，到时再向华国锋汇报。

这天，华国锋来到同住东交民巷的吴德住处。他让吴德再想想：“把他们抓起来后，全国党政军民会有什么反应，应采取什么对策？北京市委如何配合中央的这次行动？”

华国锋又问：“他们在北京市还有什么人？”

吴德说：“有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也该隔离。”

华国锋同意。他又说：“首都不能乱，首都一乱，全国就有可能发生大问题。稳定首都的问题，由你负全责。”

当天，吴德分别向北京市委书记倪志福、丁国钰打了招呼，明确告诉他们，中央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对他们隔离审查。

当晚，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耿彪突然接到华国锋打来的电话，要他过去商量事情。当耿彪来到华国锋处，看见在座的还有外交部两位副部长韩念龙和刘振华。

华国锋说：“乔冠华外长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上，提到了‘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我昨天见到这个送审稿时，在稿子上批了几句话。我说发言稿中引用毛主席的话，经我查对，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但是，乔冠华已去联合国，他带去的稿子上并未删去那句话，你们有什么办法？”

研究的结果，由韩念龙、刘振华回外交部去打电话，通知乔冠华在

发言中删去这句话。

韩念龙、刘振华两位走后，耿彪问：“从字面上看，‘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差别并不大，为什么要去掉这句话。”

华国锋说：“毛主席没有什么‘临终嘱咐’，不应该这么说。4月30日晚上，毛主席会见外宾，等外宾走后，我向他汇报了各省的情况。当时毛主席讲话时发音已不太清楚，他怕我听不清，就用铅笔写了几张字条给我看，其中有一张写的是‘照过去方针办’。这根本不是什么临终时的嘱咐，而是针对我汇报的具体问题，对我个人的指示。现在他们把六个字改了三个，把对我讲的变成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这样做，就可以把许多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情，都说成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了。”

临走时，华国锋对耿彪说：“近日有事要找，你在家里等着。”

再说汪东兴从华国锋那里回到中南海后，立即与张耀祠、武健华一起商讨了抓捕“四人帮”的具体实施方案，对解决“四人帮”的顺序、处置待遇、行动时间、隔离地点、保密措施、分工配合等都做了细致的安排。他们一直研究到3日凌晨4时。

为此，汪东兴还成立了两个小班子：一个准备有关文件，包括“四人帮”历史和现行的罪证，由李鑫负责；另一个负责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人员由汪东兴亲自从中办和中央警卫团挑选并个别谈话。

2日深夜，李鑫突然接到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建华的电话：“东兴同志要你马上来一下。他现在就站在电话机旁边。”

临走时，李鑫对妻子樊宁说：“我走了。我这是去做件杀头的事！”

妻子樊宁是李鑫地下党的战友和同学，面对可能发生的严酷命运，两人都很平静，没有握手，没有拥抱。樊宁只是镇定地说：“你去吧！你杀头，我最多是当个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吧！要牵连也只有我和孩子……”

“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李鑫登上接他的汽车，来到中南海汪东兴的家里。

汪东兴对李鑫说：“党中央决定，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要我们尽快做好准备工作，你能不能参加一些工作？”

“我听从中央的安排！”李鑫回答。

李鑫建议说：“在抓‘四人帮’的同时，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这样有利于稳定形势。”“现在张春桥、姚文元想抓《毛选》，要《毛选》五卷材料要得很急。因此，用中央常委讨论《毛选》五卷的名义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调他们来开会，他们一定会来。过去中央讨论《毛选》工作的会议，都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他们肯定不会怀疑，一定会上钩的。”“另外，研究建造毛主席纪念堂的问题，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必须参加的，张春桥和王洪文无法推脱；再就是是在怀仁堂采取行动较为方便。”

李鑫建议中央要起草三个文件：

- 一、隔离审查‘四人帮’的决定；
- 二、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五卷的决定；
- 三、关于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

这个建议，在汪东兴报告华国锋同意后，即由李鑫从10月3日到6日起草出来。

汪东兴将李鑫领进另外一间小屋，向他交待说：“你就住在这里，帮助中央起草文件。我派人给你送水送饭。我从外面把门反锁起来……”

10月3日，武建华、张耀祠、李鑫拟好了行动方案。在这个方案中，解决“四人帮”的顺序为：在怀仁堂解决王洪文和张春桥，然后依次处置江青和姚文元。

10月3日，汪东兴到华国锋住地向他详细汇报了他和张耀祠、武建华商量的具体行动部署和行动方案。华国锋听后，觉得这个方案是“可行的”，但建议把时间“再缩短一些，争取提前解决。”

汪东兴也赞成提前行动，以提防江青这几个人“铤而走险先动手的可能。”

华国锋让汪东兴再向叶剑英汇报，看看叶剑英还有什么新的意见。

10月3日，王洪文根据9月29日政治局会议的精神：“政治局的同志可分头到工厂、农村去看望工人、农民”，来到北京东郊的平谷县。

王洪文在平谷县，用毛泽东的话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他接着捏紧了拳头，大声地说：“打倒！”

王洪文接着说：“别人搞修正主义，我要打倒他；我搞修正主义，你们也来造反。”“最好是不出修正主义，但这只是个人愿望，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他扳着手指头说：“建国以来，中国就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不出是不可能的。”“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不只是邓小平搞修正主义，出是可能的，不出是奇怪的。”“我们要和贫下中农划等号，你们也要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划等号，你们要在农村多呆一段时间，要把眼睛睁的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包括我。我这个人又听人家的，又不听人家的。”

10月3日，江青在二七车辆厂找老工人开座谈会。吴德陪同。

第1411回：看梁效，《光明日报》发文章 卫戍区，部队调动归吴德

10月3日下午，姚文元把《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找到他家，告诉鲁瑛：“现在报纸上大量出现‘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传得不准确，要采取措施，从明天起，在报纸上逐渐减少‘按既定方针办’的提法，你得亲自把关。”并要鲁瑛转告新华社解力夫和《光明日报》莫艾。姚文元还特别强调说：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你得有思想准备。有人要借社论引用主席这句话大做文章，攻击《人民日报》。”

“你不要小看这件事，从最近情况来看，表面上还是比较平静的，但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今后还是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还是要继续同走资派作斗争。现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有些反不起来了，有的可能要翻案。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

吴桂贤在9月29日夜的政治局会上说，“按既定方针办”是华主席在计划会议上讲的。姚文元让鲁瑛派人了解华国锋在计划会议上传达的毛泽东的原话。

按照姚文元的指示，鲁瑛回到报社就直接打电话给卫生部长、谢富治夫人刘湘萍及谷牧等人核对，同时派出崔奇、张沛，调查华国锋在计划会议上传达的毛泽东的原话是怎么讲的……

其实，“按既定方针办”原来是一个错误的记录，最早出自1976年7月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那是7月30日晚上，华国锋、王洪文、江青、吴德、纪登奎、苏振华、倪志福等人接见出席会议者。华国锋讲话时传达了1976年4月30日午后，毛泽东接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给华国锋写下的三句话。他说：

“毛主席最近有重要指示，给大家传达一下。第一句是‘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第二句是‘照过去方针办’，”刚说到此，王洪文插话说：

“第二句后面还有‘你办事，我放心’。”

华国锋说：“对，第三句是‘你办事，我放心’。”

由于王洪文的这一插话，在场几位记录者都没听清华国锋那句“照过去方针办”。因为当时没有用录音机，于是主持整理者就按照大概意思，写成“按既定方针办”。整理稿送审时还说明，这句话好像是这样的。但主审者也没有改动，便批准发出。华国锋看到后马上说：“不对，毛主席说的是‘照过去方针办’，我传达的也是‘照过去方针办’，怎么变成‘按既定方针办’了？”但他也没有当成大事追查和通知更正。但是此时，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越来越重视了。

10月3日，苏振华去叶剑英处汇报，当天又与陈锡联商量，并根据叶剑英的指示，分头找有关单位负责人谈话。

这天，吴德到华国锋家，华国锋提到：“叶帅说北京军区在昌平有个坦克6师，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常去那里活动，叶帅对这个师的情况不放心。”

他问吴德：“如果这个部队违抗中央的决定，支持‘四人帮’，把部队开进北京市区来，北京市有没有力量把它拦住。”

吴德说：“有无把握，我得问一问北京卫戍区。”

华国锋又问：“北京卫戍区靠得住靠不住？”

吴德说：“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对‘批邓’是不满的，对‘四人帮’很反感。我是卫戍区的政委，了解吴忠的思想情况，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上，我相信吴忠是会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和我们一致行动的。”

华国锋让吴德再和吴忠谈谈。吴德从华国锋家里出来，就去找了吴忠，向他谈了中央解决“四人帮”的考虑和决心。

吴忠向吴德保证说：“北京的卫戍部队有能力保卫首都安全，请中央放心。”

他还对吴德说：“在坦克六师旁边，卫戍区就驻有一个坦克团，如有情况，可以起作用。”

但是，北京卫戍区的部队调动，还需要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并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的批准，吴忠将这个情况向吴德说明。

与吴忠谈话后，吴德立即将情况给华国锋作了汇报。华国锋说：“新华社、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飞机场、邮电局等单位要由卫戍

区控制起来。卫戍区的部队就由你负责,你这就去找陈锡联,解决北京卫戍区部队调动的问题。”

华国锋对吴德说:“陈锡联是比较好的同志,他支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吴德又马不停蹄的去找到陈锡联。在陈锡联那里,他看见陈锡联正与杨成武谈事。杨成武走后,吴德向陈锡联说明了华国锋要陈锡联安排卫戍区部队交吴德指挥的问题,陈锡联说他已知道,随即就打电话向吴忠交待:“卫戍区部队一切听从吴德的指挥。”并要吴忠立即到吴德处具体商量。

吴德踏进家门,吴忠已在他家中等候。他们根据 1971 年“913 事件”中稳定首都的经验,商量了具体措施,共同部署了北京市内紧外松的戒严事宜。当时叶剑英担心的事情,一是坦克六师的问题,后来证明,这个师没有问题,不过当时二吴还是通过卫戍区坦克团做了防备工作。另一件是要防备学生从清华、北大等学校冲出来,造成混乱。为此,他们在清华、北大附近都部署了相当的兵力,如果有人往外冲,无论如何要把他们堵回去。在 10 月 6 日的那天晚上,对北京实行暗中戒严,外地进京的所有路口都被监视,防止外地的部队进京。

吴德把与陈锡联、吴忠商谈的情况和部署报告了华国锋。华国锋又亲自与吴忠谈了一次话。

10 月 3 日下午,叶剑英派侄子叶选基到北长街请陈云过来。出门前,陈云把保险箱钥匙交给长子陈元,叮嘱他一旦发生意外,把保险柜里的文件收一收。然后随叶选基来到北京西山叶剑英住地。

到了那里,叶剑英正同邓颖超在一间屋子里谈话。

邓颖超是主动到叶剑英这里的。她向叶剑英表示了对局势、对党的前途的担忧。叶剑英给邓颖超看了毛泽东生前批评“四人帮”的几次讲话记录。他对邓颖超说:“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解决他们的问题,是完成毛主席生前未来得及完成的大事,也是周总理生前的嘱咐。不能让党和国家的领导大权落到他们手里。”

邓颖超希望叶剑英带个头,想办法,解决好这一问题。

邓颖超走后,陈云进去。寒暄后,叶剑英先给他看了一份材料,是谢静宜记录的一次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就是他给邓颖超看的那份毛泽

东批评“四人帮”的讲话。然后问陈云：“怎么办？”

陈云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

两人的共同意见是要解决“四人帮”问题，但如何解决，没有谈。

陈云问叶剑英：“这件事是不是告诉聂帅、徐帅？”

叶剑英说：“我就要去告诉他们。”

康克清也特意从城里来看望叶剑英，向他转达了朱老总临终之时的愿望。

10月3日晚，从不对部下深谈高层政治的汪东兴，突然把邬吉成叫到中南海他的办公室，没头没脑地先说了一句：“他们有野心。”

邬吉成一下没有反应过来，不知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汪东兴开始了细细的解说：“最近一段的报纸连篇累牍地刊登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那是捏造的。”

邬吉成不禁大吃一惊，心想：“捏造毛主席的话，那是多大的罪过。”

汪东兴告诉邬吉成，华国锋在外交部9月30日将由乔冠华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第31届会议上的发言》上的批示和张春桥在这同一份文件上批示。

10月4日，《光明日报》头版发表“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中写道：

“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下去，走到底。这是保证我们的党永不变修，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的战略措施。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

同时还强调：“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

这篇文章见报的当天清晨7时，正在熟睡的华国锋被秘书喊醒，告知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骑自行车赶来，有急事报告。

李鑫紧急求见华国锋，就是把刚刚出版的《光明日报》送给华国锋。

李鑫还告诉华国锋，昨天，江青几个人在钓鱼台吃饭，把他也请去。席间，江青问起毛远新：“从东北调来的部队已经到达哪里？”

华国锋感到了事态的严重。

他立即给叶剑英打电话，说是有关要事商量。

住在玉泉山的叶剑英，也已经接到下边的电话，报告今天《光明日报》上的文章。

其实，《光明日报》的这篇文章就是9月17日《光明日报》向“梁效”约的那篇文章，并没有其他人的任何指示。“梁效”负责人李家宽将任务交给了范达人。当时范达人已准备赴波兰工作，整天在学习英语，所以对《光明日报》的约稿兴趣不大。但是，李家宽既然找到头上，那还是要完成任务的。他将此事告知两位组员何芳川和陈先达。

不久，《光明日报》副总编辑孙关龙应约来到“梁效”驻地，与李家宽和范达人小组的一起讨论文章的主题。他说：“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晚年的一项重要指示，因为1976年9月16日《人民日报》社论将这句话用粗体字刊出。”

9月20日上午9时，《光明日报》领导小组成员汪波清、孙关龙在《光明日报》社对范达人、陈先达、何芳川等人谈了对该文的要求。孙关龙说：“我们理论部几个同志研究了一下，这篇文章不对毛主席这一指示作解释，而要歌颂‘按既定方针办’这六个字的伟大意义。这六个字，字字千金，要歌颂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接着，孙关龙对文章的路子、内容提出了比较详细的提纲，汪波清也作了补充。

在讨论结束前，汪波清把师海云找来，请他念了一遍华国锋在计划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其中传达了毛泽东“按既定方针办”的指示。孙关龙和汪波清还给范达人他们看了新华社内参关于对“按既定方针办”的反应。

初稿完成后，由范达人执笔修改，未作大的改动，只作了一点非实质性的文字润色。这篇文章便于9月24日左右定稿。经李家宽等人同意后送《光明日报》。

9月29日，文章的综合清样交给莫艾，莫艾于当天深夜动手阅处，改动了几处，签了字写了一段话：“我略有改动，请和‘梁效’商量，听听他们的意见，然后见报。”

9月30日上午，孙关龙同范达人在电话中交换各自改动的情况。

9月30日下午，迟群给“梁效”核心组成员李家宽回电话：“我太忙，没时间，那四篇稿子不看了，你们看了，可以发。”这四篇稿子中，就有《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

同日，《光明日报》排出清样，让“梁效”写作组再审一遍。清样复审后立即退了回去。校样上标明了《光明日报》最后定稿的日期是9月30日。

《光明日报》按照原定计划在10月4日头版头条显著位置发表了“梁效”的这篇文章。该文的标题是范达人起的。写作经过也没有江青或迟群、谢静宜授意。

10月4日晚，鲁瑛电话通知光明日报社临时领导小组负责人莫艾来人民日报社。鲁瑛对莫艾说：“关于‘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是主席患病期间谈的，传得不够确切，以后报上不要再用这句话了。”

莫艾说：“《光明日报》今天发表梁效的文章中，大标题就是讲这个的。”

鲁瑛继续说，“你回去把把关，遇到这句话要改掉。新华社发的稿件中，也要注意有没有这句话，有也不要用。这事你一个人知道就行了，不要下传，我现在也是亲自把关。”

莫艾回到报社以后，照鲁瑛的话办了。

10月4日，按已商定的意见，陈锡联带队去唐山视察地震救灾情况。

这天上午，江青带着30来人上北京景山上摘苹果。中午，在北海仿膳用餐。江青一边吃一边向同席者说：

“我一定要对得起毛主席，要加强锻炼。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斗争是长期复杂的……”

第1412回：箭在弦，汪东兴准备就绪 学毛著，江青还在摘苹果

10月4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召开毛泽东医疗组总结会，并会见毛泽东医疗组成员。张春桥提出尽早召开中央委员会，开除邓小平党籍。

散会后，华国锋要吴德到他住处，两人再一次全面检查了解决“四人帮”的准备工作以及哪些环节尚未完善需要补救等等。正谈着，汪东兴打电话来说，江青提出要到石家庄去，指定专列的车头要用二七车辆厂生产的内燃机车头，还要请二七厂的一些工人陪同她去。汪东兴请示华国锋是否同意她去。

华国锋拿着电话，看着吴德说：“江青去石家庄要干什么？她可能是试探，还是稳住她，同意她去。”

吴德点点头。华国锋当即答复汪东兴说：“允许她去，关于调车头及找工人陪同的问题由吴德去安排。”

就在华国锋与吴德商议的同时，叶剑英如约来到中南海南楼汪东兴办公室，汪东兴把抓捕“四人帮”的行动方案向叶剑英详细作了汇报。

汪东兴设想的行动方案是：以在怀仁堂正厅召集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解决。华国锋、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4人是常委，由中央办公厅发文件通知：一是审议《毛选》五卷的清样；二是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排。

姚文元不是常委，就在文件上特定写明请他来做会议的文字工作，把姚文元也从钓鱼台或住地调到怀仁堂。

江青、毛远新本来就住在中南海，迟群、谢静宜等人由卫戍区负责解决。

解决顺序是：先王、张，再江、姚。

毛远新区别对待,就地监护。

听了汪东兴的汇报,叶剑英说:“我看这个计划比较成熟,安排也相当周全了。要特别注意保密。”

下午17时,吴德离开华国锋家,刚进家门,华国锋来电话又要他再去。吴德急忙赶去,见汪东兴也在华国锋家。汪东兴向华国锋、吴德通报了他和叶剑英商量后的行动方案。因为行动方案中涉及到北京卫戍区,所以叫吴德过来安排有关北京卫戍区的工作。

3人最后确定:

一、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已议定的方案,华国锋、叶剑英在中南海怀仁堂,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研究《毛选》第五卷出版问题的名义,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到会,由华国锋宣布他们的罪状,随即由汪东兴组织人分别对其隔离审查。汪东兴派张耀祠到江青住处对她隔离审查。

二、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的隔离审查,由吴德和吴忠负责。

三、中南海内如果出现了意料不到的问题,由吴德组织卫戍区的部队支援。

四、由北京卫戍区把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机关以及由迟群、谢静宜控制的清华、北大等单位,用内紧外松的方式戒备起来。要再检查一遍落实的情况,坚决杜绝一切意外发生。

在最后一次商议中,华国锋说:“就照这个行动方案办,经过5天的准备,如果不出意外,成功是会有把握的。”

10月4日,华国锋给耿彪打来电话,并派车把他接到东交民巷华国锋的住处。他亲自给耿彪倒了杯茶,然后接着10月2日的话题谈了起来。

耿彪说:“据我推测,三五天内他们可能会有行动。”

华国锋问:“你有何依据?”

耿彪说:“他们在上海搞了个功率很大的电台,增加了民兵,增发了武器弹药,那是他们的根据地。还有一种说法,他们计划10月8日在长沙开始搞游行,9日在上海搞游行,假借‘人民群众’的名义提出由王洪文(或江青)为党的主席,张春桥为总理。接着向国外广播,同

时北京也搞游行庆祝。北京有‘两校’还有几个部带头游行，逼着那些他们尚未控制的部门跟着参加。到那时形势就严峻了。”

华国锋说：“中央决定，有一项任务要交给你去完成，是叶帅提名的。”

耿彪一听，出于一个军人的习惯，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回答说：“坚决完成任务！”

10月4日晚上，汪东兴又把负责江青警卫工作的邬吉成和负责王洪文警卫工作的孙凤山叫到他的办公室。汪东兴先简单地询问了一下钓鱼台“那几个人”的活动情况，接着就问：“王洪文有枪吗？他平时是不是随身带着？”

“王洪文有枪，手枪他平时并不带在身上。但有时他出去带着猎枪。”

“唔。”汪东兴没再问。

汪东兴对邬吉成说：“明天，江青要去试乘二七机车车辆厂生产的内燃机牵引车头。二七机车车辆厂革命委员会的人也要参加。你做好准备，并通知有关人员做好组织。”

10月5日凌晨2时，汪东兴到华国锋住地，向他汇报了行动准备情况。

上午9时30分，汪东兴又来到华国锋在中南海的秘密住处，向他汇报了这次行动的人选名单和具体部署。吃罢午饭，稍作休息，他和华国锋便分别乘车驶出中南海，直奔玉泉山九号楼叶剑英家，最后共同研究行动方案，以便取得统一认识……

上海，不知道从哪里吹起一阵风：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的“国庆节”，蒋帮预定要在这一天“反攻大陆”。

尽管海峡风平浪静，可是，上海的民兵已开始集结，加强值班——理由是为了“备战”，为了粉碎来自海峡彼岸的突然袭击。

10月4日，海军政委苏振华给叶剑英元帅打来电话，报告上海民兵的不正常的集结。“注意他们的动向！”叶剑英马上认为，这是上海的民兵在准备动手。

苏振华此时就在上海东海舰队司令部里。国庆节后，他与北京卫

成区司令员吴忠见面后，就奉叶剑英之命，急匆匆飞到了黄浦江畔。

10月5日，叶剑英案头的红色电话机里，又传来苏振华急促的话音：

“上海民兵闯入吴淞口炮台！”

“他们奉谁之命？”叶剑英用广东口音的普通话问道。

“奉王洪文的手令！”苏振华说道，“上海城里的红纸被抢购一空，据说，准备庆祝盛大的节日！”

“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入吴淞口炮台！”叶剑英对着电话话筒，大声地吼道。

“是，坚决执行您的命令！”苏振华非常干脆地答道。

10月5日下午，叶剑英和汪东兴到东交民巷8号院华国锋住地紧急磋商，最后确定行动前的准备工作落实情况。汪东兴谈了他准备好的具体行动方案。从执行人员的挑选，隔离审查的地点、时间，以及每个细节的详细安排。他说：“这件事，要绝对保密，行动要越快越好，时间拖得越久越危险，越容易走露风声。”

3人一致决定6日动手，华国锋随即向李先念通报，征求意见后说：“动手的时间，我告诉了先念同志，他表示完全同意。”

下午15时，正在唐山指挥抗震的陈锡联突然接到华国锋要他立即回京的电话。

15时45分，陈锡联乘飞机抵达京城。他匆匆回到家里，然后直奔离他家不远的华国锋家。华国锋正在等他，告诉他：“四人帮”已经发出了篡党夺权的信号，因此要赶紧动手。华国锋还说：叶帅也来找过他，他已决定明天晚上行动。说着，他做了一个抓的手势。陈锡联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与陈锡联谈完话后，华国锋又在汪东兴的陪同下，亲自来到预备关押“四人帮”的地下工程视察，重点检查了几个隔离点的准备情况。看着一切准备就绪，华国锋说：经过5天的准备，如果不出意外，成功是有把握的。

当天，叶剑英指示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总政机关要提高警惕，保持稳定，要加强部队的管理教育。”

指示总参谋部代总长杨成武：“切实掌握好三总部，陆、空军和沿海边防，务必搞好战备，无论如何要保证军队不出问题。”

杨成武表示：“军队永远听党的话，听军委指挥。”

叶剑英让杨成武转告聂荣臻，对付“四人帮”的问题已经商量好了，请他放心。

从1975年开始，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梁必业、总后勤部长张宗逊、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办公厅主任胡炜列席军委常委会，并设立“三总部联席会议”制度，军委明确杨成武是牵头人，三总部联席会议地点在三座门军委一号厅。往往军委常委会后，三总部负责布置、落实。叶剑英“生病”后，重大事情杨成武会先报告叶剑英，然后向聂荣臻汇报后再布置、落实。有时候梁必业也会和杨成武一起，但张宗逊从未一起去过。

当时总参的工作安排：杨成武负责总参全面工作，主抓作战；王尚荣副总长分管作战部并协助杨；胡炜副总长兼任军委办公厅主任。没有杨成武的明确意见或没有更上一级的指示上不了军委常委会议，而杨成武又听命于叶剑英。

陈锡联主持军委常委会，但不会有重大的事情决定，忙中央的事情更多一些。

因此，此时的实际军权仍在叶剑英、聂荣臻手中，通过杨成武落实。

叶剑英决定将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的方案告诉陈云。他把王震叫来，对王震说：“你到陈云同志那里去一下，你给他讲，对‘四人帮’问题，再征求一下他的意见。”

王震到了陈云家里，把叶剑英说的解决“四人帮”的办法给陈云讲了。陈云经过反复思考以后，让王震转告叶剑英：“看来，只有采取抓的办法。不过，党内斗争，只这一次，下不为例。”

10月5日一大早，江青按计划，和二七机车车辆厂革委会的十余人、中办警卫处副处长、中央警卫团副团长邬吉成，副政委狄福才，乘上国产的内燃机牵引的火车，挂上了一节可以开会和会客的公务车厢，从北京始发到了保定附近。火车停在了于家庄的一个铁路专用线

上,她睡了一觉。下午返京途中,休息后的江青组织随行全体人员学习中央1976年第四号文件,车厢不时响起她的侃侃话语。

晚19时许,火车返回北京站。可江青的学习座谈还没有完,别人也不敢下车。邬吉成借口安全问题下了车,叫警卫参谋马清泉一次又一次地给汪东兴打电话,报告了不下五、六次,请示怎么办。

汪东兴回答说:“知道了,她愿意什么时候下来,就什么时候下吧。你们耐心等着。”

一直等到22时左右,学习座谈结束,江青离开车站,回到她在中南海201的住所。201就在菊香书屋西北不远的春耦斋,新落成后,江青更多地住在这边。

10月6日上午,经过华国锋签字同意,汪东兴用中央办公厅名义发出了开会通知:

根据华国锋同志的建议,兹定于10月6日晚八时在怀仁堂一楼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主要议程:

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

二、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保护措施。

因部分文献需要改动,请姚文元同志列席会议。

(签字): 汪东兴

中共中央办公厅

1976年10月6日。

10月6日上午,江青打电话找杜修贤,叫他下午13时到毛泽东的住处游泳池去。

杜修贤提前来到游泳池。他已有几个月没有来这里了,今天猛然又来,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油然而生。他仿佛又听见毛泽东主席在书房里走来走去的“踏踏”的脚步声和他沉重的呼吸声还伴有偶尔的咳嗽声……

渐渐,凄凉的秋风带走他温暖亲切的感觉,留下的只是孤独。杜修贤沉浸在深深的伤感之中……汽车的喇叭声打断了他的沉思。杜修贤一惊,那是江青的“大红旗”。他赶快回到门厅里的沙发里,迅速抹去脸上忧伤的表情,显得平和自然甚至还有些懵懂。

“老杜，你迟到了……”江青一进门就冲着杜修贤没头没脑来了一句。

杜修贤这次是真的懵了：“明明我来得最早！”

江青的下一句才让他明白所谓“迟到”的含意：“我们在这里学《毛选》已经学了好几天了，你今天才第一次来学。”

随后，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和在江青身边工作的人陆续来了。七、八个人将小小的过厅坐得满满的。有人给杜修贤递了本《毛选》，他也照着其他人翻到学习的页码，一脸虔诚认真阅读的样子。可是心里老在不停地画问号：“江青为什么召集主席身边的人学习《毛选》？”

“小李，你接着昨天的继续往下念。”江青指了指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咦？学了好几天，连一篇都没有学完？”她翻开书自言自语地嘀咕。

大家的目光跟着读书声一行一行地在书上移动，没有几行，江青一声高腔，惊得人们抬起头，读书声戛然而止：

“你们知道中央谁反对毛主席？”

大家面面相觑，谁也不敢搭她的话头。江青看着大家茫然的样子，拍了一下大腿说：“万里！”

杜修贤下意识地摇摇头，江青脖子一梗对他说：“你不信？哼！告诉你们，谁反对主席我都知道。这种事休想瞒过我！”她忿忿地望着大家，想得到赞同的共鸣，沉默许久，江青似乎察觉这是在“对牛弹琴”白费力气，突然朝着小李大声说：“念，往下念。谁叫你停的？念！”

颤抖的读书声又响了起来……

江青最后干脆不叫小李念书了，她开始大谈中央的局势：“中央领导人的排列顺序要按主席生前排列的排，谁也不能改动……谁要反对你们，不行，你们都是主席身边的人，反对你们就是反对主席……中央有人想整我，我不怕！……”

终于，江青讲够了，讲累了，她愉快地宣布：“今天就学习到这里，和大家合影，明天继续学习。”此时她的心里还装着明天和更多的明天……

走出屋子，大家来到草坪上。江青一身藏青色的中山装和一顶蓝

色男式便帽,游泳池拍摄后,杜修贤以为没事了,提着摄影箱想走。不料,江青又兴致勃勃叫住他:“老杜别走!我们一起去景山公园摘苹果,还要照一些照片。”然后她笑眯眯地坐进“大红旗”里“呼”地先走了。工作人员坐着警卫局的面包车,跟着“大红旗”驶出中南海。他们从景山公园后门进去,径直开到一片苹果园旁。江青满面春风从汽车里出来,非常高兴地对杜修贤说:“老杜,我们在这里劳动了好几次,特意留了几棵树今天摘,照些照片。老杜今天看你的啦!”

一棵果实累累的苹果树前,江青小心翼翼地踩上一个事先已经准备好的架子上,旁边的人七手八脚将她扶定,又在她的手边挂了一个小竹篮,让她放摘的苹果。白皙的手握住粗糙的褐色树干,本身就是对比,一身素装和灿烂红艳的苹果,这又是对比。杜修贤拍下了对比的瞬间和对比的深思。直到晚霞染上天幕,江青才蹒跚而回。

第1413回：怀仁堂，一切均安排妥当 王洪文，欲反抗终难敌众

1976年10月6日下午15时，张耀祠接到汪东兴的电话，要他马上上去一下。张耀祠来到汪东兴办公室时，武健华也已奉命到达。汪东兴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中央决定在今天晚上8时统一行动，粉碎‘四人帮’！”

为完成这次行动，经过反复挑选，从中央警卫局的局、处、科级和中央警卫团的师、团、营级干部中抽调了20多名干部，分成四个行动小组。第一小组组长李广银，负责解决王洪文。第二小组组长纪和富，负责解决张春桥。第三小组组长高云江，负责解决江青。第四小组组长滕和松，负责解决姚文元。

15时30分，汪东兴分别对每个行动小组进行动员，宣布这件事“是叶帅和华总理拍板的”，并宣布了两条纪律：“一、要绝对保守机密。万一失密，将给予最严厉制裁。二、要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任何人不得擅自开枪。争取不响枪、不流血解决问题，这是上策。”

10月6日这天，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找了几个人到家里帮忙刮墙皮。因为地震后有些宿舍里的墙皮震落，钓鱼台管理处要对宿舍楼修葺粉刷，邬吉成是为家里的墙壁粉刷补修做准备。

过了中午，他感觉到有些不正常了。汪东兴的秘书一会儿一个电话打到邬吉成的家里：

“派你的司机小王，到某某同志处，接上他送至汪东兴同志处。”

“派你的司机小王，到某某同志处，接上他送到汪东兴同志那里”

……

汪东兴那里没车可调了吗？干嘛老用钓鱼台这边的车？

到了下午17时左右，汪东兴干脆直接给邬吉成打来电话：“邬吉成，你在干什么呢？”

“我正在忙自家房屋的加固呢。”邬吉成回答。

“你马上来，到南楼。”

南楼，就是建在中南海南海东面船坞上面的一座楼，汪东兴的家就在楼里，他的家既是住所也是办公室。

邬吉成当时干活干得灰头土脑的，从电话里听出汪东兴不容延迟的口吻，赶紧放下手里的活计，洗漱了一下，换了一身军装，叫上司机小王，直奔中南海南楼而去。

他一走进汪东兴的办公室，汪东兴马上就站起来了，说：“今天晚上行动，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吧？”

“不知道。但现在我已经可以估计个差不多吧。”邬吉成实话实说。几天来汪东兴的吹风、询问，邬吉成的观察思考，已经对可能要发生的事有所准备。

汪东兴也看出来了，所以没再费口舌，而是眼睛直视着邬吉成，顿了顿说：“你负责外面，武健华负责里边。通知孙凤山来，管理车辆，人下车后就把车调走。”

邬吉成知道汪东兴说的“里边”“外边”是指怀仁堂的里边和外边。

没有临战的动员，没有意义的解说，没有注意事项的巨细交代，他们之间已经形成了默契，一个非凡的任务，就这么寥寥几个字就布置完了。

当天的具体行动，都是汪东兴亲手布置的，执行抓捕任务的干部，汪东兴都是一个一个地谈，但他们彼此之间都不知道对方的任务。每个人站在什么位置，怎么抓，抓后放在哪里，汪东兴都一一考虑得很周到。

在怀仁堂的附近，已布好了一些岗位和暗哨，带队的是警卫团一大队的副大队长华方治。

怀仁堂里面负责警卫值班的，是警卫处值班室副主任丁志友。

18时30分，各路行动人员就位。汪东兴指挥对怀仁堂正厅进行了布置：北侧放了一扇大屏风，东边增加一排小屏风，场内摆放一张长条会议桌，后面放了两把扶手椅，所有文具、茶具都撤走。

大约19时多，汪东兴来到怀仁堂前，看见守在怀仁堂外面的邬吉成，轻声问道：“怎么样，都布置好了吗？”

“布置好了。”

“都没有问题了吗?”

“没有问题了。”

汪东兴做了进一步交代：“他们来了，你把他们的随员，都放在五间房。他们的车子，都停在怀仁堂西边的庆云堂。”

五间房即怀仁堂南面的来福堂等堂院的统称。

“孙凤山来了没有？”汪东兴又问了一句。

邬吉成说：“他跟着王洪文去平谷，好像还没有回来呢，只要一脱开身他就过来。”

汪东兴叮嘱说：“一定打电话把他叫过来，让他管车。”说完，汪东兴进了怀仁堂。不久，孙凤山就赶到了怀仁堂前，负责车辆的调度。

第一个来到怀仁堂的重要人物，是叶剑英。

下午 15 时多，叶剑英从玉泉山 9 号楼的住地来到办公室所在地——军事科学院 2 号楼，为晚上的政治局会议做准备。叶剑英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已经接到了中央办公厅的通知：晚 8 点，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题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设计方案、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置。要求叶剑英提前一个小时到。看到这份通知时，王守江在心里嘀咕了一下：平时开会，只要提前 10 分钟到就可以了，这次为什么要提前这么多？但这一行的特殊纪律要求又让他把种种疑惑压在心里。

不过，叶剑英从玉泉山到军事科学院时，离晚上 20 时开会时间还有近 5 个小时，“离 8 点的会还早着呢，叶帅怎么这么早就来了？”这不能不让王守将感到奇怪。

像往常一样，王守江把会议要讨论的几份文件准备好，装进了叶剑英的公文包，又简单汇报了一下。叶剑英只是点头应着，表情也看不出任何有异于以往之处。工作人员让叶剑英先在卧室里小憩一下，但叶剑英有点坐不住，他说：“走吧，我去跟他们谈一谈。”他起身离开卧室，让工作人员备车去中南海。

叶剑英的警卫马锡金陪着他坐上红旗车。离开 2 号院时，王守江习惯性地抬腕看了眼手表：刚 16 时多一点。

在车上，叶剑英又亲自叮嘱：“开会期间，‘马头’站在会议厅门口

不能离开，老赵坐在车里不要出去。”

“红旗”车刚驶出军事科学院不久，坐在后排的叶剑英说：“‘马头’，你看看，机场的飞机还都在吗？”

那时的北京，树没那么多，楼也没那么高，从西山放眼望去，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不远处西郊机场里停的飞机。1、2、3……马锡金一直数到了“18”，“飞机都在！”——马锡金解释说，当时西郊机场本来有20架三叉戟，1971年林彪叛逃时带走了一架，后来机场自己出事故又损失了一架，就剩下了18架。叶剑英应了一声，没有说话。

车很快过了五棵松，一路向东急驶而去。过了一会儿，叶剑英又问：“‘马头’，怀仁堂正厅有没有后门？”

对中南海很熟悉的马锡金马上回答：“有，前面有个大草坪还能停车，东边还有一个门，平时毛主席都是从东门进来，进东侧休息室。”

叶剑英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快到军事博物馆了，叶剑英又开口问道：“‘马头’，你看一下钓鱼台那边有没有‘红旗’出来？”马锡金赶紧盯住钓鱼台方向的来车，什么也没看见。

车行驶到六部口一带，叶剑英又问：“‘马头’，你对中南海熟悉吗？”

马锡金回答：“熟啊！”

说话间，车已驶入中南海。叶剑英又问：“你看中南海今天有什么变化吗？”

马锡金向四周看了看，平时进进出出很多车的中南海今天显得格外安静，“奇怪，今天怎么一辆车都没有……”他嘀咕了一句。作为中央警卫局的一员，马锡金曾参加过抓捕王力、关锋、戚本禹的行动。

17时多一点，叶剑英乘坐的红旗车停在了中南海怀仁堂门口，马锡金护着叶剑英下了车。平时来怀仁堂开会时，都是华国锋的车停在左边，叶剑英的车停在右边。而这一次车尚未停稳，便立即被门口的警卫人员调到他处。马锡金准备扶着叶剑英上台阶，也顾不上追问原因。

刚走上台阶，中央警卫局的丁志友拦住了马锡金：“随员一律不得入内。”丁志友其实也是马锡金以前的老上级，但今天显得格外严厉。

马锡金一看从门口到会场还有200多米，便搀着叶剑英执意要送上去。丁志友不放心，紧紧跟在后面走了一大半。眼看着快到会议室门口，丁志友坚决拽住马锡金不让他进；但走在前面的叶剑英又紧紧地拉着马锡金往里走，一拉一扯间，叶剑英的公文包就从马锡金的手里滑落，掉在地上。而叶剑英好像没看见这一幕，也没停下脚步，兀自往会堂里走。马锡金赶紧借送公文包的机会，尾随叶剑英进了怀仁堂。

当叶剑英步入怀仁堂正厅时，华同锋刚刚在怀仁堂正厅坐定。他见叶剑英进来，赶紧起身，请叶剑英在另一张椅子上坐定。华国锋和叶剑英请汪东兴就坐，汪东兴摇了摇手说：“今天是召集常委来开会的，我不是常委，我不能坐，我外边还有任务。”

马锡金把公文包递给叶剑英，却听到汪东兴、华国锋说：“今天用不着公文包了！”

马锡金没有明白是什么意思，他退了出来，出门时碰到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武健华，忍不住一通抱怨：“今天是怎么了？车也被调走，人也被赶了出来！”

武健华看了他一眼，马上说：“你的位置在里面，进去吧！”

武健华是负责“里面”警卫工作的。

马锡金与汪东兴及其两个警卫秘书、华国锋的一个秘书、两个警卫都躲在了屏风后面，几分紧张又几分不安地等待着。

接着出现在中南海的人，是41岁的王洪文。那天晚上，王洪文从办公室里出来，看见值班的米士奇正坐在那里看电视。他了一下手表说：“还早。”就坐下来和米士奇一起看电视。

看了一会儿，快20时了，警卫员王爱清对王洪文说：“王副主席，该走了！”

王洪文站了起来，坐上车前往中南海怀仁堂，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

负责抓捕王洪文的是第一行动小组组长李广银和队员吴兴禄、霍际龙、王志民。王洪文到后，行动组的几个卫士在走廊里把他扭住。

王洪文一边大声喊叫：“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一边挣扎。

因为王洪文年轻、有力气，前两个警卫没摁住他，他往前踉跄着冲

了一下，后面又冲上来两人将他摁住。扭着双臂送到大厅里。华国锋手里拿着一张事先写好的《决定》大声念道：

“最近一个时期，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趁毛主席逝世之机，相互勾结，秘密串联，阴谋篡党夺权，犯下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中央决定对以上四人进行隔离审查。中共中央。1976年10月6日。”

还没等华国锋念完，王洪文突然大吼一声，挣脱开警卫人员扭缚，像头发怒的狮子伸开双手，由五、六米远的地方向坐在那里的叶剑英猛扑过去……警卫猛冲上去把他扑倒，死死地摁住。随后，几个人连揪带架把他从后门押走。

很快，张春桥从前门走了进来。

10月1日，张春桥把徐景贤寄给他的关于电影《反击》问题的一封信，圈阅后退还给徐景贤，同时在信的右上角注了一行铅笔字：“你上次提到的某某单位那位女同志的材料，能否送来一阅？”

这封信没有写“绝密”“亲启”，是经过几个秘书的手，随文件一起送来的，当然，谁也看不懂右上角注明的那句话有什么含意，只有张春桥和徐景贤两个人心照不宣。

徐景贤不敢有丝毫怠慢，立刻抓紧办理：通过市革命委员会的有关部门，把那位女士的人事档案材料全部调来。为了避免引起猜疑，徐景贤故意同时调了另外不相干的几个人的档案材料，要有关部门一起给他送来。

当天晚上，徐景贤一个人在灯下打开了厚厚的牛皮纸档案袋，里面有那位女士的履历表，自传，入党志愿书，中国共产党党员登记表，历次政治运动小结以及组织上对她的鉴定等等。他从头至尾翻阅了一遍，总的印象不错，认为比较符合张春桥的要求，特别使他满意的是，在其中的几张表格上，贴着这位女士不同时期的照片。

10月6日的上午，徐景贤把这个档案袋套上了一个大信封，由他亲自密封，写上“北京 中央办公厅 张春桥同志亲启”，交给市委的机要交通员直送中央办公厅，估计当天的下午或傍晚就可以送到张春桥的手里。

第 1414 回：十月六，春桥、文元作长谈 中南海，江青、远新皆被抓

10月6日下午，姚文元前去钓鱼台看望张春桥，作了长谈。他问张春桥：“你在这段时间和国锋同志相处，觉得怎么样？”

张春桥说：“我觉得一般还是能合作的，就是不大交心。”“我对国锋同志讲了，我有主意尽量向你提出来，我的主意可能是错误的，但我绝不会出坏主意。”

他还说，他曾多次劝华国锋要和江青搞好关系。

姚文元也说：“对华主席还是要帮，这是大局。”

张春桥说：“尽量帮吧。”“那个批邓的小册子，华主席压了很长时间没有批，我催了几次才批下来。那几本东西他根本没有看。”

张春桥问姚文元：“最近和江青的关系怎么样了？”

姚文元说：“还好，比较缓和了，内参的问题做了新的处理。”

张春桥说：“你主动去看看江青，和她搞好团结。”

姚文元说的“内参问题”是毛泽东逝世后，新华社有篇内参，把江青怎么找手工艺工人做花圈，怎么讲文冠果是“文官国”，说得比较具体。不知哪些话江青不满意，对姚文元发了很大的脾气，又把新华社记者找到她家里，要他们重新写了才算完事。

张春桥还谈到出版《毛选》五卷的事，他说：“已找李鑫谈过，我对出版《毛选》的具体意见给华国锋写了信。”

随后，张春桥又说：“最近叶剑英接见了一个美国人，有个外事记者，你见到了吗？”

姚文元问：“是9月27日他会见美国前国防部施莱辛格那一次吗？”

张春桥点点头说：“他把杨成武也叫去了，讲的还是过去那一套。这些人，要改变观点也难呢。”

姚文元附和着说：“那个记录我看过了，强调的还是海军。”

这是指叶剑英1973年接见基辛格时谈过海军问题，表示愿意和美国合作，为此他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

最后张春桥说：“我想总要开三中全会吧，但还没有考虑好，你有什么想法？”

姚文元说：“华国锋当主席，应当在三中全会上正式通过，现在政治局办事的人太少，工农都有了，能不能增加一些革命知识分子的干部。”

张春桥没有说话。

后来，姚文元把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写的信中，揭发纪登奎的儿子，在看望河南省委组织部一位负责人时说的一句话，告诉了张春桥。他说：“我接到一封信，里边说毛主席逝世后，可能立即宣布某某某是叛徒。这种问题并不一定是真的，但应提高警惕。”

姚文元没有说出名字，张春桥听了后，也没有什么反映。

张春桥和姚文元谈完话，吃过晚饭，前往怀仁堂。他和往常一样，慢条斯理地走下车，朝怀仁堂走去。他的警卫“大熊”，紧紧跟随在张春桥后面。在研究抓张春桥的方案的时候，人们的注意力并不在张春桥本身，却是在反复琢磨如何对付张春桥身边的这只“大熊”。

“大熊”是跟随张春桥多年的贴身警卫。此人高马大，腰圆臂粗，会儿套拳脚，三五个人难以对付。另外，此人双枪，左右开弓，枪法娴熟，十发九中。“十大”以后，张春桥升为政治局常委。汪东兴几次提出要给他调换两个年轻、英俊的警卫，张春桥都坚决不同意，一直将“大熊”留在身边。

国庆节前夕，汪东兴主动批准“大熊”回老家探亲。不料，“大熊”才离开几天就被张春桥秘密调回来。显然，张春桥已经预感到某种危险，暗中加强了戒备。这只“大熊”的意外出现，不能不引起汪东兴的忧虑，如果出手不利，被他察觉，后果不堪设想。

果然，在抓捕张春桥的时候，差一点出了大事，危险就出在“大熊”身上！

当张春桥的轿车一到，负责抓捕张春桥的“第二行动小组”组长纪和富就迎了上去，恭敬地朝他行个礼说：“首长好！”

张春桥上下打量着他，冷冷地问：“国锋同志和叶帅都到了吗？”

纪和富说：“到了，正在会议室等您。请随我来。”

这时候，“大熊”紧跟在张春桥后边，想跟着进去，被两名卫兵拦住了。

张春桥好像察觉有点不太对劲，两眼盯着纪和富警觉地问：“怎么回事？”

纪和富解释说：“首长的随行人员都在外面大厅里休息。”

张春桥迟疑了一下，对“大熊”摆摆手：“你就在这里等我吧。”说完，就随纪和富朝里走去。

当张春桥走进怀仁堂正厅的东侧时，进了小门，刚拐了两个弯，走廊的灯便突然灭了。在黑暗之中冲出几个人，将他紧紧扭住。张春桥惊恐地连声喊道：“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一只大手就把他的嘴也捂住了。还没等他明白怎么回事，行动小组的纪和富等两人已把他左右双手挽起，架到大厅里。张春桥眨巴眨巴眼睛，只见华国锋和叶剑英坐在沙发上，看着他。

张春桥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脖子一梗，问：“你们凭什么抓我？”

华国锋起身，手里拿着一张事先写好的《决定》大声念道：“张春桥你听着：最近一个时期，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趁毛主席逝世之机，相互勾结，秘密串联，阴谋篡党夺权，犯下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中央决定对以上四人进行隔离审查。中共中央，1976年10月6日。”

张春桥脸色铁青，两眼微闭，自始至终沉默，一声不响。纪和富将他从后门押走了。

这时，张春桥的警卫“大熊”被领到一侧耳房休息。他进去后，见屋里还有几个警卫团的人，因为彼此都是老熟人，他也没介意，随便打个招呼，就坐在门口的椅子上一面喝茶一面闲聊。这个“大熊”别瞧他长得五大三粗，人还特别机警。他嘴巴哼哼哈哈应酬着，耳朵却紧听着外面的动静。可能是抓张春桥时有些响动，他“唿”地站起身就要往外走。在座的一位警卫团副团长见时机已到，便朝众人使了个眼色。几个小伙子刚要扑过去缴“大熊”的枪，没想到这家伙眼疾手快，抢先拔枪在手，猛转身把枪口对准了众人喝道：“不许动！谁要过来我就打死谁！”

大伙一下全愣在那了，谁也不敢动。副团长就说：“大熊，你放下武器，中央已决定要逮捕张春桥。”

“大熊”说：“我只听汪主任的，他让我交枪我才交。”

副团长只好给汪东兴打电话，把情况简单报告了一下，然后把话筒递给“大熊”。只听汪东兴大声说：“现在张春桥已被抓起来了，我命令你，立刻把枪交出来，听候组织安排。”

“大熊”立正回答：“是！我服从命令。”随后，“大熊”就把手枪放在了桌子上。

王洪文被捕之后，钓鱼台并不知道怀仁堂里的剧变，“王办”还以为王洪文正在怀仁堂开会呢！

邬吉成发出通知：“王洪文办公室全体人员，集中在钓鱼台十六楼，出席紧急会议”等到“王办”人员到齐，邬吉成宣布中共中央办公厅命令：“王办”工作人员要参加学习班进行学习，不准对外联系。

姚文元不是政治局常委，所以汪东兴在起草会议通知时是：“请姚文元同志列席会议。”按预定方案，抓捕完张春桥和王洪文后，由华国锋亲自打电话通知姚文元前来开会。华国锋给姚文元打电话说：“今天讨论《毛选》五卷，大家意见很多。你对《毛选》比较熟，张春桥同志建议让你参加，你能不能马上来一下？”

姚文元答应马上过来。

华国锋放下电话，问叶剑英和汪东兴：“还要我们出面吗？”

叶剑英说：“免了吧。”

于是决定由武健华对姚文元宣读隔离审查命令，华国锋当场给武健华亲笔写下了手令。

姚文元住在闹市口附近，据说当时姚文元正在院子里散步。10月6日下午，姚文元同张春桥谈完话就直接回到家里。他的情绪很不好，总有一种恍惚不安的感觉。吃晚饭时，他对小女儿说：

“如果爸爸死了，你们不要难过。”

当时孩子吓坏了，不懂他这话的意思，姚文元赶紧安慰她说：“活着的人都是要死的，爸爸也不例外。”

孩子说：“你思想反动了。”

姚文元也没有多做解释。此时，他放下华国锋的电话，对妻子金

莫说了声：“我要去开会。”拿着包就出了家门。离家时，连帽子都忘了戴。当妻子金英拿着帽子赶出去的时候，他已经上车走了。

中南海怀仁堂的事情解决完后，汪东兴拿起电话，对电话那头的张耀祠说：“这边已经结束了，快点把她弄走算了！”

晚20时，张耀祠和一中队指导员李连庆等十几个人先到毛远新住所，中南海怡年堂后院，离江青住处很近。张耀祠穿便衣，连手枪都没有带。警卫们穿着军装，也没有带枪。

毛远新吃过晚饭后，给在沈阳的妻子打了一个长途电话。接着，便坐在那里看电视。这时，李连庆突然走了进来。汪东兴选派了李连庆前去执行拘捕毛远新，一方面因为李连庆在汪东兴手下工作多年，忠实可靠，另一方面李连庆跟毛远新也很熟，派他去执行任务比较方便。毛远新见到李连庆，问道：

“老李，有什么事？来，一起看电视。”

李连庆答道：“想给你换个地方。”

毛远新：“换到哪里？我得收拾一下。”

李连庆说：“不用了，现在就走。”

这时候，毛远新听出李连庆话里的意思。双眼盯着李连庆，问道：“你来抓我？”

这时，张耀祠等人走进毛远新的办公室，毛远新立即站起来，关掉电视机。

张耀祠宣布：“毛远新，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保护审查。为了你的安全，还住在这里，但要换一个房间。现在你把文件柜钥匙和手枪交出来，材料和文件由中央办公厅派人接收。你的生活、安全仍由李连庆同志负责，不准向外打电话，要遵守纪律。你写的交代材料交李连庆同志转交党中央。”

毛远新听完宣布，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愤愤地说：“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然后就不再说了。一个干部上去收了他的手枪和钥匙。

带走了毛远新，张耀祠他们又来到江青居住的春藕斋“201”所。

张耀祠找到正在洗衣服的江青保健护士马晓先，让她和他到江青那里去一趟。此时已经下班的马晓先意识到有事发生，“要不然局长

不会亲自来叫我去。”

春藕斋“201”所，张耀祠常来，有时一天要去一两趟。这次，他带着马晓先走到江青住所，朝门口的警卫点点头，就进去了。

江青刚吃过晚饭，正在沙发上闲坐，把脚跷在跷脚墩上。她见张耀祠进来，朝他点了点头，仍然端坐着。

今日非比往常，张耀祠走到江青面前，拿着一张纸条宣读道：“江青，……”

张耀祠一张口，江青马上投来惊诧的目光，因为平时张耀祠都喊她“江青同志”，随之，她听到了如下的宣布：

“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

这段话中，“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一句，是张耀祠临时加上去的，其余全是汪东兴向他布置任务时口授的原话。

江青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表面上没有丝毫的慌乱。只是在听完后轻轻地说道：

“我没听清楚，你能不能再说一遍？”

张耀祠就又重复了一遍。

江青沉默着，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此时的她关心的似乎是存放在这里的文件，她当即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国锋同志：来人称，他们奉你之命，宣布对我隔离审查。不知是否为中央决定？”这才慢慢站了起来，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用铅笔写下了“华国锋同志亲启”7个字，然后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将信和钥匙放入信封，再用密封签把信封两端封好，交给了张耀祠。

这时，江青提出要上一下卫生间。张耀祠同意了，同时吩咐江青的司机备车。

东西都收拾好了，江青还没有从卫生间里出来。马晓先进去一看，江青正坐在那里愣神思考着什么。江青随后出了卫生间，坐上了她平时乘坐的那辆专用轿车。

江青的秘书刘真忽然想起江青计划第二天上午要去清华大学视

察,还要作重要讲话。让秘书连夜写好讲话稿,便追上去问:“你明天的讲话稿还要吗?”

江青说:“不要了,撕了吧。”

接着又说:“你告诉李讷,不要找我。”

武健华上了车,轿车仍由江青的司机驾驶,驶往不远的地下室。

这是临时关押处,是汪东兴想出来的主意。汪东兴对中南海了如指掌。他知道,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随着中苏关系的紧张。在毛泽东所住丰泽园后门,秘密地建造了一个防空洞。这样,在面临特殊情况之际,可以把毛泽东安全地转移到这里。这是一个长期空置而又被人所知甚少的地下室。把“四人帮”临时关押在这里,可以说是绝好的去处。即便江青大喊大叫,外面也听不见。

10月6日夜里,江青在中南海的一处地下室里度过。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当夜也押在那里,只是关在不同的房间。

江青押走后,张耀祠对江青的工作人员说:“这里发生的事你们不许对外面讲,从现在起,谁也不许打电话,不许回家。”这些人在春藕斋“201”所住了20多天,直到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公布后,才允许回家……

姚文元家的警卫是由卫成区负责。汪东兴怕出意外,事先请吴忠在他办公室等着,如果姚文元不来怀仁堂,就让吴忠带人去他家里解决。20时25分,姚文元来到怀仁堂。汪东兴怕再发生意外,经请示华国锋和叶剑英同意,没有让他进正厅,只让人把他领到东廊的大休息室,由警卫团副团长武健华向他宣读中央决定。

于是,行动小组人员示意姚文元进东房廊的休息室。姚文元刚一进门,3个人上去扭住他。姚文元连声喊:“小朱!小朱!”

小朱是姚文元的秘书,此时当然已被控制,无法应答。

姚文元又大声问道:“谁让你们干的?”

武健华向他宣读了华国锋刚写的手令:“中共中央决定,对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华国锋。”

姚文元被架走。他一直在喊:“我有话要说!我有话要说!”

被押解上车以后还不住地喊:“你们是哪个部队的?谁指使你们干的?”行动组只好用毛巾塞住他的嘴。

完成任务，正好是晚上 20 时 30 分。

此时，吴德与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倪志福、市委常务书记丁国钰一起守在电话机旁。

姚文元刚刚被带走，华国锋、叶剑英立即召见吴忠、耿飚。

叶剑英对吴忠说：“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严密控制新闻媒介。中央已经决定由耿飚同志接管宣传口，你从卫戍区选调一批精干、可靠的干部，随耿飚同志到广播电台。”

耿飚当时按照华国锋的嘱咐，在家等着，华国锋果真来电话了，要他马上到怀仁堂来。

耿飚放下电话就往中南海赶。21 时左右，他从中南海西门走进怀仁堂，看见华国锋、叶剑英正与吴忠等人在交谈。

耿飚问：“解决了吗？”

叶剑英点点头：“已经解决了。”

耿飚高兴地说：“太好了！”

华国锋说：“斗争刚开始，还不能太乐观。”他对耿飚说：“你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去，要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耿飚望了望四周，问：“人呢？我带谁去呀？”

华国锋说：“我这里没人，等一会儿卫戍区的邱巍高同志和你一块去。究竟怎么搞法，你俩想办法。如何控制住电台、电视台，来不及细想，一切交给你去办了。总的原则是可以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内部已发生了变化，但外面不要让人看出来。”

叶剑英说：“快去！一定要赶快控制直播室！要注意两条：一、要防止内部混乱；二、要防止向外泄密。你要防止发生异常情况，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

华国锋问他：“你要不要带支手枪？”

“手枪不必带了，但是须有你的手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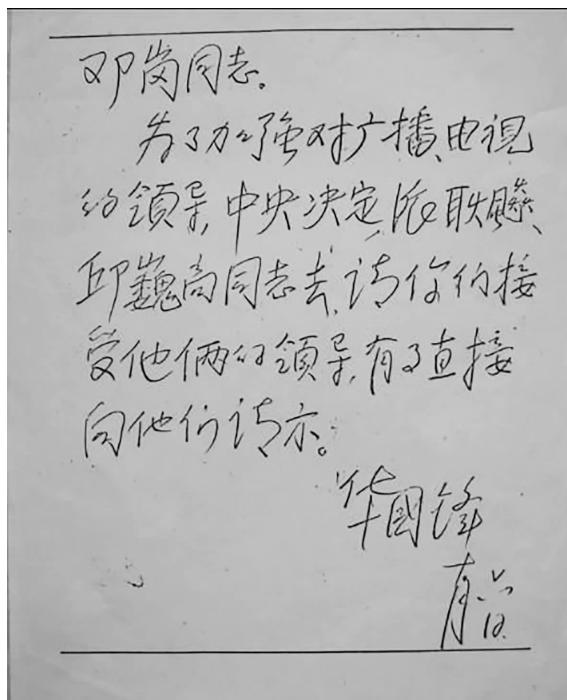
华国锋说：“好！”说完，他俯在桌上写了张条子，递给耿飚说：“你把这个交给邓岗，就说这是中央的决定。”

耿飚接过纸条看了看，上面写着：

邓岗同志：

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

华国锋
十六
月日



“‘马头’！马上回家开政治局会议！”交待完任务，叶剑英对马锡金说。

听到叶剑英的指示，马锡金一时有些迷茫，问：“回哪个家？”

“玉泉山！”叶剑英回答。

“谁通知开会？”马锡金又问了一句。

汪东兴接过话来：“我来通知。”

马锡金陪着叶剑英向车的方向走去，刚走两步，叶剑英又叮嘱：

“一定要带好华国锋的车，别让他丢了。”将叶剑英扶上车、坐好、关上车门后，马锡金特地叮嘱华国锋的司机跟上。临出怀仁堂西门时，他从反光镜里看去，华国锋的车稳稳地跟在后面。

上了车，叶剑英告诉马锡金：“告诉王守江，立即通知开会！告诉孩子们立即上床睡觉！”

耿飚在怀仁堂等了一会儿，北京卫戍区副司令邱巍高来了。耿飚把中央决定接管电台的事简单说了一遍。随后问他：“你带武器没有？”

邱巍高说：“没有。”

耿飚说：“不带枪不行，你马上找两支手枪，咱俩一人一支。”

邱巍高答应一声出去了。工夫不大，就拎着两支手枪回来。他俩把枪挎在身上。

邱巍高还是有些担心地问：“就咱们俩人行吗？”

耿飚问：“你下面有部队没有？”

邱巍高说：“卫戍区在电台大楼有一个营。”

耿飚又问：“这个营属于那个团？”

邱巍高说：“三团。”

耿飚说：“你马上把这个团的团长找来，让他跟我们一块行动。”

于是，邱巍高又打电话把3团王团长找来了。耿飚一看时间不早了，就带着他们两人乘一辆吉普车，直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车上，他把考虑好的行动方案说了一下，邱巍高和王团长都同意。

第1415回：玉泉山，政治局紧急会议 全同意，再做出两项决定

这时，叶剑英与华国锋的车相继到达玉泉山。叶剑英让华国锋一起到自己的卧室休息，工作人员立即端上牛奶、豆浆，华国锋对工作人员说：“先照顾好叶帅！”

叶剑英则推辞着说：“先照顾好华国锋同志。”

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兼叶剑英办公室秘书王守江接到马锡金的电话后，立即从军科院2号楼赶到玉泉山。正躺在卧室休息的叶剑英见到王守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用手比划了一下说：“刚刚把他们抓起来了。”王守江一下子就明白了。用手势传递意思，也是叶剑英和手下人默契的交流方式。林彪出事第二天，叶剑英向王守江伸出第二个指头，只三个字：“他跑了。”

当晚21时15分左右，汪东兴亲自用保密机打电话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周启才办公室，对他说：“那‘四个人’的事，今晚已经解决了，进行得很顺利。中央决定，今晚10点在玉泉山9号楼叶帅住地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现在国锋同志和叶帅已离开怀仁堂，一同去了玉泉山。我正在通知在京的政治局成员去那里开会。你马上去玉泉山九号楼安排布置好会场，做好各项会务工作。还有一件事，你走前要安排好，指定秘书局收发处一个负责人，坐镇中南海西门收发室，对京内外所有部门送给那‘四个人’的文电、信件、资料、报刊等，全部由他扣住和保管，不送文电处处理；秘书局文电处发给那‘四个人’的文件、资料等，送到收发室后，也由他全部扣住，不发不送。听清楚了吗？”

周启才说：“听清楚了，我立即去办。”

周启才到达玉泉山9号楼叶剑英住地，是晚上21时40分左右。叶剑英的警卫、秘书将他带到叶剑英卧室。

只见华国锋和叶剑英并排坐在叶剑英卧室床沿上，正在商议事

情。见周启才来了，华国锋说：

“老周，情况你知道了吧？”

周启才：“知道一些，东兴同志让我来向您和叶帅报到，听候指示。”

华国锋说：“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就在叶帅会客厅召开，你去安排布置一下。”

周启才说：“好。”就走出卧室。

玉泉山9号楼有一个小会议室，平时是叶剑英打乒乓球、看电影的地方，突然要来这么多中央领导开会，下面的工作人员一下子也手忙脚乱。有人说，干脆在乒乓球台上铺层东西当会议桌吧，这个意见又马上遭到否定。大家开始将乒乓球台抬出，搬椅子，忙得满身大汗。为华国锋、叶剑英准备的高靠背沙发，然后是单人短沙发，4人的长沙发，晚上21时50分左右，临时会场算是有了个模样。此时，从玉泉山看下去，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已有车陆续地朝玉泉山方向疾驰而来。

考虑到皮沙发有些凉，工作人员又四处找来毛巾被铺在皮沙发上。马锡金后来说：遗憾的是当时没有留下照片作纪念，那些五颜六色的毛巾被，绿的、紫的——这么举足轻重的会议，现在想起来也有意思。

办公室的人又想起一件事：“这么多人，连夜开会，还要吃夜宵吧？”一旁汪东兴的秘书却不慌不忙地回答：“我早就安排好了，大会堂那边送包子、酸辣汤，护士、服务员也都一起过来。”

马锡金一下子想起，10月5日那天，中央警卫局负责玉泉山的李钊专门跑到玉泉山9号楼，问马锡金：“你们需不需要什么办公用品？”

马锡金觉得这句话问得有些莫名其妙：“大过节的，也没什么人过来，需要什么办公用品？”

听了马锡金的回答，李钊未再多说一言，扭头就走。

此时，马锡金想起那日情景，忽有所悟：“我现在想起来，他一是来看一下这边的情况，为第二天晚上的会做准备，另一层用意可能是想试探一下我们是否知道消息吧。”不愧在中央警卫局服务多年，汪东兴的确心思缜密、考虑周到。

为安全起见，与会人员的车到了玉泉山之后，都停在另一个地方，

然后步行一段距离到达 9 号楼。在会场还没完全布置好时,纪登奎就先赶来了,随后是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

吴桂贤走进会场后,自言自语地说:“沙发座位不够啊。”

周启才说:“座位够,除两个主座外,随便坐。”

叶剑英的另一位秘书王文理回忆,李先念到玉泉山时,一进门便问:“怎么这么晚还开会?叶剑英病得很重?”他还以为是叶剑英生病了。

开会的人都到齐了,工作人员请纪登奎、陈永贵、吴桂贤等后面一排的人,坐到前面的空位上来,纪登奎说:“你的座位不够,还有 4 个人没有来呀!”

马锡金说:“人到齐了,请到前边来吧。”

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还是没有到前边来。

这时,汪东兴说话了,他说:“‘马头’说得对,人到齐了,你们都到前边来坐。”

一头雾水的 4 个人犹犹豫豫地坐到了前面。

晚 22 时整,周启才向汪东兴报告,出席会议的政治局成员已全部到齐。汪东兴让他去叶剑英卧室报告一下,请示华国锋和叶剑英,是否按时开会?

周启才进入叶帅卧室,向两位首长报告了上述情况。华国锋听后看看叶剑英。叶剑英说:

“人到齐了,就按时开会,咱们去会场吧!没谈完的事,还可以在会上谈。”

华国锋先从坐的床沿上站起来,并伸手扶着叶剑英站起来。

出卧室门时,华国锋请叶剑英先走,叶剑英让华国锋先走。最后是两个人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同步走出卧室,面带微笑地进入会议厅,分别坐在预先布置好的两个并列的沙发上,华国锋面向会场居左,叶剑英面向会场居右。

出席这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倪志福、吴桂贤共 11 人。李鑫和周启才列席了会议。

开始,华国锋请叶剑英主持会议并讲话。叶剑英说:“这次会议应

该由你主持,你是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的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一直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责无旁贷,你就主持开会吧!”

“那我就先讲几句,再请叶帅主讲。”华国锋说,“今晚把大家请到这里来,是要向大家通报一个重要事情: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乘毛主席逝世之机,秘密勾结,疯狂活动,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为了及时粉碎这个将给中国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反革命集团,今天晚上8时,中央已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和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为由,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拘捕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是常委,通知他来怀仁堂列席会议,做些《毛选》文字的修改工作,他来后,在怀仁堂东休息室被拘捕了。江青是在中南海她的住地被拘捕的。根据他们篡党夺权的严重罪行,分别向他们宣布了由我签署的中央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对王洪文、张春桥的拘捕是在怀仁堂正厅,叶帅坐镇,我分别向他们宣布的。江青和姚文元是由执行任务的有关负责人向他们宣读的。对毛远新实行了保护审查。‘四人帮’在北京的几个骨干分子,由北京市委、北京卫戍区根据中央指示解决。”

华国锋在讲话中还谈到了对江青这几个人实行隔离审查的意义,他说:“这次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使我们党避免了一次大灾难,使我们的事业避免了一次大倒退。”

华国锋的话音刚落,叶剑英强调:“‘四人帮’这个提法,是毛主席1974年7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的。我们清除‘四人帮’不是政治局少数人的想法,也不是我们临时的决定,而是毛主席生前想解决而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问题,我们粉碎‘四人帮’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毛主席在世时,他们结成‘四人帮’进行分裂党的宗派活动。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他们更加猖狂地向党进攻,迫不及待地妄图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接着,叶剑英谈到了毛泽东的“两着棋”和临终“嘱托”。第一着棋是指1974年、1975年毛泽东多次在政治局会议上当着在京的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面,毫不客气地说江青有野心,批评他们不要搞“四人帮”。毛泽东还多次对叶剑英说:“四人帮”的问题一定要解决,“不然要出大乱子。”叶剑英进而解释说:“我牢记着毛主席的教导,协助国锋

同志进行了这场斗争。这就是说，我们解决江青这几个人的问题，不是中央政治局少数人的想法，也不是我们临时的决定，而是毛主席生前想解决而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问题，我们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

叶剑英还列举了王洪文这4个人的几条罪状。其中之一，就是他们“结成宗派，想夺取最高领导权。”周恩来在世的时候，他们想打倒他。周恩来逝世后，他们“又要打倒新的国家领导人。”更有甚者，“他们已在准备三中全会的报告了。他们准备在三中全会上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王洪文可能没有把政变的龙袍做好，但是准备悬挂的标准相已照好了。”江青还跑到清华大学，大造反革命舆论，“到了迫不及待的地步。”可见，“情况已经到了不破不立的紧急时候。”不破了“四人帮”，中央就不能立起来。不破了“四人帮”，我们这个党就很危险。在这个关键时刻，“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采取了非常果断的措施，揭露和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叶剑英谈到毛泽东的第二着棋是指组织上的安排。周恩来病重以后，“四人帮”以为，按照原来的次序，政治局应该由王洪文主持，国务院应该有张春桥主持。但是，“毛主席就是不给他们。”邓小平被推下台后，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选定华国锋作为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毛主席为什么要下这盘棋呢？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叶剑英评价说，毛主席的这两着棋非常英明，“为我们这次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奠定了基础。”

接着，叶剑英说：“我们党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一场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斗争。在毛主席逝世不久的情况下，采取什么样的斗争策略、措施和方法，做到既要把这个反革命集团彻底打掉，又要保证首都北京和全国局势稳定。这是一步险棋，怎么走好这步险棋，非同小可，要慎之又慎，做到万无一失。经过我和国锋同志及东兴同志几次个别交谈，统一思想认识，决定采取“以快打慢”的方针，用在怀仁堂召开中央常委会的形式，对‘四人帮’采取行动，实行隔离审查。在决策和实施这一重大行动过程中，保密问题重之又重，知密范围很小，参与人员十分精干。实战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未放一枪一弹，即迅速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取得了预期的胜利。”

叶剑英还说：“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

共同愿望，中央采取这样的措施，也体现了党、军队和人民的意志。许多老同志、老领导特别是聂帅和徐帅等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曾通过各种方式向我表达这种强烈愿望，提出要采取坚决措施打掉这个反革命集团，绝不能让他们的篡党夺权阴谋得逞。这次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必将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军队完全拥护和支持党中央的这一重大决策。”

华国锋插话说：“这场粉碎‘四人帮’斗争的胜利，我们的叶帅起了最为重要的作用。”

叶剑英说：“不能这样讲。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毛主席的遗愿。毛主席逝世后，你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又是国务院总理，这件大事，如果你不下决心，你不拍板，做起来就难啊！正是因为你下了决心，你拍了板，做起来就相对容易了。”

叶剑英又说：“在这场同‘四人帮’的斗争中，东兴同志具体对行动方案组织实施，胜利完成，是出了大力、立了大功的。8341 部队的参战人员也为党为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

汪东兴插话说：“叶帅过奖了。在这场同‘四人帮’的决战中，我是在国锋同志和叶帅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做了应该做的一些事情。一个老共产党员，长期从事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领导干部，为了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完成中央交给我的政治任务，是完全应该的。”

与会者听了华国锋、叶剑英的报告，一片欢腾，有的兴奋得当场犯了心脏病，紧急抢救。会议完全赞同叶剑英、华国锋处置“四人帮”所采取的行动。

叶剑英说：“在中央，我们从政治上、组织上解决了‘四人帮’问题，这是第一步，是初战的胜利，地方上还有些‘四人帮’的帮派骨干分子要清理。更艰巨的任务是彻底从思想上肃清‘四人帮’的余毒和影响，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多方面的努力。”

华国锋说：“毛主席离开我们快一个月了。乱党、乱军、乱国，妄图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党中央及时果断地粉碎了。在此新的形势下，我向中央政治局提议，请我们叶帅担任党中央的主席，主持中央的工作。叶帅德高望重，长期在中央协助毛

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处理国际、国内重大问题，多谋善断，有多方面丰富的实践经验，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很高，在危难时刻，两次挽救了党。”

叶剑英站起来大声说：“国锋同志这个提议不妥。我年事已高，今年已 79 岁了，且长期从事军事工作，工作面窄。经过慎重考虑，我提议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他年龄比我小二十多岁，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民主作风好，能团结同志，尊重老同志，他现在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我认为他是比较合适的人选。这个担子是不轻，我们大家可以协助。请大家考虑。”

接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建立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这两个决定在 10 月 8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定稿，9 日见报。

会议研究即将召开的打招呼会议。华国锋说：“既要解决问题，又利于大局稳定”，“要破得彻底，立得正确”。

华国锋说：“我们同‘四人帮’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对于这一点，必须有清楚的认识。对跟着‘四人帮’犯了错误的人，要区别对待。在他们当中，参与‘四人帮’阴谋活动的是极少数，受‘四人帮’思想影响而犯了错误的是大多数。参与阴谋活动的，还有浅有深。无论是浅是深，只要把参与阴谋的那一套向党向人民讲清楚，同‘四人帮’划清界限，我们就欢迎。打击面要缩小到‘四人帮’及其一小撮不肯改悔的死党身上。至于受‘四人帮’思想影响而犯了错误的，更要着重教育，帮助他们分清路线是非，认识错误的内容、危害、原因和改正的办法。对犯错误的同志，‘一要看，二要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方针，是延安整风的优良传统。这个方针和传统，长期以来遭到‘四人帮’的严重破坏，我们要在斗争的实践中切实地把它恢复过来。”

会议研究了上海问题。

大家分析了上海的实际情况。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调到北京后，一直兼着上海的市委书记，张春桥是第一书记，姚文元是第二书记，王洪文虽是党中央副主席，却又是上海市委书记，排在张、姚的后面。张春桥是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但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历来看不

惯他的那一套。张春桥根本指挥不了部队。

华国锋讲：“只要把上海的问题解决了，其他各省市的问题就好解决。其他各省市闹派性的头头和‘四人帮’比起来就是小玩闹。”

华国锋说：“‘四人帮’在上海拉过警备区的四个领导干部，号称有四个‘枪杆子’，只有周纯麟没有拉过去。先让马天水和周纯麟来。先做马天水的工作。”他想了想又说：“同时通知丁盛、廖汉生。”

华国锋之所以让周纯麟与马天水一同来北京，有几个考虑：其一，周纯麟是上海警备区司令员，负责保卫上海。其二，“四人帮”一直整他，华国锋认为他可靠。其三，只叫马天水一个人来，他可能会生疑而不来，如果他不来事情就难办了。

这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从10月6日晚22时开到10月7日清晨4时多，历时6个多小时顺利结束。

第1416回：赴电台，连夜控制广播局 北京城，到处传“四人”被抓

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散会后，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李钊等人引领中央政治局各成员和随行人员分别到事先安排好的各楼房间内休息。汪东兴指示中办秘书局局长周启才办几件事：

1、给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打电话，通知他们今天上午来京，中央领导同志有事找他们谈。你通知完后，安排好专机去接他们，到京后，住在京西宾馆。

2、从今天开始，中央政治局开会或集体办公或找人谈话或其他活动，都在玉泉山五号楼会议厅进行。领导研究决定，你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集体办公会议，做好各项会务工作和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临时交办的各项任务。

3、叶帅年事已高，行动不太方便，在此非常时期，中央会议频繁，开会时秘书或警卫又不能进入会场随侍左右。给你一项任务，叶帅在会场起坐和去卫生间时，你要进行必要的搀扶，特别去卫生间要注意防滑，保证安全。

周启才问：“是否事先要向叶帅讲一下？”

汪东兴说：“今天上午政治局开会时，我向叶帅讲一下。”

当天，华国锋住在5号楼。此后约半年时间，玉泉山成了中央一段特殊时期的办公场所，直至一切恢复正常，中央领导们又回到中南海。

当时不在北京的韦国清、许世友、李德生、赛福鼎等同志，是由汪东兴打电话通知的，告诉他们政治局的决定，并征求了他们的意见。他们都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

第二天，陈锡联在玉泉山向中央写报告，要求“不再主持军委的工作，还是请叶帅来主持。”

华国锋说：“你这个报告先不要写，叶帅还要协助我处理国内的事

情，军队的事情你还要继续管一下。”他让陈锡联收回了报告。

10月6日晚22时左右，几乎与政治局玉泉山会议召开的同时，在卫戍区副司令员邱巍高和王团长的陪同下，耿飚持华国锋手令赴中央广播事业局大楼。

那晚正好是邓岗在值班，他和耿飚曾一起在抗大学习过。文化大革命时，他也被打成走资派，和耿飚一起到“五七”干校劳动。直到1974年四届人大召开后，由周恩来提名，出任广播事业局代局长。

当耿飚走进邓岗的办公室，邓岗站起来吃惊地望着他问：

“你怎么到这来了？”

他实在想不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此时到电台来干什么？

耿飚笑着说：“是啊，我来上班来了。”

“上班？”邓岗更摸不着头脑了。

耿飚把华国锋写的那张纸条交给他。邓岗仔细看了看，仍然愣愣地看着耿飚，似乎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耿飚只好说：

“派我来这里主持工作是华总理和中央的决定，你要不相信想打电话向姚文元请示也可以。但不许出去，电话就在这里打。”

邓岗扭头看了看守在门口的两名战士，勉强笑笑说：“我不打电话，没有什么要请示的，我服从中央的决定。”

耿飚接着说：“那好，你把领导班子的人统统找到你办公室，就说有事要商量。”

邓岗召集来的广播局核心小组成员有11位，耿飚在会议室门口放了两名卫兵，任何人只许进不许出。然后，耿飚把华国锋手令念了一遍，要求大家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把工作做好。

这些人尽管是一头雾水，但仍忙不迭地连声说：“明白了！明白了！”

接着，耿飚给华国锋打电话报告：“已经控制住了，领导人都在我这里，你放心。”

华国锋知悉后，高兴地说：“最关键的问题解决了。”

中央广播事业局内的人员，在晚22时以后，得知了“四人帮”被捕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全局上下迅速知道了。杜修贤回忆说：“半夜，床头的电话震碎了我的苦梦：‘江青抓起来了，还有张春桥、王洪

文、姚文元……真的，我不骗你！”

第二天，根据邓岗的传达，通知“中央三台”，不要再用“按既定方针办”这一提法。

10月6日深夜23时左右，叶剑英的警卫马头给北京后海小翔凤叶剑英在城里的家打电话，告诉正在那里的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宁和侄子叶选基：“首长让我告诉你们，‘那四个人’给抓起来了。”

叶选宁和叶选基明白“那四个人”是指谁，马上决定尽快把这个大快人心的消息通知出去。他们叫上司机任天庆开车，先到西郊机场去找“头头”，叶剑英最小的儿子叶选廉，他当时是空军34师专机组的飞行员，告诉他这个消息。然后又从那里直接到了位于永安里的国管局宿舍“九层楼”，告诉了老大叶选平。

通知完叶选廉和叶选平后，叶选基稍睡了一会儿，第二天早上7点半，他就闯到了翠家湾王震的住处，将这个消息告诉了王震。王震听到消息，整个人都坐不住、站不住了，兴奋得不得了，马上驱车去陈云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陈云。

第二天，叶选基又到王震家，看见他手里捏了两个核桃，抓来抓去。叶选基好奇地问起，王震说是陈云给他的。原来，陈云看到王震如此亢奋，控制不住情绪，送他两个核桃捏一捏，可以平衡一下情绪。

再说7日凌晨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散会后，中办秘书局周启才局长立即按照汪东兴的指示去了5号楼，查看中央政治局开会的会议大厅、中央主要领导人的休息室、保密电话间、卫生间等的布置情况。接着，又在5号楼让总机值班人员接上海马天水和周纯麟的保密电话。

凌晨3时，首先接通了马天水的电话。周启才对马天水说：

“我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周启才，中央领导同志指示我给你打个电话，请你今天上午来京，有事找你谈。”

马天水问：“谈什么事，中央领导同志讲了吗？”

周启才：“没讲。”

马天水又问：“徐景贤、王秀珍去吗？”

周启才：“没说要他们二位来。”

马天水：“上海还有别人去吗？”

周启才：“还有警备区周纯麟司令员。”

马天水：“我通知周司令。”

周启才：“不麻烦你了，总机正在给我接周司令员的电话。”

周启才在电话中告诉马天水，中央办公厅上午将派专机去接他们。

周纯麟司令员的电话接通后，周启才也讲了中央领导请他来京的事。周司令员听后说：“好的，我等机场通知。”

凌晨4时，公安部杨贵接到华国锋的电话说：

“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我们已经隔离审查了，进展得很顺利。你要注意祝家耀。”

放下华国锋的电话，杨贵想，怎么“注意”祝家耀啊？他想起祝家耀喜欢看电影，于是就调来几部电影，叫祝家耀过来一起看电影。

7日清晨6时，在友谊医院住院的姚依林，从匆匆赶来报信的女儿口中得知“四人帮”被抓。兴奋不已的他立即出院，赶到陈云家报喜去了。陈云赞许地说：“剑英同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7时多，住在万寿路干休所的陶铸妻子曾志接到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打来的电话：“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那4个人昨晚被抓起来了！”

在曾志明白那“4个人”就是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之后，兴奋得手直发抖：“谢天谢地，谢谢你告诉我世界上最好的消息！”

她放下电话，赶紧把消息告诉给女儿、女婿。

7日早晨，因“告江青状”，从4月起就被停职反省的新华社李琴，在电话里听到王海容的声音：“那4个人抓了！”

电话随即挂断了，李琴一下子想到“那4个人”是谁。

同样因“告江青状”，从4月起就被停职反省的新华社穆青的妻子周萝，也在这天接到一个不知姓名的女人电话，就一句话：“祝贺你们了！”

晚上，也是因“告江青状”，从4月起就被停职反省的新华社朱穆之，晚上在家里迎来了朋友刘回年，他是悄悄走进朱穆之的家，告诉他：“那4个人都被抓了！”

7日上午8时30分，华国锋在玉泉山5号楼会议厅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首先由汪东兴汇报了清晨他给外地四位政治局成员通电话的情况：

“根据华主席、叶副主席的指示，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散会后，我分别给许世友、韦国清、李德生、赛福鼎同志打了电话，向他们通报了昨晚中央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情况和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做出的几项重要决定，他们都表示赞同中央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的措施，同意国锋同志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

汪东兴还在会上讲了周启才给上海马天水、周纯麟打电话的情况。

接着，会议研究决定了召开“打招呼”会议的事情。华国锋说：

“从今天开始，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按照原来分工，要分头迅速召集中央在京党、政、军各部的主要负责人开会，向他们传达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和政治局紧急会议做出的各项重大决定。而后开始分期分批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会议地点在玉泉山5号楼，来京与会人员住在京西宾馆。”

接着，把外交部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召到玉泉山5号楼，由华国锋、叶剑英直接向他们进行传达，李先念、汪东兴等在会上也讲了话。外交部有的负责人听完传达后，高兴得泪流满面。根据新的形势，会上研究部署了外事工作。

10月7日，吴德通知迟群、谢静宜到北京市委开会，在那里将他们二人抓了起来。

10月7日的《人民日报》，依然保持着过去的风格，头版头条登着：《继承毛主席遗志的最好实际行动——上海市掀起群众性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高潮》，二版的通栏标题为《深入批判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总纲〉》，刊出梁效的长文《〈论总纲〉和克己复礼》。……《人民日报》如此，全国所有的报纸、电台也如此。

10月7日，《光明日报》按原计划发表了“梁效”的文章：《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黑标本——批判〈论总纲〉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卑劣手法》。

7日上午，中央政治局要谷牧派精干可靠的人员到上海了解情况。

再说上海，中央秘书局的通知让上海的马天水感到有些突然，他立刻将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徐景贤和王秀珍叫到康平路市委学习室。

上午9时，当王秀珍步入康平路市委学习室时，发觉马天水穿得

整整齐齐，早已坐在那里。马天水向来朴素，只有在接待外宾时才穿笔挺的中山装，扣得紧紧的衣领里露出一圈雪白的衬衫领。不过，他今天神态木然，呆呆地坐在那里。

“马老，今天有外宾？”王秀珍问道。

“不，去北京开会。”马天水低垂着硕大、光禿的脑袋，颓然地答道。

“去北京开会？”徐景贤也进来了。他向来是个非常敏感的人，马上插话道，“中央最近一段时间没有会议呀，也不会有人事变动。”

“是呀，每次去北京开会，春桥、文元和老王总是事先来电话关照。这一回，怎么突然叫你去开会？哪里来的通知？”王秀珍问道。

“中央办公厅一早打电话来，要我和周纯麟同志今天中午赶到北京。”马天水答道。

“你给春桥挂过电话吗？”徐景贤追问。

“我，我怕太早，他没起床，怕打扰他。”马天水支吾道。

其实，这个“马老”，乃是一匹识途“老马”，哪里还用得着徐景贤提醒？

马天水与周纯麟同行，王秀珍、徐景贤机场送行，他们再三叮嘱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到了北京“向三位首长问好”，并按惯例打个报平安的电话回来。

7日上午，马天水和周纯麟司令员飞到北京，入住京西宾馆。

当天下午，叶选基去看望吕彤岩。吕彤岩是吕正操的女儿，叶选基的前妻。此时，吕彤岩已经从父亲那里得到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因为10月7日上午，陈锡联代表中央在西山召开在京三总部各兵种领导紧急会议，传达中央粉碎“四人帮”的决定，时任铁道兵政委的吕正操参加了会议。吕彤岩问叶选基要不要将这个消息告诉邓小平，叶选基让她立即转告。于是，吕彤岩马上打电话约见了邓小平女儿邓榕的丈夫贺平，告诉他“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

正在单位上班的贺平听到这个消息后，骑上自行车“飞”一般地赶回宽街邓小平的住处。他一进屋，就连声说：“快来！快来！”全家人一看他满头大汗、兴奋不已的样子，就知道一定有大事发生。

邓小平夫妇和邓林、邓楠、邓榕一起挤在紧闭房门的厕所里，又特意放开自来水，听贺平“传达”这一消息。邓小平耳朵不好，流水声又

太太,经常因为没听清而再问一句:

“‘四人帮’被粉碎了!”

“这是真的吗?”

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震惊,疑惑,紧张,狂喜,一时之间,喜怒哀乐之情全都涌上心头。就在这间厕所里,在哗哗作响的流水声中,问着,说着,议论着,轻声地欢呼着……一向举重若轻,泰山崩于前而不惊的邓小平,此时也激动的连手中拿着的烟头都在轻微地颤动。他由衷地感到喜悦:“中国有救了,我可以安度晚年了!”一贯寡言少语的邓小平,还向大家解说“厚重少文”及周勃、陈平的典故,说“华这个人好,选对了”。

徐向前听到这个消息,连声高呼:“好得很,好得很!”

聂荣臻激动地说:“中国得救了!”

7日下午,从“文革”开始不久就靠边站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庄正在看书,电话铃响了,对方未通姓名,只说了一句话:“你不是还有半瓶茅台吗?喝了吧!”

李庄再也无心读书,挨到下班,一溜烟跑回宿舍,拿出茅台,一饮而尽。他后来回忆说:“电话是一位穿军装的老战友打来的,这是我们两人在特殊情况下为了避祸定的一种隐语,表示‘四人帮’覆灭了。”

当晚,从唐山返京的于光远,听妻子孟苏说了此事,于光远不敢相信,约了黎澍,黎澍又约了李新,4人一起在大街上散步,分析了一番,确认消息是可靠的。于光远回到家里已是午夜12时,他打电话给国务院政研室的同事李昌、冯兰瑞夫妇,要他们马上到他那里去。于光远见到他俩就说:“5个人都抓起来了。”接着,他讲了一些他听到的事情经过。李昌夫妇回到家后,兴奋得许久没睡。

7日以后,李先念约邓颖超谈话,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去看望胡耀邦,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情况。胡耀邦让叶选宁转告叶剑英三句话:“第一句,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句,冤案一理,人心大快;第三句,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第1417回：打招呼，马天水目瞪口呆 迟浩田，受命进《人民日报》

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由叶剑英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通知“立即在党内传达”。

7日下午，党中央派专机将上海、江苏、山东、湖北等地的负责人和济南军区、武汉军区的领导接到北京。华国锋首先派人将江苏的彭冲接到玉泉山，说：“今天找你们来，告诉你们，中央解决了‘四人帮’的问题。”

当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召集到京的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湖北等省市和南京、济南、武汉三个军区的负责人开会，其中有上海的马天水、周纯麟，江苏的彭冲、许家屯，山东的白如冰，湖北的赵辛初、赵修，南京军区的丁盛、廖汉生，济南军区的曾思玉，武汉军区的杨得志、王平等。

马天水走进会场，见华国锋、叶剑英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中，王、张、江、姚四人没来，心里一惊，但没漏声色，热情地和大家握手，打招呼，一切如常。

华国锋宣布：“王、张、江、姚阴谋篡党夺权，党中央对他们采取了坚决措施，将他们隔离审查，除去了隐患。”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马天水愣了，简直目瞪口呆！他解开了紧扣着的中山装的领子，虽然也随着大家拍了拍巴掌，但那光秃的前额却在不断冒汗。

华国锋系统介绍了毛泽东从1974年起对“四人帮”的不满和历次的批评，介绍“四人帮”如何阴谋篡党夺权，以及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的必要性。

会场气氛热烈，不少人插话。

华国锋手上拿着三份毛泽东的手稿，一份是“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一份是“江青干涉太多了。

单独召集十二省讲话”；一份是江青要求印发“风庆轮”问题的材料时，华国锋向毛泽东请示报告，毛泽东在华国锋报告上的批示：“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

华国锋说：“他们大造舆论，几种报刊都是他们控制的。他们伪造毛主席临终嘱咐。其实是我1974年4月30日，毛主席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把我留下。我报告主席，整个形势是好的，有几个省，浙江、江西、福建、云南有问题，政治局要讨论研究解决。主席写了三张纸给我三句话，一张是‘慢慢来，不要招（着）急’，一张是‘照过去方针办’，一张是‘你办事，我放心’。我正式给政治局传达前两张，后一张没有传达。‘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在告人民书里，在悼念词里他们不写，在社论里讲了。六个字改了三个字，作为临终嘱咐大做文章。当时主席逝世，我们都很忙，忽略了这个事。乔冠华在联合国的讲话稿，讲了主席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我在2日看了把这个字改了。张春桥又批了‘暂时不要传达’。到10月4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这篇文章用梁效的名义，文章里说：‘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陈锡联同志从唐山回来，对我说，我们都是叛徒了。在悼词里面不提‘三要三不要’，讨论时，陈锡联同志提出要把‘三要三不要’加上去，姚文元笑了一下，还是没有加上去。后来，汪东兴同志又向我提出，经我坚持，加上去的，张春桥表示写就写吧。”

会议一直开到8日凌晨，宣布几条纪律：不准私自向外面打电话，不准写信，不准外出，不准接待客人。

华国锋看了看表，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晚上继续开，大家发言。”

散会后，周纯麟和马天水坐在同一辆车里返回宾馆。路上，周纯麟问马天水：

“你今天为啥不高兴？大家都很高兴啊！而你连记录都不做，回去怎么传达啊？”

马天水说：“我好像被打了一闷棍！这些事，以前我一点也不知道啊！”

周纯麟说：“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大事，也是上海的大事，今晚大家都还没来得及发言，明天你可要好好表个态！”

马天水却说：“这些材料说服力不强。毛主席去世还不到一个月，他们就那么坏吗？我不同意把他们抓起来这种办法，就是有错误，也应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给他们有检讨改过的机会嘛！难道四个人都是一样的错误吗？”

周纯麟说：“华主席讲话时，材料都说得很清楚，证据确凿，你又不是没听到。他们谋害毛主席、反对周总理，难道还是假的吗？你对他们的不少事情都是很了解的，应该老老实实地说出来。”

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也整整等了一夜，因为不知道中央开会的内容，他一直未向上海报平安。这时，听到楼道里的脚步声，房佐庭赶紧出来，然后跟着马天水一同进屋。

走进房间，马天水实在熬不住了，冲口而出：“简直是突然袭击，宫廷政变！”

说罢，马天水似乎意识到自己失言，再也没有说话。

躺到床上，马天水辗转反侧，无法入眠。

他无法抑制自己的心情，又对秘书说出了心里的话：

“唉，今天还要去开会，会上不能不表态。表态难，不表态又不行。表示拥护吧，向上海怎么说？不表示拥护吧，恐怕就回不去了！”

再说上海，马天水走后，一直到7日晚上21时，他的秘书房佐庭按惯例的报平安电话也没给上海打回来。王秀珍着急，打电话到北京公安部找祝家耀，问他是否看到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祝家耀说，前几天看到了，是不是因为地震搬家了？

祝家耀，1955年3月至1959年4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战士、副班长。195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5月至1966年12月为上海5703厂工人，后在厂劳资科工作。1973年6月在上海市委组织组工作。1973年11月至1977年6月为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

王秀珍又将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上海市委常委、时任全国总工会“九大”筹备组副组长金祖敏在上海的秘书缪文金找来，让他打电话找马天水。

徐景贤也着急。10月7日深夜23时左右,他打电话给文化部部长于会泳,问北京有什么动向?于会泳说:“今天下午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吴庆彤通知他,中国文化代表团不出访了,是华总理决定的,很奇怪。”

徐景贤说:“中央突然把马天水找去开会,但内容没有告诉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于部长,你有什么消息要及时告诉我。”

接着,徐景贤又给卫生部部长刘湘萍打了电话。刘湘萍则告诉徐景贤:“没听说中央开什么会,江青原定今天晚上请她看戏,现在却找不到人了。”

她还说,人民日报社的鲁瑛昨晚也打电话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情。

原来,10月7日,《人民日报》也发生了变动。

10月6日午夜,正在唐山抗震救灾第一线的北京军区副政委迟浩田,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一个紧急电话:“你明天一早回京,中央派专机来接。”

迟浩田问:“什么事?”

“你来了就知道了。”对方说。

“在这个抗震救灾的关键时刻,怎么让我回去呢?”迟浩田坐立不安,于是,打电话到北京军区问秦基伟政委。秦基伟说,他也不知道,然后说:

“这大概是中央定的。叫你回来你就回来吧。”

秦基伟的回答更让迟浩田忐忑不安。这一夜,他脑海里“翻江倒海”,1973年底,《解放军报》的一幕,让他再也无法入眠。

1971年3月,迟浩田任解放军报社核心领导小组成员。1973年底,他调北京军区任副政委不到两个月,又被揪回军报,被批斗长达两年之久。这次回去,是不是还要回军报接受批斗?真是心有余悸呀!

第二天早上,到机场送行的人个个心情沉重,沉默寡言,告别的话都是一样的:“老迟,你这次回去吉凶难卜,望多保重!”那情景就像生离死别,仿佛这一去再也回不来了。

到了北京,来机场接迟浩田的是一辆黑色轿车。来人让迟浩田的警卫员和秘书回原单位,“不要跟着首长了”。秘书和警卫员心里

打鼓。

黑色轿车一直驶进了中南海。此时，迟浩田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一个白发苍苍、腰板挺直的长者迎上前来，高声问道：“你是迟浩田同志吗？”

迟浩田回答说：“是。”

他觉得曾在某个场合见过这位长者。认出来了，这是新中国第一位“将军大使”耿飚。

这时，耿飚伸开双臂欢迎迟浩田，并大声说：“告诉你个好消息，‘四人帮’被我们抓起来了。”

尽管迟浩田很不习惯这种外交礼仪方式，但他也毫不犹豫地伸开双臂，与耿飚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迟浩田看了看会议室，在座的还有担任过教育部长的刘西尧和北京日报社社长孙轶青。

大家坐定以后，耿飚简单地向他们通报了粉碎“四人帮”的过程，迟浩田和在场的人一起露出喜悦的笑容。

这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纪登奎走进会议室。他一边同迟浩田握手，一边说：“这次叫你来，是想给你个任务。”稍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上次你在军报，落了个‘复辟’罪名，把你搞得很苦，那是‘四人帮’搞的。这次中央让你到《人民日报》去，再搞一次‘复辟’，把权从‘四人帮’的手中夺回来。我们研究了一下，觉得你有工作经验，是最合适的人选。你愿不愿意去啊？”

迟浩田听了以后，不由自主地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纪登奎接着宣布：“中央决定由耿飚同志牵头，主管宣传口。你们研究研究吧，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说完就匆匆离去。

时间紧急，千头万绪。耿飚对到会的几位同志说：“我们分分工吧。我到新华社，刘西尧到《光明日报》，浩田同志，你和孙轶青到《人民日报》去，你在《解放军报》干过，有经验了。究竟怎么办，大家先研究研究。”

迟浩田考虑到“四人帮”被抓尚处于保密阶段，建议兵贵神速，马上进驻。他建议由中央组织部写一封介绍迟浩田等人到人民日报社工作的公函，由人民日报社的负责人鲁瑛来接他们去。

耿飚当即表示同意，说：“事不宜迟，马上通知鲁瑛来。”说着，他就用红机子通知鲁瑛，要他马上到中南海开会。

鲁瑛，原是上海《解放日报》的一名中层干部，用张春桥的话说：“能力很弱”。但是，作为1966年陈伯达进驻《人民日报》的工作组成员之一，他也是工作组中唯一留在《人民日报》掌权至今的人。文革中《人民日报》只有临时领导班子，直到1975年《人民日报》才正式设立了核心小组和宣传小组，两个组长都是鲁瑛，集党务、编务于一身。鲁瑛在《人民日报》长达10年零9个月，是历任《人民日报》总编辑中任期最长的。

过了一会儿，鲁瑛坐着红旗轿车来到中南海，以为是来接受管宣传口的张春桥、姚文元的指示。可是到会议室，并不见张、姚二人的身影，却见一个魁梧的中年军人站在面前。

毫无思想准备的鲁瑛看了这位军人一眼，就坐下了，翘起二郎腿，等候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到来。

这位军人就是迟浩田。这时，他用平缓的口气问道：“你是鲁瑛吗？”

鲁瑛答道：“是。”说着，抬头看了看迟浩田。

迟浩田很严肃地说：“我受中央委托和你谈话，请你先看看这封信。”说着，将中央组织部的介绍信放到鲁瑛面前。

鲁瑛满不在乎地把信展开，看着看着，脸上的肌肉开始抽搐，二郎腿放下了，背也不靠在椅子上了，神态来了180度急转弯。

中央那封信上是这样写的：

鲁瑛同志：

为了加强人民日报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迟浩田、孙轶青、郗汉生三同志参加你们核心组的领导，有重要事情向他们报告。

致敬礼！

中共中央组织部

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

鲁瑛注意到，信上，有这样的批示：

同意，请中组部办。

华国锋

十月七日

只有主持中央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的批示，没有负责宣传工作领导人的批示，鲁瑛似乎意识到什么。

接着，迟浩田严肃地对他宣布了三点：

一、中央决定，过去管《人民日报》的那几个人已经倒台了，从现在起不能再领导《人民日报》了；

二、我们受中央委托到《人民日报》工作，在宣传、版面上要请示我们，不得擅自作主；

三、你要服从中央的命令，听从中央的指挥，不能搞小动作，不能泄露机密。在关键时刻你要接受考验。

迟浩田最后说：“一会儿我们坐你的车走，去报社召开领导成员会议，宣布中央的决定。”

交待完后，迟浩田等3人便坐上鲁瑛的车子，于19时50分，和鲁瑛一同来到位于王府井的《人民日报》办公楼。

迟浩田让鲁瑛在20分钟内把报社核心小组成员召集到二楼会议室开会。

报社核心组成员，除挂名的王洪文秘书肖木之外，全部悉数到会。他们对事先没有通知，深更半夜召来开会自然是满腹牢骚。但一进入会议室，看到有几个生人，其中还有军人在座，立刻意识到出事了。大家面面相觑。

鲁瑛未作任何介绍便说：“现在请迟政委作指示！”

迟浩田对鲁瑛说：“你先念念中央通知吧！”

鲁瑛接过信，站起来开始念中央组织部的介绍信和华国锋的批示。到会者听了甚为震惊，会议室里陡然呈现严肃气氛。

迟浩田一面让鲁瑛给大家念中央的通知，一面观察在座人员神色。等鲁瑛念完后，迟浩田站起来，开门见山地说道：

“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过去经常插手《人民日报》的那几个人，现在不行了。《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从现在起要听党中央的。这是第一点。第二，我们到《人民日报》社工作，愿意和大家通力合作，把《人民日报》办好。希望大家同心协力，把应该干的工作干好，让党中央放心，让全国人民放心。第三，在关键时刻，每个同志都在经

受考验，在座的有人可能会不高兴，感到突然，这也不奇怪。不过，谁唱反调，谁逆历史潮流而动，谁就没有好下场。”

迟浩田要求到会的核心组成员表态。与会者简单地说了“听党中央的，按中央指示办”之类套话后，迟浩田对到会的人规定了三条纪律：“一、要严守机密。中央未公布之前，报社不要乱传乱讲，任何泄密行为都是党纪国法所不容许的。二、要坚守岗位，坚持正常出报。为便于工作，暂不公开身份，一切照常进行。”

散会后，迟浩田3人立即掌控了报社与中央联系的保密电话——“红机子”。报社的人说：“谁掌握了‘红机子’，谁就掌握了领导权。”鲁瑛失去了“红机子”，也就不能同中央联系了，什么事都得通过迟浩田等3人。

迟浩田3人当天夜里就睡在报社的办公室里。

第二天早上，人民日报社机关食堂里，前来用早餐的职工交头接耳，谈论一件秘闻：“报社昨天晚上又来了新的军代表！”

“嗨，这有什么稀奇！‘文革’以来，军代表来过几拨了。”传者有心，听者无意，表现的若无其事。

是啊，自文革开始，1966年6月，陈伯达带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以当时的《解放军报》总编辑唐平铸为主。后来，唐平铸被揪回军报，上面又派来一个以总政宣传部钱抵千部长为首的“记者团”。不知什么时候，这个“记者团”也无声无息地离开了报社，《人民日报》由造反派掌权。由于两派矛盾，上面又派38军的一个师政委崔金耀，带着一批连排级干部来“支左”至今。所以报社对来了“工作组”这类传言，很多人并不放在心上。何况，报社“通天”人物多得很，有些人自然把来人不当回事。

这一回可不同寻常。来接管报社的迟浩田是一位著名的战斗英雄、北京军区副政委。他一来，38军崔金耀带的那拨人，根据上级的指示，无声无息撤了。

迟浩田他们进驻报社后，源源不断地向中央发去《简报》：

《第一号简报》（10月7日晚上）：“中央：今晚七时五十分，我们由鲁瑛陪同进驻人民日报社。由鲁瑛召集报社在京的核心组成员九人开会，宣读了华国锋同志批示的中央组织部通知……”

《第二号简报》(10月8日上午)：“今天上午在不到一个小时内，他们那一帮子人两次给鲁瑛来电话，打探消息，进行串联。上午九时四十分，文化部于会泳给鲁瑛来电话，说他原来准备去阿尔巴尼亚访问，突然又不叫去了，问鲁瑛有什么情况？十时三十分，上海徐景贤给鲁瑛来电话说，昨天凌晨，马天水、周纯麟以及邻近省的领导同志到北京开会，他们走后，联系不上。徐与春桥、文元的秘书也联系不上。他们心里很纳闷，向鲁打听有什么情况没有？”

第1418回：国务院，派上海八人小组 消息传，招待所白酒售罄

是啊，上海这边也很着急呀。10月8日清早，张春桥前妻李文静给王秀珍打来电话，说张春桥的儿子原定10月8日上北京，结果李文静给张春桥打了一夜电话都没有打通，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

王秀珍闻言，亲自给王洪文打电话，就是打不通……

于是，王秀珍和徐景贤将上海市委常委、市革会副主任王少庸、冯国柱和市委常委张敬标都叫到康平路小礼堂商量，还将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以及肖木也都叫来。

廖祖康是回上海结婚的，还在蜜月中。

大家分头用各种电话号码，通过各种渠道，向北京打电话，包括8341部队值班室，姚文元的妻子、秘书，甚至王洪文的警卫员、司机、服务员，等等。但是都打不通。

廖祖康说：“情况反常！”

.....

正在这时，徐景贤突然拨通了《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的电话。大家一阵兴奋。

可是，当徐景贤刚要问情况时，鲁瑛的声音却有些反常，没说两句，就急忙把电话挂上了。

耳机里响起一片忙音，这给上海这边在场的所有人，兴奋之后又是当头一盆冷水。

肖木马上说：“坏了，鲁瑛肯定给监视起来了！”

此时，市委常委张敬标通过上海警备区接通了北京京西宾馆，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房佐庭说会议不准往外打电话，马天水的身体不好，他自己的“胃病”也发作了，动不了了。

廖祖康抢过电话大声地问：“你们到机场时谁去接的？”

房佐庭回答说：“是穿军装的人接的。”

廖祖康又问：“有没有见到中央办公厅的人？”

房佐庭回答说：“没有。”

廖祖康接着问：“你那里不准往外打电话是谁通知你的？”

房佐庭回答说：“是我问别的省的。”

最后，房佐庭又一次告诉廖祖康，说自己的“胃病”发作了。

放下电话，廖祖康问王秀珍：“老房有胃病吗？”

王秀珍答：“没有听说过。”

廖祖康说：“这就怪了。那他说‘胃病’又犯了是什么意思呢？”

这时，上海警备区作战处向上海市委报告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指示：

军委首长指示，部队战备工作转入正常后，发现有的单位有点松懈，请检查一下。战备工作不能放松，仍应提高警惕，注意敌情，边防（沿海）防止内遣外逃。

大家读了军委的电话记录后议论纷纷。

徐景贤说：“毛主席逝世之后，一号战备命令刚刚通知撤销，怎么现在中央又通知加强战备呢？而且这个通知里面还特别提到要防止内潜外逃，看来是有什么人出了事情。”

廖祖康接着说：“在北京的几个老帅，像叶帅、徐帅他们还是很有号召力的。”

说到这里，廖祖康便不再说下去了，屋子里的空气仿佛一下子凝固了，大家面面相觑，廖祖康后面未说出的话大家都明白，意思是几个老帅可能已经对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他们下手了，他们还没有想到江青也同时遭到这样的下场。

徐景贤当即说：“极可能发生军事政变！”

王秀珍接着说：“老帅动手了，右派上台了。”

王秀珍首先提出，下午她要找市民兵指挥部的几个负责人“打招呼”。

接着，王少庸提出，他在下午要找公安局的负责人“打招呼”。

负责分管宣传和新闻媒体的徐景贤也提出，他在下午要找广播电台和报社的新闻界负责人“吹吹风”。

这时，上海警备区又来通知说，总政原定在上海召开的全军图书

阅读现场会议不开了。

接着,徐景贤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负责人那里获知:“中央台通知停播《按既定方针办》等两首歌。”

上午,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通过北京熟人,也终于在京西宾馆找到房佐庭。房佐庭说:“马老正感冒,在洗澡。”

徐景贤再次拿起话筒,重新拨通了房佐庭的电话,声称一定要“马老”亲自接电话。

房佐庭回答:“马老不能听电话。”说完之后,他又说了一句:“我的老‘胃病’又犯了。”

房佐庭反复说他的老“胃病”又犯了,使徐景贤等人心中十分不安,可是又实在无法摸到准确情况。

而此时北京,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正组织一个“八人小组”准备派往上海。

10月7日晚,国家计委副主任袁宝华给秘书王守家打电话,让他第二天上班时先到袁宝华的办公室来一下。

10月8日上午8时,王守家一进计委大楼就直接来到袁宝华的办公室,看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也在屋里,不免心中一惊,不知是什么事情。

很快,袁宝华的办公室又进来7人,都是王守家熟悉的。他们是:

徐良图,国家计委生产组副组长,负责北煤南运、南粮北调和海运石油,自封为“救火队”队长。

李景昭,国家建委核心小组成员。

周力,物资部调度局局长。

曹大澄,国家建委办公厅原副主任,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运输处处长,历届计划会议、经济工作务虚会简报组组长。

干志坚,国家计委干部,石油钻探钻头工程师,地下钻管、钻头专家。

王德瑛,国家建委燃料动力局负责人。

陈斐章,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负责人。

这时,谷牧向他们宣布:“昨天,党中央采取断然措施,把祸国殃民的四个大坏蛋抓起来了!把‘四人帮’抓起来了!”

原来，7日上午，谷牧到玉泉山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知道了这个消息。这时，他仍然沿用玉泉山会议宣布的“昨天”。

在场的人先是愣了一下，接着使劲鼓掌，叫好。

谷牧等大家安静下来后，继续说：“上海是‘四人帮’长期把持的地方，现在我们对上海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所以派你们八个人先去上海，执行秘密任务：了解上海深层情况，帮派的动态，每天把上海的情况告诉北京。你们到上海以后，先做秘密串联工作，通过熟人、亲戚、朋友了解上海动态。你们要做好经受残酷考验的准备。这件事要高度保密，不许对任何人讲，甚至对老婆也不能讲，只能说到上海出差。你们向外公开的任务是了解上海生产情况，了解计划完成情况。”

他宣布，派遣小组的名义是“抓革命促生产建设调研和督促组”，组长徐良图。

谷牧对曹大澄说：“你到了上海去找王一平同志。”

曹大澄、李景昭、王德瑛这3位国家建委的人是谷牧提名的。国家计委的徐良图、干志坚、陈斐章、王守家4人和物资部的周力是袁宝华提名的。当时，各省区市的计委（上海称计划组）、经委（上海市称工交组）、建委和物资系统对这8个管业务的干部都很熟悉。每年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都是这8个人和各省区市打交道，平时也经常联系，所以他们到上海出差，别人都会相信是真来抓计划、生产、建设业务工作的，不会怀疑另有秘密使命。

王守家在派遣小组中负责总务工作。徐良图要王守家立即到计委接待处订8张飞机票，越快越好。

王守家当即请计委接待室订妥次日晨第一班飞机票。订好票后，王守家立刻给上海市工交组值班室打电话，告诉接电话的人：“明天我们8个人到上海出差。7点4分起飞，8点半到上海。请你们到飞机场接机，并安排住宿。”

谷牧为什么派曹大澄去找王一平“接头”呢？王一平和谷牧本是山东荣成同乡，青少年时代同学，1931年两人同时参加革命。王一平1935年底组织胶东起义失败后，到北平找谷牧接上组织关系，当晚住在西城辟才胡同谷牧租的公寓。1936年4月30日深夜，两人同时被宋哲元的军警督察处逮捕，关押在府右街军警督察处看守所。出狱

后，两人一起到东北军学兵团。抗日战争时期，两人同在山东根据地。新中国成立后，同在上海市委工作。1955年，谷牧调国务院任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兼建委副主任。建委撤销后，谷牧任经委副主任。王一平在上海市委做组织工作，后任书记处书记，文革开始后就靠边站了，以后又被结合到上海市革委会，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

王一平和曹大澄都爱好书画。每逢王一平到北京办事，必邀曹大澄陪同去拜访黄胄、吴作人、李可染、李苦禅等老画家，因而王一平、曹大澄成为书画朋友。谷牧要曹大澄到上海先找王一平，就是私下以书画往来，掩护此行的秘密活动。

曹大澄想，这次到上海既然以画会友为掩护，就要带上一幅画才好。晚上，他和夫人一起来到黄胄家。

黄胄已通过其他渠道，知道了“四人帮”被抓的消息。曹大澄一进黄胄家就看见画案上摆着几幅画，上面画有四只螃蟹，有的题诗句：“蟹肥酒香秋光好，看尔横行到几时。”有的题诗句：“人心大快喜若狂，除尽四害共举觞，神州欢呼新胜利，莺歌燕舞菊花香。”

曹大澄说明来意后，黄胄非常爽快地将案子上的一幅《四蟹图》卷起来交给他，说：“你给他带去，保你平安。”

也是在10月8日上午，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在玉泉山五号楼会议厅接见了靠近上海的江苏、浙江两省党、政、军一把手，着重同他们研究了稳定本省局势和上海问题。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独自受命后匆匆飞回南京。

华国锋让苏振华和倪志福去做做马天水的工作。 he觉得东海舰队驻在上海，苏振华是海军政委，可以指挥东海舰队，不怕上海闹事。而倪志福祖籍是上海人，又是工人、劳动模范，在上海有一定的影响。

8日下午，苏振华、倪志福来到京西宾馆，先到周纯麟的房间，向他了解马天水的情况。

周纯麟说：“马天水情绪不好，一上午没有起床。他坚持说材料不真实，说服力不强，还自言自语道：‘看样子我是回不去了。’”

周纯麟又把昨晚在车上的话说了一遍。他们3人仔细商量后，一起来到马天水的房间。

马天水仍转不过弯来，向他们提出要见“四位领导”。

苏振华严肃地说：“马天水同志，你在‘四人帮’的泥潭中陷得太深了！现在你必须转变立场，不然你将犯更大的错误，甚至犯罪！希望你能猛省。”

谈话后，苏振华、倪志福、周纯麟又在一起商量。周纯麟提出：马天水虽是上海的总管，现在他乱了套，不如让徐景贤、王秀珍来京解决问题。苏振华、倪志福同意周纯麟的建议。

当天晚上，回到南京的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召集南京军区各军、师的负责人开会，对上海周边的军队再次进行了认真的布防，防止上海出现突发事件，确保上海和整个华东地区的局势得到稳定。

8日，中央向党内高级领导干部发出“打招呼”的15号文件：《中央关于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通知》。同日，中央做出建立毛主席纪念堂、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及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并下达了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文件；还发出两条指示：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电话通知和广播电台停播《按既定方针办》等两首歌。

8日这天，“四人帮”被捕的消息传到驻北京的部队，招待所的酒顿时销售一空。

茅盾是8日从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工作的儿子韦韬那里听说“四人帮”被抓的消息。韦韬也是偶然知道的。早晨，他在动物园附近等班车，遇到一位同校的熟人，她父亲是军队高干。她悄悄地对韦韬说：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四人帮’被抓起来了！”

“你说什么？”韦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千真万确，都抓起来了，是在前天夜里。”

“消息真的可靠吗？”

“绝对可靠，是我爸爸亲口说的。毛远新也被抓起来了！”

韦韬回到家就把这个“特大喜讯”告诉了家人：“‘四人帮’已经抓起来了！他们完蛋了！”

《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张光年也是在这天知道的，但他不敢相信：“8日下午，老友李孔嘉同志来报喜，连说‘三个公的一个母的都抓住了’。我心知其意，心想哪有这样‘全捉’的好事，不敢插嘴。当晚，史会同志来报喜，坐下只是笑，未明说，以为我已知晓。”

82岁的叶圣陶只在日记上略略写道：“临睡时听到可惊消息，今暂不记之。”

武汉。10月8日，黄昏时分，周而复正在修改《上海的早晨》，王淑耘闯进来，迫不及待地说：“‘四人帮’给抓起来了！”又说：“中央昨天找到少数省市委负责同志到北京，开了‘打招呼’会议，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去了，湖北省委书记也去了。叶剑英在会上宣布，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已经给抓了起来，没打一枪，没费一弹，就把反革命‘四人帮’粉碎了……”她接着说，湖北省委今天下午召开了紧急会议，厅局长一级干部参加，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好消息。周而复说：“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周而复回忆：“我向市中心方向走去，走到武汉市委附近的丁字形马路上，我看到一条从未见过的大标语：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革命‘四人帮’！标语吸引了如梭的行人，有的伫立注视，有一望而过，带着怀疑的心情蹒跚而去。”

第1419回：急筹划，调民兵加强战备 防政变，要准备武装暴动

10月8日下午，上海王秀珍让金祖敏秘书缪文金随下午宋庆龄副秘书长的专机回北京，去摸清情况，约定发生最严重情况时的暗号是：“心肌梗死。”

14时，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和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张宜爱被叫到康平路开紧急会议。徐景贤和王秀珍向他们打听和马天水一起去北京开会的周纯麟是否有消息来，他们都表示不知道。对军委的备战通知，他们也没有说出什么看法。王少庸问他们：

“警备区能调动多少人？”

张宜爱答：“警备区只有调动一个连的权限，一个营以上都要经过上级批准。”

15时，上海市委常委紧急“打招呼”会议在康平路召开，徐景贤主持。他说：

“给大家通一个气，马天水7日去北京开会，通不上消息，房佐庭打电话回来，说是老胃病发了，估计中央可能出事。”

16时，徐景贤在康平路召开报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单位负责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解放日报》社的王景，《文汇报》社的沈国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刘象贤，新华分社的徐寿铿。

徐景贤将于会泳突然不出国，《人民日报》鲁瑛接电话十分反常，在京的三位“首长”联系不上，房佐庭又在电话里总说他“老胃病发作”等情况向与会人员作了通报。

接着，他说：“中央电台通知停播的两首歌曲《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和《永远按既定方针办》，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苏修军队侵占捷克时，捷克国家电台有一名播音员听中央负责人的指挥，坚持广播了一天的抗议声明，根本不听苏军的。”

徐景贤布置了各新闻单位的保卫工作，指示要调集民兵来保卫。

并要求这些人发表什么东西，都要告诉市委，把上海的舆论牢牢地控制起来。

会议结束后，徐景贤又给浙江省委副书记罗毅，福建省委常委陈佳忠分别打了电话。王秀珍也给辽宁省委副书记魏秉奎打电话，要魏秉奎给当时在北京的毛远新那里打电话。但是，几经打探，依然未能获得一点可靠的消息。

17时，徐景贤在康平路常委学习室主持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让一些骨干分子列席，他们是：

嘉定县葛隆大队党支部书、市革会副主任、市郊区组负责人周丽琴；
上海先锋电机厂工人、市革会常委、团市委书记陈新发；
上海铁路局工人、市工交组负责人、市革会常委金传德；
市总工会的陈阿大和叶昌明；
上海市总工会常委、上海市妇联主任汪湘君；
上海豫园商场售货员、中共十届后补中委、市财贸组负责人陈佩珍；
上海海运局船员、中共十届后补中委、海运局党委负责人冯品德；
市委写作组的朱永嘉；
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肖木；
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等。

但是没有通知空四军政委武占魁和东海舰队副政委康庄。

会上，徐景贤说：“马老昨天接到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已去北京开会了。周司令也一起去的。我们想打电话问问几位领导，中央开什么会，但都找不到他们，一直到现在还没联系上。想找金祖敏问问，但全国总工会说找不到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徐景贤说的“几位领导”就是指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

王秀珍说：“马老接到中央通知后，我们想问问王洪文，是开什么会？要作些什么准备？就打电话给他的秘书孙兆良，但电话没接通。又打电话给张春桥的秘书，也说没人接电话。不但秘书没有，连其他人也一个没有。电话局说对方没人来接电话。又打到姚文元家里，也是无人接电话。”

徐景贤接着说：“我9月下旬到北京去时，曾问过春桥同志，中央

最近是否开三中全会？他说最近不会开什么会的。所以我们接到马、周去开会的通知后，感到奇怪，就想打电话问问看。但一直找不到他们人。我们猜想是否中央正在开什么重要会议，所以不接电话。于是找了何秀文来，让他往张、姚两位领导那里打电话，还是找不到人。又找了廖祖康来打电话，也还是找不到人。廖、何都找不到人，我们就感到情况不大正常了。”

廖祖康说：“我打了几次电话，长途台都说没人接。怕是那边长途台不接，又用微波电话直线打到王洪文那里，电话铃响的，但没人接，说明家里一个人也不在。要是中央开什么重要会议，也不会家里连一个服务员也没有的。这种情况是从来没有过的。过去不管中央开什么会，几个秘书还是能打电话进去的。”

徐景贤：“后来我们打电话给周宏宝、祝家耀，问他们中央有否开会，他们都说没听说中央要开会。又问他们是否知道中央通知开会的事，也说不知道。”

周宏宝时任国务院教育部领导，原是上海民兵指挥部负责人。

徐景贤又介绍了给《人民日报》鲁瑛打电话的情况，并说：“马老去开会时，我们说好的，他到京后就打电话来，告诉一下是什么事情。但去了后一直没电话来。要是他自己开会没空，房佐庭总可以打个电话的。我们就打电话到京西宾馆去找马老，但那边却回答马老没来过，大约是封锁不让打电话的。因缪文金在京西宾馆住过较长时间很熟悉，就叫他打电话去找。缪文金装作是在北京打的电话，终于问到了马老是在京西住的。但电话打到马房间，是房佐庭来接的电话，要他去叫马老来听电话，过一会却仍是房佐庭来说马老有事不能来听电话。我就问他，中央开的什么会？他说话吞吞吐吐的，不说开什么会。我估计他身边可能有人监视，不好说什么。我就问他：马老身体怎么样了？为什么不接电话？他说马老有些感冒了，后又说自己也老胃病复发。我记得房佐庭是没胃病的，怎么又说老胃病复发呢？就让人去问他爱人，说他是没有胃病的。看来房佐庭说‘老胃病复发’是暗示我们出事了。”

“这次接到中办电话后，市委办公室就打电话告诉周司令，周说他已经知道了，是中办直接通知他的。周说他身体不好，能否请假？中

办法说可带医生，一定要他去的。”

“我分析房佐庭说的‘老胃病复发’这句话，可能是指那些受到批判的老右们见毛主席逝世了，又在闹了。所以他说是‘复发’。现在可以肯定中央是出事情了，但究竟是什么事还不太清楚，我们已要缪文金马上回京去打听一下情况。”

王秀珍说：“今天正好有一架专机送宋庆龄来上海，就让缪文金搭这架专机回京。以往也有这种情况，和专机组一说就行了。但今天他去搭专机却不一样了。反复问了缪文金的身份，问清是金祖敏的秘书，又电话请示了，这才同意让他搭机。”

朱永嘉也说了上海市委写作组与《红旗》杂志编辑部通电话的情况。

徐景贤说：“我们商量后，感到这是大事情，有必要向常委会说一下，大家有个思想准备，但还没有确切的消息，大家不要到外面去传。我们还要千方百计的打电话去联系，了解情况。有什么新情况，我们会及时告诉大家的。”

王秀珍：“这几天大家待在机关里不要跑开，要是出去，要告诉机关里人在那里，要有事就能找到人的。”

因为叶昌明和汪湘君正在基层参加劳动，王秀珍对他们二人说：“你们的劳动暂停一下，先回机关去。”

散会后，徐景贤回家吃饭。朱永嘉、王知常等4人又跑到徐景贤的家里商量怎么办？

徐景贤说：“我下午已经找报社、电台的人谈过了。国务院有几位部长在上海，今晚上看戏，我到剧场露露面，同时摸摸情况。你们到学习室等我，我一会儿回来再谈。”

晚上19时30分左右，徐景贤在剧场看演出时，接到文化部负责人刘庆棠打来的电话，说他们给钓鱼台江青住的那个楼打通了电话，是一个服务员接的，“说首长身体好，现在不在家”。徐景贤找个借口离开剧场，急忙赶回康平路。这时学习室里已挤满了人，气氛很紧张。

还未等徐景贤说话，警卫处的康宁一就急忙向他报告，说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从北京打来电话报告：“我娘心肌梗死。”这是他与王秀珍约定的北京发生了最严重情况的暗语。徐景贤顿时大惊。

廖祖康拿过电话，亲自给江青住的那个楼打电话，不通。接着他又给刘庆棠、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处打电话，仍然不通，屋子里顿时乱成一团。

徐景贤的秘书张家龙接通了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原上海警备区副政委徐海涛家的电话，是徐海涛妻子接的。

张家龙说：“徐景贤同志要和徐部长讲话。”

徐海涛的妻子在电话里慌张地说：“他不在，去办公室了，不要再打电话了。”

徐景贤听了秘书的通话情况汇报后，猜测徐海涛也可能被抓起来了。

屋子里再次出现混乱。

21时左右，警卫处康宁一接到公安部祝家耀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说：缪文金19时的那个电话就是在他那里打的，缪文金到京西宾馆去过，看样子是“人员集中了，门上加锁了，不好动了”。

康宁一又打电话，总算找到缪文金。缪文金说：“现在情况不明，还在诊断中，待诊断明确之后再告诉你们。”

紧接着电话铃又一阵急响，张家龙拿起话筒，是文化部刘庆棠打来的。他在电话里说：“马老不能接电话，我们文化部的几个人也都‘病’了。”

肖木听后立刻惊叫起来：“不好了，对文化部动手了，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

他这么一叫，整个学习室里顿时又是一片混乱。

面对如此局面，徐景贤立刻制止，大声宣布：“谁也不能再往外打电话了。”

他立即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市委书记王秀珍、市委常委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还有朱永嘉、何秀文、肖木、廖祖康、康宁一等人。

此时的徐景贤想起几天前，肖木说的张春桥的那段话：“上海要有大考验，要打仗。”他还想起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过去说过的关于军队的一些话：张春桥说军队靠不住，姚文元说军队都是支持保守派的，王洪文说“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他想：“现在军队也许已经把枪口对准了张春桥他们了”，“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于是他问大家：

“下一步怎么办？”

平时话不多的朱永嘉，这时直截了当地说道：“我看这次是华国锋和汪东兴两个结合，除了他俩，其他人是搞不起来的。”

接着，了解中南海保卫情况的廖祖康说，他同意朱永嘉的看法，并说：“8341部队是很厉害的，都听汪主任的，没有汪主任的指挥，一下子搞掉几个人是不可能的。”

朱永嘉接着又说：“他们先抓一个，然后再宣布一个决定，说这个人反党。这种手法，古今中外用得多了。我们要干，应该把民兵拉出来打，打它一个礼拜不行，打它三天五天也好，让全世界都知道，就像巴黎公社一样。”

朱永嘉出语惊人，没人敢回应，一片沉默。之前徐景贤、王秀珍检查民兵的战备部署，还是以落实中央军委的电话战备通知为理由。而朱永嘉的这个建议，则是要拉出民兵，举行起义。

稍后，王秀珍说：“我白天已经同民兵指挥部的几个负责人谈过了，现在我们有带枪的民兵2500人，已在各工厂集中，可以随时拉出来。还有31000人分散待命。”

王秀珍接着说，她已经给民兵指挥部的施尚英打了招呼。

分管公安工作的王少庸是老干部，过去是打过仗的，见徐景贤、王秀珍这几个从未上过战场的人都很自信，就出谋说：“光靠民兵不行，起码要有部队一个团的兵力才能形成一个拳头。”

廖祖康说：“那就把警备区的几个负责人带在我们身边。因为靠我们去调动部队是调不动的，只有通过他们下命令才能调动部队。”

接着，廖祖康提出要“带在我们身边”的人选，他们是：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员张宜爱，警备师师长李仁斋。

冯国柱又补充了一个：“把杨副司令员也叫来，他熟悉作战。”

于是，市委办公室通知这几个上海警备区的领导过来。

廖祖康又提出，将上海市总工会的陈阿大、戴立清、黄金海、马振龙、叶昌明都找来，这样可以调动工人队伍。

朱永嘉表示支持，大家也觉得廖祖康的这个办法很好。

大家又议论说，应该撤出康平路大院，将人员分散在两个地方，以免被一网打尽。于是，决定将人员分作两处，设立两个指挥点：

一号指挥点由徐景贤带领,负责抓整个武装抗争的总指挥和舆论准备,最后行动的命令由徐景贤这里发布,地点设在华山路丁香花园。

二号指挥点由王秀珍带领,负责民兵和部队的军事行动指挥,地点定在市民兵指挥部。

确定了指挥点以及分工以后,徐景贤当场执笔开列了一份进入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名单。

一号指挥点名单有:徐景贤、市委常委王少庸、张敬标、警备区副司令张宜爱、警备师师长李仁斋及朱永嘉等人;

二号指挥点的人员名单有:王秀珍、市委常委冯国柱、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杨新亚、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市委警卫处处长康宁一等人。

徐景贤当场宣读了这份名单,大家一致表示同意。

这时,张敬标提出他留守康平路机关,朱永嘉也提出他去陕西北路写作组经济组找几个人,准备舆论,徐景贤同意了。

徐景贤和冯国柱、张敬标商量后,当场宣布几项决定:

一、现在开始作武装暴动的准备;

二、为了防止意外,我和王秀珍分住二地:王秀珍与冯国柱去民兵指挥部,我和王少庸去丁香花园;

三、部队方面要做一点工作;

四、张敬标仍留在办公室值班。

徐景贤又按照王秀珍提供的民兵数字和情况,亲笔写下了:

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3500人集中,31000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

然后交给了王秀珍。

散会后,朱永嘉首先到《文汇报》,告诉报社的领导,中央可能出事了,可以在个别骨干中打个招呼。然后回写作组,立即召集王知常等人,告诉他们:“中央那几位看样出事了,”“民兵已作了布置,工字头已进行动员”,“张、姚培养了我们十年,总得报答他们。我是准备杀头坐牢也要下决心干。”

他说:“他们倒了,我们也完了。”朱永嘉要立即行动,发表宣言,“明天就在报纸上拉横幅标语,‘坚决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王知常立即表态：“市委决定干，我立即起草。”他马上拟出四个口号：

“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还我江青！”

朱永嘉又布置：“找出一批《毛主席语录》，要有针对性；搞一个赫鲁晓夫上台的资料，明天见报。”

于是王知常又当即拟出几条毛主席语录：“三要三不要”，“右派上台都是短命的”，“按既定方针办”，等等；又从《国际问题资料》中找出《赫鲁晓夫上台前前后后》一文，准备摘引。

接着，朱永嘉驱车赶到《解放日报》和广播电台分别打招呼，告诉他们，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可能出事了，如果市委决定，不发中央的消息，只发自己上海的消息，行吗？并要他们在少数骨干中个别打招呼。

晚 22 时，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忙完正在召开的警备区党委扩大会的简报审稿，回到宿舍，看到上海民兵指挥部施尚英和钟定栋已经等候多时。他们一起商量如何贯彻中央军委电话记录所要求的加强战备布置。商定：动用兵力按 9 月 23 日上海市委批准同意（按防震和 9.9 备战期间减少三分之二）的方案，第一批 25000 人，每区动用 10 辆摩托车；第二批 11000 人左右。指挥点放到基层单位，准备两个指挥点，江南造船厂作为一个点，已经确定下来了；东面准备搞个点，是否放到国棉 17 厂，还要研究一下。点上设电台。

研究后，施尚英打电话向王秀珍汇报，王秀珍要他们马上回民兵指挥部。施尚英、钟定栋、李彬山等于是都去了上海市民兵指挥部。

第 1420 回：十月九，中央播《两项决定》 打招呼，上海市紧急部署

就在上海召开常委扩大会的同时，10月8日下午17时，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中央政治局委员继续召集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湖北等省市和南京、济南、武汉三个军区的负责人在玉泉山五号楼开会。华国锋、叶剑英等向大家介绍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和“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情况。大家纷纷表示拥护中央的决策。

江苏、山东、湖北等省和南京军区、济南军区、武汉军区的人发言，纷纷对“四人帮”进行揭发和声讨，只有上海的马天水情绪消沉，不讲话。

最后，马天水神情紧张，脸涨得通红，不得不讲了几句拥护之类的话。紧接着，他就说个“但是”：“建议党中央正确处理和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张春桥在‘一月风暴’、‘大联合’中是有影响的人物，中央要慎重对待。”他不停地问：“这‘四位领导’，是不是篡党夺权，是不是一定要用抓起来隔离审查的办法，应该给四个人考虑的时间。中央是不是再给一些材料看看？”他还提出两个要求：一是让他再见见他们；二是希望中央对他们宽大处理，处理时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马天水的发言自然受到了其他人的批评，周纯麟也对他进行了劝告。

10月9日0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中共中央在10月8日做出的两项决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共同作出两项决定：《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

当天，中央各报及各地报纸，包括上海，都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条新闻。

也是在10月9日0时，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张宜爱和警备师师长李仁斋来到徐景贤和王少庸这里。此时，正好中央人民电台广播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两个决定，徐景贤觉得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与张春桥9月21日和他的谈话精神不符，当时张春桥是这样对他说的：

“考虑不准备分别出五卷、六卷，准备先把有主席手稿的，经主席审定过的文章先合成一册出版，免得五、六卷如何分期引起争论，同时，其他文章一时也审定不了。”

徐景贤据此认为，这个决定是在没有张春桥参加的情况下作出的。

王少庸问李仁斋：“究竟有多少部队？”

李仁斋答：“警备师大都是分散值班的，多的一个连，少的一个班。”

王少庸又问：“能拉出多少人？”

李仁斋回答：“最多是一个营，另外就是康平路附近的一两个连。”

王少庸问：“能调得动部队吗？”

李仁斋答：“调不动。”

朱永嘉回到康平路时，也听到了中央两个决定的新闻广播。他对留在这里的张敬标说：

“中央两个文件说出《毛泽东选集》，建毛主席纪念堂，是抓旗帜。看来中央确实出事了。我们要赶紧行动，要不然就晚了。要马上控制新闻、广播和交通、码头、车站，并发布告人民书，”这样“行动起来后，对我们有利，逼得他们不得不放人，”而且“对他们在中央的斗争也是个支持。”

朱永嘉打电话到丁香花园找徐景贤，要徐景贤布置9日的上海报纸不要转载中央的两个决定，张敬标也打去电话表示赞成朱永嘉的建议。但这两个电话徐景贤的秘书张家龙因为徐景贤已经睡觉，没有叫醒徐景贤接电话。

也是在10月9日0时左右，王秀珍、冯国柱、廖祖康、汪湘君等来

到上海市民兵指挥部。她让廖祖康打电话通知市总工会常委陈阿大、叶昌明、沈涵、黄金海、马振龙、王明龙过来。这些人除了文革前任市总工会副主任的沈涵是老干部，其他都是工人造反派的骨干。

王秀珍在市总工会的人到来之前，满脸愠容，环视了在场的人后，用压低了的声音说：“看来中央可能发生了右派政变，可能马天水以及上海去中央工作的几个领导同志都被抓起来了。我们要与他们对着干，血战到底。我们的民兵即使打两三天也好。枪声一响，全国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这几天康平路不能待了，否则一网打尽。”

她又说：“上海是一月革命的发源地，我们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血肉相联，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我们要对着干，就是死了，也要教育后代，让全国知道。”

在场的人都惊呆了。

王秀珍按照上海警备区抄报上海市委的那个电话记录的口径部署了战备，市公安局的薛干青做了记录：

8号

市委检查了发现有的单位战备有些松，战备工作不能放松，应提高警惕，注意敌情，注意空投、空飘、海漂，防止国内外阶级敌人突然袭击，检查我们战备工作有无松。

施尚英向王秀珍和冯国柱汇报了与李彬山商定的战备方案。王秀珍听后基本同意。只是对选择上棉17厂或上棉31厂作指挥点，认为太远，而且目标太大，要施尚英等从杨浦区另找一个工厂。

王秀珍将徐景贤写的那张纸条，交施尚英和钟定栋等人看，要求民兵指挥部夜里集中值班，加强对报社和电台的保卫。

廖祖康提到福州路和汾阳路两处的电话分局起着枢纽作用，特别重要。

冯国柱随即问在一旁的警备区副司令员杨新亚，市内电话局有没有警卫部队，杨新亚说没有。王秀珍即要求派民兵去警卫。

李彬山提出要加强对电台的保卫，“防止有人到电台乱说一通”。于是决定由上海警备区的警备师政治部副主任、时任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党委书记刘象贤，负责指挥警卫电台的部队。

冯国柱又问外区部队到上海需要什么手续，杨新亚答，外区部队

要越过防区，不经军委批准不行。

冯国柱又问警备区有没有机动分队？杨新亚回答说，市区只有一个连和摩托营。王秀珍要求尽快做准备。

冯国柱和王秀珍还问江苏和浙江的部队有什么消息？杨新亚答说没什么消息，“这次在杭州开会时，听说驻杭州的部队要到乍浦地区野营，驻苏州的部队要到昆山、太仓地区野营。”

当总工会的陈阿大等6人来到上海市民兵指挥部时，只见王秀珍、汪湘君、李彬山、杨新亚、施尚英、吴立义、钟定栋、廖祖康等人正在交谈。王秀珍、廖祖康见总工会的一干人到来，就出来将他们和民兵指挥部的施尚英、吴立义、钟定栋等人带到另一间屋里。

王秀珍对他们说：“中央出大事了，市委研究后认为有必要告诉大家一下。我和徐景贤兵分二路，他和王少庸在另外地方找文教口的人谈，我和冯国柱到这里找工会和民兵的头谈。”

接着，她将中央通知马天水、周纯麟去开会和一些反常的情况又说了一遍，廖祖康做了补充。陈阿大也说：“外经部长方毅正在上海，突然接到北京电话，说他家属病了，要他马上回京，他已经赶回去了。看来不会真是家属生病，而是和这件事是有些联系的。”

王秀珍说：“毛主席一直教导我们，要警惕修正主义，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就要起来造反，文革就是为了反修防修的。现在毛主席才去世不久，他们就搞政变了，就像赫鲁晓夫一样。我们要跟修正主义对着干，要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文革的胜利成果！”

她还说：“上海工人阶级是富有革命传统的，是毛主席肯定和支持的，我们现在就是要和他们对着干，不能当投降派，做王连举！”

大家纷纷表示赞同。

黄金海说：“很清楚，这是对着文革来的。主席在，他们不敢反文革，主席一死，机会到了，他们就迫不及待。我们要对着干，唤起工农千百万。”他对市民兵指挥部的人要求：“发枪吧，我们和你们一起干！”

王秀珍要求：“给总工会的头头打个招呼，要总工会贴大标语，组织工人罢工，发动群众！”

廖祖康说：“宪法上为什么要写罢工，毛主席说过的就是为了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

陈阿大挥舞着拳头说：“要大干，马上干！吴淞口只要沉一条万吨轮，就能把航道堵住。去几辆大卡车到机场，把钢锭甩在跑道上，就能把机场封住。”

黄金海提醒道：“最重要的是粮食！必要时可以动用金库去买粮食，万不得已可以到江苏去抢！”

戴立清说：“把民兵拉出来干。失败了，历史上会记上我们的功绩的！”

马振龙发出了同样的吼声：“我们要对着干。大不了完蛋，大不了掉脑袋！”

冯国柱走了进来，对王秀珍说：“我已和他们谈好了，他们要回去休息，问你还有什么事？”

冯国柱说的“他们”是指上海警备区的李彬山、杨新亚。王秀珍说：“没有事了，让他们回去吧。”

廖祖康说：“不能让他们回去，要叫他们睡在这里。把他们拖在身边，有事时，你市委下命令，还不如由他们打个电话快。”

王秀珍让施尚英在民兵指挥部给警备区的领导安排住处。

王秀珍又说道：“打电话找马老，一直没来接过电话，很可能不让他回来了，周司令可能会回来。”

廖祖康说：“他肯定能回来的，而且可能是中央派他来抓我们的。”

冯国柱说：“要是周司令回来是来抓我们的，那他回来时就不会告诉我们的，可能一回来就跑到天马山指挥部来搞我们。”

廖祖康对王秀珍说：“应告诉民航一下，要是周司令回来，或有中央专机来，要马上报告市委。不要人已回来了，我们还不知道。也要告诉铁路一下，可能会坐火车来的。”

王秀珍同意，她让廖祖康去通知上海民航局，让陈阿大通知工交组转告铁路局。

冯国柱说：“中央也可能从南京派部队来的，要注意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廖祖康说：“南京调部队来，只要过来就能发觉的。反而是在上海的部队要注意，不要他们来动手了还不知道。”

施尚英说：“民兵一头是能掌握的，部队方面无法掌握。”

叶昌明说：“外面来的部队是易发觉的，就怕驻在上海的部队动手时，我们会措手不及。指挥部应派人到部队驻地附近监视动静。”

黄金海说：“警备区主要是松江、南汇二个师，可叫青浦派人到路口去监视，只要那里部队来市区，都要经过的，马上可以发现。”

施尚英说：“不用派人去的，要是部队调动，我们能知道的。”

有人说：“中央派周或其他人来时，不一定会从虹桥机场来，也可能从江湾军用机场来。”

陈阿大说：“叫他们用不成江湾机场也很便当的，只要叫把机场的电拉掉，就不能用了。其实不用拉电，只要开几十辆大卡车到跑道上去飞机就不能降落了。”

王秀珍说：“他们如果来抓人，那我们也要干的。”

廖祖康说：“要是真派部队来动手，那也只好大家板下脸来干了。”

冯国柱对王秀珍说：“要让小廖继续向北京打电话，设法打听情况。”“与北京的电话联系一定要保持畅通，不要有起事来，电话也打不出去了。”

冯国柱说，是否把市邮电局党委书记翁默清找来关照一下？

王秀珍同意。

这时，徐景贤来电话转告王秀珍关于中央台广播中央两项决定的消息。大家都感到奇怪，怎么在半夜里突然广播这么重要的决定，而事先一点没有消息？

沈涵问王秀珍：“市委是否知道要广播中央两项决定？”

王秀珍说：“没接到通知，市委事先一点也不知道。看来他们是要利用毛主席的威望，广播这两项决定来收买人心。”

廖祖康说：“现在北京的气氛和这两项决定怎么对得起来呢？北京现在是修正主义上台在抓人，他们怎么会真的纪念毛主席，无非是要块牌子。”

叶昌明说：“这么重要的消息，不发预告，又是半夜突然广播，这是有阴谋的。因为群众不了解真相，一听广播的是这两项决定，当然会拥护的。这样可把人心拉过去了。”

陈阿大等人也讲，广播这两项决定是在造舆论。

王秀珍担心上班时间快到，市民兵指挥部目标太大，她说：“这里

也不安全，不能多待。”

冯国柱问施尚英：“这里有几条出路？”

施尚英说：“只有一个大门出入。”

冯国柱说：“只有一条出路不行的，只要来一个连把大门一堵，一点办法也没有了，这个地方不能待。”

王秀珍对民兵指挥部的人说：“你们也不要待在这里，要转移出去。”

祖康廖问施尚英：“你们有指挥车吗？”

施尚英答：“没有。”

廖祖康不满意的说：“怎么搞的？指挥部早就该准备几辆指挥车了，现在连一辆也没有，你们转移出去后怎么指挥？”

他要施尚英拿出上海地图，边看边数落：“上次就告诉你们了，一张像样的地图也没有，这种地图怎么好打仗？”

叶昌明说：“城建局有地图的，‘工总司’过去向他们要过一套上海地图，很详细的，指挥部也可去要的。”

施尚英说：“上海的一般地图，指挥部都有的，已派人再作部署了。指挥问题也研究过了，决定把民兵电台分到各区指挥部去，电台昼夜值班，保持与市指挥部的联系。指挥部正好办了一期民兵电台通讯学习班，决定停办。部队来的人都回去，学员随电台分到各区去值班。”

廖祖康觉得：“你们的电台功率太小了，不行的。”

黄金海建议：“水产局渔业指挥部楼上有电台的，是指挥海上渔业生产用的，功率总可以的了，是现成可用的。”

施尚英说：“那电台不能用的。要是民兵台不行，还有市人防办的战备电台可用，这套系统联络是可靠的。”

叶昌明建议：“光电台联络也不行，还要组织一支机动通信联络队伍，保持我们相互的联系不中断。”

施尚英说：“指挥部已考虑过，要建立一支摩托通信队伍。”

黄金海说：“海洋渔业公司有一百多条船，有人有枪，又是机动的，是支较强的力量。指挥部订方案时可考虑的。”

王秀珍突然想到：“‘康办’还有王洪文和张春桥的家属，要加大力量保护好，特别是要保护好王洪文的家属，我们有责任保护好革命

后代。”

康宁一对施尚英说：“康办”的保卫力量还没落实，民兵还没去联系过。要告诉徐汇“区指”赶快落实。

施尚英让钟定栋去徐汇“区指”布置。

王秀珍又说道：“这里不能待下去了，要马上转移。我看还是找个工厂，到工厂去，群众会保护我们的。即使在工厂里把我们抓去，对群众也是个教育。”

黄金海提议：“还是到我们厂去，运动初期‘工总司’有一段时间常在厂里的。厂里老造反多，有基础，地方也大，前后有几个门可进出，即使他们来人也不容易找到的，转出去也方便。”

王秀珍不同意，说：“17棉、31棉这些厂都会受人注意的，不能去。”

王明龙提出可到闵行去，那里大厂多，工人集中，力量强，有起事来往市区调队伍也很快的。他还提到中华造船厂，说复兴岛地方大，又偏僻，不引人注意的。

施尚英建议到江南造船厂去，说：“江南，地大人多，背靠黄浦江，对面又有上钢三厂，易于隐蔽。要是不行还可转到浦东去。”

他还说：“也可以待在指挥部101艇上，在江中游动，谁也找不到的。”

廖祖康说：“到工厂去是不行的。厂里人多太杂，我们这些人突然去了，不更引人注意了？我们去的地方，要有三个条件，一是要隐蔽，我们进出不会引人注意；二是要解决我们的吃住；三是要有电话，便于对外联系。只要附合这三条，哪里都行。”

冯国柱说：“要么找个招待所，这三条都能解决了。”

大家赞成。

廖祖康提出到东湖路七号招待所去，那里距离康平路和丁香花园都近。王秀珍和冯国柱同意。

邮电局党委书记翁默清来到民兵指挥部，冯国柱带他去另外的房间。过一会儿，冯国柱回来对王秀珍说：“我和翁谈好了，你还有什么事要向他说的？”“翁说他到邮电局不久，情况还不熟悉，究竟哪些人可靠，还不知道。”“是否你再去向翁说一下，就让他回去布置。”

王秀珍和冯国柱一起去见翁默清。回来后，王秀珍就催着赶快转移，并对施尚英等人说：“我们走后你们也赶快转移出去，不要待在这里了。”

总工会一千人去了东湖路招待所。市民兵指挥部的人没有马上去东湖。9日凌晨2时，他们召集指挥部的作战组、特兵组、后勤组的负责人开会。决定在10个区和两个指挥点开设电台，另外再设一个电台在上海第三钢铁厂，并要求到下午18时之前沟通电台的联系。

9日凌晨2时，王洪文秘书廖祖康用红色保密电话给丁香花园徐景贤打来电话，说：

“王秀珍跟冯国柱他们商量，有一个意见就是要把部队守卫电台的连交给刘象贤指挥。”“原来守卫康平路市委的那个连交给市委办公室指挥。你如果同意的话，请你告诉李师长一下。”

徐景贤答应了，放下电话后，亲笔写了手令：

“电台由李仁斋同志告电台的连，注意警卫，听从刘象贤同志的指挥。

“三连由李仁斋同志告知一下，要听从市委的指挥。”

写好后，他让秘书叫醒了也睡在丁香花园的李仁斋，当面把这个手令交给了他，然后听到他去打电话，进行布置。

根据王秀珍等的要求，施尚英他们定下了两个指挥点的所在工厂：一个是江南造船厂，为第一指挥点，称“基指”，由施尚英和钟定栋负责；另一个是中国纺织机械厂，为预备指挥点，称“预指”，由吴立义和印玉泉负责。

上午9时，施尚英和吴立义、钟定栋召开了上海10个区民兵指挥部和5个直属民兵师的负责人会议，以王秀珍传达的军委紧急备战要求为口径，布置下达了与李彬山讨论的方案以及联络暗语，分配了各区、师兵力数字，要交运局组织100辆汽车值班待命，还要求区和师负责人全部昼夜值班在位。之后，施尚英和钟定栋便去江南造船厂和中国纺织机械厂两个指挥点现场布置指挥。

与此同时，各区民兵指挥部和一个民兵师，也都设立了指挥所；各指挥所共架设了15部电台，组成两个通讯网，沟通了联络，先后收发了79份电报，直至15日凌晨1时才停止发报。

第1421回：忙避难，还是在工厂踏实 九日晨，八人组抵达上海

中央召集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湖北等省市和南京、济南、武汉三个军区的负责人在玉泉山五号楼的会议至9日凌晨2时才结束。会后，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中央政治局成员同马天水谈话，周纯麟参加。马天水向中央表示，自己无法说服上海的那些人，建议还是将他们叫来北京，由中央亲自做工作。

周纯麟也建议中央将徐景贤和王秀珍叫来北京。

华国锋看了看表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并对马天水说：“你回京西宾馆后，立即给徐景贤、王秀珍打电话，告诉他们明天来京开会。”然后回过身来，对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周启才说：“老周，派车，你送马书记回京西宾馆。”并向周启才使了个眼色。周启才理解是让他当面看着马天水给上海打电话，于是向华国锋点了点头。

10月9日，上海下起了细雨。冯国柱首先来到丁香花园。接着，王少庸、张敬标、张宜爰等市委常委也都到了。大家商量，对中央的两个决定如何表态？冯国柱建议，要表态拥护，但不要提“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

徐景贤已经从秘书口中得知朱永嘉半夜来电话表达的意见，反对刊登中央的两个决定。他虽然心里同意朱永嘉的意见，但又考虑到“中央这两个决定本身是广大群众拥护的，报纸不发的话会失去群众”，还是布置报纸刊登了。

王秀珍早晨从东湖招待所出来后，又去张春桥家和王洪文家看了一下，准备把王洪文、张春桥的妻子文静和崔根娣以及王秀珍自己的家属安排转移。把大孩子安排到工厂去，小孩子安排到工人家里去。

此时，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已经从总工会那里听到消息：“王洪文出事啦！”

她一次次给王洪文挂长途电话，总是没人接。

她给上海国棉 17 厂厂医、她的一位好友挂电话。在电话里没说几句，她就忍不住哭了起来：“我怎么办？孩子怎么办？”

“到我这里来吧，暂且躲一躲。”她的好友劝慰她。

急匆匆，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拖儿带女，离开了康平路。

没有坐小轿车，悄然登上公共汽车，从上海西南角斜穿整个市区，前往东北角杨树浦，借住到厂医家。

这位厂医与她的友情，倒并非“造反之交”。她的丈夫从部队复员到上海国棉 17 厂，曾任厂党总支委员，“文革”前与王洪文有点来往。1966 年，她的丈夫去世。1967 年在与“联司”血战之时，她曾替崔根娣照料孩子。正因为这样，这一次崔根娣又想到了她，把孩子带到了她家。

她家不是个显眼的所在。金祖敏的女儿也托崔根娣一起带来了。顿时，厂医家里挤了一屋子人。

不久，这小屋里又增加了一名“逃难者”，她叫张融融，张春桥的第三个女儿。

张春桥的女儿怎么也躲到这儿来呢？原来，是崔根娣做的大媒，把上海国棉 17 厂青年工人徐百丰介绍给张融融。听说崔根娣在厂医家避难，张融融也以为这里安全，便过来暂避风头。

虽然这儿是工人宿舍区，远不如康平路高干宿舍豪华、宽敞，崔根娣心中反而踏实了。她与厂医挤在一张床上，说出了心里话：“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些年我的心总是悬着，担心洪文迟早会出事。现在，果真大祸临头……”

王秀珍到丁香花园后，说起安排家属孩子转移之事，徐景贤说王秀珍光抓小事不抓大事，家属不用转移。

北京，中央秘书局局长周启才奉华国锋之命送马天水到京西宾馆后，也跟着上了楼。一进门，马天水就对秘书房佐庭说：

“给我要徐景贤的电话。”

不一会儿，徐景贤的电话接通，秘书将话筒递给马天水。马天水说：

“我是老马，中央叫你和秀珍明天来京开会，有飞机接你们。”

“是马老吧？”接电话的是王秀珍，她一听见马天水的声音，高兴得

跳起来了。真的，从电话耳机里传出来的，是马天水那熟悉的河北口音。

“你身体好吗？”王秀珍问。

“好，好……”马天水答道。

“四位首长好吗？”王秀珍问了最关键的话。

“很好。”马天水居然这样答道。

“你见到他们了吗？”王秀珍紧紧追问。

“来京见面再谈吧！”说完，马天水放下了电话。

周启才返回玉泉山五号楼，把马天水给徐景贤打电话的情况，向华国锋、汪东兴作了汇报。

上海这边，王秀珍放下电话，急忙把好消息转告徐景贤。

徐景贤长长地松了一口气，顿时瘫在椅子上。连日的疲劳一下子袭了上来。

其他人也如释重负，都说是一场虚惊。

这天上午，当上海市委年轻的女委员、《朝霞》杂志总编辑陈冀德听朱永嘉说：“徐景贤、王秀珍与在北京的马老通了电话了。马老说：他们三个身体很好，工作很忙，中央正在筹备一个重要会议。”她顿时觉得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对朱永嘉说：“要是马老说了谎，这个玩笑可是开得不大不小。”

王知常说：“马老是老干部了，说谎不至于。”

中午，肖木来到陈冀德办公室，对她讲：“我可能马上要走了。”

陈冀德说：“北京究竟发生什么事情还不清楚，不会马上叫你回去的。”

肖木说：“不管出什么事，我都是要走的。小说我不想写了，也写不下去了，不管怎么样，人家都会说我写这部小说是为王洪文树碑立传的。”

陈冀德说：“那也不能这么讲，文化大革命总归还是要反映的，也总会有代表人物。”

肖木听后，让陈冀德替他保存小说已经印出来的部分清样。

在谈到当前形势的时候，陈冀德说：“不知会有什么变化，华国锋同志任主席的话，春桥同志可能会当总理。”

肖木情绪低沉地说：“恐怕事与愿违。以后看起来中央是集体领导了，不可能像主席在时那样，一切都可以由主席仲裁、决定。现在还没有像主席那样可以仲裁一切的人……”

10月9日，中央决定，从即日至14日，在北京市部分单位，包括文化部、人民日报社，及全国各地党政军领导干部中，分批传达《中央关于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通知》。

这天一早，谷牧组织的“八人小组”准时在首都机场登机。8时32分，飞机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大厅空荡荡的，找不到接站的人，大家都感到意外。王守家当即给上海工交组打电话问：“我们8人已经到上海虹桥机场，怎么没来接站？”

上海工交组的说：“已经写电话记录，报告工交组组长陈阿大了，他至今还没批下来。”

王守家反问：“难道安排住宿还要批准吗？”

对方在电话里支支吾吾，没有正面回答，又说：“上海的旅馆全都满了，没地方住了。”

王守家说：“我们已经到上海了，我们不能回北京了。实在没地方，就住在你们办公室吧！”这时，机场一名值班同志说了一句：“最近根本没有什么人来上海，旅馆怎么可能都住满了呢？”

工交组的人又说：“机场有车子吧？”

王守家斩钉截铁地说：“你们必须来接我们。”

上海工交组的说：“等我再联系一下。”

过了一个多小时，上海工交组来电话，说火车站可能还有旅馆，等他联系一下。

又过了一个半小时，上海工交组又来电话说：“真是对不起，一会儿我们处长去机场接你们。”

这位处长是上海市工交组下属的生产组负责人之一。生产组是工交组最重要的单位。

徐良图一行又在机场等了很长时间，那位处长才坐一辆小面包车过来。一见面都是熟人，那位处长忙说：“真是对不起，值班员没有交接好，让你们久等了。”

大家上车后，那位处长第一句话就问：“春桥同志好吧？”

大家不动声色，回答说：“都很好。”

从机场到市区的路上，路口设了哨卡，全副武装的民兵检查过往的行人，大家顿时感到形势不同一般。一路观察，他们觉得上海呈现的是大战前的紧张气氛，犹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面包车把大家拉到距离锦江饭店不远的一座三层小楼，那位处长说：“工交组领导都出去开会了，我先安排一下，暂时先住在这里吧！”

安顿好后，那位处长就走了。

这座三层小楼十分简陋，单人房间，一桌一凳一张床，一个热水瓶，一个茶杯。还没有坐稳，生产组另一个副组长坐着车来了。因为工作关系，他与徐良图很熟悉。他一来就说：“怎么能住在这儿，太简陋了。”又让大家搬到衡山饭店。

衡山饭店位于徐汇区，离康平路市委大院很近，是上海有名的饭店，设备条件不错，但是大家很快发现情况不对头。曹大澄、王守家、徐良图、李景昭、王德瑛和陈斐章6人在四楼，干志坚、周力在三楼。但是楼梯被封死了，上下楼只能走电梯。更令人惊诧的是，楼道里的服务员虽然一身白裤褂，但每人腰间却斜挎一把套管大扳子，监视着北京来人的一举一动。他们在屋里开会，发现有人趴在门上偷听。从楼上向下看，宾馆两旁的街道衡山路、宛平路上也有三三两两的人正在巡逻。

王守家先到走廊巡视一番，发现有3个服务员在走廊里巡逻，再加一个把住楼梯口，总共4个人。王守家外出给大家买早饭，有人紧随其后。

徐良图立即召集紧急会议，安排工作。他说：“我们的任务是来观察上海动向，现在却先被软禁起来。我们唯有针锋相对，主动出击。”

他们商定派王守家、陈斐章到工交组找黄涛、陈阿大正面谈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问题，派曹大澄去拜访王一平探听消息。

徐良图说：“去工交组拜访陈阿大，被他们盯梢紧跟，还算是一个保镖。去王一平家的一定要甩掉尾巴，保证一平同志安全。”

于是，先安排干志坚出门快走。此公膀大腰圆，原就读上海复旦大学，后留苏学石油钻探，地地道道的上海人。他疾步走出门去，服务员紧盯不放。

过了5分钟，王德瑛慌慌张张地跑出去，去追干志坚。饭店服务员见状，也立即尾随其后。

稍后，周力下楼买烟，跟上一个尾巴。李景昭逛南京路，又跟上一个尾巴。

3个服务员都走了。这时，曹大澄最后下楼，和看门的服务员打招呼：“阿拉吃饭去！”

守门的服务员不能擅离门岗，只好看着他消失在人群中。

曹大澄出门后，三拐两拐匆匆来到武康路4号上海市委宿舍。进门看见王一平和一人正在桌边坐着谈话。王一平见曹大澄就说：“谷牧同志在今天8点半，你们所乘飞机落地之后来过电话。我本想把10月8日晚，上海市委宣布全市进入一级备战的情况向谷牧反映。他阻止我，说电话里什么都不要讲，已派曹大澄来接头。”

王一平听到谷牧是用山东荣成家乡话拖腔说的“接头”，明白一定发生了重要的事情。

曹大澄拿出黄胄所作的《四蟹图》，王一平看罢此画，笑笑说：“我明白了。”曹大澄扼要地介绍了谷牧委派的任务。王一平介绍屋里的那人说：“自己人。”那人自我介绍，名叫李庸夫。

王一平介绍，李庸夫长期在上海市委秘书处工作，是原上海市委分管政法的书记梁国斌的秘书，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处处长。

王一平、李庸夫向曹大澄介绍了10月7日、8日两天，上海市的一些情况。他对曹大澄说：“我这里目标太大，你以后就和李庸夫联系吧。”

当即，李庸夫和曹大澄商定了下次接头地点。

事不宜迟，曹大澄马上赶回衡山饭店，向徐良图汇报，李景昭在座。大家一起研究，觉得形势严峻。徐良图对曹大澄说：“你今天就坐飞机回北京，当面向谷牧同志报告。”

李景昭说：“我回北京吧。曹大澄对上海人熟，继续了解情况。”

王守家买好票，当晚送李景昭上了飞机。

第二天，饭店服务员问王守家：“你们刚来就回北京？上午来，晚上走，他回北京干什么去了？”

王守家回答：“他回去拿东西。来时落了东西。”

李景昭回到北京后，立即将材料交给谷牧。谷牧的秘书胡光宝迅速编写成《上海来信》第一号，于当晚送交华国锋、叶剑英等中央领导。

中央政治局得到上海小组的报告后，将上海警备区司令周纯麟召到玉泉山5号楼。

周纯麟到玉泉山5号楼后刚坐下，李先念就详细地询问了上海警备区兵力部署和上海民兵的情况。接着，严肃地问他：

“周纯麟，你估计一下，‘四人帮’被隔离的消息公布后，上海会出现什么情况？”

周纯麟思索了一下说：“我估计有三种可能，一种是大干，一种是小干，一种是没什么大的问题，比较平静。但是大干的可能性不大。”

李先念追问原因。周纯麟说：“因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个人被抓起来后，他们没有打旗的了，在上海有哪一个人能挑头？就是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也不行，树不起来。而小干呢，就是他们可能利用一下民兵，把我们警备区的机关冲垮，或把我们上警的几个领导同志抓起来。”

他稍许停了一会儿，又说：“不出问题的可能性较大。但先决条件是，要尽快地把‘四人帮’的罪行向上海人民群众公布，使群众不再受蒙骗……”

接着，周纯麟又把马天水这几天的表现情况作了汇报。中央领导问：“徐景贤、王秀珍能来吗？”

周纯麟说：“中央要他们来，恐怕会来的。”他建议让马天水打电话通知他们。

周纯麟还汇报说毛泽东逝世后，部队处于一级战备状态，有一个师正在由青浦向上海方向拉练。

华国锋马上说：“马上停止，不能引起误会，逼出事来。要相信上海工农群众，军队一调动，马上就会引起恐慌了。”

这支部队接到命令后，很快就回去了。

第 1422 回：召徐王，上海市暂趋平缓 封梁效，小平拥护华国锋

9日下午，上海市委召开常委会，传达中央关于“两个决定”的 15 号文件。与会人员对 15 号文件都表示拥护。

晚饭后，徐景贤和王秀珍商量，撤销民兵的战备集中和待命决定，恢复正常，不然将引起误会。于是，王秀珍当即给民兵指挥部施尚英打电话，对他说：

“撤销五位数（即 31000 人，实际上只有 11000 人），保持四位数（即 2500 人）恢复正常。”

接着，徐景贤和王秀珍又将廖祖康找来，要他将东湖路招待所的指挥点撤了，让聚在那里的总工会的人都回去。廖祖康答应了。

晚上，马天水秘书房佐庭再次打电话通知徐景贤、王秀珍：马天水要他们两人去北京开会，空军会派飞机，情况来了会清楚的。

马天水要徐景贤接电话。徐景贤汇报了下午常委会开会的情况。马天水说：“还可以在马路上贴拥护中央决定的大标语，但开大会要等我回来。”

北京，听到徐景贤、王秀珍准备第二天到北京开会的回复后，华国锋、李先念等又找彭冲等人和南京军区的廖汉生、丁盛两位负责人谈话。

10月9日，叶剑英向华国锋提议：“赶快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恢复他原来的职务。”华国锋未置可否。

紧接着，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又正式提出这个问题：“我建议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参加了政治局、恢复了工作，总不会跟我们挑剔吧？”

李先念马上表态：“同意！应该让小平同志尽快地出来工作。”

华国锋还是没有表态。

10月10日，邓小平给华国锋写信，表达自己对于粉碎“四人帮”

的拥护和兴奋之情：

东兴同志转呈国锋同志并中央：

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胜利。

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

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邓小平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

10月10日，是毛泽东逝世一个月，中央组织力量起草了《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的社论，华国锋和中央政治局专门审议，在社论中加了毛泽东关于“三要三不要”的语录，并决定以“两报一刊”名义发表。

这上午，南京军区通知上海警备区，上海警备区政委李宝奇、副政委章尘、李彬山、副司令员张宜爱、杨新亚，马上去南京军区开会。临行前，李彬山与上海民兵指挥部施尚英约好，如果有事他将告之。中午，一行人乘火车离沪。

中午，彭冲、廖汉生、丁盛等回到南京。彭冲在省委常委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传达了中央的精神。

马天水10月9日晚上打给上海的电话，再次引起上海的猜测：

“为什么马天水不回上海?”

“为什么要上海去人?”

“为什么会议不是中央通知?”

10日上午，徐景贤、王秀珍又通过各种途径向北京摸情况，当听到“四人帮”被抓的消息后，他俩又有点疑惑：“马老”的话，总不至于不可靠吧。

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黄涛、张敬标6个上海常委开会，研究、估计事态发展的几种可能性。

王少庸提出：“可能有问题，是否不去人，或者去一个人？”

徐景贤、王秀珍商量后说：“这是马老通知的，两人不去不好，去了一定打电话回来，如果没有电话就是出事了。”

他们听了《人民日报》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社论写道：“历史证明搞垮我们党是不容易的。任何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批示的人，任何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徐景贤、王秀珍、冯国柱、张敬标分析后错误地认为，可能是有人反对华国锋，而江、张、姚、王是站在华国锋一边的。

徐景贤、王秀珍商量去北京后要及时通报消息。最后，他们决定让徐景贤的秘书张家龙随同去北京。

王秀珍说：“我们走后，你们几位就在康平路集体值班，注意各方面的动向，有问题在一起研究。”

徐景贤说：“我们两人去北京开会的消息，在场的人要保密，不要传出去。”

王秀珍马上又打电话给上海市总工会副主任叶昌明：“我和徐景贤要去北京开会，你那里不要动，有事要请示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要听他们的指挥。”

临行之际，徐景贤、王秀珍也作了“一去不复返”的打算：“作最坏的打算！如果我们去了以后，两三天没有消息，你们就决一死战！”

“一到北京，就给我们打电话！”冯国柱、张敬标、叶昌明都再三关照徐景贤和王秀珍。

下午14时30分，徐景贤、王秀珍乘空军专机飞往北京。

10日，“四人帮”被抓的消息已经在北京市民中传开，人们半公开地议论，市场上白酒的销售量突然猛增。许多人去买三公一母一串的螃蟹，有人还敲打螃蟹：“看你还横行霸道不！”



1976年打倒四人帮时宗其香画的《三公一母》横行霸道



黄永玉再画猫头鹰

10月10日，两报一刊发表的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第一次在报纸上公开出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的提法。这被外电认为是暗示“四人帮”已失势。

10月10日，星期天。晚上，北京大学两校写作组的范达人从家里返回梁效的途中，走到北大哲学系的路口，天已经黑了，组织组的一个副组长刘隆亨碰见他说：“你还去上班？”

范达人答：“是啊。”

“你没有听到什么消息啊？”

“没有啊。你听到什么消息？”

“迟群、谢静宜篡党夺权，搞阴谋，抓起来了。”

“哎哟，”范达人心里一震，说：“怎么，怎么这样就抓起来了，这两个是我们直接的领导啊？”

回到梁效，范达人将迟群、谢静宜被捕的消息告诉了自己写作组

的成员,但是当时大家都沒有想过事情会有多严重。

当晚,已经到了11日的凌晨2时了,写作组的人都进入了梦乡。突然,很亮的强光从窗外射了进来,吉普车、摩托车……部队将梁效包围了。接着进来一批人,有北京市委的,还有部队的,为首的宣布:“四人帮已经隔离审查了,迟群也隔离审查了,我们要查封梁效,中央下命令要查封梁效。你们马上离开,只能带洗漱用品,不能带任何资料文件。”

就这样,梁效的成员灰溜溜地出了楼房。也是从这一天开始,梁效成员被隔离审查。写材料,交代,接受各种形式的批判和审讯。作为《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等重要文章的执笔者,范达人是重点审查的对象。

1977年2月29日,北京大学召开“全校揭批四人帮及其篡党夺权急先锋梁效的罪行大会”,在全场高呼“打倒范达人”的口号声中,范达人从会场被直接押上了囚车。他被押往半步桥监狱。

1976年10月10日晚上,徐景贤、王秀珍飞抵北京。华国锋决定他们暂不参加政治局的打招呼会议,由马天水、周纯麟向他俩传达“四人帮”被隔离的情况。

听马天水、周纯麟讲了中央会议的精神,徐景贤和王秀珍一时无法接受。徐景贤谈了10月8日以来,他们在上海调动民兵、搞战备部署的情况。他觉得大势已去,要求与上海通一次电话,说“可能出事”。

经过书面请示中央办公厅同意后,徐景贤打电话给上海的冯国柱,对他说:

“我们已经平安到达,一切等我们回来以后再定。”

当晚,朱永嘉从上海市委回到写作组后,对大家说:“徐、王在郑州被勒令下飞机接受检查。”并说:“载他们的飞机不是专机,而是沿途把山东等省市书记放下后再到上海接的他们二人。起飞后也不是直飞北京,在中途又多次停顿。”

廖祖康也对聚集在东湖招待所的市总工会的人说:“徐、王是乘中央送开会的人回来的专机去北京的。专机到郑州后突然降落,检查了乘客的身份后,才再飞北京。这种情况过去也没有过的,好像怕有什么人会混进去似的。”

他又说：“中央分批开会，这架专机是送第一批开会的人回来，接第二批开会的人去的。其他省第一批开会的人都回来了，就上海没回来，又要去两个人。”

大家听廖祖康这么一说，都很担心，纷纷说：“为什么马老不回来又叫徐、王去？不要都不回来了。”

朱永嘉和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三位常委都觉得反常。到 11 日凌晨 1 时左右，朱永嘉又从市委给写作组打来电话说，他已和徐景贤通了电话，徐景贤叫大家不要动，等他们回来再说。

写作组的王知常马上说：“时机又错过了。”

11 日中午，徐景贤、王秀珍聚在马天水的房间。周纯麟得知后，立即过去，刚推门进去，他们就不说话了。随即，徐景贤、王秀珍起身走了，马天水连忙招呼周纯麟坐下。

不一会儿，房佐庭到王秀珍房间送文件，徐景贤跟着也进来了。

王秀珍对房佐庭说：“毛主席逝世不到一个月呀，怎么一下子被他们搞起来了？是怎么一回事啦！老房，你在马老身边几天了，马老是怎么想的？”

房佐庭讲了马天水在中央表态的情况。

徐景贤说：“同意他们的会议精神，就是同意和平演变啊！”

王秀珍埋怨徐景贤说：“你怎么把调动民兵、分两个点的情况对周司令也说了，不能对他说的，周司令是党中央安排在我们市委那里的一支钉子。”

下午 14 时左右，陈锡联、苏振华、倪志福受中央委派，到京西宾馆会议楼，找周纯麟和马天水谈话。

周纯麟汇报了徐景贤、王秀珍的情况。马天水谈了 10 日深夜徐景贤、王秀珍提的一些问题。

回来后，周纯麟和马天水立即向徐景贤、王秀珍转达了中央领导的讲话内容。

10 月 11 日，上海在不安中度过。这天，上海市公安局监听台不断听到国外电台报道“四人帮”被抓消息。

市委写作组的朱永嘉和王知常强烈主张要有行动。11 日，朱永嘉说：“可能马天水被人家做工作做过去了，又怕担不了全部责任，今天

把徐景贤、王秀珍也叫去北京，徐和王回来，肯定是当钱谦益。”

钱谦益，明朝东林党领袖之一，官至礼部侍郎，因与温体仁争权失败而被革职。明亡后，依附南明弘光政权，官拜礼部尚书。清兵兵临南京城下，钱谦益率诸大臣在滂沱大雨中开城向清军统帅多铎迎降。

不过朱永嘉又认为，留下的张敬标、冯国柱、王少庸三个市委常委态度还是很坚决的，“民兵、总工会几个人坚决要干，我们应当干。”

朱永嘉说：“这一乱可好了，肯定会出现辛亥革命后的局面，军阀割据，谁也不听中央的。”

下午，朱永嘉在他的办公室里一边整理东西，一边对在场的王知常和陈冀德说：“你们也收拾收拾准备坐牢吧。就这么束手就擒，实在不甘心，也对不起张、姚两位首长。”

陈冀德说：“就是被抓去坐牢，也不做对不起他们的事。”

当晚，朱永嘉从“康办”回到写作组，带回了确切的粉碎“四人帮”的消息，说《美国之音》和英国 BBC 已经广播了。

听朱永嘉这么一讲，陈冀德情绪很激动，她说：“中央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与上海的关系又这么密切，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市委成员却都是从外电消息中知道的，这叫什么党内原则？事情早已发生，却一直把我们蒙在鼓里，这就叫马列主义？这就叫光明正大？”

第 1423 回：苏倪彭，组成三人工工作组 听外电，上海市局势又紧

11日晚，上海市总工会的人又如约在东湖招待所碰头。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施尚英等人，说上海警备区 10 日中午到南京军区开会的人都回来了，警备区李宝奇政委在浦东大楼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宣布警备区正在召开的党委扩大会暂停，由董常云副司令负责战备工作。施尚英说：“李彬山回来也没打电话给民兵指挥部，也没来过。战备工作原来是张宜爱抓的，怎么又换成董常云了，看来情况不妙。”

大家议论纷纷，觉得南京的会与中央发生的事是有关的。

这时，正在北京参加电影工业会议的原市委工业政治部机关造反派头头、时任上海电影公司党委副书记及电影技术厂党委书记的秦学能，从北京打来电话找陈阿大。陈阿大拿起电话，听了几句后，立即将工交组的工作人员肖云机叫过去，让他听电话，边听边复诵边记录。大家都围在电话机边，听肖云机复诵。

秦学能在电话中说：“北京传说已传达了中央文件，内容据说是是在钓鱼台揪出了一个反革命政变小集团，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迟群、谢静宜等人已被抓起来了。北京街上已出现了打倒王、张、江、姚的大标语。”

围在电话机边的人都紧张起来，廖祖康立即给肖木打电话，他一边听着肖云机的复诵，一边给肖木转述。

叶昌明也马上给张敬标打电话。张敬标不在，叶昌明让“康办”值班室立即向张敬标报告，说北京有电话来，他们要求马上过去汇报。

叶昌明让肖云机立即把电话记录整理出来送“康办”。

这时，“康办”来电话，让叶昌明他们马上过去汇报。当他们来到“康办”时，已是 22 时左右了。在场的有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黄涛四位常委及肖木、何秀文。

叶昌明他们汇报了秦学能北京来电的情况，送上了电话记录，又

讲了警备区去南京军区开会的人已回上海。

张敬标说：“朱永嘉刚走，已叫人去通知他来了。”“我们刚才和徐、王通了电话，他们说平安到京，参加了会，现会已结束，在等中央领导接见，明天就能回来了。要我向他俩家属转告一下，他们身体很好，明天回来。我们问是开什么会？他们不肯说，只说等明天回来就可知道了。”

冯国柱和张敬标抱怨说：“他们在上海时也是急得要命的，也知道我们在等他们的消息。但到北京后就跟马天水一样了，不肯说什么情况，不知是什么道理。”

又说：“他们电话里对马老的情况一点也不说，只要向他们的家属转告，也不提向马老的家属说一下，马老到底怎么了？”

说起南京军区的会议，张敬标和冯国柱说，上海警备区去南京开会的五个人都回来了，原来李彬山和张宜爱都说好回来就告诉他们开会内容，但到现在也没有来电话。

叶昌明说：“李彬山和张宜爱不来电话，市委可打电话去叫他们汇报么。张宜爱是市委常委，李彬山是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来向市委汇报也应该的。”

张敬标和冯国柱说：“我们也考虑过了，他们既然不愿来电话，我们也不便去找他们了，不来就不来吧。”

原来，李彬山和张宜爱 10 日去南京军区开会，得知中央发生的情况后，深知事关重大，也对上海民兵备战发枪之事感到严重，从此一直待在警备区，不敢再与上海地方党政尤其市民兵指挥部发生任何接触，更不要说通消息了。为了摆脱警备区在这个敏感时期与市民兵指挥部的干系，李彬山又将守在中国纺织机械厂指挥点的上海警备区的吴立义召回警备区。

冯国柱说：“收听到外电广播，也说北京揪出了政变集团，几个大学的留学生听了外电后，还去问中国学生。情况已汇报上来了。”

王少庸讲：“公安局也侦听到敌台广播了揪出政变集团的消息。”

张敬标说：“重型机器厂有人在京开会，向厂里打电话说了这件事，厂里作谣言报到‘康办’来了。”

在座的人纷纷问：“我们问该怎么办？”

冯国柱和张敬标说：“他们既然说了明天回来，只好等他们回来再说了。”

叶昌明、陈阿大、施尚英、廖祖康回到东湖招待所，向等在这里的黄金海、马振龙、王明龙传达了“康办”所议论的情况。

廖祖康说：“说几位领导是反革命，我不相信！我跟王洪文这么多年了，这几年一直和他们接触的，还不知道他们的情况？他们一直是紧跟毛主席的，怎么会一下子变成反革命了呢？”

大家都说不相信。

廖祖康又说：“中央可能会马上来电叫我回去的。”

在场的人都说不能回去，可以找个地方躲起来。

廖祖康说：“我已作好思想准备了，中央要叫我回去，我就回去。不回去也没用的，反正跑不掉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像资本主义国家，你能躲在哪里不出来吗？是躲不住，也跑不掉的。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变修后，他的控制也更厉害了。”“马、徐、王他们可能已被中央拉过去了，否则不会让他们回来的。我们不能把希望放在他们身上，要靠我们自己干。”“马、徐、王回来后，很可能是来做工作的，要我们跟他们跑，只要看他们回来传达时，是否叫我去参加，就可看出他们的态度了。”

叶昌明说：“要是他们回来是做工作、劝降的，我们不能同意他们的。我思想是不会通的，准备去开会后不出来了。”“被抓的都是一直紧跟着毛主席的中央领导人和从文革中出来的新干部，把这样的人抓起来，就清楚的说明了是什么问题了。我们希望把这样的人抓得越多越好，这就更能说明问题。只要把被抓的名单一公布出来，群众一看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

陈阿大说：“不靠他们（马、徐、珍），我们自己干！”

他又问大家：“真要干起来，你们怕不怕？”

大家都说：“不怕！”

陈阿大又说：“要干就干到底，不能做叛徒。谁要做叛徒，我就先把他干掉！”

廖祖康说：“我们也要有点准备才行，不能光说说就算了。”

大家同意，并议论刷大标语，找一些可靠的老造反吹吹风，活动要

保密等等。

黄金海提出是否将正在干校的戴立清叫回来？

叶昌明、廖祖康他们同意。于是叶昌明以戴立清家里有急事的名义，让市革委会总机转五七干校所在的奉贤县县委，再由县委总机转到干校。

电话接通后，叶昌明对戴立清说：“你家里有急事，你连夜回来。要是干校没车，我们马上派车来。”

戴立清说：“干校有车，我立即回来。”

廖祖康清理了他房间里的东西，拿出一大盒糖来说：“原准备结婚时给你们的，现在分掉吧。”

叶昌明讲：“还是先放着，等事情搞完了，有机会再吃吧。”

北京。10月12日上午，华国锋在玉泉山5号楼召开政治局会议。他说：“现在看来，上海市委这些人已无法工作了。他们顽固地站在‘四人帮’立场上，与党中央对抗，妄图发动武装叛乱；过去被‘四人帮’压下去的一派也准备搞串联；上海的群众也自发地起来了，需要正确的引导，中央应马上派人去接管上海，不然会出大乱子。”

倪志福在20世纪80年代回忆了这次会议：

在会上，叶剑英说：“我赞成国锋同志的意见，为了防止上海这些人狗急跳墙，搞武装叛乱，要派一位无论是在军队还是地方，都能压得住台的老同志去。”

他停了停，略一思忖后说：“我看振华同志堪当此重任。他资格老，林彪、‘四人帮’整得他很惨，但他斗争很坚决，在粉碎‘四人帮’的紧急时刻，起了重要作用。在战争年代，有指挥作战的丰富经验；在建国初期，担任过贵州省委书记，多次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称赞。再说，上海有海军东海舰队的基地，苏振华去上海，工作起来也有方便条件。”

陈锡联、李先念同意叶剑英的意见。

华国锋也表示同意，他说：“我赞成叶帅的提名。根据‘四人帮’控制上海的实际情况，中央去接管上海的人选，最好是在将来的一段时间内，能够取代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职务的人。‘四人帮’和他们的余党不是说王洪文是工人阶级的‘领袖’吗？他是什么工人阶

级‘领袖’！我们要派一位真正的工人阶级领袖去，我看志福同志也一起去上海。”

李先念、叶剑英等表示同意。华国锋接着说：“过去上海和江苏的矛盾很尖锐，但上海和江苏不论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关系都很密切，最好能从江苏调一位同志去上海工作。”

李先念说：“可以派彭冲同志去，他处事从容稳重，在江苏政绩突出，‘四人帮’往死里整他。他跟‘四人帮’斗争非常坚决，他去接管上海，有利于解决两地矛盾，上海经济建设上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将会得到江苏的有力支援和帮助。”

大家都表示同意。于是，中央政治局决定，苏振华、倪志福、彭冲3人组建中央工作组，并急电彭冲进京。

上海，下午14时左右，叶昌明打电话到“康办”找张敬标，他不在。叶昌明问值班室，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他们回来没有？回答：没有。叶昌明又问：

“什么时候回来，有消息没有？”

回答依然是没有。

上海总工会的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王明龙和廖祖康、民兵指挥部的施尚英等人，又在上海市工人文化宫5楼会客室碰头。

叶昌明说：“人到现在还没回来，也没什么时候回来的消息，看来下午不可能回来了。”

大家怀疑，是中央把人扣下了，也有可能中央是对上海封锁消息，等布置好了就动手。

他们分析了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的几种可能，廖祖康说：“他们要是抵制的态度，中央是不会让他们回来的。要是能回来，态度就不行了，被拉过去了。”

叶昌明说：“总是态度变了，才让他们回来的。回来是做我们工作的，不能听他们那一套。”

廖祖康说：“各地都是两种观点的，我就不相信都听他们的。只要有人带头起来和他们干，就会有人跟上来的。现在就看谁来带这个头了！要是上海能带个头，周围几个省肯定也会起来干的。”

叶昌明说：“上海在‘一月革命’中是带了头的，现在也应起带头

作用。”

马振龙说：“要是马天水他们回来不干，我们可以自己干，不能投降。”

其他人也都表示了坚决要干！

他们议论要设个值班室，专供他们几个人联络用，对外保密，还要准备标语、口号。

民兵指挥部来电话找施尚英，说警备区李彬山来电话让施尚英马上去他家。

施尚英从李彬山那里回来后，对大家说：“李果然是找我去说南京开会的事，是军区开的，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说王张江姚是‘四人帮’，毛主席对他们有指示的。我问他，几位领导是否被抓起来了？他肯定的。我问他在会上是否表态支持了？他不吭声，表示默认的。我就与他吵起来对他说，你原来说过的，马没回来前，你是不去参加会的，怎么又投降了呢？李吞吞吐吐的说不出话来。我又问他，有没有文件？他说，没文件，口头传达的，但有几个影印件。他说，毛主席有三条指示：你办事我放心；照过去方针办；不要着急慢慢来。他抄在本子上，读给我们听的。说是在南京看到了毛主席手迹的影印件的。社论说的篡改毛主席指示，就是指篡改‘照过去方针办’这条。我说凭这些就能相信了吗？我要李详细说，他不肯多说。我故意与他吵，骂他，他也不吭声，但神色十分反常，只说不要急，等马他们回来传达，你就知道了。我怕你们等急了，就赶紧回来了。”

大家议论说：“照过去方针办”和“照既定方针办”不都是一样意思吗？怎么能叫篡改呢？他们问廖祖康是否知道这些事？

廖祖康说，从没听说过“四人帮”的提法，也不知道毛主席关于“四人帮”问题的指示。他表示不相信有“你办事我放心”的批示，认为“照过去方针办”和“照既定方针办”都是一个意思，不能叫篡改。

廖祖康还说，汪东兴是肯定参加这件事的，没有他参加，抓人是不可能的。

叶昌明打电话给张敬标，讲李彬山找施尚英谈话了，有重要情况要求马上汇报。

张敬标说常委在晚上碰头，可以晚上过来谈。

廖祖康建议：“还是先找黄涛去说一下。”他打电话给黄涛，讲有重要情况要汇报。然后和陈阿大、叶昌明、施尚英、廖祖康一起来到黄涛家，黄涛正在吃晚饭。

施尚英汇报了李彬山找他谈话的情况，大家问黄涛：“怎么办？”

黄涛说：“晚上‘康办’要碰头，等碰头时再商量一下怎么办吧！”

大家决定在黄金海工作的上棉 31 厂设秘密联络点，组织几个人 24 小时值班。叶昌明要黄金海马上去 31 棉落实。下午 16 时 30 分左右，黄金海和连夜赶回上海的戴立清，去上棉 31 厂找人布置值班事宜。

其实，就在 10 月 9 日，谷牧派到上海的“八人小组”找到市革会副主任王一平后，王一平即找到他的老部下，曾任杨浦区委书记，时任市委常委、市委办公室主任的张敬标，向他了解上海市委的情况。张敬标将徐景贤、王秀珍离沪前上海市委常委开会商议的内容交给了王一平。

张敬标接到叶昌明的电话后，又打电话给上海警备区政委李宝奇，说：“现在我们这里情况很紧张，工会和民兵指挥部的一些人情绪很激动，我们已经很难控制。”

李宝奇要他尽量稳住他们。

张敬标和冯国柱决定晚上在康平路碰头交换情况，通知王少庸和黄涛也到。说是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实际就是总工会和写作组核心人员。本来张敬标打算四个常委先碰头商量一下，统一认识。但黄涛一直在忙工交组的日常工作，到迟了，常委未能先商量研究。

第1424回：要大干，众秀才情绪激动 再等等，四常委难下决心

10月12日晚上20时30分，陈阿大、叶昌明、施尚英、朱永嘉、肖木、廖祖康、何秀文等来到康平路学习室，和冯国柱、张敬标、王少庸、黄涛四位常委互通情况，都是四面八方传来的关于“四人帮”被抓的消息。

会议气氛非常紧张，吵吵闹闹的。

施尚英汇报了下午与李彬山见面的情况。

这时，写作组的王知常和总工会的马振龙也先后进来了。

听了施尚英的汇报后，王少庸说：“‘按既定方针办’和‘照过去方针办’有什么两样？我看不出有不同的意思，这种叫篡改吗？凭这一句话，就能把人打成反革命了？我想不通！”

其他人也都觉得这两句话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张敬标说：“马天水他们说的今天回来的，又不回来了。”

大家要求再给北京打电话，于是冯国柱写了电话稿，读给大家听，征求意见。大意是：“上海现在传说纷纷，谣言很多，思想混乱，人心浮动，我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你们赶快回来！”

冯国柱说：“要把情况说得严重一点，可以让他们早点回来。”

张敬标强调：“要再加一句，再不回来，我们要正式向中央发电报了。”

大家都同意张敬标的意見。

与北京的电话挂通后，大家都到学习室对面的小会议室，先是冯国柱与马天水通话。他按照电话稿的意思向马天水汇报了上海的情况，说：

“这里很乱……”

“又不是我们要乱！”

“不是不听指挥的问题，而是没人指挥。”

冯国柱问：“你们什么时候回来，明天能回来吗？”

北京那边，王秀珍又接过电话，冯国柱对她说：上海“谣传很多，你们要早点回来。”

张敬标插话说：“不回来要发电报。”

马天水说：“不能发电报。”

冯国柱又报了上海这边在场人的名字，说：“他们都很急。”然后将电话递给叶昌明说：“王秀珍叫你来听。”

叶昌明接过电话，只听王秀珍在电话里对他说：“小叶，你们一定要听指挥啊！”

叶昌明说：“现在不是不听指挥，而是没人指挥啊！你们再不回来，我们要急煞了！”

王秀珍说：“不要讲了，我们明天回来。”

叶昌明说：“下面各种传说很多，弄的人心慌慌，思想很乱的……”

王秀珍打断他的话说：“不要说了，情况我们都知道的，一切等我们回来再说。工会一定要听指挥啊！”

说完，就挂了电话。

大家回到学习室，冯国柱传达了马天水和王秀珍的电话内容，“说一切等他们明天回来后再说。究竟有些什么情况，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冯国柱问叶昌明：“王秀珍对你怎么说的？”

叶昌明说：“差不多的，也是说要听指挥，一切等他们回来再说，没等我说话就挂了。”

大家又是议论纷纷，对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很不满意。

冯国柱说：“我们急得要命，他们又不是不知道！一点情况也不肯说，现在不知打什么算盘，今天说明天回来，明天能否回来也不晓得，这样一天天拖下去怎么行？”

张敬标说：“马天水说 10 日回来的，结果不回来。本来说今天一定回来的，又不回来了。现在又说明天一定回来了。明天要是再不回来，我们一定要向中央发电报了，为什么把人扣住不让回来？这么大的上海，一个书记都不在，出了事谁负惩起这个责任？！”

大家着重议论了马天水、王秀珍讲的“要听指挥”、“一切等我们回

来再说”究竟是什么意思？最后认为：一种大约是他们的态度没有变，要回来和大家一起干的。怕上海这边先干了，他们不能回来。一种是他们态度变了，不会干了，怕上海自己先干了，所以这样说，不让大家干，他们回来是要做大家工作的。但后一种可能性大。

廖祖康说：“他们要是明天能回来，就说明态度变了，不行了！要是在中央坚决顶住的，是不会让他们回来的。”

叶昌明：“他们要是不回来，不一定是坏事，说明是顶的。要是能回来，也不一定是好事，可能是向中央投降了，回来做我们工作的。”

张敬标说：“周司令是部队的，他肯定会变过去的。马天水是老干部，变过去也不奇怪。徐景贤、王秀珍都是新干部，造反派，在上海时态度也很坚决的，为什么一到北京后就变了？我主要是对他们的态度变化感到奇怪，想不出是什么道理！”

王知常：“这有什么奇怪的？人总是会变的！”

冯国柱：“可变得太快了，总想不通是什么原因。”

王知常：“徐本来就是个软骨头吗！‘1.28’炮打时就已表现出来了，被弄到复旦后，什么都答应了。”

朱永嘉：“他们明天能否回来还是个问题，这样一天天拖下去也不是个办法，时机是很重要的，这样拖下去，就会坐失时机的。”

他突然站起来，两手把袖子卷起说：“我的意见，不要等他们了。要干就是今天。今天不干就失去时机了，明天就别想干了。”

王知常接着朱永嘉的话说：“现在不能再等他们回来做决定了，要么大干，要么不干！”

朱永嘉写了一张“民气可用”四个字的条子，在会场上传阅。

肖木也说：“现在不能再等下去了，等马天水他们回来，就来不及了。”

叶昌明表示赞同，陈阿大也说：“要马上干，不干会失去时机。”

冯国柱为难：“他们都还没回来，怎么干呢？”

马振龙和王知常都是自己要求参加会的。马振龙到总工会后，听说“康办”正在开会，于是打电话要求参加。他到会后，见大家正在议论，流着眼泪说：

“我知道你们开会不让我参加，我是自己来的。问题很清楚，中央

出了修正主义，三位领导被抓，我们要为毛主席路线而干。我是提着脑袋干文化大革命，现在我们也是非干不可”，“我四岁死了父亲，是党培养了我，我这人从不流泪的，毛主席逝世，我也没有流眼泪，今天我流着眼泪说这些话，我们只有干，才能保住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这时，马振龙听了冯国柱的犹豫后说：“他们没回来，还有你们常委在，只要市委带我们干，我们一定干！”

马振龙一番话讲得慷慨激昂，朱永嘉马上过去拉着他的手，说：“过去我们有点矛盾，现在要团结起来一起干！”“我先提个建议，要马上派民兵进驻报刊、电台，不要让部队先去了。要马上起草告全国人民书，写好后给报纸连夜印出来，电台早晨6时可广播。这些都要在天亮6时前准备好的，晚了就不行了。报刊、电台我们去通知，民兵进驻不会有有问题的。宣言由肖木起草，你们工会也带个头行动起来，只要民兵一动，我们就造舆论支持你们。要干就大干！现在不干，将来会在历史上留下惭愧！”

叶昌明说：“民兵也要进驻水、电厂等要害单位保护好，不要出乱子。我们可发动工人上街游行，刷大标语，号召群众起来保卫文革的胜利成果。”

王知常说：“写标语就要有针对性，要旗帜鲜明的。他们既然抓了人，我们就可以写：‘还我洪文，还我春桥，还我江青，还我文元！’还可以在报上用通栏大标题印出来。”

永嘉朱问王少庸：“上海的存粮有多少，能坚持一个月吗？”

王少庸答：“光吃是可以的。”

朱永嘉又问陈阿大：“煤呢？”

陈阿大说：“只供应民用，可坚持一个月。”

朱永嘉说：“除了维持一些必要的生产外，其他都停下来，把群众发动起来，粮、煤能坚持一个月就够了。巴黎公社打了9天，我们总可以打一两个星期吧？能打一两个星期就是很大的胜利了！可以让全世界知道，中国不像苏联，到底还是有人起来反抗的！如果被镇压，失败了，那么像巴黎公社一样，历史上也会记上我们的业绩的。我们这样斗了，也对得起几位领导了。”

王知常说：“要血战到底，就像巴黎公社一样，战死到最后3

个人。”

张敬标不无担忧地说：“上海要是这样一干，不是对几位领导的安全更不利了吗？马天水他们原可以回来的，一干起来，中央就不会让他们回来了。”

朱永嘉说：“不会的，历史上有例子的。楚汉相争时，项羽一次把刘邦包围了，要刘投降，刘不肯。项又抓来刘的父亲，在城下威胁刘，说不投降就杀他父亲。但刘邦不吃这一套，态度很强硬，项羽反倒不敢杀刘的父亲，还好好款待刘邦的父亲。这样的例子历史上还有。你越怕他，就越不行。你态度硬，他们反倒软下来了。只要我们一干起来，他们不会有危险的。中央可能会叫他们回来解决问题。还可能把几位领导也放回来。”

叶昌明和施尚英见朱永嘉、王知常态度如此激烈，不免有些吃惊。施尚英觉得，朱永嘉和王知常提出的方案，与前两天他和警备区制定布置的战备方案，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他感到事态的严重，但心里又极为矛盾：一方面担心中央是否真发生了政变？另一方面又深知拉民兵武装反抗中央政府责任重大。他悄悄对叶昌明说：

“他们的情绪不对头，我们要冷静些。”

叶昌明也对施尚英说：“对他们要小心些，不能听他们的去办。”

施尚英不同意朱永嘉提出的民兵占领电台的提议，说电台是军队警卫的，民兵和军队有分工的。

朱永嘉说：“不要紧的，我叫电台的刘象贤将你们民兵领进去。”

施尚英说：“调动民兵要市委下命令的。”

朱永嘉问施尚英：“天亮前民兵能调好吗？”

施尚英说：“来不及的，民兵分得散，……”

王少庸说：“那先调一个团行吗？”

施尚英说：“人调起来也有困难的，天亮前不行的。”

朱永嘉不满，廖祖康也问：“调这么点人，要那么长时间？”

施尚英说：“队伍调起来是很慢的，要是市委下命令调，我们去想办法。”

叶昌明说：“民兵太分散，调起来太慢。不像部队是成建制的，一下就拉出来了。要是来不及，还不如不调的好。不然，我们人没调好，

反暴露了。”

朱永嘉问叶昌明：“工会方面能否马上发动起来？”

叶昌明说：“也要市委点了头，下面才能动的。”

王少庸说：“这样分散怎么打仗，等你们拉出来，部队早就将你们包围了。”

于是，施尚英就在会议室，给正在市民兵指挥部的钟定栋打电话，要钟定栋检查各单位值班和战备人数。随后，施尚英又给钟定栋打电话，要钟定栋做一个重点目标的保护方案。

钟定栋接到电话后，即挂起了上海交通地图，从 12 日晚上一直做到 13 日凌晨 2 时，制定了两个方案。他给这两个方案取了两个名字：“捍一”、“方二”。

“捍一”是对市委、市革会办公处，以及重要目标的保卫方案。

“方二”是对上海外围进口的控制。

康平路学习室里，大家又议了一阵。

王知常说：“他们三位去开会的，可能投降了。马天水是老干部，徐景贤是软骨头，王秀珍是既得利益者，我们不能再等！”

张敬标问：“怎样干？”

陈阿大说：“我们工交组下面工厂有的是船，在黄浦江上弄条万吨轮一沉，就把江封锁了，外面进不来。在机场跑道上开几辆卡车，飞机就不能停了，就把机场封死了。再把电网拉下来，一断电，上海马上瘫痪。”陈阿大解开外衣纽扣，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越说越激动。后来干脆坐在会议室门口的地面上，堵住门，不准人进出，要大家表态是干还是不干。

廖祖康更是激动，说自己整个文革 10 年都跟着王洪文，对王洪文的绝大多数行动都知道，不相信王洪文会反对毛主席。

朱永嘉坚持“马上干！”

廖祖康说：“我是同意马上干的。”

叶昌明和施尚英也表示“同意马上干，但要市委下命令。”

除了四常委外，其他人都一一表示同意马上干。最后，朱永嘉要四个常委表态：是否同意下令调民兵马上干？

冯国柱和张敬标推脱说：“不能急，要好好商量。”

马振龙追问：“到底干，还是不干？不能光说空话，浪费时间。”

陈阿大着急了，说：“你们不干，我们自己干，这样拖下去怎么行？！”

他叫叶昌明跟他一起出去，说不参加这个会了。

冯国柱、张敬标叫住陈阿大，说：“不要急，这是件大事，要好好商量，不能意气用事的。”

陈阿大说：“你们不愿干，还有什么商量的？我不参加！”

叶昌明和其他人也劝陈阿大坐下商量，不要走。

廖祖康要四个常委表态。

张敬标对黄涛说：“你先说意见。”

黄涛说：“我同意他们意见。现在情况也很清楚了，再等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张敬标又要王少庸表态。王少庸说了很多，大意是他同意干的，但怎么干法要商量，是否马上干，要再看看情况定。

张敬标表态说：“我和大家一样，是决心要干的，但怎么干法，什么时候干，要研究。我意见还是等他们几个人回来，问一下情况后再干。”

最后冯国柱说：“大家坚决反修的精神是好的，也是很可贵的。要干的态度，我和大家一样的。要干，这个原则可定下来。但是否马上动手，我意见要等一天。因为北京究竟什么样情况，还不太清楚。他们既然说明天一定会来，还是等他们回来后，了解一下情况，可以更好的准备。”

有人问：“要是明天他们又不回来怎么办？”

冯国柱、张敬标说：“明天不回来，就不再等了，一定马上干。”

还有人问：“要是他们回来，不同意干，怎么办？”

冯国柱说：“明天他们回来，我们去机场接他们，先不回‘康办’，另外找个地方去，先扣起来。”

施尚英不理解，问冯国柱：“为什么要扣起来？”

冯国柱说：“你不懂，他们三个回来也可以代表市委下命令的。我们先问他们是什么态度，要是同意和我们一起干的，就一起干。要是做说客的，就把他们圈起来，不让他们出来，我们自己干。”

张敬标也赞同这个意见。

朱永嘉把陈阿大叫了出去。

一会儿，陈阿大进来又把叶昌明叫出去，施尚英也跟了出来，他们一起来到小礼堂。

在小礼堂，朱永嘉对他们几人说：“这几个老头子靠不住了，现在只有靠我们自己干了，你们有决心吗？”

叶昌明说：“市委不点头，是没法干的，光靠我们也是干不起来的。”

施尚英也说：“要是市委不通知下面党委，我们调人是调不动的。即使想调，下面打电话到市委一问，也就不行了。”

阿大陈也表示，市委不点头，干不起来。

这时，他们发现，除了四个常委外，学习室的其他人也都来到小礼堂了。市委组织部的王日初也来到小礼堂，他也是听到消息后，自己要求来参加会的。

朱永嘉问：“怎么都出来了？”

马振龙等人说：“张敬标说他们要开正式常委会，决定是否马上干的问题，叫我们都退出来。”

朱永嘉说：“这不行，这几个人靠不住了，不能只让他们几个人在里面，不能让他们打电话出去漏了消息！”

他马上对马振龙说：“你快进去，看住他们，不要让他们打电话。”

马振龙立即返回学习室。

会议室，四个市委常委。冯国柱说：“他们商量，我们四个市委常委也要商量一下。”

冯国柱、张敬标、王少庸意见一致，一定要稳住。

黄涛既不说干，也不说不干，踱过来踱过去，只说要准备，要准备。

小礼堂，朱永嘉对大家说：“几个常委不肯干，已靠不住了。现在要干，就要靠我们自己干了。”

王知常说：“要干就大干，小干没意思的。你们干不干？”

很多人说：“市委不下令干，是不能干的。”

王知常说：“现在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还有什么怕的？你们不肯干，”他对肖木说：“我们走！”

朱永嘉劝道：不要急，大家再商量一下。

王知常说：“你们不干，我们在这里干么？还不如回去睡觉。”

大家劝王知常、肖木不要走。王知常说：“你们这么胆小，还有什么好谈的，我不参加了！”说完，他就和肖木走了。

朱永嘉对大家说：“最好还是争取他们一起干。还是让我再去做做他们工作。”说完，他又回到了学习室，对四位常委说：

“8号就应该干，已经错过，今夜再不干，到了明天，一切时机就都丧失，要干就下决心今夜干，而且要大干，要以市委名义干，你们4人和我们一起干。”“今夜要不干，到了明天，他们3人一到，要干也干不起来了！那时我看你们只有唱两只歌的份了，要就只唱革命歌，我就算佩服你们；否则就唱投降歌，但是当你们回忆这段历史时，将会感到忏悔。”

其他人也回到了学习室，只见朱永嘉正站在屋子中间，说：“……这几天我想得很多，反正已活了这么几十年，还有什么怕的？要豁出命来干！”

冯国柱也说：“我也活了这么大岁数了，并不怕死的。”

张敬标对大家说：“常委正式决定，干是要干的，但一定要等一天。要是他们明天不回来，就不等了。要是他们回来不肯干，我们自己干！”

朱永嘉说：“今天不干，就别想干了，没时机了。”

主持会议的冯国柱逐个问大家的态度，都表示要干，会议室内已是极度紧张。张敬标说：“现在不好动，一动，周围和外面的部队就要进来，不能贸然行动。我已快60了，怎么样都没关系，你们还年轻，干革命还要靠你们年轻人，不能作无谓牺牲。”

叶昌明说：“等他们回来是可以的，但可否先做些准备，不然他们回来同意干的，再准备就来不及了。”

冯国柱、张敬标表示同意，说：“准备工作可以先做起来，但不能马上动手干的。”

大家都同意。

朱永嘉说：“不能大干，小干也别干了，还是保存一些力量吧。”

时间已经是10月13日凌晨，大家散去。临走前，叶昌明对冯国柱

和张敬标说，他要将中央发生的情况对下面的工会干部“吹吹风”，让大家有个思想准备。冯国柱和张敬标没有表示反对，只说：“吹风可以，但不要行动啊。”

叶昌明对陈阿大、施尚英、马振龙、廖祖康和王日初说：“已叫黄金海他们在总工会等了，我们是否到总工会去？”

大家同意，于是他们分乘两辆车前往总工会。

第1425回：十二日，政治局见马、徐、王 上海市，总工会往下吹风

10月12日晚22时，华国锋、叶剑英和陈锡联、纪登奎、吴德、汪东兴、苏振华、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等接见了马天水、周纯麟、徐景贤、王秀珍三人，一直谈到13日凌晨1时30分。李先念因劳累没有参加。

华国锋让马天水先谈。马天水汇报了几天来的思想认识过程，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对“四人帮”采取的果断措施。

华国锋拿出张春桥《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的影印件，给了周纯麟、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每人一份，并对徐景贤说：“你给大家念一遍吧。”

徐景贤看出那个影印件确实是张春桥的手迹。当他念完《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陈永贵、吴德、吴桂贤介绍了“四人帮”反对周恩来的一些具体事例。马天水他们听后说：“真没想到他们这样对待总理，在我们面前他们表现得很尊重总理。”

华国锋又介绍了江青控制毛泽东文件的情况，他把江青改过的两个讲话文件拿给马天水他们看，还详细介绍了毛泽东逝世前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如何大闹政治局。华国锋说：

“摇鹅毛扇的是张春桥，这份《有感》是他的总思想，‘又是一个一号文件’，他恨主席恨得很。”

叶剑英说：“上海是受蒙蔽、受封锁的。主席讲，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你们这次来了，情况就明了。张春桥的《有感》里，把阵线划得很清楚，‘他们’‘我们’，搞宗派历来是反党分子的做法。”

华国锋说：“主席不但想打烂‘四人帮’，而且还怕把新同志拉进去，所以在陈永贵同志报告上批了‘钓鱼台没有鱼’。”

华国锋介绍了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后说：“我们不会采取‘四人帮’对别人办法，乱戴帽子，乱整人。有错误改了就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按毛主席的路线，以实践来检验，只要转变立场，我们

是欢迎的。揭发批判，我们欢迎。有些材料要保存好。你们一时思想转变不过来，是可以理解的。廖祖康、肖木，要来京办学习班，他们是青年，要帮助改正错误，我们相信你们能搞得更好。‘四人帮’解决了，全国的形势就会更好，你们过去对外省点名批评，但这次江苏对上海没有提意见。经济上我们一定安排好，煤、铁的供应决不能减少。对于‘好八连’以及其他基层同志的努力，都要肯定，不要因为某某某送过什么东西，就否定他们，要区别开来，群众是好的。”

华国锋还说：“江青和美国女作家维特克谈话，谈了六次，贬低主席，内容下流。‘四人帮’逼着外交部交出，特别是王洪文主持工作，他亲自写信，找乔冠华把材料要回来，后来中央决定，我们说花多少钱也要把这本书的版权买回来。”

叶剑英说：“上海是大革命开始的地方，上海的人民、工人觉悟高，对‘四人帮’的活动如果说以前受了蒙蔽的话，现在则应当看清楚了。你们不能再站在少数人的立场上。站在‘四人帮’的立场上，没有前途。要站在多数人一面，把上海的事情办好。”

中央政治局的人问马天水他们：“你们过去听说过‘四人帮’吗？”

马天水等人回答，从来没有听说过。

徐景贤、王秀珍汇报了这次来北京前，在上海曾和上海警备区的几位领导在一起，部署了民兵战备。现在了解了这几个人原来是篡党夺权的“四人帮”，感到极大的义愤，并表示坚决和他们划清界限，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华国锋笑着说：“你们回去别人会骂你们是叛徒。你们把立场转变过来，就要振作精神，做好工作。”

随着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态度的转变，会议气氛渐渐变得和缓。散会后，周纯麟、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同政治局的人一一握手告别。到了京西宾馆，王秀珍后悔没有交代调动民兵数字的问题。一早，她又找到了会议上负责记录的人，告诉了上海调动民兵的数字，请补到记录里去。

上海，13日凌晨，夜深人静。在蒙蒙细雨中，一辆辆轿车驶出康平路。其中的几辆朝东径直驶向外滩。

矗立在外滩的上海总工会大厦400室。1时左右，陈阿大、叶昌

明、施尚英、廖祖康、王日初、马振龙等从康平路回到这里。黄金海、沈涵、王明龙、戴立清、市妇联主任汪湘君和市妇联副主任强玲英等人已经等在这里了，是叶昌明在“康办”开会时，看到大家都要“大干”，让总工会值班室通知总工会机关人员都来机关的。戴立清是12日晚上连夜赶回上海的。

叶昌明主持开会，他向大家传达了康平路会议的情况，陈阿大等人补充、插话。

说到几个市委常委时，他们说：“老家伙们都在耍滑头，一定要等马老他们回来。”

黄金海和戴立清听了表示：“等什么，再不干，等警备区将军队都布置好，我们就只能束手待擒了。”“这些老家伙，等马老是假的，其实就是拖延时间。”

叶昌明认为，这样大的事情，没有市委出面，单靠工会和民兵指挥部是没有足够号召力的。他说：

“既然常委已决定了要等一天，我们当然不能干的了。但看来等马老、徐景贤、王秀珍回来了，也不会再干的。但是市委不同意干，我们又不能干的。我讲：上海这个地方十分重要的，不管谁来掌权，都是怕上海乱的，乱起来对他们没好处的。现在看来，中央也会怕上海乱的，但我们是不怕的了。毛主席说过，右派上台是短命的，不得安宁的。我们要让他们不得安宁。现在要干，是不大可能的了。但知道情况的人太少了，应把情况告诉下面的干部，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情况。这样即使把我们这些人都抓起来，下面也会有人和他们对着干的，使他们不得安宁。”

他提出，总工会马上召集区县局工会负责人紧急会议，把这些情况连夜吹下去。大家都表示同意。

再说上海民兵指挥部施尚英，他在13日凌晨回到江南造船厂的指挥点后，立即打电报给各区民兵指挥部，包括民兵直属师，要大家一定听从市指挥部命令，千万不要擅自行动。

凌晨1时30分，上海市总工会大厦五楼会议室，召开了39人参加的“吹风”会议，都是总工会机关各组室和总工会所属市工人文化宫等事业单位的负责人，是叶昌明派车分头将他们接来的。

会议开得很短，只有半个小时。叶昌明说：

“现在我们和去北京开会的马老失去了联系。

“据外地传来的消息，还有外国电台的广播，都说中央高级领导中出了事情。王副主席处境危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来的一些同志，都被打下去了。

“对这件事我们要独立思考，经受考验。

“上海正面临着大考验。我们正面临着大考验。……”

凌晨3时，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来冯国柱家，向张敬标和冯国柱讲述了他在南京开会时听到的消息。

送走李彬山，市委办公厅来电话：马天水等三人13日上午9时，由北京起飞回上海。

13日上午，市总工会紧急通知区、县、局和市直属大厂工会负责人共49人到总工会开会。会上众人议论纷纷。

有人说：“王洪文是我们工人领袖，不可能是反革命。”

有人说：“这是算文化大革命的账，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是邓小平路线的继续。”

还有人要求总工会带领各级工会斗争，“头可断、血可流，坚决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

会议结束后，一些局工会又召集下面的工会再吹风，直到基层工厂的工会。

随着中央打招呼会议，“四人帮”被抓消息已经通过各种途径传到上海。许多工会干部有所耳闻。但因为不是正式渠道的传达或报纸刊登，他们不敢也不愿意相信这些传闻是真的。总工会的“吹风”证实了这些传说，让这些与文革共命运的工人造反派心慌和不知所措，都说要和修正主义斗争。

有人到总工会找叶昌明，问：“为啥还不赶快行动？”

叶昌明说：“怎么行动？几个常委都不同意马上干，要等他们回来再说。”

“等他们回来，要来不及了！”

叶昌明：“那也只好等啊！”

“也要想想法子。”

叶昌明：“现在没什么办法可想的，只有等他们回来，看是什么情况了。他们要干，会带我们干的。他们不同意干，你就毫无办法。所以只能坐等！”

上海总工会收到北京寄来的一封信，信封上写着：

上海市总工会

叶常明、唐行南同志 收

北京西单商店

唐行南，市总工会办公室负责人。

信是从白报纸上裁剪下来的小纸条，上面写着一行铅笔字：

叶：王、张、江、姚、金数十人被抓。 10月11日

叶昌明看了信后说：“看来北京也是有反对派的，怕我们不知道这事，特地写信告诉我们。说明我们也不是孤立的。”

唐行南说：“这信看来也是匆忙中写的。”

叶昌明：“北京只有西单商场，没西单商店的，这个署名肯定是假的，写的字迹看来也是故意装的。”

因为信封钢笔字，信纸铅笔字，都写得一笔一划很呆板。

唐行南说：“北京知道我名字的，除了‘全总’的一些人外，就没什么人了。而信封把你的名字写错了，我的倒是对的。信纸上也只是提金祖敏，不提迟、谢，看来是‘全总’几个造反派写的。”

叶昌明马上派人将信送往“康办”，并打电话告诉“康办”值班室：收到信后即送张敬标。

再说谷牧派到上海“八人小组”的李景昭回北京后，10月9日晚，留在上海的人继续外出访亲问友，曹大澄继续与王一平、李庸夫联系。和李庸夫的接头地点都是双方临时约定。为了保证曹大澄的安全，徐良图派王守家、陈斐章保护。他们3人坐一辆汽车，快到接头的路口，提前下车。曹大澄胆子大，走在最前面，中间是陈斐章，王守家随后，每人相隔十几米。就这样，曹大澄一趟一趟出去和李庸夫联系。

“八人小组”到上海，也极大地鼓舞了李庸夫和上海市委内反对“四人帮”的干部，他们将收集到的材料源源不断地提供给曹大澄。

怎样将情报送出去呢？曹大澄、王守家等在衡山饭店试验密写。他们用糨糊在纸上写出来，干了以后，什么都看不出来。到了北京那

边用碘酒一抹就出来了。听说上海四个市区轮流检查邮件，徐良图派王守家、陈斐章坐火车到苏州寄信。王守家、陈斐章刚到火车站，王德瑛赶来叫他俩回去，说不送了。大家回到衡山饭店才知道时间来不及，已另想办法，找老干部或军区打电话。

同时，他们也分头到各工厂了解生产情况。一方面是为了掩护秘密工作，同时也是为了接触干部、群众，直接观察社会动向，了解更多的政治情况。

10月10日，谷牧又派出第二批人员去上海。这天上午，谷牧找轻工业部机械局局长谢红胜和轻工业部计划组副组长陈锦华谈话。谷牧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说：

“我是奉命找你们谈话的。中央已经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现在中央最关心的是上海的情况，所以决定由各部委派一些人，以研究、准备明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名义到上海去。你们到上海后，要尽可能地接触各方面的同志，了解工厂的情况，了解社会上的动向，了解上海市委有什么动作，把所了解的情况尽快写信寄回北京，寄到北皇城根立新路9号，有专人处理这些信件，并随时向中央报告。”

谷牧要他们尽快动身到上海，可是，已经买不到第二天去上海的飞机票了，直到10月12日，谢红胜他们一行才动身去上海，于当晚20时20分到达上海虹桥机场，住进了国际饭店。

在从机场到市区的路上，他们看见沿路的墙上用很大的黑体字写着“永远按既定方针办”的标语，还有两三次看到背着枪的民兵在巡逻。当晚，他们中有人到衡山饭店去找徐良图。徐良图不见，让王守家下楼接待。王守家告诉来者，徐良图外出不在。徐良图这么谨慎，一是他没有接到谷牧的通知，二是大家一直处于被监视状态，不能贸然行事。

晚上22时许，已到上海的轻工业部计划组副组长陈锦华接到中国纺织机械厂党委书记张秀打来的电话，要他们北京来的一行人晚上睡觉警觉一点，并且说：“你们来的人，最好集中在一起，不要单独走开。”

第二天，轻工业部机械局局长谢红胜他们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

工交组和纺织工业局、轻工业局了解情况，看到办公室人来人往，没有大的异常现象，也听到一些反映。于是，先后给北京寄了几次信。为了以防万一，第一封信没敢在上海寄，也是派人到苏州寄的。

13日8时，王一平、李庸夫突然来到衡山饭店。因为他们听说：10月12日晚，黄涛、陈阿大等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10月13日下午17时下班时间打响第一枪，原因是那时街上行人多，部队难以开枪还击。

徐良图觉得王一平、李庸夫亲自到衡山饭店来太危险了，因为他觉得服务员一直都在监视着他们，于是急忙将王一平、李庸夫迎进屋内。

王一平、李庸夫将他们听到王洪文的小兄弟决定今天下午17时发动武装叛乱的消息告诉了徐良图。

情况紧急，此时距离下午17时只有八、九个小时，如何将这份重要情报送到北京？飞机航班已过，坐火车也来不及。王一平提出，可以借用部队备战的红色电话机。于是，由王一平跟江湾路一号总后勤部驻沪办事处领导联系后，李庸夫陪曹大澄一起来到江湾路总后勤部驻沪办事处，曹大澄用这里的电话将消息告诉了谷牧秘书胡光宝。

谷牧10月13日的日记写道：“今天发走了上海问题第三、四、五号，三号是曹大澄用军用电话打来的，四号是密码来的，五号是（王）西萍亲自跑回来的。李伯宁（水利电力部副部长）也坐飞机回来了，谈的情况和西萍谈的一样，没有另写报告。”

第1426回：速返沪，说“大干”功亏一篑 实无奈，大势去唯有痛哭

1976年10月13日上午9时，中央派专机将周纯麟、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4人送回上海。

在飞机上，周纯麟对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说：一、回上海后，立即通知市属各大单位，说明“四人帮”被隔离了的事情是确切的；二、市委马上按中央指示办，逐层传达打招呼会议精神；三、各单位照常工作，不准任何人搞破坏；四、各级领导干部要听中央的话，一切听中央指挥。这四条，要由他们3人亲自给各有关单位打招呼。

上午10时多，飞机在上海虹桥机场降落，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在机场迎接，警备区没有派车接周纯麟，因为他们没有通知警备区。

马天水提出要到丁香花园开会。周纯麟感到，此时最要紧的事是要尽快掌握部队情况，坚持要先回家。

周纯麟一到家，就把警备区政委请来，询问部队情况。政委说，南京军区已传达了粉碎“四人帮”的情况，警备区部队已按南京军区的指示，作了调整和部署。周纯麟紧张的心情有所缓和。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到丁香花园后，先向张敬标、冯国柱、王少庸3人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徐景贤拿出毛泽东给华国锋的几张亲笔批示影印件给张敬标、冯国柱、王少庸看。

张敬标看罢，把影印件往沙发前茶几上一摔，用手拍打着说：“我以为你们带回来什么重磅炮弹呢！原来是这几张东西，上面又没头没尾的，谁拿到了都可以用嘛！”

徐景贤说：“这是毛主席的手迹。”

张敬标说：“谁知道是真是假，毛主席的手迹没头没尾，‘你办事，我放心’的‘你’是谁没有写明，叫人怎么相信？凭这么几张东西就可以宣布人家反党了？！”

说到头天晚上的情况，张敬标边哭边说：“我们老头子反正年纪大

了，死了没有什么……你们说服得了他们？革命革到现在，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弄成这样的下场，培养一批青年干部不容易，他们革命热情非常高。”

冯国柱也边哭边说：“自从你们走后，各路情况摸下来都是传四个人被抓起来了，警备区的几个人从南京军区开会回来也不敢来找市委了。总工会、写作组的人都要起来干，逼着市委表态，而你们在北京不断来电话要家里稳住，一切等你们回来再说。弄得几个在家的人两头受夹，度日如年啊！”

他们最后决定下午召开常委会，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

听到马天水和徐景贤、王秀珍3人已经回沪的消息，写作组的朱永嘉和王知常立即打电话给市总工会的黄金海说：“不能再迟疑了，要立即动手！”

黄金海回答说，叶昌明他们正在开会，要和他们商量后才能决定。

王知常限他们在下午2点半答复。

中午，张春桥的妻子文静让女儿打电话给朱永嘉和肖木，要他们去她家谈谈。到了文静那里，文静对他们说：“难道就这样完了吗？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

朱永嘉答：“常委说要等去北京开会的几个书记回来后再定，没有办法。”

文静不甘心地说：“他们不搞你们可以搞嘛。可以组织写作组的一些人到下面去，搞串联、发动。我不相信群众起不来。”

肖木也表示，要等北京开会的马天水等人回来后再说。

黄金海、陈阿大、叶昌明、施尚英等人午饭后来到工交组黄涛办公室。黄涛对他们说：“去开会的人都回来了，是廖祖康从机场得到消息后，打电话告诉我的。我没去接，是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去接的。”

叶昌明他们问黄涛：“你为什么没去接？”

黄涛说：“没通知我。”

大家说：“四个常委就你一个人不去，看来对你也是不相信的了。”

叶昌明：“看他们回来的这种情况，肯定是不会干的了。”

黄涛：“情况看来很不妙的！可能他们要先商量一下后，再叫我去。估计今天是要传达的。可能先正式常委开会，然后列席常委参

加。也可能他们商量好后，就一起开了。”

陈阿大：“他们是要做我们工作的，办学习班，思想通了才能出来。我准备去了不再出来。”

大家议论纷纷。

这时，接到“康办”通知，下午到“康办”参加常委会。

黄涛对大家说：“现在再要干是不行的了，还是先听他们的，还可以保存一下力量。”

叶昌明说：“准备去了不回来！”

黄金海：“我回厂去等你们消息。要是你们出不来，我带人去救你们。”

叶昌明：“我会打电话来说情况的，你们一定要等我电话，不要有行动。”

施尚英：“我在江南厂，有事可打电话来。”

下午 14 时 30 分，王知常又打电话催问黄金海：“你们到底干不干？决定干，我就带几个人一起来干！”

黄金海说：“施尚英不在，再商量一下。”

王知常很激动地说：“你们这些人这样动摇。动摇怎么行？算了算了，我们辛辛苦苦培养几年的力量，也不要拿出来了。好吧，等你们到 4 点，再不打来就算了！”

下午，总工会的叶昌明、陈阿大接到王秀珍的电话，通知他们去开会。恰在这时，正准备去开会的叶昌明在市总工会司机组接到了王知常的电话。

王知常问叶昌明：“‘康办’开会，你去吗？”

叶昌明反问：“朱永嘉去吗？”

电话那边停了一会儿，王知常说：“朱永嘉要问问你。”

叶昌明：“去的，去听听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也好的。”

王知常问：“你去开会，有什么准备吗？”

叶昌明：“没什么准备。”

王知常又问：“那你们打算干吗？”

叶昌明：“我马上要走了，你打个电话去找黄金海说吧。”

王知常：“你们大干，我就来。要是小弄弄，我是不来的。我这人

就是好走两个极端的,要么大干,要么就不干。”

叶昌明:“黄金海在那里,你找他谈吧。”

叶昌明当即给黄金海打电话说:“王知常打电话来,他现在还想要大干呢!我叫他给你打电话谈。他等会来电话,我马上去开会了。”

黄金海在电话中对叶昌明说:“要是情况不对,你马上打电话来。要是不能讲话,只要咳嗽两声,我就知道了。我带人来救你们。”

叶昌明:“我一定会设法来电话的,你们不要动。”

王知常打电话给黄金海,黄金海说:“人都不齐了,定不下来。”

王知常连声长叹:“好了好了,算了算了,束手待毙吧!”

当叶昌明他们到“康办”不久,办公室通知,会在别处开,叫开会的人集体乘车去。叶昌明和陈阿大在车上说:“不管到什么地方开,我们思想不会通的,反正不准备回来了。”

上海市委常委和列席常委会议到下午 16 时才在锦江饭店 14 楼召开。马天水在会上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精神,徐景贤传达了主席对“四人帮”的一系列批评。

会场上气氛沉闷,没有人说话。

马天水说:“到北京参加会议,听了中央负责人的话后,我开始思想上是想不通的。所以上海打电话来,我不愿接,也不好说。会开好,我向华主席提出,我一个人来开会,回去工作难做,还有两个新干部书记没来,要求让徐景贤、王秀珍也来参加会,回去一起做工作。华主席同意了。所以我们没回来,又叫徐景贤、王秀珍去的。”

马天水他们拿出从北京带来的关于批判“四人帮”的材料。毛泽东手迹影印件“你办事,我放心”,成了众人争睹的重要文件。

黄涛问:“能相信这些材料吗?!”

马天水说:“想不通,允许想,也允许提出问题。但这材料是不能怀疑的。”

徐景贤说:“老实说,我们刚参加会时,也是想不通的,过去从没听说过这件事,为什么毛主席逝世不久,就要这样搞法!华主席在接见我们时,对我们说,‘四人帮’是两面派,你们只知道他们在文革中的情况,他们在中央搞的反党分裂活动,你们是不知道的,所以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一听到这件事,感到吃惊,有想法,也是不奇怪的。王张姚都

是上海的，你们的任务很重，回去要做好工作。我仔细想想，才慢慢想通了。过去我们只看到他们在文革中影响很大，所以相信他们。不知道他们背后搞了那么多阴谋活动。他们是背着我们搞的，与我们没关系的。老实说，就是‘四人帮’掌权，他们也不会搞马列主义的，也是要搞修正主义的！”

黄涛说：“要是想通了，就意味着背叛！”

王秀珍说：“开始听了也想不通，多听几遍，多看看材料，就可以想通了。我们在北京就是这样的。”

徐景贤说：“我担心我们原来做的布置，向华主席说我们原来想不通，来开会前还做了点准备呢！华笑着说早知道了，你们还打了许多电话，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马讲：这件事，会有许多人想不通的。我们要做工作，要允许有暂时想不通的人，允许他们想，允许他们提出问题来。但是不能反对。传达后，肯定会有人贴大字报、大标语的。只能贴拥护的，不能贴反对的。要是贴反对我们的，也不要禁止。但对贴保我们的，包括反击那些反对我们的，要劝阻他们不要贴。现在这个时候，特别要注意不要去和群众闹对立。”

徐景贤还说：“不能贴华主席大字报、大标语，发现即覆盖掉，这是反革命。不怕大字报反对我们，就怕出现两派矛盾，所以一定不能反击。”

朱永嘉说：“这几天我又把几位领导过去的讲话、批示等看了一遍，看不出什么问题来。”“我现在思想很乱，又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不要出国了吧。”

徐景贤说：“朱永嘉是到日本去访问的‘鲁迅代表团’团长，这两天就要去的。这件事，我们在京时，向华主席汇报过。华主席说，既然已定下来的，还是去吧。”

周纯麟、马天水、王秀珍也说：“华主席同意你去的，还是去吧。”

叶昌明开始听传达时，也是抱着不相信态度。但他听到毛泽东对“四人帮”问题的一系列指示后，感到很吃惊，特别是看到几分影印材料后，这才相信这是事实。他没有说话，但流了泪。这时，他意识到原来对情况的估计完全错了，他们这几天的活动也会成为严重的政治错误。他立即向马天水等人提出：

“其他人还在等我们的消息，今天是否就能向他们传达？”

冯国柱、张敬标等也提出，赶快传达。会议最后决定，今晚即在锦江小礼堂先向工、青、妇、民兵、写作组、组织组有关人员传达，明天上午在延安西路 200 召开组办、区县局、大专院校党委负责人会传达。

马天水出去接电话，回来后说：“是马振龙来电说要来参加会，我劝他不要来。他还问我们到底什么态度，干不干。他们急得不得了，我答应晚上就向他们传达。”

晚饭前，王秀珍和叶昌明、陈阿大、汪湘君、陈新发、陈佩珍等人在一起时，叶昌明问王秀珍：

“怎么说了张春桥和江青的一些问题，王洪文和姚文元没什么材料？”

王秀珍说：“主要是张春桥、江青的问题。张春桥是在后面摇鹅毛扇的，江青是在前面跳的，王洪文是被他们拉过去的。姚文元问题不多，他想跳出来，但跳不出来。”

王秀珍又讲了一些叶昌明他们过去不知道的江青的问题。

当晚 20 时，马天水在锦江饭店小礼堂向上海市总工会、市妇联、团市委、市公安局、市民兵指挥部头头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主要精神，也在会上作了自我检查。会场上议论纷纷。马天水所传达的内容，无法说服众人。传达的毛泽东三句话：“你办事、我放心”，“慢慢来，别招急”，“按过去方针办”。黄金海对此表示不解：

“毛主席写的三张纸，三句话，其中一句是‘你办事、我放心’，但这同四人帮无关，传达下来，有什么意思，无非是叫大家不要讲话。”

尤其对将“按既定方针办”，说成是“四人帮”篡改毛主席指示，大家更是想不通：“这和‘按过去方针办’没有实质上的差别。”

马振龙说：“不能相信这些材料的，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搞法？”

黄金海说：“这些材料根本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的，即使他们有错误，完全可以在政治局开会帮助他们，为什么要把人抓起来？”“毛主席的指示很清楚的，批评他们是对他们的爱护、教育，为什么现在要这样搞？要是毛主席在世，是肯定不会这样做的！现在这种做法，党的历史上没有过的，这样搞法不能服人，无论如何想不通的。”

叶昌明也说：“他们有问题，但采取这种做法，我是想不通的。”“现在把他们说得那样坏，和我头脑中对他们的印像，根本对不起来的。要我恨是恨不起来的。”

戴立清说：“为什么要采取抓人的措施？有什么问题，完全可以开会批判么，这样做法，我想不通的。打招呼会上，中央也没拿出什么有说服力的材料来。”

稍有说服力的材料，是毛泽东关于：“四人帮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会场上，更多的人选择了沉默，会场气氛沉闷。

据陈冀德后来回忆：朱永嘉催她表态。她说：“一是不相信，二是想不通。”站起身就走了。回到寝室关上门整整哭了一夜。

马天水说：“想不通也不奇怪的，允许大家想，也允许提出问题来，但材料还是要相信的，不能反对的。”

徐景贤、王秀珍也如是说。

会后，各自按所负责的系统，传达了中央的精神。华国锋新政权最担心的上海的反抗，终于没有实施。

当晚，谢鹏飞悄悄一个人来到马天水家里，对马天水说：

“这是政变，我们应该利用掌握的上海民兵武装，像巴黎公社那样，举行反抗，马老你带头，我们跟着你！”

马天水回答：“军队不在我们手里，民兵根本对抗不了军队。”两人抱头痛哭。

13日深夜，上海有人在马路上刷出打倒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大标语。

第 1427 回：大游行，举国上下齐欢腾 胡厚民，断定是“右派政变”

1976 年 10 月 9 日，中央决定，从即日至 14 日，在北京市部分单位，包括文化部、人民日报社，及全国各地党政军领导干部中，分批传达中央 15 号文件：《中央关于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通知》。

中央分批、分期召开的“打招呼”会议，于 10 月 14 日结束。每次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华国锋、叶剑英做主要讲话。

华国锋讲话时，手上都拿着毛泽东的那三份手稿：

“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

“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十二省讲话”；

还有一份是华国锋向毛泽东的请示报告关于江青要求印发“风庆轮”问题的材料，毛泽东在华国锋这份报告上的批示：“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

华国锋将这三份毛泽东手稿在会上向大家作了传达，然后，着重讲了毛泽东的第一份手稿。他说：“毛主席写的这件三句话手稿，是 1976 年 4 月 30 日晚上，我陪同毛主席在中南海主席住地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我向主席汇报了我处理的几件事情和几个省的一些问题，听取主席指示时主席写的。当时主席说话已经很困难，有的话我听不明白，听不清楚。主席要秘书拿来纸和笔，写了这三句话给我。前两句是主席听我汇报工作后的指示，后一句是对我个人讲的。‘慢慢来，不要招（着）急’和‘照过去方针办’，我在此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四人帮’当时都在场。‘你办事，我放心’我没有传达。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急于篡党夺权，他们密谋策划，把毛主席写的‘照过去方针办’的工作指示，篡改、伪造成‘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嘱咐，在报纸上大造反革命舆论。由于当时全力忙于毛主席的治丧活动，对此没能及时处理。”

许世友在最后一次“打招呼”会上说：“在毛主席治丧期间，我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腰里都揣着手枪，如果‘四人帮’胆敢在会上闹事，抢班夺权，我就毙了这伙坏蛋。”

由于英国《每日电讯报》在1976年10月12日公开报道了“毛的遗孀被捕”的消息，在10月13日经世界各报转载，中共“最大机密”在国外人所皆知了。

这样，叶剑英原定“保密两个月”已经不可能了。于是，在10月14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开宣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同时，也公布了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的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

全国沸腾了。首都北京处于沸腾的中心，全城洋溢着一片节日气氛。大游行席卷了北京。当时的北京人口为800万，半数以上的人参加了大游行。新华社这样描述北京的大游行：

天刚亮，游行队伍的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就响遍全城。一队队的工人、人民公社社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机关干部、革命知识分子、街道居民、红卫兵、红小兵，以及各界人民群众和爱国民主人士、台湾省籍同胞，源源不断地涌向天安门广场，全天共达250万人。他们抬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高举红旗和彩旗，不断振臂高呼：“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整个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上，成了欢乐的海洋。

这里有一封北京大学当年跟着聂元梓一起造反的孙蓬一写给友人的信，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想法：

喜读来书，兴奋得不能自己，本要去洗澡，不洗了，先给你们写封回信。

四人帮之上西天的消息，我是十日知道的，已较迟了。他们的今日，早是意料中的事，我倒没有过速之感，相反，主席逝世后，他们还十分活跃，我都有些焦急了。消息传来之后，我的大脑皮层进入了超限兴奋状态，持续几昼夜，上下眼皮安定团结不起来，过了几个与近些年我的常伴——失眠性质迥然相反的不眠之夜；过去是委屈、悲愤、忧党、忧国，不眠的夜晚是难明的长夜，这次，是胜利、解放、宽慰，以前是

痛苦，此次是幸福的喜悦。一句话，太高兴了！这帮家伙不跨，再下去几年，神州会变成什么样子？！看到现在这副痛的局面，对未来则更加不寒而栗了。当然，对未来的最终结局，我从来是信心百倍的，不管道路将如何曲折，真理终将战胜错误，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共产主义终将实现。

我们过去的行动，是对得起祖国的历史的，这是我们所追求的最大的安慰。至于个人的功罪，根本勿须任何人评说，我们是党共产主义者、革命者的良心行事的，不求别的，只求活着时能问心无愧，死时能有颜面去见马克思，那就不枉此生了。生命是短促的，只有真正做一个忠于自己的信念——共产主义的人，生活才会真正从动物界里提升出来。我没有被四人帮压垮、消灭，活下来了，而且目睹了他们的可耻的今日，就是靠这种理想的力量支撑下来的。

对江青，我们是有个认识过程的，开始出于对毛主席的无限虔诚，当然也就对她十分尊敬，特别是当我们反王关戚时，王关戚的拥护者也有反她的，就更增加了她与他们不是同根生的假象。六七年师大的九·七事件以后，我第一次对她有了怀疑，因她在接见“五大领袖”时公然责难韩爱晶给总理写报告，责问韩：你还要不要革命了！

总理逝世时，我在战友相聚时是放声痛哭了一场。现在每当想到总理，我都禁不住要心酸眼湿的。总理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我们应永远以总理为光辉的典范，来安排自己短促的一生。

昨天，谢静宜第一次拉来北大批斗，迟群在清华批斗，然后两校再交换，最后还要合起来大会批斗。昨天我去学校转了一转，斗争会的主会场在俄文楼。全校听拉线转播，昨天主要批她反华主席。主会场由卫戍区的武装战士严密戒备，可能怕群众冲进去要了她的狗命。校园内外刷满迟、谢的大标语，物理系贴在海淀校门外的大标语是：彻底砸烂迟、谢的狗头！也倒怪有意思，砸烂狗头还要冠一“彻底”二字。大饭厅前，俄语系贴的大标语是：砍掉迟、谢的狗头，为敬爱的周总理报仇！二体打字标语是：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校内还早已贴出要求建立总理纪念堂的大字报。地质、哲学、生物先后贴出还我新北大的大标语。由于领导不得力，校内运动十分不理想，但群众的觉悟越来越高，所以可以说形势是越来越好的。

卫生部斗了刘湘屏，这个骚货，与江青一样，是个地地道道的臭娘子。群众给她总结了她与江娘子有十个一样，其中包括乱搞面首。她至今还领谢富治的工资。斗她时，说她反总理，她开始嚣张地抵赖。后来“刘办”的人起来当面揭露她说：抄林巧稚的家就是你让我去的！她傻了眼。事情是这样的：总理逝世后，林十分怀念邓大姐，几次电话联系未通，最后邓大姐接了电话，劝她不要去看她，林坚持要去，邓大姐答应了，但让她来看看就是，回去不要说什么，林去了回来后，家则被抄了。

六七年三月，戚本禹、陈伯达到北大俄文楼来召开“教改座谈会”时，会上戚公然将周总理排除在无产阶级司令部之外。我记得是因我们在计委保总理后，他才特意来放这顿屁的。计委的那次斗争的细节我已模糊了，只记得与对待余秋里同志有关。你们回忆一下，告我。还有六·五以后，宗式曾告我机院东方红有一个小子公开到校对你们讲，所以反我们，因我们被“老三”收买了，而文革只有打倒“老三”才能结束。这个材料早已上报过。

吴德在解释十六号文件时，在说到天安门事件不能翻案时说：如果说他们当时是反四人帮的，那在当时也是分裂中央，正如9·13以前反林彪一样。当场则引起大哗。事后几乎众口一词地遭到非议，以后吴收回了他的讲话。

想说的太多了，以后再谈。

祝

勇敢地战斗！

老孙 1976·11·18

10月14日，上海市委在延安中路200号召开区、县、团、局和大专院校的负责人以上干部大会，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

徐家汇、康平路市委机关办公的地方，群众已经开始冲进去贴大字报。马路上开始出现彻底砸烂“四人帮”，打倒王洪文、姚文元、张春桥、江青的大字标语。

下午，“四人帮”被逮捕的消息陆续传达到上海群众。群众立即沸腾起来了。机关、学校、工厂贴出各种声讨大字报并迅速蔓延到街头。

一支支自发的游行队伍出现在大街上。群众游行队伍一层一层地包围徐家汇、康平路市委机关办公大院(楼)。

上海交通大学师生员工走在最前面,首先到康平路刷大标语:“砸烂反革命黑窝!”“揪出反革命的帮凶!”“清除四害,斩草除根!”他们还迫使徐景贤走出机关大院,接受师生们递交的抗议书,并要他转告马天水、王秀珍,要好好检举、坦白、交代!

10月15日凌晨,上海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的师生,高举“欢呼打倒‘四人帮’!”的横幅,走上街头,举行自发的庆祝游行。就连许多集中待命的上海民兵,也加入了欢庆的队伍。

10月15日凌晨,上海市委给中央打了一个紧急电话,说:“我们估计,这类大字报一多,特别是联系上海市委的标语增多的话,有些思想尚未转过来的人,会贴出反击大标语。有的会出来支持市委,甚至可能贴出为‘四人帮’辩护、矛头指向党中央的大标语。如有打砸抢者,我们将采取坚决措施予以镇压。”

上海市民兵指挥部也在报纸上发表公开声明,上海民兵的“枪杆子永远听从党中央指挥”。

有人将江南造船厂的电台拿出来示众。

这天,《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在头版报道了上海工人阶级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决心坚持“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同一切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斗争到底。这是上海报纸首次公开不点名地揭批“四人帮”。

当天下午,马天水在文化广场召开了万人大会,传达中央精神。徐景贤仍然称姚文元为同志。他的话激起群众的愤怒,大家将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轰下台,会议由周纯麟主持。周纯麟传达完中央精神,要求广大干部、群众坚决听中央的话,按中央的指示办事。从此,上海游行、集会,规模越来越大。

从15日开始,上海群众自发地连日举行游行集会,络绎不绝。数以万计的群众拥进康平路上海市委大院,质问上海市委为什么不传达中央关于上海是“四人帮”基地的指示。

徐良图小组及时将上海最新动态报告北京,谷牧马上编成《上海

来信》送交中央。18日,《人民日报》报道:上海二百万产业工人坚决拥护中央两项重要决定,决心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同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斗争到底。

15日,上海“长自轮”领导听到打招呼会议的消息,16日传达给船员,当天下午起锚,开船去大连,17日晚在船上传达给48个旅客,旅客无不兴奋。当晚,100多名船员、旅客召开声讨大会,悬挂打倒“四人帮”的大幅标语。当时,辽宁省还没有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大连的群众并不知道抓捕“四人帮”的消息。18日子夜2时许,“长自轮”到达大连港,因挂有粉碎“四人帮”的标语,港监不让进港。“长自轮”将此情况报告上海远洋局。很快,大连港监上了船,气势汹汹地说:“没有信号不能进港。”船上用无线电话再三联系。旅大市委命令:“叫你们政委下来。”船上召开支委会,认为问题大,没有让政委上岸交涉。旅大市委第二次又命令:“一、不准进港。二、撕下大字报,自己与上海联系。三、给旅客做工作。四、接受地方党委领导,否则犯错误。”船上领导研究后,决定给中央、交通部写报告,再增加三幅拥护中央决定的标语。

“长自轮”的报告很快到了华国锋那里。华国锋说:“应该支持上海的工人。”

8时20分,大连港接交通部的通知,准许“长自轮”进港。

因双方僵持了6个多小时,“长自轮”船员大怒,一上岸,拿着糨糊桶到处贴大标语,刷到13辆汽车上。“打倒‘四人帮’”“打倒毛远新”的标语一直刷到旅大市委。4个便衣警察一直跟着船员,但是不敢行动。

华国锋高兴地说:“上海人民知道粉碎‘四人帮’的时间早,广大群众对‘四人帮’的愤恨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这实在好啊!这个消息实在好啊!我听了实在高兴,这些工人实在好。向上海工人阶级学习。”

10月7日下午,中央派专机接湖北省委书记赵辛初、赵修、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8号到北京开会。当晚,正在召开的湖北省革委会会议仓促结束。

赵辛初、赵修、杨得志3人回到武汉。10月12日,湖北省委向省直机关传达“四人帮”被抓的消息。

胡厚民私下说：“我作好了坐牢杀头的思想准备。断定这是一次右派政变。”他嘱咐下面的造反派：“同志们准备迎接最艰苦的风浪，已经是考验同志们的时候了。”“你们以后不要乱跑了，特别是不要到上面头头这里来，把毛主席给江青的那封信好好回忆一下，自己领会就行了。”

一天，一些“二司”中学红卫兵的头头到谢保安家里聚会，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李迎希的儿子李江也来了，他说王张江姚被抓起来了。大家就七嘴八舌说是右派政变，还猜测上海那边会不会有动作，甚至说到要上山。

此时，已经过文革中多次折腾的谢保安多了一份谨慎，联想到自己可能会因此又有一段非常难受的日子，就让大家赶紧散了，不要再议论这个事情。

谢保安将“四人帮”被抓的消息告诉《长江日报》的邓国栋，他不相信。再接着就听说朱鸿霞他们下落不明了。谢保安想到自己的母亲刚刚去世，父亲去了株洲姐姐家里。他当时的工作单位在铁路上，分配在铁山，他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回铁山去。

因为赵修曾经带着谢保安到处宣传，说要给谢保安补台当武铁分局革委会副主任，所以他回到单位后，受到隆重的礼遇。此时下面还不知道“四人帮”被抓的消息。

但是当时气氛毕竟已经不是很正常，谢保安觉得还是应该先去探望一下父亲。他没有向单位请假就去了株洲，在那里和父亲一起呆了两天。果然，这是他和父亲的最后一次见面。

谢保安从株洲回到铁山，武汉铁路分局原“百万雄师”的头头陈文彩带了铁路的人来抓他。当时流传一个造反派的联络图，在这个图上谢保安的级别很高。很久之后，武铁分局的党委经湖北省委批准，才做出对谢保安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这个时候，他已经被关在地下室很长时间了，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冷。因为没有什么过硬的材料，到了1977年春节的时候，放3天假让谢保安回家。以后就是在铁路上到处批斗，东起黄石，西迄十堰，北至广水，南到蒲蕲。

第 1428 回：打游击，云南也准备起事 心不甘，湘渝造反派无奈

1976 年 10 月 12 日中午，云南黄兆其得知“四人帮”被逮捕的消息后，于 13 日、16 日，两次召集刘殷农、涂晓雷、张奎林、徐宝兴开会商议。黄兆其认为这是“右派政变”、“修正主义复辟”。会上决定“学蔡锷起义”，搞“武装斗争”，“上山打游击”。并确定，由黄兆其、涂晓雷负责与部队叶秀锦等联系；策动军内的人出来“充当蔡锷式的人物”；选择楚雄等地为基地；由刘殷农、张奎林、徐宝兴分头给省、市级机关和各地区的同志“打招呼”，作好思想上、组织上和物质上的准备。

他们还研究了控制省建、煤机厂、海口三五六厂等单位的民兵和武器弹药；策划绑架军区和省委领导干部，占领广播电台，发布“告全国人民书”等。

云南文山州革委会副主任何立宽也是在 12 月 12 日中午得知“四人帮”被逮捕的消息，他认为是“右派政变”，希望发表毛主席致江青的信，希望国内爆发“革命”。10 月 13 日，何立宽派任怀灿、马昭去昆明找黄兆其、刘殷农探听动向和行动计划。并向任怀灿、童永昌等人提出了上山打游击的问题。

10 月 14 日，涂晓雷将武装起义的计划告诉了昆明军区的许梅康等人，同时参与分析了有关部队的情况，统一了搞武装起义的方案，确定要搞“云贵联合”。安排黄兆其与某副司令面谈的时间、地点。

10 月 14 日至 16 日，刘殷农分别向昆明机床厂、煤机厂，省国防工办、省机械局、昆明铁路局等单位的人部署了任务，要他们“控制民兵”，“注意各地动向”，“学习蔡锷”，准备“上山打游击”。向楚雄的柯平、安且康、杨跃才、杜勇，文山的任怀灿、马昭等人，传达了准备武装叛乱的计划，要他们“作好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的准备”，“点起这把火”，到时间就到那里打游击，并要任、马二人“马不停蹄”地赶回去做准备。

10月16日,涂晓雷将与军队许梅康等人联络的情况向黄兆其、刘殷农作了汇报,同时又进一步策划了武装起义的行动计划。

这天,刘殷农派吴福全乘飞机去上海探听武装起义的动向,黄兆其给省交通局张贤忠、煤管局金奕旦、海口三五六厂刘志宏等人打了“招呼”,要他们“准备迎接严峻的考验”,准备武装斗争。

10月17日凌晨4点,任怀灿、马昭从昆明返回文山,立即向何立宽转告了刘殷农“粉碎四人帮是真的,走资派可能趁机翻案报复,我们要坚持斗争,要是真的干起来,要依靠民兵和产业工人,实在不行,就上山打游击;要与部队取得联系,争取部队支持;现在要作好思想和物资准备”的意见后,何立宽即与任怀灿、马昭、李玉芬、李传田、丁行红、蒋绍明、杨和昌等人,先后在李传田及其家中,策划了武装起义,上山打游击,地点选择在文山老君山;医药由李玉芬准备;车辆、汽油由蒋绍明、杨和昌准备,收发报机和报务员由余相德准备和物色,地图除原准备的11张军用地图用于上山打游击外,又从李传田处拿到文山州地图和云南公路图各两份,并搞到手枪。10月13日和19日,又分别从丁行红处搞得五四式手枪1支、子弹23发、军用手榴弹4枚。17日、19日,何立宽又要任怀灿、马昭到文山驻军要武器弹药。

10月14日,云南楚雄州委副书记刘光兴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后,于10月15日下午,在州医院李国樑家召集邱立峰、赵文鼎、安且康、李国樑等人开会,认为逮捕“四人帮”是“右派政变”。刘光兴决定派柯平、安且康连夜上昆明找黄兆其、刘殷农联系。

10月16日上午9时,柯平等人在刘殷农家找到黄兆其、刘殷农。

黄兆其对柯平说:“形势可能有大反复,要准备经受一场严峻的考验”。

黄兆其走后,刘殷农具体向柯平,安且康布置,要楚雄地区“做好武装斗争的准备”,“如昆明出现不利情况,你们楚雄将成为我们的基地”。刘殷农还表示“对楚雄寄予希望”并要求“要有转入上山打游击的思想准备,不要放弃民兵的领导权”。

16日下午,柯平等入赶回楚雄,当晚刘光兴在柯平家与吴向忠、柯平、李国樑,安且康、邱立峰等人密谋策划武装叛乱。柯平传达了黄兆其、刘殷农的旨意后,刘光兴说:“我们的情况是好的,搞武装斗争是有

条件的,文的武的我们都要准备”。“要做好思想准备,重上紫金山,上山打游击。”当议论到武器问题时,刘光兴说:“只要分区有人参加,枪支不成问题”。

10月18日晚,刘光兴继续在李国樑办公室内与吴向忠、柯平、李国樑策划武装行动计划。刘光兴说:“各县搞各县的力量太分散,为了便于集中指挥,要分东西两片”。会上确定上山时全州分东西两片。西片以楚雄为中心,楚雄、南华、牟定、禄丰四个县,大约有3000人左右,地点在哨区,由刘光兴和各县的头头负责;东片以武定、元谋为中心,大约有2000人左右,地点在武定元谋之间。由付永昭、王朝明负责。并决定分别向各县“打招呼”。

1976年10月中旬至12月,黄兆其又与刘殷农等共同策划“改变策略”,组织第二套指挥班子。还由涂晓雷等写了揭批“四人帮”罪行《提纲》、《春城魔影》、《周兴是怎样死的?》等文章和传单。

10月14日,听到“四人帮”被抓消息的湖南唐忠富与胡勇、张厚、雷志忠、胡求生等人在长沙汽车电器厂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唐忠富说:“十·六事件”是“右派政变”。会上提出“要分别找一些头头通气,要捆紧把子。”还议论了“上山打游击”。

会后,唐忠富找叶卫东秘密串连,告知了会议的内容。

但是,毕竟大江东去浪淘沙,得民心者得天下。此时“四人帮”已失去了中国大多数民众的支持,这计划终究都成东流之水,没有激起稍许浪花。

10月8日,有人找到重庆市革委会副主任黄廉,对他说:“听到国外广播,中央发生了右派政变。”很快,重庆大学也传说出了大事,到10日的时候,重庆谣言满街都是了。

10月18日,重庆市委在礼堂传达中央17号文件,周家喻、黄廉都坐在主席台上。当念到华国锋任职时,满场掌声,周家喻拍得懒洋洋的,黄廉更是抱着手,不鼓掌。结果下面就喊起来:“把黄廉拉下来!”

重庆市委书记鲁大东走到黄廉的背后说:“等下出场你坐我的车。”

黄廉没有理他。一散会,他走到主席台后面,许多人蜂拥而来,在他周围挥拳舞掌。黄廉表面上装得无所谓,内心却已深深地体验到了

一个政权将要覆灭的强烈感受：原来政权中间的聪明人，要抓住一切机会，踩着不识时务者的鲜血爬得高一点，每个人都在一霎那间都理清了思路：“自己要为将来准备一点什么。”

回到市委一号楼，鲁大东走过来问黄廉，粉碎“四人帮”他“事先晓不晓得？”

黄廉问他：“你晓不晓得？”

鲁大东说：“不晓得。”

黄廉此时还不忘讥讽鲁大东，说：“你跟邓小平那个好，他事先没有告诉你呀。”

晚上部队鸣枪，敲锣打鼓，第一批出来游行的是文化界的学校。

黄廉穿上军大衣，戴上棉帽子，把整个的游行队伍看完。他回到宾馆跟总台的寇玉林说：“前几天还在毛主席遗像前哭得天昏地暗的人、举手发誓的人，都到那里去了。”

寇玉林说：“你讲话要小心，周围搜集情况的人多得很，鲁大东已经布置了公安局。”

黄廉从宾馆回到木材站，很多人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不清楚。长安厂来了几个工人找他，问他：“忍了吗？”“上山吗？”“有什么办法？”

也有人说要到体育馆去集合，准备上山打游击，黄廉要他们不要冲动，但内心一片茫然……

黄廉打电话给13军，回答说是一级战备，放假都没有了；打电话去民兵指挥部找李木森，电话里回答说：“他们来干什么，他来了还不一定走得脱。”

黄廉心想：“可以想见搞修正主义政变好容易了。”

有个13军的干部建议黄廉去尼泊尔，说可以告诉边防军放他过去。黄廉说：“我去尼泊尔干什么。”

10月20日黄廉去市委，当兵的拦住他不让进，说里头的领导在开会。黄廉说：“我就是领导。”

警卫说：“大东同志让你在外面等一下。”

此时，市委宣传部门口已经贴满了大字报，主要都是勒令黄廉、周家喻要老实交代与“四人帮”的关系。黄廉看了说：“是不是要回到文革初期那样，由我们当走资派？”

有个干部说：“恐怕还要恼火哟。”

10月16日，李先念打电话征询陈云对粉碎“四人帮”后各项工作的意见。陈云谈了他所考虑的一些问题。李先念希望陈云把这些意见写成书面材料交给他。18日，陈云将意见写成文字，在同王震、姚依林商量后送给李先念。送出前，陈云给李先念写了一张便条：

“十月十六日你在电话中要我把向你提的意见写给你，现已写出，并与王震、姚依林同志一起议过，他们也同意。特遵命送上，供你参考。妥否，请酌。”

在这份意见中，陈云说：“政治局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处理稳妥，进展顺利，我认为很好很好。”

“一、要把反‘四人帮’的文件写好。着重说明为什么必须在十月六日采取行动。因为：八亿人民中多数还不知道他们阴谋的内幕，七亿农民是在农村和穷乡僻野。因为‘四人帮’中有一位是主席的夫人。着重说明为什么必须在主席逝世四个星期就采取措施。

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三、支持各省委工作。使党的这个重要环节能坚强地工作。包括上海在内，让他们自己与‘四人帮’划清界限，好好工作。

四、在外地的政治局委员要经常到北京参加政治局会议和工作，要成为制度。

五、准备在时机成熟时召开三中全会。

六、恢复党的好作风。因为毛主席倡导的许多党的好作风被‘四人帮’破坏干扰了。”

“防止这次运动扩大化。对还在闹派性的人，号召他们化悲痛为力量，上班工作，团结起来，共同革命；对他们的办法，只能是教育，一切也都为了教育；要防止又翻烧饼。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是老中青，只是不要聂元梓、蒯大富式人物。中央和省市领导同志不要提‘四人帮’中个人私生活的丑事，而要批判他们的反动路线和政治上的大事，这样做对党有利。要再查一查今年四月天安门事件的真相；当时绝大多数人是为悼念总理，尤其担心接班人是谁？混在人群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人帮’对这件事有没有诡计？”

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

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即中央 16 号文件，宣布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隔离审查的决定，列举了他们反党篡权的罪行和毛泽东 1974 年以来对他们的批评。

《通知》在列举了“四人帮”的罪证后，首先指出：“我们党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然后指出：在揭发和批判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中，要注意政策。要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要切实执行毛主席的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对犯错误的人，要区别对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受了“四人帮”的影响，说了错话，做了错事；又有极少数人是跟着“四人帮”干坏事，陷得很深的。要允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改了就好。不要揪住不放，不要纠缠历史的旧账，不要一棍子打死。中央热烈希望，跟随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尽快觉悟过来，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划清界限，揭发他们的罪行，转变自己的立场，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通知》要求将文件发至县团级，传达到全体党员群众。文件还说，有关这个反党集团的材料，“中央将继续印发”。

第 1429 回：告急电，中央工作组抵沪 双庆会，英明领袖华国锋

10月18日上午，人民日报社召开全体职工大会，正式宣布中央派迟浩田3人接管《人民日报》的决定。迟浩田登上讲台，会场鸦雀无声。当他宣读完中央决定，并发表讲话，表示要和报社同志团结一致，办好《人民日报》时，会场上猛地响起雷鸣般经久不息掌声。

10月1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新华社上海17日电讯：《上海二百万产业工人坚决拥护党中央两项重要决定 决心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同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斗争到底》。电讯中提到的“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是当时对“四人帮”的特定的代名词。

10月19日，在玉泉山4号楼苏振华的住处，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根据中央的部署，研究了接管上海的主要问题，便分头作必要的准备。

当天下午，上海交通大学的团委、学生会在上海文化广场发起召开了全市16所高等院校的“声讨‘四人帮’大会”。同时，不少听到消息后赶来的工人、机关干部共计3万多人也参加了大会。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音乐学院等单位的代表发言，这是上海最早召开的一次声讨“四人帮”的群众大会。大会通过了向中央的两点请求：(1)立即改组上海市委，组成新市委，领导上海人民进行揭批“四人帮”的斗争。(2)立即派中央调查组到上海，调查“四人帮”在上海的一切罪恶勾当。

这天深夜，上海市委向中央打了第二次告急电话，内容是：“原来打算在文化广场召开上海市委愤怒声讨‘四人帮’反革命罪行大会，但考虑到一百几十个单位定于明天(20日)在人民广场召开30万人的大会，带头的是交大。他们的负责人通知我们说，市委的大会是阴谋，他们要冲大会……市委机构整个已经瘫痪，急请中央予以指示。”

10月20日，苏振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正式主持召开中央

工作组会议。苏振华说：“党中央决定立即派一个强大的工作组去上海接管党政大权，事情十分紧迫，请各位稍做准备，立即赶去上海。”

苏振华让人与上海海军方面联系，通知上海虹桥机场，说是海军方面有关领导将来沪检查驻沪海军的工作，并由海军方面自己派专车前来接待。

会后，苏振华一行 14 人立即乘海军的专机直飞上海，于当晚 18 时在上海虹桥机场降落，却没有见到前来接他们的海军部队。

秋日的上海滩，下午 18 时已近黄昏，机场上的灯光也开始亮了起来。苏振华等人从机窗向外看去，只见平时繁忙的上海航空港，此时却有些冷清，仿佛被一种异样的气氛包围着。再看看四周，那气氛让人觉得整个机场正处于严密的戒备状态。大家都不知道飞机外面的情况，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

就在这个时候，有两名军人走进了机场保卫严密的贵宾候机室。这正是中央工作组想要回避的人，他们一个是上海警备区的领导，一个是上海市委警卫处的负责人。

苏振华他们在飞机上等了十几分钟，一直没有见到前来接他们的海军武装部队，不免有些着急，不知道从北京起飞之后在上海的地面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不知他们将面临什么样的严峻局面。就在他们焦急等待的时候，只见一支车队飞快地朝机场开来。苏振华一看，高兴地说：“好，我们的海军来了！”

这是海军派来迎接苏振华一行的车队，车上坐着全副武装的海军战士。到达机场之后，汽车一字排开，战士们跳下汽车，迅速将这架专机围了起来。带队的是海军上海基地司令员杜彪和政委康庄。二人向苏振华敬礼，并汇报说：“苏政委，我们接你们来了，迟到了一步，对不起。”

苏振华将手一挥，只说了一个字：“走！”

可是，当他们走出机场时，却被人拦住了。就是刚才先到贵宾候机室的那两个人。他们来到苏振华面前，向苏振华敬礼说：“请问各位首长，你们到上海是有事呢，还是路过？”

苏振华一听，不由皱起了眉头，问道：“我没有通知你们，你们怎么会到这里来？”

苏振华说完之后不敢久留，一行 14 人急忙登上海军基地的汽车，飞快地开走了。

中央工作组去上海，事先没有通知上海市委。直到深夜，中央才正式通知上海市委。

苏振华一行到了海军上海基地招待所住下后，就把马天水找去，问他从北京回来后做了什么？现在的认识怎样？

马天水结结巴巴地回答，从北京回来后，已把中央精神向市委常委和区县局干部作了传达，并印成文件发到基层。群众都起来了，冲击市委，我们已难于工作，现在中央工作组来了，我们就好办了，我们保证服从你们的领导。

苏振华对他说：“我们是工作组，主要是了解情况，市委的正常工作还是由你们负责，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过去，你们在‘四人帮’的泥坑里陷得很深，现在要打起精神，将功补过，上海出了问题，还是由你们负责！”

徐良图小组将上海的情况源源不断地送到北京，谷牧据此源源不断地编成《上海来信》。谷牧日记：10月 16 日，发《上海来信》第十、十一号。10月 19 日，发《上海来信》第十六至十八号。10月 20 日，发出《上海来信》第十九、二十号。

20 日晚，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率中央工作组到达上海，谷牧停止编写《上海来信》。后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还问谷牧，《上海来信》怎么没有了？谷牧说，中央工作组到了上海，上海来信就结束了。

10月 21 日上午，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找从南京赶到上海的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副参谋长张挺。苏振华提出，鉴于上海“四人帮”的余党贼心不死，蠢蠢欲动，请南京军区继续加强戒备，特别是江苏、浙江一线的部队要保持高度警惕，海上的情况由海军负责。上海警备区那两个与武装叛乱活动有牵连的人，立即调回南京。请南京军区另外抽调人员到上海。有人提议驻扎在无锡的野战军向上海方向拉练，造成一种威慑。叶剑英表示，不需要这样做，要相信上海工农群众，军队一调动，马上就会引起恐慌了。

在苏振华和南京军区领导谈话的同时，林乎加、严佑民找先期到上海的工作组成员开会。工作组把到上海这 10 天的情况向林乎加他

们作了汇报。

10月20日，中共中央成立专案组，审查王、张、江、姚的反党罪行。专案组由华国锋负责，成员即政治局委员。专案组下设办公室，汪东兴兼主任，成员有于桑、严佐民、武健华、周启才、任子超、王志民。

10月21日，中共中央通过广播和报纸，宣布一举粉碎“四人帮”，北京市150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

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任平的长篇文章《一个地地道的老投降派》，揭露“狄克”反对鲁迅。“狄克”是张春桥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用过的笔名。这是报纸上批判“四人帮”的第一篇文章。文章只点“狄克”，没有提张春桥的名字。

1976年10月21日，85岁高龄的郭沫若作《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庆贺：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
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
自比则天武后，
铁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
一枕梦黄粱。

野心大，
阴谋毒，
诡计狂。
真是罪该万死，
迫害红太阳！
接班人是俊杰，
遗志继承果断，
功绩何辉煌！
拥护华主席，

拥护党中央。

10月21日晚上，在海军上海基地招待所的会议室里，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找来谈话。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是通知他们：10月24日北京要开百万人大会，全国各地都要召开这样的大会。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苏振华和倪志福届时回北京参加全国的大会，彭冲回南京参加江苏省的大会。上海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基地，开好这个大会尤为重要，对全国影响很大，你们一定要同全国人民站在一起，开好这个大会，这对你们也是最好的考验。谈完话后，苏振华、倪志福就回北京，彭冲回南京了。

21日晚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打破了多天的沉默，播发了新华社报道的北京游行盛况：“广大游行群众热烈欢呼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愤怒声讨‘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

22日，《人民日报》以套红标题《首都一百五十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伟大胜利》，刊登新华社21日夜报道的北京群众的庆祝活动。“四人帮”一词第一次公开见报。

22日，首都军民冒雨继续举行盛大庆祝游行，欢呼声、口号声、锣鼓声、鞭炮声交织一片，从早到晚响彻北京。

23日，北京的庆祝游行达到高潮。从天刚亮一直持续到夜晚。3天来参加游行的群众达580万人次。

从21日起，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人民群众及解放军各部队纷纷举行盛大的集会和游行，纵情欢呼党中央为国除了大害，热烈庆祝这一伟大胜利。

在那些日子里，人们称颂华国锋“为党锄奸，为国除害，为民平愤”。

在那些日子里，人们称“人心大快”，亦即“党心大快，军心大快，民心大快”。

在那些日子里，两报一刊社论用这样的话来形容中国：“万里河山红旗展，八亿神州尽开颜。”

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对林彪，一下子就恨起来了；

对刘少奇，是恨了很久才恨起来；对邓小平，是怎么也恨不起来；对“四人帮”，则早就恨在心里了。

新华社 1976 年 10 月 23 日的一则电讯在报道遵义的大游行时，把华国锋跟 41 年前的毛泽东相提并论，把粉碎“四人帮”跟遵义会议相提并论：

今天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采取英明、果断的措施，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在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关键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10 月 24 日，北京的大游行进入最高潮。下午 15 时，北京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集会，庆祝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庆祝粉碎“四人帮”。这次大会被称作“首都庆祝大会”，也叫“双庆”大会。华国锋、叶剑英与其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全都出席了这次大会。

这是华国锋作为中国的领袖，第一次在万众欢呼声中登上天安门城楼。虽说在一个多月前，他曾在一片凝重的气氛中，在天安门广场主持了毛泽东追悼会，但是那时他的身边站着王张江姚“四人帮”，他的领袖地位尚未确立。今日的天安门广场，却是以彩旗代替了上月的黑纱，以笑语代替了上月的啜泣。

这次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百万群众盛大集会，成了华国锋登上中国领袖地位的隆重庆典。

《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支歌，往日仿佛是毛泽东“专用”的。毛泽东总是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中登上天安门城楼。这天，华国锋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登上天安门，这意味着华国锋已经成了中国的新舵手。

新华社这样描述华国锋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热烈场面：

城楼上下，广场内外，一片欢腾，欢呼声、口号声、锣鼓声响彻云霄，最生动地表达了全党三千万共产党员，全国八亿人民对自己领袖华国锋主席和党中央的衷心拥护和完全信赖，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和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前途充满信心。华国锋主席身着绿军装，高兴地频频向百万群众亲切招手致意。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在首都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乘毛主席病重和逝世之机，迫不及待地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我们面临着党变修、国家变色的现实危险。我们党处在一个严重困难的时刻。经过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我们党胜利了，无产阶级胜利了，人民胜利了！”

“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采取果断的措施，揭露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巩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使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能够继续沿着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航向胜利前进。”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不听毛主席的话，肆意篡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

“他们崇洋媚外，里通外国，大搞投降主义和卖国主义。他们路线的实质，就是根本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国内，篡改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国际，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投降帝国主义。”“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所作所为，证明他们就上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是一伙资产阶级的阴谋家、野心家。”

这天，中国各地都举行了“双庆大会”。

10月24日，上海百万军民云集人民广场，大会横幅上的字是这样排列的：

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上海军民大会

热烈庆祝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

人民广场上空，依然是马天水的声音——大会由他主持，头衔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革会副主任”。

大会给“华主席、党中央”发去致敬电：

“敬爱的华主席、党中央！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被彻底粉碎的特大喜讯传到上海，上海全市立即沸腾起来了！连日来，

全市一千万军民涌上街头，结队游行，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愤怒声讨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上海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解放军指战员、民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红卫兵、红小兵和其他劳动人民，一致奋起。浩浩荡荡的队伍汇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奔腾不息；锣鼓声、鞭炮声和激昂的口号声，震荡百里浦江，响彻万里长空。千万张革命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街头，万炮齐轰‘四人帮’反党集团；揭发、批判、声讨‘四人帮’篡党夺权滔天罪行的怒潮，席卷全市，势不可挡，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在念致敬电的时候，坐在主席台上的徐景贤、王秀珍也不时跟随着大家鼓掌。

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改组上海市的领导班子，中央的通知是：为了加强对上海的领导，中央决定苏振华同志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倪志福同志兼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彭冲同志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在收到中央的通知后，中央工作组按照当时重大事件要组织群众祝贺报喜活动的惯例，决定组织上海市群众祝贺报喜活动，并派先期到达上海的国务院轻工业部计划组副组长陈锦华找上海市委商量落实。陈锦华当即从工作组的住地延安饭店到康平路市委书记办公大院直接找到马天水，对他说了中央的通知和工作组的意见，请市委、市革委会部署通知，祝贺地点定在外滩市革委会办公大楼，有关祝贺报喜和群众的游行顺序、交通指挥等，要一并做出妥善安排。

马天水表示立即照办。

10月27日，市委召开区县干部会议，传达中央通知，苏振华讲话，宣读了中共中央改组中共上海市委的决定。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也坐在主席台的最后一排位置。在会上，马天水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身份发言，表示“坚决拥护”。

这一消息刊载在10月30日《人民日报》。

当天的会上已经有许多人发言揭批“四人帮”及其上海的余党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其中以文革前上海市副市长张承宗的发言

揭发最为尖锐。他在会上揭发说，马天水曾经让工厂突击生产几万副手铐，他质问马天水：你赶做这几万副手铐，要干什么？你要铐谁呀？谁让你这么干的？马天水没有回答。因为当时会议上围绕着武装叛乱、篡党夺权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斗争的气氛极为紧张。

随着审查的深入，马天水患上反应性精神病，精神失常的状况越来越严重，直至确诊为偏执型精神病。

第 1430 回：派军队，解决保定府问题 要批邓，河南抓捕造反派

北京 10 月 24 日“双庆”会结束不久，要求“停止批邓”的呼声不断高涨。这一年的冬天，北京人还是不能安分。他们刚刚在天安门广场上向着英明领袖华国锋欢呼，可是一出来就觉得少了点什么。

“少了邓小平”，一个记者说。

叶剑英派他的小儿子亲自驾车把邓小平接到西山，亲自向他传达政治局会议精神。邓小平一见到叶剑英，万分激动，长叫了一声：“老兄……”两人的手便紧紧握在了一起。

叶剑英和聂荣臻等商量，多次向华国锋提议，尽快恢复邓小平原来的职务，赶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但是，遇到了重重阻力。华国锋对参加中央打招呼会的西北组高级干部讲话时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要继续批。”

10 月 26 日，华国锋召集中央宣传口领导小组负责人开会，华国锋谈到揭批“四人帮”的问题，他说：“批判中要注意，凡是毛主席说过话的、点过头的都不要去批，比如，‘八个样板戏’还是要演，某个演员不好，换人就是了。”

华国锋在会上做了四项指示：当前，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

10 月末的一天，原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等人到军科 2 号楼，叶剑英在军事科学院的办公室所在地看望叶剑英。叶剑英留他们一起吃饭。

席间，王炳南问：“我可不可以去看望一下小平同志？”

叶剑英说：“可以。”

王炳南在饭后回家的途中就闯到宽街去看望邓小平。当时邓小平家的人感觉很突然，卓琳婉言闭门谢客，让王炳南吃了闭门羹。

10月31日，叶剑英将熊向晖找到西山畅谈。叶剑英说：“现在大局已定。过去主席讲，从大乱到大治，现在是这个时候了。华主席谦虚、稳重、诚恳，有民主作风，是领袖之才。毛主席是慧眼识英雄。华受命于危难之机、非常之时，非常之事，非常之人，建立非常之功，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没有什么，主要是江青。她是主席夫人。敢于下决心把她抓起来，也只有华。这个人是大智若愚，有智有勇。把江青抓起来，我都没有想到。如果周总理在，周不会这么做。就是邓小平也不一定这么做，不像我们老家伙思想顾虑多。红楼梦大观园不好管。王熙凤有病，探春管，看起来文弱，其实厉害。主席讲人才难得，外柔内刚，绵里藏针，放在华主席身上更合适。他交班不交给别人，毛主席慧眼识英雄，文化大革命有他的功劳，难怪他讲一生中做了两件大事。”

1976年11月1日至8日，保定482厂发生武斗，厂革委副主任杜洪志被打死。11月6日，保定市委在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称，地震过后，保定又乱起来，半月来，来自定县、涿县、徐水、望都、清苑和郊区的500多农民进城，发生打、砸、抢、抄、抓事件多起，死4人，伤多人。

11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解决保定地区武斗问题的《布告》，《布告》说：保定问题长期不能解决，根子就是“四人帮”。《布告》重申要立即无条件停止武斗。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已成立由秦基伟负责的解决保定问题领导小组，规定了解决保定问题的方针和政策。

11月15日，以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秦基伟为组长，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38军政委王丕礼为副组长，北京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吴岱、河北省军区司令员马辉、38军副军长李连秀为成员的“中央解决保定问题领导小组”进驻保定。于当天在38军礼堂召开大会。传达中央指示。

38军奉命于11月16日对保定地区各武斗据点实行武装包围。38军全军出动，分赴保定23个县、市的城镇和农村，宣传《布告》。同时投入20个团的兵力，封锁了保定地区所有交通要道，包围了192个武斗据点，收缴武器，抓捕坏人。在半个月的时间内，先后张贴和用飞机散发《布告》近300万份，1500个广播站反复广播，召开宣讲《布告》

的群众大会 8000 多场,到会群众 570 多万人次。通过强大的政治攻势,很快收缴各种枪支 1.1 万支,炮 699 门,弹药 14.5 万多发,手榴弹 5.5 万多枚,以及大批地雷、炸药和雷管;拆除工事,解散武斗班子,逮捕了 21 名民愤极大的首恶分子。

11月 20 日,中央解决保定问题领导小组在保定召开 10 万人公判大会,依法判处抢夺枪支、私造武器、抢劫、破坏交通、拦劫抗震救灾物资、杀人放火、强奸妇女的犯罪分子孙福山等 16 人死刑和有期徒刑。其中孙福山、褚万才、赵民众、王喜保 4 人死刑,立即执行。

12 月 13 日,保定集中 500 余人赴京参加由解决保定问题领导小组举办的“学习班”,同时,由河北省委和 38 军组建的联合工作组进驻保定,配合地、市委工作,形势迅速好转,保定方根本结束了 10 年的反复动荡。

11 月 15 日至 19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宣传工作座谈会。耿飚在会上宣读了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当前宣传要点的请示报告》,指出宣传工作的三个要点:一、突出宣传华国锋;二、大力宣传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意义;三、彻底揭批“四人帮”。

11 月 18 日,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在全国宣传口的会议上讲话,提到了邓小平的问题。他说:

“去年 10 月后,毛主席就发现邓小平的错误,而且错误是严重的,搞原来一套。毛主席见邓不行,另找华国锋,而邓小平的严重错误一直发展到天安门事件。”

接着他又说到“天安门事件”:“天安门事件如果是悼念周总理,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又有什么错呢?但是他们被反革命分子利用了。在批判邓小平错误的时候,反革命利用了这个东西,形成暴乱。”

他说:对批邓“毛主席已经有了个四号文件。四号文件里面不管怎样总是正确的,是毛主席的指示。”

汪东兴说:“当前斗争的矛头是‘四人帮’,但邓的问题批了一段也是必要的。”

接着他讲:“现在小道消息,说邓恢复了工作。”

他要人们注意,对邓小平,“毛主席讲过‘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嘛!”汪东兴说:“邓那两下子比华国锋,差得远嘛!对邓小平试了一

下,不行嘛!”“对文化大革命还是不理解,三个正确对待做得不好。这个问题老同志要注意。老的与年轻的都要注意。”

“现在邓小平问题也没有划为敌我矛盾。谁划了?他还是‘以观后效’。”

11月30日,吴德在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汇报粉碎“四人帮”情况。他最后说:“凡是毛主席指示过的,凡是毛主席说过的,我们都要去做,而且要做好。他说过去‘四人帮’给我们很多干扰,现在清除了‘四人帮’的干扰,因此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关于纪登奎次子纪虎民谈话的内参在姚文元家被抄出后,纪登奎和刘建勋便以这件事为根据,将与这份内参有关系的董万里、周民英和杨止仁武装监护审查,说他们和“四人帮”有联系。同时进行审查的还有郑州铁路局党委书记唐岐山。他们4人被作为河南的“四人帮”在全省批斗。

11月,已任河南原阳县委副书记的原开封“824”头头陈红兵在停职检查一段时间后,被押回开封隔离审查。他们从柳园渡口坐船过河抵开封上岸后,押送他的人掏出手枪朝天放了两枪,大概是庆祝胜利。陈红兵意识到:还没有审查,他们就已把他看成了敌人!

陈红兵1967年10月被选为开封师范学院革委会主任、开封市革委会常委。1967年底分配留校,1968任河南省革委会常委。1968年底再分配到太康县解放军农场接受再教育1年。

1970年初,他又被分配到新乡地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陈红兵主动放弃原分配方案,要求到最艰苦的、河南有名的贫困县——原阳县农村插队。插队的村子叫下马头,陈红兵住在十一生产队两间泥坯草房的记工分用的屋里,生产队会计把一半的空间打扫干净,摆一张床,摆一张旧桌,就算是安下了家。他每天和社员一起出工收工,在庄稼地里忙活,在群众家里吃饭、拉家常,给五保户困难户担水,学犁地等农活,对农民生活加深了了解。

下马头大队属中等偏上的大队。大队有一台履带式拖拉机,一台天津铁牛55轮胎式拖拉机,一个小砖窑。各生产队有自己的菜园,农民生活虽不富裕,但没有一个人生活过不去,军烈属、五保户都得到照顾。中央表态支持“二七公社”、“开封824”之后,原新乡地委书记耿

其昌一句话“贫下中农都是造反派”，稳定了农村局势。但农民心有不平敢于说话、敢于向干部提意见，大队干部谨谨慎慎，关乎大家利益的事情常开会向群众说清楚。农村干部学大寨积极性很高，平整土地、打机井抓得很紧。农村买拖拉机和城市比便宜很多，打机井国家出资为主，农民出力为主，群众对党的农村政策很满意。一般农民勤劳朴实，很善良，对待下放锻炼的干部学生，对待在政治运动中被批判过而下放到农村的人，从不歧视。不管上面说这个人如何坏，他们从来都有自己心里的评判标准。

陈红兵女朋友毕业后，也放弃直接分配工作的机会，要求和陈红兵一起插队。他们到福宁集公社登记结婚，生产队把记工分的房子用砖墙隔开，这半间草屋就成了他们的新房。那天晚上，各生产队插队的大学生和乡亲们挤满一院子，笑着嚷着。他们两个向大家三鞠躬，唱一首革命歌曲，撒了喜糖，就算举行了婚礼。

他们婚后一起参加劳动，日子过得很快乐。因为他们知道，不到劳动者中间，怎样了解他们的需要？不了解他们的需要，怎样为他们服务？共产党不为大多数人服务，难道还叫共产党吗？

1970年“一打三反”和抓“516”运动，学校里军代表将陈红兵的几个战友当作“516”嫌疑，就连刘建勋的秘书王书庆也打成“516”，关进了学习班。

“913事件”后，“516”学习班渐渐撤销。开封师范物理系的一个“814”的头头在街上与陈红兵偶遇，对他没进学习班表示大惑不解。他紧抓住陈红兵的手，把他拉到路边，反复地问：“你真的没进学习班？你真的没进学习班？你这个大鱼真的没进学习班！”看得出，他的精神受到很大刺激。难怪毛泽东后来说“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

1972年初，陈红兵和插队的学生们一起被分配工作，教育局局长和他谈了两句话：“红兵，就是这样了，也别有其他想法了，去农村教学吧！”他被分配到原阳县最边缘的祝楼公社高中教学。临行那天，祝楼派一辆马车前来县城接他们一家。大雪初晴，温暖的阳光笼在厚厚的雪原上。清脆的鞭响，嘚嘚的马蹄声，喜鹊蹬落的雪粉和欢快的叫声，打破原野的宁静。陈红兵和妻子以及执意要送他的长春地质学院学生李旭，摇晃着坐在装着铺盖行李的车上，未满周岁的儿子倚在妈妈

的怀里，好奇地看着这个世界。一只不知名的白色大鸟，忽然在路边沟渠未结冰的水面上掠了一下便腾空而去。赶车的老乡五十多岁，从旧社会过来，对生活很满足，一路上给我们讲一些风土人情、笑话掌故，大家爽朗地笑着，蜿蜒50里的乡路也不觉得遥远。

祝楼高中是个文革中新建的学校，班级不多，校长是个没有学历的农村基层干部，踏实为教师服务，任劳任怨，对造反派没有好感。他后来对陈红兵说：“听说分来个造反派头头，我心里不安了好多天。来了一接触，不是想象的那回事，人还不错，教学也有本事。你这个造反派我赞成！”

1973年3月，陈红兵在农村入了党，选拔到中共原阳县委担任县委副书记，兼靳堂公社书记。

第 1431 回：看渝鄂，造反派隔离审查 材料一，乔冠华免去外长

1976 年 11 月 8 日，重庆市委书记鲁大东将黄廉喊到市委办公厅会议室，对他说：“17 号文件下达已经半个月了，你要好好思索自己的问题。你跟‘四人帮’不是一般的关系。”

黄廉依然我行我素，反唇相讥说：“你当初反对过中央文革了，是靠都靠不拢吧，你现在是不是落伍了？”

鲁大东说：“文件下来半个月了，你还是这个思想，觉悟很差，态度很不对头，一个星期之后，你就带上用具去开会，会上要表态的，今天跟你谈话，是代表党和华主席跟你谈的。”

11 月 14 日，市委来车接黄廉，他爱人问他还开什么会？黄廉对她说：“此去恐怕不再回来了。”

黄廉到了市委，鲁大东、徐庆如、钱敏都在。鲁大东拿出一个文件夹说：“跟你宣读个文件，根据华主席的指示，四川的邓兴国、黄廉、周家喻、杨志诚，从文件到之日起，停止工作，不接电话、不会客，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说清与‘四人帮’的关系和问题，什么时候说清楚，什么时候解脱。”

钱敏对黄廉说：“你把与王、张、江、姚的关系说清楚，取得党的谅解。”

黄廉依然嘴不饶人，说：“你们需不需要说清楚？你们的级别比我高，跟上层接触比我多。”

鲁大东、钱敏和徐庆如起身都走了，屋里剩下的就是保卫人员。过了一会，一辆军用吉普车把黄廉送回木材公司。一进大门，就有 3 个解放军战士在门口站岗。三楼的一个房间，门窗已经用厚木板加固钉死了，里面有四张床。政法学院的革委会主任柳传承对黄廉说：

“是市委清查组派我来的，我和公安局的杨、孙两位处长，三位在这里陪你学习，每天负责收集你的材料。我们早上 8 点半开始，下午

是接待外调的时间，晚上 6 点半休息，解手要有人陪同你去。天气冷的时候，有人会给你送东西，本单位已经管不了你了。”

黄廉偷空给周家喻家里打了个电话，知道他也被办学习班了。谁想，就这一个电话打出去，门口又给他加了两个岗哨。

12 月，黄廉转移到五招待所，看守就换成军分区一个排的解放军了，还有两个民兵，吃的东西拿进来需要经过检查。黄廉除了跟他们吵架之外，几年时间一个字也没有写，也几乎不跟他们说一句正经话。

1976 年 10 月 29 日，武汉市召开大会，批斗“四人帮”在武汉的骨干分子董明会、李想玉。

11 月，武汉原“百万雄师”部分人员又成立了“工农兵”组织。11 月上旬，“工农兵”头头研究决定，对造反派的主要头头要抓起来办学习班，交代问题。“武昌(汉阳)以武重、武锅、武船、汉轧的同志为主”，将“夏邦银、朱洪(鸿)霞、胡厚民、李湘(想)玉、彭勋等人抓起来”。“其目的有三点：1. 掌握‘四人帮’插手湖北、武汉的情况和(有)牵联(连)的人和事；2. 三钢头头打、砸、抢、抓、抄的罪恶行为；3. 湖北、武汉个别领导干部与‘四人帮’的牵联(连)和支造的事实真相”。

很快，董明会、朱鸿霞、李想玉、沈复礼、王锦铭等人都被抓去，五花大绑地站在敞篷汽车上，胸前挂着“四人帮的黑爪牙”的牌子，整天在武汉三镇大街上游街。胡厚民等人也被“工农兵”关押一个多月。

12 月 12 日，中共湖北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认真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有关文件精神，联系湖北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及其在湖北的骨干分子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的反革命罪行，彻底清查其帮派体系。

12 月 14 日，全省批斗“四人帮”的骨干分子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大会在武昌洪山礼堂召开。

从 1976 年 12 月开始，一直到 1982 年 7 月，胡厚民、杨道远、夏邦银、朱鸿霞及原来因“北决扬”案件被抓的人都被关押在位于武昌民主路 45 号看守所。

我们再回到北京。11 月 24 日，毛泽东纪念堂奠基仪式在北京举行。

11月30日，吴德在全国四届人人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说：“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

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籍团籍处分的，应予撤销。”

12月10日，华国锋仿照“913事件”后，毛泽东处理林彪等人的做法，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全党全国印发了中发[1976]24号文件：《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要求“立即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传达，并组织阅读和讨论，务必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

文件对“四人帮”的定性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千方百计地反党乱军，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说“四人帮”“背叛党的九大、十大路线，推行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妄图在国内篡改我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国际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投降帝国主义”，“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是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

文件说明，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毛泽东生前就已有想法：“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以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洞察力，早已看透了‘四人帮’的野心，预见到身后他们会闹事。毛主席对‘四人帮’不断地进行了批评、教育和斗争，做到了仁至义尽。但是，‘四人帮’毫不悔改，变本加厉地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毛主席采取有力的措施一个一个地打破了他们的阴谋，特别是极其英明地亲自选定了华国锋同志为接班人，有效地预防了‘四人帮’的反革命复辟。”

因此，“我们党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文件说：“王张江姚专案组正在编辑《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材料之三，以后将陆续印发给你们。《材料之一》，你们可以翻印，但应注意保密，不许丢失，不许外泄。《材料之一》的蒙、藏、维、哈、朝少数民族文字的翻译工作，由民族出版机构

负责。”

文件“四人帮”的罪证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份，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在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前后分裂党、篡党夺权的罪证。主要内容有：

一、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搞三箭齐发。

二、进行篡党篡军的阴谋活动，证据只有两条：一是江青提出要批“大儒”“现代的儒”，文件认为：江青提出的这个“大儒”就是指周恩来；二是1974年3月5日，张春桥、江青召集于会泳、陈亚丁等人开会。江青在会上说：“八一（厂）造孽了，军阀管你们。”文件认为这是攻击中央领导。

三、反党乱军，背着毛主席、党中央私自处理党政军重大问题。证据呢？主要是一些涉及军队的文件没有批给叶剑英。

四、在中央准备召开四届人大，酝酿国家机构的人事安排期间，进行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证据也很有意思：一是王洪文赴长沙“告状”，二是江青向毛泽东要工作，三是江青写的《琅牙台》那首诗：

江上有奇峰，锁在烟雾中，
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文件认为，这是“江青受到毛主席的批评，野心没有得逞。她心怀怨恨，准备把它写的这首反动诗，配上他照的庐山汉阳峰的照片一起，用‘琅牙台’的笔名在《中国摄影》上发表。诗中污蔑毛主席是‘烟雾’，野心勃勃地自比为江上‘奇峰’，企望有朝一日‘露峥嵘’，实现她篡党夺权的狂妄野心。”

就连“四人帮”的合影，也成了他们的罪证。

罪证的第二部份是说“四人帮”宣扬“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认为这是攻击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这里有一条是说“四人帮”扣压、对抗毛泽东的批示，这在当时可是“罪莫大焉”，应该是一条很过硬的罪证。那证据呢？文件上列举的是1975年4月23日，毛泽东在姚文元送的新华社《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作的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时任新华社社长朱穆之请示是否传达，王洪文5月8日批：“我意见暂不传达。请文元同志阅示。”姚文元批：“同意暂不传达。精神可以在新华社工作中贯彻执行。”只有这一条。

罪证的第三部份是说“四人帮”反对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总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妄图取而代之，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证据是王洪文在1976年1月下旬准备在打招呼会议上作的长篇报告；还有张春桥在1976年2月3日，华国锋任第一副总理、第一副主席后写的《有感》；上海在批邓时点出了几个副总理的名；江青私自召集的12省、自治区会议上讲话；还有一条十分过硬的证据材料就是章含之写给毛泽东的信。文件说：“乔冠华和他的老婆章含之经过一番密谋策划，由章含之出面，于1976年4月25日写了一封名义上给毛主席，实际上送给了江青的告密信，密告康生同志揭发江青、张春桥是叛徒。江青气急败坏，写了一大篇话，恶狠狠地污蔑周恩来同志、康生同志、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和坚持同‘四人帮’斗争的同志是什么‘大、小舰队’，疯狂叫嚣：‘吃的饱饱的、睡的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当时江青看了章含之的信后写的是：“此类事逐渐会揭发出来，我看他们是否高超过林彪？据说，他们的大、小舰队活动有些雷同，有些不同。小舰队有过之而无不及。吃的饱饱的、睡的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

罪证的最后一部份是说毛泽东重病期间和逝世以后，“四人帮”迫不及待地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罪证。证据是在毛泽东病危时，江青还到天津、大寨去“游山玩水，恣意取乐”；王洪文在毛泽东病重期间钓鱼、打鸟；在毛泽东病中，江青还向他伸手要钱；甚至在毛泽东逝世前5个多小时，江青到新华印刷厂也是在搞阴谋。

毛泽东逝世后，江青找张玉凤索要毛泽东的手稿，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新华社等给江青写“效忠信”，要江青当党中央主席的“劝进信”，王洪文照的“标准像”，这些当然也都成了他们阴谋夺权的证据。其中，“伪造‘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为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大造舆论”，自然成为最有力的罪证。

最后，上海在“四人帮”被抓后的种种事情，作为“四人帮”在上海余党准备的“未遂暴动”，那更是不能放过的过硬证据。

12月10日至27日，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召开。华国锋在讲话中指出，王、张、江、姚是一伙“极右派”，我们要保卫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华国锋在12月举行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中，针对叶剑英等要求邓小平复出的提议，说：“批邓是必要的，邓小平犯了错误，有错误就应该批判。”

才华横溢的外交部长乔冠华被免去外交部长的职务。1976年12月2日的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对此有如下说明：

“经华主席、党中央批准，这次会议任命黄华为外交部长，免去乔冠华的外交部长职务。现在讲讲为什么免去乔的外交部长。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为了控制外交部，早就看中乔。乔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自觉卖身投靠“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对华主席，参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明知道主席对‘四人帮’有严厉的批语，但他却在外交部当谣言来追查，说这是‘政治谣言，分裂中央’。他对毛主席指定华国锋同志担任总理，极为不满。他早知道毛主席给华国锋同志写的‘你办事，我放心’，却反对刁难。在批邓中，毛主席认为外交部的运动有问题，让他请示华国锋同志，他不去，他找江青，有意把外交部运动搞乱，要把知道‘四人帮’底细的王海容、唐闻生同志打成‘反革命’，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扫除障碍。毛主席批语乔‘借刀杀人’，‘借中央之刀杀王、唐’。乔同他的夫人章含之反对周总理，把康老揭露张、江的叛徒问题向江青告密，态度恶劣，至今不能取得群众谅解。鉴于外交部工作的重要性，决定免除乔的外交部长职务，任命黄华为外交部长。”

《人民日报》组织专门小组，全面清查了报社内与“天安门事件”有关的人和事，写出了《“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的阴谋活动》清查报告。1976年12月10日，以迟浩田、孙轶青、郗汉生3人名义报送宣传口并党中央。迟浩田为此特地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中央宣传口并报华主席、党中央：

在揭批“四人帮”控制人民日报搞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中，报社许多同志揭露了“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搞的欺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罪行。我们觉得这一问题有必要向中央反映。现将人民日报运动办公室材料组整理的《“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的阴谋活动》送上，请审阅。

迟浩田

1976年12月10日

耿飚首先看了材料，他马上提笔给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写信，说：“人民日报社许多同志揭露了‘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搞的欺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罪行：他们于十二月十日整理出了一份材料，现送上，请参阅。”

叶剑英通过耿飚嘱咐《人民日报》社以后多给他送这方面的材料。人民日报社遵嘱按时给叶帅送去“内参”。

第 1432 回：为小平，李东民成反革命 材料二，说江青就是叛徒

1976 年 12 月 10 日晚，邓小平因患前列腺炎，住 301 医院治疗。301 医院进行了精心准备，将刚装修完的南楼五层还未起用的外科病房，供邓小平一人用。12、13 日，吴阶平会诊，建议手术。

12 月 16 日，华国锋收到邓小平给他和汪东兴的信，要求手术，马上批准，汪东兴也签了同意。24 日，邓小平做了前列腺摘除手术。手术后，余秋里、徐向前、聂荣臻、宋任穷等许多老干部相继看望邓小平。但华国锋和叶剑英都没有去。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几个教师和学生，开始收集数月前“天安门事件”期间天安门广场上流传的那些“反动诗歌”。京城的老百姓也真是奇特，那个春天里警察抓走了那么多人，可是没有被抓走的人居然会把那么多的“反动诗歌”隐匿起来。报纸上不住地批判，警察到处搜捕，民兵日夜监视，反复地清查清理，可就是找不出这些“反动诗歌”来。现在听说有人要把这些东西整理编辑出版，诗歌就从大街小巷里面纷纷涌出来。到了 1977 年 1 月 8 日，周恩来逝世整整一周年。为纪念周总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师生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童怀周”，意为“共同怀念周总理”，并以此为笔名，居然把那些诗歌出版了，书名叫做：《天安门革命诗文选》，分上、下两卷，共计 1032 页，国人读之如饮狂泉。

同样在 1977 年的 1 月，也即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时候，还有更加露骨地为邓小平翻案的人，北京发生了震惊全城的“大字标语案”。大约十几个青年，在京城中心长安街上，用硕大的排笔写出大字标语：

“坚决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坚决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警察立即出动搜捕，很快便抓到元凶，他叫李冬民，北京重型机器厂的工人。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却是北京“首都兵团”的头头、中学红

代会的核心组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后来他参军，入党，复员，当工人。

于是，大街上谣言纷起，有人说“批邓”批错了，邓小平就要出山。还有人说毛泽东弥留之际对镇压天安门广场颇有悔意。辽宁省旅大市革委会大门口，有人在张贴大字报批评吴德和陈锡联，还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对李冬民，吴德坚定不移地说：“反革命分子。”

接着，李冬民立即就被关进了监狱。

1977年1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召开会议，大家统一了认识，同意邓小平在适当的时候恢复工作。

此时，邓小平准备出院，华国锋与叶剑英商量邓小平出院后的住处问题，华国锋提出小平的住处靠近叶剑英比较安全，因此决定把邓小平安排到西山25号楼，原来给王洪文建的那处别墅。

会后，列席会议的周启才随叶剑英一起来到玉泉山9号楼，周启才对叶剑英的秘书王守江说，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邓小平恢复工作，让王守江给邓小平送文件，以便让邓小平熟悉情况。

当时邓小平还没正式出来工作，文件怎么送呢？周启才和王守江商量之后决定，给邓小平送的文件统统写上“王守江收”，由王守江转送到邓小平住处。

一天晚上，华国锋派车将邓小平接到玉泉山。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4个人一起和他谈话。华国锋等介绍了粉碎“四人帮”的过程，恢复邓小平看中央文件的待遇。

2月3日，邓小平出院，直接去了西山军委25号。25号楼在山上最高处，从车道下来就是叶剑英住的15号楼。出院后，邓小平第一个见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叶剑英。他住到西山25号楼后，叶剑英派小儿子叶选廉把邓小平接过去与他会面。

王守江第一次到西山25号楼给邓小平送文件时，邓小平正在打牌，收下文件后，只说了一句：“我打牌呢！没别的事我打牌了。”

据吴德回忆，华国锋在政治局会议上宣布政治局常委决定邓小平在适当的时候恢复工作时讲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

作做好群众工作。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后，在李先念的提议下，李先念、陈锡联和吴德一起去西山看望邓小平，转达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

邓小平见到李先念他们很高兴，说：“很好啊！我可以过一个安宁的晚年了。这种方式好（指粉碎“四人帮”事），干净利索！”

李先念说：“我们还要请你出来工作呢！”

邓小平风趣地说：“出来干什么？”

李先念说：“起码官复原职。”

邓小平兴致勃勃地请李先念他们去看了为王洪文修的电影厅，说：“看，这就是电影厅。”

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其中提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后来说的“两个凡是”。

2月8日，中南海发出通知，要求全国人民都不要相信北京传播出去的“政治谣言”。一时间，京城的气氛又紧张起来。坚决打击政治谣言的运动如火如荼地推行开来。

2月18日，春节，邓小平的25号楼分外热闹。叶剑英、李先念、王震、胡耀邦、万里都来了。

过了春节后，华国锋、叶剑英专程到25号楼看望邓小平，并向他征求政治局人事安排的意见。

经过10年文革，中国人都知道，在中国大陆的“官场”上，要抓你的现行罪证那是很难的，《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16开本，近200页，真正过硬，能称得上是罪行的材料几乎没有。要将你打倒，最有力的材料就是你历史上的污点。同样是“刘邓路线”，刘少奇被彻底打倒了，永世不能翻身，为什么？因为他是叛徒。而邓小平没事，“913”以后又站出来了。因为他一直在部队工作，历史上从来没有被捕过，自然没有当叛徒的可能。

同样，“四人帮”是被抓起来了，人们也早就风闻张春桥和江青是叛徒，如果这条能够坐实，那他们自然也就没有翻身之日了。人们期盼已久的关于“四人帮”的历史材料终于在1977年3月6日与大家见

面了。这天,中央以中发(1977)10号文件印发《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

文件自然首先公布了张春桥的历史罪证,说他是国民党特务分子,证据是:

1932年至1934年,张春桥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期间,于1933年春,伙同李树慈和马吉峰两名学生在济南发起成立法西斯组织华蒂社。文件登载了“华蒂社”李树慈在1976年11月13日作过的交代:

我是一九三三年在济南由黄僖棠介绍,参加“中华革命同志会”的,后改为复兴社。在山东省的国民党复兴社正副头目是秦启荣、黄僖棠。三三年春夏,黄僖棠授意我,以编文艺刊物为诱耳,收买拉拢一批青年学生,成立了“华蒂社”。这个组织是由我和张春桥、马吉峰等人发起的。刊物也以《华蒂》为名。“华蒂”,暗含“中华法西斯蒂”之意,以使这个反动组织的政治性质更加明确。我是“华蒂社”的负责人,也是刊物的主编。开始,在国民党报纸《历下新闻》副刊上出版《华蒂》周刊,后由黄僖棠向复兴社要求,批准每月三十元的印刷津贴,编印出版单行本《华蒂》月刊,出版了三期,均由复兴社经营的午夜书店印刷、发行。《华蒂》周刊出版后,黄僖棠就叫我写一份“华蒂社”社员名单交给他,以便上报复兴社南京总部。名单中有张春桥、马吉峰等十余人、……张春桥是“华蒂社”中坚分子,积极为“华蒂社”发展组织,介绍了陈庆章参加“华蒂社”。……

张春桥1917年2月1日出生,1933年16岁,初中生。按照文件所说,此时他已“充当国民党特务”。

文件继续说:“张春桥在1935年到上海,在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的指使下,从事文化特务活动。”证据是:1935年5月,中学毕业后的张春桥来到上海,在上海杂志公司做校对员。从1935年6月6日开始,给《大晚报》投稿,尤其是在《大晚报》的《火炬》副刊上登载的张春桥投稿文章,几乎每月都有一篇。1936年3月15日,张春桥化名狄克,在《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发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评》,批评鲁迅为《八月的乡村》这部小说作的序言。鲁迅于同年4月16日写了《三月的租界》一文予以驳斥,于是“狄克”一时在上海滩上小有名气。

攻击鲁迅,这在当时已经就是“罪莫大焉”。更何况,文件说:《大

晚报》的《火炬》副刊主编崔万秋,明着是个左倾作家,而实质上是国民党复兴社的特务。为什么说崔万秋是国民党复兴社的特务?证据就是国民党军统局大特务沈醉的回忆文章:最早的一次是1962年,他在《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中发表的《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中是这样描述的:“还有些文人如崔万秋、高巩白等,也都拿军统的津贴,为戴笠效劳”。

粉碎“四人帮”后,沈醉于1977年1月8日又就崔万秋的身份作了细致的说明:“我于1932年冬参加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后,便在特务处上海特区当交通联络员,崔万秋当时已参加了特务处,是特务处上海特区领导的直属通讯员,每月薪金80元。上海特区有十多名直属通讯员,由区长直接领导,由交通联络员联系。我每月送薪金给他,并取回几次情报。”

既然崔万秋是特务,你张春桥给他投稿,于是“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二的文件做了这样的定性:张春桥是“在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的指使下,从事拥蒋反共活动,疯狂反对鲁迅,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而且,文件继续揭露说:“1937年9月,张春桥离开上海,返回济南,奉山东复兴社特务头子秦启荣之命,由复兴社特务赵福成掩护,伺机潜入我根据地,1938年1月混入延安。”

张春桥的真实身份居然是潜伏在共产党内的国民党特务,而且官至政治局常委,当然比刘少奇的职务还差一点,但这也已经是在文化大革命10年之后,亿万人民群众几乎将全中国所有的干部历史像蓖头发那样的审查数遍后,又出现的“国民党特务”,不能不让众多国人在惊讶之余,内心却大呼“刺激”。

不过,文件丝毫也没有提到人们关心的“叛徒”问题,只是说张春桥1936年4月在上海参加了叛徒宋振鼎组织的一个冒充共产党的所谓“预备党员委员会”。不久,被上海党组织发现,由吴仲超代表党组织宣布予以解散,并责令宋振鼎通知了所有参加这个组织的人,也通知了张春桥。而张春桥到延安后,仍把他参加“预备党员委员会”一事向组织汇报,作为他参加革命的时间。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张春桥是叛徒。是啊,张春桥参加革命后就没有被捕过,就是神仙也没有办法证明他是叛徒呀!

当然，张春桥的老婆文静叛变一事，那是板上钉钉的，在文件中肯定被大书特书了一番，甚至连文静的档案照片也给影印出来。

说到江青，文件中毫不客气的写到：“叛徒江青的历史罪证”。

首先是江青 1934 年在上海被捕的证明材料，这是事实。刘志坚在战斗中受伤被俘仅一天就被自己的队伍营救出来了，文革中不是照样被说成是叛徒吗？因为你被俘期间这几个小时没有人能证明你没有叛变，更何况你江青在监狱里蹲了那么长的时间。

江青也曾经是崔万秋的座上客，既然崔万秋是复兴社特务，那你江青还能跑的掉吗？何况江青在上海期间还参加过为蒋介石祝寿的演出活动……

但是，最重磅的证明材料还是曾经在江青最困难的时候接济过江青、在江青被捕后参与营救江青、并在江青投奔延安时帮助过江青的徐明清。

关于徐明清，在《文革史话》第七部第 1394 回中已有详细介绍。“四人帮”被抓后，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此时的徐明清也同全国人民一样高兴，以为文革中被定为“叛徒”的冤案终于可以平反昭雪了。

就在江青被抓起来的第四天，1976 年 10 月 10 日，中央专案人员敲开徐明清的家门。原来，江青被捕后，中央专案组开始审查她的历史，在清理江青的档案时，发现了徐明清在延安时所写关于江青历史情况的证明材料。那份材料清楚地表明，在三十年代，徐明清与江青有过密切的工作关系。

于是，专案组通过公安部找到了徐明清，要她揭发江青的罪行。那几天，公安部一位副局长带着一个书记员，每天乘一辆灰色吉姆车来王观澜家，一谈就是一个上午，非常严肃，连口水也不喝。他们要求徐明清站在党的立场上，揭发江青的叛徒问题。

江青在徐明清那里没有组织关系，只是普通群众，何来叛变问题？这让徐明清如何揭发？

于是，有关方面以“帮助江青混入革命队伍，给江青写过信，长期包庇江青”的罪名，将徐明清关押在一个至今她和她的家人都弄不清楚地点的小房间里。房间的窗户都用报纸封糊着，屋里一团漆黑，白天都得点着灯。有四、五个女看守一直看管着她，连上厕所也要跟着。

这里既是隔离室，又是审讯室，写交待材料、逼供审讯连续不断地进行着。

徐明清如实写下的材料，被专案组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态度，“不老实”，认为她在“包庇”江青，总也通不过。每次谈完话，那些人都放下几张纸，让她继续写交待。几轮下来，他们仍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这些人急了，大声训斥徐明清：

“你这个人，是吃罚酒，不吃敬酒。让你写江青怎么叛变的，你写了不就没问题了嘛，不就立功了吗！”

“你要立功啊！”

徐明清说道：“江青被捕和我不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我不知道她被捕后是否叛变？更不知道她叛变的细节，我怎么能写呢？我也写不出来啊。”

于是，专案组继续对徐明清实行“车轮战”，一天提审数次，就在这样逼供的情势下，1977年1月8日，徐明清被迫写下了一份“交代”。

那一天，专案组人员给她拿来了一张16开大小的白纸，让她坐在接受审讯的小桌前，由他们口授，令徐明清一句一句照抄。

徐明清头脑昏沉，也不清楚整体内容是些什么。写完后，专案组又拿来纸，要她重新抄写。这时，徐明清才明白了这份材料的内容，完全是按照专案组的意思，假徐明清之手，炮制的一份假口供。

徐明清感到自己被耍弄了，内心非常痛苦，一再要求收回材料。但是没人理睬她，徐明清只能在黑暗的小屋里痛哭不止，最后陷入神志不清，以致不能控制自己的状态。

徐明清万万没料到，两个多月后，她写的这份交待材料被影印收入一份“红头”文件，即《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之中，并于1977年3月6日印发全国。

文件中说：

1933年秋，江青在上海晨更工学团当教员时，就与当时‘晨更’的负责人徐明清关系密切，后来两人先后被捕，自首叛变。

她们1937年混入延安前就订立攻守同盟，长期相互包庇……同年10月，江青隐瞒了自首叛变的历史，由徐明清出面作假证明，钻进党内。

1977年春节过后,徐明清被宣布逮捕,押往秦城监狱。从关押到被捕,始终都是秘密进行的,甚至连她的丈夫王观澜和家人都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她的户口也被强制吊销了。

入狱后,专案组仍会不断地来提审她。徐明清条件反射一般,反复重复着一句话;“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能乱说!”对专案组提出的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她更是无法回答,只好沉默。

专案人员还提审了已经在1975年获释的,曾在江青上海被捕时参加审讯的,原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编审组长朱大启。专案组告诉他“李云古”即江青。面对专案组,朱大启在1977年1月18日写下一份材料,全文如下:

李云古,女,山东人,左翼文化组织成员。1934年下半年被国民党特工总部上海区逮捕,关押在伪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由上海区训练股审讯组赵耀珊在伪公安局特务股楼上审问,我参加过劝降谈话。有一次赵耀珊迫使李云古自首,打李一个耳光,我以伪善面孔劝李自首,说:“你很简单嘛,只要转变就好了。”当时,李表现很可怜的样子。以后李云古就自首了,由训练股长阎松年和赵耀珊经办了自首手续,李的自首登记表和保证书我审查过,其中写了反对共产主义、拥护三民主义等内容。自首登记表和保证书由我报送了南京特工总部。1934年间,自首的女性如张蕙芬等人的自首手续,都是经我报送南京特工总部的。

朱大启在1977年1月18日所写的这份材料,后来收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7)110号”,成为定江青为“叛徒”的重要依据。

当时传说,在西安,蓝苹曾向徐明清详细谈及自己1934年10月在上海被捕后,如何写“自首书”出狱的。但是,迄今为止,除了徐明清坚决否认的《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中的那份影印件外,再也没有见到徐明清任何关于江青自首叛变的证明材料。

第1433回：庆诞辰，叶剑英《八十书怀》 难阻挡，邓小平三次复出

1977年1月20日，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武保部向党委上报《关于聂元梓、孙蓬一的情况报告》。《报告》反映：聂元梓声称她是受“四人帮”迫害的，审查她是不对的；孙蓬一到哲学系闹，说他是受江青迫害的。

2月15日，校党委开会，传达市委负责人2月14日听取北大、清华运动汇报后的指示精神。市委领导讲，……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我们一定要坚决执行，包括两个估计。毛主席批准的，不能动摇。……十七年不能翻，两个估计不能翻，聂、蒯的案不能翻。

中央准备在1977年3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叶剑英对中央为华国锋起草的讲话修改稿提了两条意见：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估价，应把提法改变一下，为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叶剑英的话说得挺委婉，华国锋对叶剑英的建议也点头称是，可是却没有按照叶剑英的意见修改报告。在报告中，他没有直接地谈邓小平的问题，而是把“李冬民反革命案件”的材料印发给与会者：“现已查明，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

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汪东兴拿出毛泽东的话说：“有人提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错了，要把邓小平请出来，还要让他当总理，说他如何如何能干。邓小平这个人我是熟悉的，讲能力他是有一点，但错误更多。1975年，毛主席是想让他当总理，可试了试，不行，他那两下子比我们华主席差远了，所以，最后毛主席才选定华国锋同志做接班人。”

3月13日，陈云郑重地在中央工作会议西南组作了书面发言。这个发言稿，陈云会前请胡乔木帮助修改，然后约了王震、肖劲光、王诤几个老干部，到耿飚家里商量，得到他们的赞同。耿飚说：“稿子就要写到这样才好。”

陈云在书面发言中说：“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

陈云还提出：“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会议工作班子要求陈云按照华国锋讲话的口径修改这篇发言，被陈云拒绝。他说：“要发简报，就照我讲的，一个字不改地发。”中央领导得知陈云的态度后，决定会议简报不刊发陈云的讲话。

王震也在会议发言中提出了同样的意见。他针对汪东兴关于邓小平的讲话，举出毛泽东的一些话来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是革命的，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王震的发言会议简报也未予刊登。但他和陈云发言还是在会场内外传开，并产生很大的影响。

第二天，华国锋在会上讲话。关于天安门事件，他仍称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但肯定“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他批评一些人一味在“天安门事件”上纠缠不休，让大家不要再争论这些问题；关于邓小平问题，虽然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但明确表示邓小平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准备“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但要“等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他在讲话的最后说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3月17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西南组发言时说:“时机成熟的时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很赞成。”不久,陈云的提议就在北京传开了,各省也都知道了陈云的提议。

胡耀邦也准备了一个长篇发言,事到临头却没有说。他也许觉得自己的地位和资历都还不能和陈云这些人并论,又是邓小平“错误道路”上的人,眼下还需静观时变,等待时机。

3月22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说:“这一年(指1976年),毛泽东在他的住所召见华国锋等,又一次谈到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他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4月5日,1977年清明节,天安门纪念碑周围,主要是毛主席纪念堂工地的围墙上,贴了很多怀念周恩来总理和庆贺粉碎‘四人帮’的诗文。

4月10日,邓小平再次写信,不过,这一回不是写给华国锋一人,是写给“华主席、叶副主席并转党中央”。这次,邓小平的信是这样写的:

华主席、叶副主席并党中央:

我完全拥护华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

我在七五年的工作虽然也作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工作中确有缺点和错误,我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的批评和教导再一次表示诚恳的接受。

我感谢党中央弄清了我和四人都没有关系这件事,我特别高兴在

华主席的讲话中肯定了广大人民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

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曾向中央用书面表达我内心的悲痛和深切的悼念。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在党中央决定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时候,我知道了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确的方式战胜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的时候,我在七六年十月十日曾向国锋同志和中央用书面表达我的真诚拥护和欢欣鼓舞的感情。

如果中央认为恰当,我建议把我这封信连同去年十月十日的信印发党内,究竟如何处理,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决定。

顺致诚挚的敬礼!

邓小平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

邓小平的信在权力中枢流转了23天。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此信,并把邓小平在6个月前的那封信也找了出来,用党中央的名义将邓小平的两封信一并下发了。中央肯定了邓小平的意见。

5月14日,是叶剑英80岁诞辰。这一天,邓小平和在京的徐向前、聂荣臻元帅,粟裕、王震、杨成武、余秋里等,不约而同以“祝寿”的名义来看望他。

第一个到来的是王震夫妇。随后到来的是余秋里、杨成武。接着聂帅夫妇来了。徐帅也来了。

人们刚刚坐定,聂帅的女儿聂力便向众人透露了一个秘密:“爸爸手里有一首诗。”于是聂荣臻的诗篇展现在寿星和众人面前:

揭竿羊城五十年,

风雨齐州步履艰。

川西传讯忠心耿，
京华除害一身胆。

行若吕端识大事，
功成绎侯有愧颜。

八秩寿翁犹继志，
旗展神州贺新天。

徐向前元帅也补了一首：

吕端当愧公一筹，
导师评论早有定。

当年英，劲倍增，
八秩犹似四十前。

射虎屠龙宿有志。
二三鬼神一扫空。

千秋伟业断不坠，
辅佐堪作后者镜。

叶剑英一如往日的谦虚，连连说：“惭愧、惭愧，不敢当啊！”

众人正谈笑间，邓小平和家人也驱车赶来了，邓小平一进门就十分高兴地说：“老帅们都在这里盛会啊！我也来祝贺。”

听到邓小平的笑语，叶剑英赶忙迎上前去，高声说道：“你也是老帅嘛，是我们老帅中领班的！”

正说着，粟裕最后一个赶到。邓小平开玩笑说：“别让他进来，坐不下了！”

叶剑英起身，亲自迎粟裕进来。

邓小平叶剑英并肩坐下后，元帅、将军们如同众星拱月一般，很自然地围拢过来，和家人孩子们一起来吹寿烛。

插在寿糕上的寿烛是8根，因是叶剑英80大寿。邓小平建议再插一根。众人不解其意，邓小平笑道：“这样变成9根，象征‘长久’。”

叶剑英十分开心，和大家一齐吹起来蛋糕上的蜡烛。

入夜，“寿星”送走了战友、亲朋，独自坐在写字台前，回顾走过的的人生道路，面对当时除掉“四人帮”后的大好景象，心如潮涌，情不自

禁，奋笔疾书，作七律一首：

八十毋劳论废兴，
长征接力有来人。
导师创业垂千古，
侪辈跟随愧望尘。
亿万愚公齐破立，
五洲权霸共沉沦。
老夫喜作黄昏颂，
满目青山夕照明。

这就是当时被广为传诵的《八十书怀》。

5月，华国锋召见汪东兴和李鑫，要他们去找邓小平面谈。

5月24日，汪东兴和李鑫前往邓小平家中。谈话持续了好半天。汪东兴告诉邓小平可以出来工作了，但要求邓小平先写个书面声明，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被邓小平一口拒绝。

“我出来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邓小平说。

邓小平还说：“‘两个凡是’不行。如果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

汪东兴和李鑫不免面面相觑，他们终于明白，华国锋不是毛泽东，至于邓小平本人，不仅已经不再是1971年的邓小平，而且也不再是1976年10月给华国锋写第一封信时的邓小平了。

两个月后，7月16日至21日，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叶剑英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出席了这次会议。在这次全会上，终于一致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邓小平在全会上讲话，再次强调了对毛泽东思想应有一个正确的完整的认识，他说：“对我们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集体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

恢复邓小平党政军领导职务的消息公布，举国为之震动。在北京，没有像组织“双庆大会”那样鼓励大家上街游行，但有些城市还是出现了盛大的集会游行。7月30日晚上，当邓小平突然出现在北京国

际足球邀请赛的主席台上,全场欢呼,掌声雷动。这哪里还是一场球赛呀,分明是一场政治集会。邓小平以 73 岁高龄第三次复出,不仅在国内引起轰动,而且引起世界轰动。

1977 年 8 月 1 日,建军 50 周年招待会上,已经恢复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的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互相敬酒。

1977 年 8 月 1 日,于会泳在接受批斗期间,在文化部的隔离审查地点,偷服了厕所里的消毒药水,自杀身亡。他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第 1434 回：十一大，十年文革大幕落 争论起，真理标准大讨论

1977 年 8 月 12 日，中共十一大在北京召开，华国锋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叶剑英在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邓小平致闭幕词。

这次会议最为世人瞩目的是正式宣布：自 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8 月 12 日，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说：“现在，‘四人帮’打倒了，我们可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实现安定团结，达到天下大治了。这样，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

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于落下了帷幕。此时此刻，回首十年，神州大地，上自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下至每一个普通百姓，在这场触及每一个人灵魂的大革命中，谁敢说自己在这场大革命中没有受到触及？谁的亲朋好友不曾在这场大革命中或多或少的受到过伤害？又有几人敢保证自己没有在经意或不经意间触及或伤害过别人？尘埃落定，多少人留下了不堪回首的往事，又有多少人在心中埋下不愿再被人提及的尘埃？放眼神州大陆，几乎无人不在想：如果没有这十年……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许多问题还要解决。

1977 年 8 月，《人民日报》刊登了署名“杨西岩”的来信，对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提出批评。因为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定性，是通过吴德之口宣布的。所以，杨西岩认为，天安门事件至今没有得到平反，是北京市委，主要是吴德在“捂盖子”。这封信的发表，在中央引起了震动，也引起了华国锋的不满。在一次会议上，华国锋特意谈到对《人民日报》发表这封信的意见：

《人民日报》前天发表了一个读者来信，说“捂盖子问题”。几个报都转载了，香港也转载了，而且加了标题：“谁捂北京市委的盖子？”

这封信发表是谁决定的？政治局主席、副主席都不知道。报纸发表群众来信，支持群众是对的，但点政治局委员的名，为什么不请示？……北京市委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并委派先念、东兴、耀邦同志去解决。……《人民日报》是不大慎重，……这样一点名，北京很紧张，连夜开会，要检查，请示中央，政治局就要开会了。北京问题不是不准登，但要请示报告……

杨西岩的信虽然使《人民日报》招致了批评，但毕竟揭开了北京市委的“盖子”。稍后，吴德向中央提出辞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中央调林乎加任市委第一书记。

中共中央在1977年9月23日下发了37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转发〈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的通知及附件》，文件中罗列了“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的揭发”、“新华社揭发姚文元利用职权掩盖江青里通外国的罪行”和“原总参测绘局局长张清化的揭发交代”。其中“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的揭发”说到1972年8月江青与美国女作家维特克的谈话：

“江青出于篡党夺权的野心，认为这是为她自己树碑立传、里通外国、投降帝国主义的大好机会，无视周总理批示，在北京一次就见了六个小时。”“江青与维一见面，就要维为她写传记。她对维说，‘关于我本人的历史，从来没有对外国人讲过，你是第一个外国人’，‘我谈的都可以发表’，‘斯诺写了一本《西行漫记》世界闻名’，‘我希望你能走斯诺的道路’。”“周总理指出：维来华后期表现不好，思想反动，来历又未弄清，要江青不要多谈，只谈一次，最多两次，只谈文艺，不要谈其他问题。江青听了接待人员转达周总理的指示后，大发雷霆，叫嚷：‘我的事不用你们管！’‘你们胆子真大，敢来围攻我！’她一意孤行，又同维谈了六次，连同前一次共谈了六十小时。”“江青为了掩盖她里通外国的罪行，伙同王洪文强令收缴有关江青与维特克的谈话材料，销毁罪证。”

张清化的揭发则称，江青“谈完后，当场即将《解放战争开始前形势图》、《我军战略反攻形势图》、《毛泽东主席行动路线图》、《西北战场作战过程形势图》、《辽沈战役概况图》，《平津战役概况图》、《淮海战役概况图》和《解放战争三年半战绩统计表》等重要图表，拱手送给

了维特克。”“以上图表的内容大部份是我们没有公开的。江青里通外国，出卖了大量的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

1977年12月8日，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几个人商量，派一人去见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冯文彬，请他征求当时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副校长胡耀邦的意见，同不同意他们贴揭康生盖子的小字报。这人对冯文彬说：

“康生祸国殃民，罪大恶极，而又隐藏很深，我们不揭开康生的盖子，不仅中央党校的揭批查运动深入不下去，全国揭批查林彪和‘四人帮’的问题也深入不下去。现在中央对康生没有表态，而且有人还要保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考虑到不给耀邦同志惹麻烦，打算不贴大字报，而贴小字报，不贴在室外，而贴在16楼室内走廊墙上。16楼是教务处所在地方，学员常来常往，能看到小字报，这就能把康生问题端到全国去。不知耀邦同志和文彬同志认为这样做行不行？”

当天中午，冯文彬征求胡耀邦意见后，答复此人说：“耀邦同志讲了，贴康生的小字报这件事，我们既不提倡，也不反对。”

这人高兴地说：“这个态度就是对我们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极大支持。我们决定贴出去了。中央如果怪罪下来，责任完全由我们来负。”

下午，由韩树英、吴义生、卢俊忠、毛卫平等5人署名的第一张揭发康生的小字报贴出来了。标题是：《×××（指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执行的是一条什么路线？》，主要揭发所谓“康老路线”与江青路线完全是一丘之貉。这张小字报贴在16楼一层走廊西头南墙上。几小时后，接二连三又有人写小字报，挨着第一张小字报往东贴，第二天、第三天……陆续又贴了几十张小字报，小字报从16楼的走廊一层南墙转到北墙，转上二层的楼梯，再转到二层走廊南墙、北墙，再转上三层的楼梯，到三层以后转入会议室。观者络绎不绝。

胡耀邦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对身边的秘书梁金泉说：“听说16楼贴了揭发康生的小字报，好得很呀！咱们去看看吧。”梁秘书劝他不必去，说小字报底稿都会收集上来的，可以看到全部内容。有些学员知道了，奔走相告，晚间还有人打着手电筒去看。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地、司级以上干部纷纷写信、打电话回去，报告中央党校已开始揭发康生。这个消息迅速传播到全国。接着，各地也开始有人向中央打报

告,揭发康生。中央党校的小字报内容,通过《情况反映》反映到中央常委。

华国锋对胡耀邦说:“康生这人不好,干了很多坏事。不过中国人有个传统习惯,人死了也就不再追究了。”

1978年清明时,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周围贴的政治诗更多。1978年4月6日,一篇署名霍华和尹明的大字报发出建议,文章说:“我们应当把这块阵地作为不中断的论坛,不闭幕的会场,不休战的阵地,随时把我们的思想言论写出来,把我们的作品发表出来,在这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可以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理论家、作者,同时又是读者、听众、观众、批评家。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主人。”

1978年3月22日上午,邓小平约见方毅、蒋南翔、刘西尧及北大的周林、高铁、韦明、汪小川,谈北大工作。邓小平问:“北大的运动怎样?”

有人反映冷冷清清。

邓小平问:“聂元梓现在怎样?”

北大党委书记周林答:“她要翻案。”

邓小平:“她有什么可翻。聂元梓,为什么你们不批?这个人至少应该开除党籍,调到别处去劳动。她有一张大字报,对文革起了推动作用,康生说王八蛋也要支持嘛!”

4月1日,北京市委批准将聂元梓、孙蓬一及打人凶手贺彦生三人隔离审查。

4月7日,北大校党委向市委报送《对孙蓬一的审查及处理意见报告》。《报告》提出将孙蓬一定为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党,并建议依法惩办。

4月8日下午,北大校党委召开“批斗聂元梓大会”,孙蓬一陪斗。大会由党委副书记高铁主持。中文系教员成美,经济系教员杨勋,生物系党总支书记胡寿文,西语系教员郑培蒂在会上发言,揭发聂元梓、孙蓬一。孙蓬一不停地喊“毛主席万岁!”当时专案组有人同情孙蓬一,想给他递一个条子,告诉他只是陪斗,别喊了。但条子未能递成,会也开不下去了。

4月19日，聂元梓、孙蓬一等人再次被押上设在东操场的批判台，接受北大以及北大以外的许多人的批判。批斗会的横幅已经成了“批斗聂元梓、孙蓬一大会”。这次公安把孙蓬一的下巴卸掉了，他无法再喊了。在会上揭发、控诉的有：华东师范大学代表夏鹤令，北大生物系毕业生、湖南临湘县572分校教员樊立勤，地质系教师王永法。党委副书记韦明在会上宣布：经上级党委批准，决定开除聂元梓、孙蓬一的党籍，开除聂元梓、孙蓬一、贺彦生的公职，建议依法惩办。宣布后，专政机关正式逮捕了聂元梓、孙蓬一、贺彦生。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了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二天，5月11日，此文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署名是：本报特约评论员。当天，新华社将此文作为国内新闻头条，转发全国。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首都和地方好几家报纸转载。

不料12日晚上，时任“毛著办”副主任的吴冷西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打电话，口气极为严厉，说这篇文章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很坏很坏，是砍旗、丢刀子、非毛化。“砍旗”，是指砍毛泽东思想这面旗；“丢刀子”，是毛泽东批赫鲁晓夫的用语，说他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列宁这把刀子也丢得差不多了。吴冷西用这个话，意思是把毛泽东这把刀子丢了；“非毛化”，是说这篇文章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吴冷西指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在开初的时候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以后才是真理等，是完全错误的。他说，照文章作者的看法，“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不是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而是死抱着毛主席的教条不放，因而现在主要不应该反对“四人帮”，反对修正主义，而应该反对教条主义。他还指责，文章说要粉碎人们的精神枷锁，要反对只有“圣经”上说了才是对的，要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

吴冷西点出了这篇文章的政治目的，就是要冲破毛泽东的禁区。吴冷西的指责，等于将当时中央上层的矛盾公开了。

5月13日，有更多地方党报转载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

5月17日，分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在《红旗》杂志新老主编交接的会上说：“最近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和《贯彻推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两篇文章，不够慎重。首先，发表这两篇文章是哪个中央同意的，要查一下。”他特别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针对毛主席来的。”

第二天，5月18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刚刚开始，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张平化就被汪东兴叫去。张平化从汪东兴哪里回来后，将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各地代表团团长请到钓鱼台，就这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说：

“这篇文章，听说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文章很好，另一种意见说很不好。我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摸透。大家可以看看，小范围可以议论议论，发表不同意见。不要因为《人民日报》转载了，新华社发了，就定论了，要提高鉴别能力。”

这实际上代表中宣部表了态，是启发动员大家发表不同意见，也就是来批评这篇文章。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提出“实事求是”

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尖锐批评了“照抄照转照搬”,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与此相对立的是,6月15日,汪东兴在一次讲话时说:“‘实践标准’这篇文章,党性不强,要接受教训,下不为例,文章被‘帝修反’利用了,挑拨中央常委之间的关系。”“有人要为‘天安门事件’翻案。毛主席定了嘛,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嘛。还有人要翻‘516’的案,要把文化大革命的案也翻了,最坏的是矛头对准毛主席。”“批‘梁效’?北大是毛主席抓的点嘛,你们也要批啊?”

罗瑞卿同胡耀邦一起,指导哲学家吴江撰写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长文,系统批驳了坚持“两个凡是”者的观点,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6月24日,《解放军报》在罗瑞卿的直接支持下,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篇文章。《人民日报》在同一天刊登,《光明日报》在第二天全文转载。

华国锋没有阻止“实践标准”讨论,但也没有表示要收回“两个凡是”。

7月4日,华国锋同胡耀邦、谭启龙谈话,对“砍旗”的帽子有批评:“现在有一种苗头,动不动就说矛头对准谁,就说你要砍旗子。这样说,你叫人家怎么办呢?胡耀邦说,我们搞‘四不’(‘四不’即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有人爱整人,结果整到自己头上。”

7月21日,邓小平找当时的中宣部长张平化谈话,告诫他“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

7月22日,邓小平又找胡耀邦谈话。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引起争论的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接着,理论工作者采取开研讨会、撰写文章、讲演等方式,大力推进讨论的发展。特别是,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人民解放军各大单位主要负责人纷纷发表谈话,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将这些高级领导干部的讲话作为重要新闻,连续报

道，影响巨大。

7月，汪东兴到山东，在同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的谈话中，提出“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180度转弯”。

8月18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介绍了一个情况：“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

9月16日，邓小平在东北视察工作时，再次批评了“两个凡是”的主张。

1978年9月，《红旗》杂志上任不久的副总编辑方克主动请缨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方克是想借此参与“实践标准”讨论，摆脱《红旗》杂志几个月来的被动局面。但是，总编辑熊复根据汪东兴“按兵不动”、“不准介入”的旨意，不赞成文章发表。后此文经反复修改，到了第三稿，题目改为《重温〈实践论〉》。文章批判不可知论、怀疑论、“海外奇谈”。所谓“海外奇谈”，就是指香港那边有人说，大陆现在非毛化了。《重温〈实践论〉》以此为靶子，旁敲侧击：“海外帝修反，说我们非毛化，挑拨中央常委之间的关系。”

《红旗》杂志的文章送到中央，叶剑英认为，既然有不同意见，建议中央开个理论务虚会，让大家把意见充分摆出来，经过讨论统一思想，解决问题。

叶剑英的这个建议，是受了同年7月到9月李先念在财经战线召开的务虚会的启发。

1978年8、9、10月，全国掀起了真理问题的大讨论。

第1435回：西单墙，召开中央工作会 发重炮，陈云提六个问题

1978年9月10日，停刊11年的《中国青年》杂志出版了复刊号。这一期《中国青年》突出的重点是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革命何须怕断头》，报道了“天安门事件”当事人韩志雄的事迹。他因悼念周总理被捕入狱，多次被毒打，但他坚贞不屈，当审讯人员要他交代去天安门的动机时，他说：“我就是对你们批邓不满，我不相信邓小平是搞修正主义。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关心群众生活有什么罪？”

这一期《中国青年》还刊登了“童怀周”选编的《天安门诗抄》。

这一期《中国青年》还发表了由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撰写，经中组部部长胡耀邦审阅的，以本刊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的题为《破除迷信，掌握科学》的文章。其中引用了毛泽东在1954年讨论第一部宪法草案时讲过的话：“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文章第一次系统提出“要破除现代迷信”，这也让一些人理解为破除对毛泽东的迷信。

9月10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未定稿》刊物编辑部的人到街上买《中国青年》杂志，回来说，“买不到，不准再卖了。”

原来，负责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当天即下令禁止这一期《中国青年》发行，强制收回已发出的刊物。查禁的理由是：1. 刊物中登载了一些1976年四五天安门运动的诗抄，有为“反革命事件”叫屈的嫌疑；2. 杂志里没有登载毛泽东的诗词；3. 杂志里没有登载华国锋的题词；4. 有一篇文章中提出了：要破除“现代迷信”，即破除对毛泽东的迷信——这也是刊物被禁的最主要原因。

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国社会科学院《未定稿》刊物编辑部的人觉得：“‘天安门事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至今仍未平反，现在《中国

青年》挺身而出,公开正面报道,现在又遭封杀,肯定遇到巨大压力。我们应该尽力支持,让广大群众看到这些文章,读到这些悲壮的诗篇,以产生更大的影响。”

于是他们立即到《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买回一份《中国青年》,编辑部的李凌和王小强、王晓鲁三人把杂志拆开,一页一页贴在大张白纸上,并在重点文章和诗篇上加了鲜明的大红标记,以引起读者注意。他们又用红墨水大字写上一段按语,大意说:这是今天出版的《中国青年》杂志复刊号,不知为什么,街上买不到了,现张贴出来,供大家阅读,请大家评议。

他们将《中国青年》贴好后,张贴到哪里呢?

李凌的家当时在复兴门外三里河中国科学院北门外的地震棚里,他天天骑车上下班都要穿过长安街,看见北京西长安街和西单北大街交会处,西单路口东北面有一段西单体育场的约2米高、200米左右的灰色围墙,而且那里有几路公共汽车站,有许多人在那里上下车,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常常有人在这排矮墙上张贴寻人启事和小广告,引人注目,于是建议把这份《中国青年》贴到西单那面墙上去,大家都赞成。随后李凌骑上自行车,编辑部工作人员聂峙砥乘公共汽车,他们俩带着这份大字报和一桶浆糊、一把笤帚,来到了西单路口。一到那段墙下,李凌就赶紧刷浆糊,小聂急忙往上贴,很快就吸引了很多人来看。谁知这时两名戴着红袖章的持枪战士前来干涉,吆喝:“不准贴,不准贴!”有一个士兵的两只手像铁钳一样,紧紧地抓住李凌的双臂,命令说:“你们不能贴!”“你跟我到我们领导那里说清楚!”

这时围上来的人更多了,有些人对李凌他们说:“我帮你贴!我帮你贴!”于是,有人帮刷浆糊,有的帮聂峙砥贴,更多人则是把两个执勤战士和李凌围在中心,并对两个战士说:

“干嘛?干嘛?这些都是今天出版的《中国青年》杂志,下午就买不到了,贴出来让大家看,这又不犯法!”

有的高喊:“你们怎么随便抓人?放了他!放了他!”

在大家大声嚷嚷的时候,那个抓住李凌的双臂的战士稍微犹豫了一下,人们一拥而上,把他的双手拽开,有人低声对李凌说:“赶紧走!赶紧走!”于是李凌得以脱身,跑回家中。

第二天早上,贴《中国青年》的西单墙上又贴出一些新的大字报。这一下轰动了北京城,成千上万的人们涌到西单墙去看大字报。很多人读后在这个墙上贴出短短的大字报和长长的小字报,表示反对禁止发售《中国青年》。

《中国青年》复刊号被封杀,一时成了北京热议的话题,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一年10月以后,《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先后发表了许多在“天安门事件”中与“四人帮”进行斗争的事迹。

对于正在进行的“实践标准”讨论,10月,汪东兴对《红旗》杂志负责人熊复说,《红旗》杂志要一花独放,“就是不表态”。当熊复反映因为《红旗》不表态而受到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责难时,汪东兴说:“你要怕孤立。怕什么!不要怕。《红旗》不参加这场讨论。”

从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至10月,在这5个月中,《红旗》杂志没有发表一篇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短时间内,“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的尖锐分歧,迅速由京城传向了全国。

10月11日,贵阳诗人黄翔和其同伙李家华、方家华、莫建刚,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原人民日报社门前的巷口和巷内两侧,将一百多张大字报一长溜贴开。两个谷箩大的字“启蒙”在一支火炬背景上出现,跳入人们的眼帘。人们一下子全围挤了过来,整个大街交通堵塞。应人们要求,黄翔即兴朗诵了他写于1969年的《火炬之歌》等六首诗,总称《火神交响诗》。人们手挽手地将他围在中间保护起来,有人问:

“你所指的偶像是谁?”

结果问话的人被围观的人群打得口鼻喷血。几十份油印刊物《启蒙》朝人群中撒去。

此事当晚即震动北京。

10月到11月,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召开。会上,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又一次提了出来。

11月8日,新华社根据北京市公安局审查的结果,宣布“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完全是一宗冤案,在这次事件中被捕的388人,没有一人是反革命分子。

此时，党政军各部门、各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 219 人，接到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他们大多数是在文革中被批判或被批斗、打倒过的老干部，用当时的话讲，受过“迫害”。

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一切似乎没有什么不同。毛泽东和华国锋的标准像，悬挂在主席台的上方。会议期间，很多与会者晚上还饶有兴致地去观看主办者为大家放映的内部电影。

华国锋在开幕讲话中为会议确定了三项议题：一、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二、商定1979年和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接着，华国锋提出，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华国锋慢条斯理地讲了一个多小时，其间三次离稿讲话。他讲了很多经济建设问题，讲了国内经济形势和国际的有利条件，还讲了要善于利用这种形势，吸收国外资金和技术。华国锋还批评了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以及机关存在的同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问题。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上海申请进口一套设备居然要盖 18 个大印。他还说，我国经济工作中“笑话很多”，特别批评不重视市场竞争。

会议开幕后的第三天，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中提出了 6 个问题：

一、薄一波等 61 个叛徒案，陈云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7 年，深知这一案件内情，认定“薄一波等 61 人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他们不是叛徒”。

二、1937 年和 1940 年，中央组织部相继做出决定，就是从反省院出来履行过出狱手续但后来继续干革命的同志，经审查可以恢复党籍。陈云提出，“这些同志不是叛徒，应该恢复党籍。”

三、陈云对陶铸以及王鹤寿案件提出尖锐意见：“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一个尾巴，例如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我认为，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当移交给中央组织部，由中央组织部复查，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这些结论都应该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去考察。像现在这样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应该结束。”

四、“彭德怀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我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既然没有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五、“天安门事件”。陈云认为，“这是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六、康生的问题。陈云提出：“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康生同志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

陈云的发言，可谓“十年不鸣，一鸣惊人”。倘若从1962年算起，陈云已经保持沉默14年了，除了1977年3月，他为了支持邓小平复出，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一次书面发言，但那次的发言没有在大会简报上登出。这次，陈云的发言终于在大会简报上登出，使全体出席者都知道他在东北组扔出的这6颗“重磅炸弹”。

其实，一些老干部对陈云“放炮”并不感到意外。中央工作会议之前，他们已就一些问题有过沟通。

张爱萍之子张品，时任王震的秘书。工作会议前，王震委托张品，就“61个叛徒”问题征求了张爱萍的意见。

当时，干部子弟经常充当老干部之间的联络员。张品是一个，叶剑英的侄子叶选基、儿子叶选宁，以及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都是当时十分活跃的“联络员”。

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后，陈云、耿飚、王震、王诤等老干部都有过串联。叶选基和这些老干部的子女们有着密切的联系，并担负着通告消息的任务。

此时，华国锋已经很难让会议按着他原来计划的轨道运行了。在陈云发言后的第二天，华国锋要求转入农业问题的讨论。可是，各组在讨论时，纷纷对陈云的讲话做出强烈回应。万里、王首道、康克清积极支持陈云的发言，要求迅速解决陈云提出的6个问题；胡耀邦发言要求把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肖克发言要求为“二月逆流”平反；杨得志提出要为武汉“7·20”事件彻底平反；陈丕

显提出,上海“一月风暴”的问题要搞清楚;胡乔木就“少宣传个人,不搞新的个人崇拜”提出建议。

这些在党内很有声望的老革命家,接二连三地发出重炮,把华国锋轰得晕头转向。

正在召开的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作总结报告时,北京市委第三书记贾庭三讲话,每个代表都发了一份铅印的报告稿。讲到后来,贾庭三离开讲稿,从旁边拿出一张小纸条,念了一段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问题:

“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滔天罪行的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愿,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对于为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这段话,虽然并没有出现“天安门事件”五个字,但三个“完全”的连续运用,实质上是否定1976年4月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行动是反革命事件的。

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周鸿书听了贾庭三念的小纸条的内容后,觉得这实际上是在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感到很重大,就找总社国内部主任杜导正,把这个情况给他谈了,问能不能单独发表这一段。

杜导正看了稿子后,非常支持周鸿书的提议,表示“争取一下试试。”

回到分社,周鸿书在起草会议的新华社通稿时,考虑到:虽然杜导正支持单发,但还要经过北京市委同意才行,如果北京市委不同意单发,他担心关于这一段就发不出来了。所以,他在写稿子时,就把这一段放在稿子里,而没有单独写一条。但是,在送审稿时,他还要争取北京市委同意单发,因为杜导正也表示了这样的意见。

11月14日晚,周鸿书将稿子送北京市委书记毛联珏审查时写了这样一段话,大意是:“此稿总社有关领导看过。关于天安门事件那一段,建议拿出来单发,要否?请您审定。”

夜里23时左右,毛联珏来电话说:“老周,你的稿子我看过了。如果就照这样来发,我这里通过了。关于天安门事件那一段单发,我定

不了,这得请示林乎加同志。”

他沉了一下又说:“恐怕林乎加同志也定不了。”

于是,周鸿书给总社打电话通知“照大稿子发”。随后,又给杜导正打电话,说明了毛联珏的态度。

杜导正沉吟了一会儿说:“那就算了吧。”

1978年11月15日早晨,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周鸿书听新闻联播,没有他写的消息;翻阅报纸,也没有。他感到奇怪,总社为什么没有发消息?因为按照惯例,北京市委开会的消息,新华社应该在当晚就发出电讯稿。

原来,杜导正看了周鸿书的稿子后,觉得报道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内容非常重要,但淹没在长长的报道里,不突出。他认为这是应该重点突出的内容,所以,就和内部的几位副主任于明、冯健等商量,能否就这一段发一个电讯稿。

因为事关重大,国内部总编室将稿子送给穆青、李普审定。穆青、李普表示支持。穆青告诉杜导正,他和新华社社长曾涛商量后再做决定。

因为要商量,所以新华社的电讯稿也就没有在当天发出。当晚,穆青与在京西宾馆开会的曾涛通了电话,也觉得天安门事件这样重要的问题,被淹没在市委扩大会议的长新闻里太可惜了。两人取得一致意见。

11月15日,《北京日报》刊登了北京市委常委扩大的报道,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那段话,也在这个4000字左右的报道里面。

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社论,社会上感到一种“解冻”的气氛。紧跟着,南京群众纪念周恩来而引发的类似北京天安门事件的“南京事件”宣布平反;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也宣布平反。

这时,新华社内部由杜导正主持开会,立刻讨论如何落实曾涛的意见。讨论来讨论去,觉得有两个方案,一个是按照周鸿书原来写的稿子发,但在导语里突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一个是单发,但大家都有顾虑,担心通不过审查。到后来,北京分社社长周鸿书说:“我讲个馊主意,看行不行。今天的《北京日报》已经登了会议的报道,里面有

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那一段。我们是否可以从报纸里把这一段抽出来单发。”

大家认为，这个主意还不错，既单发还不用送审，两全其美……杜导正最后拍板说：“做两个方案，一个是摘出来单发，一个是放在导语里，但要把老周的稿子调整一下，最后送给穆青来定。”

穆青拿到稿子后，就通知国内部做好发稿的准备。标题是正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写的。

在此期间，曾涛还征求过林乎加的意见。林乎加回忆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曾涛对我说：我们新华社想把天安门事件单独发电讯，行不行？我回答说：我们的讲话是经中央批准的，你们怎么发，是不是要请示，是你们的事情嘛，我可没有权力干涉。”

与此同时，曾涛与穆青之间，也为是否请示中央这个问题，电话来往不断。穆青回忆说：

这中间，我们还商量要不要向中央请示。我们俩商量是，不能请示，一请示就完了，就等于给否了。曾涛同志给我透了个底，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和很多同志都提出来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么多老同志，这么高的呼声，看来这么做没有错。只要我们胆子大一点，完全可以这么做。所以我们才最后下了决心。如果没有会议上的信息传出来，我也不敢下这个决心。所以，这个事情是当时中央工作会议和新华社的编辑部来回协商，最后下决心共同负责。

到晚上7点临发稿了，曾涛同志又打电话给我，说：怎么样，穆青？下决心就这么发好不好。我说：好啊，我们大家都同意这么发。

曾涛像是开玩笑地跟我说：如果这篇稿子出了问题要坐牢，你可得陪我一块去。我说：行，我跟你一块去。

那天，我整整担心了一晚上。但是，第二天也没有什么事，而且反映是一片欢呼。华国锋给《天安门诗抄》题写的书名发表出来后，我们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第1436回：发电讯，“天安门事件”平反 划时代，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11月15日新华社发消息，11月1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新华社电讯稿：

引题：中共北京市委宣布

主题：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副题：对于1976年清明节因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这一新闻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11月16日，北京吕朴，音乐家吕骥的儿子，以真名和联系地址在西单墙上贴出大字报：《致宗福先和于无声处剧组公开信》。这张大字报后来被誉为点燃西单民主墙的火炬。

同日，一份署名“机修工0538号”的大字报，批判毛泽东犯下的历史错误。接下来，就进一步出现了要求肃清专制余毒、要民主、要言论自由的大字报，形成了西单墙一时间大鸣大放的盛况。

西单墙大字报不断地贴出，墙前驻足观看的读者越来越多，有时达四、五千人。有人宣读、笔记、照相和录音，中外记者夹杂其中采访、摄影，外国人与中国人随便交谈。有人撕毁大字报，有人维护张贴权利。

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了9条决定：

1、关于“天安门事件”，他承认“问题解决得还不彻底，还没有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并且代表中央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

2、承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撤销有关的全部中央文件；

3、为“二月逆流”平反；

4、为薄一波等61人平反；

- 5、彭德怀的骨灰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 6、为陶铸平反；
- 7、为杨尚昆平反；
- 8、对康生、谢富治进行揭发批判；
- 9、“文革”中的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由各地实事求是妥善处理。

25 日大会开过，当天晚上，于光远到卫生部部长江一真的房间，同他商量是否指名道姓地批汪东兴。他们认为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要讲“两个凡是”的提法和对它的坚持，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抵制，对平反“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出来领导党和国家工作的阻挠，对解决“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和康生问题的消极态度等等，汪东兴欠的账就很多很多……不把他的名字点出来，许多事情就讲不透彻，许多问题就说不明白。

25 日晚，西单墙前出现了自发组织的“民主讨论会”。

11月26日，邓小平接见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时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和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确，这并不可怕。”

11月26日，中共中央转发湖北省委、省革委会、武汉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的请示报告》，为武汉“七·二〇事件”平反。

11月26日，胡乔木在中央工作会议的东北组发言，希望华国锋在会议结束时讲一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算是对会议做的结论。他说：“真理标准问题本来是一个理论问题，但也是政治问题。”

于是，华国锋关于会议议程的安排又一次受到影响。代表们纷纷提出，大会暂不讨论经济问题，应该先讨论思想路线问题。这么一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下子成了大会的中心议题。

就在胡乔木发言的同一天，时任卫生部部长的江一真在西北组发言时，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

随后，杨西光、于光远也批评了汪东兴坚持“两个凡是”、阻挠邓小平复出、压制真理标准讨论。

江一真揭发汪东兴在1976年12月说：“邓小平的那两下子，不是

试过了吗？就是不行嘛！”

杨西光也揭发了汪东兴一系列讲话的具体内容。比如，1978年5月17日，汪东兴讲话说：“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

他们的发言在会议《简报》上登出后，其他各组也有人公开批评汪东兴。《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就是其中一个，他对事情发生的经过很了解，所举材料更为具体。在他发言之后，批评这位副主席的人更多了。

华国锋当时让大家敞开讲话，简报该登就登。当时最长的一份简报42页，整个会议出了400多份简报，放在地上有一米多高。

为让大家打消顾虑、畅所欲言，服务员一律不让进入会议室。以往都是由服务员给大家倒水，这次会议，主办者给每个会议室准备了两个暖水瓶，与会者自己倒水。秘书也不让听会，都站在会议室外的楼道里。

11月27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Robert Novak)时对民主墙涉及到重大问题公开表态。他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并强调自己不是赫鲁晓夫，不会贬低毛泽东。他还否定了外界传闻的他与华国锋的矛盾，表示不赞同大字报对毛泽东的评价，也表示自己不会当总理。但对大字报、对群众的民主诉求，他表示理解和容忍：“这是正常的现象，是我国形势稳定的一种表现。”又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利否定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都是完全正确的。这不可怕。”

谈话当晚19时，在西单墙前六、七千人集会，听取诺瓦克的朋友传达的邓小平与诺瓦克的谈话。随后集会群众从西单游行到天安门，在纪念碑下开会庆祝邓小平副主席支持西单民主墙。

第二天，28日，邓小平的讲话，新华社做了摘要报道，接着全国各大报刊刊登。天安门广场再次集会，人数逾万。







西单民主墙

12月1日晚上，邓小平和李先念找许世友、李德生、杨易辰、王恩茂、任仲夷、万里、陈丕显、段君毅、胡立教等人谈话。邓小平知道这些人对陈锡联、纪登奎等有比较大的意见，担心他们对陈锡联、纪登奎揪住不放。因此表示：像“天安门事件”、“720”事件等是要做出处理的，但是只能搞粗，不能搞细。一搞细就要追，追就会产生不利的效果。他说，找他们谈话是和他们谈判。邓小平说得很恳切，说这也可以“算我一个请求，要以大局为重”。他说，他是有意识地、自觉地和稀泥。稀泥必须和，有意识地和，否则不利；只有和稀泥，才是正确的。他说国内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凡是有损于这个，给人以错觉，极为不利。邓小平说，常委意见，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不能下。他讲这次会议在人事方面会有变动，对那“几个犯错误的同志”要批评，但不能动，现有的中央委员，一个不去，有的可以不参加会议活动，但不除名，对那些有意见的人，让他过关算了。

12月6日，北京电工魏京生在西单民主墙贴出小字报：《第五个现代化：民主与其它》。魏京生认为自由民主比改善生活更重要，要求反省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和将政治民主化。这份小字报引起很大的反响。

西单墙大小字报的内容很多，有蒙冤受屈者的申诉，有批评建议，有揭发恶人丑事，有新闻消息。在最初的几个月，西单墙的大小字报

绝大多数的内容以申冤诉苦为主，只是就事论事，不大涉及政治内容。很多人到这里来，主要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怨情，寻找翻身解放的机会。

后期主要是政论。其中讨论最多的是民主与法制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 1、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来探讨社会民主问题。
- 2、主张民间办报、民主办报的问题。
- 3、要求言论自由，废除“恶毒攻击罪”的问题。
- 4、赞赏推崇西方民主的问题。
- 5、公开评毛泽东功过的问题等等。

形式各异，优劣参差，署名、笔名、匿名不一而同。

北京在西单墙的活跃激发下，大中专学校和社会上一些青年们自发组织起来，兴办起自己的民间组织，出版自己的民间刊物，发表自己的政见、理想与追求，并不断地将它们张贴在西单民主墙上，或者散发给来往的群众，或者寄往外地的院校。仅北京就有 50 多种非官方刊物发行。来这儿的人越来越多，在北京的外国留学生和记者也跑到这里，采访并与行人和粘贴文稿者交谈，并向国外通讯社发送消息，这引起了中国公安部门和高层的注意。

与此同时，北京大学三角地也出现了北大民主墙。

1978 年 12 月 13 日，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承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汪东兴也在这一天做了书面检讨。

华国锋说，1977 年 3 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讲的关于“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拥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论，都必须制止”，这些话讲得绝对了。

他还说，1977 年 2 月 7 日中央“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中，也讲了“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

华国锋承认，“两个凡是”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全面，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

此外，华国锋还讲了一个集体领导的问题。他说：“希望今后各地区各单位向中央作请示报告的时候，文件的抬头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

央,只写党中央就可以了。中央党政军机关向下行文,也希望照此办理,也不要提英明领袖,称同志好。”

华国锋在讲话中说,中央政治局同意叶帅的建议,决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

12月13日,邓小平在闭幕式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邓小平文选》收入这篇讲话时作了这样一个注释:“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邓小平讲话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第二个问题是“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他说,“当前这个时期内,特别需要强调民主……现在敢出来讲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我们这次会议先进分子多一点,但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是不那么敢讲话。”“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群众提了些意见应该允许,即使有个别心怀不满的人,想利用民主闹一点事,也没有什么可怕。要处理得当,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现在党内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这是对长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种惩罚。”“人民群众提出的意见,当然有对的,也有不对的,要进行分析。党的领导就是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给以适当解释。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

他特别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关于经济的部分,他认为,“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

自主权”,这就是中国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改革的指导思想。

这时,中共的“第一提琴手”,名义上虽然还是华国锋,但实际上已经是邓小平。

叶剑英在闭幕会上充分肯定了这次会议,他说:“这次会议的民主精神是我们党很多年来没有过的。……实行这样充分的民主,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带了头。”“一定要永久坚持,发扬下去,一定要推广到全党、全国去。”

他还说:“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体现了我们党内的民主,西单民主墙体现了社会上的民主,这些民主精神都要发扬,我们要在全党、全国造成真正民主的空气,使广大干部群众精神振奋、心情舒畅。”

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但并没散会。与会者继续分组讨论了两天,会议到15日才结束。3天后,12月18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从此拉开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巨幕。

全会的具体议程是讨论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从1979年1月起提出的,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建议,同时审议通过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和今后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讨论人事问题和选举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在三中全会上,叶剑英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这句话,后来在三中全会文献出版时被胡乔木删去。

与此同时,陈云特别指示《人民日报》派记者深入到西单群众中去了解动态,收集情况,反馈中央。

胡耀邦则表态道:西单的大字报是人民出自内心的呼声,是人民新的觉醒。

1978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人民万岁》。

文章开头就引述革命导师恩格斯的一段名言:“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大规模群众运动只能“是人民的要求和需要的自发的不可遏止的表现”。

“(天安门)运动发生之前,并没有谁来号召,谁来动员,谁来组织,

也没有谁来事先确定斗争的目标,拟定斗争的纲领,准备斗争的旗帜。人民群众既是这场运动的勇敢战士,又是杰出的组织者和指挥员。”

文章认为,我们的国家在革命胜利后仍然存在着“封建主义的残余势力”,存在着“反人民、反民主”的势力:

“‘四人帮’馨香祷祝的所谓‘社会主义’,原来只是涂着社会主义色彩的彻头彻尾的封建主义。”

文章接着写道,除了“四人帮”,还有一些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在人民赋予他们权力之后,不是用这种权力来维护人民的利益,而是一味追求自己的锦衣玉食和高楼大厦,企图剥夺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甚至对人民进行压制、打击和迫害”,“人民就有权抛弃他们”。

文章号召:人民群众需要“坚持不懈地进行争取和保卫人民民主的斗争”“人民的民主权利,靠人民用自己的斗争去争取和保卫,而不是靠什么神仙皇帝来恩赐。”

文章为天安门所代表的民众力量觉醒和崛起而欢欣鼓舞,乐观地展望民间力量是新中国的希望所在:

“他们不仅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而且尝试着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手段、自己的步骤来推动实现这些要求的社会变革,尝试着给整个革命发展的进程打上自己的烙印。”

这篇文章是由胡耀邦策划,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林润青主笔,中央党校的阮铭参与撰写的。没想到,《人民万岁》见报后,立即受到邓小平的批评!

22日晚,十届三中举行闭幕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等文件,陈云、华国锋发表讲话,会议闭幕。

第1437回：务虚会，锋芒直指毛泽东 五否定，邓小平“看不下去”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及这一时期的人和事，如何处理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当时曾经有两种认识：一种认为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另一种认为完全是林彪、江青野心家集团的犯罪内乱，只能通过审判处理。

陈云认为：首先，要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和后果区别开来。他说：“关于对‘文化大革命’的估计，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是为了防止中国变修，出现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事件，最初也不是要搞那么大。这个问题需要作一个总结，总结时要很慎重，要把林彪、‘四人帮’等人的破坏作用估计进去。”

1979年1月4日，陈云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说：“我们党从1921年成立至今快58年了。是毛泽东领导我们取得了伟大胜利。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功绩概括得很清楚，他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我们党很可能还在黑暗中苦斗。’民主革命胜利后，‘恢复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造都很成功’，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也有缺点、错误。要求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是不可能的，是空想。”

1月8日，周恩来逝世三周年纪念日，北京维权上访女工傅月华率领数千名上访群众，到天安门示威游行。他们手持白色床单做成的横幅，上书“反饥饿、反迫害、要民主、要人权”。

第二天，1月9日晨，傅月华被逮捕。《探索》、《四五论坛》、《中国人权》开展呼吁释放傅月华的抗议活动。

随着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开展，西单民主墙大字报揭示的问题也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涉及敏感的禁区，出现涉及抨击共产党和现行制度、攻击中共领导人的内容。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对此做出了新的规定，要求大字报张贴者必须在张贴处的登记处如实登

记姓名、单位、住址等内容。登记处对大字报不加审查。张贴者应对大字报的内容负政治、法律责任。大字报张贴处禁止无理取闹、寻衅滋事。

1月9日,刚担任中宣部部长不久的胡耀邦主持召开中宣部务会议,正式确定了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议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中宣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邀请中央和北京理论宣传单位160多人参加,各省市派来1位联络员。第二阶段,以中央的名义召开,邀请各省市的有关人员参加,规模扩大到四、五百人,改名为“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

1月18日,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幕,胡耀邦作“引言”报告。这份“引言”报告,胡耀邦会前曾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并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第一段会主要是大家讨论、小组座谈和大会发言相结合,让大家把思想敞开,畅所欲言;第二段会请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人都到会讲话,引导大家集中讨论解决思想理论战线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重要问题。先民主后集中,把思想统一起来,促进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的理论工作做得更好。

胡耀邦的“引言”稿和信很快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同意。他在“引言”报告中说:

“我们召开这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要达到什么目的呢?第一,要总结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教训。……建国三十年,理论宣传战线有许多好的经验,也有许多教训,要把这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总结起来,……。第二,要研究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

胡耀邦激情洋溢,挥舞着拳头,要求“冲破一切禁区”、肃清林彪、“四人帮”的“理论恶霸作风”。他的引言报告话声刚落,周扬就从邓小平家里匆匆赶来,传达邓小平的指示:“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

接下来是小组讨论。会议第二天,1月19日,《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在第一组的小组会上宣读了他和《解放军报》总编辑华楠、《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新华社社长曾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中央编译局负责人王惠德6人的联合发言:《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情况》,长达两万余言,从十个方面批判坚持“两个凡是”的言论和

行动。

之后,各组都据此向会上的“凡是”派发难。一天之内,便掀起了揭发批判“两个凡是”的高潮。接下来就天天盯着“凡是”派,要他们检讨、交代。连主管全国理论宣传新闻出版工青妇等工作的汪东兴也被牵扯出来。会议开到后来,有人甚至提出要汪东兴到会上来说清楚。

接踵而来的就是批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否定毛泽东。

王若水一马当先,在会上作长篇发言,题目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教训是必须反对个人迷信》,公开批评毛泽东,甚至从道德、人品上谴责毛泽东。

接着,与会者从个人崇拜的表现、危害、理论和历史根源,直到个人崇拜的历史观基础,一路扫荡过去。什么语录歌,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万岁万岁万万岁”,“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几百年出一个”,“顶峰”,“最最最”,“三个里程碑”,“四个伟大”,所有当时大家耳熟能详的东西,统统都在被批判之列,与会者感到痛快淋漓。当然,此刻他们是不会反思在他们认为的那个个人崇拜年代,自己是怎样表现的?又是怎样推波助澜的?

对个人崇拜的声讨同样也涉及到华国锋新的个人崇拜,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的张显扬在会上做了题目为《从〈东方红〉到〈交城山〉》的发言。

《交城山》是山西的一首民歌,后来改了词,变成专门歌颂华国锋的歌。张显扬认为,《东方红》最初是陕北一个老农李有源的口头创作,作为农民的一种感情表达,没有什么不可以。可是,几十年来官方把它作为标准的颂歌,作为一种程式,每逢大会必唱。张显扬把《东方红》跟《国际歌》做了对比,说:

“《国际歌》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东方红》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完全是两种思想体系。毛泽东自己说过,《国际歌》是历史唯物主义。既然如此,他就应该拒绝‘大救星’、‘万岁’之类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歌功颂德、阿谀奉承。但是,他却非常欣赏。”

显然,张显扬的看法是片面的。《东方红》作为中国正式场合的颂

歌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没有任何官方将它作为正式场合标准的颂歌。将《东方红》作为正式场合标准颂歌的恰恰是广大群众,包括张显扬自己在内。而毛泽东对此是屡屡表示反对的。但此时,毛泽东的反对在与会者眼里已经都是虚假的了,他们将这一切都推到了江青、林彪、毛泽东的身上,似乎与张显扬他们自己没有任何的关系。

对个人迷信,一位与会者举出一个例子,说粉碎“四人帮”后他在某省见到了这样一件事:一天省城街上突然出现了游行队伍,锣鼓喧天,十分热闹。上街一看,原来是各单位到省委去迎接新发行的华国锋的画像。据说,华国锋的画像由飞机运到省城,省委领导人已从机场迎回。这种迎请华主席画像的情况大致是这样:去时,各单位领导人站在队伍的最前面,抱着空镜框,回来时把画像放在镜框里面,抱着率队归来。一时之间,满城都是迎请画像的队伍。这位与会者最后慨叹道:“想不到我们党竟沦落到这个地步,连某些迷信团体也做不出来的事情我们却公开做出来了!”

随之而来的是批判毛泽东晚年极左的思想、理论、指示和决策,诸如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全面专政理论,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等等。所有这些曾被认为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贡献的东西,全都受到批判。

历史学家黎澍这样谈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变化状况:“毛主席本人思想在变化。他在《论联合政府》和七届二中全会上都说过,全国解放以后,要保存资本主义一个阶段,并要让它有所发展。还说过,要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马上建设起社会主义是空想。可是不久他又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必然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党内也会有一部分人借口中国落后需要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发展,这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新的社会制度一产生他就想超越经济自然发展阶段,这样也就带来了严重的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搞成了贫穷的社会主义,还说贫穷能更快进入共产主义。”

经济学家许涤新也说了这样一段话:“三大改造后,对于如何搞社会主义,毛泽东同志和党内许多领导人的思想是不一致的。看来,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三大改造后认为在他的坚强的意志之下,中国是可以

很快进入共产主义的，于是就来了个‘大跃进’，大炼钢铁，吃饭不要钱，等等。但是国民经济却因此出现了极大的困难。看来，毛主席在‘大跃进’失败之后，就认为许多老党员、老干部，不能适应他的很快进入共产主义的思想，认为这些老家伙是修正主义，因此，反右倾，搞‘四清’，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接踵而来。……是不是可以说，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是主席他老人家唯意志论发展下来的结果？既然唯意志论成了主导思想，那么还有什么客观规律呢？他老人家是不考虑客观规律的。他心目中的平均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为了急于消灭三大差别，竟然要知识分子丢掉知识，丢掉科学文化。毛主席在哲学、政治、军事、诗词等方面有伟大的成就、功绩，就是不懂经济。”

会上对毛泽东思想是否包含错误的问题，有不同看法。有一种意见认为，正确的是“毛泽东思想”，错误的是“毛泽东的思想”，或“毛泽东的晚年思想”。许多人不赞成这种意见，认为毛泽东思想本身就是一分为二的，里面有正确的东西，也有错误的东西。

会议的发言已不回避公开指名道姓地评论毛泽东。

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与会者也提出质疑，认为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统统都是毛泽东左倾路线的产物，因此造成的冤假错案，都应该彻底平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被批得最凶。

第三组副组长、中央编译局负责人王惠德说：“现在全党面临着一个重新认识的问题。建国快要30年了，现在还有两亿人吃不饱饭。面对这种情况，全党、全民都在思考：我们一定是在哪里出了毛病。这个重新认识的要求是阻挡不住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搞理论工作的同志麻木不仁不思考，不去研究是不行的。”

该组组长周扬接着说：“首先有个对‘文化大革命’的定性问题。结论当然要由中央来做，但在理论上，我们必须弄清楚。究竟是出了林彪、‘四人帮’几个野心家、阴谋家造成的，还是在路线、理论上有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否存在有问题？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两个凡是’的问题也就搞不清楚。如果这个理论站得住，在这方面讲‘凡是’也许还可以；如果这个理论有问题，那就更不能‘凡是’了。过去，我们很多人都是‘凡是派’，现在‘凡是’不下去了。‘无

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个根本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毛泽东同志，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文化大革命’的定性问题才能解决。随着，‘两个凡是’的问题也不必争论就可以得到解决。”

会议还提出为要文革前的“十七年”正名。与会者认为：“四人帮”认为十七年许多领域都是“黑线专政”，这是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提出的最重要的论据。为了驳斥“四人帮”，就要为十七年正名。大家举出许多事实证明，十七年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统治，并无所谓“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可是，与会者是否想过，既然十七年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统治，为什么还发生了那么多他们认为是错误的政治运动呢？既然十七年发生的政治运动统统是毛泽东左倾路线的产物，那又为十七年正什么名呢？而此时，狂热的与会者们已经顾及不到这些了，只要是涉及到毛泽东的，就都是错误的，都要反。

关于对外政策和防修反修，国际问题专家宦乡，从国际论战谈到国内的“左”，直接批评“九评”。他说：

“20年国内‘左’倾思想的发展，同一定的国际条件也有关，特别表现在国际共运的论战中。当然，别人干涉我们的内政，或者企图损害我们的主权，进行反击是对的，可是当时的论战却大大加强了国内‘左’倾思想的发展。尤其是因为苏联批评我们的‘大跃进’，我们就更发誓要比苏联更早进入共产主义，并且毫无根据地怀疑有些中央领导人暗中与苏联通气，因此加强了国内反右斗争。‘九评’所提出的观点，有的已经‘左’得不能再‘左’了，尤其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和《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这两评，前一评是根本错了，斯大林说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修正主义的典型，赫鲁晓夫把它平反了，并亲自登门道歉，而我们却出来维护斯大林的无理判决，轻点说也是干涉别国内政。现在虽然已平反，但提到的错误观点及其影响尚待清理。这篇文章的文风也特别坏，东拉西扯歪曲利用人家的片断材料，无限上纲。这篇文章听说主要由王力起草，是王力的‘名著’。‘九评’对国际国内都有比较大的影响。对国内来说，从‘九评’可以看到提出‘走资派’的由来和发展，可以看到我们是如何从批判苏联的‘奖金挂帅’和南斯拉夫的‘市场经济’中发展我们的‘政治挂帅’、忽视经济规律、忽视发展生产力的，也

可以看到我们是如何从支持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搞个人迷信而又转到提倡个人迷信的，林彪、康生、‘四人帮’利用这一点大售其奸。而‘两个凡是’实际上就是去鼓励继续搞个人迷信。”

“九评”是指20世纪60年代中央为反击苏共对中共的攻击，由特别组织的中央反修领导小组撰写的九篇论战文章，在当时的国际共运中有相当的影响。中央由邓小平负责，每篇均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

会上还提出一连串问题：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社会帝国主义？苏联怎么是社会帝国主义？赫鲁晓夫怎么是修正主义？等等。并以肯定和同情的态度讲到南斯拉夫，说南斯拉夫是最先思想解放，突破禁区，摸索了一条自治社会主义道路，难能可贵。与会者还对赫鲁晓夫的经济改革，作了肯定的评价。总之，凡是毛泽东反对的，他们都要肯定。当然，与会者们都没有能够像毛泽东那样，预见到后来苏联的解体和铁托逝世后，南斯拉夫的分裂。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严家其讲了废除终身制问题，李洪林讲了个人崇拜在制度上的危害，北师大的齐振海讲了民主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齐振海说，因为没有民主，才使广大党员、人民30年来遭受多次大的政治迫害；反右派、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都是因为制度不民主造成的，一个人决策，怎么能不犯错误？他还说，中国的“选举”被搞得声名狼藉，一定要给真正的选举恢复名誉。不搞选举，哪来民主？会上还对原来一直批判的资本主义国家提倡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人道主义等等作了肯定的评价。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人提出建议：中央应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像40年代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一样，做一个总结，通过总结，弄明是非功过，统一对毛泽东的评价。

第1438回：形势变，取缔西单民主墙 写《决议》，河南刘建勋撤职

对理论务虚会的情况，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邓力群认为：“会开的时间越长，发言越多，离谱的东西就越多。最突出的是王若水，他否定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从毛泽东的个人品质上，要连根拔掉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胡乔木说：“这个会越开越不像样，这个也否定，那个也否定。归纳起来就是五个否定，即否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说：“看理论务虚会的简报，越看越看不下去。”

邓小平让胡乔木为他起草一个讲话，针对会里会外发生的一切，讲讲应坚持的原则。

1979年3月6日，陈云在会见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时，专门谈到关于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他说：“‘文化大革命’不能说毛泽东没有一点责任，但人们对毛泽东的评价不会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在这个问题上，要平心气和，要掌握分寸，慎重考虑，不能感情用事。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

1979年3月，任畹町等人在西单民主墙贴出《中国人权宣言》。

3月22日，《北京日报》发表《人权不是无产阶级的口号》一文。

3月25日，魏京生在西单民主墙贴出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指名道姓批评邓小平“走的是独裁路线”。

理论工作务虚会原计划闭幕时华国锋的讲话是由李洪林起草的，务虚会一开始，胡耀邦和胡乔木就把他叫去，胡耀邦讲了一个大要，胡乔木说了详细的提纲，主题是继续解放思想，促进改革开放。会议第一阶段休会前，李洪林就把稿子打印出来交上去了。但是最后，华国锋不讲了，改由邓小平到务虚会去作总结讲话。邓小平的讲话稿起草工作由胡乔木主持，成员有宋振庭、吴江、李洪林、滕文生。

3月27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胡乔木等人谈话时,集中谈了讲话稿要表达的思想。他明确指出: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现在该讲了。他要求讲话稿要结合分析当时出现的几个非法组织的活动来讲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以动员群众同坏人作斗争。

3月28日,理论务虚会第二阶段开始,原计划开10天,实际只开了7天。

3月29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布通告,明确指出:凡是反四项基本原则、泄露机密、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标语、海报、大字报、小字报及书刊、画册、唱片、图片等,“一律禁止”。

同日,中共中央转发公安部党组的请示报告,确认全国87个自发组织中,有7个组织:北京的“探索”、“中国人权同盟”、“兴中会”,上海的“社会主义民主促进会”、“上海民主讨论会”、“振兴社”和贵州的“解冻社”,“都是有极少数坏人控制、把持的”,“他们从纲领、口号到具体活动,都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中共中央的处理意见是,打击首恶分子,分化和瓦解这几个组织。

当天,北京市公安局发布六条通告,禁止“妨碍交通的集会、游行”;“冲击党、政、军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造谣惑众,煽动闹事”;“拦截车辆,无票乘车”;“任意张贴和涂写标语、海报、大小字报”等活动。

《通告》发出后的当天,北京市公安局立即逮捕魏京生和陈昌。魏京生被捕的直接理由是出卖中国军事情报,“把我军毙伤越军一万多人的战报及自编我军指挥员名单、战略意图等资料,以20元人民币卖给外国人”。

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长篇讲话。讲话后,各组进行讨论。与会代表都纷纷表态,认为这个讲话“非常重要”,表示“听后受到很大教育”。但不少代表也对报告中的一些提法提出修改意见或要求补充一些内容。比较集中的意见是:报告只强调反对右的一面,很少提到反对“左”的一面。对坚持“两个凡是”,甚至怀疑、否定和反对三中全会方针的错误思潮,也应

给予坚决的批判。报告后，就有人议论：中央现在“收”了，“转”了，“纠偏”了，务虚会第一段错了，等等。与会者建议报告对于三中全会前后思想路线论战的历史意义和务虚会在分清两条思想路线方面所做的工作、所起的作用，应予足够的评价。

4月3日，理论工作务虚会结束，胡耀邦作“结束”讲话。除了邓小平报告外，原定华国锋和叶剑英的讲话都取消了。

4月4日，“中国人权同盟”负责人任畹町在西单民主墙张贴大字报时，被便衣警察当场逮捕。

同时，数百人开始洗刷全城的大字报。除指定保留的西单大字报区外，天安门广场东侧、东长安街、王府井大街、前门大街、北京站和台基厂一带的街头标语大小字报均被洗刷干净。

全国和各省也开始采取相应措施，清洗大字报和封闭民办刊物。上海“民主协会”、“民主讨论会”、“人权委员会”共有十多个成员被捕。贵阳“解冻社”成员全部被捕，后来又全部释放。不过在87个自发组织中，除了认定有问题的7个外，多数自发组织，包括一些有重要影响的如“北京之春”，并未列入其中。对认定的7个组织的处理也留有余地，特别指示“不要把它们定为反动组织”。一些被拘捕的活动分子，经“教育”后又被释放。

6月18日至7月1日，在北京召开的五届二次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取缔西单民主墙的问题。胡耀邦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表示：“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或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

对于魏京生的被捕，胡耀邦说：“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监牢。魏京生抓了三个多月，他一死就会在群众中变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



此照片拍摄于 1979 年 9 月 3 日北京西单民主墙前的人行道

自从“四人帮”被抓捕之后，华国锋就明确表示，与“四人帮”的斗争是敌我矛盾性质的斗争。既然如此，应该怎样处置“四人帮”呢？

随着真理标准的讨论，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召开，西单民主墙的传播，中国民主与法制的呼声越来越高。许多在文革中受到过审查的老干部对在专案组，或在批斗他们时不容他们分辩的作法深恶痛觉，他们认为，应该改变文革中的做法，依法办事，按照法律程序审判他们。他们觉得，这样做，不仅可以在政治上彻底打倒“四人帮”，还可以树立依法治国的榜样。

这时，人们突然发现，既然是依法审理，那么，依什么法？法在哪里？因为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还没有一部完整的刑法。在此之前，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国第一部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等5个组织法，标志着中国法制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这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律室便开始着手刑法典的起草工作。到1957年6月，写到第22稿，上报中央法律委员会，据说毛泽东看了，评价不错，发给人大代表人手一册，并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出了决议，同意将第22稿刑法作为草案公布试行。1962年3月，毛泽东针对立法工作指出：“不仅刑法要，民法也需要，现在是无法无天，没有法

律不行,刑法、民法一定要搞。”在这次谈话精神的鼓舞下,同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室在第22稿的基础上再次开始修订工作。经过多次的重大修改和反复征求意见,至1963年10月9日,写出了第33稿刑法草案。由于后来的“四清”和文革,这项工作就搁置了。于是,1979年2月下旬,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宣告成立,着手刑法典的起草工作。刑法又历经了5稿,终于在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7月6日正式公布,并规定自1980年1月1日起施行。

197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对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的党内审查工作,后来称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审理领导小组,胡耀邦为组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审理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中纪委,对外称“中纪委二办”。

1979年10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庆,中央决定由叶剑英作一个重要讲话。邓小平提出这个讲话要对过去30年作一个总结,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要做出一定的说明。这篇讲话的起草是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进行的。1979年8月下旬,邓小平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提出讲话草稿“讲理论的东西多了,概念的东西多了,读后感到沉闷,需要做大的修改”,“要从林彪、‘四人帮’的事件中间得出几条基本的教训,要写得很准确”。

9月4日,邓小平再次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提出讲话稿“还是要讲在30年的历史上毛主席是有伟大功绩的,我们的一切成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下取得的。我们的党、军队和人民是受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在毛主席领导下建立功勋的”,“要使人看了这个讲话以后得出一个总的印象,我们的党和人民现在是真正坚持毛泽东思想,是完整、准确地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是真正将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付之实现,不是搞片言只语。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叶剑英的讲话稿前后改了十八、九遍,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中进行了多次讨论,并在各民主党派中征求了意见。先后参加讨论的有三、四千人。

1979年9月25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四中全会召开。会上,许多与会者继三中全会之后,再次公开批评了中央一些领导干部,

包括纪登奎。

万里说：“活着的个别领导人干了错事坏事，必须自我批评，不要欠账。”

吕正操说：“你指的是纪登奎，说明白点。”

万里说：“对，就是指他。”

许世友的发言更加尖锐，他对纪登奎说：“你是造反起家，进了政治局，官不小了，还搞什么名堂，你基本是跟‘四人帮’走的。”

邓颖超也批评说：“你的检讨很坏，避重就轻，应把 10 年来在政治、思想、工作、作风、立场上与‘四人帮’是什么关系说清楚。建议中央也要查清，一批二保三看。有同志说你是翻云覆雨的政客，你今后还是政治局委员，希望警惕，不要利用权位报复我们。”

廖承志、程子华、谭震林等也都作了发言。出席四中全会的许多人都给纪登奎提了意见，有的意见还相当尖锐。纪登奎表示接受大家的批评，并做了检讨。

十一届四中全会上，中央决定纪登奎辞去他在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职务，但没有公开。纪登奎交出主要工作之后，邓小平找他谈过一次话，鼓励他还要继续做一些工作，又征询了他的意见。后来，中央安排纪登奎主管了一段时间的旅游工作。

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并通过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9 月 29 日下午，讲话正式发表。讲话提出：

“中共中央认为，对过去 30 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10 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做出正式的总结，但是，在庆祝建国 30 周年的时候，有必要给予初步的基本估价。”

讲话总结了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主要特征和教训，对“文化大革命”10 年的基本评价是“反革命大破坏，使我国人民遭到一场大灾难，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是“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毛泽东同志的不朽功绩，坚决捍卫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讲话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要求在国庆讲话基础上，更加具体、充实、丰富，进一步做出一个历史问题决议的呼声日高。

同时,党内还有另一种呼声,就是觉得建国30年的历史留在以后来讲不晚,文化大革命的10年也要等待适当的时机来做出决定。这是三中全会确定的方针。

邓小平支持把《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提上党中央工作日程。

1979年10月,邓小平同胡耀邦、姚依林、邓力群谈话说:常委研究,准备为五中全会、六中全会和十二大做点准备工作。第一,修改党章;第二,修改宪法;第三,讨论两年调整计划、十年长远规划;第四,起草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现在着手,六中全会讨论通过。邓小平还说,有了国庆讲话,《历史决议》就好写了。以讲话为纲要,考虑具体化、深化。这样,邓小平代表党中央正式提出起草《历史决议》,并在此后直接领导这一工作。

10月30日,具体负责《历史决议》起草工作的胡乔木在起草小组会上传达了邓小平的谈话,对《决议》起草工作进行了部署,提出以起草国庆讲话的班子为基础,再从人民日报社、新华社、解放军报社和中央档案馆抽调20多名理论工作者,集中起来,脱产工作。

11月,中共中央决定着手起草《历史决议》,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胡乔木、邓力群等组织实施。《历史决议》起草工作正式启动。

1979年10月,中共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经省委批复同意的《关于处理“北、决、扬”一案的请示报告》,认为“北、决、扬”不能定为反革命组织。鲁礼安、冯天艾等人免于起诉,先后释放。

10月16日,魏京生被以反革命罪及向外电记者出卖惩越战争情报为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11月,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做出决议:取缔“西单墙”。

11月开始,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2月6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通告,规定除在自己所在单位张贴大字报外,所有大字报一律集中到月坛公园,且要填报真名和其他资料,禁止在西单墙和其他地方张贴大字报。

西单民主墙取缔的那一天,有一首墨迹未干的诗刚刚贴上。诗中写道:

我的朋友，
告别的时刻已经来临。
再见！
我能对你说些什么？
说春天的严寒？
说枯萎的腊梅？
不！
还是说欢乐吧！
说明天的欢乐，
说纯净的天空，
说野外金黄的花朵，
说孩子透明的眼睛。
我们应该带着尊严重告别，
不是吗？
当时的月坛公园偏僻而无人问津。

1978年7月，邓小平批评郑州大学揭批查有阻力，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应声下台，全省又掀高潮。当年开封“八二四”头头陈红兵也被转移到开封烟厂严加看管。

1978年11月16日深夜，陈红兵被正式宣布逮捕，戴上手铐，塞进一辆北京吉普，左右两人押送，沿着郑汴大道从开封向郑州驶去。后边还有一辆吉普车尾随着，里面坐着兰考县委书记张钦礼。

当晚，河南造反派的三大著名头头同时被逮捕。他们是：党言川，河南“二七公社”的学生头头；陈红兵，开封“八二四”的学生头头；张钦礼，“兰考卫焦”的头头。而“河南十大总部”、“河南造总”、“开封左司”、“兰考卫东林焦”的头头不仅一个没抓，并且这时大多数成了整造反派的掌权者。

1978年11月21日，《河南日报》头版右下登载一篇消息：“中共河南省委决定依法惩办反革命分子党言川、陈红兵、张钦礼”，全文如下：

本报消息：为了深入开展“一批双打”斗争，坚决打击“四人帮”的社会基础，中共河南省委决定，将反革命分子党言川、陈红兵清除出党，

依法惩办；将反革命分子张钦礼，开除党籍，依法惩办。公安机关已将三犯依法逮捕。

反革命分子党言川、陈红兵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反党乱军，大搞打砸抢，残酷迫害老干部，疯狂镇压群众，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罪恶昭著，不加惩办不足以平民愤。

原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张钦礼，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包庇纵容坏人，反党乱军，大搞打砸抢，践踏社会主义法制，残酷迫害革命干部和群众，严重破坏工农业生产，擅自扒堤决口，使群众遭受严重损失，罪恶累累，民愤极大。

依法逮捕反革命分子党言川、陈红兵、张钦礼，大快人心，大得人心。当地党委正放手发动群众对三犯的反革命罪行深入进行批判斗争。

从这时开始，凡是曾经支持过造反派的干部，包括刘建勋、纪登奎，无一幸免成了被清查的对象；工厂里直到班组长，农村里直到生产队长，全省达一百万人。据当时省委领导人公布，全省开除党籍106000人，判刑2700人，实际比这更多。

1979年12月26日，陈红光接到对他的判决书（1979汴法刑字第365号）——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而且指控他“拒不认罪”。

第1439回：徐明清，平反后风波依然 谈《决议》，刘少奇案全推翻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部分了解徐明清历史的老干部开始不断反映徐明清的情况，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开始着手调查。第一次透露徐明清冤案可能平反的信息，是从胡耀邦的一次报告中发出的。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着手清理冤假错案。他在一次报告中尖锐批评了乱抓人的问题，一口气点了20多个遭到乱抓人的名字，其中就提到了徐明清。

1979年3月的一天，秦城监狱的监狱长忽然来到徐明清的牢房，对她说：“你身体不好，决定让你进城看病。”并让她把所有的东西都带上。

一会儿，一辆轿车把徐明清从秦城监狱送到了北京公安医院。徐明清被安排在一间单人病房，门口站着卫兵，虽然行动仍受到管制，但伙食有了改善，每天由医生为她检查身体，治疗调养。

在医院安住了一个多月。一天中午，徐明清正在睡午觉，秦城监狱的监狱长忽然走进了她的病房，通知她说：“赶快起来，你现在可以回家了。”

“回家？”徐明清一下子懵了。

她百感交集地从床上坐起来，不觉大声反问：“回家？我还有家吗？有家吗？”

监狱长和蔼地安慰她：“有家，你的孩子们都来接你了，就在楼下等着呢！”

真是喜从天降，徐明清连忙穿衣下床，不过她细细一想，又站住了。

她连声问道：“你们说我是‘现行反革命’，说我是‘叛徒’，这些帽子不摘掉，我不离开这里！我在监狱里写的材料，是被逼抄写，我不能承认！”

于是,徐明清被请到医院的一间办公室,由前来的中纪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公安部和徐明清所在单位农业部的代表,向她明确宣布:“你身体不好,先回家休息。组织上正在对你的问题进行重新调查、核实,现在问题基本澄清,不久就会为你重作结论。请你放心。”

就这样,徐明清和她的孩子们一起,回到了家中。

不过,她的案子“通天”。被逼所写的材料,上了“红头”文件,并向全国转发。正因为这样,她的冤案的平反,不仅仅要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进行仔细调查,而且要报送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

这一切,都在一步一步地进行。

1979年11月17日,农业部做出撤销在“文革”中错定徐明清为叛徒的决定,中央组织部审批同意后,于1980年3月10日向有关单位下文,摘掉她“叛徒”的帽子,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和行政10级的待遇,彻底为她恢复了名誉。

1982年7月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的《案件复查通报》第1号上,刊载了《关于徐明清同志是否包庇江青问题的复查结果》一文。

《复查结果》指出:“徐明清同志和江青的关系问题,经中央组织部核实,徐明清同志在延安给江青写的证明材料并未证明江青在上海北新泾有党的关系,与其他同志所写的证明材料是一致的,是实事求是的;徐明清同志在关押审查中被迫写的交代材料,在宣布她自由的当时,即申明推翻了。”

《复查结论》还说:“徐明清同志没有包庇江青的问题,中共中央组织部于1981年7月报告中央,上述各项报告,已于1981年9月1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同意。”

徐明清的冤案终于彻底得到了平反,从“文革”中抓“叛徒”开始,直到因江青问题蒙尘,风风雨雨14年,徐明清终于度过了漫长艰难的日子。

事情还没有完结。曾为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的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写了一部《江青野史》,已于1980年12月在香港出版。书中参照中共中央1977年10号文件的说法,把徐明清说成是江青的死党。后来,此书又在大陆出版,影响很广,弄得徐明清是不明不白。自1981年3月起,徐明清开始向组织申诉此事。

1988年,朱仲丽又出版了两本有关江青的书,徐明清的恶名仍在其中。怎么办?

那时候“通过法院,依法解决”非常的时髦和盛行,人们似乎认为,什么事情都可以用“打官司”的方式予以解决,就连李谷一和韦唯工作上的纠纷也闹到了法庭上,一时间,全国上下沸沸扬扬。

老革命徐明清此时也不能“免俗”,在万般无奈之下,她向法院提起诉讼。

1990年3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

“原告徐明清诉被告朱仲丽侵害名誉权纠纷一案,经本院审理认为,原状诉争之内容,已有有关部门处理,原告对原处理持有异议,应向有关部门申诉解决……驳回原告徐明清的起诉。”

中组部办公厅确实下发了关于“徐明清没有包庇江青问题”的文件,可是,中央1977年10号文件是向全国人民传达的,而中组部办公厅的决定,广大党外群众并不知道,朱仲丽也没有向徐明清赔礼道歉。徐明清的名誉仍然在受到极大地伤害。

徐明清又向市高级法院上诉,二审依然被驳回。理由是徐明清和朱仲丽都是共产党员,党组织既然已对朱仲丽进行过批评,也就是组织上已予以解决,无须再由法律机关介入。

更让徐明清伤心的是,自己写的文章,内地很多报刊都不予刊登。

1991年初,在新中国影响很大的小说《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为徐明清鸣不平,写了一篇《我为徐明清辩清白》一文。北京各家刊物都不刊登这篇文章,只好托人在香港《繁荣文摘》上发表了。直到1993年5月才终于在海南的《特区法制》上发表。

是啊,两名资格那样老的老党员,党内的高级干部,因为党中央工作中的错误引发的民事纠纷,居然要闹到地方法院予以解决,这不能说不是个笑话。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朱仲丽引用中央文件上的材料进行文学创作,她有错吗?

徐明清受到如此莫须有的伤害,难道她就不该讨回她应该得到的公道和权益吗?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自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那种勃勃生机和强大

的凝聚力已经不再。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那种崇高的威望和尊严，也正随着历史的长河而渐渐地销蚀或大块的剥落。40多年前，黄炎培在“窑洞对”中对毛泽东所讲的“周期率”似乎在显示着它的作用。

1980年2月23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29日结束。会议决定提前召开中共十二大；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设立中央书记处，胡耀邦为总书记。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中有这样一段话：

(3)原审查报告影射一九三〇年四月满洲省委大破坏，是刘少奇同志“提供情报”的结果。这是蓄意歪曲历史。根据党的历史档案(一九三〇年九月十八日中共满洲总行委第十二号《通知》)和敌伪档案(一九三四年日本大阪对支经济联盟编《苏联和满洲的共产运动》)、敌伪报刊(一九三〇年五月一日《盛京时报》)记载，以及上述当时在满洲党、团省委工作的赵毅敏、杨一辰、王鹤寿等同志一致证明，这次大破坏，致使党、团省委领导人及党、团员三十余人被捕，是由于杜兰亭(当时在团省委工作)四月十二日被捕后叛变，向敌人供出团省委机关的地址造成的(当时党、团省委负责同志正在那里开会，许多同志因而被捕)。当时刘少奇同志已经离开满洲去上海工作，这件事同他毫无关系。(4)刘少奇同志是在被捕半个多月后，统治阶级没有取得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取保释放的。据孟用潜同志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补充材料”说：“对我的判决是‘煽动工潮，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对刘少奇也是‘不予起评，取保释放’。”杨一辰同志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和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四日两次证明，当时对刘少奇同志判决“检察却下，不起诉处分，取保释放”。还有饶漱石(当时任满洲团省委书记)、王广恩(原奉天纱厂协理)等人，也提供了类似的证明材料。

刘少奇翻案了，中央要给他召开追悼会。他的骨灰在哪里呢？他逝世后，骨灰是存放在开封驻军1军那里。1975年，1军和20军换防，1军向河南省委提出把刘少奇的骨灰留在河南，刘建勋同意。

11月30日，1军保卫处处长张金贵向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

请示关于刘少奇骨灰管理移交的问题。商谈后,1军和河南省委联名给中央打了个报告。

12月8日,中央给开封驻军的指示信:“同意××、××、××刘少奇骨灰移交河南省委有关单位管理。”

刘建勋与时任1军政治部主任并兼任开封市委书记的何俊德谈了交接细节,然后派省委副秘书长的霍云桥负责此时,并安排自己的老司机沈进奎去取回骨灰盒及相关手续,并指示霍云桥送到“省委档案处存放”并严格保密。这一过程,后来沈进奎的回忆也谈到了这一过程。

1978年,霍云桥要调到天津工作,当年也参与这件事的省委办公厅机要处长戴衍钦对霍云桥说:“刘少奇的骨灰是你经手接受的,你要调走了,刘建勋也离开河南了,此事应该向省委有个交代。”

于是,霍云桥写了一个报告交给省委常委、秘书长郭坦。

1979年3月5日,郭坦接到霍云桥的报告,认为事关重大,立即报告了河南第一书记段君毅。段君毅召集第二书记胡立教、常务书记兼省长刘杰商量,决定把刘少奇的骨灰取回由省委保存。

恰在此时,省委书记赵文甫到段君毅办公室谈事,段君毅顺便将此决定告诉了赵文甫。

当晚,赵文甫让霍云桥立即去开封,把刘少奇的骨灰盒取回来。

刘少奇的骨灰盒于3月6日取回郑州,秘密保存在赵文甫办公室的保险柜里,一直到1980年5月刘少奇平反大会前迎回北京。

刘少奇的骨灰以刘卫黄的名义于1969年11月14日由8172部队,即1军送存,申请人写的是刘少奇的儿子刘原,编号123,寄存年限3年,1972年11月14日第一次续存3年,1975年11月14日第二次续存10年,于1979年3月5日23时30分取走,登记表的上方醒目地写着一行字:

“1979年3月5日夜11时半取”。

这就是霍云桥于1979年3月5日根据赵文甫的指示取走刘少奇骨灰时留下的记录。

我们继续说十一届五中全会。全会批准汪东兴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职务的请求。

全会还批准了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要求，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全会决定增选两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即胡耀邦和赵紫阳。

全会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刘少奇的案翻了，由胡耀邦任组长，针对林彪、江青的“两案”审理领导小组经过初步审查，认定“两案”案犯既有违反纪律的问题，又有触犯刑律的问题。1980年2月，中纪委根据对“两案”审查的结果，认为林彪、江青两个集团触犯了国家刑律，决定把“两案”主犯正式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审理，追究刑事责任。3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中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由彭真任主任，统一领导“两案”的审判工作。

3月，“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彭真在召集“两案”审理指导委员会讲话时说：

我看了对“四人帮”的起诉书和材料，没什么意见。对这帮人要有充分的估计：他们做了多少坏事？他们知道，我们不知道。所以，在预审中不能轻敌。轻敌就要打败仗。按司法程序办事，公安部要搞好预审，检察院要搞好起诉，法院要搞好审判……要通过预审先核对事实，弄清每个案犯承认多少罪行，不承认多少。在会上决定的事，要弄清是谁提的方案，第一个是谁提出来的，谁办的，谁拍板的，要搞得清清楚楚。调来预审的人，一个组对付一个人，人员不够还可以借调……一定要经过预审来核实。还有口供问题，法律上有证言，但我们办案一定要重视证据，只有口供没有证据不能定。苏联在证据问题上有沉痛的教训。只靠口供，搞了不少冤、假、错案，我们办这个案子同审理其他案子一样，只有口供没有其他证据不能判。

公安部要打头阵，检察院是第二道程序，法院出来就扎实了。起诉书要拿到书记处讨论，要报中央常委批准。一定要搞好预审，时间不要限制得过死，以搞好为标准。不要匆忙。不要过早登报。

假定“四人帮”罪行有一百条，挑最重要的上二、三十条就可以了。写三五条也可以判。要按法律程序办事。我从公、检、法的角度可以

管,但情况不熟。彭冲同志也刚来,“两案”审理领导小组要抓到底。

……起诉书应当以证据做后盾,以预审做基础。四道程序把关,公、检、法是三道关,中央领导小组是第四道。现在的起诉书(草稿)不能拿出去,要把罪行列出来。……有不少是路线问题,我们是审理罪行的,路线问题我们管不着,公、检、法没有资格审查党的路线问题,也不应过问这个事……

从事实做起,从调查研究做起。离开事实,谁讲也不算数。经过调查研究,有什么算什么。只有事实,案件才靠得住。林彪、“四人帮”他们搞专案,是先戴帽子,后搞材料。我们不能这样干。一定要注意三条:一是要客观,二是要全面,三是看本质。全面有两种,一是历史的全面,二是现实的全面。历史是指这个人一贯表现怎样?现实是看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怎样?有个外国人讲,中国人非常怪,好的占百分之五十一就是好,坏的占百分之四十九就算坏。这样复杂的案件,不从事实出发怎么行。希望你们搞案子的同志,要很好学习毛主席《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那一篇文章,要有这样的认识论,我们党如果能按《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讲的观点办事,我们党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要有个专门班子看原始材料。现在看原始材料的同志,将来审判时可以当顾问。必须把好人办错事和坏人办坏事区别开来。谁也不可能不说一句错话,不做一件错事。有的人把几十年前讲的话拿出来用今天的眼光去批判,那行吗?几十年以前的事,谁能看得那样准?有一年在怀仁堂,×××同志讲毛主席《关于体育之研究》,毛主席哈哈大笑说:我那是带封建性、资产阶级性的东西,你还讲这玩艺。不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是不行的……

3月19日,中央书记处提出一个审判方案,称“为防止在审判过程中泄露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而不公开审理。”

第 1440 回：写《决议》，邓小平多次指示 四千人，讨论批判毛泽东

1980 年 2 月，《历史决议》起草小组拉出一份仅供领导参阅的《〈决议〉提纲（草稿）》。邓小平看后感到平铺直叙，主题不够鲜明。3 月 19 日，他找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 3 人谈话，专门谈《决议》总的指导思想问题。首先，从写法上讲：“我看了起草小组的提纲，感到铺得太宽了。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对重要问题要加以论断，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些，当然要准确。”

作为《决议》起草小组的具体负责人，胡乔木提出了起草《历史决议》的两个难题：“一个是因为发生‘文化大革命’。说‘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不难，但是必须答复为什么发生这个错误的问题。不答复这个问题，《决议》就失掉价值。一个郑重的马列主义政党，就得对这个问题有个科学的分析。

另一个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质是什么。我们讲坚持毛泽东思想，是讲坚持什么。许多同志希望中央列出几条来。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基本原则是一致的，但他与马列主义的已有的论点相比较又有所不同，有所发展。不能只说坚持武装斗争为主，农村包围城市，这些只适用于过去。还要讲适用于现在的，特别要讲适用于现在的。这个问题在这个文件中一定要答复。不答复这个问题，坚持毛泽东思想这个口号就没有力量。”

邓小平对胡乔木的意见非常重视，他提出三条“中心的意思”：

“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外都很关心，不但全党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们怎么说。”

“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

公正的评价。”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

邓小平最后强调：“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

后来，邓小平又找胡耀邦、胡乔木和邓力群谈了一次，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则：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

当时，有不少人主张不急于做这个决议，留待十二大甚至更后去解决。邓小平指出：“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4月1日，邓小平再与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对修改后的《历史决议》提纲的看法。他首先讲了1957年到1966年的10年间，党和国家经历的重大事件，并对这些事件作了基本评价。

在谈到如何安排决议的结构框架时，邓小平问道：“整个设计，可不可以考虑先有个前言，回顾一下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段，话不要太多。然后，建国以来十七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泽东思想一段，最后有个结语。结语讲我们党还是伟大的，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

《历史决议》起草小组夜以继日。终于在5月23日再次起草出一个决议提纲。紧接着，又拿出了首次供中央书记处讨论的《历史决议》初稿。

虽然3月19日中央书记处对“两案”提出“为防止在审判过程中泄露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而不公开审理”的方案，但不公开审理的方案，被邓小平否决。

6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和加拿大社论撰写人访华团时说，对

“四人帮”要进行审判，“对我们国内来说，是一种公开的审判形式。但审判‘四人帮’会涉及我们国家大量机密，所以，我们不准备对外公开。”

6月9日上午，邓小平同胡耀邦、胡乔木谈《历史决议》稿的修改问题，商定将“毛泽东晚年思想”改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

6月27日，邓小平谈了对初稿的意见，他认为现在的稿子没有很好体现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坚持发展毛泽东思想的要求。“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恰当。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

7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文章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仅要消除“神化个人”的现象，而且要处理好领导班子中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不言而喻，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是针对华国锋的。

7月30日，中共中央在发出的《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指示》中说：当前在执行三中全会制定的要“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的方针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一指示，同样暗含对华国锋的批评。

8月下旬，彭真主持召开“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审判指导委员会扩大会议，要求按照公开审判做准备。

9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华国锋、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听取彭真汇报审判起诉四人帮及林彪集团的准备工作。彭真说：

关于“两案”的问题，书记处讨论了两次，9月4日及5日上午。现在主要情况弄清了，十名主犯的罪行基本查清了。一边是黄、吴、李、邱加江腾蛟，他是“三国四方”会议确定谋害毛泽东主席的指挥官。一边是“四人帮”加陈伯达，陈伯达同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罪行都分不开。五加五共十个人。送常委的起诉书（草稿），拟判十个人。除江腾蛟外，九个人都是举世瞩目。其他人另外审判，由最高人民法院、地方法院和军事法院分批陆续审判，十个人判了，其他人的问题就解决了。

他们的主要罪行弄清了，林、江是头子，康、张是军师，两个集团是

狼狈为奸的一伙。列入起诉书的罪行，都不牵涉毛、周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过错，这个大原则中央已批准了的。起诉书还把周总理列入了被诬陷的领导人名单中。

起诉意见书上所列的犯罪事实，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划开了。起诉书不涉及路线问题，工作上的错误包括党纪、军纪、政纪问题都不涉及。这次审判只审罪行。

他们的问题用法律手段去处理，小平、国锋同志接见外国人时都讲过了。我们还是现在审好。中央领导同志对外讲过多次，为什么总不审？人家无非认为是罪不够，或者内部意见不一致。何时审，请中央决定。

我主张尽快审判！

这两个集团没法分开。你把这两个分开，康生、谢富治死了，这两个人算是哪一伙的？

一案起诉好处理。这两个集团有矛盾，矛盾在哪？他们做贼上一致，分赃上有矛盾。黄、吴、李、邱由军人组成的第二审判庭去审。这几个人一定要审，判刑可以轻一点，他们同江青不一样，历史上还做过一点好事，打过仗。

另外，公开审判好。罪行证据都公布，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工作，证据完全能站得住脚。

彭真汇报后，邓小平说：

这个起诉书可以用。不能有一丝虚假，不能侥幸。

这次会议后，要扩大范围，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

起诉的内容不能涉及毛主席、周总理的错误，这一点要特别慎重。

这两个案子不要低估林彪集团的罪过，林彪是掌握枪杆子的，比笔杆子不会差。

黄永胜等人有功，量刑可以轻一些，不能减罪，成立特别法庭，一审终审！

审这个案子叫“投鼠忌器”。务必抓紧，要不审，有人会说他们罪不够，或说我们意见不一致。

请彭真同志一抓到底。

最后会议确定了关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两案”审判方案，将

“两案”合并为一案起诉；成立特别法庭，公开审判。

9月10日，《历史决议》起草小组在改写出了完整的决议稿，把这个稿子发给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9月21日，胡乔木在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讲话时说：

“《历史决议》草案，经过很多同志的努力，小平同志、耀邦同志提了很多次意见，现在已经有了一个稿子。这个稿子，我也说不上是第几次的稿子了，一些主要的骨架，大概就像现在这个样子了，要作很大的变化，实在说我也变不出来了。经过大家交换意见，现在的写法跟原来的想法确实有了很多的变化。有许多问题，在党内也好，党外也好，争论是很尖锐的。”

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对关于取消“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问题，正式作了决议。

9月26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通知》，确定组织特别检察庭、特别法庭，一案起诉，分庭审理，一案判决，公开审判。中央和国家机关，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人民团体，民主党派将有几名代表参加旁听。不让外国人旁听。起诉的罪状是四条：（一）煽动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二）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篡党夺权；（三）迫害镇压广大干部、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四）指挥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

9月2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集团反革命案进行公开审判。

因为对《历史决议》稿争论很尖锐，10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组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讨论的通知，要求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由于预定参加讨论人数是4000人，所以称作“四千人大讨论”。

此外，经中央批准，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1548名学员也参加了讨论。

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大讨论，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仍然是讨论中争论的焦点。其中有不少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言论，个别人甚至主张《决议》里干脆不要写毛泽东思想这一部分。

例如：原稿提出，在 17 年中，多数情况我们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许多人对这个结论不完全同意。他们认为：建国后虽然在某些方面的基本建设取得可观的成就，但政治方面不断地搞运动，出了很大偏差，整了几百上千万人。1957 年，反右一下子整了 55 万，实际上远不只此数；1958 年，搞“大跃进”，实际上是大饥荒，死了几千万人。

这可能就是后来传说三年自然灾害死了 3000 多万人的最早来源。但是，死 3000 多万人的依据在哪里？没有人提供这方面的材料，也没有人深究，更没有人站出来批驳。更多的则是人云亦云，三人为虎。直到 30 多年后，还是台湾人李敖出来指出此说的荒诞和不实。是啊，中国军事科学院编写的《中国抗日战争》一书中说，中国在抗战期间军民伤亡总数为 3500 万人。如果按照“七七事变”后的 8 年抗战时间计算，平均每年的伤亡人数是 437.5 万人，如果按照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的 14 年抗战时间计算，平均每年伤亡人数是 250 万人，这里面还不都是死亡人数，包括受伤的。而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饿死人数居然是 3000 万！平均每年在 1000 万以上，是战争年代伤亡人数的两至四倍，这怎么可能呢？但在当时，这些荒诞的说法却任其传播，还有人煞有介事的千方百计予以论证，当然只能是徒留笑柄了。

在“四千人大讨论”中，还有人问：“文革前 17 年有没有路线错误？有，那么主要是毛泽东的错误，还是草稿所笼统说的是‘党的错误’？”

很多人强调：文革前 17 年存在一条“左”倾路线，而毛泽东就是“左”倾路线的总代表，因此在《决议》中不能回避，对此要有一个正确的评价。

很明显，大家认为，文革前 17 年正确的一面，取得的成绩那是党中央集体领导的成果，是必须肯定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彰显出文革的错误。但这些与毛泽东无关，因为在那 17 年的错误一面，主要是“左”的错误，则必须由毛泽东负责。

因此，与会者不赞成把毛泽东的错误归结为全党的错误。许多人提出，“晚年的毛泽东犯了大错误，那么‘毛泽东思想’是不是也应当包括毛泽东的错误思想？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是不是要排除他的错误思想？哪些是错误思想，怎么看？按原稿的意思，毛泽东思想只包括

正确思想，错误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这在逻辑上是不通的”，很多人反对。

讨论会另外一个争论点就是毛泽东的为人、行事作风。时任铁道部副部长的李颉伯说：“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动机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排斥他所不放心的人。这场浩劫实际上在1956年11月一次中央会议上就种下了根。这次会上，周总理讲话，肯定近年工作冒了；陈云、富春、先念都讲了类似的话，少奇还组织人写了《既要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社论。会上毛主席没有吭声。后来乘反右斗争胜利和自莫斯科参加第一次会议归来，他很得意，1958年1月，他召开了南宁会议，在会上就发作了，说你们56年反冒进，就是反对我。你周恩来同志说了什么，陈云、富春、先念同志说了什么，少奇写了社论，你们把自己抛到了右派的边缘。谁晓得我身边有没有睡着赫鲁晓夫？将来有一天他作秘密报告。……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有些人就把矛头指向这些同志。黄敬同志在散会后就得精神病，后来得脑血栓去世了。”

此外，会议上有人认为华国锋粉碎“四人帮”虽有功绩，但他和汪东兴等人工作上的指导方针，都有错误，表示华国锋不宜再担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主席。

这次讨论从10月中旬开始到11月下旬结束，前后持续了一个多月时间。讨论情况不断用简报、快报等形式迅速反馈给起草小组和党中央，而一些相关的重大问题则以综合报告、意见汇编等形式上报中央政治局。

第1441回：生活会，华国锋无奈辞职 开庭审，黄吴李邱“四人帮”

1980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转发华国锋同志的信的通知》。华国锋提出，今后在公共场所不再悬挂华国锋同志的像和题词。于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公共场合并排悬挂毛泽东和华国锋画像的现象不复存在。华国锋的画像纷纷被取下。华国锋语录以及题词也被纷纷取下。至今，唯一被保留下来的华国锋题词，那就是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六个镌刻在大理石上的金字。

邓小平在看了10月25日四千人大讨论的简报后，立即找胡乔木等人谈话，他说：“这次党内四千人讨论还在进行，我看了一些简报，大家畅所欲言，众说纷纭，有些意见很好。很多组要求把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段补写上去。看来，这段内容势在必写。”尔后，邓小平“力排众议”，反驳一些人的错误观点：“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他强调，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面旗帜，实际上就是否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

邓小平还对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提出了具体的意见。他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我们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他坦诚地指出：“在‘文化大革命’前工作搞对的有我的份，搞错的也有我的份，不能把那时候的失误都归于毛主席。”他指出：“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

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时任中纪委常务书记的黄克诚更是旗帜鲜明地支持邓小平的观点，针对前一段党内和社会上有人肆意诋毁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他指出：毛泽东所犯的错误是一个伟大革命家的错误，在纠正他所犯的错误、总结经验时，应抱着爱护尊敬的心情。“在中央来说，只要是开中央全会举手通过决议的事情，如果错了，中央都应该来承担责任。当然，毛主席作为中央主席要负领导的责任。过去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都尽了一份责任，功劳大家有份。现在如果把错误都算到一个人身上，好像我们没有份，这是不公平的！”

四千人讨论以后，胡乔木等人综合、研究各种意见，提出了一个“对于修改历史决议草稿的初步意见”，共 12 条。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一个“1980 年 11 月 22 日修改稿”。

1980 年 11 月 10 日、11 日、13 日、14 日、17 日、18 日、19 日、29 日和 12 月 5 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了 9 次会议，专门讨论华国锋问题。除刘伯承、聂荣臻二人因病未参加（聂荣臻来信同意会议内容）和陈永贵、赛福鼎二人未通知到会外，实到政治局委员 21 人，候补委员 1 人。中央书记处 7 人列席，共计出席者 29 人。

召开这 9 次会议的原因，是自从 1980 年 8 月中下旬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来，不少人向中央提出，华国锋不宜继续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 9 次会议，对此进行讨论，并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

11 月 11 日下午，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陈云讲了三点意见：

一、揪出“四人帮”，是华国锋对党的“一个很大的贡献”。那时，华国锋“是负主要责任的”。但是，揪出“四人帮”以后，我们党没有能够实现心情舒畅、生动活泼这样的局面，使人“大失所望”。

二、“华国锋同志当主席不适当”。陈云说：“那一天我跟先念同志到国锋同志那里去的时候提出，国锋同志要有自知之明，在毕生的工作里头，加号是多少，减号是多少。加号指的正确的，减号指的错误

的。我讲了一句，希望国锋同志珍惜已有贡献，就是说，不要随便丢掉已经有的这一点贡献。”

三、“我认为这件事不能再拖了。十二大谁作报告决定下来，哪个当主席哪个作报告。”

胡耀邦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列举了华国锋的 5 条表现，批评了华国锋对毛泽东晚年错误采取的态度。他说：“按理来说，国锋同志内心不是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全都赞成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国锋同志很关心生产，至少有三次：第一，我们在湘潭时期，他对生产的兴趣很大；第二，他自己讲，1971 年揭露林彪时，毛主席同他谈话，批评他：你满脑子都是生产；第三，1975 年他在听取科学工作汇报提纲座谈会上的讲话。可是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讲的却是另外的东西，什么基本路线，什么阶级斗争为纲，什么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什么继续革命，等等。但也不会是真心话。这里边就产生一个实用主义的问题。这就是要害的地方。国锋同志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是拣他的需要，只顾眼前，不顾后果，只考虑个人得失，不考虑党和国家的安危。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这很不好。”“国锋同志继续当党的主席、军委主席，看来党内多数同志是不会赞成的。因此，国锋同志自己提出要辞去这两个职务，我觉得好。这对党、对华国锋同志自己都有好处。”

叶剑英在发言中做了自我批评，检讨自己在宣传华国锋中说过过头话，作了过高的赞誉，有“周公辅成王”的封建思想作怪。他回忆了毛泽东临终时欲言未语的难忘情景，说道：“据《三国志》第三十五卷《诸葛亮传》里记载，刘备在白帝城临终托孤时，对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之后，诸葛亮并没有照刘备的话去办，而是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毛主席临终的时候说，我不行，快完了。政治局的全体同志到毛主席那个房子，排队一个一个见主席。那时，他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看完后，退回休息室。过了一会，护士又把我叫到主席面前。当时主席看了我一眼，说不出话来，我又退了出来，不久，主席心脏就停止跳动了。当时我就想，主席为什么要第二次叫我呢？还有什么嘱托？”叶剑英讲到这里，心情激动，眼泪流了下来。他继续说：“我剖析毛主席在世时自己的心情，我确实把华

国锋同志当作‘后主’看待，尽管我自己精力不足，水平不高，还是想尽力扶助他。我对他还讲过一些过誉的话。这是一种旧的封建思想在作怪。借此机会，我应作自我批评。”

叶剑英说：“这次政治局会议确实开得很热烈。华国锋同志犯错误，我也是有责任的。当初刚刚粉碎‘四人帮’，我的头脑里也有愚忠愚义思想，有时明知华国锋同志的意见不对，但给他提出来后，他一拒绝，我也没有坚持，就这样酿成现在的局面。所以，这种情况，我也有份。”“如果国锋同志不愿意承担责任，那就由我承担好了。所有中央这四年来的错误都是我造成的，你们怨我、批评我都可以。我早就提出要辞职，今天在这个会上我再提一遍，我请求党中央让我离休。这是我雷打不动的意见。”

本来华国锋为自己做了很多的辩解，不肯承认错误，不敢承担责任。但是看到叶剑英这样说了，他表示不再辩解，愿意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接受批评。并提出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要求在六中全会以前，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和中央军委的工作。

华国锋提议由叶剑英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这两个职务。

叶剑英坚决推辞，再次提出批准他离休。

叶剑英和其他人一致提议由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谢绝。他认为，在60多岁的人当中，胡耀邦政绩显著，所以力荐胡耀邦担任中央主席，并对胡耀邦说要“当仁不让”。

但是邓小平说，他自己只愿意担任中央军委主席。

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华国锋犯了“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但不要说成是路线错误。路线、路线错误、路线斗争等提法没有明确的科学含义，使用这些提法过去在党内造成很不好的后果，以后要尽量少用。中央政治局最后通过三项决议：向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的职务；向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军委主席；在六中全会前，暂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都不用正式名义。

11月17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陈云听取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审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领导小组副组长王鹤寿关于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情况的汇报,同意“两案”审理领导小组提出的除对少数罪行重、民愤大的人追究法律责任、进行党纪处分外,对有牵连的人采取宽大处理、区别对待的政策。经过一天考虑,19日,陈云就“两案”审理工作写下重要批语: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但这是一场政治斗争。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斗争。这场政治斗争被若干个阴谋野心家所利用了。在这场斗争中,有许多干部、党员、非党人士受到了伤害。但‘文化大革命’从全局来说,终究是一场政治斗争。因此,除了对于若干阴谋野心家必须另行处理以外,对于其他有牵连的人,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对于这场政治斗争,不能从局部角度、暂时的观点来处理,必须从全局观点、以党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来处理:这种处理办法,既必须看到这场斗争的特定历史条件,更必须看到处理这场政治斗争应该让我们党今后若干代的所有共产党人,在党内斗争中取得教训,从而对于党内斗争采取正确的办法。这是处理这场政治斗争的前提。”

1980年11月20日下午15时,北京正义路1号,公安部礼堂,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正式开庭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

法庭的主席台中央挂着一个特制的国徽,国徽下是60个法官和检察官的座位,面对着台下的观众。

检察官的座位和法官的座位同在法庭中央,这恐怕是全世界的法庭绝无仅有事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本来,法庭工作小组把法庭的布置已经安排好了,按照正常的惯例,法官们在中间,一边是检察官,另一边是律师。但检察官们不干,认为“我们怎么和律师是这么一个关系?”特别检察厅的检察长,也就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黄火青,他是井冈山时期的老革命,他坚持检察院和法院是平等的,你代表国家我也代表国家。既然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你坐中间,我坐旁边?为这个事情争论了很久,彭真也没有办法,最后,就变成这个样子,两家并列。

墙边也有两排座位,一侧是被告辩护人,另一侧则是特别法庭书

记员……

参加旁听的人员除中央有关部门领导、民主党派代表、首都各界代表之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派出 10 名或 5 名代表参加旁听,加上采访的国内记者,将整个大厅坐得满满的。在开庭审理期间,全国有 6 万多名代表旁听,他们也都发表了各自的量刑意见,更多的人直接投书法庭、审判长、审判员。

审判庭楼上会议室设有闭路电视,专供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实况。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被公审时
的法庭全景

台下旁听席上有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贺龙元帅的遗孀薛明和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她们 3 人坐在前排中间,轻声地交谈,看得出她们都很激动。

正式开庭前,案件已经过多次预审,还做过彩排,证人都经过培训……

15 时 03 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兼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宣布开庭。第一个被押上被告席的是王洪文。

在开庭前,特别法庭根据在预审时的表现,认为如果将江青第一个押上来,很有可能她会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大闹法庭,给以后的审

判带来困难。因此决定不按两案主犯原来的排列顺序,先押认罪态度较好的王洪文,然后再押张春桥等8名主犯。

当江华一声高唤“传被告人江青到庭”之后,整个大厅顿时一片寂静,近千双眼睛齐刷刷地转向同一个方位。

江青被两名女法警押着走了进来。此时的江青已66岁,仍然是满头青丝。今天,她将头发梳得非常整齐,配上那件合身的黑色上衣,显得十分得体。

只见江青目不斜视,大步走进法庭,对于射过来的近千双目光毫不理睬,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按照指定的位子安静地站在审判台前。

法庭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兼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宣读长达两万多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提起公诉。

起诉书宣读完毕,江华庭长宣布:对两案所涉及的10名被告人,将由第一审判庭和第二审判庭分别进行审理。由第一审判庭审判的被告人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由第二审判庭审判的被告人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

接着,江华庭长向被告人宣布:被告在庭审过程中必须听从法庭指挥,不得违反法庭规则。被告有辩护和最后陈述的权利。

5时20分,江华庭长宣布休庭。

第 1442 回：为宽大，陈伯达被迫认罪 检察官，为证人出庭彩排

1980 年 11 月 26 日，特别法庭再次开庭。江青身穿素色套装，依然镇定自若。

“被告江青在一九七四年秋阴谋阻止邓小平当副总理”。这是指控江青的第一条罪证，一个证人出来作证。这个证人是王洪文！

“谁指使你去长沙向毛主席汇报邓小平和周恩来的活动的？”

“江青下的指示。”王洪文面无表情的答道。

江青静心听了一会儿王洪文的诉说，突然大声提出要去厕所，审判中断一会儿后。当江青在回到法庭时，王洪文不见了。这时，江青大声质问道：“他在哪儿？王洪文在哪儿？”

没有人回答。

检查官宣读了张玉凤写的证词，江青坐得笔直，盯着前面。她方正、白净的面孔像一座雕塑。张玉凤没有到庭。

唐闻生和王海容出庭作证。

唐闻生说：“我们马上就看透了‘四人帮’的阴谋诡计。”

江青不屑一顾，歪着脖子，盯着天花板。

王海容也说：“毛主席对江青很生气。”

江青喊道：“我要发言！”

可是庭长没有让她说话。

11 月 27 日，特别法庭审理张春桥，其罪名有：“长沙告状”；诬陷朱德、陈毅；提出“改朝换代”；指使、煽动“打倒刘少奇”。张春桥闭着眼，一言不发。

11 月 27 日这天，陈伯达问监狱的监管员：“明天是不是该审我了？”

“你怎么知道的？”监管员知道通知他的时候还未到，有些惊异地望着他。

“是我计算的，前面 4 个我估计已审完了，该轮到我了。”陈伯达说。

当陈伯达得知要公审他的消息后，曾在 1980 年 11 月 1 日找工作人员谈话说：“我的精神、肉体都是属于党的，党对我怎么处理都行。”

中共中央“两案”领导小组和“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在组织进行“两案”审判准备工作是定的一条根本原则，属于党内路线错误的问题，列入党内审查的范畴，不作犯罪事实起诉。因此，在起草起诉书中，经中共中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两案”领导小组决定，对陈伯达在庐山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一系列活动不提出起诉，只追究陈伯达触及法律的事实，认定陈伯达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积极参与林、江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主犯。

起诉书送到后，陈伯达监号里传出哭泣声。

冬日里的寒风卷着一个老头儿的哭声……

陈伯达陈述了对起诉书中一系列细节上的辩解，然后说：“我的问题是党内问题，运动开始哪有不犯错误的？党内处理可以体谅，现在罪大恶极，怎么处理都行，但不是救人的办法。”

最后，他又目光飘忽地说：“如果毛主席还在，说一句话就好了。我不轻易流泪，今天我哭了，现在没有办法了。”

预审期间，陈伯达对指控他的罪行均不承认。11 月 18 日上午 10 时，陈伯达的律师甘雨霈、傅志人赶到复兴医院。他们对陈伯达目前的心理状态，作了分析，认为：陈伯达不坦白交待罪行，而采取对抗的手段，很可能会导致精神崩溃，不能正常出庭接受审判。因此两位律师决定给他释压。

会见开始，陈伯达先澄清了上次谈话中，关于对诬陷迫害刘少奇罪行的认识。这次不兜圈子了，十分明确地拒不认罪，说：“关于刘少奇的问题我昨天写了一下，……江青、陈伯达擅自决定批斗刘少奇，这事我完全忘了。如果我真正参加过这决定，是不会忘记的。我认为我没有参加这个决定。”然后又作了一些补充，说他曾帮助周恩来解过围，对围攻周恩来的人说：“周总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你们不听他的话，听谁的话。”还说刘少奇在天安门上对他说，要找他谈一次话。又说：“江青与我结仇，她要把我送进监狱……”

律师对他说：“我们应该负责任地告诉你，方才你讲了那么多，对减轻你的罪责毫无作用。不仅不能从轻处理，还有可能从重处罚。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是不是想破罐破摔了。”

“当然不是……”陈伯达低着头，小声嘟囔着。

“那好，只要你和我们好好配合，经过我们努力为你辩护，还是可能争取到法庭对你的轻判。”律师软硬兼施。

“可能？真的？”陈伯达倏然睁圆了小眼睛，望着律师，目光中掠过一道久违的光芒，马上又说：“那怎么可能呢？”陈伯达疑窦难解。

“可能不可能，要看你配合不配合了，”律师又开始攻心：“对你们10个被告人，法庭会区别对待的。这个区别又是依据什么呢？‘以事实为依据’，就从连续犯罪时间来看，你是最短的，自1970年被隔离以后，你就再也没有犯罪。再有，林彪、‘四人帮’的几个重大罪行，如阴谋杀害毛主席、策动上海武装叛乱等你均未参与。所以按事实，你本应轻判。但如果你不配合，拒不认罪，我们又拿什么去和其他被告人的罪行相比较，从而得出你的罪行最轻呢？即使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为你辩护，得出你罪行最轻，应该轻判的结论，但是你一句不认罪的话，我们就前功尽弃了。如果你从现在开始认清形势，悬崖勒马，改变态度，还来得及。只要在认罪态度上有好的表现，加上我们据理力争的辩护，法庭一定会给你一个公正的、从轻的判决。”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一定，一定……”说到这儿，陈伯达哽咽无语，潸然泪下。

12月3日上午，江青大步走进法庭。她抚平衣服，理理头发，弯腰坐到椅子上。每位公诉人和证人面前都放着一杯茶，而江青面前只有一排麦克风。公诉人一再声明，江青要对刘少奇的“被迫害致死”和王光美被囚禁12年负主要责任。

证人中包括刘少奇的厨师郝苗，他曾在狱中呆了6年。

“我要发言！”江青刺耳的声音响彻整个大厅……

“住口，江青！”一位法官喝道。

“住口，江青！”6名法官异口同声地喊道。

公诉人拿出证据。江青曾指使搜查了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家，以寻找他们“犯罪”的材料。

江青摘下眼镜放在右手中一挥，打断了江华庭长的话，她向法庭反问：“抄他们家值得大惊小怪吗？告诉我，你们现在难道没有抄过我的家？”她不顾一切地接着又说：“破四旧必然导致抄家，这是革命行动。”

检察长黄火青说，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人大代表未经全国人大或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不受逮捕或审讯。“那么，你江青有什么理由剥夺刘少奇和王光美的自由？”

可是，黄火青想过没有，抓捕“四人帮”时，“四人帮”也是人大代表，而且还是政治局常委、委员，华国锋和叶剑英、汪东兴又有什么理由剥夺他们的自由呢？

而且，黄火青、江华，当年你们领导农民运动时，又有什么权力组织农民抄没地主的财产呢？按照当时的法律，你们当年的做法是不是犯法呢？

当公诉人提到江青三十年代的活动是“反革命活动”时，江青又跳起来，对着法庭咆哮着反问道：“这些反革命活动是什么？”

法官们没有说话。

“江华，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江青透过她的金属眼镜框盯着这位法庭庭长。

江华似乎吃了一惊，但一会儿又冷静下来，说：“可以，你问吧。”

“法庭是不是刑场？”江青说话就像律师开始盘问证人一样。“上次法警扭伤了我的胳膊肘，使我受了内伤，现在我的右手都抬不起来了。”

她把她左胳膊缓缓地放在右臂上，法官们在椅子上坐立不安。

“还有一件事，我们有约在先，江华你是知道的，我尊重法庭，可你们不让我说话，你们想妨碍我时就马上在法庭上叫人喝彩，作为对付我的武器。这就是你们对待我的方式，”江青说：“党内有许多事只是你们这些人不知道罢了，你们清楚，在那个年代，共产党做了哪些让你们抱怨的事，你们把什么都推到我身上。天啊，我好像是个创造奇迹、三头六臂的巨人。我只是党的一个领导人。我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逮捕我，审判我，就是诋毁毛泽东主席！”

一位法官插话想阻止她。江青冷笑着说：“既然你们不让我讲话，

为什么不在我椅子上放尊泥菩萨来代替我呢?”

江青投出一颗炸弹：“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她对静下来的法庭宣布：“那天晚上毛主席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的话，”

她环顾四周，她的眼镜成了法庭中照相机的焦点。

“这不是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全部内容，至少还写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

法庭上又是大乱。阵阵铃声中，江青再一次被拖出礼堂，听众席上鼓起掌来。

据后来给李作鹏当辩护律师张思之回忆，正式庭审前，特别法庭曾做过两次彩排，由李纪周模仿江青。此人伶牙俐齿，又了解案情，结果让那些法庭工作人员一时间都招架不住，于是提出：说江青要这样可怎么办啊？可怎么审啊？

果然在法庭上，有一些证人按照培训的方式出庭作证，结果跟江青吵了起来。特别是廖沫沙出庭作证时，跟江青当场吵得连法庭都制止不住。证人在法庭上成了控诉被告人的原告，而不是出庭作证的证人了。

12月4日，特别法庭审理张春桥指挥“游雪涛小组”从事特务活动、制造上海康平路事件、支持济南“五·七”武斗事件。张春桥依然一言不发。

12月13日，特别法庭审理张春桥组织第二武装；策动上海武装叛乱。他还是一言不发。

特别法庭还审理了张春桥授意清华大学蒯大富打倒刘少奇的事情，蒯大富出庭作证。

为此，蒯大富从北京市看守所转到了秦城监狱，生活待遇提高：单间，席梦思床；随时可以洗澡；一日三餐，早上是肉包子和肉丝面，中午晚上都是一菜一汤；还有图书馆，可以开借书单借书；放风场地也大。警察对他很友好，放风时会很关切的问他：“蒯大富吃得怎么样？”

秦城预审员让蒯大富把1966年12月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传达室接见他的事情说一下，蒯大富如实讲了。

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的人又来跟他谈，要他出庭作证，并说：“现在对你的问题也没有做什么结论，听说你在监狱里表现也不错

嘛，大是大非嘛，‘四人帮’肯定是反革命了，你和他们不一样，你和他们划清界限嘛，如果有立功表现，我们就更好说话了。”

蒯大富的理解是，如果自己有立功表现，对自己的处理就可以更轻点。于是他按照特别检察厅的要求，将证词写好。

特别检察厅规定证词里不准提党中央，不准提毛主席，只提张春桥。并且明确提出：“你要提出来，在张春桥的指示下，在北京第一次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推向社会，造成严重后果。”

出庭前几天，特别检察厅的人帮蒯大富修改了证词，缩减到只有一张纸。然后对他说：“一个字都不能动了。”

他们还要求蒯大富每天将证词背若干遍，连动作都教给他，为他特别设计了几个手势。背述到什么地方，做什么手势，用什么语调。就这样，特别检察厅让蒯大富排演了多次。

蒯大富曾提出：“在法庭上做手势不合适、不严肃吧？”

特别检察厅的人说：“不对！要有语气要有表情。比如手指着说：‘就是他！张春桥。他让我……’”

果然，特别法庭审理张春桥时，当江华说：“蒯大富，把张春桥见你的时候情况说说。”蒯大富就开始背那一段，还按照特别检察厅的指示，用手指向张春桥说。结果，法警过来制止说：“别做手势。”后来就不做手势了。

蒯大富作证时，张春桥依然什么表情也没有，眼睛都没抬。

第 1443 回：众法官，不允许江青说话 提要求，华国锋出庭作证

1980 年 12 月 24 日上午 9 时至 11 时 38 分，第一审判庭对江青开庭进行法庭辩论。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副庭长兼第一审判庭审判长曾汉周和 17 名审判员出庭。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副厅长喻屏和 5 名检察员出庭支持公诉。

审判长曾汉周主持法庭辩论，他宣布：“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指控被告人江青的犯罪事实，本庭于 11 月 26 日、12 月 3 日、5 日、9 日、12 日和 23 日上午，先后 6 次开庭，已经调查完毕。现在进行法庭辩论。”

检察员江文起立发言，他说：“经过 6 次法庭调查，对被告人进行审问，出示和宣读证据、证言，听取证人出庭作证，播放了江青的讲话录音，完全证实了对江青反革命罪行的控告。江青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是‘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头子……她犯下的罪行是十分严重的。她的主要罪行是：第一，伙同康生、谢富治等人诬陷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制造了全国最大的冤案。江青硬把逼出来的假供当成定案的依据，结果造成了全国在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冤案。刘少奇终于被迫害致死。第二，江青肆意点名诬陷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群众。至于江青个人究竟点了多少名，诬陷了多少人，这个数字现在是很难统计的。凡是被她点名诬陷的人，绝大多数都遭受了各种迫害。有的被整病了，有的被整伤了，有的被整残废了，有的被整死了，弄得家破人亡。第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勾结林彪进行了大量的反革命活动。第四，大量事实证明，在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继承了林彪的衣钵，继续进行篡党篡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的反革命勾当……江青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92 条、第 98 条、第 144 条，构成了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非法拘禁罪、诬告陷害罪、

刑讯逼供罪、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应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03条从重判处。”

审判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18条的规定,宣布被告人江青有陈述和辩护的权利,有最后陈述的权利。

江青说:“我对他的意见,也就是刚才所讲的《起诉书》的那一套,整个地说,就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歪曲、篡改历史,隐瞒捏造事实。你们说了我那么多罪名,没有一件能站得住脚。远的不说,那就更说不清了。就从1966年5月16日以来,也就是中共中央通过重要的通知,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来,到毛泽东主席逝世,我没有什么自己的纲领,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执行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和政策的,是执行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你们逮捕审判我,这是丑化毛泽东主席。审判我就是丑化亿万人民,丑化亿万人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你们审判我就会使‘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和‘红小兵’抬不起头来。”

审判员打断她的发言说:“我们是代表人民审判你的。”

这是江青的发言第一次被打断,她立即反唇相讥:“你代表人民,你知道什么是人民?你还是戴上假面具吧!不然,太丑了!”

审判长曾汉周按铃警告江青“你再扰乱法庭,就取消你的辩护权利。”

江青:“对不起,我可以方便一下吗?”

曾汉周:“带被告人退庭方便。”

江青站起身,又说:“算了,我不去了,我要念一念《我的一点看法》,你不反对吧?”

曾汉周:“你可以念。”

于是,江青拿起两页纸念道:

“《我的一点看法》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投降叛变,授人以柄。

要害问题,两个纲领:

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继续革命；
以三项指示为纲，以目混纲，修正反党。
穷凶极恶，大现原形。
掩盖罪恶，画皮美容。
树立威信，欺世盗名。
标新立异，妖言惑众。
弥天大谎，遮瞒真情。
偷天换日伎俩，上下其手劣行。
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暗中嫁祸他人。
转移人民视线，妄图洗刷臭名。
罗织诬陷中央文革，迫害灭口有关知情。
只手难掩天下耳目，修正主义螳臂之能。
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乃是人民大众英雄。”

江青说：“这是一、二还没有写完。如果需要，我还可以给你们解释。我不是为自己辩护，我是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捍卫亿万群众人民参加的文化大革命……”

江青接着说道：

“一张起诉报告，满纸胡说八道。要为真理斗争，我的声明如下：你们借助国家名义，拼凑了一个什么特别法庭，给我罗织了一大堆罪名，这些罪名一条也不能成立。我过去的一切都是根据中央的指示做的，我在工作中有错误，有偏差，但绝不是犯罪。……”

“我是执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我现在是为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尽我的所能。你们承认不承认九大和十大？如果不承认，就是离开重大历史背景，隐瞒重大历史事件！”

江青的发言第二次被打断。

她继续说：“我和毛主席结婚已经38年了，我怎么能够反对毛主席呢？当初华国锋抓我的时候就捏造了许多谣言，这些东西现在提都不提了。为什么？不敢见人嘛。你们捏造的这些东西和国民党当年对我的丑化和攻击有何不同？我和毛主席的感情是用历史来证明的。战争年代撤离延安的时候，留在前线追随毛主席的女同志唯有我一个，你们都躲到哪里去了？！”

江青的发言第三次被打断。

江青质问法庭：“你们的起诉书把林彪这个要杀死我的人，作为我这个所谓集团的成员，怎么能把谋害人的和被谋害的搞在一起？说以江青为首的搞这个阴谋活动？然后罗列一些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我，十足地暴露出你们的无耻和卑鄙。通篇的文字，绝大多数是造谣嘛。比如说，你们的材料里说我说过邓小平是汉奸，汉奸这个罪名要有事实呀，我没有材料说他是汉奸呀。我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呢？没有，我从来就没有说过。就是又造谣嘛。不错，我和邓小平之间有斗争，我从来不否认这一点，但是我没有说的话怎么能承认呢？还有，我对时传祥这个人根本不认识，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我怎么会说他是什么工贼呢？这一些事实就说明了，这个起诉书采用了没有的给我捏造，小事情给我夸大，别人的加在我头上。用这样的方法来制造了这起大大的冤案。你们开了这个头，好，后人就会群起而效之，你们将来也逃脱不了这样的下场。就是现在不会这样，将来也免不了这样，这是你们首先挑起来的。”

江青的发言第四次被打断。

她继续说：“我同林彪是有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我和这个卖国贼斗争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在哪里呢！林彪和刘少奇一样，都是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都是把亲手把他们提拔起来的毛泽东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迫不及待地企图取而代之。我作为毛泽东的妻子和战友，为捍卫党的原则，和保卫毛主席的安全，我挺身而出是自然的。党中央授予我一定的领导权后，我始终就在这个权力的范围内进行我的工作，这怎么能说我是非法的呢？这样说，你们把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究竟置于何地？你们究竟还承认不承认九大和十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中央的一系列的重要文件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和批示？

你们根据什么，竟能得出结论说什么有的人是犯了错误，有的人是有意要推翻无产阶级政权？难道毛主席亲自发动，亿万人民积极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为了推翻什么阶级专政、夺取什么政权吗？

这真是一个荒谬不堪的论点，是一个简直叫人难以置信的诬蔑和

构陷。你们这样说，就等于把全国人民的意志都强奸了。

我所干的这一切，邓小平、彭真、华国锋，包括你们现在在台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曾经异口同声地拥护过，参加过，你们又怎样解释你们当年的行为呢？”

江青的发言第五次被打断。

“毛主席早就对我说过，要警惕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杨尚昆以及周扬、田汉、廖沫沙等人的翻案活动，他们肯定是要翻案的，这是一条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一条预见，由于华国锋这个坏家伙和叛徒的出卖，你们暂时地得逞了。但是，有一点我要告诉你们，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中国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熏陶的，人民是经过锻炼的，你们这些修正主义分子，人民将来是不会放过的，我也在这里要告诉你们……”

江青的发言又一次被打断。

她继续说：“林彪指使叶群和他们的小分队去抄郑君里、赵丹他们家的事情，我回顾了很久，这是林彪的罪恶和阴谋的一部分，郑君里和赵丹的死，我是在这里才听说的，你们把这些强加在我的头上，难道不是和林彪一样地对我的迫害吗？吴法宪那个王八蛋是他的走狗，他的话怎么能作为凭据呢？他早就对我和张春桥恨得咬牙切齿，这是人所共知的。

我再在这里申明一遍，林彪和他的小分队对郑君里和赵丹以及对秦桂贞的事情，和我没有任何的关系，你们也拿不出像样的证据来。我倒是怀疑，你们已经和吴法宪这类人串通好了，有意要陷害我，不然，为什么你们至今不让我和郑君里家里的人好好地对质一下事情的经过。你们这样做，就是要造成一种效果，好像我江某人在三十年代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现在你们把要说的话都说出来嘛，我究竟有什么样的把柄攥在你们手里呢？没有，没有，根本没有。江某人在三十年代的所作所为是光明正大的。你们做出了林彪要做而没有做出来的事情，你们才是地地道道的林彪的同伙呢。其实，毛主席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就是把他们结合起来批的，只不过你们要把林彪的设想变成现实罢了。”

江青的发言第六次被打断。

她继续说：“你们所说的那个所谓诬陷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事情，简直是有史以来的奇谈怪论。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对各级机关和部门的领导人提了很多的问题，揭发出许多历史上的丑行，我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向康老要一个有问题的人的名单，就成了所谓的诬陷的证据。难道说，革命群众揭发的那些问题，都是我江某人炮制出来的吗？难道说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等人的揭发材料，也是我江某人策划搞的吗？明明是党中央给他们定的案子，我看了材料给人们讲一讲，就成了我江某人的诬陷，这能说服历史和后人吗？我这里还只是说就算你们所说的材料是假的这个前提上，更何况党中央整理他的每份材料和定的案子都是正确的呢。照你们说来，文化大革命十年来，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这场运动中，所有揭发出来的走资派和叛徒、特务以及一切牛鬼蛇神等等，统统都是假的，统统都是冤案、假案、错案，都是我江某人策划的，这可能吗？这岂不把你们的能力和才华都抹杀了吗？我江某人真要有这么大的本事，我怎么会坐到这个被告席上来呢？ ”

我这样一讲，可能人民群众就能看清事实了，你们这个特别法庭搞的这一切，就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地精心制造出来的大冤案。你们所采取的手段，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然后扩大范围，把我搞臭。天地良心，你们的良心哪里去了？我还是毛泽东的妻子，你们就敢于如此，可见王洪文为什么到了法庭，到了这个地方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江青的发言第七次被打断。

她继续说：“刘少奇的叛徒材料，是他自己三次被捕坐监所写出来的，难道是我编造的吗？他是怎样出狱的，连延安整风的时候，你们现在的中央里的人都提出过怀疑，还有揭发，就是因为证据不够，毛主席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到桌面上来，而且刘少奇还受到重用。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和革命派揭发出来他们大批这样的问题，才进一步引起了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这才经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和批准，成立了中央专案组。这个专案组所有的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都参加了，所有的材料都是集体审定和共同研究的，你们仅仅抓住我批准他们拘留了几个人的报告，就断定刘少奇的

专案是我江某一个人制造出来的，是不是编造得太离奇了吧？是不是难以让历史和后人所接受呢？除非你们和当时的中央是木偶人，否则这一套就是荒谬的，站不住脚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的意见已经说过多次了，你们爱怎么罪就怎么定吧，这个我也没什么。你们现在翻刘少奇的案，翻彭真的案，都是反对周总理，反对康老，都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全国人民能答应你们吗？……”

“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向毛主席负责。现在整的是毛主席。我的家乡有句老百姓的话：‘打狗看主面’，就是说打狗呵，还要看主人的面子。现在就是打主人。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为了毛主席，我不怕你们打。在毛主席的政治棋盘上，虽然我不过是一个卒子，不过，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

“过去我经常说：革命要有‘五不怕’：一不怕杀头；二不怕坐牢；三不怕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四不怕开除党籍；五不怕老婆离婚。这第五条对于我不成问题了，二、三、四条已经三年多了，我经受了，第一条杀头，我久候了！……”

江青又说：

“清君之侧，目的在君。

罗织陷害，血口喷人。

利用专政，搞法西斯。

精神虐待，一言难尽。

破坏政策，凶悍残暴。

造反有理，革命无罪。

杀我灭口，光荣之甚。”

最后，江青大声地说：“这就是我的回答！”

江青的最后陈述，历时近两个小时。

曾汉周：“被告人讲完了吗？”

江青：“讲完了。”

曾汉周：“请把你的原文交给法庭。”

江青：“可以。”她将原文交给值警法警

曾汉周问：“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江青：“已经累了，到此为止吧。”

曾汉周：“把被告人江青带下去。现在休庭。”

此时已是上午 11 时 38 分。



江青在法庭上

第 1444 回：谁怕谁？法官与江青辩论死刑否？徐向前表示反对

邓小平看了江青在法庭辩论时的发言后，气恼地对彭真说：“告诉特别检察厅的同志要准备一篇很好的发言，一条条地批驳这个娘们的诡辩，把她的画皮彻底地剥下来。这个家伙，我早就料定她会在法庭上表演这么一下子的。下次辩论的时候，她如果再继续攻击党的领导人，你们就采取措施，不能让她这样为所欲为。否则，就收不到我们审判的预期目的。”

彭真当即把这个指示通知了特别检察厅：“你们再不能允许江青在法庭上攻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如果她要再讲，你们就押她出去或者采取当庭制止的措施。总之，不能允许她继续如此。”

江华立即做了相应的布置。

5 天后，12 月 29 日上午 9 时至 10 时 26 分，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对江青继续开庭进行法庭辩论。

检查员江文对江青 24 日的辩护词进行了批驳：“江青在长达两个小时的所谓辩护发言中，对本庭指控她所犯的严重反革命罪行，没有提出任何可以证明她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通篇不过是颠倒黑白，混淆视听，转移目标，掩盖罪责的谎言和诡辩……”

江文说江青的全部辩护言论，集中起来，就是攻击法庭对她的审判是什么“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说她的反革命罪行是代表毛泽东主席的，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办的，妄图把反革命罪责，推到毛主席身上，借以掩盖她严重危害国家和人民的反革命罪行，逃避依法应负的刑事责任。

江文列举的事实是，1974 年 7 月 14 日，毛泽东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的话：“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还举了 1974 年 12 月 23 日毛泽东的话：“江青，一不要出风头；二不要乱批东西；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你们看她有没

有野心？我看有。”及 1974 年年底，毛主席说的：“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和 1975 年年初，毛泽东的说：“我死了以后，她（指江青）会闹事。”江文说：“毛主席的这些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现在，江青还要继续把她的反革命罪行说成是代表毛主席的，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办的。这种谎言是骗不了人的！”

不过，江文想到过没有，毛泽东说的这些话，可是没有一句说江青是反革命呀！毛泽东生前也说过邓小平：“说是永不翻案，我看靠不住呀。”那是不是也可以由此判断邓小平也是反革命呀？

江文还批驳江青说的“审判我就是丑化人民”、“你们审判我就会使‘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抬不起头来”。说这是对人民的公开侮辱，这是颠倒黑白的胡说。江文说：“江青代表什么呢，不过代表一小撮阴谋家、野心家、反革命分子……和形形色色的社会渣滓。”又说：“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横行的 10 年中，毒害了广大青少年，严重损害了年青一代的成长。他们同广大群众一样，强烈要求清算你们的罪行。”

江文是这样驳斥江青质问法庭承不承认“九大”、“十大”和怎样看“文化大革命”等说法：“如果讲历史的话，你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反革命，你所谓‘捍卫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捍卫打、砸、抢、抄、抓，刑讯逼供，诬陷迫害那一套，就是要继续把中国人民投入苦难的深渊，就是要掩盖你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累累罪行。”

对江青不同意将她与林彪集团说成是“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一事，江文是这样驳斥的：“大量确凿的证据证明，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江青反革命集团，在 1971 年 9 月林彪反革命集团谋杀毛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被揭露和粉碎以前，曾为了实现共同的反革命目的，或者是公开配合，或者是秘密勾结。他们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颠覆政府，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些方面，江青一伙同林彪反革命集团是狼狈为奸、勾结在一起的，如果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内部后来有矛盾，那不过表明他们是做贼是一伙，分赃有矛盾罢了。”

江文最后再次提出说：“江青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92 条、第 98 条、第 102 条、第 136 条、第 138 条、第 142 条、第 144 条，犯有

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罪、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非法拘禁罪、刑讯逼供罪、非法搜查罪。被告人江青所犯罪行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我代表特别检察厅再一次提请特别法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03条对被告人江青从严惩办。”

江文反驳之后，审判长曾汉周问江青：“你还有什么话要讲？”

江青说：“我要看中共九大和十大政治报告。”

曾汉周说：“这与本案无关，予以驳回。”

江青认为法庭剥夺了她的发言权，大声抗议。

曾汉周按铃警告，江青不予理会，她说：“你们这个法庭根本就不敢把事情的真相讲清楚。华国锋和邓小平对我说的这些事情都有过赞扬的话。当初他们对刘少奇采取的是和我一样的态度。他们的一些表态和检查就在我的保险柜里，你们法庭可以去拿嘛。为什么你们不敢把他们传过来对证。我要和华国锋对证。他就是新的证人，你们……”

审判长打断江青的话说：“法庭已经传唤了证人作证……”

江青也打断审判长的话说：“你们完全是假的，为什么我要的证人你们不让出庭？什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骗人的！”

李作鹏的辩护律师张思之后来回忆说，曾汉周把桌子一拍说：“江青，你是犯人，你是被告，你要怕我们！”

江青一愣，然后反应过来了，说：“什么？我要怕你？”

“对，你要怕我们。”

江青马上说：“怕你？你怕我！”

两个人这样来回几个回合，争论“谁怕谁”。后来江青哈哈一笑，说：

曾汉周一再按铃警告，江青根本不予理会，并大声喊道：“你问问坐在你旁边的江华，看我怕过谁？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一句话把曾汉周提醒了，是啊，江青怕过谁啊？于是“谁怕谁”的辩论到此结束。最后向江青宣布：“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指控你的反革命罪行，本庭经过6次开庭，进行法庭调查，出示和宣读了大

量的证据、通知和传唤了证人及同案被告人到庭作证，播放了你诬陷、迫害干部的讲话录音，事实已经调查完毕。法庭给了你陈述和辩护的权利，给了你充分陈述和辩护的时间。但是，你回避指控你的罪行，不按照起诉书指控你的犯罪事实进行陈述和辩护。反而利用法庭辩护和最后陈述，继续诬蔑、诽谤党和国家领导人，诬蔑法庭和法庭组成人员、诬蔑公诉人，公诉人已指控你继续犯罪，特别法庭在评议时，将予以考虑。”

江青大声说道：“那就让我多长几个脑袋，割了算了嘛，我在这里……”

曾汉周打断江青的话说：“现在我宣布，本次开庭全部结束，把被告人江青押出法庭！”

江青一听，双手抓紧栏杆高声喊道：“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两名女法警将江青双臂反扭，连拉带推，拖出了法庭现场……

一路上，江青不断地高呼口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如何对“四人帮”和黄吴李邱量刑？1980年12月，解放军代表在京西宾馆对此案的10名主犯量刑进行过投票，并提出一张“单子”：

投票人数88人。

江青：死刑并立即执行/33人，死缓/48人；

张春桥：死刑并立即执行/36人；死缓/46人；

姚文元：无期徒刑/65人；20年/11人；

王洪文：无期徒刑/17人；20年/49人；

陈伯达：无期徒刑/32人；20年/27人；死缓/15人；

这时，民革副主席屈武还转给邓小平一封信：

小平同志并转中央：

江青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如不处以死刑，则：1、不能为死者申冤；2、不能平民愤；3、使其余党存死灰复燃的幻想；4、使心有余悸的人担心将来变天。以上几点都不是从法律角度考虑，如按刑律，罪不至死，当然可不判死刑；如依法应判死刑而不判死刑，则将铸成大错。

对江青，徐向前不同意杀。据徐向前的秘书李尔炳将在纪念洪学智上将的一篇文章《不朽的丰碑——纪念洪学智同志诞辰100周年》

中说：

“在审判‘四人帮’期间，有一天，洪老来看徐帅。一进门就说，老帅呀，唯一的一票啊，好啊，老帅的意见还是有作用的。什么唯一的一票？老帅事后才向我们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中央在讨论对江青的量刑时，多数同志主张杀江青，只有徐帅提出，从国际国内的大局考虑，建议不杀江青。中央采纳了徐帅的意见。”

据说，陈云也坚决不同意判江青死刑。

1981年1月25日，特别法庭对“两案”的10名主犯做了宣判。

10名主犯中，除王洪文、江腾蛟认罪外，陈伯达是在律师的谈话后，被迫认罪。而吴法宪却是积极认罪，但却对犯罪事实一概不知。其余6人均不认罪。

姚文元胸前依然别着一支钢笔，金鱼眼睛仍朝着天花板，对起诉他的事实，他只承认有错误，但不认为有罪行，是犯法。

张春桥胡子拉碴，双唇紧闭，从头至尾一言不发。他松弛了的眼睑低垂，一双眼睛更显得成了三角形。

他面对提问，不答；

送达文件，不看；

要他签字，不签！

有位法官，在法庭上反反复复地对他说：“张春桥，你不吭声，你沉默，就是承认对你的控诉了。”

其实，沉默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怎么能因为他的沉默就认为他认罪了？由此可见，这个看似要依法办事的特别法庭，其实法律常识是极低的，在审案的过程中一而再，再而三的犯下了许多法律错误，甚至依据1979年才通过的《刑法》去审理、量刑1976年以前发生的事事实经过。

特别法庭最后对他们10人做了如下判决：

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处被告人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处被告人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判处被告人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处被告人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判处被告人黄永胜有期徒刑 18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
判处被告人吴法宪有期徒刑 17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
判处被告人李作鹏有期徒刑 17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
判处被告人邱会作有期徒刑 16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
判处被告人江腾蛟有期徒刑 18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



审判席上的姚文元



十名主犯被押进被告席上的铁栏里，左起：
张春桥、陈伯达、王洪文、姚文元、江青、黄永胜、
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



审判“四人帮”

江青后来对他的判决书写了大量批语。

对迫害刘少奇、王光美及其他人的“罪状”部分，江青写道：

“1966年底，毛主席跟刘少奇谈话，我在场。

刘少奇问：‘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也要造共产党的反吗？’毛主席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在共产党员内，就要造他们的反，不从党里抓要从哪里抓呢？你读读列宁是怎样教导我们的。’毛主席把《国家与革命》中的一段指给刘少奇看：‘资产阶级思想家，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迫于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而不得不承认，只有在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地方才有国家，但他们又来‘改正’马克思，说国家是阶级调和的机关。在马克思看来，如果阶级调和是可能的话，国家就不会产生，也不会保持下去。在市侩的庸俗的教授和政论家们（他们往往善意地引用马克思的言论！）看来，国家正是用来调和阶级的。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在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看来，秩序正是阶级调和，而不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缓和冲突就是调和，而不是剥夺被压迫阶级用来推翻压迫者的一系列斗争工具和手段。’‘看完了吗？’毛主席说：‘我的书和列宁的书中，都是这个观点。我们的修正主义者很奇怪。当他们打击左派的时候，从来也不讲法律，不讲民主，专门搜

集左派的材料，他们对我们可狠哪。无产阶级刚刚准备反击，他们的一切舆论就都来了，这难道是平等吗？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那以你之见，就这样闹下去吗？’刘少奇反感地和毛主席辩论：‘就不需要制定一定的规矩吗？’毛主席气愤地说：‘又是你们那一套党有党规、国有国法，是不是？以我看，革命就是要打烂一切条条框框，让群众起来彻底革命。在推翻走资派统治的斗争中，是不能给造反派指定那些陈规旧俗的。要不然，还有什么革命二字？’我把这段毛主席与刘少奇的对话，写在这里。立此存照，让世人、后人去评论我有没有所谓的‘罪行’。”

对于把江青等人和林彪集团搅在一起，江青写的批语是：“邓小平他们把我们和林彪集团并为一案审判，有着极大的阴谋。其一，林彪在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过刘少奇、邓小平一伙。他们对所有批判过他们的人都怀着极大的仇恨，以百倍的疯狂进行秋后算账，所以他们要把批判他们的人一块进行报复；其二，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批林批孔，林彪集团已经臭不可闻。邓小平想把我们与林彪搅在一起，借助毛主席的号召，达到他们把无产阶级革命派搞臭的罪恶目的；其三，掩盖林彪集团的极右实质，为推行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鸣锣开道。他们和林彪是一丘之貉，都是极右派，都代表了官僚垄断阶级的利益。我还是那句话：我是最早坚决反对林彪集团的极右路线的人之一。”

第 1445 回：作《决议》，文革被彻底否定 紧接着，各地造反派判刑

1981 年 3 月 9 日，邓小平同邓力群等人谈话，谈《历史决议》的稿子。他说：“问题最大的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部分。现在稿子的调门不符合原先设想的方针。看完后，给人的印象是错误都是老人家一个人的，别人都对。我说过多次了，不能说成别人都对，只有一个人是错误的，这个人就是毛主席。历史不是这样的。这不符合实际。那时的错误，大家都有责任，主要是因为当时我们没有经验。”

3 月 18 日，邓小平在听取邓力群、吴冷西汇报胡乔木对《历史决议》稿的修改意见时再次指出：“决议稿的轮廓可以定下来了。我最早提出写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位的任务，是树立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个问题写不好，决议宁可不写。在这一点上站住了，决议才能拿出去。这是中心，是关键。写好这个问题，才叫实事求是地分清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的是和非、对和错，包括个人的功过。”

他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这一点，他曾经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这些事情写清楚了，再写‘左’的思想的发展，以至于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关于‘文化大革命’这一部分，要写得概括。胡乔木同志的意见，我是赞成的。‘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代人，其实还不止一代。它使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但是，这十年中间，也还有健康的方面。所谓‘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帮’

的反复斗争嘛。”

1981年3月，陈云先后同邓力群进行了四次谈话。

在第一次谈话时，陈云明确表示支持邓小平确定的三条总的原则：“《决议》要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小平同志提出《决议》宜粗不宜细，我是同意的。要在这个原则下面，是成绩就写成绩，是错误就写错误；是大错误就写大错误，是小错误就写小错误。”

在第二次谈话时，陈云认为在历史决议中要确定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地位。为了在写法上使大家能够从这个决议上看得清楚，他建议：“增加回顾建国以来二十八年历史的段落。有了党的整个历史，解放前解放后的历史，把毛泽东同志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么，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的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依据；说毛泽东同志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

陈云在第三次谈话中，具体讲到了建国前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他说，毛泽东同志的威望，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同毛主席相比，包括少奇同志、恩来同志。即使在毛泽东同志犯错误的时候，许多老干部被整得那么厉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他，忘不了他的功绩，原因就在那里。

陈云在第四次谈话时，建议《历史决议》要写上共产国际对我们的帮助，我们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建党初期共产国际起了好作用。在抗日战争期间和建国初期，苏联还是给了我们援助。“这样一些问题，《决议》应该如实地按照事情本来面貌写上去。要通过对这些历史问题的论断，再一次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是公正的。”

3月24日，邓小平亲自去看望陈云，并就历史决议的起草问题交换了意见。

陈云对《历史决议》稿提出两点意见：

(一)要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这

样写,毛泽东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

(二)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在延安时,毛泽东亲自对我讲过三次要学哲学,我把毛泽东的著作认真读了一遍,受益很大。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要选编一些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如《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论联合政府》等;还要选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也要学点历史。青年人不知道我们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3月26日,邓小平在同邓力群的谈话中转述了陈云的意见,他说:“前天我去看陈云同志。陈云同志对修改决议稿又提了两条意见。一是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这个意见很好,请转告起草小组。二是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

邓小平说:“这些意见很好,请转告起草小组,并报告胡耀邦。”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举行预备会议,对提交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进行第四轮大讨论。从6月15日起,预备会议开始分组讨论,起草小组成员分别在各小组对《决议》的起草和修改情况作说明。各位中央委员认真讨论了8天。在这期间,中央还征求了在京党政军机关近千人的意见。

6月22日下午,中央常委召开各组召集人碰头会,了解讨论的情况,邓小平对决议草案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到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的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

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胡乔木、邓力群根据这次会上提出的新问题,对决议草案进行了提交六中全会审议前的最后修改。陈云看后,称赞道:“改得很好,气势很壮。”

6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邀请在京的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及无党派人士、全国政协部分老同志座谈,征求他们对决议稿的意见。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文化大革命有这样一段结论: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什么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决议》发表后,紧接着就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彻底否定文革”的宣传教育。但是,文革能够被彻底否定吗?对立范畴不乏二律背反。左彻底否定右的存在,上彻底否定下的存在,高彻底否定低的存在,大彻底否定小的存在,对彻底否定错的存在,唯心主义彻底否定唯物主义的存在,资本主义彻底否定社会主义的存在,市场经济彻底否定计划经济的存在,这些,可能吗?

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的内乱。这个领导者是谁?是中央领导吗?显然不是,就是指毛泽东。《决议》既要肯定

毛泽东，又将其说成是发动一场内乱的始作俑者，逻辑上似乎很不一致，尽管其中加上一句“被反革命集团利用”，仍然让人一看便知这场内乱的根源是毛泽东。

毛泽东当时的威信确实很高，但能高到在半年的时间内就让大陆几乎所有的人都狂热地投入到一场这样“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的运动中去吗？而且这场运动看上去是与普通的百姓没有什么关系的。如果真是这样，那岂不是当时的中国老百姓都神经有问题了，只有邓小平、陈云等老干部头脑是清醒的？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几乎人人都自觉参与的，广泛、深入的运动，连老太太和小孩都投身其中，挡都挡不住。《决议》将其说成仅仅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这符合历史事实吗？

1982年，上海司法机关审判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余党徐景贤、王秀珍等罪犯。鉴于马天水患有反应性精神病，决定暂不提起公诉，取保候审。后来，由马天水的弟弟马登坡作保，把他领回原籍养病。

马天水返回老家以后，病情时发，经常离家外出，在外胡言乱语。1998年安徽《党员生活》杂志发表《马天水的暮年》一文是这样描述的：

一个寒冷的冬天，华北平原上最后一批庄稼已收割完毕，西风残照，衰草凄迷。一个孤独的老人毫无目的地踽踽独行，时而狂笑，时而嚎叫——他就是当年上海滩上不可一世的马天水。

马天水回到河北唐县老家已经一年了。他弟弟马登坡管束不了，向有关部门提出报告，要求解除担保，由政府处理。有关部门决定派员前往唐县，带回马天水，替他治病。

1983年4月初，一行人来到河北省唐县一个村庄。没有料到，马天水一见到吉普车来到后，就像一匹受了惊的马，一味朝野外狂奔，不一会儿就消失在密密的树丛中了。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寻找，最后才在一条水沟里找到了马天水。只见他趴在沟沿上，脑袋钻进了草丛，只一个屁股撅在外面。显然，他的精神病又发作了。在医生的帮助下，公安人员好不容易把马天水弄上车，离开他的老家。

吉普车在华北原野上奔驰。马天水安静下来了，他环顾着这熟悉的原野，向坐在身边的医务人员念叨起来：“我们在这个土坡上打过日本鬼子一个伏击，那儿原来有日本鬼子一个炮楼，后来被我们游击队炸飞了……”

对抗日战斗历史的明晰回忆，看起来马天水的神智是正常的。可是，一接触到“文革”，他就丧失了理智，胡言乱语。

徐景贤被判处有期徒刑 18 年，剥夺政治权利 4 年。

王秀珍被判处有期徒刑 17 年，剥夺政治权利 4 年。

第 1446 回：胡厚民，法庭作最后陈述 呼口号，黄廉不承认有罪

1982 年 6 月 10 日，武汉市检察院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对武汉市造反派头头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向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7 月 9 日至 21 日，武汉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

在法庭调查中，被告人朱鸿霞、夏邦银基本上承认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

朱鸿霞在第一次开庭审理结束后，在回监所途中看到新华路北湖一带建了很多新房子。他说：“这两年发展真快，我几乎认不出来了，不知道还要不要我参加建设。”他对管教干部说：“不错，法庭很文明，我原以为要拷上去、拷下来的。生活也不错，吃了两个面包。”

夏邦银第一次受审后说：“开庭的方法很文明，起诉书上写的都是事实，我应该认罪。”“刚接到起诉书的时候有抵触情绪，看守所干部跟我谈话以后，感到主要事实是对的，枝节也没有什么必要辩了。人总是在变的，经过这段时间一想，就想通了。”他还对管教干部提出：“我在法庭上有哪些不对的地方，你可以指出来，我好注意。”

张立国出庭受审时，对被指控的十九条罪行中的十条进行辩解，对法庭的审问，时而回答“这不是事实”，时而称证人是“有意作伪证”。被法庭认为是态度反复无常。回监后，张立国说：“法庭出示的证据不公正，只出示公诉人的证据，这个证据都是由公诉人任意取舍的。”

7 月 12 日凌晨 3 时，张立国先后两次用毛巾勒自己的脖子自杀，被值勤民警及时发现制止。法庭调查后期，他的态度有所转变，能承认部分犯罪事实。

被告胡厚民对法庭调查的问题拒不回答。他回到监所后说：“嗨！还不是那么回事，都是些老掉牙的问题，我听了心里好笑。‘一月夺权’是毛主席肯定的，这算反革命夺权，那全国有多少反革命？”

他还说：“我对法庭没有信任感，我们的案子法院作不了主，他们也没有那个板眼做主。有人会为我们说话的。这不是我看不起他们，今天开庭有那么多小车，还不是头头们在看电视。对我们的处理，态度好坏无关紧要。王洪文的态度还不好？结果判了无期，比姚文元还重。态度越好越有鬼。”

他说：“人生能有几回搏，再不说，以后没有听众了。”“不管朱、夏、张判几年，我不管那些，我反正跟他们拼了。”

因此，胡厚民被认为是藐视法庭，破坏法庭规则。当法庭调查他策划 1967 年“126”夺权，并认定这是反革命夺权时，胡厚民只说了一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他还在法庭上喊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胡厚民在辩护时全盘否定了起诉书所指控的罪行。他说：“自古以来，打官司两方面都可以说。但在整个法庭调查中，法庭只听原告的，不听被告的，很显然，是法官先生偏袒原告，压制被告，我认为这是不公正的，严格地说是违法的。第一，把‘126 夺权’说成是反革命夺权是站不住脚的。第二，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规定要搞‘四大’，既然要‘四大’，我们搞的那些何罪之有？第三，还有什么诬陷迫害干部，也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把赵辛初、韩宁夫等搞到武胜路街头，不是阴谋。喻文斌等把省里几个领导人藏了几天，为什么不起诉喻文斌，不外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公诉人批驳了胡厚民为自己进行的辩护，并提请法庭对胡厚民从重判处。

7月24日，胡厚民在法庭陈述：

尊敬的法官先生：

我认为我的问题决非个人问题，而是个社会问题。不为个人陈述，我要为千千万万在文化大革命中致伤致残致死、被批被斗被关的工农兵群众、干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包括他们的子女及亲友）在这里讲几句，为他们鸣冤叫屈。

我认为，既然文化大革命全错了，那就不是你是我非。更不能一派的受害者得到了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得到了各种优厚的照顾；而

另一派的受害者至今不仅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仍然背着各种罪名(包括其子女及亲友仍然遭到歧视和排斥)。人民是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概念,人民法院不应该站在某一边讲话,应该为全体人民做主,伸张正义。决不能以曾经反过或者保过自己来做为判断是非、认定功罪的标准,而应该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大公无私,亲疏一视同仁,不是说在法律目前人人平等吗?我想在这里也应该是平等的。造反派这边伤害了那边的问题,我愿承担一切责任,那么“百万雄师”那边伤害了这边的人,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总不能说这边是人民,那边就不是人民吧?

也许有人说我这是为民请命,对此我将理直气壮地告诉他,这是责无旁贷的。为此,我将代表这些受害者及其亲友特此向人民法院提出口头起诉,希望人民法院真正站在人民立场上秉公执法,严肃审理,为全体受害者做出一个实事求是的公正合理的结论。我起诉的内容如下:

第一、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出于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反修防修而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被打成“三家村”“四家店”牛鬼蛇神、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小邓拓等等罪名的工农兵群众、干部、学生、知识分子,如果这些人确负上述罪状,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应该给这些人员做出一个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二、1967年3月17日,全省上下一个晚上以反革命名义抓成千上万的人,关押时间不等,有的致伤致残致死,如果上述人员确系反革命,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应该给人家作一个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三、1968年底清理阶级队伍时,据曾思玉在总理面前汇报时说:湖北全省清理出几多万人阶级敌人(我当时在场,曾有讲话稿)。如果这几多万人确系阶级敌人,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应该给这些人作一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四、1969年中共中央发出了九·二七指示(我有证据,这个文件是康生搞的),曾思玉、刘丰在湖北大抓“北决扬”、“516”,全省上下被

打成“北决扬”分子，“516”分子的人，数以万计，被批被斗被抓致伤致残致死的人数是空前的，我个人就被打成“516”反革命集团在湖北的幕后总指挥，“北决扬”反动组织的总头目总后台，幕后主要操纵者。假如上述情况属实，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该给上述人员做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到底谁是“北决扬”？到底湖北有没有“516”？应向全省人民讲清楚，好像天津市委就宣布天津没有一个“516”分子，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五、1970年曾思玉、刘丰在大抓“北决扬”“516”的高潮中，每次批斗我时，都要提出一部电台来，并称这部电台是我私设并使用过的。然而，我活了40多岁，还不知电台是何许物也。请法庭审查，假如确认我私设电台并使用过，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请对这个轰动全省的奇案，应该做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六、1976年底以后，全省上下许多人被打成“四人帮”的黑干将、黑爪牙、黑爪毛等等，被抓被斗被关致伤致残致死者无法统计。如果上述情况属实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实就该给上述人员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以上问题如果真正得到了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决，枪毙了我胡厚民，我死也瞑目。如果得不到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决，枪毙了我胡厚民，我死也不瞑目。但是我深信我们伟大的党，必定会做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至于我是判死刑还是只判无期，那就随你们的便罢。但是为了向党向人民表明我的心迹，特写了二首小诗，题为法庭吟：

第一首：

肉躯刀可断，主义枪难灭。

身首异处分，魂尤信马列。

第二首

行至地狱入口处，当像游子返故居

入党当许献终身，捐躯岂能头反顾

一刀可将生命断，万枪难使真理屈

共产党人谁惜死，敢擎方寸照环宇

我的陈述完了，谢谢法官先生

胡厚民

一九八二年八月（七月）二十四日上午于武汉中级人民法院法庭上
重庆的黄廉，自1976年11月，被作为“四人帮”在四川的黑干将，
关押审查了5年多，轮流在全市各单位批斗了4年多后，也于1982年
进行了公开审判。黄廉后来回忆说：

那天我一出监狱就看到摄影机，到会议室之后，检察员给我念起诉书副本，说公安局已经结束了侦察。正式开庭是82年春节假期过后了，那个时候我身体很不好，他们送我去三医院看病，碰到一个熟人问为什么这么瘦，医生说为什么瘦，贫血、身体不好。我坚持不肯让他们抽血，也就算了。

公开审判一直进行了五天，常常上午是周家喻，下午是我。开庭回来之后有加菜，碗里有十几片油炸的肉，他们要我在法庭上听话，说审判完就好了。第一次审判是在政协礼堂，这个时候出门已经是正式的囚车了，我看到从监狱出来到礼堂，2000多米长的街道全部戒严了，机枪架起，阵仗很是吓人。把我押到被告席要我坐下，我就站在那里，看台上坐的是些什么人，所有人的前面都有牌子和标识，只有一个女人前面没有牌子，审判长介绍的时候也没有介绍她。庭长宣布开庭，宣布一下就往楼上看一下，估计是有个什么领导在楼上坐着。然后庭长问我叫什么名字，我不回答，最后我说，你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把我弄来干什么？下面哄堂大笑。他们气得脸色发青，耐着性子跟我解释这是法庭程序，我说要他先回答我一个问题，然后才回答，他说可以。我就问，那个女人面前没有牌子，是刽子手吗？法官气得要命，说我咆哮公堂，要罪加一等。

法官接着就宣布我跟随四人帮颠覆政府，这遭到我的严厉驳斥。我说我是革委会副主任，我自己就是政府组成人员，自己颠覆自己吗？公诉人说提出抗议，说黄廉十分嚣张。我说嚣张，我是一个正直守法的公民，而且是一个正直的政府工作人员，你们拿不出任何证据，把我关了五年，你们自己才是违法乱纪。然后他们就放幻灯片，说黄廉在建设厂煽动反击右倾翻案风，我说这是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批邓是毛主席部署的，上午搞了几个小时休庭。

下午是证人出庭，石有中出来作证，说黄廉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动员我们准备500辆卡车、5万斤粮食，准备上山打游击，问我是否事实？我说没有听清要再说一遍，他刚刚开始说，我就说石有中，你怎么这个卑鄙？他就再也说不起话，当时就想走掉。人看来不能干坏事，干了之后，自己也会看不起自己的，这个人最后在精神上就消沉下去了。

他们又说我犯有反革命杀人罪，我就说请问审判长，有谁被杀？死者是谁？在什么地点被杀？杀人工具何在？凭据何在？你这样的法官判案，冤案都不知道有多少？僵持完了又休庭。我回去之后，说我咆哮公堂，这次加菜没有了。我跟他们说，你们不把加菜送来，明天我就不去了，最后只好又端来了。

最后一天，我在法庭上进行最后陈述，针对检察院的起诉书提出的三个问题，说根据检察院的起诉书和法庭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我有罪，我参加文革是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你们说我拥护四人帮，有些人比我的级别高，跟他们有更直接的联系，你们怎么不追究？就算他们是反革命，也不能因有关系而定罪；文革中间是有严重的派性，问题主要在于以刘邓为首的走资派派出工作组，组织搞抄家破四旧，形成打砸抢，毛主席宽容了他们，我自己就是他们资反路线的受害者，在文革期间屡遭迫害，最后得利的是你们干部，我们造反派只有血泪的付出；在你们所谓的粉碎四人帮过后，没有任何手续，没有任何调查和事实，也是你们以捕代审关押我五年，是你们违法还是我违法？我是革委会副主任，你们没有任何手续就抓，是你们政变还是我政变？文革是中央主导群众广泛参与的社会潮流，如果有错误也只能是中央负责，追究了江青还要抓群众，中国哪有那么多的反革命？你们说几个小丑就搞乱了七八亿人口的国家，把武斗的责任堆在我身上，你们根本没有分清是谁制造派性挑起武斗的，我根本无罪，你们是在闹一个历史的大笑话，我永远都不会服，历史将证明我无罪。我喊了毛泽东思想万岁，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对资反路线要永远造反下去，武警不让我喊，拼命地用劲把我撑下去，把我的肩膀都弄痛了，第二天宣判就不让我讲话了。

又关了两个月，上诉到省高院被驳回，省里面派人来与我吵架。然后就转移到大足省第三监狱关押，那个地方曾经关押过胡风，是专

门关押政治犯的。在我到来之前,他们把监狱进行了一番整顿,把所谓的帮派骨干分子都转移走了,有的到南充,有的到重庆。那个时候刘张还关押在那里,刘结挺已经病得快不行了,张西挺就像是叫化婆,他们就住在我隔壁。我想要去劳动,监狱方说没有劳动的条件,也不会让你与犯人接触的,要我看报学习,交代我不要去墙边,不要去接触武警。监狱政委来找我谈话,我告诉他不要用减刑来吸引我,你们愿意关押好久就关押好久,最多牢底坐穿,我要求他在生活上不要搞阴谋,不要法外加刑,枉法判决已经是无形的杀害,不要再搞法外执法,要他们别把我的东西弄丢了,我需要写信,而且我告诉他们不可能100%服从他们的。

第 1447 回：均判刑，覆巢下岂有完卵 难端平，十年风雨后人评

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早在 1970 年抓“516”时即被隔离审查失去了人身自由。

谭厚兰，1968 年 10 月，与当时的许多大学生一样，被分配到北京军区 4627 部队劳动锻炼。1970 年 6 月，她是 5 人中最早作为“516 分子”被调回北师大隔离审查的。1975 年 8 月，审查结束，谭厚兰被送到北京维尼纶厂监督劳动。谁知粉碎“四人帮”后，1978 年 4 月，北京市公安局又以反革命罪逮捕了她。

蒯大富，自 1970 年 11 月 18 日被带回清华大学后，即关押在工字厅的一个单独房间里，由工宣队派人 24 小时看守。蒯大富有什么反映，随时出简报报军宣队、工宣队总部领导。他就这样在清华大学一直被审查了 3 年，也没有明确的结论。1973 年 10 月，他被下放到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东风化工厂监督劳动。1978 年 4 月 19 日，他被带回清华大学，公开宣布执行逮捕。

韩爱晶，1971 年 3 月 8 日被作为“516”分子从湖南带回北航隔离审查并批斗，同样没有明确结论。1975 年 9 月 8 日，韩爱晶被送到北京密云液压件厂当翻砂工，监督劳动。1978 年 4 月 19 日，他从北京密云液压件厂拉回北航批斗，并在会上公开宣布执行逮捕，带上手铐。

王大宾在清查“516”时，于 1971 年 3 月 9 日，仅比韩爱晶晚 1 天，从成都抓回北京地院关押审查。后来被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一直没有正式的结论。

“四人帮”被抓时，他正在湖北地院李世忠教授领导下搞人造金刚石钻头研究，等待北京市委吴德给地院指示。因为没有结论，王大宾不好回原单位。

这时，人们都对王大宾说：“大宾呀！江青们完蛋啦，压你头上的大石头落地啦，你该彻底解放啦！”

但是,王大宾万万没有想到的是,1978年4月29日,他等来的是武汉市公安局的逮捕令:经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纪登奎五位中央领导签字批准,正式逮捕王大宾。

随即,王大宾被戴上手铐,关进了湖北省武汉市武昌民主路415号、位于蛇山下的湖北看守所,罪名是“反革命”,依据还是当年清查“516”时的那些材料。

聂元梓,自1970年庐山会议后,即在北大开始批判她在庐山的错误,追查她的后台。但是,作为“516”分子,她是5人中最晚的一个。1973年3月1日,她在全校大会被戴上“516”帽子,宣布开除党籍。1975年4月开始,她在北京大学校办仪器厂监督劳动。“四人帮”被抓后,聂元梓认为自己是挨“四人帮”整的,便于1977年年初,从被关押的北京大学24楼跑了出来,到陶然亭公园对面的中央上访接待站,说自己被非法关押,逃跑出来向党中央申诉冤案,然后到北京市委门口,给北京大学打电话,叫他们来人把她接回北大。1978年4月19日,北京大学东操场召开批判聂元梓、孙蓬一大会。随后,她即与孙蓬一一起被正式逮捕。

1978年12月27日,北京市召开30万人大会,批判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5人,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3人被押上主席台批斗。



大会的主会场在首都体育馆，下面还有若干个分会场。开场白后，首先宣布“把反革命分子聂元梓带上来！”然后北京大学的代表批判发言。发言完毕，宣布“把反革命分子聂元梓带下去，把反革命分子蒯大富带上来！”由1968年曾经被蒯大富打成反革命分子的清华大学贾春旺发言。之后，蒯大富被带了下去。把韩爱晶带上来。

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3人都是戴着手铐，脖子上勒着麻绳被押上台的。在批斗会上，聂元梓和蒯大富的绳子没起作用。而韩爱晶对大会发言者指控的许多罪名持“不同政见”，他多次用带着手铐的双手，将两个手的手指伸到脖子上的细麻绳圈里，紧握双拳，狠狠抓住绳圈，向左边跳起来，冲着那个发言的人大喊：“胡说！造谣！”“胡说！造谣！”。警察把他按下去，紧他的手铐。会场一次又一次出现骚动，场下群众发出惊讶的叫声。

1983年3月16日，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在正义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

聂元梓、蒯大富以反革命罪判刑17年，剥夺政治权力4年。

韩爱晶被判刑15年，剥夺政治权力3年。

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对指控他们的反革命罪均不同意，对起诉和判决都表示不服并上诉，北京高级法院驳回他们的上诉并维持原判。

“五大学生领袖”中的谭厚兰，“因犯罪情节较轻，认罪态度较好，免于起诉。”

谭厚兰是怎样做到“态度较好”呢？

原来，1981年，谭厚兰被检查出患有宫颈癌，住进了公安医院。后被保外就医。9月，回老家湘潭治病。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做出了对谭厚兰免于起诉的决定。1982年11月，谭厚兰走完了她人生的最后路程，终年45岁，一生未婚。

王大宾呢？1978年4月29日被正式逮捕后，他的妻子古宝琳心中不平，于1980年1月，疾笔而书，投函国务院信访部：

国务院信访部：

打倒“四人帮”以后，原北京地质学院学生王大宾于1978年4月29日被关押至今。这种长期关押是违反法律的，是错误的。说“王大

宾跟着四人帮干了很多坏事，破坏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说法是言过其实的，是没有充分的事实作为依据的。

法律是应依靠事实来作证据的，而不能以某些“金口玉言”的空编来作为依据，并且，任何地位再高的人也不应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否则，法律又怎能取信于民呢？

对文化大革命中王大宾自己干的事情，应负起政治责任，但是要把当时地质学院学生所干的坏事情都归为是王大宾的错误和罪行，那么，王大宾就是一死也难以承担此罪了，况且，在那谁也管不了谁的年代里，这种归罪法又是多么地蛮横无理！按此法推理，浩劫中国的十年灾难又该归罪于谁呢？

如果说，王大宾只须对自己的干过的事情负法律责任，那么现在的这种关押是缺乏事实和证据的，是错误的。

现实中，不少上了林彪贼船或跟着“四人帮”干了大量坏事的人，现在依然是“官星高照”，他们所干的事情可以算是难以饶恕的，可是被饶恕了，而对于王大宾这样的青年人犯了些错误却审查清理了整整十年最后还关押起来，这是为什么？难道就是因为王大宾无枪无权，地位低贱吗？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来说是一场灾难，这场灾难是怎样发生的，中国人民心中是清楚的，谁也不会相信是几个学生在那里兴风作浪而掀起的文化革命。文革初期，王大宾跟所有青年学生一样，抱着一股革命热情，响应党的号召投入到运动中去，由于当时对中央所发生的错综复杂的路线斗争认识不清，因此，单纯的政治热情被“四人帮”利用了，犯了些错误，但是这些错误是跟当时的历史背景难以分开的。不是吗？在67年68年当时的条件下，中国到底有多少干部和群众抵制了“四人帮”的横行呢？中国共产党许多共产党员中到底有几个为正在被洗劫的中国人民说句话呢？要是当时大家都认识到这个问题，“四人帮”就不可能在中国横行猖獗十年之久了。既然当时的历史事实是这样，那么为什么对还是学生的王大宾要求那么高呢？要求他当时就能去抵制“四人帮”横行呢？

并且，十年来，王大宾一再表示愿意改正自己的错误，但为什么一直不允许他改正错误最后还要置他于死地呢？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

不是经常说要允许人犯错误，允许人改正错误吗？但为何对一个当时还只是二十几岁的青年学生，就不能有这种宽恕的气度呢？

古宝琳

80年1月

1982年6月，湖北省公安厅七处周处长和负责王大宾专案的徐科长对王大宾说：

“你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许多错误，有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和聂、蒯、韩不一样，你安心等待结论，不用急。”

1983年的夏天，看守所和专案人员又通知王大宾，他们到北京找中央汇报请示后，情况是：“对你的问题，有人说：怎么只判‘天派’？‘地派’也要判！”

他们做王大宾的工作，要他顾全大局，要理解不能不对他也进行审判。他们还要王大宾在法庭上注意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且保证量刑时会区别对待的。

结果，王大宾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于1983年8月18日，由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9年，剥夺政治权力2年。比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晚了5个月零两天。

后来王大宾才知道，说“怎么只判‘天派’？‘地派’也要判！”的人是陈云。

1983年10月，中国共产党开始大规模整党。而清理“三种人”是这次整党的主要任务。

“三种人”，按照1982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中的提法，是指“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这一提法最早是陈云于1981年7月2日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座谈会的讲话中提出来的。他说：

“闹派性的骨干分子，打砸抢分子，一个也不能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

1982年1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机构精简问题会议上讲话说：“人一定要选好。还是老话，要坚决贯彻陈云同志讲的几条，几种人不能放进去啊！”

1月18日，陈云在中央组织部送来的材料上批示：“一、出重要，进更重要。二、进的人，必须不让‘三种人’进。”

2月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发出《关于一些领导班子中仍有“三种人”的三个调查材料》。

1984年2月23日，“老红卫兵”孔丹和董志雄二人就一些单位在追查“三种人”时，对“老红卫兵”在文革中的一些事情进行追查一事，给陈云写信，全文如下：

陈云同志：

我们曾是“文革”初期“老红卫兵”的成员，现在想向您反映在整党中应当如何正确对待“老红卫兵”的一些想法。

所谓“老红卫兵”，是指一九六六年夏季一些出身于干部、工农家庭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受当时“左”的路线影响而自发组织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又于同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陆续退出运动，在“文革”的中、后期一直受压抑的红卫兵。

在当前整党中，有人散布一种舆论，说什么“老红卫兵”也是“造反派”；有的地方和单位竟把“老红卫兵”在“破四旧”中发生的问题当作“三种人”问题来清查；还有的人仅仅因为担任过“老红卫兵”组织的负责职务或参加过“西纠”、“联动”这类在“老红卫兵”中名声比较大的组织，就被视为“文革”中有严重问题，而影响到对他们的使用和提拔。

凡此种种，我们觉得同中央有关文件、中央领导同志有关指示的精神都是相违反的，需要澄清和纠正。否则将不利于整党，不利于清理“三种人”和建立第三梯队的工作。

“老红卫兵”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其大多数人在“文革”各个重要阶段，表现是好的，是经住了考验的。他们对党、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深厚的感情，对“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较早不满和抵制，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

“老红卫兵”有没有缺点错误？有。首先，他们一般是学校中最早起来批判校领导的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这个大方向就错了。其次，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主要是一些未成年的中学生）在“破四旧”运动中有过过火行为，有的动手打了老师，有的抄了“地富反坏右”

的家,极个别的甚至打死了人。但是,“老红卫兵”的这些错误与那些造各级党委反、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反的造反派组织的错误,具有本质的区别,与“三种人”更是水火不容的两码事。

整个“文革”期间,贯穿着党的各级老干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林彪、“四人帮”之间的殊死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老红卫兵”是站在前者一边,而为后者所忌恨的。如北京中学生中的“西纠”“东纠”,大学生中的“一司”等,都是周总理和党政军老干部极力支持、引导,用以控制局势、保护老干部、维持社会秩序(如保卫国家机关、保护档案、反对过火行为等)的组织。“联动”更是为了反对中央文革而成立的。他们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前后都被中央文革压垮或镇压,打成“保守组织”或“反动组织”,其中一些受到程度不同的打击和迫害,林彪、“四人帮”还通过追查他们的“后台”来整老干部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那时起,“老红卫兵”作为组织不复存在了,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长期受着压抑,在诸如反“十二月黑风”、“一月夺权”,反“二月逆流”、“批林整风”、“批林批孔”、“批邓”、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文革”的关键时刻,从思想感情到政治态度都是与林彪、“四人帮”对立的。而那些紧跟林彪、“四人帮”,自觉充当中央文革得力工具的造反派(无论是极左派还是“策略派”),却始终把矛头对准党的各级老干部,对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积极参与各地、各部门的夺权斗争,砸机关、抢档案,打派仗,制造武斗,揪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对老干部搞“专案”和进行所谓“群众专政”,围困中南海,组织批斗中央领导同志的各种联络站和大会,窃取、泄露党和国家的机密等等(当然,对这些造反派组织的成员,应根据党的政策和他们在各个时期的具体表现区别对待)。两相比较,“老红卫兵”在“文革”初期的活动、组织及骨干,与他们这些造反派的活动、组织及其骨干,在性质上都是根本不同的。把“老红卫兵”说成是“造反派”,势必把水搅浑,转移人们对“三种人”的视线。

在“文革”初期,“老红卫兵”中一些人也有打、砸、抄行为,如打了当时被认为是“阶级敌人”的人(如“地富反坏”,流氓等),抄了那些人的家,砸了当时被认为是“四旧”的东西(如一些寺庙,某些商标等)。这是在当时“破四旧”的号召下发生的,时间很短暂(个把月左右),我

们认为大多属于一般性错误。当然,对其中情节严重者,如个别打死人的,如果过去没处理过,也必须区别情况,认真处理。但这不能与“三种人”的打、砸、抢混为一谈。我们理解,所谓“三种人”,无论其中哪一种(包括打、砸、抢分子),都是以为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为目的,都首先是严重的政治问题。而“文革”初期,“老红卫兵”中少数人由于年幼无知,搞了一些打、砸、抄的事情,并不是为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服务的问题。如果把这类问题列入“三种人”问题,实际上就模糊了“三种人”的政治性。

“老红卫兵”和“三种人”基本是同一代人,现在大多三、四十岁。正如陈云同志指出的:谁对聂元梓、蒯大富手下的第二、第三、第四把手清楚?老同志不清楚。只有那个时候也是“红卫兵”、后来成为“保守派”、“逍遥派”的人才清楚,他们知道是谁整老干部的(大意)。因此,我们认为在这次整党中,“老红卫兵”虽然也需要结合自己的经历,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觉悟,但对他们在“文革”初期的缺点或一般性错误,绝不应当再予追究,对中央文革曾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罪名,更不应当再拿来作为追究他们的依据。相反,倒是应当充分肯定他们在“文革”中的主流并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依靠他们和广大的中青年和“三种人”进行斗争。

以上是我们个人的一些想法,不知当否,恳请指示。

此致

敬礼

国家经委干部、共产党员孔丹

冶金部干部、共产党员董志雄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2月28日,陈云将孔丹和董志雄的这封信转给胡耀邦、邓小平等
人,并写了他的意见:

耀邦、(剑英暂不送)、小平、紫阳、先念同志:

我建议将此信和陈楚三的材料均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并加发整
党指导委员会和中组部。孔丹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有关部门应当研
究。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
象。清理“三种人”是一场政治斗争,要防止有人将水搅浑。像陈楚三

这样的人要特别警惕，绝不能让他们混进第三梯队，但也要给出路。

陈云

八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陈云所说的陈楚三的材料，是1983年，中组部青干局的处长李志民找到原清华大学“414”头头陈楚三，说中央大力平反冤假错案，解放一大批干部，这些干部多年关监狱、住牛棚，与世隔绝，对文革中的红卫兵怎么回事不太清楚，希望陈楚三写个材料，介绍红卫兵的起源和发展。陈楚三推脱不过答应了，但提出：各行各业都有红卫兵，很乱，他只写学校的红卫兵；红卫兵起源于中学，他对中学红卫兵不了解，只能写大学的红卫兵；其他大学的红卫兵他也不了解，因此，只能写他就读的清华大学的。李志民同意了。

此后，陈楚三花了大约半个月时间，用稿纸写了一万字左右，以私人信件寄给李志民。

当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公布。陈楚三在信中认为：“毛主席确应对左倾错误负主要责任，但中央其他负责人也有左倾错误，例如，清华校长蒋南翔就是被刘少奇打倒的；红卫兵正是左倾错误的产物。”

信中简述了中学红卫兵产生的背景是左倾错误的影响：“遥想当年送苹果，江青阿姨多爱我”，以及他们后来成立“联动”，反中央文革被打成反革命。简述了大学红卫兵部分人因反中央文革也被打成反革命，举了地质学院朱成昭以及报纸上报道的韩爱民等例子。

信中着重叙述了清华大学“414”派和中央文革支持的蒯大富派的斗争情况，指出“414”派“全体是反谢（谢富治）的，骨干是反陈（陈伯达）的，核心是反林（林彪）的”。基本观点是，反对把红卫兵视为“洪水猛兽”，主张对红卫兵也要一分为二。

信中对红卫兵是跟着林彪、四人帮“受骗上当”的说法提出异议。陈楚三指出，“我是共产党员，应当听党的话。叶帅在接见军队院校师生员工大会上说过，林彪同志只有五十九岁，身体非常健康，这是我们革命事业胜利的重要保证，让林彪同志作为我们的副统帅，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最可庆幸的大事。周总理则不止一次说过，江青同志是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不听林彪的、江青的，那么总理的话、叶帅的

话我们听不听？信不信？要是都不听，还能当党员吗？如果一定要说我们受骗上当，那就是受党中央的骗，上党中央的当了。”

他还提出，“中国共产党成立只有六十多年，而文革长达十年，占了六分之一；对长达六分之一的一段历史，不应当简单地‘彻底否定’，而应当认真总结，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他在信中特别提出“八旗子弟”问题。他说：许多干部子弟运动初期敢于造反，紧跟毛主席和党中央；但当自己的父母受到冲击、被打倒，就患得患失，不那么“紧跟”了，有些人逍遥了，有的还因此对毛主席和党中央产生怀疑。比较起来，大批工人、贫下中农和普通干部子弟反而无私无畏，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这封信没有留底，直接寄出了。后来李志民告诉陈楚三，当时中组部青干局局长李锐看过这封信，并批给几位处长、副处长传阅。李志民所在处的副处长刘泽彭也看了。据说，后来刘泽彭将陈楚三的这封信件通过某种渠道送到陈云处，于是便有了陈云对这封信的极其严厉的批示。

2月28日，胡耀邦对陈云的信写下自己的意见：

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办。先送小平、紫阳、先念同志阅批。然后请乔石同志将所有批语及材料印成政治局文件，发各同志。

胡耀邦 二月二十八日

3月1日，李先念也批复：

完全同意。三月一日

中央以中发[1984]2号《会议文件》的形式转发了这封信，文件的标题是：《孔丹、董志雄同志给陈云同志的信》，并同时转发了陈云、胡耀邦、李先念的批示，及“（小平、紫阳、乔石同志已阅）”。

7个月后，1984年10月，孔丹任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常务董事兼副总经理，相当于副部级。

文革中的风云人物至此基本都叙述完毕，各路神仙各自归位，《文革史话》写到这里也该收笔了。

时过境迁，白驹过隙，大革命的领导人均已作古，文革当年意气风发、豪情万丈的年轻人也已耄耋老矣。再回首，许多人发现，那是一段很难被忘怀的十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场大革

命的是是非非，只能留待后人评说，它的价值，也只能由历史的长河冲刷出其本来的面目。

十年风雨起苍黄，神州荡，终难忘。一腔悲愤，何处诉衷肠。百年回首应不识，尘满卷，忆如霜。

大梦一觉治伤创，平冤状，更弦张。书简留言，何止字千行。料得后世议难平，千秋业，何人抗？

一词《江城子》，作为本书的结束。

第七部下卷 各地文革章回索引

北京：

第 1409 回；第 1410 回；第 1411 回；第 1412 回；第 1414 回；
第 1415 回；第 1416 回；第 1417 回；第 1418 回；第 1422 回；
第 1425 回；第 1427 回；第 1429 回；第 1430 回；第 1431 回；
第 1432 回；第 1434 回；第 1435 回；第 1436 回；第 1437 回；
第 1438 回；第 1439 回；第 1440 回；第 1447 回；

清华大学：

第 1409 回；第 1410 回；第 1411 回；第 1422 回；第 1447 回；

四人帮：

第 1409 回；第 1410 回；第 1411 回；第 1412 回；第 1413 回；
第 1414 回；第 1429 回；第 1431 回；第 1432 回；第 1434 回；
第 1437 回；第 1438 回；第 1439 回；第 1440 回；第 1441 回；
第 1442 回；第 1443 回；第 1444 回；

中央军委：

第 1410 回；第 1411 回；第 1412 回；第 1413 回；第 1414 回；

北京大学：

第 1409 回；第 1411 回；第 1422 回；第 1433 回；第 1434 回；
第 1447 回；

邓小平：

第 1416 回；第 1422 回；第 1430 回；第 1432 回；第 1433 回；

文艺：

第 1433 回；

刘少奇：

第 1439 回；

北京航空学院:

第 1447 回;

北京地质学院:

第 1447 回;

北京师范大学:

第 1447 回;

上海:

第 1409 回;第 1416 回;第 1417 回;第 1418 回;第 1419 回;

第 1420 回;第 1421 回;第 1422 回;第 1423 回;第 1424 回;

第 1425 回;第 1426 回;第 1427 回;第 1429 回;第 1438 回;

第 1445 回;

华北地区:

河北:

第 1430 回(保定);

东北地区:

辽宁:

第 1427 回;

西南地区:

四川:

第 1428 回(重庆);第 1431 回(重庆);第 1446 回(重庆);

云南:

第 1428 回;

中南地区:

河南:

第 1430 回;第 1438 回;第 1439 回;

湖北：

第 1418 回；第 1427 回；第 1431 回；第 1446 回；

湖南：

第 1428 回；

华东地区：

江苏：

第 1418 回；第 1422 回；